狱中札记

安东尼奥·葛兰西著

狱中札记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

葆　煦　译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马少展

АНТОНИО ГРАМШИ
ТЮРЕМНЫЕ ТЕТРАД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
据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
《葛兰西选集》俄文版第三卷译出

狱 中 札 记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
葆 煦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75印张 375,000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000
书号 3001·1833 定价 1.60 元

出版说明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年)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生于意大利的撒丁岛，幼年时由于家境贫穷做过多年杂工，中学毕业后又因获得都灵大学奖学金而于1911年入大学研习语言学、历史和哲学。1913年，葛兰西加入意大利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开始为社会主义报刊《前进报》等撰写文章。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思想对葛兰西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并在1919年与陶里亚蒂等创办了《新秩序》周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他自己也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1921年1月在意大利社会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葛兰西等人同该党的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彻底决裂，并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1922—1923年间，葛兰西作为意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居住莫斯科，1924年返回意大利并被选进议会，同年六月共产党人同其他反法西斯团体一起退出议会。1926年1月，在意共的一次代表大会上葛兰西提出组织统一战线以恢复民主、反击法西斯的主张，赢得了大多数党员的拥护。1926年11月，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悍然逮捕了葛兰西，并于次年6月判处他二十年徒刑。他相继被监禁于许多城市，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被允许写信和接受书籍。在他的精神、肉体备受折磨因而健康状况很差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的余生都用于阅读和写笔记，这就是他的两大卷《狱中书信》和《狱中札记》的由来。1933年底，葛兰西终因健康状况恶化暂时获释就医，直到1937年4月

在罗马一家医院逝世。

安东尼奥·葛兰西为工人阶级解放的事业奋斗终生。他进行理论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探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为此在他的《狱中札记》中涉及了极为广泛的理论问题，诸如历史唯物主义和其他的哲学问题，意大利的历史、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政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等等问题。

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在从各自的立场、角度出发研究葛兰西的思想、著作，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也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为了便于我国理论界研究，我们特将此书翻译出版。本书所据以翻译的是《葛兰西选集》俄文版，原书分三卷，第一卷为《新秩序》(1919—1920年)，收入葛兰西在《新秩序》周刊发表的论文；第二卷为《狱中书信》，收入著者在被监禁期间写给亲友的信件；本书为第三卷。葛兰西在写作此书时，为了避开监狱当局的检查，不得不使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来代替通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并故意用一些隐晦曲折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就给翻译和研读本书带来一定的困难，这是要请读者加以注意的。

1982年4月

目　　录

第二部分　革命问题

第三部分　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

第四部分　文化生活问题

俄文版出版者的话

在这一卷俄译安东尼奥·葛兰西选集里，即第三卷，也就是最末一卷选集里所发表的著作，是1929—1935年他在监狱里写的。

甚至葛兰西被法西斯刽子手们关到阴暗的、透不过气来的石头牢笼里的时候，这位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卓越的革命者一思想家、为工人阶级事业而斗争的战士，也没有停止紧张的工作。

在厚厚的三十个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的 2884 页）里，集中了葛兰西的巨大的思想理论遗产。

凡是看到这部非凡的《狱中札记》的人，首先感到惊异的，就是他所探讨的主题的广泛性和多面性。

这里面包括有对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有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观点的批判（在批判里，葛兰西所注意的主要是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权威"贝奈戴托·柯罗齐）；有其他一些哲学方面的著作；有关于意大利历史、意大利知识分子、意大利整个文化方面、特别是意大利文学方面的论述；有关于建立和发展工人阶级政党问题、关于工人阶级争取自己的领导权、争取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斗争问题的论述；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

从性质上来看，《狱中札记》里的资料也是极其多种多样的。除了大量的主题一致的论文和短评以外，在《狱中札记》里还包括有一些单独的评论和记述，它们虽然在主题上彼此没有联系，但却具有自己的意义，它们是作者准备继续发挥的那些题目的最初构思和草稿。

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在科学探讨上极其精湛的葛兰西，自己不止一次地指出，《狱中札记》里面的记述和评论决不是已经完成了的著作。它们基本上具有"备忘"的性质。它们不是一部有机的完整的著作的基础，而是一系列独立的论文的基础。在它们里面所述及的往往是一些还没有经过检验的论断和设想。这些东西只可以称之为"初步接近"。在他进一步研究某一问题时，并不是所有的初步结论都是正确的。葛兰西谈到按照笔记本来分别安排资料的时候说，他也不认为这种安排是最后确定下来的。在个别地方，还可能没有把主要的和次要的区别开来，没有把什么应该列入本文，什么应该做为附注区别开来。

葛兰西在法西斯监狱的严酷条件下进行这种紧张的科学理论工作，要付出多少真正算得是超出人力以外的努力，是难以设想的。这种条件，无论如何不能与一个学者进行自由的和系统的工作时所具备的正常条件相比，因而也就不能不对《狱中札记》的资料的陈述性质烙上自己的印记。

葛兰西这项工作的主要障碍之一，不止是监狱当局的检查，而且甚至是对这项工作的实在的威胁。在写作的时候，不能使监狱里的"监护者"怀疑这些札记具有政治上的目的，怀疑共产党将利用它们去进行活动。为了这个原故，葛兰西往往不得不避免使用一般通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而用特定的名词来代替它们。例如：实践哲学（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élite，"现代君主"（党）；社会集团（阶级）；国家－力量（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有时甚至以假名来代替真实姓名。

缺乏必要的参考资料，也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这本来是进行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作者不仅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可能，而且甚至常常要避免提到这些著作的真实的和全部的名称。作者甚至连有系统地和广泛地利用资产阶级书

刊，也是谈不到的。葛兰西的“科学图书室”主要是他的异常博学和他的非凡的记忆力，而补其不足的仅仅是作者能够在狱中读到的一些为数不多的书刊。

不难理解，所有这些困难，使得葛兰西无法使自己的著作具有有机的完整的形式，把它们加以系统化，加以详尽的说明，确实注明引语出处。

如果考虑到葛兰西在法西斯牢笼里所经受的那些极端难堪的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痛苦，那么，不言而喻，要完成这样一项真正不愧为艰巨的工作，必须具有什么样的钢铁的意志，什么样的英勇的忘我精神。

葛兰西的著作，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宝库来说是一项巨大的科学理论贡献，而且也是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行动指南。然而，《狱中札记》的意义并不止此而已。在研究葛兰西理论工作的过程本身及其方法上，这些著作也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尽管葛兰西没有可能赋与《狱中札记》里面自己的论述以一般在正常条件下准备付印的科学著作所具有的那种完整形式，尽管本卷所载各种著作的完成程度各有不同，而且或许更有甚者，然而恰好由于这一切，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里才更为明显地看出这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理论家的“创作才能”。

出版社在编选本卷著作的时候，基本上以罗马葛兰西研究所提出的计划为依据。

第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它所选收的是意大利出版的《葛兰西全集》第二卷中的哲学著作。

第二部分——“革命问题”。这是葛兰西“现代君主”的译文（稍加简缩）。原文载于意大利出版的《葛兰西全集》第五卷。其中探讨共产党为了争取工人阶级革命领导权而进行斗争的问题，并研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中

所担负的政治任务。

第三部分——“历史和政治问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黎沙治孟多（意大利第一次复兴）”，另一部分是“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前者载于意大利出版的《葛兰西全集》第四卷。后者译自第五卷。

第四部分——“文化生活问题”。探讨知识分子历史问题，以及知识分子在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作用问题。此外并研究文学和文学批评问题。原文载于意大利出版的《葛兰西全集》第三卷及第六卷。

凡附注下未特别指明注者的，都是葛兰西原有的附注。这和前两卷相同。俄文译本编者附注载于卷末（中译本均移至当页——译者）。

第一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问题

I. 研究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绪论

关于本题的几句前言

必须打破一种传布得很广的成见：哲学是一门很难的学问，据说因为这是这样一种智力工作，能从事这种工作的只有一定范围内的学者专家，或者，换句话说，只有经常在这方面工作的职业哲学家。为了打破这种成见，必须先证明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确定这种“全世界的人”都具有的“自发的哲学”的界限和特点。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包含在（1）语言本身里面，这种语言不只是（而且也不就是那样）除了词汇意义之外就是毫无内容的一些单词的堆积，而是一定的语法的概念和观念的总和；（2）包含在日常知识和常识里面（senso comune e buon senso）；（3）包含在民间宗教里面，因而，也就包含在整个一套民间信仰、迷信、观点、生活方式和行动方式里面，总而言之，这种哲学包含在通常被人们归纳在一起而称之为“民俗”的那一套东西里面。

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每个人都无意识地各有一套哲学，因

为哪怕是任何一种智力活动的最起码的表现，哪怕是在“语言”中，都包含有一定的世界观。证明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转而考察第二个因素，即批评和自觉的活动这个因素——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一种思考方法更优越些。可以“思考”而不批判地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即没有联系地和偶然地“思考”，换句话说，“同意”某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外界、是社会集团之一机械地强加上来的，而每个人自从进入意识世界的时候起，就会自动地被引进到这种社会集团里面来（这个意识界的范围，可能限于本乡或本省，而这个意识界的根源可能是教区的教会，可能是地方神父或教长的“智力活动”，他们的智慧具有法律的效力。这个意识界的根源可能是继承了一套魔法的老太婆，也可能是一个由于愚昧和行动无能而自以为是的小知识分子）。但是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思维方法，就是通过自觉的和批判的思维，以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从而通过大脑紧张的工作，选定自己的活动范围，认真参与完成世界历史的工作，成为本身的主宰，而不再消极地和驯服地等待着周围世界来使你这个个人形成。

附注一。人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总要附属于一定的集团，而且恰恰附属于一切和他采取同样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的社会分子所加入的那个集团。人总是努力同某一种适合的制度相适应。人始终是人群或人的集体。问题是在下面：这个适合的制度、这些以人为其元素的人群属于哪一个历史类型？如果一个人的世界观不是批判的和彻底的，而是偶然的和矛盾的，这个人就同时属于许多人群，他自己的个性就会杂乱得令人奇怪：在他的个性里，将同时有使他类似原始洞穴人的成分；最新的和先进的科学的原理；一切成为过去的、狭隘地方的历史阶段的残余；全世界整个人类的、未来哲学的直感的萌芽。因此，批判自己的世界观，就是使它具有一致性和一贯性，把它提到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界已经达到的那个高度。

因而，这也就是批判所有以前的哲学，因为所有以前的哲学在民间哲学里留下了坚固的冲积层。人对于自己的世界观进行这种批判改造，是从他意识到他实际上是个什么人开始，也就是从一个人"认识自己"是整个以往历史过程的产物开始。这种过程在你身上留下了自己的无数的遗迹，这就是你没有查看财产清册而接收下来的包袱。为了从头做起，必须编造这本清册。

附注二。不能把哲学同哲学史分开，也不能把文化同文化史分开。不认识世界观的历史性，不设想这个世界观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不认识这个世界观同其他世界观或其他世界观的要素相矛盾，就不能成为最直接和最完全意义的、也就是具有批判地认识的和一贯的世界观的哲学家。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所要回答的是明确的、现实提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十分确定的，而且在它们的现实性方面是"独创的"。怎么可以用那些为了研究过去的问题、往往是相当遥远的、而且是已经完全克服了的过去的问题而制定出来的概念，来说明现在，而且是十分确定的现在呢？如果情况当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思想家在当时就成为"不合时宜"的，就是说，他是化石，而不是现代的活生生的人。或者，至少这是说他是"造作"得不象个样子。在事实上，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有的社会集团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最发达的现代生活，而在其他一些方面，都落后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因而不能达到充分的历史独立性。

附注三。如果每个人的语言都包含着世界观和文化的成分在内这种说法是对的话，那么，根据语言可以判断讲话者的世界观的复杂性的大小这种说法也应该是对的了。一个人只讲方言，或者了解民族语言的程度不够，则与之相联系的必然是比起在世界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伟大思潮来或多或少狭隘的、地方性的、极端落后的、不合时宜错误的。他的利益将是狭隘的、或多或少小团体的和经济主义的，而决不是普遍的。假使不能经常有机会去研究许

多外国的语言，以便了解各种不同的文化，那么，最低限度也必须很好地研究民族语言。一种伟大的文化，可以译成其他民族文化的语言。任何其他伟大的文化，都可以译成在历史上发展的和丰富的伟大的民族语言。换句话说，用民族语言可以表现世界文化。用方言就做不到这一点。

附注四。创建新的文化，并不只意味着独自去进行"特创的"发现。它也意味着——而且这一点特别重要——批判地传布已经发现的真理，即把它们所谓"社会化"，从而把它们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的和道德的结构的要素。被导向统一的和一贯的认识实在的现实的方式的人民群众——这是一种"哲学"事实。它比某一位哲学"天才"发现新的真理更有意义，更为"独创"，因为这种真理只能成为狭隘的知识分子集团的财富。

常识、宗教和哲学之间的联系

哲学是一种精神结构。无论常识或宗教都不能成为这种东西。在实际上，宗教与常识之间，也不是一致的。而且宗教是常识的零零碎碎的要素之一。同时，"常识"是个集合名称，也正如"宗教"这个集合名称一样，一致的常识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也是历史在其形成中的产物。哲学是对于宗教和常识的批判和克服。在这种场合下，哲学与同常识对立的"理智"一致。

科学、宗教和常识之间的关系

宗教和常识不能形成精神结构，因为它们甚至不能在个人意识中达到统一性和一贯性，在集体意识中，就更谈不到了；它们不

能"自由地"达到统一性和一贯性，因为甚至"强迫地"达到——过去也的确达到过——，也只能是在一定的限度内。宗教问题不是从教会意义来考察，而是从世俗意义来考察，宗教问题作为一个信仰统一问题。信仰既确定世界观，也确定与此世界观相适应的行为准则；但是当时为什么不称这种信仰的统一性并非"宗教"，而称为"思想体系"，或者，干脆称为"政治"呢？

在事实上，一般的哲学是不存在的，存在着各种哲学或世界观，不得不经常从它们当中进行选择。怎样进行选择呢？这种选择仅仅是纯粹的智力活动，还是较为复杂的呢？不是往往有这种情况吗：在智力活动和行为准则之间暴露出矛盾来？在这种场合下，哪一种世界观是真正的：是根据逻辑确定的、作为智力活动的那一种呢？还是从每个人实在的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包含在他的事业中的那一种？而因为我们的活动始终是政治的活动，能不能说，每个人的真正哲学完全包含在他的政治里面呢？这是思想与事实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两种世界观的并存——一种是在口头上肯定下来的，另一种是表现在事实上的。这种并存情况并非经常都是不诚实的结果。用不诚实来解释，这对于若干单独的个人，或者甚至人数比较多一些的集团来说，可能是满意的。但是，当矛盾发现于广大群众的生活表现中的时候，再用不诚实来解释，就不能满意了。这时，它不能不是社会历史制度的较为深刻的矛盾的表现了。这就是说，当一个具有自己世界观（哪怕是刚刚萌芽，哪怕是仅仅表现在它的行动中，因而不是不间断的、而是时有时无的）的社会集团，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去进行活动的时候，由于它在智力上依赖于另外一个社会集团并服从这个集团，因而它就不能以自己的世界观为指南，而是以它从另外那个社会集团借用过来的世界观为指南了。它在口头上确认了这种世界观，甚至相信必须追随这种世界观，因而它在"正常的时候"也就是当它的行为还没

有成为自主的和独立的，而依然是从属的和依赖的时候，他就追随着这种世界观。这样看来，不能把哲学同政治分开；不仅如此，可以表明的是：选择和批判世界观也是一种政治行为。

因而，必须说明，怎样会在所有一切时代都同时存在有许多哲学体系和流派；必须说明，这些体系和流派是怎样产生的，是怎样传布的，为什么在传布时，它们会造成一定的争执，会采取一定的方向等等。这就表明，多么需要批判地并一贯地使自己的世界观感和人生观感系统化，确切地确定，所谓“系统”应当指什么，以免学究式和教授式地去理解它。但是这项工作必须而且也只能通过哲学史来完成。哲学史告诉我们，思想在若干世纪的过程中有了什么样的发展，我们现在的思想方式付出了多少集体的努力，我们现在的思想方式扼要地并且概略地包含着这整个过去的历史，连同它的错误以及妄诞的观念在内，虽然，另一方面，也并没有排除以往所犯过的和纠正过的错误，现在不可能重演和不需要再一次纠正。

民间对于哲学的观念是怎样的呢？这种概念可以用日常语言的说法来重述。最流行的说法之一，就是“哲学地看待事物”；这种说法的分析表明，在这种说法里面也有某种值得注意的东西。不错，在这种说法里包含着有一种隐蔽的号召，号召驯顺和忍耐，然而，据我看，其中最重要的恰好是号召深思，号召弄清楚并且认识到所有发生的事物在实质上是合理的，并且正应该这样去理解它们，集中所有自己的合理的力量，不要被本能的和任性的冲动所左右。这些使用“哲学”和“哲学地”字眼的老百姓语言的说法，我们可以拿来同那些从大辞典里摘下来的、用民间体裁写作的作家们的相仿的说法结合在一起，那时我们自会看到，这些话语具有很确切的意义，它们表明，在赋予个人的活动以自觉方向的一般的必然性观点上克服了本能的和原始的热情。常识的健康的种子，也

就是那值得继续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和完整的体系的恰好可以称之为理智的东西，正在这里。于是又一个原因突现出来了，根据这个原因，不能把所谓“科学的”哲学同所谓“庸俗的”及仅仅代表思想和见解零星的总和的民间的哲学分开。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任何一种世界观，即那成为一种文化运动、“宗教”、“信仰”，换句话说，哲学本身作为理论“前提”(可以说是“思想体系”，假使把“思想体系”这一术语正是在其最高意义上使用，即在被隐蔽地包含在艺术、法律、经济活动里面——包含在一切个人的和集体的生活表现里面的世界观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隐蔽地包含在其中的实践活动的意志的任何哲学的主要问题，也就是作为保持正由于这种一定的思想体系而结合和联合的一切社会集团思想体系统一的问题。各种宗教的力量，特别是天主教会的力量，过去和现在即在于它们尖锐地感觉到必须在统一的教义基础上把全部“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并努力不使智力较高的阶层同低下的阶层脱离。罗马教会经常最坚决地进行斗争，以反对“正式”成立两种宗教：“知识界”宗教和“普通人”宗教。这种斗争不使教会本身感到很大不快是不行的，但这些不快是同那改造整个市民社会，并且包含着对宗教的整个瓦解性批判的历史过程联系着的；同时也突出地表现出了教会人员在文化领域内的组织才能，以及教会在自己的范围内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所建立的那种抽象的合理的和公正的关系。毫无疑问，耶稣会教徒在建立这种均衡关系上，是最灵巧的能手，而为了保持这种均衡关系，他们使天主教具有一种努力在一定限度内满足科学和哲学要求的进步运动的外观。可是他们做起来很讲究方法，速度很缓慢，甚至当“巴西的法西斯党徒”觉得他们是“革命的”和具有煽动性的时候，“普通人”群众也还没有感受到什么改变。

所有的内在论学派的哲学的最大弱点之一，一般地说，正是他

们不会建立下层与上层之间、“普通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体系的统一。在西方文明史中，这一事实在文艺复兴以及部分地宗教改革的迅速瓦解中，在它们与罗马教会相比为期短暂的过程中，以全欧洲的规模暴露出来了。这个弱点也在小学教育问题的提法上表现出来，因为内在论学派的哲学甚至没有试图建立一种能够在教育儿童方面代替宗教的主张；从这里就出现了那种假历史的诡辩论，一些非教徒的教育家（实质上是无神论者）就在这种诡辩的掩护下，让出了阵地，同意讲授宗教。因为，据他们说，仿佛宗教是人类哲学的童年，这个童年要在每个真正童年中——要在人类、个人的童年中复生。唯心主义也同样表现出自己是“走向民间”的文化运动的敌人。这种文化运动采取所谓民间大学及与其相类似的机构形式。这种敌视决不能用他们的恶劣的方面来解说（因为如果这样，唯心主义者只须设法加以改善就行了）。这些运动毕竟值得注意和研究，这些运动成功之处在于他们证明了“普通人”具有提高到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更高的世界观的真诚的热情和坚定的意志。然而，在这些运动中，既没有哲学思想同“普通人”利益之间的任何的有机联系，更没有文化活动的组织上的稳定性和集中，他们毋宁象是英国商人初遇非洲黑人：用不值半文的商品去换取金块。另一方面，思想的有机性和文化运动的稳定性只能在下列条件中产生：知识分子与“普通人”有一种应该存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性，即要是知识界能成为这些群众的有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知识分子能对于这些群众的实践活动所提出的原则和问题加以研究并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同这些群众组成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这里又发生了一个已经涉及到的问题：哲学运动是仅仅在哲学被利用来发展知识分子的狭隘集团的专门化了的文化的限度内才是哲学运动呢，还是仅仅在下面这个条件下才是哲学运动：即在研究着科学的、一贯的、较常识为高的思想的

同时，决不忘掉同“普通人”保持联系，并且在这种联系中，找到须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的来源？仅仅由于这种联系，哲学才成为“历史的”，才清除掉个人性质的智力成分，而成为有生命力的①。

实践哲学在自己发展的初期，除了从论战和批判的立场，证明自己对于以前的思想方式和具体的现有思想（或世界上现有的文化）所具有的优越性，不可能出现。因此，它首先就从批判“常识”（首先利用这种常识做为基础，来证明“大家”都是哲学家，证明问题不是 ex novo② 把某一门科学引入“大家”的个人生活里面来，而是在于对已经存在的思想活动加以更新，并且赋予它以批判的方向），然后，再去批判产生哲学史的知识分子的哲学；因为知识分子的哲学是个人的（而这种哲学确实主要是个别独具天赋的个人发展出来的），所以，可以把它看成是常识，至少是社会中最富有教养的阶层的常识、通过他们也是民间的常识。发展中的“顶峰”的一个链条。这就是为什么在怎样研究哲学这一节里，应该概括地说明整个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而整个文化仅仅部分地反映在哲学史里面，但是，由于缺少常识的历史（由于缺少文献资料而无法编造这种历史），所以哲学史依然是用以批评这些问题，用以证明这些问题的真实价值（假使它们还具有价值的话）或者它们作为在道路上已克服的阶段所具有的意义，用以确定新的当前的问题，或者旧问题的当前的提法的最主要的研究根据。

---

① 在“实际上”把哲学与常识加以区别，以便更好地表明从一个要素到另一个要素的过渡，也许是有益处的；在哲学中，放在第一位的，是个人研究了的思想的轮廓；而在常识中，正相反，则是某一时代和某些人民集体的经过总结的思想的模糊和零散的轮廓。然而，任何哲学都力图成为某一个，哪怕是狭隘的阶层（例如，整个知识界）的常识。因此，问题在于形成已具普遍性或能够普及的哲学（由于它同实际生活相联系并且来自这种实际生活）——这种哲学就会成为具有一贯性和说服个人哲学的力量的更新了的常识；但是，假如哪怕是一瞬间忘掉了必须同“普通人”文化上联系的话，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② ex novo（拉丁文）是重新之意。——译者

"高级"哲学与常识的联系，如"政治"的保证，正如知识界的天主教与"普通人"的天主教之间的联系为政治的保证一样。然而，根据联系的性质来看，这两种场合彼此是根本不同的。就是：教会之所以不得不接触"普通人"的问题，是表明"信教者"团体造成了深深的缺口，这种缺口如果说可以弥缝的话，不是通过把"普通人"提高到知识界的水平（教会甚至也就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因为教会在现今的情况下，无论从思想上，或者是从经济上来看，都是不能胜任这种任务的），而是要通过为知识界实施铁的纪律，使他们不能超越一定的分界线，不致把缺口变成不可弥缝的、造成祸害性的鸿沟。过去，信教者团体的这种"缺口"，是由强大的群众运动来填补的。这些运动，结果以强有力的人物（圣多米尼克，圣芳济）为中心[①]成立了新的教团，运动也就于此完成。

然而，反宗教改革却摧毁了这些澎湃的人民的力量："耶稣会"〔耶稣会徒教团〕——这是起源反动和专横、具有镇压和"外交"性质的最后的大教团。它的诞生标志天主教会机体的麻痹，后来成立的一些新教团，对信教者群众来说，其"宗教的"意义是十分微小的，但其"纪律的"意义却很大。这些新教团从它们诞生的时候起就是或者随后即成为"耶稣会"的分枝机构和触角，以及既得政治阵地的"保卫"工具，而不是发展的更新力量。天主教成了"耶稣会教"。现代主义[②]所造成的，不是"教团"，而是政党，即基督教民主党[③]。

实践哲学* 的立场是同天主教的立场相反的。实践哲学力图

---

① 中世纪异端运动（发生在由于产生公社而造成的社会冲突的基础上）对于教会的政客手腕和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曾经是这种政客手腕的表现之一）来说，是一种反动，它表明在教会问题上群众与知识界之间的关系中所出现的深刻缺口。这种缺口，由于出现民间宗教运动（教会把这些运动据为己有，从而成立了乞食教团并形成了新的宗教统一）而"合拢"了。

不把“普通人”阻留在他们的原始的常识哲学的水平上，相反地，力图把他们导向更高的认识生活的形式。实践哲学认定必须使知识界同“普通人”接触，这并不是为了限制科学活动和为了在群众的低下水平上保持统一，而恰恰是为了建立一个智力-道德集团，这个集团要使所有群众，而不仅限于狭隘的知识分子小集团，能够在政治上进步。

活动的人——群众的成员在实践中活动，但是他没有明确地从理论上认识他这种活动，其实，这种活动也是在认识世界，因为它在改变世界。不仅如此，他的理论认识，在历史上可能同他的活动相矛盾。也许，可以这样讲，即人——群众的成员有两种理论认识（或一种矛盾的认识）：一种——包含在他的活动本身里，并且实在地把他同他那些在实践上改变现实的所有同志联合起来；第二种——在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或者口头的，是群众从过去继承下来

---

② 现代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天主教神学中的一个流派，它的目的是使天主教适应现代文化发展水平以保存天主教会在人民群众中的阵地。现代主义者所标榜的口号是“更新”宗教，“使它符合实证科学和哲学的最新成就”。

现代主义最初产生于法国（姆·布朗德尔，让·帕拉尔等）。意大利拥护现代主义的有洛莫罗·姆里，艾尔涅斯特·布奥那依乌蒂（他们在米兰出版《复兴》杂志）以及作家佛加查罗，实证论哲学家罗伯托·阿尔狄戈。

梵蒂冈很快就感觉到甚至这种修改天主教基础的企图对于它是多么危险，因此在许多通谕中宣布现代主义是“异端中最恶劣的”，要求神甫在就任教职时宣誓不支持现代主义。——俄文版编者

③ 这里提起一段逸话是合宜的。这是斯武德④在自己的《回忆录》（Steed，Memories）里讲的：一位红衣主教对一个倾向于天主教的英国新教徒说，圣亚努阿里的奇迹，只是那不勒斯老百姓的信奉对象，而不是知识界的信奉对象，甚至在福音书里也有“夸大”的地方。当问他“难道我们自己不是基督教徒吗？”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们是主教，也就是罗马教会的政治家呀！”

④ 斯武德·亨利（1871年）——英国记者和政论家。在1897—1902年担任《泰晤士报》驻罗马的记者。1924年出版两卷《回忆录》（Through Thirty Years）（《三十年来》）。——俄文版编者

* 实践哲学系指马克思主义。——译者

的，并且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的。虽然如此，但这种"口头的"认识不是没有结果的，它附着于一定的社会集团，它影响道德行为，影响意志的方向——这一切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能达到一点，那时认识的矛盾将不再容许任何行动，任何决定，任何选择而造成道德的和政治的消极状态。因此，批判的理解自己本身是通过政治的"领导权"的斗争实现的，是通过相对立的方向的斗争实现的，开始是在伦理方面，随后是在政治方面，最后形成自己的现实观的最高完成。当你认识到你是一定的领导者力量的一部分的时候（也就是政治的认识）——这就是往后的和进步的自觉的第一阶段。归根到底，理论和实践在这种自觉之中结合起来。这就是说，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并不作为机械的原始论据而存在，却是作为历史形成的过程而存在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两种概念要经过整个一段路程：由以几乎本能地认识理论与实践彼此之间的"差别"，"破裂"和互不关联为特点的基础的和原始的阶段起，一直到实在地和完全地掌握一套完整的和统一的世界观为止。这就是为什么应该强调，领导权这个政治概念的发展表明巨大的哲学上的进步，而不仅是实际政治行动中的进步，因为这种发展必然引起和暗示智力的统一以及符合那种克服了常识并成为批判的（哪怕暂时还在有限的范围内）现实观的伦理。

然而，甚至在最新实践哲学著作中，理论和实践统一这个概念的深度也还没有脱离其最初的阶段：机械论的残余依然存在，因为在谈到理论时，把它作为实践的"附加物"、"补充"实践，作为实践的仆从。这个问题从历史上提出来，也就是做为知识分子问题的政治方面提出来，也是正确的。从历史上和从政治上看，批判的自觉表现在造成智力的 élite（杰出人物）上面。群众不组织起来（广义地），就不能"崭露头角"并成为独立的"自身"；而这种组织，没有知识分子，也就是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

理论同实践统一的理论方面在那些专门研究制定哲学概念的人这一阶层的活动中，以具体的形式超然出众。但是这种知识分子形成过程是长期的、困难的、充满矛盾的，有时是前进的，有时是后退的，有时是分散的，有时是重新组织的。在这个过程中，群众的"忠实"（而忠实和纪律是表现群众在整个文化发展中的参与及合作的最初形式）不止一次地受到严重考验。发展过程是同知识分子——群众的统一的辩证发展相联系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在发展着，但是每一次向知识分子阶层的"宽广性"和复杂性的新阶段跃进时，是与"普通人"群众的类似运动相联系的，后者提到更高的文化水平，同时拔擢出一些单独的个人或多少大一些的集团，从而在专门化的知识分子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将经常重复出现一些时机，那时群众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个别代表或者某些集团）之间发生分裂和失去接触——从此也就产生一些所谓"附加物"、补充和隶属的印象。当着理论与实践这两个要素不只是划分出来了，而且彼此分开了，决裂了（这一过程本身是纯粹机械的和有条件的）以后，坚持"实践"这一要素在理论与实践统一中的主导作用，这就表明运动还没有脱离相对原始的历史阶段，表明运动还在通过经济-团体阶段①，在这时候，"基础"的一般状况发生量的变化，而相适应的质的上层建筑刚刚产生，可是还没有取得有机的形式。应该特别强调现代世界中政党在制定和传布世界观方面的重要性和意义，因为它们在基本上制定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也就是作为在其历史活动中从这些世界观出发的特殊的"实验家"而活动，党从积极的群众中进行个人选择，而这种选择无论在实践方面，无论在理

---

① 经济-团体阶段——葛兰西把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和它的社会认识的发展过程分成三个阶段，这是其中的第一个阶段的名称，——俄文版编者

论方面，都是彼此关联的；而且，新的世界观本身在对待旧的思想方式上，越表现得有生气，越表现得急进地革新，越表现得对抗，那么，理论同实践的联系就越密切。因此，可以说，党在培养新的、完整的、无所不通的智力，也就是说，党象是一只坩埚，把理论同作为实在的历史过程来理解的实践熔于一炉。由此可以明白，一个建立在个人加入的原则之上的组织，而不是"工党"类型的组织，是多么必要，因为，如果问题是在于有机地领导"所有在经济上积极活动的群众"的话，那么，这意思就说，不应该照老一套领导这些群众，而要采用革新的方法；革新活动在初期除了通过 élite（杰出人物）以外不能传布到全体群众，因为在杰出人物中，贯穿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现实的认识，完整的和一贯的认识，成了明确的和坚决的意志。

上述阶段之一，可以根据《文化》撰稿者密尔斯基[①] 在其论文中谈到的一次辩论来加以研究。在那次辩论的进程中，表现出实践哲学中最新的改变。从这次辩论中看出，已经从机械的和纯粹外表的观点过渡到积极的观点。这种观点，正如已经指出的，在更大的程度上接近于正确理解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尽管它还没有包括这个代表辩证综合的统一的全部意义。可以指出，决定论的、宿命论的、机械论的成分赋予实践哲学以一种直接的思想体系的"芳香"，一种宗教的和兴奋（但却是麻醉剂的样式）剂的特殊形式；但这是历史必然性，它是可以用一定社会阶层的"从属"性质来解释的。

当斗争的主动权失掉了，因而失败时期来临的时候，机械的决

---

① 这里大概是指德·斯·密尔斯基的论文《布尔什维主义中的民主制度和党》(D. S. Mirskij, Democratie und Partei im Bolschewismus)而言。该文载于罗登编辑的《民主制度和党》论文集里，1932 年维也纳出版。戈列杰尔在 1933 年《Bibliografia Fascista》(《法西斯主义者书目提要》)中提到这部论文集。——意文版编者

定论就变成了精神反抗、团结、顽强而忍耐的韧性的雄伟力量。“现在我遭到失败，但是环境的力量渐渐有利于我起来”，等等。实在的意志变成了对于某种历史的合理性的信仰行动，变成对于热情的非那尔论[①]的经验形式和原始形式的信仰的行动。而这种非那尔论是作为前定和启示等忏悔的宗教的教义之替身而出现的。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这一点必须坚持——，强有力的意志活动实际依然继续存在，直接干预着“环境的力量”，但只是在隐蔽的、遮掩的自感羞涩的形式之下。因此，意识是矛盾的，它缺乏经过批判的统一性等等。但是，一旦“从属者”成为领导者和群众的经济活动的负责者的时候，机械论在一定时机就发展为严重的危险，全部思想方式发生修正，因为社会生活方式变化了。“环境力量”的统治界线缩小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从属者昨天实质上是事物，现在他已经不是事物，而是历史人物，是主角了；如果说昨天他是个不负责者，因为“反抗了”别人的意志，现在他感到自己是责任者，因为他不再反抗了，而是活动了，而且根据必要性活动得很积极，进取心很强。但是即使是在昨天，难道他曾经在什么时候，仅仅是“反抗”，仅仅是“事物”，仅仅是“不负责任”吗？当然，不是的。不仅如此，应该着重指出：宿命论不外是一种服装，弱者穿上它用以遮掩积极的和实在的意志。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经常揭穿机械决定论的空洞。这种决定论假使还可以给自己找到解释，说它是群众的素朴哲学（而且就是它唯一为他们的努力而服务的场合）的话，那么，当它被知识分子推崇为考虑周详的和完整的哲学的时候，甚至不待从属者成为领导者和负责者，它就会变成消极的原因，白痴般自满的原因。有一部分群众甚至处于从属地位时，也

① 非那尔论（语源来自拉丁文——finalis。——译者）——目的论的一个变种，相信自然和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目的，这种目的预先决定某种发展的方向，并相信达到这种目的是不可避免的。——俄文版编者

经常是领导者和负责者，而这一部分群众的哲学经常是全体群众哲学的前驱，不仅是理论方面的前驱，而且也是现实的必然性。

关于机械论观点是从属者的宗教这一点，只要一分析基督教的发展，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基督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是而且继续是"必然性"，是一种表达人民群众意志的必然形式，是世界和生活合理性的一定形式，并且它建立了实在的实践活动的一般标准。我觉得，发表在《天主教文明》的文章（《多神教的个人主义和基督教的个人主义》，1932 年 3 月 5 日号）① 中的下面一段话，对于基督教这种职能，表白得不坏："相信有保障的未来，相信进入极乐之境的灵魂不死，相信一定可以享受永福，是一种全神贯注在内心修养使精神高超的原动力。真正的基督教个人主义就在这里找到了自己赢取胜利的刺激物。基督教徒的全部精力都集中起来，以便达到这一崇高目的。一个人摆脱由于疑虑而心灵憔悴的冥想苦恼，受到永垂不朽的教义启示：于是他感觉到内心里希望的复活；他确信最高力量支持他同恶去做斗争，他压服了自身并战胜了世界。"不言而喻，就是在这个场合，所谈的也是素朴的基督教，而不是耶稣会化了的、成为人民群众真正麻醉剂的基督教。

至于喀尔文教派及其决定广泛传播进取精神（或者成为这种运动的形式）的慈悲论的和预定论的铁的教义，它的立场更为明显和更具特点②。

为什么和怎样传布新的世界观，使它们普及呢？这一传布过

① «Civiltà Cattolica»,Individualismo pagano e individualismo cristiano.

②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发表于 1931 年《新阶段》及其以后各期的玛克斯·魏伯尔著《新教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Max Weber, L'etica protestante e lo spirito del capitalismo)；及葛洛吐逊论述法国资产阶级宗教起源的《法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来源。第一章，教会与资产阶级》(Groethuysen, Origines de l'esprit bourgeois en France; I: L'Eglise et la bourgeoisie; Paris, 1927)。——意文版编者

程（同时是代替旧世界观的过程，往往也是新旧结合的过程）受不受（怎样受，受的程度）说明和表现新世界观的合理的形式的影响；传布者的威望的影响（就他哪怕是大致的被承认和推崇来说）；传布者请求支持自己、归属于拥护新世界观的人所加入的同一组织（在与同意新世界观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原因加入这个组织之后）的那些思想家和学者的威望的影响？在实践中，这些因素根据社会集团以及各该社会集团的文化水平而彼此各各不同地结合着。为这些问题找出答案来是颇有意义的，因为这要涉及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的世界观改变起来更为困难，并且无论如何人民群众向来也不会以所谓“纯粹的”形式接受某种新世界观的方法来改变世界观；新的世界观经常仅仅在新旧观点多少有些奇怪的结合的形式中被确定下来。具有合理的、在逻辑上很完整的形式，论断全面，毫不遗漏哪怕意义极微小的、正面和反面的论据，这当然具有其意义，然而，这个意义远不是决定性的；固然，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个意义可以成为决定性的，例如，当一个人已经感受到智力的危机，动摇于新旧之间，对旧的已经失掉了信仰，可是还没有决定信仰新的，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

对于思想家和学者的威望，大致也可以这样讲。这种威望，在人民的心目中，是很大的，但是要知道每一种世界观都有它自己拔擢出来的思想家和学者，于是威望也就散开了；此外，任何一位思想家都可以在同其他的思想家相比中区别出来，提出疑问，他是否正是这样，而不是另外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等等。最后可以这样说，新世界观的传布过程，决定于政治的原因，归根到底，决定于社会的原因，但是，形式上的因素、逻辑完整性的因素，正如威望的因素和组织的因素一样，只要群众一旦一般地（个别的少数个人也好，人数众多的集团也好）认为这一种或另外一种新的世界观是优越的，就立即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从此也就得出

一个结论，即群众本身只能把哲学作为信仰来接受。同时，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来自民间的人具有理智的立场；这种立场是由意见、信念、分辨的准绳和行为的标准形成的。凡是拥护与他的观点相对立的观点的人，只要具有较高的智力，在论证自己的理由时，就会比他高明，就会在逻辑上使他“张口结舌”，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这位来自民间的人是不是由于这一点就定会改变自己的信念，仅仅因为他在直接辩论中不能证明他的信念是真理而改变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势必每天改变它们，也就是每当他遇到一个在智力上比他强的思想敌人时，就要改变它们。既然这样，他的哲学，特别是他的那个被赋予行为标准的形式（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这种外衣的哲学建立在什么要素之上呢？毫无疑义，最重要的就是非理性性质的要素、信仰的要素。但是信仰谁和信仰什么？首先是信仰他自己所属的那个社会集团，因为后者在基本上而且整个地和他一样地在思考；来自民间的人想，许多人在一起不会发生错误，不会整个错和完全错，如他的对手在争论中企图说服他的那样；不错，他自己不能象他的对手那样很有道理地坚持和发挥自己的理由，可是，在他自己所属的集团里，却有人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甚至比他的对手还来得高明；于是他也就记起果然他曾经听到有人广泛地、前后连贯地讲过使他信服的自己信仰的原理。他记不起这些具体理由，而且也许不能重述它们，然而他却晓得，这些理由是存在的，因为他听到有人怎样讲过这些理由，并且他被这些理由说服了。一旦这种坚定的信念感悟了他，那么，这个信念本身就成为在他身上保持这个信念的经常原因，尽管后来他也许自己不能提出论据来为它辩护。

但是，这些说法导致一个结论：新的信念在人民群众中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当这些新的信念同那些正统的（也是新的）信念相矛盾的时候，因为正统信念的社会实质是同统治阶级的基

本利益相符合的。这一点，以宗教和教会的命运为例，就可以看出来。宗教或某个一定的教会保持着自己教徒的一致性（在一般历史发展需要的一定范围内），其程度也和它们经常有组织地保持自己的信仰一样，它们不倦地重复自己的辩解，每时每刻都始终利用同样的论据来保护这种辩解，它们收买一些教职高低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使命是赋予这种信仰以一种哪怕是外表的思想价值。每当教会与教徒之间关系的连续性，由于政治原因强行中断的时候，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所发生的那样，教会所受的损失是不可估计的，而且，如果使教会难于执行其日常职能的条件，在时间上延长得超出了一定限界的话，那么，可以设想，这种损失将是决定性的，而且会产生新的宗教；这种与旧天主教相结合的宗教也当真在法国产生了。由此就产生某些必需的要求，每一种力图代替常识和一般旧世界观的文化运动，都应该满足这些要求：（1）经常不倦地重复自己的论据（改变它们的文字表达形式）：重复是影响人民思想的最有效的富有教导意义的手段；（2）不停地努力从智力上提高越来越广泛的人民阶层，也就是为了赋予群众的无组织的分子以个性；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努力培养出新型的、富有智力的杰出人物，他们会直接成长于群众之间，因而依然同群众保持联系，他们对群众来说，犹如鲸须对妇女紧身的关系一样，这第二个必需的要求（如果它能得到满足的话），恰好也就是真正改变时代的“思想全景”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不能从自己的队伍中拔擢出一些职位高低不同的、有威望的、智力高超的、最胜任的代表来的话，这些杰出人物当然也就不能形成和发展。而这些代表人物又可以在个别伟大的哲学家身上达到发展的顶点，假使这位哲学家当真能够具体地感觉到在思想上团结得很巩固的社团的迫切要求的话，假使他了解到这个社团不能具有个人智慧所固有的那种思想生动性的话，因而，假使他能够确切地研究并制定一种集体的学说，使它

更为符合而且更为接近集体思想家的思想方式的话。

显然，这一种群众组织不会"随意地"实现，不会围绕任何思想体系，根据由于狂信自己哲学信念或宗教教义为自己提出这项任务的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形式上有组织的意志而实现。群众支持某一种思想体系或不愿支持某一种思想体系，就是用以检验对思想方式合理性和历史性的实际批判的方法。随意的组成甚至即使象有时那样的由于一些直接条件的有利结合，能在某些时间内得到某些普及，也会比较快地被排挤出历史的竞争圈的；那些有机地符合复杂历史时期要求的组成，则往往归根到底是占上风的，并保持着优越性，甚至即使它们不得不经过许多中间阶段，这时它们的被确认只是在或多或少的奇怪的结合形式之中。

这些考虑一经发展，就要提出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集中在各种不同智力水平的阶层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和性质上，换句话说，归结为一个问题：由于在智力上处于从属地位的阶层对于辩论和发挥新的批判概念能力的限制，高级集团的创造性的贡献应该具有并且可以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可以并且应该表现于哪一种活动中。因此，问题是确定辩论和宣传的自由的界限，这种自由不应从行政和警察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应从领导者加于自己的活动上的自己限制的意义上去理解，或者，简言之，问题是在有关文化问题的政策中确立一定的方向。换句话说，谁来确定"科学权利"和科学研究的界限，而且一般地能不能确定这些权利和这些界限呢？显然，必须给予个别的学者以自由的主动权，以便去发现新的真理，并且为已发现的真理寻求更好的、更完整的和更清晰的公式，即使这些学者依然不断地去辩论那些我们认为是最基本的原则。同时，如果这种辩论的发起是由于自私自利，而不是由于科学性质的原因，也将不难判明。另外，可以设想的是：个人的发起将是有纪律的、被调整的，而且每一次发起，在其公开之前，一定要经

过学院及各种文化研究机构的选定，以及诸如此类的手续。

有意义的是以某一个国家为例，具体地去研究那种在运动中支持所有思想体系的文化组织，并探究它的实践活动表现在哪些方面。同样有益处的是研究每一个国家专门在文化方面积极工作的人员名额同居民之间的人数比例，并估计一下闲散的人力。各级学校及教会——这是每一个国家中以专门在其中从事工作的人数来看两个最大的文化组织。报纸、杂志、书籍出版业务、私立学校（国立学校的补充机构、私立大学型式的文化研究机关）。其他职业，例如医生、军官、律师职业，也要吸收较大一部分文化力量去进行专门工作。但是，必须指出，在所有国家中，在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集团（甚至其中人数最多的、而且最接近下层的、最接近人民群众的、例如小学教员和神甫）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脱节，虽然程度上是不同的。还应该指出：其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原因是甚至在统治者口头上承认这一点的国家里，国家本身也不是统一的、一贯的、清一色的主张的体现者，因此知识分子集团就分散在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或在同一阶层之内。至于大学，除了几个国家之外，并不执行任何联合的职能，一位自由思想家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比整个大学以及与它类似的机关都大。

关于实践哲学的宿命论观点的完成的历史职能，可以写一篇悼辞，以缅怀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所带来的好处，也正因为这一点，才有理由必须把它连同一切应得的荣誉一起埋葬掉。这一观点的作用，大可以拿来同慈悲论和预定论的作用相提并论，后者在现代世界的初期起过自己的作用，但是后来被德国古典哲学以其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观点所压倒。这一观点是感叹语“如上帝的意”的普及的代用品，但是，无论如何，即使在这种原始的和基本的说法里面，它所发现的世界观，比起“如上帝的意”这句感叹语里面或慈悲论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来，也是更为现代化，更为有成效

的。可不可以使"形式上的"新世界观穿着另外一种服装，而不是粗糙的、朴素的平民服装进入世界呢？以整个必然前景武装了自己的历史学家毕竟会了解并肯定，为了新世界奠基而最初投下的几块石头，尽管粗糙而没有磨光，却比垂死世界的残景和它的绝笔美丽得多①。

---

① "宿命论"和"机械论"的衰落标明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因此密尔斯基的总结性的著作就造成了很深刻的印象。由于这部著作使人想起了1917年11月在佛罗伦萨与律师玛里奥·特罗齐所进行的辩论②以及初步谴责他是柏格森主义者和唯意志论者等等。可以描绘出一幅具有半严肃性的图画，以表现他的观点在事实上是怎样一幅样子。同时也想起了1924年6月在罗马与普列左蒂教授所进行的辩论③，乔治·姆·西拉蒂把他拿来同乔利蒂船长④相比；这种比较决定了他的命运，对他来说是宣判死刑。对于西拉蒂说来，乔利蒂就等于孔教徒对于道教徒一样，就等于一位来自南方的、很活动的和能干的中国商人对于北方的博学的高官一样，后者以一副斯文的和明智的看穿了人生奥妙者的身份极端卑视这些相信能够以自己的忙忙碌碌蚂蚁般的行动加速"行程"的南方的小人物。同样也想起了柯劳吉奥·特列维斯关于赎罪的一段话。在这一段话里有些是圣经预言者的说法，谁想要战争和谁发动战争，谁把地球从它的轴上拧下，谁的行动成了战后混乱的原因，谁就应该赎罪，谁就应该对这种混乱负责。他们犯了"唯意志论"的罪——他们就应该为了这种罪行受到惩罚等等。在这一段话里有一种祭司的神气，凶狠的咒诅，这些咒诅本来应当变成一块吓人的石头，而在实际上却适得其反，成了莫大的安慰；因为它们明白地指出，掘墓人还没准备好，拉撒路⑤可以复生。

② 与律师玛里奥·特罗齐所进行的辩论。这次辩论是在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会议上展开的。在这次辩论中改良主义者玛里奥·特罗齐反对葛兰西的建议——提出具体计划在意大利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和在文化领域中的领导。——俄文版编者

③ 与普列佐蒂教授所进行的辩论。在举行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时，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列宁派多数与鲍尔第加分子之间进行了辩论。在辩论中茨麦拉尔多·普列佐蒂站在鲍尔第加的宗派主义立场上。——俄文版编者

④ 船长乔利蒂——朱塞佩·乔利蒂，海员和码头工人独立工会的领导者。尽管他作为一个工会活动家很受欢迎，但是他的政治立场不止一次地发生急剧转变，先是积极支持共产党，后来又赞成许多法西斯的措施。——俄文版编者

⑤ 拉撒路是《新约》中的一个乞丐（见《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后来都用来指流氓无产阶级。——译者

哲学和历史问题

科学的辩论

在提出历史-批判问题的时候，不应该把科学的辩论看成是一种又有被告又有检察官的诉讼案件。检察官根据职责必须证明被告有罪，理应“禁止流通”。在科学辩论中（由于根据假设，它的目的是寻求真理并保证科学进步）持下面观点的人是较为“先进的”：对手可以提出要求，这项要求应该包括到自己本身的主张里面来，哪怕是作为从属的因素也好。理解并现实地估价对手的立场和理由（而有时它们却原来是全部以前的思想），恰好就是表明摆脱思想体系的桎梏（这是指卑鄙的盲目的思想体系的狂信而言），也就是抱着“批判的”观点，而这是科学研究中唯一有成效的观点。

哲学和历史

重要的是确定，所谓哲学，所谓一个历史时代的哲学究竟是指什么，以及每一个这样的历史时代的一些哲学家的哲学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假使采纳贝奈戴托·柯罗齐所表述的宗教的定义，即宗教是已成为生活准则（这里所谓生活准则不是指书本意义上的，而是体现在实际生活中的）的世界观，那么大部分人就是哲学家，因为他们在进行实践工作，而在这些实践工作中（在他们的行为的指导路线中）已经包含有一定的世界观，一定的哲学。通常所理解的哲学史，也就是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史，是一定阶级的人物所采取的在思想体系上试图改变、纠正、改进存在于每个一定时代

的世界观，从而也是改变与这些世界观相适应并取决于这些世界观的行动准则，也就是改变整个实践活动的历史。

从我们所关心的观点出发，仅仅研究各个不同的哲学家的哲学体系的历史和逻辑是不够的。至少根据方法论的指示，必须注意哲学史的其他部分，即研究广大群众的世界观，最狭隘的领导（或知识分子）集团的世界观，最后是这些各种不同的文化集合体与哲学家的哲学之间的联系。时代的哲学不是某一哲学家的哲学，某一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某一大部分人民群众的哲学而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组合体，它在一定的方向中发展着并改进着，同时程度越来越深地成为沿着这一方向集体行动的准则，也就是成为具体的和完全的（完整的）"历史"。

这就是说，一定历史时代的哲学，不外是这一时代的"历史"，不外是领导集团善于从以往接受下来的现实中进行改变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历史与哲学是分不开的，它们形成"联盟"。但是，可以区别哲学本身的成分，而且是在它们所有的阶段上：作为哲学家的哲学，作为领导集团的主张（哲学的文化）以及作为广大群众的宗教；也可以看到的是在每一个这样的阶段上势必碰到各种不同形式的思想体系的"组合体"。

"创造性的"哲学

哲学是什么？它仅仅是一种纯粹感受的〔直观的〕活动，还是至多是一种整理的活动，或者是一种绝对创造性的活动？必须给"感受的"、"整理的"和"创造性的"这几个用语下个定义。"感受的"就是指确信有一个外部的绝对不能改变的世界"一般地"、客观地（这个词的最庸俗的意义上的）存在着。"整理的"从含意来看，接近于"感受的"这一术语：它虽然也承认某一种思想活动，但这种

活动是微不足道的和有限制的。而"创造性的"这一术语表明什么呢？也许它表明外部世界是由思想创造的吗？但是什么样的思想和谁的思想呢？这样可能陷入唯我论，而且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也确实必然陷入唯我论。为了一方面避免唯我论，而另一方面避免已经包含在把思维理解为感受的或整理的活动本身中的机械论的观点，必须"历史地"考察问题，同时把"意志"（而归根结底是实践的或政治的活动）作为哲学的基础，但这种意志并不是随便的，而是合理的，其实现以符合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为限，也就是以它自己在进步发展时机中为总的历史为限。假使这个意志在开始时是由单独的个人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它的合理性就由许多人接受它并长时期地接受它这一点来证明，换句话说，就要由它成为文化，"常识"，带有相适应的伦理的世界观这一点来证明。在德国古典哲学以前，人们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感受的，或者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整理的活动，换句话说，人们把它理解为对某一个在人以外客观地发挥机能的机构的认识。德国古典哲学开始使用了一个"创造性的"思想的概念，但是它却充满了唯心主义的和思辨哲学的内容。也许只有实践哲学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依据并避免陷入唯我论的一切倾向，迫使思想前进一步。它历史地把思想看成是一种世界观，看成是一种流行于许多人中间的"常识"（假使这种"常识"不是合理的和历史的，那么，这种流行性就恰好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流行到它已经变成一种积极的行为准则。因此，必须把"创造性的"一词理解为"相对的"，这是指思想改变大多数人感受现实的方法，从而改变没有这些大多数人就是不可思议的现实本身而言。其所以是"创造性的"，也是因为它指出并不存在本身的、自在的和自为的"现实"，"现实"却始终存在于同那些改变它的人们的历史的相互关系中等等。

哲学的历史意义

许许多多有关各种哲学的历史意义的研究论文和著作都是绝对无用的幻想的产物，因为在这些论文和著作中没有考虑到许多哲学体系是纯粹个人的(或者几乎是个人的)活动的表现，而有权被称为历史的那一部分往往是非常少的，并且是充满一大堆具有纯粹合理的和烦琐哲学的来源的抽象。可以说，哲学的历史的价值能够按照它所达到的“实际的”(广义的“实际的”)效能“算出来”。如果说任何哲学都是一定社会活动的表现是对的话，那么它必定对社会起反作用，并决定它的一定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结果，它所起的这种反作用的限度也恰好就是衡量它的历史意义的尺度，即衡量它不是学者个人热心钻研的成果，而是一件“历史事实”的尺度。

哲 学 家

尽管提出了一个原则，即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或者换个说法，即在职业哲学家、哲学领域中的“专家”与其余的人之间存在着不是“质的”，而仅是“量的”差别(在这个场合下，“量”一词具有其特殊的意义，不能把它同算术中的数量相混，因为它所指的是或多或少的“同类性”、“一贯性”、“逻辑性”等等，也就是质的成分的量)，还是应该说明，这种差别究竟何在。例如，把任何一种思想倾向，任何一种一般的思潮等等，甚至任何一种“世界观”都称为“哲学”，那就会是不确切的。大可以把哲学家称为“熟练的工人”，与粗工相对立，但这也会是不确实的，因为在工业里，除了粗工和熟练的工人以外，还有工程师，工程师不仅在实践上，而且也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懂得这个行业。职业哲学家，或哲学领域中的“专家”

不仅比其他的人"思考"得更富有严谨的逻辑性，更彻底，更有系统，而且他也了解全部思想史，就是有能力清楚在他以前的思想的发展，他能够在问题经过一切解决它们的企图以后所处的态势中去批判地考察它们等等。在思维的领域中哲学家所执行的职能，如同专家在科学的各种不同领域中所执行的职能一样。

然而在哲学专家与其他领域中的专家之间却有区别，正是哲学专家比其他领域的专家远为接近其余的人。把哲学专家变成了好象科学中其他专家一样的人物，这件事正好就产生了对哲学家的讽刺。其实，为了设想一位昆虫学专家，根本不必要所有其余的人都是有经验的"昆虫学家"，为了设想一位三角学专家，根本不必要大多数其余的人都从事三角学，余此类推（可以找到某种最精微、最专门化的，是必要的科学，但是它们还不能因此而成为大家"共同的"），但是不能设想同时不是哲学家的人，不思考的人，其所以不能这样设想，正因为思维能力是人本身所固有的（只要他不是病理学上的白痴）。

言语，语言和常识

通常称为"日常知识"或"常识"的那种东西，它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不仅在于常识是利用因果性原则（即令它不公开承认这一点），而且在于从其意义来看一种局限性更为巨大的事实上——即常识在许多判断中确定一种明白的、简单的、易懂的原因，不容许任何形而上学的、冒充意义深刻的、冒充有学问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奸计和机智把自己引入歧途。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人们不能不称颂"常识"，因为当时人们已开始起来反对被认为是权威的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教条式的原则；在事实上，人们发现了在"常识"里面有一定分量的"实验主义"和即使是单凭经

验的和有限制的对现实的直接观察。人们直到现在还继续认为这就是常识的价值所在，尽管情况改变了，而今天常识的实在价值已大大地降低了。

假使我们确定哲学是世界观，并且已经不仅把哲学活动看成是"个人"制定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的概念，而且也（特别是）看成是文化领域中为了改造人民的"智能质"和为了传布那些会具体地也就是历史地和社会地成为普遍的限度内证实其"历史的正确性"的哲学方面的新事物而进行的斗争，那么言语和语言的问题"在技术上"就应该被提到第一位来。也许应该把实用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所写的论文也翻阅一遍。①

在对待实用主义者时，也像一般地在任何其他想要有机地使哲学体系化的企图中一样，都没有表明问题是否是整个的体系，还是仅仅限于体系的基本内核。我以为可以这样说，万依拉蒂的以及其他实用主义者的语言观是难于接受的；但毕竟还造成一种印象，以为他们感觉到了实在的需要并且大致准确地"描述了"它们，甚至即使他们根本没有能够提出问题和解决它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语言"实质上是个集合名词，根本不以存在着无论在时间上或在空间上某种"唯一的"东西为前提。语言也意味着文化和哲学（哪怕是在常识的阶段也罢），因此，"语言"现象在现实中原来是许多现象，它们或多或少地有机地彼此联系着，互相依赖着；走到极端，可以说每个讲话的人具有自己个人的语言，也就是自己独具的思考和感觉的方式。文化在其各个不同的阶段上把或多或少的个

① 参阅乔·万依拉蒂②的《论文》和其中一篇短论《作为取消虚幻矛盾道路上的障碍的语言》〔G. Vailati, Scritti(«Il linguaggio come ostacolo alla eliminazione di contrasti illusori»), Firenze, 1911〕。

② 乔万尼·万依拉蒂（1863—1909）——意大利数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著名的实用主义者之一，他在意大利传布实用主义。他曾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俄文版编者

人联合成为人数众多的阶层，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有不同的程度上相互了解等等。恰好是这些历史-社会的差别反映在人民的语言中，并产生实用主义者所谈的那些"障碍"和"错误的原因"。

由此产生文化因素在实践（集体）活动中也有的重要性：任何一种历史的行动只能由"人的集体"来完成。这一点预定要达成一种"文化-社会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之下追求各种目的的分散愿望在同样的和统一的世界观（一般的或个别的，一时起作用的——由于激动——或经常起作用的，当这种世界观的精神基础已经根深蒂固，已经被掌握得很牢固，已经成了习惯，以致能够变成一种热情的时候）的基础上，为了同一个目的而结合在一起。正因为这一切都会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关于语言的一般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关于集体制造同样的文化"气候"的一般问题的重要性，就很明显了。

这一问题可以而且必须同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现代提法接近起来，根据这种提法，教员与学生的关系是积极的关系：他们的地位可以变换，因此每一位教员同时就是学生，而每一名学生同时就是教员。但是教育关系不能仅仅归结为专门的"学校的"相互关系，在这些相互关系的范围内年青的一代同成年人接触，并从他们那里接受经验和历史上必要的财富，把本人发展和"培养"到历史上和文化上更高的水平。这些相互关系存在于整个社会之中，并适用于每一个个人在他同其他个人的关系中，适用于知识分子阶层与非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杰出人物与追随他们的群众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之间、先锋队与主力之间的关系。每一种"领导权"的关系，必然也是教育的关系，它不仅在一个民族内部，在构成这个民族的一些力量之间表露出来，而且也在国际的和世界的范围内，即在民族的和大陆的文明的组合体之间

表露出来。

因此可以说，个别哲学家的历史个性，也表现在他同他想要改变的文化环境的积极的相互关系上，而这个环境也对哲学家起反作用，并以“教员”身份迫使他经常进行自我批评。这样，现代知识分子在政治方面的最有力的要求之一原来就是所谓“思想自由和表达思想（出版和集会）的自由”的要求，因为只有在那存在着这种政治条件的地方，教员一学生的关系才能在上述的最广泛的意义中实现，而且在事实上才能“在历史上”体现新型的哲学家，这样的哲学家可以称为“民主主义哲学家”，也就是确信他的个性不仅限于他的肉体上的个人，而且也表现在改变文化环境的积极的社会的相互关系中。一个“思想家”假使满足于自己的“主观地”也就是抽象地自由的思想，那在我们今天会令人发笑的，因为科学与生活的统一，正是积极的统一，只有在这种统一中才能实现思想的自由，这是教员和学生的关系，哲学家和他在其中活动并从其中抽出要求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文化环境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哲学和历史的相互关系。

人是什么？

这一问题是哲学中的头一个和基本的问题。可以怎样回答它呢？定义可以在人的本身中找到，也就是在每一个个别的人的身上找到。但定义对吗？在每一个个别的人的身上可以找到每一个“个别的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是什么，特别不是每一个个别时机的每一个个别的人是什么。经过一番思索，我们就会理解到，我们提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我们是想要问一问：人可以称为什么，也就是人可以不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可以不可以“造就”自己，创造他自己的

生活？于是，我们说，人是一个过程，确切一些说，是他的行为的过程。假使仔细地分析一下，那么，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就不是抽象的问题，或“客观的”问题。它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在考虑自己和别人，是由于我们想要知道——有关我们所想到的和所看到的——我们是什么，并且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是否我们的确是“自己本身的锻工”，自己生活的、自己命运的“锻工”，而且在什么样的限度内。并且我们想要“就在今天”，在今天所存在的条件下，在“今天的”生活中知道，而不是在一般的某一个人的一般的某一种生活中知道。

这一问题产生于对生活和对人的特定的看法，并由此取得了自己的内容。这些看法中最重要的是“宗教”，而且是一种一定的宗教：天主教。的确，当我们给自己提出人是什么，他的意志和他的具体活动在创造自己和自己本身的生活中的意义如何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似乎想要问：天主教有没有提出关于生活和人的确切的观念？我们当天主教徒，也就是把天主教义当做生活准则的时候，我们是误入歧途呢还是遵循着真理呢？大家都直觉地理解，凡是把天主教当做自己生活准则的人们都是误入歧途。这一点由于甚至自称为天主教徒的人也没有把遵守天主教做为生活准则而更正确了。一个十足的天主教徒，也就是一个一举一动都遵照天主教准则的人，看上去会象是个怪物，而这一点，假使仔细地分析一下，也就是对天主教最强有力而且是最不容反驳的批判。

天主教徒会回答我们说，任何其他的主义也并非十分确实地执行着，他们的话也将是对的，但这只不过证明事实上，历史上不存在对所有的人绝对一样的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这里没有任何论据对天主教有利，虽然天主教作为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早在几个世纪以前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形成的。任何其他一个宗教都还没有具有这样的手段，这样的系统性，这样的经常性和集中

化。从“哲学的”观点看来，天主教义中使人不能接受的就是它认为恶的根源在于人本身，也就是把人当做一个完全完成了的和受限制的个体来看。可以说，一切存在到今天的哲学都在重复天主教的这一教义，也就是把人做为一个被限制在自己个性里面的个体来考察，而个性又被哲学作为天主教义的精神来考察。恰好是在这一点上必须改造关于人的观念。换句话说，必须把人作为许多积极的关系（做为一个过程）来考察，在这些关系之中即使个性具有最大的意义，却决非所考察的因素中的唯一的因素。反映在每一个个体中的人类是由几个因素构成的：（1）个体本身；（2）其余的人；（3）自然。但是第二、三因素并不象看上去可能令人感觉到的那样简单。个体与他人发生关系，同他们并不是简单的算术上的总和；他是有机地发生关系，也就是说，他是去参加各种不同的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社会机构。人与自然发生关系也同样并不是简单地因为他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积极地、通过劳动和技术。不仅如此，这些关系不是机械的。它们是积极的，是有意识的，也就是符合一个个别的人对它们认识的大一些或小一些的程度。因此，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在改造自己和改变自己，其程度正如他改变和改造那整个一套的相互关系，而在这一套相互关系中他本人就是一切线索汇集的枢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实在的哲学家正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积极改变周围世界也就是改变每一个个人都参加的一切相互关系的总和的人。如果说个性就是这些关系的总和的话，那么创建自己的个性就意味着认识这些关系，而改变自己的个性就意味着改变这些关系的总和。

但是，正如已经讲过的，这些关系不是简单的；同时其中有一些是必要的，而另外一些则是自愿的。此外，或多或少的深刻地认识它们（或多或少地知道可以怎样改变它们）就已经是在改变它们。那些本来是必要的关系，由于他们在其必然性中被认识了，也

在改变自己的样子和意义。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权力。但是问题由于其另外一方面也是复杂的：仅仅认识关系的总和是不够的，因为关系在当时是作为某一种已有的体系而存在着。重要的是认识它们的发生，在形成过程中认识它们。因为每一个个人——这不仅是一些现存关系的综合，而且也是这些关系的历史，也就是全部过去的总结。或许有人会讲，一个单独的个人，如果注意到他的力量的话，他是不能大大地改变情况的。这种想法仅只在一定的限度内是对的，因为一个单独的个人可以同所有致力于那种改变的人联合在一起，假使这种改变是合理的话，那么他的力量就能够增大好多倍，成为感动人的力量并且能够实行一种比起骤然看来能够实行的改变要激进得多的改变。

一个单独的个人所能归属的团体是为数很多的比看来要多得多。一个单独的个人正是通过这些"团体"参加人类的生活。这样一来，他用以同自然发生关系的方式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因为所谓技术，同通常不同，应该不仅理解为在工业中所应用的科学知识的总和，而且也理解为"思想的"工具，即哲学的认识。

不能把人设想为别的，而只能设想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这是一般的道理。但是从这一点并没有做出一切必要的结论，——甚至对于个人是必要的结论。一定的人的社会以一定的物的世界为前提，而人的社会只有存在着一定的物的世界才是可能的——这也是一般的道理。至于在这以前这些个人以外的概念被赋与了机械论的和决定论的意义（无论对于societas hominum①，还是对于societas rerum②并由此产生了对它们的反响，这也是正确的。必须制定出一种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所有这些关系都是积极的并处于运动之中，而且极其明白地确定这种积极性的来源——是单

① 人的世界。——译者

② 物的世界。——译者

独的一个人的意识，这个人根据他认识、希望、欢喜、创造等等的多少而认识、希望、欢喜、创造等等多少，并且他意识到他不是孤立的，而是充满着其他的人和他对之不能不有某些观念的物的世界所提供给他的可能性（正如每个人是哲学家，每个人是学者等等一样）。

费尔巴哈的断言"人是他所吃的那种东西"就其本身而言，可有不同的解释。无味的和荒谬的解释：人在物质上逐渐成为他所吃的那种东西。换句话说，食物对思想方式起着直接的决定的影响。回忆一下阿玛第奥① 的说法，他说，如果知道例如人在讲话以前吃了什么东西，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个人所讲的话本身。这个说法是幼稚的；而且在实质上甚至与实证科学也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脑子不是靠大豆和地菇营养的：食物在自己变成了同类的和同化了的物质以后，也就是变成了具有与脑细胞"同样的潜在本质"的物质以后才能恢复脑细胞。假使这种说法是对的话，那么历史的决定一切的来源就会是厨房，而革命就会符合于群众饮食中的激进的改变了。从历史上来看，与此相反的倒是对的：革命和复杂的历史的发展——正好改变了饮食，然后创造了选择食品的"口味"。并不是按时种植小麦使得游牧生活消灭了，而相反地，是反对游牧生活的条件造成了按时种小麦，余此类推②。

另一方面，"人是他所吃的那种东西"是完全对的，因为饭食是整个社会关系的表现之一。每一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确定了的饮食。但是同样完全可以这样说，"人——这是他的衣服"，"人是

① 系指阿玛第奥·鲍尔第加而言，他是以前的共产党的领导者，过激分子，后被开除出党。——意文版编者

② 把费尔巴哈的这种说法拿来同"玛里尼蒂阁下"掀起的反对通心粉的运动，以及"邦坦佩里阁下"为了维护后者所发起的论战比较一下——并且这些都发生在1930年，正在世界危机极端严重时期。

他的住所"，"人是他的繁殖后代的特殊方法，也就是他的家庭"——因为除了饮食以外，衣服、房子、繁殖后代都是社会生活的要素，而在这些要素中也就正好最显著地和最普及地（也就是普及到所有群众）表现出社会关系的综合。

这样看来，"人是什么？"的问题永远是所谓"人的本性"的问题或者是所谓"一般的人"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的探索（哲学），而这门科学一开始就会从"统一的"概念出发，代表包括着所有"人类"的抽象。但是这个一般的概念和"人的"表现又是什么呢；是起点还是终点？而且就把"人的东西"作为起点来看的话，这种探索是否勿宁为"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残余呢？不能把哲学归结为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类学"：人类的统一并非包括在人的"生物学的"本性里面——历史所重视的人们之间的差别不是生物学的（种族，头骨形状，皮肤颜色等等，而归根到底"人是他所吃的那种东西"——在欧洲吃面粉，在亚洲吃大米等等——这个论断也是归结为这一点，这个论断随后又可以归结为另外一个公式："人是他所生活的国度"，因为大多数食物一般地都是同所住居的地域相联系的）；但是甚至"生物学的统一"在历史上也没有过难得知道的什么意义（人有一个时期是自己吃自己的动物，那时他们处于最接近于"自然的"状态，就是当他们不能"人为地"增加自然财富生产的时候）。甚至"判断能力"或"精神"也不会造成统一，而且也不能被概括的因素承认，因为它只是具有范畴性质的形式上的概念。结合人们的或分散人们的不是"思维"，而是那被具体地思考的东西。

"人的本性"是"社会关系的综合"这一答案是最满意的，因为它包含着形成的观念：人在形成，他不断地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着，他之所以改变是因为他否定"一般的人"。的确，设想社会关系是由各种不同的人的集团表现出来的，这些人们的统一不是

形式的，而是辩证的。只有在存在着当农奴的人的场合下，人才能成为贵族，余此类推。同样可以这样说，人的本性是"历史"（而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使"历史"的概念等于"精神"的概念——可以这样说，人的本性是精神），假使恰好赋予历史以"形成"的意义，以"concordia discors"① 的意义的话，后者并不是从一致出发，而含着这种可能的一致的基础。因此"人的本性"不能在任何一个单独的人身上去找，而只能在人类全部历史中去找（使用了"类"这个词即自然主义性质的词的东西，没有失去其意义），那时作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特点由于把它同其他的人的特点对照起来而突出地显露出来了。传统哲学中的"精神"的概念，正如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面的"人的本性"概念一样，应该解释为"科学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是来代替最大的乌托邦——在上帝身上探索"人的本性"（同时把人们看成是上帝的儿女）；它们证明历史发展的延续不断的痛苦，证明理性和感情等等的意向。不论断言作为上帝的儿女的人们平等的宗教，或断言人们作为被赋予判断能力的生物平等的哲学，都是奠定历史发展最有力的基础的复杂的革命运动（古代世界的变革——中世纪世界的变革）的表现——这是正确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这些伟大的历史变革的最后一个反响，从社会矛盾表现而来的辩证法应该随着这些矛盾的消灭而变成纯粹概念的辩证法，这一点显然构成了现代空想的哲学比如柯罗齐的哲学的基础。

在历史中真正的"平等"，也就是"人的本性"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达到的"精神的"阶段，表现在"私人的和公共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团体的体系中，这些团体互相交织着组成"国家"和全世界的政治体系。这里所谈的，正是关于一个团体的成员之间

① 不一致的一致。——译者

所感受到的“平等”和各种不同团体之间所感受到的“不平等”，关于就其反映在一个单独的个人或整个一个集团的意识中来说具有意义的平等和不平等。我们也是这样来看待“哲学与政治”，思想与行动的平等或相等的——换句话说，我们也是这样来看待实践哲学的在所有的事物中都有政治，包含哲学或种种哲学在①，而唯一的“哲学”——这是行动中的历史，这是生活本身。可以在这个意义来解释关于德国无产阶级的论点，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继承者的论点，而且可以肯定，伊里奇②所完成的领导权的理论化和实现是伟大的“形而上学的”事件。

进步与形成

我们所说的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呢，还是同一个概念的几个不同的方面呢？进步是意识形态，形成是哲学观念。“进步”取决于精神发展的一定水平，为了达到这种水平，有若干历史上一定的文化要素来参加。“形成”是哲学的概念，其中可能没有“进步”。进步的概念是指量的和质的计量的可能性：多一些和好一些。因此，它的前提是某一种“规定好了的”或可以规定的尺度，但是这个尺度是以往决定的，是以往的一定阶段决定的，是以往的一定的可以计量的方面等等决定的（自然这不是指进步的公制而言）。进步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这种观念的产生是不是文化发展方面的能够创造时代的有决定性的事实呢？或许的确是。进步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与意识的广泛传播相符，这在社会与自然（在自然的概念中加入偶然性的概念和“非理性”的概念）之间达到了某种对比。——由于这种对比，全体的人都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大的信心，有可能草拟

① 参阅关于思想体系性质的札记。

② 即列宁。——意文版编者

关于自己生活的包罗一切的计划。为了摧毁进步的观念，雷奥帕第[1]不得不援引火山爆发为例，也就是以暂时还是“不可制止的”和不可挽回的自然现象为例。其实以往有过多少不可制止的力量，例如，歉收，时疫等等，它们在一定限度内已经被制止住了。

认为进步是一种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这是毫无疑义的。认为它促进了现代立宪国家的成立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认为现在它已经度过了自己的繁荣期，同样是毫无疑义的。但这是指何而言呢？并不是指失掉了能够合理地征服自然和消灭偶然事故的信心而言，而是指在“民主主义”的意义上，——在进步的正式的“体现者”成为没有能力实现这种征服而言，因为他们使得现代的破坏力量活动起来，这些力量也和以往的破坏力量(现在已经忘掉了的，至少是“在社会上”忘掉了的；固然，我们不能讲：被社会所有的成员忘掉了的，我们之所以不能这样讲，因为农民还依然不理解“进步”，也就是依然相信自然和偶然事故的力量，而且的确还过于依赖它们的支配，因此还保留着“魔法的”、中世纪的、“宗教的”思维)一样危险和难受，比如“危机”、失业等等。由此可知，进步观念的危机，不是观念本身的危机，而是这种观念的体现者的危机，因为他们已变成了那个应该予以征服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来攻击进步观念是极端自私的和有倾向性的。

可不可以把进步的观念同形成的观念分开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它们作为政治(在法国)，作为哲学(产生在德国，随后大大地发展于意大利)是一起产生的。人们企图在“形成”的概念中挽救

---

[1] 雷奥帕第·查科莫(1789—1837年)——意大利诗人，出身贵族，后与封建—天主教的世界观决裂。曾写出爱国的诗篇，如《意大利颂歌》，《但丁纪念碑赞》等等。他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关系，但流为一般地对进步思想的批判，使得这位诗人陷入悲观失望的情绪中，特别是在反动时期，这种思想表现在他的作品《对话和思想集》(1827年)里面。——译者

出"进步"中最具体的东西——运动，就是辩证的运动（从而是这个概念的加深，因为进步是与庸俗的进化观相联系的）。

下面摘引了1932年12月4日发表于《意大利文学》上面的阿尔多·卡帕索的一篇妙文里的几段话，它们对这些问题表现出了庸俗的怀疑：

"我们这里也时兴嘲笑十九世纪文风中人道的和民主主义的乐观主义，并且当雷奥帕第带着嘲笑的口气谈到'进步的命运'时，他不是孤独的；但是这时却想出了一个狡猾的办法，把'进步'改装成唯心主义的'形成'，即在历史中与其作为德国的，甚至不如说是作为意大利的而保留下来的观念。但是继续到ad infinitum①就是生成、就是永远不能同肉体感觉幸福相比的改善具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最后'阶段的固定标准，'改善'就失掉任何一种衡量的单位。不仅如此，我们甚至没有根据希望我们这些实在的活生生的人优于……比方说优于当时的罗马人或最初的基督教徒，因为假使完全而十分理想地去理解'改善'的话，就可以很妙地假定，即我们社会中所有的人现在都处于'衰落'的状态中，而当时的那些人几乎都是完美无缺的，甚至干脆就都是圣人。因此，从道德的观点出发，隐藏在形成概念中的无止境地上升的观念，有些不能自圆其说，因为考虑到道德上的'完善'是个人的事，而恰好是从个人的角度可以做出结论，即整个现代，假使随时对它加以考察的话，是完全没有道德的……但是那时形成的乐观主义的概念无论从理想的观点，或是从实在的观点出发都将会是不可捉摸的……大家知道，柯罗齐否认了雷奥帕第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意义，他断言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是情感的范畴，而不是哲学的范畴。但是悲观主义者可能会指出，恰恰是唯心主义的形成概念才是乐观主义的表现，才

① 无限的。——译者

是感情的表露，因为悲观主义者也好，乐观主义者也好(假使二者都没有由于相信'超验的东西'而受到鼓舞的话)是同样地把历史设想为一条没有河口的河流，然后根据自己的心情要么把重点放在'河'这个词上，要么把重点放在'没有河口'这几个字上。一些人说：没有河口，但是，象在一条谐和的河中，却有不断的波浪和它们在时间上的相续性：昨天产生的今天在发展……而另外一些人又说：不错，河是不断的，但却没有河口……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忘记，乐观主义是丝毫也不少于悲观主义的感情。留下来一个结论：任何'哲学'原来都不得不在感情方面被确定'为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等等。"

在卡帕索的思想里面没有太多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但是思想方式本身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流行的慕虚荣的情绪和缺乏信心的情绪，其特点是模棱两可和肤浅；这种思想方式同样没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正直性和端正态度，甚至缺少必要的形式逻辑。

问题依然是原来那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假使我们从心理上或思辨地把人确定为个体的生物，那么这些进步和形成的问题就会成为不可解决的或流为空话。但是，如果我们把人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就会弄清楚，人们之间在时间上的任何比较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场合，问题是在于不同的事物，甚至是在于不同种类的事物。另一方面，由于人也是他的生活条件的总和，所以可以计量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量的差别，因为可以计量人征服自然和消灭偶然事故的限度。可能性不是现实性，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现实：人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这一点在估价实在做什么的时候是有自己的意义的。可能性意味着"自由"。自由的限度包括在人的概念之中。根据我的观点看来，存在着饿不死的客观可能性这一点，以及有的人在饿死这一点，具有其意义。但是存在着客观条件或可能性，或自由——这还不够：必须

"认识"它们和善于利用它们。必须想要利用它们。在这个意义上人是具体的意志，也就是在实践上把抽象的愿望或生存的动机加到用以实现这种意志的具体手段上去。要想创造自己的个性，必须：（1）赋予自己的生存动机或意志以一定的和具体的（"合理的"）方向；（2）确定能够使这种意志成为具体的和确定的而不是随意的手段；（3）在自己所具有的力量的限度内并且采用最有效的形式，促使那一套实现这种意志的具体条件发生变化。应该把人理解为由一些纯粹个人的和主观的因素，以及个人同它们保持积极关系的一些群众的和客观的或物质的因素所形成起来的历史的联合体。改造外部世界，改造一般的关系就意味着加强自己本身，发展自己本身。把道德上的"完善"设想为一种纯粹个人的事——这是妄想和谬误。用以形成个性的那些因素的综合固然是"个人的"，但是这一综合，如果没有由内向外的活动，没有能够改变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活动，从与自然的关系起到与处于社会阶梯的各种不同阶段上、属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一直到包括整个人类的最一般的关系上的其他人的关系，就不可能实现和进一步向前发展。因此，可以说，人在实质上是位"政治家"，因为他的"人道"，他的"人的本性"是在有意识地改造和指导其他的人的活动中实现的。

个 人 主 义

关于所谓"个人主义"，也就是关于每一个历史时期对个人在世界上和在历史生活中的立场的观点讲几句话。现在被称为"个人主义"的那种东西来源于随着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发生的文化革命，并指明对神的问题，从而对教会的问题所持的一定的立场是从超验论思想向内在论思想的转变。

分析一下反对个人主义的成见，直到重复极端的天主教徒的

和顽固落后者的挽歌。现在那种表现在个人抓占财富的“个人主义”已成为反历史的，而财富的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了。天主教徒最不宜于抱怨个人主义；这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永远认为只有财产才是政治上的个性，也就是说人本身在他们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把人同一定的物质财富结合起来的时候，才有意义。人只有在当他具有依财产而定的资格时才有选举权，人只有根据他所掌握的物质财富的多寡来参加政治－行政的团体，这一事实难道不意味着“精神”屈从于“物质”吗？假使只有掌握物质财富的才被认为是“人”的话，并且假使所有的人都掌握物质财富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寻求这样一种所有权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物质力量会充实每个人的身份，会参与创造每个人的身份，为什么会是反宗教的呢？其实已经在默认人的“本性”——不在个人内部，而是在人和物质力量的统一中；因此，争取物质力量是争取自己人格的方法，而且是最重要的方法①。

“人的本性”概念的分析

“平等”感的根源：宗教及其上帝是父亲，而人都是他的子女，因此彼此都是平等的观念。格言中的哲学：“Omnis enim philosophia, cum ad communem hominum cogitandi facultatem revocet, per se democratica est; ideoque ab optimatibus non injuria sibi exstimatur perniciosa”②．生物学认为人“类”所有单

① 最近对于青年的法国天主教徒作家达尼埃尔·罗浦斯的《没有灵魂的世界》一书(Daniel Rops, Le monde sans âme, Paris, Plon,1932) 赞扬备至。这部书也有意文译本。有必要看一看这书里面的一系列的概念，通过它们又诡辩地把以往的立场伪装现代的提出来。

② 哲学既然从所有的人具有同样的思维能力出发，因此它本身就是民主的，因此有产者不无根据地认为权力对自己是危险的(拉丁语)。——译者

独的分子都是"天然"平等，也就是精神上和生理上平等：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样子生下来的以及类此的道理。"人是要死的。X是人。X是要死的。"X使所有的人平等。这样就根据经验并科学地（经验地－科学地－民俗地）产生一个公式："在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赤身露体。"

应该记起哲斯脱敦①一套小说里面的小说《布朗神父的天真》，其中描写一位邮差和一位能制造奇妙机器的小手艺人。那里有这样一段插话："一位年老的夫人带领二十名仆人住在一所寨堡里。另外一位夫人来拜访她，她对这位来客说：——我始终是孤零零地一个人在这里，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医生来告诉她，这个地区发现了鼠疫，有传染的危险等等。这时她又这样说：——可是我们这儿的人很多呀！"（哲斯脱敦只是利用这段插话来继续发挥小说的主题。）

哲学与民主制度

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和一定形式的唯心主义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发展可以相提并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论断的平等，其途径是把人归结为自然历史范畴，归结为不是按照社会的和历史的定义来区分，而是按照自然的资料来区分，并且在任何场合下实质上都是与自己的同类相等的生物种类。这一论点转变成了常识；在常识里面这一论点被民间的一种说法表现出来："在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赤身露体"（即使这种常识的说法不是出现在知识分子思想辩论之前）。哲学完全是民主的科学，因为它所依赖的是一切的人所固有的思考能力——这种论断是属于唯心主义的。

① 哲斯脱敦（Chesterton, Gilbert Keilh, 1874—1936）——英国新闻记者及作家，天主教徒，他的许多作品都为天主教辩护。——译者

这一点也正足以说明贵族憎恶哲学和维护旧的制度的各个阶级对学说和文化所规定的一些法律上的禁令。

数量与质量

因为数量没有质量不能存在，而质量没有数量也不能存在（经济没有文化，实践活动没有对它理解的能力，反之是这样），所以从健全的理智的观点出发，把这两个术语无论怎样地对立起来都是荒唐的。在事实上，假使把质量拿来同数量对立起来，并按照胡里耶里莫·费列罗①之流的作法，加上所有不聪明的变化，那么，在实际上是把某一种质量同另外一种质量对立起来，把某一种数量同另外一种数量对立起来，也就是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某一种政策，而不是哲学论断。假使数量－质量的结合是不可分的，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把自己的意志的力量加到哪个上面更有用处，也就是应该发展什么——数量还是质量？这两方面之中哪一方面更容易控制？哪一方面更容易计量？对哪一方面可以做出预测或制定工作计划？答案是毫无疑义的：是数量这一方面。因此，当你肯定说，你想要在数量上下工夫，发展现实中的“实体的”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打算轻视“质量”。相反地，这意味着你想要最具体和最现实地提出质量的问题，也就是用那种可以控制和计量这种发展的唯一的方法去发展质量。

这个问题是同另外一个在谚语“Primum vivere, deinde philosophari”② 中表现出来的问题相联系的。的确，生活不可能同哲学分开。但是谚语也有实践的意义：生活意味着首先从事实践的

① 胡里耶里莫·费列罗（Ferrero, Guglielmo, 1871—1942）——意大利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译者

② 先生活，然后谈论哲学。——译者

经济活动；而谈论哲学是从事智力活动，Otium litteratum①。但毕竟还有这种情况，即一些人仅仅"生活着"，而一些人则不得不从事劳动，奴隶的、受折磨的劳动等，——这是这样一种劳动：没有这种劳动其他的人就不可能摆脱经济活动去谈论哲学。提出"质量"来与"数量"相对立唯一地意味着下列情况：保持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不受侵犯，在这些条件下一些人代表纯粹的数量，另一些人代表质量。认为自己是质量、美丽、思想等等的合法的代表会是多么愉快呀！没有一个上流社会的贵夫人不坚信她是在大地上执行保持质量和美丽的职能的！

理论与实践

应该研究、分析并批判理论与实践统一这一个概念在思想史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因为似乎没有一种世界观或哲学不研究于这一问题的。阿奎那·托马斯和一些经院哲学家的论断："Intellectus speculativus extensione fit practicus"②说明理论由于它的简单的传布而成为实践，也就是肯定思想体系与行动之间的必然的联系。莱布尼茨关于科学所讲的而为意大利唯心主义者所重复好多遍的名言："Quo magis speculativa, magis practica"③。乔巴蒂斯特·维科所讲的一句话："Verum ipsum factum"④曾被讨论过多次而且解释各有不同（参阅柯罗齐论维科一书和同一作者其他一些论战文章）。柯罗齐从唯心主义的意义上发挥了这句话。根据这种意义认识是行动，并且所认识的就是所

① 读书闲散。——译者

② "直观的智力通过它的传布而成为实践的"。——译者

③ "越是直观，越是实践"。——译者

④ "合乎真理的是现实的"。——译者

做的，这里"做"具有其特殊意义，特殊到根本不意味着任何其他的东西，而只是"认识"，也就是在同语反复中被揭露出来（虽然如此，应该把这一论点同实践哲学的论点联系起来）。

由于任何一种行动都不是一个意志的结果，而是几个激烈程度不同，自觉程度不同，对整个集体意志的综合体来说却是一类的意志的结果，所以很明显，与这种行动相符合的并隐蔽在这种行动中的理论，也将是同样分散的和种类不同的信念和观点的结合体。但是即使在这种限度内和条件下，理论也依然是完全接近实践的。假使也提出理论与实践等同的问题的话，那么，是在这种意义上：怎样以一定的实践为根据去建立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与实践本身的决定性的因素相吻合和等同，所以会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更为同样，更为一贯，在所有它的因素中更为有效，也就是会最大限度地加强它。或者假使已经有某一种理论的立场，——怎样组织为了使这种立场生效所必须的实践因素。把理论与实践同一起来是一种批判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证明实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或理论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这就是为什么理论与实践同一的问题特别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所谓过渡时期，也就是在改造运动进行得最迅速的时期发生，这时被解放了的实践的力量确实需要证实自己的表现的正确，以便成为更有作用的和更为扩大的，或者当也需要得到现实的证明理论纲领增多时，因为已经了解到这些纲领可以被实践运动所采用，而实现这些纲领的这种唯一的道路会成为更为实际更为现实的。

基础与上层建筑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有一句话，讲到发生在基础内部的冲突，人们在思想形式中意识到，这句话应该被看成是不仅具

有精神－心理意义的，而且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的论断。由此可知，领导权的理论－实践原则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因此正应该在这方面来寻求伊里奇对实践哲学所做出的最伟大的理论贡献。由于伊里奇向前推进了政治理论与实践，他也就在事实上向前推进了哲学本身。既然领导权机构的建设构成了新的思想体系的形式，既然这种建设决定了意识的改革和认识方法的改革，那么这种建设也就是一种认识行为，一种哲学行为。或者用柯罗齐的语言来说：在能够采用符合新的世界观的新的道德的时候，这也就造成了同样采用这种新的世界观的可能；换句话说，新道德的采用会引起整个哲学的改革。

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历史的联合”。换句话说，复杂的、矛盾的、不一样的上层建筑的综合是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反映。从此产生下面这一结论：只有包罗一切的思想体系才合理地反映出基础的矛盾和推翻实践的客观条件的存在。

假使组成一个思想意识方面百分之百清一色的社会集团，这就意味着存在这种推翻的百分之百的前提，“合理的”成为真正发生作用的和现实的。这种论断是以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必要的相互联系为依据的（这种相互联系也恰好就是实在的辩证过程）。

术语“卡塔尔希斯”①

术语“卡塔尔希斯”可以用来表明从纯粹经济的（或感情的－利

---

① 卡塔尔希斯（希腊语〔Katharsis——译者〕）——“净化”。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关于悲剧的学说中所使用的术语，表明“净化”卑鄙的热情，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观众在古代悲剧的演出中经常经受到这种净化。后来，这一术语常常用于美学中，美学基本上保持着同样的意义：在艺术作品的影响下赎罪，克服卑鄙的热情和感情，并且结果是人的道德的完善和提高。——俄文版编者

己主义的）因素向道德-政治的因素的过渡，也就是向更高地改造基础为人们意识中的上层建筑过渡。这也意味着"从客观之物向主观之物'和'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由压迫人的外界力量构成的基础把人吸收掉，使人陷入消极，变成自由的工具，变成创造新的道德-政治形式的手段，变成新的创议的源泉。这样一来，据我看，"卡塔尔希斯"因素的确定就成为全部实践哲学的出发点；卡塔尔希斯过程是与完成每一个辩证发展阶段的综合的链条相吻合的①。

康德的"本体"

关于"外部世界客观性"的问题，是就它同"自在之物"的概念及康德的"本体"相联系而言。据我看，难于否认"自在之物"之来源于"外部世界客观性"，也应归功于所谓希腊-基督教实在论（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这也可以从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一定倾向产生了新康德主义和新批判主义学派看得出来。

假使现实是象我们所认识它的那样，而我们的认识又在不断地改变的话，换句话说，假使任何一种哲学也不是最后的，而始终是在历史上受到制约的，那么就难于想象客观现实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不仅从常识的观点来看难于设想，而且从科学思想出发也难于设想。在《神圣家族》中这样说：全部现实包括在现象中，在现象之外什么也没有。当然就是这样一回事。但是证明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现象是什么呢？现象是不是一种存在于自身之中和为自己而存在的客观的东西，或者这就是人由于

---

① 应该永远记住这一过程动摇于其间的两点：（一）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也不给自己提出解决它们的必要条件和足够条件还没有或者还没有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任务。（二）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在没有首先表现出自己全部潜在内容之前是不会灭亡的。

争取自己实际的（建设自己的经济生活）和科学的利益，也就是由于在世界中去寻找一种程序，描述我们周围的事物并分类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也与实际利益，与未来利益间接联系）所选出来的一种质量？既然断言，我们在事物中所认识的东西不是别的，只是我们自己，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利益，换句话说，我们的认识是上层建筑（或者不自命为彻底和完善的哲学）就很难放弃一种思想，即在我们认识到的那一面毕竟还存在着一种实在的东西，不是作为形而上学的“本体”或“未知的神”或“不可认识之物”而存在着，而是在具体的“相对地不知道的”现实的意义上存在着一种还没有“被认识的”但是有朝一日人们的“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工具较为完善的时候，也就是人类的社会的和技术的条件沿着进步的方向改变的时候，就一定会被认识的东西。在这个场合下，我们求助历史的预见，这种预见在于一种简单的思维行为，它将要计划象我们从最古时候起直到我们今天止所发觉的那样一种发展的未来过程。在任何场合都必须研究康德，并且仔细地审查他所提出的原理。

历史与反历史

应该指出，现今所进行的“历史与反历史”之间的辩论不是别的，而是用现代哲学文化的概念和术语重复上一世纪末用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概念和术语所展开的关于自然和历史是“飞跃地”发展着呢，还是仅只逐渐地和进步地进化着呢这一问题的争论。至于这次辩论本身的痕迹我们也可以在以前的几代中找到，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居维叶的学说），还是在哲学方面（在这里这种辩论表现在，例如，黑格尔的著作中）。应该写一部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具体的和显著的表现的历史；那时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时代

中它一直都是现实的，因为永远都有保守党人和雅各宾主义者，进步者和顽固者。但是据我看，这种辩论的“理论”意义如下：它指出了一点，在这一点上发生着从任何一种世界观向符合这种世界观的道德“逻辑”的转化，从任何一种“直观”到行动，从任何一种哲学到受这种哲学所制约的政治行动的“逻辑的”转化。换句话说，这正是世界观、直观、哲学成为“实在的”那一点，因为它们提出改变世界，推翻实践作为自己的任务。因此，可以这样说，实践哲学的集中点也就在这里，在这里它现实化并且开始历史地生活着，也就是开始社会地生活着，而已经不仅仅是在单独个人的头脑里生活着；不再是“随意的”，而成为必然-合理-实在的。

问题应该历史地去加以考察，而无论如何不能用其他的方法去考察。至于那么多的戴上巨人的假面具的尼采主义者大肆狂喊反对一切现存的东西，反对一切客套虚礼等等，而结果是引起了普遍的嫌恶，把许多严肃的立场变成了不严肃的东西，——这一切确实如此；但是在自己判断中，不应追随装腔做势的人们。既然反对假装大智者，反对优柔寡断的愿望和抽象的把戏，那就应该记住必须“不轻于”发言和做态，以便使性格中和具体意志中具有力量。但这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作风问题。

据我看，这种从世界观向实际行为准则过渡的典型形式可以从加尔文教的预先决定中产生世界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实际创议的动机之一这个实例中看到。决定论的任何其他形式在一定的时机也同样以创议的精神和极端紧张的集体意志发展出来。

从马里奥·米西罗里① 对梯尔格② 《伦理学和法哲学概论》

① 米西罗里，马里奥（1886年）——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自由天主教派的政论家和作家。他曾长时期地编辑波伦亚报纸《古钱报》（“Resto del Carlino”），尔后又在都灵《新闻报》（“Stampa”）任编辑。现在是在米兰发行的资产阶级最大的报纸《晚邮报》编辑。——俄文版编者

("Saggi di Etica e di Filosofia del Diritto", Torino, Bocca, 1928, pp. XV—218)一书的评论(发表于1929年1月"I. C. S"③)中可以看得出来,《历史和反历史》("Storia e Antistoria")这本小册子的基本论点在梯尔格的哲学体系( )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米西罗里写道:"有人说,来自柯罗齐和秦梯尔④的意大利的唯心主义流为纯粹的现象论,这是十分正确的。其中没有个人活动的余地。阿德里安诺·梯尔格在这部书里激烈地反对这种倾向。梯尔格追溯到古典哲学的传统,特别是追溯到费希特,有力地证明关于自由和'责任'的学说的正确。没有选择的自由的地方,就有'本性'。不可能躲避开宿命论。生命和历史失掉意义,而良心的永久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回答。不以处于经验的现实的彼方的某种东西为依据,是不能谈什么道德、善和恶的。这一切都是早已为众所周知的事情。梯尔格的独创性在于他第一个传布了这项对逻辑的要求。'责任'的概念对于逻辑的必要不下于道德。从此也就产生了逻辑与道德的不可分离性,而旧的论文的作者却喜欢分别地考察它们。由于把自由看做是必要的前提,所以产生了自由的任意这种选择善与恶的绝对自由的理论。例如,惩罚(专讲刑法的篇章具有特殊的洞察力)的根据不仅在于责任心(古典学派),而且在于那一个唯一的和简单的事实,即个人虽然认识恶之为恶,仍可以作恶。因果性可以代替责任心。犯罪者的决定论与惩罚者的决

② 梯尔格·阿德里安诺(1887—1941年)——意大利哲学家、作家和文学戏剧批评家。他在哲学方面反对贝·柯罗齐的唯心主义的"历史主义",而为非理性主义辩护。——俄文版编者。

③ "Italia che scrive"在维隆那发行的文学评论刊物。——俄译者

④ 秦梯尔,乔万尼(1875—1944)——意大利反动的新黑格尔派哲学家。他把全部物质现实和精神活动归结为一种思想"行为"(从此产生他的哲学名称"行为主义")。在墨索里尼当政的年代中,他是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充任法西斯政府的教育部长。——俄文版编者

定论等值。这一切都是这样。但是这种坚决号召‘尽责任’，号召创造历史的反历史——它能不能在逻辑上恢复二元论和先验论？凡是把先验论看成是‘因素’之一的人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在论。在这里是同柏拉图的明显的分歧”。

思辨哲学

不需要对自己隐蔽讨论和批评某些哲学体系的“思辨”性质的困难以及从理论上“否定”哲学论点的“思辨形式”的困难。

这时所发生的问题是：(1)是否任何一种哲学都具有“思辨的”因素，这种因素是不是任何理论体系本身都必然采取的那种形式，换句话说，“思辨”是不是哲学和理论的同义语？(2)或者应该“历史地”提出问题：这一问题是不是完全历史的问题？而不是理论的问题（这是指任何一种世界观在其某一个一定的历史阶段都取得标志着它的顶点和腐朽的开始的“思辨”的形式而言）？完全可以做一个对比并且查明与那个从“经济-团体”阶段过渡到“领导”阶段（在积极同意下）的国家发展的联系。可以换句话说，每一种文化都经过自己的思辨的和宗教的时机，每一时机与表现这种文化的社会集团的完全领导的时期相吻合，而且可能甚至正好与那个时期相吻合，在这个时期中实在的领导权在基础上完全瓦解，而思想体系正因此（正是为了抵抗这种瓦解）而以教条的方法趋于完善，成为超验的“信仰”。

这就是为什么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每一个所谓衰落的时代（这时旧的世界发生解体）其特点都是产生一种精确的和高度“思辨”的思想。

但是批评必须以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的实在形式表现这些思辨的判断-实践活动的工具。然而批评本身也将有自己的思辨阶

段，这个阶段标志着它的顶点。全部问题在于：这个顶点是不是新型历史阶段的入门，一些社会的矛盾在这个阶段上即在自由与必然彼此的有机的渗透中将消灭，而观念的辩证法、概念的、而不是历史力量的辩证法将成为唯一的辩证法？

在关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神圣家族》）一段论述中十分清楚和明确地指出实践哲学的发生：它是由于思辨哲学本身的工作而达到自己完成的并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不错，在这种完成的过程中，除了哲学的实在论以外，从旧的唯物主义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另外一个应该认真思考的因素——思辨哲学的"精神"的观念是不是改着时装的"人的本性"的旧概念——既是超验哲学所具有的，也是庸俗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概念，也就是说"精神"的观念是否不是别的，而是旧的"神圣精神"的思辨化。在这种场合下可以断言，唯心主义内部是神学的。

"思辨"（唯心主义意义上的）有没有把新型的先验主义引进以内在论观点为特点的哲学改革中去？或许只有实践哲学是彻底"内在论的"观点。应该特别注意批判地审查思辨性质的历史理论。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写一部新的《反杜林论》，并且大可称之为《反柯罗齐论》。在这里面应该简短的说明不只是反对思辨哲学的论战，而且也要有反对实证论、机械论以及实践哲学的被歪曲了的形式的论战。

认识的"客观性"

对天主教徒来说，"……全部唯心主义的理论都立足于否认我们的任何认识的客观性，立足于唯心主义的'精神'的一元论（就其为一元论来说，相当于实证主义的'物质'的一元论），根据这种一

元论，宗教的基础本身即上帝并不是客观地在我们以外存在着，而是我们的智力的一种创作。因此，唯心主义之根本与宗教对立并不下于唯物主义”①。

在实践哲学中，关于认识的“客观性”的问题，可以根据下面这句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来分析：人们在思想意识的形式中，在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形式中，认识物质的生产力之间的冲突。但是这种认识是不是限于物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根据所引用的原文文字——还是指任何有意识的认识而言？正是这一个因素应该研究，而只有同所有关于上层建筑意义的哲学学说一起才有可能来研究它。在这个场合下，“一元论”这一术语将表达什么意义呢？当然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这一术语将标明在具体的历史行为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也就是与某一种被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与人所改造的自然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具有具体性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这是行动（实践，发展）的哲学，但不是“纯粹”的行动的哲学，即“非纯粹的”，实在的（在最简单的和最通俗的意义上的）行动的哲学。

实用主义与政治

据我看，不考虑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历史情况，是不能批判“实用主义”的（詹姆斯·威廉② 等），因为它是在这些国家里产生和得到广泛传播的。如果任何一种哲学都是政治，而每一个哲学家在实质上都是政治活动家的说法是对的话，那么对实用主义者就

① 参阅玛里奥·巴贝尔神父在1929年6月1日《天主教文明》上所发表的论文。

② 詹姆斯·威廉（1842—1910年）——美国反动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俄文版编者

更加可以这样说了，因为他们是用最直接意义的“功利”来建立自己的哲学的。并且假使这种情况在天主教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作为一种运动）话，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宗教与文化生活从文艺复兴和反宗教改革时起就被一道鸿沟所分开，那末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里的宗教与日常的文化生活是密切相结合的，而且它不是官僚主义地集中化了的和在智力上教条化了的。无论如何，实用主义超出了宗教-实证的范围，它努力建立世俗道德（不是法国类型的），努力建立比常识高一级的“民间哲学”；实用主义与其说是一个哲学体系，勿宁说是一个直接的“思想体系的党”。

假使把詹姆斯所表述的下面这个实用主义的原则拿来研究一下：“讨论某一种理论的各种不同原理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从确定当二者必取其一时这一个是合乎真理的场合与那一个又会是合乎真理的另一场合之间的实际差别开始”①，就会看得出来，实用主义哲学与它的政治基础是多么直接地相联系着。意大利或德国类型的“个别的”哲学家是与“实践”间接地相联系的（而且往往是经过带有许多环节的链条），至于实用主义者则想要与它建立直接的联系；其实意大利或德国类型的哲学家比起实用主义者来要更为“实用”，因为实用主义者在自己的推论和判断中是从直接的现实，往往是从庸俗的直接的现实出发的，可是前者则有更高的目的，选择目标中最高的一个，从而在努力提高现有的文化水平（不言而喻，所讲的这一切只有在前者确实向这方面努力的时候才是对的）。可以把黑格尔看成是十九世纪几次自由的革命的理论先驱。实用主义者至多也不过是促进了“工商界俱乐部”② 运动的产生，或者为

①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关于人的本性的研究》(W. James, Le varie forme della esperienza religiosa-Studio sul'a natura umana, trad. di G. C. Ferrari e M. Calderoni, ed. Bocca, 1904, p. 382)。

一切保守的和反动的运动做辩解而已（并且是在事实上为他们辩解，而不只是由于在论战中所犯的歪曲真理的结果如黑格尔对待普鲁士国家那样）。

伦　理　学

伊·康德的格言："你要那样去做，以便使你的行为能成为类似条件下所有的人的准则"，——并不象初看上去那样简单和明显。怎样去理解"类似条件"？是人的行动中的直接的条件呢，还是必须有长期的、批判地分析的研究才能认识的那些一般的条件，即复杂的和有机的条件呢？（在实质上，这是苏格拉底伦理学的基础，在它里面"道德"的意志是倚靠智力、知识的，而坏的行动是以无知来说明的等等，并且在它里面批判的认识的研究是达到更高的道德或绝对意义的道德的基础。）

康德的格言可以看做是一个自明之理，因为很难找到一个人，他在行动时不深信处于这种条件下的任何人都会象他那样地行动。一个人由于饥饿而去偷盗时，认为凡是挨饿的人都会去偷盗。一个人杀死不贞的妻子时，认为所有被欺骗的丈夫都一定去杀妻子，余此类推。只有临床学意义上的"疯子"在行动时，才不认为自己是对的。这个问题同其他问题相联系：（1）每个人都宽容自己，因为当一个人的行动同一般承认的道德不"相吻合"的时候，他会知道自己的感觉和判断的全部机构，知道使他这样行动的因果的整个链条，但同时却对其他的人很严厉，因为他不知道他们的内心

---

② "工商界俱乐部"（"扶轮社"）——1905年在美国创建的国际性的意识形态协会，主要联合了大工业资本和财政资本的代表人物。协会的俱乐部的绝大部分在美国，在那里出版它的中央机关刊物。这一协会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在三十年代中意大利曾有三十多个协会的俱乐部。——俄文版编者

生活；（2）任何一个人都根据自己文化的一切特点行动，也就是根据他本界的特殊文化行动，而对他来说，本界就是“所有的人”，所有同他一样思考的人；康德的格言的前提是一种统一的文化，一种统一的宗教，“世界的”一致主义①。

同时我以为有一种反对的意见也是不对的，它认为“类似条件”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这些条件中也包含有行动者本人，他的个性等等。可以说，康德的格言是时代决定的，是世界主义的启蒙运动和作者的批判的观点决定的，即它是同作为世界主义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哲学相联系的。因此行动者本人也是“类似条件”的体现者，换句话说，又是它们的创造者，这就是说，他“应该”按照他想看做人人榜样的那种“榜样”去行动，按照那种类型的文明去行动，而为了这种文明的到来，他一直在努力着或者为了保持这种文明他一直在“抵抗着”瓦解它的力量。

怀 疑 论

从常识的立场所能提出的反对怀疑论的意见如下：假使怀疑论者想要成为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的话，那么他没有别的，只有去过草木的生活方式，不参与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事物。假使怀疑论者参与争论，这就意味着他相信有说服别人的可能，也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怀疑论者了，而代表一定的积极的意见了；这种意见通常不是好的，只有在它使社会相信其余的意见更坏，因为它们无用，它才能胜利。怀疑论是同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相联系的，罗伯托·阿尔迪戈有一段话是值得玩味的，在这段话里讲到为了

① 一致主义（原文为 conformism。——译者）（宗教的，社会的）——使行为的准则、制度和习惯同居统治地位的（在宗教方面，社会生活方面）力量或阶级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相一致。——俄文版编者

柏格森的唯意志论而应该赞扬柏格森。这意味着什么？难道这不是承认自己的哲学无力说明世界，如果乞灵于相对立的哲学体系以寻求实际生活所必须的要素的话？阿尔迪戈的这些思想（参阅乔·马尔基赛尼收集并编辑的一卷《杂文集》〔"Scritti vari" raccolti e ordinati da G. Marchesini; Firenze, Le Monnier,1922〕）必须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联系起来；这种比较表明马克思多么高地超出了庸俗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

"观念论"①的概念

"观念论"是"感觉论"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一样的。它的最初的意义是"观念的科学"，而因为分析是科学所承认和采用的唯一的方法，所以它又意味着"观念的分析"，也就是"观念起源的研究"。人们把观念分解为它们的最后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感觉"：观念是由感觉而来的。但是感觉论可以不特别费事地同宗教，甚至同对"圣灵万能"和"它的命运不朽"的极端信仰结合起来。曼卓尼就是这样的，他甚至在信仰天主教（或回到天主教）以后，甚至在写出《圣歌》的时候，依然是感觉论的原则上的信徒，一直到他认识了罗兹明克的哲学为止②。

---

① 原文是"ideologia"，马克思主义是理解为"意识形态"的，法国十八世纪的"观念论"（以孔狄亚克为代表）用的也是这个词，所以要分别译为不同的词。——译者

② "观念论"的最有影响的文字宣传者是德斯杜特·德·特拉西（1754—1836年），因为他的著作文字通俗易懂；另一个是卡巴尼斯博士，他的著作有：《人的肉体与精神的相互关系》（"Rapport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等人是较狭义的哲学家）。也应该指出曼卓尼、卡巴尼斯、布尔热、泰纳（泰纳是莫拉斯和天主教一派其他作家的始祖）的"观念论与天主教"的联系，与"心理小说"（司汤达是德·特拉西的学生）的联系。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主要著作是他

"观念论"一词的内容改变了，不再是什么"关于观念的科学"、"观念起源的分析"，而开始指一定的"观念体系"了。关于这一点应该历史地加以考察，因为在逻辑上这一过程是容易理解和说明的。

可以断言，弗洛伊德是最后的一位"观念论者"，德·曼也是一位"观念论者"。柯罗齐和柯罗齐分子对德·曼的"热情"可能看上去更为奇怪，假使这种热情得不到"实际"的证明的话。应该探索一下，《通俗概要》[3] 的作者怎样在"观念论"上纠缠不清，而实践哲学却很明显地克服了"观念论"并且历史地正好与"观念论"相对立。"观念论"这一术语在实践哲学中所取得的意义本身，就暗示观念论意义减小的思想。这个意义排除了那种思想，即实践哲学的创始人能够在感觉中，从而归根到底在生理学中寻找观念的来源的思想；根据实践哲学，这种"观念论"本身应该历史地被看做是上层建筑[4]。

在分析各种意识形态意义时所犯的错误的因素之一，据我看，可以用下面这一事实（而且这一事实不是偶然的）来说明，即既把一定基础的必要的上层建筑称为意识形态，也把随意的体系，某些个人在科学上努力的成果称为意识形态。这个词的被歪曲了的意义成了它的扩充了的意义的基础，这也就改变了并歪曲了意识形

的《观念论的因素》（"Eléments d'idéologie", Paris, 1817—1818）一书。这书已出版了比较完整的意大利文译本（"Elementi di Ideologia del conte Destutt de Tracy", tradotti da G. Compagnoni, Milano, Stamperia di Giambattista Sonzogno, 1819）；法文本缺少整整一节——大概是关于爱情的一节；司汤达从意大利文译本里看到了这一节，他就利用它写了自己的著作。

③ 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通俗教科书》。——意文版编者

④ 意思即是说"观念论"（ideologia）这个名词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当作"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来理解的。下面我们遇到以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意义使用时，即译为"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译者

态的概念的理论分析。这种谬误的过程可以很容易地恢复过来：（1）确定意识形态同基础的区别，并肯定不是意识形态改变基础，而正相反；肯定（预定改变基础的可能性的）一定的政治决定，是“意识形态的”，换句话说，是不足以改变基础的。肯定这种决定没有用处，愚蠢等等；（3）转向这一种肯定，即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纯粹的”外表，没有用处的、愚蠢的等等。

因此，必须区别历史上固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一定基础所必需的意识形态与随意的、合理化的，“设想出来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作为历史上必然的东西，所以“在心理上”是牢固的，它们“组织”群众，成为那种人们进行活动，意识到自己本身的立场，进行斗争等等的基础。由于是“随意的”，所以它们只能形成个人的“运动”、论战等等（但是甚至这种意识形态也不是完全没有用的，因为它们似乎是代表着那种因为与真理相对立，而又肯定真理的那种谬误）。

应该记起马克思的经常的论断：“民间迷信的坚固性”是一定形势的必要因素。他大致是这样说的：“当着这个思想方式具有民间迷信的坚固性的时候”等语。马克思的另一个论断，即民间的信念往往具有物质力量的那种能量，或诸如此类的说法，是很值得注意的。我想，把这些论断加以分析可以加强“历史的联盟”的论点，在这里物质力量正好构成内容，而意识形态则构成形式；划分形式和内容只具有教学法的意义，因为没有形式的物质力量在历史上会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物质力量的意识形态也会成为个人幻想的结果。

II. 有关研究实践哲学的一些问题

问题的提法

造成一定历史时代既有营养又富成果的新的文化的Weltanschauungen[①]和在哲学上被最初已经存在的Weltanschauungen所指导的创作。马克思是Weltanschauung的创造者；而在这种场合下，伊里奇起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样的作用是不是纯粹依赖的和从属的呢？说明就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科学与行动里面。

从空想到科学和由科学到行动。建立领导阶级（也就是国家）与创造Weltanschauung（世界观）有同样价值。应该怎样理解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这个说法呢？马克思不想用这个说法指出成为国家领导阶级的阶级理论的自己哲学的历史使命么？对伊里奇来说，这一点实在地发生在一定的领土上了。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已经指出了伊里奇所制定的和实现的领导权这一概念和事实本身的哲学意义。实现了的领导权表明对哲学的实在的批评，它的实在的辩证法。同戈拉齐阿德[②]在《价格与超价格》（"Prezzo e soprapprezzo"）绪论里所写的比较一下；他把马克思看成是几位伟大学者的综合。最严重的错误是，在其他的学者里

---

① Weltanschauung（德语）——世界观。——译者

② 戈拉齐阿德同主教奥尔查蒂相比是落后了，因为奥尔查蒂在一本论马克思的小册子里，没有找到其它的比喻，只有把他同基督相比。对主教来说，这的确是极端的让步，因为他是相信基督具有神的本性的。

面没有一个人创造了独特的和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精神的创始人，这个时代大概要延长几个世纪，也就是一直到政治社会消灭和调整了的社会建立为止。只有到那时候他的世界观才会被超越（必然性观念被自由观念超越）。把马克思同伊里奇加以对比，以便把他们安放在某一种等级的梯子上面的不同的阶梯上——这是胡闹，白白浪费时间：他们表现了两个阶段：科学与行动，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内既是同样的又是不同样的。

把基督同圣保罗加以对比从历史上看也是荒谬的：基督——Weltanschauung（世界观），圣保罗——组织者、行动，传布 Weltanschauung。历史在同样的程度上需要他们两个人，而且他们身材相等。在历史上基督教本可以称为基督-保罗教；这种叫法会更确切些（只是由于相信基督是神，所以妨碍形成这样的叫法；但是，要知道这种信仰本身也只是一种历史的，而非理论的因素）。

有关方法的一些问题

假使我们想要研究一种从来也未曾为其创始人有系统地说明过的世界观是怎样产生的（在实质上，创始人的一贯性实质上不应该在每一篇单独的论文里或一组论文里去找，而应该在包含这种世界观因素的智力劳动的整个发展中去找），必须预先做好一番文献学性质的工作，做的时候要极端仔细、确实和精密，要具有科学的忠实性和智力上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不得有任何的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先验的论断或党的偏见。必须首先重现这位具体思想家的思想发展过程，以便确定在他的思维中什么样的因素成了稳定的和"经常的"，也就是体现为他自己的思想的，与他预先研究的起到刺激作用的"资料"有所不同并且更高的思想的因素。只有这些因素才是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可以按照长短不同的时期进行这种

选择，要放弃构成每一个这种时期的本质的东西，而不放弃关于这些时期的外部资料（这些也可以加以利用）；这样做可以“筛出”许多零散的学说和理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这位思想家可能在一定时期表示过同情，甚至一度承认过并利用来进行自己的批评工作，进行自己的历史的或科学的创作的零散的学说和理论。

根据观察所有学者的个人经验做出来的一般结论是：在某些时间内被“英雄般热心地”研究着的（也就是说并不只是由于表面的好奇心研究，而是由于对它感到深刻的兴趣）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在一定的时期内，特别是在年轻时期，它本身就具有一种吸引力，能把研究者个人整个掌握住，只有新的后来被研究的理论出现以后，才算告一段落。这种新的理论限制着旧的理论，直到它们两者之间确立了批判的均衡为止，在这以后，理论将被深入地研究，但已经没有由于所研究的体系或它的作者的感召力而产生的冲动的影响了。这位思想家越具有热烈的和论战的性质，越缺少系统性，这些观察就越具有重大的意义。或者问题是在于一个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不断交织起来的个人，或者问题是在于一个不断创作的、处于经常的运动中并且强烈地要求对自己进行无情的和彻底的自我批评的思想家，这些观察也具有更大的意义。

从以上这些前提出发，我们的工作应该具有以下的方向：（1）重写传记，不仅在实践活动部分，而且特别是在思想活动方面。（2）把所有的著作，哪怕是最不重要的著作按年代先后编制目录，这些著作根据作者本人变化情况划分为时期：他的智力的形成、成熟、掌握和使用新的思想方法，新的认识世界和生活的方法的时期。研究思想发展的主因和节奏比研究个别偶然的论断和零散的格言等重要。

这些预备工作使得有可能继续进行任何的研究工作。此外，在这位思想家的著作中必须区别哪些是他写成了并且自己发表了

的，哪些是自己没有发表的（由于没有完成）而被他的朋友或学生发表了的，并且有修正，改作和删节的地方，换句话说，并且是经过出版者积极参与了的。显然，对这些死后发表的著作的内容要特别注意和小心，因为这种内容只能看做是没有完成的，还要加工的，临时的材料。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即这些著作，特别是曾经在长时期之内准备的著作，是作者本人根本不想完成的，是被他本人部分地或全部地推翻了的，因此是他所不满意的。

至于实践哲学的创始人这个一定的具体的事例，则他的文字创作可以分为下列几部分：（1）在作者直接负责下发表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不仅要研究他本人提供材料付印的著作，而且一般地研究作者"发表的"或者他以其他各种方法：以信札、通告等形式使之流通的著作（典型的例子是《哥达纲领眉批》和信札）；（2）死后出版的著作，直接负责印行的不是作者，而是别人。最好能有最准确的核对过的原文（这项工作现在已经在做），或至少是根据科学标准仔细说明原本。

这两部分应该依照批判的年代时期重行整理，以便可以进行实在有用处的，而不止是机械的和随意的比较。

应该仔细地研究和分析作者所做的工作，即重新研究和确定自己著作的材料的工作，这些著作是后来作者自己发表的。通过这项研究工作至少可以得出一些标准和根据，以便批判地估价其他的人在这位作者死后所编辑的他的著作的可靠程度。原来准备的材料距离作者本人发表和校订的著作的最后的原文越远，其他作家对同一类型的材料所做的编辑工作其可靠的程度就越小。任何一部著作永远也不能与原来为了编著而收集的草稿等同。最后的选择，安排各个组成部分，对于在准备时期收集来的这个或那个成分给予或大或小的重视——这一切也就正好构成实在的著作。

对于通信也应该相当小心地加以研究：在信札里提到的这种

或那种肯定的论断可能没有在书里重述。信札在文体上的生动，往往从艺术性来看比之书本里的斟字酌句而稳健的文体来更具有说服力，这有时就引起论证中的缺点；在信札里，也像在讲演和谈话中一样，往往发现逻辑上的错误；思路比较快常常就会缺乏深刻性，理由也不够充足。

在研究独创的和新颖的思想时，我们只是在其次才注意其他的人在这种思想文献记载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这样，至少是在原则上，作为一种方法，应该提出实践哲学两位创始人之间在观点上具有同样的关系的问题，没有差别的问题。一位和另一位关于彼此同意的论断也只是在一定论据的范围内有效。甚至即使这一位为另一位的著作写了几章，这也并不是应该认为全书是绝对同意的结果的不可争论的根据。不应该低估第二位的贡献，但同样不应该把第二位与第一位等同起来，正如不应该设想，所有第二位归诸第一位的东西都是绝对真实的，没有包含任何其他的杂质。当然，第二位在著作史上表现出了唯一的无私的和毫无个人名利心的范例，在这方面没有问题；这方面既没有问题，更不怀疑第二位的绝对的科学忠实性。问题在于，第二位毕竟不是第一位，假使我们想要认识第一位的话，那么必须在由他直接负责发表的他的真实的著作的特点中去寻求他。从这些意见中对于附带的研究工作得出一些方法论上的看法和指示。例如，1912年佛尔米吉尼出版的洛多尔佛·孟多尔佛《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Materialismo storico di Friedrich Engels”〕一书，有什么意义呢？索勒尔①（在他写给柯罗齐的一封信里）对研究这样的题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因此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恩格斯独自思考的能

① 索勒尔（Sorel, George 1847—1922）——法国哲学家及工团主义理论家。他企图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同蒲鲁东的观念综合起来，反对社会改革是由历史和经济决定的。——译者

力有局限性，而且不止一次地重复说，不应该把实践哲学的两位创始人相混。把索勒尔提出的问题放在一旁不谈，据我看，单是这个事实本身，即有人假定两位朋友中的第二位理论能力有局限性（或至少他对第一位是处于从属地位）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必须弄清楚，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独创的思想到底是属于谁的等等。的确，直到现在，在文化界中（孟多尔佛的书除外）还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做过这类的研究。不仅如此，第二位的著作（其中有些著作的特点是具有相对的系统性）现在已被提到首位并且做为真正的原本来接受，更有甚者，做为唯一的真正的原本来接受了。因此，我以为孟多尔佛的这部书很有用，至少是由于这部书所指出的方向。

实践哲学与现代文化

实践哲学是现代文化的要素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些哲学思潮或者使某些哲学思潮富有成效。对于这一非常重要和非常有意义的事实的研究被所谓正统派忽视了，或者他们根本对这事实无知，道理在下面。认为实践哲学与各种不同的唯心主义的倾向发生最具本质的结合这种论断，在基本上与上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来文化中特别思潮（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主义①）相联系的所谓正统派看来是废话，甚至是欺哄人（固然，在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里对这个事实有一些指示，但是最肤浅地，而且没有任何批判的说明的企图）。因此有必要象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试图做的那样重新估价问题的提法。

发生了下列的情况：实践哲学的确受到了双重的修正，也就是成了双重哲学结合的成分。一方面，它的某些因素，明显地或隐蔽

① 自然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变种。——俄文版编者

地成了某些唯心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指出柯罗齐、秦梯尔、索勒尔，那同一位柏格森的哲学观，实用主义就足够了）。另一方面，所谓正统派所关心的是要找到一种哲学，根据他们的很狭隘的观点，这种哲学要强似“普通的”对历史的解释，他们基本上把实践哲学与传统的唯物主义等同了起来。另外一种流派返回到康德主义去了（作为实例，除了维也纳的教授玛克斯·阿德勒以外，可以举出两位意大利教授——阿尔弗列多·波吉和阿德尔基·巴拉托诺）。可以指出的是：一般地试图把实践哲学同唯心主义倾向结合起来的流派基本上是由“纯粹的”知识分子来代表的，而正统派却是由一些智力劳动的人们所代表的，他们比较坚决地献身于实践活动，从而更多地与广大人民群众（而且并没有妨碍其中大多数人做出具有不小的历史-政治意义的令人头晕的把戏）相联系（或多或少的表面上的联系）。

这种划分是很重要的。“纯粹的”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阶级的传布最广的思想体系的作者，作为自己国家里面的知识分子流派的首领不能不多少利用一些实践哲学的成分，以便使自己的软弱无力的主张得以立足，以便用新的理论的历史现实主义来美化过分思辨的哲理，以便用新的武器来充实他们所联系的社会集团的武库。另一方面，正统倾向的代表人物不得不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布得最广的思想体系——宗教的先验论做斗争，并且认为只要用一种平凡而庸俗的唯物主义就能够战胜它，而这种唯物主义也是常识的相当重要的形成层之一，这种形成层的存在是得到宗教本身的支持的——其支持的程度比起向来所料想的要大得多——而宗教在人民中间采取着自己的庸俗而鄙陋的迷信和魔术的面貌，在这上面物质起着不小的作用。

拉布里奥拉所不同于这二者的在于他断言（说实在话，并不总是有把握的），实践哲学是一种独立的和独创的哲学，本身具有继

续发展的因素，这些因素能够把对历史的解释变为普遍的哲学。正是必须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工作，发展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立场。洛多尔佛·孟多尔佛关于拉布里奥拉一书不能认为是（至少是根据我的记忆）这个立场的一贯的发展。①

为什么实践哲学竟会有这样的遭遇：它的基本元素被利用去造成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哲学上的结合呢？这一特点的判明工作不能不是复杂的和微妙的。这一工作要求具有很大的细致的分析能力和清醒的头脑，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就很容易被表面的相同之点吸引住而不能看到隐蔽的相似之处，观察不到必然的，但却是被遮掩起来的联系。必须具有很谨慎的批判态度，才可以进一步明确实践哲学向传统哲学"让步"并使得这些传统哲学能够经历一段返老还童的刹那时间的一些概念；这既不多也不少地意味着写出一部从实践哲学创始人的活动结束以后开始的这一个时期的现代文化史。

很显然，一种明显的假借是不难考究的，但是无论如何，也必须批判地来分析它。这种假借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柯罗齐把实践哲学归结为一种历史研究的经验的准则；这种看法甚至渗入到了天主教徒中间（参阅主教奥尔查蒂的著作）。它促成了意大利经济-法律历史编纂学学派的建立，这一学派不仅在意大利国内，而且在国外得到了传布。研究"隐蔽的"、没有被承认的假借将大为困难并需要高度的细心；这些假借的发生正是因为实践哲学是现代文化的要素之一，因为那种间接地不知不觉地起着作用从而改变了旧的思想方式的气氛本身贯穿着现代文化。从这一观点出发去研

① 仿佛记得孟多尔佛始终没有放弃实证论的基本观点，而一个罗伯托·阿尔迪戈的学生也理当如此，孟多尔佛的学生迪阿姆布里尼·帕拉齐所写《论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哲学》一书（有孟多尔佛的序言）一是孟多尔佛本人所受的大学教育的贫乏性和局限性的书面证明。

究索勒尔是特别有意思的。索勒尔和他的成功恰好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的说明；对于柯罗齐也应该这样讲。但是，据我看，最重要的应该是研究柏格森的哲学和实用主义，因为假使把实践哲学的历史环节除掉，它们的某些立场就会成为完全不可理解的了。

问题的另一方面——这是实践哲学恰好是用那些同它进行了激烈的原则战斗，象在理论上与马基亚维利战斗但实际上却是他的好学生的耶稣会徒一样的人所教导的政治学的实践课。在马里奥·米西罗里担任《新闻报》①驻罗马记者的时候（大约在1925年），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意见》之一大致讲过下面的话：假使深入地探索一下资本家内心的话，那么就会十分地清楚，其中最聪明的人确信《批判的〔政治的〕经济学》②把他们的一切事情都分析和研究得一清二白，因而他们就利用起从那里面吸取的教训来。所有这一切丝毫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很准确地分析了现实以后，不过是把这种现实的历史参加者本能地和模糊地在过去和现在所感觉到的并且在批判对方以后更极其深刻地认识了的那种东西合理地和彻底地系统化了。

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更值得注意。为什么所谓正统派也把实践哲学同其他的哲学“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同所有的，而恰恰主要是同一种完全确定下来的哲学呢？在事实上，假使有一种结合值得注意的话，那么这当然就是同传统的唯物主义的结合；同康德主义的结合只能得到有限的成功，而且只在不多的思想流派之中。关于这一问题须要看一看罗莎的《实践哲学发展中的停滞和进步》③

① La Stampa。——译者

② 即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意文版编者

③ 指罗莎·卢森堡的“Stillstand und Fortschritt im Marxismus”（《马克思主义中的停滞和进步》——译者）一文而言，该文载于1903年3月14日“Vorwärts”（《前进报》——译者）。——意文版编者

一文，在这篇论文里强调指出这种哲学的组成部分在发展上是程度不相同的，尽管始终是符合实践活动的需要的。换句话说，根据她的意见，新哲学的创始人大大地超过了自己时代的需要以及后来的时代的需要，并且似乎是建立了一种还不能适用的武库，因为它是不适时的，它的时刻还要在将来来临。这种说法多少有些诡辩，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把那个被说明的事实拿来作为说明之用，只是已经在一种抽象的形式中；可是在这种说明中毕竟还有某些对的东西，而这种"某些"的东西是可以深入一步加以研究的。据我看，产生这些结合的历史原因之一应该在实践哲学必须同异己的倾向结成同盟，以便战胜保存在人民群众中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的残余，特别是在宗教方面的残余中去找。

实践哲学担负着两项任务：战胜最精微形式中的现代的思想体系，以便能够组成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并教育具有中世纪文化的人民群众。这第二项任务，是基本的任务，考虑到新哲学的性质，不仅从数量上，而且也从质量上吸收了全部力量。正好是从"教学法的"理由出发，新的哲学形成一种结合，这种结合采取一种文化的形式，这种文化比起平均的人民文化（非常低的）来稍为高一些，但绝不适于与有教养的阶级的思想体系作斗争，而这种新哲学本身的所以产生恰好是为了超越当时文化的最高表现——德国古典哲学——并产生出属于新的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来，而这种哲学也就是这个集团的世界观。另一方面，现代文化，特别是唯心主义的文化不能够研究和创造出任何人民的文化来，不能够以道德的和科学的内容来充实自己的学校的教育大纲，这些大纲始终还是一些抽象的理论公式；它只是知识贵族狭小集团的文化，即使对青年也起到影响的话，那只是在有时当它直接成为一种政策的时候。

必须判明，这样来"配置"文化力量是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能不

能在以往的历史中根据时间和地点等情况找到类似的局面。在现代以前的典型的例子无疑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新教国家中的宗教改革的实例。柯罗齐在《意大利巴罗柯式①时代史》②里写道："文艺复兴运动即使在作为这个运动的母亲和乳母的意大利本土也成为贵族的、挑选出来的集团的运动了。它没有脱离宫廷小圈子的范围，没有深入民间，没有成为习俗和'成见'，换句话说，没有成为集体的信念和信仰。至于宗教改革，则正相反，'恰好具有这种深入民间的效能，但是它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在自己的内部发展上的落后'，这种发展是缓慢的，而且多次被自己生命胚胎的成熟所打断。"在前面，在第八页上，这样写道："路德也和这些人道主义者一样，否认忧愁，庄严地欢呼快乐，斥责游手好闲，号召劳动；但是，另一方面，这使得他对于文学和科学漠不关心甚至仇视。于是使爱拉斯谟③能讲出这样的话来：'ubicumque regnat lutheranismus, ibi litterarum est interitus'④；果然，德国新教的创始人所表现的这种仇视几乎成了唯一的原因，使得德国新教许多世纪来在科学方面，在批评方面，在哲学方面几乎一直毫无成果。而相反地，意大利的宗教改革家，特别是胡安·第·瓦尔德斯小团体里面的宗教改革家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毫不费力地把人道主义同神秘主义联合到一起了，把对科学的崇拜同严酷的道德联合到一起了。加尔文教由于它有严格的慈悲的教义和严格的纪律，同样决不有利于自由的研究和对美的崇拜；但是正好解释和发展慈悲和预定的教义并使得这两种教义彼此适应的加尔文教，很荣

① 巴罗柯式是欧洲文艺复兴末期开始至十八世纪末叶为止的一种建筑、艺术风格，以有丰富的装饰和场面豪华见称。——译者

② B. Croce, Storia dell'età barocca in Italia, p. 11.

③ 爱拉斯谟(Erasmus, Desiderius 1466—1536)——荷兰学者，生于鹿特丹，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北欧学术界的领袖，他最初赞成宗教改革，后来又反对。——译者

④ 所有路德教盛行的地方，文学就毫无作用了。——译者

幸地得以有力地把经济生活，生产，财富的积累推向前进。”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加尔文教引起了广泛的人民一民族运动，而它们也溶化在这种运动里面了；更高一些的文化只是在尔后的时期中才产生。至于意大利的宗教改革家的活动并没有获得巨大的历史的成就。不错，宗教改革本身在其最高阶段具有文艺复兴的面貌并且在非新教国家中也以这种形式传布开来，而在这些国家里并没有宗教改革在人民群众深处成熟的时期。但是人民发展的阶段使得新教国家能够顽强而胜利地抵抗天主教十字军的征伐；就这样产生了日耳曼这样一个现代欧洲最强大的民族之一。法兰西被几次宗教战争蹂躏得不堪言状，结果是天主教表面上的胜利，但是它却经受了十八世纪的伟大的人民改革——启蒙运动，伏尔泰主义，“百科全书派”，——即1789年革命的先声和伴随这次革命的改革。这的确是法国人民的伟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改革，比之德国的路德的改革来，更为全面，因为它也包括了乡村中的广大的农民群众，因为它是在明显的世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曾经企图用表现在民族的和爱国的联系中的世俗的思想体系来完全代替宗教。然而甚至这项改革也没有能够使高度文化直接繁荣起来，但体现在实证法学形式中的政治学除外①。

或许只有乔治·索勒尔以詹森主义②的狂怒起来攻击议会制度和政党的畸形怪状，能够或多或少有些模糊地和知识分子式地预见到应该把实践哲学理解为现代的人民的改革（因为那些象米

---

① 应该记起黑格尔怎样比较了同样一种文化于法国革命时期在法国和德国所采取的特殊的民族形式，回忆一下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它经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以后，造成了下面这两句名诗：

“……他们被对立的信仰所推动，使得伊曼努尔·康德失掉了上帝，使得玛克希米里安·罗伯斯庇尔失掉了国王。”

② 詹森主义——一种宗教-社会运动，在十七世纪中叶发生在法国，它反对天主教会的专制封建思想体系。——俄文版编者

西罗里之流的等待着意大利宗教改革，等待着新的意大利版的加尔文教的人，都是纯粹的经院哲学家）。索勒尔从列南[①]那里承袭了一种必须实行精神和道德改革的思想；他断言（在写给米西罗里的一封信里），伟大的历史运动往往由现代文化之一来代表等等。但是我以为当索勒尔利用原始基督教作为比较的标准，固然，完全是书本式的，但却多少有一点儿真理的时候，这种论点就流露出来了；虽然他也采取具有形式主义性质的而且往往是臆造出来的引证，但是毕竟可以从他的论点里发现一线深刻的直观。

实践哲学是以这一切过去的文化为前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加尔文教和古典英国〔政治〕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作为全部现代生活观念基础的历史主义。实践哲学自身使这一切精神道德改革运动成功，这种运动形成高级文化与人民文化之间的辩证矛盾。实践哲学与下面这种结合相符：新教改革加法国革命；这是政治的哲学，同时也是哲学的政治。实践哲学还没有完全脱离平民的阶段：产生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是不容易的，为了这样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包括着行动和反行动，结合和分裂，也包括新的为数众多的和复杂的组织的建立。暂时这还是一种社会的从属集团的观点，这个集团被剥夺了历史的首创精神，仍在不断地扩大，但不是有机地；这个集团依然没有能够越过某一种质的阶段，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掌握国家政权，足以实现自己的对于整个社会的领导权的地步；而只有这种领导权允许在智力集团的发展中保持某些有机的均衡。实践哲学也被变成"偏见"和"迷信"了：在它本来具有的形式中它代表着现代历史主义的人民的方面，但同时它本身又包含着克服这种历史主义的原

① 列南·艾尔奈斯特（Renan Ernest，1823—1892）——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折衷派哲学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他利用冒充科学的论断，企图保卫宗教和唯心主义。——译者

则。在文化史中（它远比哲学史范围广），每当社会经历着变革，并且新兴阶级的金属从全民的矿物中精炼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人民文化的繁荣，就会出现“唯物主义”的兴盛，而相反地，就在这个时机，衰老的阶级却死抓住唯灵论不放。黑格尔依据法国革命的经验和复辟的经验把人的思想的两个方面，即唯物主义和唯灵论辩证化了，但是综合的结果却是“站在头脑上的人”①。黑格尔的门徒破坏了这个统一，有一些人回到唯物主义的体系，另一些人回到唯灵论的体系。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更生了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的，法国唯物主义的整个这一套经验，以便恢复辩证统一的综合，但已经是作为“用双脚站着的人”了。实践哲学也受到了黑格尔学说所经受过的遭遇：人们曾经同样企图把它扯碎为几个部分；有一些东西脱离了辩证的统一又重新回到哲学的唯物主义，同时高级的唯心主义文化企图把实践哲学里面制造某种新药所需要的东西包括到本身来。

唯物主义的观念“在政治上”是接近人民的，是接近常识的；它是与许多信仰和偏见，几乎与一切的民间的迷信（魔法、幽灵等等）密切相联系着的。这在民间的天主教中，特别是在拜占廷的东正教中可以看出来。民间的宗教是粗糙唯物主义的，但是知识分子的正式的宗教却尽力阻止成立两种分开的宗教，两个独特的阶层，以便不脱离群众和不正式成为它实际上已变成的东西——狭隘集团的思想体系。然而从这个观点出发不应该把实践哲学的立场同天主教的立场混为一谈。因为前者同人民群众中的一些越来越新的阶层保持着经常活动的联系并且经常努力把他们提高到越来越

① 黑格尔关于法国革命曾说：“自从天空中照耀着太阳，而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行以来，从来没有见过人用自己的头脑站立着，就是说，人根据思想，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见他的《历史哲学》，转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版，第14页。）——译者

高的文化水平，而后者则努力保持纯粹机械的、表面的统一，这种统一特别建基于教会的仪礼上和最刺目的使群众受感化的崇拜上。许多异端的企图都是人民的力量争取改革教会和争取通过把人民的文化提高到更高的水平的途径使教会更接近人民的表现。教会对这些企图迅速地作出反应，而且往往是以最残酷的方式作出的：它成立了"耶稣会"，企图以特兰托宗教会议的决议①武装自己；而且不管怎样，它组织了出色的"民主"选拔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机构，但是恰恰把它们作为单独的个人，而不是作为一定的人民集团的代表选拔出来的。

在文化发展历史中必须特别注意文化活动的组织和表现出这种组织的具体的形式的那些人物。从乔·第·鲁柴洛所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G. De Ruggiero, Rinascimento e Riforma)一书中可以看得出来，以鹿特丹的爱拉斯谟为首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抱有什么样的立场；他们都向火刑和各样迫害低了头。正因为这样，所以宗教改革的体现者是整个德国人民，是全体不可分割的人民，而决不是知识分子。恰好就是知识分子在敌人面前的这种临阵脱逃，也说明宗教改革直接在高级文化范围内一直到从保持着忠于宗教改革事业的人民群众中间逐渐擢拔出在古典哲学中达到自己顶峰的新知识分子集团为止始终"毫无成果"的原因。

至今为止实践哲学也发生了某一种相类似的情况：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知识分子的大的代表，除了他们人数不多以外，没有与人民联系起来，并不是出身于人民；他们是传统的中

① 特兰托宗教会议——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曼大帝国在意大利北部特兰托(Trento)地方召开的天主教会议(1545—1547，1551—1552，1562—1563)。会议的目的本打算是实行教会改革，但耶稣教徒反对，而成了反对宗教改革的会议。会议的决议充满了天主教反动派的精神：决议排斥一切新教教义；宣布罗马教皇高于会议；决议也特别注意提高僧侣等级的文化水平；这个决议是天主教封建反动势力的共同纲领。——译者

间阶级的表达者，因而在急剧的历史"转变"时期他们也就回到这些阶级那里去了。其中另外一些人留在自己的原来阵地上，但不是为了保证新的理论的独立发展，而是为了对它作有系统的修正。主张实践哲学是一种新的、独立的、独创的理论，同时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因素之一，也就是主张一种新的、正在成熟的文化的独立性和独创性，这种文化将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只是经常在变化着的新与旧的结合，只是产生在一刹那间的与社会关系的均衡相符合的文化关系的均衡。只有在建成了〔工人阶级的〕国家以后，文化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才被提出来，并且要求得到彻底的解决。无论如何，在这种国家成立以前的立场应该是一种批评的——论战的立场（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是教条主义的）；这应该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立场，但是它的浪漫主义应该自觉地努力向古典主义的彻底的阶段过渡。

附注一。必须研究复辟时期，把它看做是一个制定所有现代的历史学说的时期，其中也包括这个时期完成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正好是在1848年前夕创造出来的，这时复辟已经到处垮台，而"神圣同盟"也已粉碎。谁都知道，复辟不过是一个比喻：其实任何旧制度的真正的复辟也没有发生，发生的只是一种新的力量的配置，在这种配置下中等阶级的革命成果是受到限制的并且是被法定了的。法国国王和罗马教皇成了相应的党的领袖，不再是无可非议的法国的或基督教的代表。特别是教皇的地位摇摇欲坠。恰好就由那时起开始成立永久性的"黩武的天主教徒"的集团，这些集团经过另外一些中间阶段——1848—1849年，1861年（教皇国家第一次解体和伊密里亚省的归并〔给意大利王国〕），1870年和战后时期而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天主教行动"——虽然强大，但却以防御的立场出现。复辟的历史理论是与十八世纪的抽象的和空想的思想体系相对立的。这些抽象的和空想的思想体系一直到

1870 年都作为无产阶级的哲学、伦理和政治而存在着，它们特别广泛地传布于法国。实践哲学作为群众的哲学与十八世纪的这些民间的观念相对立，与它们的一切形式，从最幼稚的起到蒲鲁东的观点为止相对立。蒲鲁东受到了一种独具一格的保守的历史主义的嫁接，因而或许可以把他称为法国的乔别蒂①，但是是人民阶级的乔别蒂，正如在 1848 年所发现的，这是为意大利历史比起法国历史具有落后性所决定的。如果说保守派历史学家，旧的理论家在批判木乃伊化了的雅各宾思想体系的空想性质方面是强有力的话，那么实践哲学家无论在估价成为新的法兰西民族形成中的创造因素（也就是在实在的一定的情况下起作用的因素）的雅各宾主义的历史上实在的意义而不是抽象的意义方面，或在估价那些在事实上是雅各宾党人的腼腆的儿女的保守主义者本身的历史任务方面都更加强有力：咒诅他们的极端性，同时却又很仔细地处理他们的遗产。实践哲学不仅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对一切过去的东西加以说明和证明为正当，而且是对自己本身加以历史的说明和证明为正当；换句话说，它是最高的"历史主义"，它完全摆脱了任何一种抽象的"观念论"，它是历史的世界之实在的成果，它是新的文明的开始。

思辨的内在性和历史的或实在论的内在性

有人断言，实践哲学是在十九世纪前半期文化的最大限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种文化是由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革命的〕政治著作和实践所代表的，断言这三种

① 乔别蒂（Gioberti, Vinccujo 1801—1852）——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否定对立面的斗争，因此主张各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合作。在本书中葛兰西对他的学说有所批判、分析。——译者

文化运动是实践哲学的来源。应该从怎样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论断呢?是从这种意义上去理解吗,即这些运动中的每一种都相应地促进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实践哲学的〔革命的〕政治的制定?或者是实践哲学综合地改造了所有这三种运动,换句话说,改造了时代的文化,而且在这种新的综合中,不论我们去研究其中的任何一种因素:理论的、经济的、政治的,我们都会在它们之中的任何一种里面找到这三种运动中的每一种运动作为"基本因素"。我正是这样看的。并且我以为应该把这种综合的联合的因素确定为内在性的新的概念,这一概念从德国古典哲学所提出的它的思辨的形式借助法国〔革命的〕政治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被转为历史的形式。

由于在德国哲学的语言与法国〔革命的〕政治的语言之间实质上具有同一性的关系,应该回忆一下前面的札记。据我看,最有意思的和最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之一应该是对德国哲学、法国〔革命的〕政治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所做的研究工作。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实践哲学等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一开始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应该不应该把李嘉图在经济学上应用的新的方法论上的规则看成是纯粹的工具性的珍品(或者,为了明确起见,看成是形式逻辑的新的一章)或者这些规则具有哲学革新的意义?难道形式逻辑原则"倾向律"的发现,由于它能够使人们科学地表述 homo oeconomicus'a① 的〔政治〕经济学和"一定市场"的基本概念,不也是一种具有认识论意义的发现吗?"内在性"、"必然性"与自由等等的新的论点不正是包含在它里面吗?据我看,正是实践哲学把李嘉图的学说变成了哲学的语言,因为实践哲学赋予了他的发现以一种通用的性质并且适当地把这

---

① 拉丁文,人的家政。——译者

些发现推广到全部历史上面去，从而自己在创造新的世界观的时候首先利用了它们。

当前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1）扼要地叙述李嘉图的表现在经验论规则形式中的科学-形式的原则。（2）研究李嘉图这些原则的历史来源，这些原则是同经济学本身的产生相联系的，是同资产阶级这个“具体的世界的”阶级的发展相联系的，从而是同世界市场的形成相联系的。这个市场上的复杂的运动已经达到了那种“密度”，使得从它们里面找出一些必然的规律性并对这些规律性加以研究成为可能，换句话说，使得从它们里面找出一些倾向律并对这些倾向律加以研究成为可能，这些倾向律并不是在自然主义的和思辨的-决定论的意义上，而是在“历史的”意义上，也就是根据“一定市场”，或者换句话说，也就是活生生的和在自己发展的运动中有机地联系着的环境的自己表现而起作用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现象的量的表现来研究这些倾向律；在从〔政治〕经济学转为普遍的历史的时候，量的概念补充以质的概念和变成质的辩证的量的概念）①。（3）把李嘉图同黑格尔和罗伯斯庇尔联系起来。（4）考察一下，实践哲学怎样从这三种活生生的思潮的综合升高到清除了先验性和神学的一切痕迹的新的内在观。

除了上述的一些研究工作以外，应该提出一项涉及到实践哲学与柯罗齐和秦梯尔为代表的现代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在继续的关系的研究工作。必须怎样理解恩格斯关于继承德国古典哲学所讲的那句话？应该不应该把它理解成现在的已经与世隔绝的一个历史的集团，在这个集团里面那种黑格尔学说中的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已经被彻底地、一劳永逸地吸收完，或者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仍在发生着的历史过程，这种过程重现着

① 数量＝必然性，质量＝自由。“数量—质量”的辩证法（辩证的相互联系）与“必然性—自由”的辩证法同一。

文化-哲学的综合的必要性呢？在我看来，这第二个答案是正确的：在现实中依然重现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个论纲中受到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彼此片面的立场，而且也和当时一样（虽然我们也达到了更高的阶段）须要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的阶段上的综合。

马克思主义的组成因素的统一

人与物质（自然—物质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通过辩证的发展达到统一。在政治经济学中，统一的中心是价值，换句话说，是工作人员与工业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反对价值论的人陷入笨拙的庸俗的唯物主义，他们只把机器本身——不变的技术资本——提出来并把它们看成是脱离了管理它们的人的价值的生产者）。在哲学中——统一的中心是实践，也就是人的意志（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在政治中——统一的中心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国家进行干预（集中化了的意志）以教育教育者，一般的社会环境（这都需要深入研究并以更为确切的专门术语来说明）。

哲学，〔革命的〕政治学，〔政治〕经济学

假使所有这三种活动都是同一个世界观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在它们的理论原则中，必然应该包括有一种变为另一种的能力，包括有彼此转译为每一个组成部分的自己专有的语言的可能性：一个包括在另一个之中，而它们一起共同构成清一色的集团①。

① 参阅前面所提出的关于科学语言的彼此转译的可能性的札记（在俄文版中这些札记没有收入）。

从文化史家如思想史家的这些前提中（这些前提还应该加以制定）产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的某些研究工作的标准和批判的准则。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即大活动家并不是在从表面上分类的观点来看显然应当是最"合乎逻辑的"那种形式中，而是在完全另一种表面上看成好象是与他不相干的领域中更有成效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作，但是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论文中去找。任何一个人都有其基本的和主要的活动；他的"真正的"思想正应该在后者之中去寻找，这种思想往往包含在隐蔽的形式中，并且有时是同 ex professo① 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相矛盾的。以这种态度来估价历史的判断，固然是包含着很大的肤浅的危险，因此在使用的时候，必须很谨慎小心，但是这项标准在寻求真理上却没有失去它的效果。

的确，这种"偶然的哲学家"更难于摆脱在他那个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潮，摆脱那些成了教条主义的对于一定世界观的解释等等；而他作为学者-政治家是觉得自己脱离这些时间和阶级的偶像而独立的，并且接受原来的那种世界观连同所有的直接性和独创性；他洞察到它的核心深处并且在与生活密切的联系中去发展它。在这方面卢森堡所表现的那种思想依然是有用的和有成效的，即目前还不能着手解决实践哲学的某些问题，因为普遍的历史的进展或各该社会集团的历史的进展还没有使得这些问题成为迫切的。一定的智力活动是符合着每一个阶段的：经济-团体阶段，在公民社会中争取领导权的阶段，国家的阶段，而这种智力活动是不能随意造成的或者在时机未到以前产生的。在争取领导权的阶段中发展着政治学；而在国家的阶段中则应该发展上层建筑的所有部分，否则国家有解体的危险。

① 拉丁文，十分内行。——译者

实践哲学的历史主义

实践哲学历史地考察着自己本身，也就是把自己看成是哲学思想的暂时阶段这一点不仅从这一哲学体系的全部精神中看得出来，而且也公开地包含在一个有名的原理中，即在一定的时期历史的发展将表示由必然性王国向自由的王国的过渡。所有存在到现在的哲学(哲学体系)都是使社会分裂的一些内部矛盾的表现。但是这些哲学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体系本身也不是这些矛盾的自觉的表现，因为只有彼此之间进行斗争的一切体系的总和才能得出这样的表现。每一个哲学家都坚信，而且也不能不坚信他是在表现人类精神的统一，也就是历史与自然的统一；其实，如果不存在这种坚信的话，人们就不会行动起来，就不会创造出新的历史，哲学就不会成为“思想体系”，就不会在实践中获得具有“物质力量”的能力的“人民成见”的坚固的狂信堡垒。

黑格尔在哲学思想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的体系，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哪怕是以“哲学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也好，能使我们理解什么是现实，也就是在一个哲学体系中和在一位哲学家身上包括有那种对矛盾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在以前仅仅能从一些体系的总和中，从一些彼此争论和互相矛盾的哲学家的总和中产生出来。

由此可知，实践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黑格尔学说的改革和发展，是摆脱掉(或尽力摆脱掉)思想体系的片面性的和狂信的任何因素的哲学，是对矛盾的充分认识，同时被理解为个人或整个社会集团的哲学家本身不仅理解矛盾，而且也把自己本身看成是矛盾的因素并把这个因素提高到认识的从而是行动的原则。实践哲学否认“一般的人”，不论他是怎样呈现出来，它讥笑并打破赋予体系

以统一的外表的教条主义的概念，因为它们也表现"一般的人"或每个人内在的"人的本性"的概念。

但是假如实践哲学也是历史矛盾的表现，并且是自觉的、因而也是最完善的表现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它也是与"必然性"而不是与"自由"相联系着，因为自由不存在并且在历史上还不能存在。这样看来，假使已经证明矛盾一定要消灭，那么从而证明实践哲学也一定要消灭，也就是一定要被克服：在"自由"的王国中，思想，观念不能再在矛盾的基础上，在斗争的必要性的基础上产生。现在，(实践)哲学家只能提出这种一般的说法，不能更多：在事实上，他不能逃开目前的矛盾的土地，关于没有矛盾的世界的存在他不能说别的，而只能大致地讲一下(以免直接造成空想)。

这并不等于说，空想不能具有哲学价值，因为它具有政治价值，而在任何一种政治中都隐藏着哲学，哪怕是不完整的和仅仅处于草创的形式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宗教是最大的空想，也就是在历史上所出现的最大的"形而上学"，因为它代表一种以神话形式调和历史生活中实在的矛盾的最大的企图。在事实上，它肯定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样的"本性"，存在着一般的人，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的儿子，因此是所有其余的人的兄弟并与所有其余的人一律平等，他在其他的人们的中间是自由的，他自己也象他们一样，对着这个人类的"自觉"的上帝这面镜子可以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但是它又肯定，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这个世界，而是为了另一个(空想的)世界。这样一来，平等、友爱、自由的观念就在人们的心中沸腾起来，就在既看不出自己是和大家一样平等，也看不出自己是其他的人们的兄弟，更看不出自己是和其他的人一样自由的那些阶层的人们心中沸腾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每当群众的最下层的阶层骚动不安的时候，就会这样或那样地以一定的形式和在一定思想体系的形式下恰好提出这些要求来的道

理。

讲到这里不由得记起了威里奇〔伊里奇〕对1917年4月提纲所提的意见①，即专门论述统一制学校的那一条，更确切些，是这一条的补充说明（引自1918年日内瓦版本）。他在那里面提到在雅各宾恐怖时期被斩首的化学家和教育学家拉瓦节就恰好提出了这统一制学校的思想并且直接把这种思想同当时人民所具有的感情联系起来，当时的人民认为1789年的民主主义运动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现实，而不仅仅是某一个思想体系——某一个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且对于平等做出了具体的结论。对于拉瓦节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看来，是具有一种空想的因素的（凡是从人的"本性"的"统一原则"出发的所有文化思潮中都程度多少不同地表现出这种因素来）；但对伊里奇来说，他具有能从理论上证实的政治原则的意义。

假如实践哲学从理论上肯定任何被认为是永恒的和绝对的"真理"都具有实践的来源，并且都代表"暂时的"价值（由于任何一种世界观都具有历史性）的话，那么就很难于迫使"在实践上"理解这种解释对于实践哲学本身也是有效的，同时并不打破一旦缺少它们则行动将成为不可能的那些信念。

另一方面，这就是任何一种历史哲学都要遭遇到的那种困难。庸俗的争论者（特别是天主教徒）滥用这一点来在同一个单独的个人身上把"学者"同"煽动家"对立起来，把哲学家同行动的人对立起来，并且作出结论，说什么历史主义必然造成道德上的怀疑主义和腐化。这一种困难会在小人物的意识中产生许许多多的"悲剧"，也会迫使大人物穿上歌德式的"奥林匹亚"披风。

---

① 指1917年4月列宁向党第七次代表会议所提出的修改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草案。新的纲领后来在1919年3月召开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意文版编者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把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这句话非常精确和仔细地加以分析和研究的道理。

因此从实践哲学本身也发生着这样一种情况，即它努力成为这种意义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成为绝对的和永恒的真理的教条主义的体系，特别是当着人们把它象在“通俗本”① 里所做的那样拿来同庸俗的唯物主义，同“物质”的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时候，因为“物质”不能不是永恒的和绝对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是发生在人类社会，而不是自然界（尽管这种过渡也能影响对自然的感受，影响科学观点等等）。甚至可以断言，当实践哲学全部体系在新的统一的世界中临到衰落的时候，在必然王国中是空想的许多唯心主义的论点或至少是这些论点的某些方面也能够在这种过渡以后成为“真理”等等。不能说什么分散成许多集团的社会的“精神”，而没有必要的明确说明，这是指团体的精神而言（当着人们如象秦梯尔在他自己的那本论现代主义的小册子② 里面所做的那样跟在叔本华后面说，宗教是群众的哲学，而哲学是选拔出来的人物的也就是知识分子的伟大代表人物的宗教的时候，这一点在隐蔽的形式中被承认着）；只有在社会成为“划一了的”〔统一的〕的时候，才可以谈得到社会的“精神”。

〔政治〕经济学与思想体系

要求（做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公设被提出来的）提出并说明

① 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科书》一书而言。——俄文版编者

② G. Gentile, Il modernismo e i rapporti tra religione e filosofia; Bari, Laterza, 1909 (《现代主义及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关系》巴利版，出版者拉台尔札，1909年)。

政治和思想体系晴雨计的任何波动，都是基础中的改变的直接表现，应该从理论上做为一种原始的婴儿病加以驳斥，并且在实践上用从事具体的政治和历史问题著作的作者马克思本人的证明来驳斥。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和《关于东方问题》的论著，以及其他的论文(《德国革命和反革命》,《法兰西内战》和更短小的论文)。把这些著作加以分析，把篇幅散乱的理论方面的论断查考清楚，搜集在一起，正确地加以理解和解释就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方法论。

可以看得出，马克思在自己的具体的著作里提出多少实际的保留意见，这些保留意见在他的关于一般问题的著作里是看不到的。在这些保留意见中，可以指出下面这一些做为例子：

(1)在每一个个别的场合下静止地(如同一刹那间照像的显影一样)确定基础的困难性。在事实上，政治在每一个个别的场合下是基础发展的一些倾向的反映，而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说过这些倾向必定会实现。对于基础的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只有在它完成了自己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后才可以去具体地研究和分析；在过程本身进行期间对它只能是假定地加以研究，并且要着重提出问题正好是在于假定。

(2)由此可见，某一种历史的行动可能是统治阶级领导者打算上的错误，这种错误由历史的发展去纠正，并且通过统治阶级的议会的、政府的"危机"来克服。至于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则它是不注意发生错误的可能性的，而把每一个政治行动都看成是为基础所直接决定的，都看成是基础的实在的和经常的(成为经常的)变化的反映。"错误"的原则是复杂的：问题可能是由于错误打算而产生的个人的冲动，或者甚至是某些集团或小集团企图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领导权，而这些企图是可能失败的。

(3)不够注意的是许多政治行动是组织性质的内部需要决定

的，换句话说，这些行动是同使这个或那个党、集团、社会具有完整性的必要性相联系的。这一点以天主教会为例就可以看得很明显。假使我们想要为教会内部每一次思想斗争都在基础中去寻求直接的根本的解释，我们就会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根据这一点已经写出了不少的政治-经济的长篇小说。而相反地，这些争论的大部分显然是与宗教主义的组织方面的要求相联系的。如果为了罗马与拜占廷之间关于圣灵起源问题而发生的争论中，在东欧的基础中去寻找一种认为圣灵仅仅起源于天父的说法，而在西欧的基础中去寻找一种认为圣灵既来源于天父也来源于天子的说法，那就很可笑了。这两个教会的存在和冲突取决于基础和全部历史，它们提出的问题成为其中每一个的分裂和内部团结的出发点；但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即两个教会之中的每一个教会会肯定恰好是另一个教会所已经肯定的东西；然而分裂和冲突的基础却依然保持下来，要知道构成历史的问题的正好是这种分裂和这种冲突，而不是每一方偶然竖起的旗帜。

附注。常在《劳动问题》杂志副刊上写长篇连载的富有思想性小说的“小星”（这一定是声明狼藉的弗朗斯·惠斯用以隐蔽自己的笔名）在一篇以《俄国的倾销政策和它的历史意义》为标题的使人好笑的谵语里，正好在谈到早期基督教的这些分歧时肯定说这些分歧是直接与时代的物质条件相联系的，假使我们不能弄清楚这种直接联系的话，那么这仅仅是由于事实距离我们现在已经遥远了，而我们的智力也弱。这种看法很便当，但是在科学上却十分不高明。在事实上，每一个实在的历史阶段却要在尔后的阶段中留下自己的痕迹，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前者的最好的文件。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时间上的统一，因此现在的东西在本身中包含着一切过去的东西，而在过去“本质的东西”，在现在实现着，并且没有任何“不可认识的东西”的残余，而这种“不可认识的东西”好象

就是真正的"本质"。同时"被遗失了的"那种东西，也就是在历史过程中没有被辩证地传下来的东西，其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好象是一种偶然的"渣滓"，琐碎小节，而不是历史，是表面的，归根到底没有被注意的插曲。

道德学与历史唯物主义

我以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的科学基础应该在"社会永远不给自己提出解决它们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的任务"① 这一论断里去找。一旦条件具备，"任务的解决成了'责任'，而'意志'成为'自由'"。道德应该是对于为了在一定的意义上向着一定的目的实现意志的自由所必须的条件的研究，同时应该是这些条件的存在的证明。也不应该说什么主要目的和从属目的，而应该说必须达到的目的的次序，考虑到我们想要使之"道德化"的不仅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人，而是个人组成的整个社会。

规律性与必然性

怎样在实践哲学创始人头脑里产生了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概念呢？这种概念未必是从自然科学派生出来的；毋宁应该考虑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大卫·李嘉图用以充实了经济学的那种形式中，和借助于大卫·李嘉图用以充实了经济学的那一方法论而产生的概念的研究和制定。例如，"一定的市场"的概念和现象以及那一个科学的发现，即一定的起决定作用的和经常起作用的力量历史地出现了，而且它们在以某种"自动性"

①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9页。——译者

起着作用，这种"自动性"能够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和具有一定信心地"预测到"符合这些被科学地查明和理解以后的力量的个人创举的结果。说"一定的市场"这就等于说"一定基础的生产机构中社会力量的一定的关系"，即得到一定政治的、道德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保证的（指被永存下来而言）关系。在学者查明这些起决定作用的和经常起作用的力量和它们的自发的自动性（也就是它们的摆脱个人的任意和摆脱政府的任意干涉的相对的独立性）以后，他就以假定的方式把这种自动性本身绝对化起来，把纯粹的经济事实同它们在实际上呈现的重要性或大或小的结合隔离开来，确定因果的关系，前提与结论的关系，从而得出一个一定的经济形态的抽象的公式（在这个现实的和具体的科学体系上面，后来堆积了一个新的、更为概括的"人本身"、一般的人、"历史以外的人"的抽象——作为"真正的"经济科学而出现的抽象）。

这就是产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条件。因此，在谈到新的"经济科学"或经济问题的新的提法（二者并无区别）以前，必须证明已经发现了力量的新的配置，新的条件，新的前提，换句话说，已经"确定了"新的市场连同它本身的新的"自动性"和自己的具有特点的表现，这些表现好象是可以与自然现象的自动性相比的一种"客观的"东西。《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怀抱中产生的，然而直到今天还不可能有新的科学或科学问题的新的提法。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一定的市场"和它的"自动性"的历史性概念出发，可是"纯粹的"经济学家却把这些因素当做"从来就有的"和"自然的"；批判是在现实地分析着决定市场的力量对比关系，揭露它们之间的矛盾的深度，估计与新的因素之出现和加强相联系的可能的变化，并且表明被批判的这门科学的"脆弱性"和"可代替性"；它把这门科学做为活生生的同时又做为已经死去的科学来加以研究，它在这门科学里面找到那些必不可免地要造成它的

解体和被克服的因素，从而举出一个仅仅在它能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本身的生命力那一天以前才是预想的“继承者”来。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任意的”因素不问它是来自单独的个人、康采恩还是国家，都具备前所没有的意义，并且深刻地破坏了传统的自动性；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证实新的科学问题的提法正确，正是因为这种侵入是“任意的”，程度大小不一的，不可预测的。能够证实提法的是这种说法：经济生活改变了，它孕育着“危机”（而这一点是大家所理解的）。另一方面，任何地方也没有说过，旧的“自动性”消灭了：它表现在对重大的经济现象的关系上，但只是在比以前更大的规模上，而个别的事实则的确成为“不正常”了。

在确定“规律性”、“规律”、“自动性”的概念运用到历史事实上面去时，也应该从这些看法出发。问题并不在于发现“决定论的”形而上学的规律并且甚至不在于确定“万能的”因果律。问题在于查明怎样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以一定的规律性和自动性起着作用的相对“固定的”力量。甚至大数法，无论它对于比较多么有用处，也不能用来做为历史事实的“规律”。为了确定实践哲学的这个因素的历史来源（这个因素不是别的，乃是实践哲学对“内在性”的特殊理解），必须研究大卫·李嘉图怎样提出经济规律。问题在于理解李嘉图对于实践哲学的形成具有意义的，不仅由于他在〔政治〕经济学中发现了“价值”概念，而且也由于“在哲学上”他提示了理解和感受生活与历史的方法。我想应该把“假定……”的方法，也就是导致一定的结果的前提的方法，确定为实践哲学创始人的哲学经验的出发点（智力刺激物）之一。应该查考一下，过去有没有从这个观点研究过李嘉图①。

---

① 也完全应该阐明“偶然的”和“合乎规律的”哲学的概念，导致先验的目的论，甚至导致超验的目的论的“合理性”或“神意”的概念，以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提出的“让世界去碰机会”的“偶然的”概念。

原来历史的“必然性”的概念是同“规律性”和“合理性”的概念密切相联系的。“必然性”既可以在“抽象-思辨的”意义上去理解，也可以在“历史-具体的”意义上去理解。当存在着实在的和积极的前提，这种前提已经为人们所意识到而成为有效力的，在集体的意识面前提出具体的目的，并创造出一套具有“人民的成见”的力量的信念和思想的时候，才存在有必然性。在前提里面应该包括有已经发展起来的或正在发展中的为实现集体意志的动机所必需的和足够的物质条件；但是很明显，从这个物质的而在数量上又可以计算的“前提”中不能脱离掉一定的文化水平，换句话说，不能脱离掉智力行为的某种总和，而从这些智力行为中又不能脱离掉（做为它们的产物和结果）有支配力量的热情和情感的一定的总和，因为这些热情和情感是能够“不惜任何代价”迫使人们行动的。

只有遵循已经讲过的途径才可以历史地（而不是抽象-思辨地）理解历史中的“合理性”（从而是“非合理性”）。

关于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特别是柯罗齐所（思辨地）使用的那种意义上的“神意”和“机会”（“fortuna”）的概念，必须看一看柯罗齐论乔·巴·维科一书，在这本书里把“神意”的概念译成思辨哲学的语言；这本书是对维科哲学做唯心主义的解释的开端。关于“机会”在马基亚维利的著作中具有何种意义，应该看一看路易吉·卢骚①的著作②。根据卢骚的说法，马基亚维利著作中的“机会”具有双重意义：客观的和主观的。“机会”是不是事物的自然力量（也就是因果联系），各种情况的有利的凑合，维科称之为神意的那种东西，还是旧的中世纪的学说曾经大谈特谈的那种彼岸的力

① 卢骚·路易吉（〔Russo, Luigi——译者〕1892年）——意大利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文艺学家。——俄文版编者

② 参阅《君主论》原文第 23 页附注（“Principe” 〔Firenze, F.Le Monnier——意文版编者〕）。

量，也就是上帝呢？在马基亚维利看来，这不外是个人的美德，它的力量根源于人的本身的意志。据卢骚说，马基亚维利所指的美德，已经不是具有道德性质并且借助于上天之力的经院哲学家所认为的美德，甚至也不是李维所认为的美德，因为后者在大多数场合下把这个词理解为军人的英勇——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美德，这是由才干、本领、敏捷、人力、敏感、对情况的嗅觉和本身潜力程度感所形成的美德。

卢骚在自己的进一步的分析里就开始动摇了。在他看来，做为事物的力量的"机会"的概念这个在马基亚维利那里也象在人道主义者那里一样的概念，还保持有自然主义的和机械的性质，只有在维科和黑格尔的合理的神意里才得到自己的历史的体现和深化。但这并不妨碍提醒：在马基亚维利那里这类概念并没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如象在真正的人道主义哲学家那里那样，而只表现出朴素的和深刻的世界感（既然这样，那么从而也就表现出哲学来！）；只可以做为他的感觉的象征来理解和说明它们①。

实践哲学的百科全书

把在讨论实践哲学时围绕它所提出的一切问题，编成一部附有广泛批评书目的批评汇集，是非常有用的。编成类似专门化的具有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的资料，是十分广泛的，各种各样的，价值不同的，各种语言的，因此必须有一个专门的编辑委员会才能加工

---

① 关于在马基亚维利以前时期这些形而上学概念的缓慢形成问题，卢骚引证了秦梯尔的《乔尔丹诺·布鲁诺和文艺复兴的思想》一书（《文化复兴时期人的观念》一章和附录）佛罗伦萨，出版者瓦列基（Gentile, Giordano Bruno e il pensiero del Rinascimento (cap.«Il concetto dell'uomo nel Rinascimento» e l'«Appendice»), Firenze, Vallecchi）。

关于马基亚维利这些概念，又参阅费·艾尔柯莱的《马基亚维利的政治学》。

整理，即使这样也远不是很快就可以完成的。但是这项编纂工作所能给尔后科学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学校教育和自修)带来的益处是会很巨大的。它会成为扩大实践哲学研究范围的最重要的工具，它会成为加强这项研究工作的科学基础的工具；它会确定两个时代之间的：现代与在它以前的工作肤浅幼稚，鹦鹉学舌和浅尝辄止的时代之间的明确的分界线。

为了使这项计划更为明确，应该研究各国天主教徒为了维护一般的宗教以圣经、福音、忏悔录〔神甫的著作〕、教规、仪礼为题所公布的同一类型的全部资料——这是专门化的大百科全书，价值各有不同，但却经常发表并用以维系着构成天主教会骨架和力量的数十万神甫和其他的领导者的思想的一致。(关于德国实践哲学书目问题，应该看一看艾恩思特·德兰所编的资料，由德兰本人引证于«Reklam Universal Bibliothek»第6068—6069期的导言里。)

对于实践哲学也必须做伯恩海姆为历史的方法所做过的那项工作①。伯恩海姆的这部书，虽然不是论述历史主义哲学的，但毕竟和它有内在的联系。所谓实践哲学社会学“对这种哲学也应该占有伯恩海姆那部书对一般历史主义所占有的同样的地位，也就是应该系统地叙述研究和解释历史以及政治的实际规则；它应该成为具体的标准，批判的保留意见等等的汇集，一种特殊的从实践哲学立场写成的历史和政治的文献学。在某些方面为了反对实践哲学某些倾向(恰好是最庸俗的因此也是最流行的)，须要采取现代历史主义对旧的批评方法和旧的文献学所提出过的那种批评

① E. Bernheim,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6te, Ausgabe, 1908, Leipzig, Dunker und Humblot (艾·伯恩海姆：《历史方法教科书》，第6版，1908，莱比锡，顿克与洪堡特书店出版。此书译成意文，由巴勒摩的撒德朗书店出版〔节译本〕)。——意文版编者

(或那类的批评)。这种旧的方法和旧的文献学造成了幼稚的教条主义，用肤浅的描述和列举未经研究整理的往往是毫无顺序地堆积在一起的资料，来代替历史的解释和系统化。这些论文的不可克服的力量在于当时形成起来的并得到流行的教条主义的神秘主义的一定的变形上；它的基础是一种论断(哪怕它还没有得到任何证实)，即作者是历史方法的贯彻者和科学的捍卫者①。

① 关于这些意见参阅《杂志类型》和《批评字典》一节〔这些札记将发表在葛兰西全集其他几卷里——意文版编者〕。

第二部分　革命问题

现　代　君　主

关于马基亚维利的政治学的札记

《君主论》的基本特点在于它并不是系统化了的论文，而是一部“活”书，在它里面，政治思想体系和政治学在“神话”的戏剧形式中结合起来了。

它和空想以及烦琐哲学的论文不同，也就是和一直到马基亚维利以前的采取的政治学的那些形式不同，这种叙述性质使他的论点具有幻想的和艺术的形式。于是理论的和唯理性论的原理就体现在形象地和“拟人”地表示“集体意志”的象征的统帅形象之中。

追求一定政治目的的、一定集体意志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以对于行动方式的原则和标准加以研究和予以仔细分类的形式来描述的，而是通过具体个人的一定品质、特征、职责和需求来描述的，也就是使得任何一个需要说明的人去运用艺术幻想，并且赋予政治热情以一种更为具体的形式①。

我们完全可以把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拿来做为索勒尔的“神话”的一个明显的历史实例而加以研究，也就是做为一个政治思想体系的实例而加以研究，这种政治思想体系并不是一种冷冰冰的空想，也并不是一种空论，而是一种对于分散的人民起作用的、使他们产生并组织集体意志的具体的幻想的产物。《君主论》的空想性质在于这个君主并不存在于历史现实之中，并没有做为一个直接的客观实在而出现在意大利人民的面前，而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的抽象，一个领袖、一个理想统帅的象征；但是它那贯穿全书的神话成分和热情与它那种在叙述上非常强烈的戏剧性结合到一起，并且在这书的最后一章，在那向“实行存在的”大公呼吁中成为生气勃勃的东西。

马基亚维利在全书中所探讨的是君主应当怎样领导人民建立新的国家；这部书在叙述上具有逻辑谨严性和科学的独立性，临到结尾，马基亚维利自己成了人民，同人民结合在一起，但不是同“一般的”人民，而是同马基亚维利用自己在前面的叙述予以说明了的人民；这种人民的意识在马基亚维利身上得到表现，他理解到他自己的这项作用，他感觉到自己与人民的同一性。看来，整个“逻辑上的”结构无非是人民本身的反映，在人民的意识中所进行的自己同自己的坦率的谈话，而以情不自禁的热情的呼号告终。由于思索自己而产生的热情又成了“激动”、狂热、对活动的异常渴望。正因为这一点，《君主论》的结论就不是什么表面的、从外面“硬加上

① 应该找一找看，那些在马基亚维利以前写作关于政治学的人之中有没有一部著作在形式上类似于《君主论》的。甚至《君主论》的结尾也同它的“神话”性相关联，因为马基亚维利在描述理想的统帅之后，在一节从艺术力量来看很精彩的文字中向实在的统帅呼吁，希望这位统帅能在历史现实中体现出他所描述的那种理想。这种热情的呼吁贯穿在全书里面，因而恰好使这部书具有了戏剧性。路·卢骚在其《马基亚维利论》的序言中称马基亚维利为政治学上的艺术家，而且在一处也用过“神话”字样，但是这个字样与上述意义并不确切吻合。

去的"、用以修饰文章的东西；必须把它看做是这部作品的必要元素，甚至必须把它看做是阐明全部作品并赋予它一种"政治宣言"形式的元素。

可以从科学上表明的是：以神话思想体系的观点为出发的索勒尔还没有理解到政党，而只能停留在工会的观点上。当然，对索勒尔来说，"神话"并非在工会这种集体的意志的组织中得到自己最高的表现，而是在工会的实践活动中和已经形成的积极的集体意志中得到自己最高的表现——这种实践行动的最充分的实现应该是总罢工，也就是所谓"消极活动"，这种活动具有消极的和预备的性质（只有在联合意志的协调下，这种活动才能取得积极的性质），而且根本不具有"主动的"和建设性的阶段。因而，在索勒尔的学说中有两种要求碰到一起：神话的必要性和批判神话的必要性，因为"任何一种预先制定了的计划都具有空想性和反动性"。彻底解决被委诸作理性的、"任意的"冲动（即柏格森所称的"生命的冲动"），也就是"自发性的"冲动。①

然而神话能不能是"非建设性的"，可不可以依照索勒尔直观推测方法去设想：那种用区分方法（"分裂"方法）（即使这种区分或分裂借助于强制手段而实现的）使集体意志停留在它的最初形成的原始阶段和基础阶段的，也就是破坏现存道德的和法律的关系的手段会产生某些效果吗？而处于基本形式中的这种集体意

① 这里应该指出柯罗齐对于历史和反历史的问题的提法同他对于其他问题的观点——他对于"政党"的敌视和他关于社会事件"预见"问题的提法（参见《批评谈话》第一集，150—152页，对刘陀维科·里孟坦尼《社会事件的预见》一书的评论，都灵，波卡书店出版，1907）——之间的潜在矛盾。如果社会事件不能预见，而预见理论本身只是一种空谈，那么非理性的东西不能不占优势，而人的任何组织都会是反历史的，都会是一种"成见"，于是只有一条路可走：随时根据临时抱佛脚的准则来解决由历史发展过程所提出的个别的实际问题（参见《文化和精神生活》上柯罗齐的论文《党是明智也是偏见》）并承认机会主义为唯一可能的政治路线。

志，——会不会立即停止自己的存在，分散成为无尽的在实证阶段上沿着各种不同的和矛盾的方向运动的单独的意志呢？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谈到，那就是没有隐蔽的建设和肯定，不能有破坏和否定——并且不是“形而上学的”意义的，而是在实践上，就是在政治上，体现于党的纲领上。在这种场合下，在自发性后面预先假定有纯粹的机械论，在自由（生活的意志——激情）后面预先假定有决定论的极端，在唯心主义后面预见假定有绝对的唯物主义。

现代君主，神话君主，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个人，具体的个体；他只能是被承认了的并且在行动中部分确定下来的集体意志已经开始表现自己的那个社会中的有机体，复杂的要素。这个已经由于历史发展产生了的有机体，就是政党。这是第一个细胞，其中集中了力图成为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集体意志的一些萌芽。在现代世界中，只有具备必须采取迅速的、闪电式的步骤特征的直接而必不可免的历史政治行动，才能神话般地体现在具体的个体之中；只有由于巨大的和直接的危险，迅速行动才成为必需的，而这种危险恰好就导致热情和狂信的闪电式的白热化，从而消灭那种能够破坏统帅“神明”性的批评感和辛辣的讽刺（这种情况正好发生于布郎热的冒险行动中）。但是这种直接行动，按它的性质来说，不可能是长期的，不可能具有有机的性质；这种行动几乎经常都是复辟和改组的型式，而不是建立新的国家和新的民族与社会体系过程所固有的那种型式（这一点正是马基亚维利《君主论》的主题，在那里，复辟的方面只不过是一种修辞的要素，这种要素是同在文献上确立的那种认为意大利源于古罗马因而其使命是恢复古罗马的制度和它的威力[①]的观点有联系的）；从其性质来看，这种行动将不

---

① 除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强大专制君主的这种范例以外，马基亚维利引用了一些对古罗马的回忆来说明坚持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国家的必要性的政治主张。但是，须要强调指出的是，不能根据这一点就把马基亚维利的主张同文学—修辞传统混同起来。

是建设的，创造的，而是"防御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设想的是：已经存在的集体意志处于削弱的和分散的状态，陷于一种危险的、危急的、但不是毁灭性的，更不是彻底的衰落，因而必须把它重新加以集中和加强，但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而只能是ex novo(重新)、创造性地建立集体意志，并把它导向具体的、积极的和合理的目的。但是这种目的的积极性和合理性还没有在会成为尽人皆知的有效的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得到证实和检验。

索勒尔的"神话"观的"抽象"性表现在对雅各宾党人的敌视中(这种敌视强烈地表现在道德上的憎恶中)，而雅各宾党人无疑义地是马基亚维利的君主的"十足体现"。现代的《君主论》应当包括专门探讨雅各宾主义一章(指这一概念在历史中所取得的完全的意义而言，而根据它自己的思想内容来说也是应该具有这种意义的)，雅各宾主义是一个实例，可以说明集体意志是怎样具体形成和行动的，这种集体意志最低限度在某些方面是ex novo独创性地创造出来的。而且必须使集体意志以及一般地政治意志在现代意义中规定为——对于历史的必然性的积极的认识，规定为——实在的、效果良好的历史剧中的主角。

在最初的几节里，应该有一节专门探讨"集体意志"，提出下列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说，已经存在着使人民的、民族的集体意志产生和发展成为可能的条件?"因而必须对于这个国度的社会结构做历史的(和经济的)分析，并且"戏剧性地"来描述多少世纪以来为

首先因为这种要素不是独一无二的或甚至不是主导的，而必须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的结论也并不是从它得出来的，其次是因为参照古罗马本身，并不象所想象的那样抽象，道理是这种参照正好来自人道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气氛。在该书第七篇——《论军事艺术》一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这块国土(意大利)好象是为了复活所有死亡了的一切而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在诗歌、绘画和雕刻的实例中可以看得出来；因此，它是不是也会恢复军事方面的英勇传统呢?"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应该把其他这类的意见也汇集在一起，以便确定它们的真实性质。

了唤起这种意志而采取的那些企图以及决定了这些企图相继失败的原因。为什么在马基亚维利时代，意大利没有建成君主专制？分析必须从罗马帝国的崩溃开始（联系语言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问题），说明中世纪城市公社的职能、天主教的意义等等；总而言之，必须把全部意大利历史加以概述，——这种概述是综合性的，但必须是确切的。

建立人民的，民族的集体意志的这些相继交替的企图之所以失败，必须在由于城市公社资产阶级解体而产生的某些社会集团的存在中寻求它的原因，必须在反映意大利做为教皇宫廷所在地和神圣罗马帝国传统的保存者等等而担负的国际职能的其他社会集团的特殊性质中去寻求它的原因。这种职能和受此职能制约的地位就决定了国内的局面，这个局面可以称为“经济团体的”局面，也就是在政治方面它是封建社会一切形式中最坏的形式，最少进步的和最为停滞的形式，因为在这种形式之下，有效的雅各宾力量始终缺少并且也不能巩固起来，而这股力量恰好就是在其他国家中能激起并且组织人民的、民族的集体意志，和导致建立现代国家的。归根到底，有没有形成这种意志的条件呢？也就是说，现在这些条件和与它们相敌对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怎样呢？传统的敌对力量是土地贵族，而比较广义的讲，是整个土地所有权以及这种所有权所固有的意大利特点，即特殊的“农村资产阶级”——由于城市公社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解体而遗留给近代的寄生者（“百市”，“沉默的都市”①）。

应该把那些在工业生产方面相应发展并且在历史-政治发展上达到一定水平的城市社会集团的存在，视为积极条件。如果

① “百市”，“沉默的都市”——“百市之国”是中世纪意大利的名称之一。邓南遮把那些在古代和中世纪曾兴盛一时，随后衰落，失掉过去意义的意大利城市称为“沉默的都市”。——俄文版编者

广大农民群众不同时加入到政治生活里面去，人民的、民族的集体意志的任何形成仍然是不可能的。马基亚维利认为通过建立民兵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一点，而雅各宾党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恰好实现了这一点；这样来理解事件，也就可以看出走在时代前面的马基亚维利的雅各宾主义，而这也就是他的民族革命观的源泉（或多或少是有成效的）。从1815年起，全部历史都证明传统阶级千方百计在预防这种集体意志的形成，在以保持消极均衡为特点的国际体系中维护着“经济一团体”的权势。

在现代君主中应该重视精神和道德的改革问题，也就是宗教问题或世界观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也发现在传统上缺少雅各宾主义和对于这个主义的恐惧（在哲学方面这种恐惧的最后表现，是柯罗齐对宗教所采取的马尔萨斯主义态度）。现代君主应该是而且也不能不是精神和道德的改革的宣扬者和组织者，这就意味着为达到现代文明最高和无所不包的形式的人民的、民族的集体意志的往后发展，奠立基础。

这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形成人民-民族的集体意志，而这种意志的组织者和积极、认真的表现者就是现代君主，一个是精神和道德的改革，——应该构成全书的骨架。必须把具体的、各项纲领性的条目放在第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们应该“戏剧性地”表达出来，应该来自生动的谈话，而不应该成为冷冰冰的、学究式的一些议论的汇集。

但是这项文化改革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被压迫阶层的公民的提高，如果不先在经济上进行改革，如果不先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在经济世界中的位置，是不是可能呢？精神和道德的改革不可能不同经济改革的纲领相联系，不仅如此，正是这种纲领才是实行任何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具体方法。

现代君主在自己的发展中，将抛弃精神和道德关系的整个体

系，因为这种发展恰好在于：任何行动，是否有益或有害，是否有价值或犯罪，完全决定于这种行动的出发点是否是现代君主本身，完全决定于这种行动是为了加强它的权力还是为了反抗它的权力。在人们的意识中，君主占有上帝的地位或无上命令的地位，将成为为了建立现代世俗文化和彻底赋予整个生活、一切习惯和风俗以世俗性质而采取的行动的基础。

政治是一门科学

实践哲学所贡献给政治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基本的新东西，归结起来是证明不存在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与此相反的观点的来源，当然是宗教的思维和超验的观念），并肯定人性是历史上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用文献学和批评的方法证实的历史事实。因此，必须把政治这门科学的具体内容（以及逻辑表现）看成是处于发展中的有机体。但是须要指出，马基亚维利对于政治的问题做过阐释（就是包含在他的著作里面的那种论断，即政治是一种具有自己的原则和规律的独立的活动部门，这种原则和规律不同于道德和宗教的原则和规律，——这个论断具有巨大的哲学意义，因为它在隐蔽的形式中恢复了道德和宗教的观点，也就是恢复了整个世界观），——这种阐释依然是辩论的对象，甚至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还没有成为"公认的真理"。这一事实表明了什么？这是不是仅只表明在马基亚维利观点中其因素尚处于in nuce① 的精神和道德革命还没有实现，还没有成为民族文化的公开的和公认的形式呢？或者这一事实仅只具有迫切的政治意义，也就是可以使人们揭露存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

① 萌芽状况中（拉丁文）。——译者

的破裂，指明存在有两种文化——统治者的文化和被统治者的文化——并指明领导阶级和教会一样，对于普通人民抱有特殊的态度，其所以抱有特殊的态度是：由于一方面必须不与他们脱离，而另一方面必须在他们中间保持一种信念，认为马基亚维利不外是恶魔的教唆？

这样一来，就产生一个关于马基亚维利对于自己时代所具有的意义的问题，和一个关于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君主论》中所抱的目的的问题。在马基亚维利的时代，他的学说并不是纯粹"书本上"的学说，并不是与世隔离的思想家的专利品，并不是仅仅在知音者中间传布的天书。马基亚维利的风格，不是中世纪所盛行的或人道主义作家所习用的系统化论文写作者的风格；正好相反，这是一种行动的人的风格，这是一个致力于唤起行动的人的风格，这是党的"宣言"的风格。福斯科罗① 所做的"道德说教的"解释，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毫无疑义，马基亚维利也揭露了一些问题，而并不是仅仅从事于理论工作。可是这些揭露的目的何在呢？是道德上的呢，还是政治上的呢？通常都是这样讲：马基亚维利所提出的政治活动准则"被运用着，却没有被宣扬着"；伟大的政治家都是以咒骂马基亚维利起家，正是为了有可能"神圣地"运用这些准则，而宣称自己是反马基亚维利主义者。马基亚维利自己是否是一个不成器的马基亚维利主义者，是否是那些"懂得演奏"但教起来却马马虎虎的人之一，而被庸俗地理解了的马基亚维利主义却教人采取相反的行动呢？柯罗齐断言：马基亚维利主义做为一门科学在同样程度上既为反动派服务，也为民主主义者服务，好象剑术一样，同样既为贵族服务，也为强盗服务，用来自卫和杀人，正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福斯科罗的评价，——这种断言是十分

---

① 福斯科罗（Фосколо Уго 1778—1827）——意大利作家及诗人。——译者

抽象的。马基亚维利自己讲过，他所写的东西被运用着，而且一直被伟大的历史人物运用着；因此，我们看不出马基亚维利想要教导已经懂事的人，要知道他的风格，并不是一种不偏不倚的科学工作的风格，不可能设想，马基亚维利通过哲学构思得出自己的政治科学的基本原理，这在这个专门科学中对于他那个时代会被看成为似乎一种奇迹的东西，尽管到今天这一切惹起了这么许多的异议和争论。

因而可以设想，马基亚维利著书立说的对象是“不懂事的人”，他是想完成在政治上训练“不懂事的人”的任务——并不象福斯科罗所解释的那样，消极地从政治上训练痛恨暴君的人，而是积极地训练那一定承认某些必要手段（哪怕这些手段是暴君们所固有的）可以允许使用的人，因为他抱有一定的目的。凡是在统治者传统环境里生长的人，几乎自动地具有现实政治家的品质，这是由于他在朝代利益或家族利益占优势的围绕着他的家庭环境中受到了整个那样一套教育。这样，到底谁是“不懂事的人”呢？当时的革命阶级，“人民”，意大利“民族”，从自己的人们中产生出萨服那洛拉和别洛·索得里尼而不是卡斯特鲁卓和瓦连廷诺的城市民主派①。可以这样认为：马基亚维利力图说服这些力量，使他们认识

① 萨服那洛拉，吉洛拉莫（1452—1498）意大利的传教师，佛罗伦萨的宗教政治改革者。他揭穿了教皇和天主教会，对于起义反抗美第奇家族暴君统治并恢复了共和国的人民群众起了重大的影响。

索得里尼，别洛（1452—1522）——中世纪意大利国务活动家，治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首脑（“公正首长”）。他实行了一系列符合佛罗伦萨广大居民群众利益的改革。

卡斯特拉坎尼·卡斯特鲁卓（1281—1328）——意大利国务活动家和军事统帅。对佛罗伦萨共和国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企图建立强有力的君主国家。

瓦连廷诺（柴札列·鲍札）（1476—150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家。他力图在中部意大利建立强大的君主国家。1498法国王路易十二世赐以瓦连廷诺公爵的称号。瓦连廷诺由此得名（瓦连廷诺公爵）。意大利历史家往往在著作中以瓦连廷诺代替其原名柴札列·鲍札。——俄文版编者

到必须有一位能够知道他所需要的并且知道怎样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的"领袖"，并且热情地拥护这位领袖，哪怕这位领袖的行动与当时流行的思想——宗教相抵触（或者似乎抵触）。马基亚维利的这种政治态度又在实践哲学场合下重复了。又产生了做"反马基亚维利主义者"的必要性，从而发展政治理论和技术，以便为斗争的双方服务，尽管人们认为归根到底主要将为"不懂事的"那一方服务，因为人们认为在这一方中包含着历史的进步力量。在实际上，可以迅速达成一个明确的结果——打破建立在传统思想体系基础上的统一，而这种传统思想体系不跨台，新的力量就不能认识到自己独立的个性。马基亚维利主义不但使得占统治地位的保守集团的传统政治技术趋于完善，而且也使得由实践哲学所产生的政治趋于完善。这一点不应该淹没它所具有的实质上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甚至在今天也是感觉到的，这就说明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基亚维利主义的表现——从耶稣会教徒的反马基亚维利主义到帕斯库阿列·威拉里①的伪善的反马基亚维利主义。

政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研究马基亚维利，首先必须提出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政治是一门独立科学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政治学在系统化了的（完整的和一贯的）世界观中，在实践哲学中所占有的或应该占有的位置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来，柯罗齐在其关于马基亚维利和政治学的著作中所达到的实际成就主要在于（柯罗齐在其他方面的批评活动中也是这样）揭穿了许多虚假的、附会的或提法不对的问题。柯

① 帕斯库阿列·威拉里（1826—1917）——意大利资产阶级历史家和政治活动家。有关于马基亚维利和萨服那洛拉的名作的作者。——俄文版编者

罗齐是从自己的区别精神发展中各个阶段的那个原则出发，是从承认实践阶段、实践精神阶段出发，这种实践精神是自主的和独立的，尽管它通过区别的辩证法同整个实际具有循环的联系。在实践哲学中，区别的原则也要被运用，当然并非运用于绝对精神的各个阶段，而运用于上层建筑的各个阶段。因此问题是树立辩证的立场以进行做为上层建筑一定阶段的政治活动（和与这种活动相适应的科学）。在接近解决问题之际，我们可以预先指出的是：这种政治活动正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上层建筑仍处于纯粹的、任意的确定——初步的和模糊的确定——直接状态。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把政治和历史，从而把存在和政治等同起来呢？因此又怎样可以把上层建筑的全部体系看成政治的区别体系，从而又怎样可以证明把区别的论点运用到实践哲学上是正确的呢？可不可以讲到区别的辩证法的问题，并且怎样可以理解上层建筑各个阶段之间的循环论点呢？应该把"历史的联合"这一论点，也就是自然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统一、矛盾与区别的统一这一论点同这个问题联系起来。

对于经济基础可不可以也使用区别的标准呢？应该怎样理解经济基础，在社会关系的体系中怎样方可以区别那些被历史地理解的，而不是被"形而上学地"理解的象"技术"，"劳动"，"阶级"等等的要素呢？由此就产生一个关于批评柯罗齐的立场的问题，因为他为了辩论的目的而断言经济基础成为一种"隐蔽之神"，是一种"本体"，以与上层建筑的"外部表现"相对立。关于"外部表现"的问题是在隐喻的和实证的意义上来考察的。为什么可以"历史地"并且视为表现方式地来谈"外部表现"呢？值得指出的是柯罗齐怎样从这个一般论点出发而发展了自己的关于错误和错误的实践根源的特殊理论。柯罗齐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直接的"热情"，也就是具有个人或集团的性质。但是具有更为广泛的历史意义的

"热情"，做为"范畴"的"热情"，从何而产生呢？成为"错误"根源的直接的"热情—兴趣"是在《费尔巴哈论纲》里面称为"Schmutrig-jüdisch"① 兴趣的东西。但是，正如"Schmutrig-jüdisch"热情—兴趣导致直接的错误一样，更广大的社会集团所固有的热情也要招致哲学的"错误"（介乎这两种错误之间的中间错误，是思想意识错误，柯罗齐对它单独作探讨）。"在利己主义（直接的错误）——思想意识——哲学"这一序列中，重要的是"错误"的一般概念。这个概念同热情的各种不同阶段所相联系，并且不能在道德化的或空论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应该在纯粹"历史的"和辩证法的意义上去理解——即在"历史上过时并且该当灭亡"的意义上，在任何哲学"未臻完善"的意义上，在"生—死"，"存在—不存在"的意义上，也就是在应该于发展中予以克服的辩证极限的意义上去理解。

"在外部表现出来的"，"外部表现"的概念所表明的恰好就是这个，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概念，而且必须坚持这个概念以反对教条主义，因为它在肯定一个事实：在确认任何一个体系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同时，肯定任何一个思想体系都要灭亡。（"在思想方面人会趋向于对社会关系的认识"——这样讲，是不是表明确认"外部现象"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呢?!）

柯罗齐所提出的政治—热情的论点是排斥党的，因为不可能设想有组织好的和不断存在的"热情"：不断激起热情是造成机能亢进和痉挛状态的条件，这种状态会造成不能行动。这个论点排斥党并且排斥具体的预先规定的行动的一切"计划"。然而，党是存在着的，而行动计划是在制定着、运用着并且往往是几乎全部被实现着——因此，在柯罗齐的论点中存在着缺陷"。

不应说，党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很大的"理论"意义，这

---

① "卑污的犹太人"。——译者

只是因为在行动期间出现的“党”并非恰好就是原先存在着的“党”，这部分地可能是对的，但是，在两种“党”之间存在着某些相符之点，以至在实际上可以说他们是同样的一个有机体。

但是理论仅只在也可以把它应用于“战争”的场合下，从而在可以借助它来说明常备军、军事科学院、军官团的存在的道理的场合下才有力量。要知道，在实践中，战争也是一种“热情”，最强烈的和最急剧的热情，是政治生活的因素，是一定政治在另外一种形式中的继续。因此，应该善于说明，“热情”怎样可以成为道德上的“义务”——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伦理的意义上。

谈到与党这种固定组织的存在相联系的政治计划，就应该回忆一下毛奇的说法。他说在制定军事计划时，只能预先规定好一个概略，一个一般的计划，而不能规定细节，因为细节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要以敌人的移动为转移。而热情恰好表现在细节之中，但这并不等于说毛奇的原则应该证明柯罗齐的理论正确。无论如何，还应该说明清醒而“冷静地”制定计划的总参谋部的“热情”属于哪一类热情。

柯罗齐把热情视为政治因素这一论点难于说明和证实永久性政治组织，党以及在更大程度上，国家军队和总参谋部，就是这样的政治组织，因为不能设想，热情一旦成为永久性组织的形式，不会变为一种合理的因素，变为一种深思熟虑的见解，也就是停止其为热情。只有通过把政治和经济的等同，才能找到摆脱这种困难的出路。政治是一种经常的活动并正好在它和经济等同的限度内产生经常存在着的组织。但是，它也是和经济有区别的，因此可以分别地来谈经济和政治，并且可以谈直接刺激行动的“政治热情”。这种行动产生在经济生活的“有机的和固定的”基础上，超过政治热情，它发挥和表示一种情感和愿望，在这些情感和愿望达到顶峰时，人生的打算本身将服从一种有别于保证个人利益法则的法则

等等。

柯罗齐开始的现代"马基亚维利学"除了功绩以外，同时也必须指出它所造成的"夸大"和谬误。例如，夸大马基亚维利的意义已经成了风气，把他看成"一般的政治家"，看成对于各个时代都有意义的"政治学者"。

必须把马基亚维利看成主要是他那个时代的必然表现。这个表现是和他那个时代的条件和需要密切联系着的。确定这些条件和需要的首先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内部的斗争和没有能够摆脱市政公社残余、也就是没有能够摆脱成为封建障碍的那种形式的佛罗伦萨国家的特殊结构。其次是意大利各个国家之间为了在意大利境内建立平衡而进行的斗争，而阻碍建立这种平衡的是教皇和其他封建市政残余的存在，这些残余是当时具有城市国家形式的而非领土国家形式的国家所固有的。第三是或多或少彼此团结一致的意大利国家之间为了建立欧洲平衡而进行的斗争，也就是在意大利内部建立平衡的必要性与欧洲国家争取领导权的需要之间的矛盾。

获得强大的领土国家统一的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实例对马基亚维利发生了影响；用柯罗齐的话来说，马基亚维利作了一个"椭圆形的对比"，并且为建立一般的强大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国家制定了准则。马基亚维利从头到脚是一个自己时代的人。而且他的政治学体现了时代的哲学，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倾向于建立民族的君主专制政体——那种会给资产阶级生产力造成可能性和易于继续发展的政治形式。在马基亚维利身上可以找到处于萌芽状态的分权的思想和议会制度(代议制度)的思想。他的"愤慨"的对象是封建世界的残余，而并不反对进步阶级。君主应该结束对封建的无政府状态，而瓦连廷诺在罗曼尼依靠生产阶级，依靠商人和农民所做的正是这一点。

从国家元首权力的军事独裁性质出发（这种性质在为确立和巩固新政权而斗争的时期是必要的），包含在《论军事艺术》论文中的阶级性质的指示应该也看做同样适用于一般国家的结构，因为如果城市阶级想要结束内部混乱状态和外部无政府状态，他们就应该依靠农民群众，建立一种绝对不同于雇佣军队的、可靠而忠实的武装力量。可以说，马基亚维利的按其实质来说是政治的主张占了主导地位，以致使他犯了军事性质的一些错误。他所考虑的主要是步兵，因为步兵群众可以通过政治活动来募集，因此他不承认炮兵的意义。

路·卢骚（在其《马基亚维利论序言》中）讲得对，他说《论军事艺术》一文是补充《君主论》的。但是他没有根据自己的观察做出一切必要的结论。也应该把马基亚维利的《论军事艺术》看成是一个必须研究军事艺术的政治家的著作。他的片面性（还有其他一些"奇谈"象方阵理论之类，给那些象班德罗①所搬弄的最流行的廉价的俏皮话提供借口）之产生是因为马基亚维利的思想和兴趣并没有集中在军事技术问题上。他只是在对于他的政治体系必需的限度内，才去探讨这一问题。毫无疑义，不仅需要把《论军事艺术》一文同《君主论》联系起来，也需要把《佛罗伦萨史》同《君主论》联系起来。并且也必须把这篇历史看做包含有对意大利和欧洲现实的具体条件的分析，而这些条件是确定《君主论》里所谈到的那些首要任务的。

具有很大历史主义精神的对所谓"反马基亚维利主义者"或至少对其中最"坦率的"人物的估价，是做为一种派生的东西从与自己的时代最有联系的马基亚维利的论点出发的。在实质上，问题不在反马基亚维利主义者，而在那些表达了自己时代的有别于影

① 班德罗·马蒂奥（1480—156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俄文版编者

响过马基亚维利的那些需要或条件的政治家。辩论的形式是纯粹写作方面的偶然的现象。据我看，这些“反马基亚维利主义者”之中的典型人物是让·菩丹(1530—1596)。1576年他是三级会议中的布鲁阿代表，由于他的努力，第三等级拒绝了提供内战所需的补助费①。

在法兰西内战期间，菩丹以称为“政治家”的党的代表的身分出现。这个党从民族利益出发，也就是从国内阶级平衡的利益出发，因为在这种平衡状态中领导权属于第三等级，而第三等级是通过国王实现这种领导权的。

据我看，把菩丹列为“反马基亚维利主义者”这是做了一个极端肤浅的、十分轻率的结论。菩丹是在马基亚维利在世时期意大利所存在的关系远为发展和复杂的基础上在法国创建政治学的。

对菩丹来说，任务并不在于建立一个包括全部国土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因为这样等于回到路易十一世的时代)，而在于必须在这个国家——一个已经相当强大和巩固了的国家——内部，使彼此斗争着的社会力量达成平衡。他所关心的不是力量问题，而是协议问题。在菩丹身上体现了一种趋于发展专制君主制的倾向。因为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力量和自己身价的第三等级十分清楚地了解专制君主制的命运是和他本身的命运以及他本身的发展相联系着的，因此他对君主制度的支持是受一些条件的制约的，他提出自己的要求，尽力去限制专制制度。马基亚维利的学说在法国已经为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了，因为他的学说很可能被用来证明下

---

① 菩丹著«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历史简易研究法»)出版于1566年，里面说明了气候对国家形式的影响，指出了进步的思想等。«République»(«共和国»)出版于1576年，里面表明第三等级对专制君主制的观点和专制君主制与人民的关系。«Heptaplomeres»(“七人党”)认为现代才是光明的，他比较了所有的宗教，认为宗教作为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唯一明智的自然宗教，它们的存在是正当的，它们都是值得注意和宽容的。

面这一说法的正确，即世界似将永久处于“摇篮”之中（借用别尔特兰多·斯帕温塔① 的说法）。因此，在参加论战时，必须采取反马基亚维利主义的立场。

必须指出，意大利在马基亚维利时代没有象法国三级会议那样相当发展的和在国家生活中多少起较大作用的代议机关。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些人有一种成见，认为议会制度是由国外输入到意大利的，可是他们却忽略了在这个事实中只反映了意大利在十六——十七世纪中政治和社会条件的落后性和停滞性，而这种情况的造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势力压倒了麻痹了的和僵化了的国内力量。这样一来，在这个时期，意大利的国家结构由于外国人的占优势就成为半封建的了，成为外国宗主权的对象了。这是不是由于国外输入的议会形式而被消除了的民族发展的“独创性的”特点。而这种议会形式，相反地，却为民族解放并进而建立现代化的、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开辟了道路呢？

不过，意大利有过代议机关，特别是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可是，因为意大利这些地区的第三等级发展不大，它们的意义比起法国来十分有限。这就使得议会被贵族利用来做为一种手段，使无政府状态永世长存，并做为一种工具以反对君主国的改革企图，因而君主国由于资产阶级的不发展而被迫去依靠城市“流氓”。② 十分明白的是：为什么把城市和乡村联合起来的这项任务和倾向在马基亚维利的著作中只能从军事方面表达出来。这说明如果预先没有那种清楚地表明农民起着这样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作用的重农

---

① 斯帕温塔，别尔特兰多（1817—1883）意大利著名的黑格尔派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俄文版编者

② 应该再看一下1927年（也许是1925年？）安东尼奥·帕内拉发表于《狮像》的论述《反马基亚维利主义者》的著作，共有十一篇。必须研究一下，他怎样在同马基亚维利相比中评价葛丹和他怎样一般地提出反马基亚维利主义的问题。

主义者的理论出现，就不可能有法国的雅各宾主义。吉诺·阿里阿斯研究了马基亚维利的经济观点（刊于波科尼大学《经济年鉴》）。然而，应该考虑一下，一般地来说，马基亚维利有没有过经济理论。问题在于可不可以把马基亚维利的实质上是政治的语言译成具有经济概念的语言，并且可不可以把他的政治观化为一定的经济体系。必须思索一下，生活在重商主义时期的马基亚维利是否在政治方面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并且预先想到了后来在重农主义者那里得到表现的一些要求①。

政治要素

必须强调指出，最常见的是正好把政治所具有的基本要素、最普通的概念忘记了。另一方面，它们却被重复无数次，成为集体行动所必需的人物的政治支柱。

第一个要素在于确实存在着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以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政治的全部艺术和整个政治学都建立在这个原始的事实上，这是谁也规避不了的（在某些一般的条件下）。关于这一事实的起源问题，是一个要求个别研究的独立问题（至少是，可以而

---

① 是不是也可以设想让·雅克·卢梭而抛开重农主义者？我以为，如果认定重农主义者仅仅代表农业的利益，并且只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出现以后才表现了城市资本主义的利益，这是不对的。重农主义学说是同重商主义的决裂，也是同行会制度的决裂，而且是走向古典政治经济学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并且我以为，正因为这一点，重农主义者才做为某一种未来社会的代表而出现，这一社会比起他们所反对的那个社会来要复杂得多，甚至比起他们的学说中所直接描绘出来的那个社会也要复杂得多。他们的表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的时代，并且反映了城市与乡村的具体矛盾，但是在它里面包括有一种资本主义将来渗入农业的预见。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②的说法，也就是要求进行工业活动的自由和首创精神，当然与农业利益没有联系。

② 听之任之。——译者

且必须对这个问题加以研究，以便判明怎样才可以把这种现象的范围收缩到最小限度，甚至改变某些在这一方面表现出发生作用的相同条件而完全把它消除掉）。但事实毕竟是事实：存在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以及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从这一事实的存在出发，必须考察一下，怎样才可以实现最有效的领导（在目的一定的情况下），并且与此相联系的是——怎样可以最好地培养领导者（更确切些说，做为科学和艺术的政治其首要任务正好在这里）。另一方面，必须考察一下，怎样寻求抵抗力最少的道路，也就是寻求保证被领导者或被治理者服从的最合理的道路。

培养领导者的基本前提是：人们是否愿意始终存在着治理者和被治理者，还是努力造成一些使得存在这种划分的必要性消失的条件？换句话说，是不是从那种认为人类将永久被划分开的前提出发，还是认为这种划分只是与一定的条件相联系的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同时也必须认清，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划分，即使这种划分归根结底上升为社会集团的划分，甚至在同一个集团的范围内也是经常存在着的（假使从实际出发的话），尽管这个集团在社会关系上是清一色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讲：这种划分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是一种技术现象。那些在一切事物中只看到"技术的"一面，把一切都归结为"技术上的"必要性等等，以便不去考虑主要问题的人，会玩弄这些要素的相符。

由于甚至在同一个集团中也存在着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划分，就产生了建立一些定而不可移的原则的必要性，可是，恰好在这一基础上犯着最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表现出最要不得的无能，而且也最难于纠正。有的人认为既然讲明了集团本身的原则，这就是以自然而然地保证对这个集团的充分支持，因此就没有必要坚持这些原则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仅如此，有的人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甚至不去请求支持，甚至用不着规定前进的途径，

这种支持也会“来的”(有的人确信这一点，而且更糟糕的是根据这种“信念”去行动)。例如，很难消灭领导者所固有的那种“卡多那主义”，① 也就是认为工作之所以那样实行只是由于领导者以为这样实行是正确的和明智的那种信念。如果结果适得其反，就把“责任”推到那个“该当者……”的头上以及诸如此类的做法。同样也很难消灭那种犯罪的、轻视避免无谓牺牲的必要性的恶劣作风。事实上，大家都知道，集体(政治的)行动的失败大部分是由于不打算避免无谓的牺牲或者不重视别人的牺牲和以他人的生命作儿戏。每个人都从前线作战归来的军官口中听说过，在很必要的时候兵士们确实不惜牺牲，相反地，当兵士们看到他们的生命被轻视的时候，就起来反抗。例如，整个一连人能够忍饥耐饿好多天，因为他们看到在复杂的环境下粮食运不来，但是哪怕偶然一次由于不关心，官僚主义等等作风没有发粮食，他们就反抗起来。

这一原则适用于一切可能造成牺牲的行动。根据这一原则，在任何一次失败以后，首先必须找出对失败负责的领导者，这是指直接负责的领导而言。例如，一条战线由一些独立部队组成，每一个部队有自己的领导者。可能这条战线的某一个部队的领导者对失败所负的责任比起另一部队的领导者所负的责任要大一些。但是这决没有排除每个领导者的责任——问题只在责任的大小。

如果从存在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以及治理者和被治理者这一原则出发，那么，毫无疑义，到现在为止“党”是培养领导者和锻炼领导艺术的最便利的手段(“党”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名称下出现，甚至在反党的和“否认党”的招牌下出现。但是甚至所谓“独立者”(“个人主义者”)在实际上也是党的人物，不过他们想要借神的恩惠或者他们的追随者的愚蠢而成为“领袖”)。

---

① 卡多那主义是一种官僚主义的和独裁的领导方法(这一用语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军队总司令路易·卡多那之名)。——俄文版编者

须要发展包含在“国家精神”这个用语中的一般概念。这一用语具有十分确实的、在历史上确定下来的意义。但是产生一个问题：在任何一次重大的运动中，也就是在并非仅仅是个别人物的（多少有些理由的）个人主义的随意表现，而是多少〔在历史上〕被证实为正确的那种运动中，有没有某种类似于称为“国家精神”的那种东西？同时“国家精神”的概念是假定无论对过去（通过保持传统）或对将来，都具有“连续性”，也就是说是假定任何行动都是那个开始于过去并且在将来要发展的复杂过程的链条中的一定因素。对这一过程负责，对参加这一过程负责，对同那种物质上“看不到的”、但感觉到是很活动的和积极的、并且被考虑到它们好象是“物质的”、在肉体上被感觉到的力量团结一致负责，——这才是在一定场合下称为“国家精神”的东西。

显然，这种对运动“持久性”的理解应该具有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性质，也就是在一定的意义上不应该超越一定的界限。我们假定最狭小的界限是上一代和下一代。而这已经不算少了，因为不是以今天以前三十年或以后三十年来计算各代的，应该有机地、历史地去理解它们。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从一代一代的根本的特点来看，代辈是什么这个问题，最低限度以对待老一辈的关系为例，是容易理解的：我们同已经成为高龄的并且在自己身上体现了“过去”的老年人是团结一致的。这种过去在我们中间还活着，必须知道这种过去，必须同这种过去清算，这种过去是现在的要素之一，也是未来的前提之一。我们也是相应地对待儿童，对待正在出生的、成长的一代，我们对他们是负有责任的。（带有倾向性，也包括选择一定的目的，也就是成为思想基础的对“传统”的崇拜与此无关。）但是假使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具有这样理解的“国家精神”，那么必须时时反对对它的曲解和违背。

有“为了做手势而做手势”，“为了斗争而斗争”以及诸如此类

的情况，而且特别是有一种无聊而小气的个人主义，它是一种满足片刻冲动的古怪形式。(在实际上，这些都只是那些采取各种美妙和奇异形式的意大利的“非政治倾向”的变种)。个人主义只是一种兽性的非政治倾向的表现。在宗派主义中也表现出“非政治倾向”——并且确实，如果对它仔细地加以考察，那么这种表现确是一种个人“庇护”的形式，因为在这种表现中缺乏做为“国家精神”基本要素的党的精神。证明党的精神是国家精神的基本要素——这就是应予解决的迫切而特别重要的任务之一。相反地，“个人主义”是一种非人性的、兽性的特点，它是“招外国人欢笑的”，正如动物园里的动物怪里怪气招人欢笑一样。

政　党

上面已经提过，如果在现代写一部新的《君主论》，那么它的主要人物不会是英雄的个人，而是某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在各个不同时期并且在各个不同民族的各个不同的内部关系中——致力于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政党是有意识地并且以历史的必然性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

应该注意的是：凡是树立了极权主义制度的地方，最高政权机关的传统职能事实上是由一定的党来执掌的。这个党之所以是极权的，正因为它执行了这种职能。虽然任何一个党都是社会集团的而且仅仅是一个固定的社会集团的利益的体现者，可是某些个党却在一定的条件下代表这个集团的利益，因为他们在实现着平衡而且充当着本集团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之间的仲裁的角色，同时也在关心使他们所代表的集团在与这个集团联盟的一些社会集团的协议和协助下发展，如果这些社会集团不直接而坚决地与这个集团敌对的话。规定国王（或共和国总统）地位的宪法条

文——“统而不治”——是这种仲裁职能形成为法律的表现，是立宪党派希望不“揭露”国王或总统的表现。宪法中关于国家元首对政府行动不负责的规定以及关于内阁负责的规定是对下面这个总的原则的诡辩：这一原则维护国家统一的主张，维护被治理者不问谁来主持政府，不问哪一党当政，都赞同国家的活动的主张。

在极权政党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这些宪法上的规定就失掉它们的意义，根据这些规定而执行职务的机构的活动也要削弱。但是极权政党却来执行这种仲裁的职能，因为它赞扬“国家”这种抽象的观点，并且尽力以各种方法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不偏不倚的力量”的职能在切实而有效地实现着。

既然谈到“政党”问题，政治行动（狭义的）是不是必要的呢？可以指出的是：在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中，有机的、主要的政党由于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或由于其他原因都分为派别。其中每个派别全把自己称为“党”，甚至是独立的党。因此往往产生这种情况，即有机的党的精神总部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派别，好象是一个立于各党之上的独立存在的领导力量而活动着。甚至有时人们还相信它。假使从以下这种情况出发，即报纸（或许多报纸），刊物（或许多刊物）也是“党”或“党派”，或执行“某一政党职能”，那么对于这种职能可以很确切地加以研究。因此须要考虑一下《泰晤士报》在英国所执行的那种职能，而这种职能在意大利是属于《晚邮报》的。同样须要考虑一下所谓“通报”性的和“非政治性的”甚至体育的和技术的报刊所执行的职能。同时，这种现象在那些极权政党独占统治的国家里暴露出很耐人寻味的特点，因为这种政党不再执行纯粹政治的职能——它现在仅只执行技术的、宣传的和警察的职能，以及道德和文化教育方面的职能。在这种场合下，是以间接的方法来执行政治职能的，因为如果没有其他合法政党，那么经常会有一些不能以合法手段加以压制的实际政党和倾向。要想进行旨在反

对它们的论战和斗争，那就会象捉迷藏一样。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极权政党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产生政治同行语的文化职能，也就是政治问题采取文化形式，并因此而成为无法解决的。

但是一个传统的政党在实质上具有"间接的"性质，也就是它直接地、公开地做为一个担任纯粹"教育的("lucus"等等)、道德化的、文化的(sic)角色的党而出现。这里所讲的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同时，甚至所谓直接行动(恐怖手段)也被看做是用实例进行的"宣传"。这种情况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支持那种意见，即无政府主义运动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于其他党派的外围的，目的是"教育"它们。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每一个有机的党所固有的。(有智力的或有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大党的这种"外围活动"的一方面吗?)"经济主义"[①]信徒的流派本身就是这种现象的历史表现。

这样一来，揭露出把直接的政治行动归结为赤裸裸的抽象的"党"的两种形式。首先它可以是一部分优秀的(èlite)文化活动者，他们的职能是从文化观点，从一般的思想原则去实现对彼此相近的党的巨大运动的领导(这些党在实际上是同一个有机的党的派别)。其次，在较近的时期，这种党不是一部分优秀的人(élite)，而是群众的党了。同时，群众的政治作用只是在于他们应该(象军队一样)在一切问题上追随并信赖公开的或隐蔽的政治中心(公开的政治中心往往是那些尽力留在暗地里并通过中间人，通过"中介思想"而间接活动的力量手中的管理机构)。群众在这里干脆是一种"机动力量"，并且要对他们"从事"道德上的教训，感化他们，利用救世主的神话告诉他们传说的时代要来了，到那时候一切灾难将会自然而然地解决，现代的一切矛盾将被消灭。

---

① "经济主义"——葛兰西用这一名词来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解释，即经济唯物主义。——俄文版编者

要写一部政党的历史，实际上势必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比起洛别尔托·米开尔斯①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尽管他在这方面被认为是位专家。党史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呢？它是否只应该简单地叙述一下政治组织的内部生活，政治组织的产生情况，党据以建立的最初一些小组的情况，形成党的纲领和世界观的思想斗争呢？当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会写成一部知识分子的有限集团的历史，而且说不定会写出一部个别人物的政治传记。因此，内容的范围应该是更广泛和更丰富。

党史应该是一定群众的历史。这些群众追随着倡议者，以自己的信赖、自己的忠诚、自己的恪守纪律来支持他们，或是"现实地"批评他们，如果态度消极（对倡议者的动议而言）或者根本涣散。但是不是应该把这些群众看成只是党员组成的群众呢？是不是只探讨代表大会的历史，投票的结果等等，也就是党的群众表现自己意志的一切形式的全部活动就够了呢？十分明显，也应该考虑党体现它的利益的并且是它的先进部分的那个社会集团。换句话说，党史不能不是一定社会集团的历史。但是这个集团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有朋友，有与它相近的集团，对手和敌人。只有呈现整个社会的、国家的（往往还有国际的）关系的复杂情景才会给我们一个关于某一个党的历史的正确概念。因此，可以这样说：写一部党史就等于以一定的专论的观点去写一部整个国家的历史，突出这个国家的最富有特点的方面。党所具有的意义和所产生的影响，多或少，恰恰决定于党本身的活动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反映着并预定着国家历史发展的全部进程。这样看来，党史写作的方法本身就表明它的作者对于党是什么和党应该是怎样的这一问题的

① 米开尔斯，洛别尔托（Michels, Roberto, 1876—1936）——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著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Storia del marxismo in Itatia, 1908）等。——译者

看法。对宗派主义者来说，党内生活中一些不足道的事实就会使他欢欣鼓舞，因为它们对他具有秘密的意义并且使他充满神秘的热情。一个历史家固然在一般情景范围内确定每一个因素和每一个事件的意义，但是他的主要注意力却放在党的实在的斗争能力上，放在党的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的指导力量上，由于这种力量，党对于实现某些事件和防止另一些事件才有所贡献。

关于什么时候可以认为党已经形成，也就是有了明确而永久的目的这一问题，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而且遗憾的是甚至往往产生党的自满，其可笑和危险程度不亚于维科所谈到的"民族自满"。在实际上，可以这样说：党永远也不会彻底形成，这是指历史的发展在不停地提出新的任务和责任而言，也是指对于某些党来说下面这种奇谈是适用的而言：到了这些党终止自己的生存，也就是到了它们在历史上成为无用的时候，这些党的发展才算彻底形成和完成。这样看来，每一个党既然是阶级的附属物，那么，不言而喻，一个努力消灭阶级划分的党只有到它停止生存的时候，它才达到发展的最高的和最完善的形式，因为阶级不再存在了，从而他们的利益的体现者也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这里必须指出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机。这一特殊时机是随下面这一时机而来的：在那时党可以存在，可是也可以不存在，因为它的存在的必要性还没成为"绝对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具有非常毅力的和具有非常的不达目的不止的精神的个人的存在。

什么时候党成为历史上"必要的"呢？是在它的"胜利"条件，它必定变为政府的党的条件处于形成的阶段并且使人能够具有信心地预见到这些条件尔后的发展时。但是不是可以在这些条件下肯定党不会被人以普通手段消灭掉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发挥下面这个论题：为了使党存在，必须达成三个基本要素（也就是三组要素）的结合。

（1）最通常的要素——普通的中常的人。他们的贡献并不在于拿出创造精神或高度组织精神，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实。无疑义的是没有他们，党是不能存在的，但是同样无疑义的是如果党"仅仅"由他们组成，党也是不能存在的。只有在有人保证他们的集中、组织和纪律的时候，他们才成为力量；假使没有这种联系力量，他们就会分散成为无数的小部分，彼此削弱，从而消灭得无影无踪。不能否认，其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种联系力量之一。但是恰恰在他们不是这种力量而且也不能成为这种力量的时候，才能谈到把他们作为联系力量。或者即使他们是这种力量，那么也只是在狭小的界限之内，因而没有政治意义，并且没有什么影响。

（2）主要的联系要素，它在国家范围内实现集中并且使那些听其自然好似等于零的或比零多一些的力量成为有效的和强大的力量的总和。这一要素具有强大的联系力量——集中的、有纪律的甚至（可能由于有了这些品质）发明的力量（如果在一定方向中，依照力量的一定配置，依照一定的前景，甚至一定的前提去观察"发明才能"的话）。

当然，党也不能只靠这一个要素而形成起来，可是它保证这种形成的程度却大于上述要素中的第一个要素。

一般都惯于讲究将领而不及军队。但是在实际上建立一支军队比造就将领要容易得多。已经存在的军队，如果没有将领，就要跨台，这也是无可争论的。同时如果有一些善于彼此合作，互相深刻了解并且致力于共同目的的军事首长，那么甚至在根本没有军队的地方，建立军队的工作也会进行得很顺利。

（3）中间要素，它会把第一个要素同第二个要素结合起来，它会使它们彼此之间不仅在"人身上"，而且也在道德和精神方面建立联系。实际上，每一个党都存在着这三个要素之间的"一定比

例"。当这种"一定的比例"实现的时候，就达到最大效果。从这些道理出发，可以说，在下述场合下，就不可能以普通手段把党消灭掉：存在着第二个要素作为必要的条件，因为它的产生是由于存在着客观的物质条件，哪怕它们还不巩固，还不稳定(如果没有第二个要素，任何议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以及由于这种情况，两个其他要素也就不能不形成，也就是第一个要素会必不可免地造成第三个要素做为自己的继续和本身表现的手段。

要想使这一切都实现，应该具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对成熟了的问题做一定的解决是一种必要。没有这种信念，就不能形成第二个要素，而这个要素由于为数不多最易于打破。但必须使这个要素甚至在被打破的时候，也能留下酵素，以便使它复生。但是这种酵素除了在第一个要素和第三个要素里面之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更好地依存和更好地形成呢？因为它们显然是同第二个要素最相近的。因此，第二个要素的主要活动应该放在制造这种酵素上面。衡量第二个要素的标准应该是：第一，它的一般的实在活动，第二，由于它有被破坏的可能而对它所做的准备。很难说这两个标准哪一个更为重要。既然在斗争中必须经常预见可能遭受的失败，那么准备自己的接班人，其意义的重要，不亚于为了胜利而直接进行的工作。

谈到党的"自满"，可以说它比维科所说的"民族自满"更为危险。为什么？因为民族不能不存在，而且在它存在的事实本身中经常可以发现(甚至表现善良的意愿和引出令人信服的证明)命运的命令和特别深刻的意义。而党则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停止其存在。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的是：在民族之间的斗争中，每一个民族所希望的都是另一个民族由于内部斗争而削弱下来，而党恰好是这种斗争的参加者。因而经常会发生一个问题：党是不是由于本身的力量，由于本身的必要性而存在着，或者，相反地，仅仅由于其

他的人关心它的存在而存在着(的确，在论战中这一要素永远也不会放过。相反地，它甚至被坚决地强调着，特别是在做出不容置疑的答复的时候。而这也正表明这个问题曾引起怀疑而且仍然受到怀疑)。然而谁要因为这种怀疑而苦恼，当然是个蠢才。这个问题在政治方面仅仅具有短时间的意义。在所谓民族问题的历史中，曾有过无数次的外国干涉，有利于反对敌对国家内部基础的国内党派。因此，当人们谈到，例如，加富尔的“东方”政策时，应该考虑一下是否指“政策”，即是否指经常行动的路线，还是指在一定时期并且由于预料到1859和1866年的战争而为了削弱奥国所玩弄的手法。人们也正是这样看待1870年年初玛志尼运动中(例如，在巴尔桑蒂[①]的事件中)的俾斯麦的干涉。当时俾斯麦预先看到对法国战争和意法同盟的危险，希望借助内部冲突来削弱意大利。对于1914年6月发生的一些事件，有些人也是这样联系着即将爆发的战争而认为是奥国总参谋部的干涉。可见，诡谲的手法是很多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观点。如果承认某人所做的一切都始终有利于某人，那么在这种场合下重要的是以一切方法尽力做到使有利于自己，也就是达到完全的胜利。无论如何，必须鄙弃党的“自满”，而代之依靠具体事实。凡是不从具体事实出发、而从党的“自满”出发、并且在政治上以这种“自满”为指导的人，他无疑义地要迫使人们怀疑自己是否是一位严肃认真的政治家。无庸再饶舌的是：党应该避免使他们的行动，哪怕甚至“证明是正当的”，被看成是在受别人的玩弄(尤其假使这个“别人”是外国的话)，但是假使有人企图在这上面投机，那也就没有办法了。

很难设想，某一个政党(代表统治集团的，以及代表被统治的

---

① 巴尔桑蒂·皮埃特罗——班长，1870年5月24日与四十名共和党人去进攻帕维亚地方的兵营，想使兵士们转到玛志尼这方面来。巴尔桑蒂的企图没有成功，同年8月被枪毙。——俄文版编者

社会集团的）不同时执行警察职能，也就是保卫一定的法定政治秩序的职能。

在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以后，应该按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也就是关于用以实现这一职能的那些途径和方法的问题。这一职能的基础是什么——镇压还是说服，它具有反动的性质还是进步的性质？该政党执行自己的警察职能时，其目的是为了维护那个表面的、与历史的活力背道而驰的并且阻碍它们发展的秩序呢，还是它的这种行动在于努力把人民提高到新的文明阶段，而这一阶段的政治和法律结构正是它的纲领中所规定的目的呢？在事实上，法律可以找到这样一些破坏它的人，首先在被法律剥夺了权力的反动的社会分子中间有人破坏法律，其次，在受到法律压制的进步分子中间有人破坏法律，第三，在那些没有达到法律所能代表的文明水平的分子中间有人破坏法律。因此，党所执行的警察职能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退步的；当旨在把脱离政权的反动力量约束在合法性范围内，并把落后群众提高到新的合法性的水平上时，它是进步的；当尽力压制历史的活力并且维系已经过时的、与群众背道而驰的反历史的合法性时，它就是退步的。在其余方面，衡量任何一个党的最好的标准是它活动的性质：如果党是进步的，它就会"民主地"（在民主集中制的意义上）执行这个职能；如果党是退步的，它就会"官僚主义地"（在官僚主义的集中制的意义上）执行这个职能。在第二种场合下，党就成了简单的、缺乏判断能力的执行者，它成为一个（在技术方面）警察组织，而它的名称——"政党"——不过是一个具有神话性质的普通比喻而已。

工业家和大地主

有一个问题，大工业家有没有自己的经常存在的政党？据我

看，答复应该是否定的。大工业家时时在利用一切现有的政党，但是他们本身却没有自己的政党。然而绝对不能把他们看成是“不可知论者”或“不关心政治者”。他们关心的是保持一定的平衡，他们正是时时以在变化着的政治斗争环境中用自己的资金去支持这个或那个政党的手段来造成这种平衡的（当然，反对他们的政党除外，因为即使根据策略的理由，他们也不能促使这种政党加强）。但是，如果所有这些情况都发生在“正常”生活的条件下的话，那么，当然在特殊场合下——例如在战争场合下，这种场合在国家生活中是屈指可数的——大地主的党就成了大工业家的党，而大地主与大工业家不同之点就在于大地主有自己的经常存在的党。在英国可以找到证实这种说法的例子：英国的保守党吞没了看去象是以工业家的传统政党面目出现的自由党。

拥有巨大工会组织的英国现实能说明这一事实。的确，在英国形式上并不存在会成为激烈反对工业家的党，但是那里却有群众的工人组织，而且可以看到的是：在一定的紧要关头它们会打破官僚主义的外壳（例如在1919年和1926年）从下到上地改革（在宪法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大地主和工业家的利益具有经常的和深刻的一致性（特别是现在保护关税政策已成为普遍的，普及到农业和工业的时候）。还有一点是无可争论的，即大地主在“政治”方面组织得比工业家要好得多，他们吸收的知识分子更多，他们的行动准则更富有“经常性”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象英国的“自由激进党”，法国的“激进党”（这个党固然始终大有别于前者）以及寿终正寝的意大利的“激进党”这些传统的“工业”政党是什么样的政党，而且它们的命运如何呢？它们是大的和小的派系的交织物而根本不是某一个大阶级的利益的体现者。因此也就产生了它们形成和解体的形形色色的形式。这些政党的“机动力量”是小资产阶级，这些小资产阶级在这种交

织的情况下处于使他们有完全转变危险的经常改变的条件之下。今天他们成为"蛊惑性政党"的机动力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般地可以这样说：把各个不同国家的条件加以比较，对于判明这些政党变态的原因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而且是最有成效的。这也适用于"传统"主义国家政党之间的论战，也就是这些政党成为整个历史"总目"的"片断"的那些国家政党之间的论战。

在评价任何世界观，特别是任何行动时，必须首先从下列标准出发：可不可以把世界观或实践活动看成脱离社会生活而完全"孤立的"和"独立的"，或者这样不对，而应该把世界观和实践活动看成对其他世界观或其他实际立场来说是一种"完成"，完善，平衡等等？假使深思一下，就会明白，这一标准在正确估计思想运动和实际运动中起着决定的作用，而且也具有不小的直接的实践意义。

最流行的偏见之一，就是相信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自然的"，相信这种存在的事物不能不存在，相信所采取的根绝祸害的企图不能中止生活的进行，因为传统的力量将继续活动，并且正好因此而保证现存事物得到保持。当然，这样的说法是包含着一部分真理的，而如果不是这样，那也就够糟糕的了！可是这种思维方法超过一定的界限就会成为危险的，因为在许多场合下会导致最有害的政策；无论如何，总算还有上面指出的并且为进行哲学、政治和历史的评价必需的具有实际力量的标准。

当然，假使深入问题的实质，就可以看到：某些运动把自己只看成是附属的，也就是它们的前提是有一个主要运动，它们同它联合在一起，来医好某些预想的或实际的病害。换句话说，这些运动具有纯粹改良的性质。这一原则在政治方面是重要的，因为在理论上正确的命题，即每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党，由于下列这一事实而得到证实：在紧要关头那些每一个都做为"独立的"党而出现的各种政治小集团会联合在一起，组成统一的联盟。这样看来，以前存

在过许多小集团这一事实，仅仅具有“改良主义”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些小集团之所以为数众多是因为它们曾研究局部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着政治上的分工（在一定范围内是有益的）。但是每一个集团是以另一个集团的存在为前提的，因为这样可以在紧要关头，也就是恰好当斗争在主要问题上展开的时候，建立统一，形成联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在建立政党的时候，应该以“团结一致”，而不应该以一些次要问题为基础；因而必须注意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领袖与群众之间保持不断的联系。假使在紧要关头领袖们转入他们的“真正的党”内，那么群众就要陷于没有首脑，毫无生气，软弱无力的境地。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真正的运动也不能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完整性——这一点只能在它取得经验以后才能做到，那时它将根据一些事实而确信全部现实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它是自然的（在这个词所具有的那种可以被人曲解的意义上），而是因为有了某些一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一旦消失就会引起相应的后果。这样看来，运动在改进着，失掉自发性的特点，失掉“共生”的特点，成为真正独立的，这是就它创造为了达到一定后果所必需的前提而言，也是就它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创造这些前提而言。

“经济主义”的一些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问题

“经济主义”——保护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主义）的理论运动——理论的工团主义。

应该考察一下，理论的工团主义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导源于实践哲学，并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导源于论证贸易自由的必要性的经济学说，也就是归根结底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导源于自由主义。因

此应该判明，具有最完备的形式的经济主义是不是自由主义的直接继续，即使在自己的产生中，同实践哲学有非常薄弱的、并且无论如何只是表面的、纯粹术语上的联系的继续。

应该从这一观点来考察柯罗齐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的序言（1917 年）所引起的艾诺第[①]与柯罗齐之间的辩论[②]。艾诺第所提出的必须注意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引起的关于经济史文献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指出这种文献由于表面同实践哲学相混，而产生了经济主义。因此，当艾诺第批评（坦率地说，不中肯）一些经济主义的曲解时，无异于他自己搬砖砸脚。自由贸易思想与理论的工团主义思想体系之间的联系在意大利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里工团主义者如兰齐洛之流对帕列托[③]的恭维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是从意义上看来，这两种倾向是很不相同的：第一种为居统治地位的和领导地位的社会集团所具有；第二种为仍处于从属地位、还没有认识自己的力量、自己发展的可能性和途径的因而还不能脱离原始阶段的社会集团所具有。

自由贸易运动的方针立脚于理论的错误之上，而这种错误的实际根源是不难查明的，它是以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别为基础的。这种区别从方法论上的区别变为有机的区别并做为这种区别而呈现出来。例如，人们断定经济活动是市民社会所固有的，因而国家不应该干涉它的规章的制定。但是由于在现实中市民社会与国家是被视为同一的，因此必须指出，保护自由贸易也是一种以立法和强制手段实行并维护的国家性质的"规章"。它是有

---

① 路易·艾诺第（1874— ）著名的意大利经济学家。自由党的有名活动家。自1948 到 1955 年，任共和国总统。——俄文版编者

② 见《社会改革》1918 年 7—8 月号第 415 页。——意文版编者

③ 帕列托·威尔富列多（1848—1923）——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俄文版编者

意识地致力于本身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经济压力的自发的、自动的表现。因此，保护自由贸易是一个政治纲领，其目的是更换（就它能够成功的限度来说）国家本身的领导干部和经济纲领，也就是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

理论的工团主义情况不同，因为它是属于从属集团的。这个从属集团不可能以这个理论为指导而在某一个时期成为统治集团，不可能在自己的发展中超出经济团体阶段，以便在市民社会中上升到取得伦理—政治的领导权的阶段并且在国家中成为统治集团。至于自由贸易的维护，那么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是领导集团的一定派系。这个领导集团所要改变的不是国家的结构，而仅仅是政策的方向，它要改革贸易立法而且仅仅以间接方式改革工业立法（因为无疑义的是：保护关税政策，特别在那些市场范围狭小的国度里，限制创办工业自由，并且对于垄断组织的产生起着不良的推进作用）。这里所讲的是组成政府的各个党派的经常轮替，而不是建立和组织新的政治社团，更谈不上建立和组织新型的市民社团。

理论的工团主义运动问题是更加复杂的。毫无疑义，宣布自己是这个运动的捍卫者的从属集团，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在这个运动中于统治集团智力领导之下牺牲了，因为理论的工团主义不外是自由贸易主义的一个方面，后者被实践哲学的一些被曲解了的（因而成了平凡的）原理证明其为正确。怎样并且为什么有这种“牺牲”呢？这种牺牲归结为从属的社会集团没有可能变为统治的社会集团，或者因为这个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提出来（费边派，德·曼，大部分工党党员），或者因为这个问题是在不适当的和不起作用的形式（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倾向）中提出来的，或者因为把直接从社会集团所存在的那个制度向以完全平等和辛迪加经济为特点的制度的飞跃看做公设。

至少经济主义对各种意志表现，对积极行动，对政治和精神的首创所抱的态度是奇怪的，好象它们全不是经济必然性的有机产物，而且——更有甚者——不是唯一的有效的经济表现。把领导权问题的具体提出这样地解释成为一种引起领导集团陷入从属地位的事实同样也是完全不合适的。无可争论的是：领导权的前提是要考虑那些行将被领导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倾向，是要产生一定的妥协的均势，也就是领导集团要做经济团体性质的牺牲。同样无可争论的是：这种牺牲和这种妥协不能触动基础，因为如果领导权是伦理—政治的，那么它也就不能不是经济的，因而做为它的基础的不能不是领导集团在有决定性的经济活动方面所执行的那种有决定性的职能。

除了自由贸易主义和理论的工团主义以外，经济主义采取许多其他形式，包括各种不同的缺席选举形式（它的典型实例是1870年以后意大利教权派的缺席主义。从二十世纪开始直到1919年以及"人民党"成立以前，它越来越减弱了。教权派在合法的与实在的意大利之间所做出的根本的区别也同样在经济方面与法律及政治方面之间做出了区别）。缺席主义采取了多样的形式，也就是它能表现为"半缺席"，"四分之一"缺席等等。同缺席主义相联系的是"越坏越好"的公式以及一些议会党团所具有的所谓议会"不调和"的原则。经济主义并非经常敌视政治活动和政党，然而，它却把政党看成是辛迪加型的普通的教育组织。为了研究经济主义，并且为了理解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把《哲学的贫困》里面的一段话做为出发点。这一段话是说在社会集团的发展中，有一个时期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时期里，有个别的工会会员，其斗争已经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保护和发展组织本身①。

同时须要记起恩格斯论实践哲学的两封信（它们也用意大利

文发表了②）里面的说法，认为经济仅仅“归根到底”才成为历史的原动力。这种说法应该直接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讲到人们会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中意识到发生在经济里面的冲突的那个地方联系起来③。

在这些有关各种问题的论述④中肯定了实践哲学传播的范围远比一般所承认的要广泛得多。假使考虑到历史的经济主义（象罗里阿⑤教授现在把自己的或多或少没有条理的理论称为的），得到了传布，而且自从实践哲学加入了斗争的时候起，文化界完全改

---

① 必须找到确切的说法。《哲学的贫困》在形成实践哲学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部著作可以看做是《费尔巴哈论纲》的发展。同时它象《神圣家族》一样，还是一个中间的因素，还没有确立的而且是偶然的情况所引起的。这一点从那几段论述蒲鲁东特别是论述法国唯物主义的文字里就看出来了。论述法国唯物主义的那段文字勿宁说是一章文化史（而不是人们往往把它解说成的一篇理论概要），并且做为文化史它是极出色的。有一种意见应当重视，这种意见认为《哲学的贫困》里的对蒲鲁东和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的批评可以适用于乔别蒂和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一般的温和派的黑格尔学说。把蒲鲁东同乔别蒂对比，尽管他们所属的历史政治发展阶段各有不同——而且甚至恰恰因为这一点，——可能是有意思的和有成效的。

② 恩格斯的两封信——系指恩格斯下面的两封信而言：致布洛赫（1890 年 9 月 21—22 日）及致施米特（1890 年 10 月 27 日）。在其中第一封信里讲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 466 页）。——俄文版编者

③ 大约指下面这两句话：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的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9 页）。——译者

④ 见葛兰西：《阿罗齐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意文版编者

⑤ 罗里阿（Loria, Achille1857—1943）——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译者

观的话，那么这种肯定是正确的。可以借用柯罗齐的用语这样讲，这个产生于"自由的宗教"内部的最伟大的异端，和正统的宗教一样，遭到了蜕化并且做为一种"迷信"而传布开来，也就是它同自由贸易主义交织在一起而产生了经济主义。但是，必须考虑一下，这个异端的迷信是不是与已经衰朽了的正统宗教不同而始终保存着酵素，使它有可能做为高级宗教而再生，也就是迷信的渣滓是否易于消除。

下面是一些说明历史经济主义特点的因素：（1）在研究历史联系的时候，不区别那"比较经常的"事物与偶然的临时的偏向，并且把经济现实看做是个别人的或小集团的利益，看做是在最直接的和"卑污的唯利是图"意义上的利益。换句话说，不考虑主要的经济的阶级以及他们所具有的一切关系，而只注意肮脏的高利贷的利益，特别是当它们符合刑法法典所规定的犯罪形式的时候。（2）一种把经济发展归结为劳动工具中技术改革过程的学说。罗里阿教授的那篇1912年发表于《现代评论》上的关于飞机的社会影响的论文，是运用这种学说的光辉范例。（3）一种学说，根据这种学说，经济的和历史的发展直接决定于某一个重要生产要素的改变、决定于在机器构造和使用上引起采取新办法的新原料以及新燃料的发现等等。近年来有不少关于石油的著作。1929年5月16日发表于《新文选》的安东尼奥·拉维奥札的论文是个典型的例子。新燃料、新动力以及适于加工的新原料的发现，当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可以改变个别国家的状况，但是它并不决定历史的进程等等。

往往有这种情况，人们反对历史的经济主义，但却以为他们是在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引证1930年10月10日巴黎《展望》报上（转载于1930年10月21日《外国报刊每周评论》第2303—2304页）的社论做为典型的例子。它里面说："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而

特别是在战后，人们向我们断言，说物质利益在统治着各国人民并且推动世界前进。这一论题的发明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给予这个论题以'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多少有些学说意味的名称。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人们在群众中所服从的不是热情，而是经济的必然性。人们都知道政治是热情，爱祖国是热情。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断言这两种确定不移的思想在历史中的意义只是表面的，因为在现实中各国人民的生活多少世纪以来都是以起因于物质的变化多端并经常更新的活动来说明的。他们说：经济就是一切。许多'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附和了这种论调。他们以应该用粮食、石油产品或橡胶市场上的竞争来向我们说明国际政治的基本方向而感到骄傲。他们费尽心机企图向我们表明全部外交从属于关税和价格问题。这种说法传布得很广。它们有科学的样子，并且从那想博得至美无上之名的、特种极端的怀疑主义出发。对于对外政策有热情？有国家事务感？胡说！所有这一切都只能用来对付头脑简单的人。伟大的智者，'专门研究的人'都知道：主宰这一切的是供给和需求。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是绝对的假真理。以为人们只是自私自利，这是纯粹的谎言，而认为指导他们的主要是热烈地相信威望和为取得威望而努力，这却是纯粹的真理。凡是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那他就什么也不懂。"

在这篇论文的续篇（标题《威望狂》）中，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是作为以"威望"的理由而不是以物质的利益为指导的政治的。一篇不长的论文充满了对实践哲学的最庸俗的论战式的攻击，但实质上这种论战是指向罗里阿那一套毫无条理的经济主义的。同时，作者的论证从另外一些理由来看也是站不住脚的：他不理解"热情"不能不是经济利益的同义语，他不理解很难使得政治活动经常处于热情极度兴奋状态。事实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法国政治是一贯"唯理性"的、没有任何热情痕迹等等的政治。

实践哲学在自己最流行的"经济主义"迷信形式中，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失掉了自己产生文化影响的很大一部分能力。可是它在人民群众中间和尽量不受思考的麻烦而要表现出十分老练的中层知识分子中间却具有很大的这种能力。正如恩格斯写道，许多人很轻易地相信：他们可以很便宜地而且不付出任何劳动地学到一些包括全部历史以及全部政治的和哲学的最高智慧的公式。他们忘记了人们据以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上认识经济冲突的那个论题，其性质不是心理的或道德的，而是有机的，认识论的。因此，就产生一种把政治从而把历史看成是延续不断的欺骗的市场(marchè de dupes)看成是一套幻想的魔术和骗局的习惯(forma mentis)。"批判的"活动总归是在于发现骗局，揭发丑事，计算代表人物口袋里的钱。

这样看来，人们忘记了，即使"经济主义"是客观的(也就是科学上客观的)解释者的准则，或者把它当做这个来看，那么在这种场合下，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的研究也应该普及到历史的所有各方面，既要普及到代表一定"正题"的人，也要普及到代表"反题"的人。除此以外，人们还忘记了实践哲学的另外一个原理，就是"人民的信仰"或这一类型的思想具有物质力量的意义。

透过"卑污的唯利是图的利益"棱镜来观察一切事物的准则的固有的错误，有时带有严重的和令人发笑的性质，并且对实践哲学的威望起着不良的影响。因此，不仅必须立脚于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上，而且也(特别)立脚于政治活动的理论和实践上来同经济主义作斗争。在这方面的斗争可以而且必须通过领导权的理论的研究来进行。在实际上，著名的政党在发展党的学说的过程中和展开自己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就进行过这样的斗争(反对所谓不断革命论的斗争，以革命的民主专政的理论来同它对抗；对于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各种思潮的支持具有重要意义等等)。

大可以研究一下关于一定的政治运动如何发展问题的逐渐发展观点。这些运动的典型例子是布郎热运动[①]（从1886年起大约到1890年）、德雷福斯案件[②]或者甚至12月2日国家政变（这里必须分析关于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经典著作[③]，以便确定在这部著作里赋予纯粹经济因素以何种相对的意义以及对"意识形态"的具体研究在这部著作里占有何等的地位）。

在考察这些运动时，经济主义提出一个问题：运动的主动权直接属于谁？随即做出一个既简单化又错误的答复：主动权直接属于统治集团的某一派系，并且为了避免错误，指出了那个相当明显地执行着进步职能的和监督全部经济力量职能的派系。在这种场合下可以确信不会有错误的，因为如果所考察的运动导致夺取政权，那么不可避免的是，迟早统治集团的进步的派系都将会监督新的政府，并把它变成一种工具借以为了本身的利益而利用国家机关。

这样看来，问题是努力求得廉价的没有错误，而这种没有错误不仅丧失了任何理论价值，而且它的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也是微不足道的。一般地讲，这个经济主义原理除了道德的说教和无穷无尽的个人性质的问题之外，没有提供什么东西。

假使展开了布郎热类型的运动，在这个场合，必须现实地去分析一下下面的因素：（1）加入运动的群众的社会成分；（2）这些群众在经受改变过程的力量均势体系中所起的作用，而新的运动的发生本身就证明了这种改变；（3）运动的领导者所提出的并得到

---

① 布郎热（Baulanger, George Ernest Jean Masic 1837—1891）是法国将军。布郎热运动（Baulangism）是指他的领导的保守党、保皇党和激进党反对共和国联合政府的运动。后来运动失败，他逃往布霍塞尔自杀。——译者

② 德雷福斯（Dreyfus, Alfred 1859—1935）是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1894年被控叛国，后由左拉等呼吁重新调查，证明控告时，文件是假造的，撤销原判（1906）。——译者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意文版编者

广泛支持的口号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的问题，以及这些口号符合哪些实际需要的问题；（4）关于手段符合目的的程度问题；（5）只有归根结底，并且是在政治的形式中，而不是在道德的形式中才能提出一个假定，这种运动必不可免地要蜕化而且要服务于完全不是参加运动的群众所追求的那种目的。"经济主义者"则预先就提出了这一假定，那时还不存在一个能够证实这一假定的实在的因素（这个因素的现实性应该对于大家都是一目了然的，而不是得自秘密的"科学"分析），因而这一假定看上去象是从道义上谴责运动参加者有两面性，缺乏信心或者不够灵活，愚蠢。于是一场政治斗争就变成了一连串的私人冲突——那些没有被欺骗了的、没有从瓶子里放出魔鬼的、被自己的领导者愚弄了的、由于本身不可救药的愚蠢而不肯确信这一点的人的一连串的私人冲突。同时，在这些运动没有导致夺取政权以前，经常可以预想它们是注定失败的，而且其中有些也的确终于以失败了结的（前面讲到的那个布郎热运动遭到了破产，尔后又被德雷福斯案件的运动所彻底击溃。乔治·瓦罗亚的运动和盖达将军的运动也遭到同样的失败）。因此，研究的方向应该是弄清楚这些运动的优缺点。根据"经济主义"所提出的假定，有一个直接表现出来的力量的因素，这就是有一定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财政支援（甚至一家大报纸出来支援这种运动也可以做为间接的财政支援）——只此而已。但是这是十分不够的。因而，在这种场合下，对于力量的相互关系的各种因素加以分析，其顶点不能不是领导权的问题和伦理政治关系的问题。

对所谓妥协抱着鲜明的原则的敌视可以做为所谓议会不调和的理论表现的实例，这种敌视的侧面表现是那个可以称之为"害怕危险"的东西。毫无疑义，这种对妥协的原则的敌视是与经济主义密切联系着的，因为它的基础是毫不动摇地确信历史发展具有在性质上与自然规律相同的客观规律，不仅如此，它的基础也是相信

事物的结局具有与宗教信仰相同的命定的不可避免性。由于认为将来产生有利的条件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由于具备这些条件会神秘地发生复兴现象，所以为了根据一定计划去创造这些条件而有意识地采取的行动不仅是无益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除了这些宿命论的信念以外，还依然存在着盲目地并绝对地依赖军队的调整力量的倾向。固然，这种倾向并不是没有一定的逻辑性和彻底性的，因为认为意志的干涉只是在破坏时而不是在建设时有用（建设恰好已经在这同一个破坏的时机中进行）。在这种场合下破坏是机械地，而不是做为破坏一建设来看待的。抱有这类观点的人不去考虑“时间”的因素，而且归根到底也不去考虑“经济”本身的因素，这是指他们不理解下面这一点而言：群众的思想意识观念始终落后于他们的经济状况，因此，在一定时机内，经济因素自动引起的运动会由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迟缓下来，会受到阻止，或者甚至会在刹那间被消灭掉。由此就产生了进行有意识的和目的明确的斗争的必要性，理解群众经济需要的必要性，而这种经济的需要可能与传统领袖所提出的口号相矛盾。必须始终掌握主动权，以便使经济运动摆脱传统政治的桎梏，也就是改变一定力量的政治方向，必须把这种力量吸收到自己方面来建立新的、团结一致的、没有内部矛盾的、带有经济政治联盟性质的历史联盟。两种彼此“相似的”力量仅仅在一系列的妥协的基础上，由于达成建立联盟的协议而彼此接近，或者当其中一种力量由于公开强制而服从另一种力量时借助武装力量而彼此接近，才能合为一个新的有机体；因此，问题在于是不是存在着这个力量，也就是强制力量和武装力量，假使存在着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有效地”利用它。如果为了战胜某一种力量而必须另外两种力量结成联盟，那么关于使用武器和强制手段（即使有这种可能性的话）来建立这种联盟的想法，纯粹是方法论上的假定，而唯一实在的可能性依然是

协议，因为强力可以用于敌人而不能用于必须迅速地吸收到自己这方面来的自己力量的一部分，为了做到这一点，须要有热情和"善良的意愿"。

预见和前途

该当解决和探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政治活动中和国家生活中"双重前途"的问题。存在着可以判明双重前途的各种不同的阶段——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但在理论上它们可以归结为符合马基亚维利的半人半马怪物的两重性即兽性和人性的两个基本阶段，——归结为力量与协议，权力与领导权，暴力与文明，个人的与全体的（"教会"和"国家"），鼓动与宣传，策略与战略等等的阶段。有些人把"双重前途"的理论归结为一种平凡的和贫乏的东西，而且仅仅归结为这种东西，也就是归结为两种"具体的"形式，这种形式机械地在时间上彼此先后相随，"接近"的程度有时大一些，有时小一些。相反地，可以产生这种情况：第一种"前途"成为"最具体的"，最基本的程度越大，第二种应该成为"遥远的"（不在时间上，而做为辩证的关系）、复杂的、崇高的程度也就越大，也就是可以产生象人生活中的情况：个人被迫保护自己直接的肉体生存的程度越大，他在自己的主张和行动中倚靠文明的和人类的一切复杂的和最高贵的珍品的程度也就越大。毫无疑义，预见仅仅表示正确地把现在和过去作为处于运动中的事物来看。正确地来看就是准确地断定基本的和经常存在的过程因素。但是设想纯粹"客观的"预见则是荒谬的。进行预见的人本身在实际上有一定的"纲领"，他愿意这种纲领得到胜利，而预见正是这一胜利的因素。这并不是说，预见永远应该是任意的和没有根据的或者完全是偏见的。甚至可以说，只有在预见的客观方面与纲领相联系的

限度内，这个方面才具有客观性：（1）因为只有热情才能使得智力更敏锐，并且使得直观更清晰；（2）因为实现是把人的意志加到事物共性上（工人意志加到机器上）的结果，所以扬弃意志表现的任何因素或者仅只考虑其他意志的干涉作为势力一般角逐的客观因素，都是对现实本身的歪曲。仅仅具有强烈愿望这样做的人才把这些实现他们自己意志所必需的因素等同起来。

因此，认为一定的世界观本身含有最高预见能力的意见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是愚昧的自满和轻率所造成的。当然，在任何预见中都包含有世界观。因此，世界观是彼此毫无联系的随意的思想活动的总和，还是具有明确的和一贯的观点的形式，这决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恰好在那个做出预言并且以自己的强烈的意志来实现这些预言的人的活动的头脑里，它才具有这种意义。这一点从所谓"不偏不倚的"人们所做出的预言中看得出来：他们充满废话，无味的烦言，天花乱坠的猜想。只有"预见者"具备要求实现自己的纲领，才能使得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的方面，在那些可以被组织起来并且容许导之前进或引向一旁的因素上，这些因素在实际上是唯一可以预见的因素。这与一般通用的观察问题的方法相反。通常是这样想的：任何预见活动的前提是判明经常起作用的象自然科学的规律一样的规律。但是这些规律并不是在预想的绝对的或机械的意义上存在着。同时并不考虑其他意志的表现而且也没有"预见"到它们的运用。因此，它们是从随意的假定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的。

"过度的"（因而也是表面的和机械的）政治的现实主义往往会造成一种主张，即国务人员仅仅应该从"现实"出发，所关心的不是"应该是"而仅仅是"是什么"。这表明国务人员应该抛掉展望的观点，应该看得不远于自己的鼻子。这种错误使得帕欧罗·德里佛斯承认基查第尼① 而不是马基亚维利为"真正的政治家"。

必须区别"外交家"与"政治家"，正如区别政治学者与政治活动家一样。外交家只能在现实的范围内行动，因为他的专业不是建立新的平衡体系，而是在一定的法律范围内维持现有的平衡。学者也同样只是应该从现实出发，因为他不过是位学者。然而马基亚维利不只是学者，他是党人，他是具有强烈热情的人，他是努力建立新的力量对比的政治活动家，因此他不能不关心"应该是"。当然，这个"应该是"并不是从道学先生的意义上去理解。因而不能在这种形式下提出问题，它是比较复杂的。换句话说，问题在于确定那个"应该是"的东西是随意的行动还是必要的行动，是具体的意志还是绝望的幻想，是愿望还是模糊的意图。政治活动家——这是建设者，是鼓励人们行动的人，但是他不能赤手空拳地建设，他不能在自己的愿望和幻想的空洞的云雾里旋转。他是从现实出发的；但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现实呢？可能这是一种静止的和不动的东西，而根本不是与处于不断运动中和变化中的平衡相联系的力量的对比？指导意志去建立实在存在的和活动着的力量的新的平衡，依靠那种被认做是进步的一定的力量，创造条件使这种力量获得胜利，这一切当然都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行动，但是行动的方法必须是善于控制这种现实并且超越这种现实（或促成这一点）。由此可见，"应该是"是个具体的东西，不仅如此，它是唯一的现实主义的、以历史主义为根据的对于现实的解释，是唯一的体现在行动中的历史和哲学，唯一的正确的政治。

萨服那洛拉与马基亚维利之间的对立并不是是什么与应该是之间的对立（在勒·卢骚的著作里有整整一章论述这个问题，但只不过是华丽辞句的堆积），而是两个"应该是"——萨服那洛拉的抽象的和模糊的与马基亚维利的现实主义的——之间的对立。后者

---

① 基查第尼（Guicciardini, Francesco, 1483—1540）佛罗伦斯历史家和政治家，十六世纪主要历史著作《意大利史》（1561—1564）的作者。——译者

的"应该是"是现实主义的，即使这个"应该是"还没有变成具体的现实，因为不能期望个人或书本能改变现实；他们只能说明它并指出可能的行动路线。马基亚维利活动的局限性仅仅在于他是"私人"，是作家，而不是国家或军队的首脑，因为后者虽然也是个人，但却掌握着国家的力量或军队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一大批文学的力量。但是，不能根据这一点就肯定马基亚维利是一位"赤手空拳的预言家"；这无异于轻视他的精神意义。马基亚维利从来不说他想要改变现实或者打算亲自从事改变现实。他只是努力具体地表明历史的力量应该怎样行动才能变为有成效的。

情况的分析。力量的对比

研究应该怎样分析当前情况的问题，也就是应该怎样确定力量对比的各种水平的问题，能够有助于说明作为一套研究和专门观察的实际方法的政治学和政治艺术的基础，而研究和专门观察的实际方法有助于唤起对具体现实的兴趣和有助于发展比较正确的和比较细致的政治直觉。同时应该说明须要怎样理解政治中的战略和策略，战略"计划"，宣传和鼓动，组织，也就是有关政治组织和行政的科学。

通常毫无条理地分散在论述政治学的一些著作中的从实践中取得的观察资料（盖·莫斯卡[①]的著作《政治学要素》可以做为这方面的例子）应该，——因为它们不是抽象的，而且不无可靠的根据——在确定力量对比的各种水平时占有相当的地位。应该从国际力量对比开始（这里应该考虑所有有关确定大国问题，有关一些国家加入统治集团问题，有关涉及小国和中等国家限度内的独立

① 莫斯卡·盖唐诺（1858—1941）——意大利资产阶级法学家，有许多社会学的著作。——俄文版编者

和主权概念问题的著作），然后转入客观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转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再转入政治关系，党派之间的关系（关于掌握国家领导权的政治集团的问题），最后，转入直接的政治关系（也就是与战争有潜在联系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发展在主要的社会关系发展之先，还是它们的发展在逻辑上随着后者呢？毫无疑问，前者是随着后者的。经济基础每次根本更新就要引起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的绝对的和相对的根本改变，这表现在技术和军事方面。甚至一个民族国家地理位置的改变也不会预定基础的改变，而且其本身就是后者改变的逻辑结果；同时，这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后者的改变——其程度正如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政治影响经济等等。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对政治关系，对与各党领导权相联系的关系起着消极的和积极的影响。一个国家的直接经济生活从属国际关系的程度越大，那么它反映在利用这种情况防止敌对政党取得优势的一定政党的活动上的程度也就越大（可以回忆一下尼蒂[①]关于"意大利革命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那篇有名的讲话！）。从这类事实出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往往所谓"外国人的党"根本不是这种名称极其庸俗的党，而恰好是最富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党，因为除了它是本国生命力的代表者以外，在它的活动中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着这个国度在经济上依赖和从属于这个或那个占霸权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事实[②]。

为了正确地分析那些在一定历史时期中起作用的力量，以及为了认清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正确地提出和解决经济基

---

① 尼蒂（Nitti, Francesco Saverio 1868—1953）——意大利经济学家、政治家，曾任首相、法西斯主义上台后亡命国外。——译者

② 在德·沃尔培发表于 1932 年 3 月 22 日及 23 日《晚邮报》上的论文中，曾指出这种"压制"个别国家内部力量的国际因素。

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比关系的问题。这时应该遵守两项原则：（1）如果解决任务所必需的现实条件还没有，或者最低限度这些条件尚未处于发展和形成阶段的话，任何一个社会也不会给自己提出这些任务；（2）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各种关系内部所具有的一切生活形式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以前是不会死亡的，也不能被其他社会所代替①。从这两项基本原则出发，可以制定出一系列属于历史方法论方面的其他原则。

同时，在研究经济基础的时候，必须区别有机的运动（也就是比较连续的）与那些可以称为"一时的"运动（后者具有偶然的、表面的性质，并且几乎是突然地发生的）。当然，甚至这种一时的运动也以有机的运动为转移，但是它们没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们所造成的是琐碎的、应急的、涉及到个别的不大的统治集团和直接授与权力的人物的政治批评。具有有机性质的过程，则造成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批评；这种批评包括大的社会集团，并且远远超出对个别的直接授与权力的人物和一般统治人物批评的范围。

在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时候，就会显露出这种区别的巨大重要性。我们会发现存在着有时是延续几十年的危机。危机的这种非比寻常的延续性表明在经济基础上开始出现了（成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保持和维护这种经济基础而活动的政治力量却致力于在某种程度上调和并克服这些矛盾。这些顽强而不断活动的力量（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形式永远也不肯承认它已过时），构成那个可以使对抗的力量组织起来的"偶然的"基础。这些对抗的力量

①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页）。

努力证明已经存在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能使一定的历史任务可以而且应该历史地得到解决；它们之所以应该得到解决是因为任何对历史义务的不执行都会加剧必不可免的混乱，并将造成更为严重的灾难。(这种证明归根结底只有在确立了新的现实，只有在这些对抗的力量赢得胜利的场合下才是有成效的和“真实的”，但是在初期它采取意识形态的、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和其他的论战冲突的形式。而这些论战的具体意义以它们的影响的力量以及它们在以前存在的社会力量配置中所能够引起的变革的程度为定)。

在进行历史—政治的分析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不能在那个有机的东西与偶然的东西之间找到正确的对比关系：把那些间接发生影响的原因提出来做为产生直接影响的原因，要么就是肯定产生直接影响的原因是唯一起作用的原因。在一种场合下表现出“经济主义”或学究式空论所固有的极端；在另一种场合下表现出“观念论”所固有的极端。在第一种场合下过高估价了机械的原因，在第二种场合下则赞扬了唯意志论的因素和个人的意义。在任何一种局势下，都必须区别“有机的”和“一时的”或偶然的运动和现象；不仅在那些具有后退及严重危机特点的局势下，而且也要在那些以进步的发展和繁荣为特点的以及那些以生产力停滞为特点的局势下。难于准确地判定两种运动之间的辩证的联系并在研究中把这种联系表示出来；如果发生在历史编纂学上的错误是严重的话，那么在政治艺术上这种错误的性质就更为严重，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恢复过去的历史，而是创造现在的和未来的历史①；自己的愿望和自己的卑鄙的私欲是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因为它们代替了客观的和不偏不倚的分析。这种代替本身并不是有意识地在进行着，以便利用它做为鼓励行动的“手段”，而是自欺的结果。在这种场合下，蛇也同样会咬玩蛇者，换句

话说，蛊惑家将成为自己蛊惑行动的第一个牺牲品。

这些方法论标准在运用到研究具体历史事实的时候，其意义连同它们的全部明显的教育作用可以充分地被揭示出来。把这一点运用到1789年到1870年这一时期法国历史中的事件是有益处的。根据我的观点，为了叙述得更为清楚，必须对整个这一段时期加以考察。在事实上，仅仅在1870—1871年，由于公社的一些创举，1789年所发生的一切就历史地得到了解决；为了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新兴阶级不仅击败了不肯承认自己已经完全过时的旧社会的代表，而且也击败了认为由于开始于1789年的事件而产生的新的基础已经陈旧了的最新的社会集团，从而新兴阶级向旧的阶级和最新的社会集团表明了自己的生命力。此外，从1870—1871年开始，实际上产生于1789年，并且由于1848年革命而在理论上发展了的那一整套政治战略和策略原则，也就是那些归结为"不断革命"②的公式的那些原则就失掉了效力。（考察一下，在玛志尼的战略中，例如由于1853年米兰暴动，利用这一理论的程度，以及是否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是很有意思的）。下面的事实证明了这种意见的正确性：历史家在确定构成法国革命的全部事件的界限时，彼

---

① 考察"力量对比"时，不注意直接政治关系的因素这一事实，是同庸俗一自由的观点的特性相联系的；工团主义也是它的这种表现，即认为自己是一种较先进的理论，尽管在实际上它是倒退了一步。在事实上，认为采取党的组织的各种形式（读报，议会和地方选举，狭义的群众性的党的和工会组织）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庸俗一自由的观点，同工团主义相比是较先进的，因为后者认为主要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且仅仅这些关系具有头等意义。庸俗一自由的观点在隐蔽的形式中也同样重视这些关系（从许多征候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来），但是它更多注意的是那些表现了并在事实上在自己身上体现了其他关系的政治关系。这些庸俗一自由的观点的特性可以在一系列的著作中看到，正如有些人肯定，这些著作是同实践哲学相联系的并且产生了幼稚的乐观主义形式以及形形色色的荒诞的东西。

② 葛兰西在这里使用"不断革命"这一术语是为了指出托洛茨基对于马克思这一公式的错误的解释（也就是作为少数人没有广大群众支持而完成的政治改革）。因此葛兰西把这术语加了引号。——意文版编者

此的看法是极不一致的（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些人（例如，萨尔威米尼）认为革命完成于瓦尔美的胜利：法兰西建立了新的国家并且组织了军事-政治力量，以确立和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另外一些人则断言革命一直延续到热月政变；他们甚至谈到有过几次革命（例如8月10日是一次独立的革命等等）①。

在事实上，仅仅随着第三共和国的建立，1789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法国社会制度的内部矛盾才相对地减弱了，并且在最后六十年中，法国的政治局势在八十年以越来越广泛的浪潮展开的暴风雨般的改革——1789，1794，1799，1804，1815，1830，1848，1870年的事件以后，始终是稳定的。恰好对这些规模不同的"浪潮"加以研究，就能使我们一方面认清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认清在一定基础范围内发生的有机的和一时的运动发展的相互关系。同时可以说，在不断革命的历史一政治公式中，包含着本文开头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上的原则之间的辩证的相互联系。

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关于所谓力量对比的问题。在历史的著作中常常遇到这种一般的说法："有利于（或不利于）某种趋向的力量对比"。这种说法在这样抽象的形式中并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说明什么，因为一切仅仅归结为某一件须要说明的事实要考察两次：一次做为事实，另一次做为抽象的规律，做为说明的本身。因而这里的理论错误在于研究和说明的原则变为历史事件的"原因"。

同时，在考察"力量对比"的时候，应该分出这个对比中的各种

① 见A. Mathiez,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阿·马提亚：《法兰西革命》）（编入阿·柯仑发行的丛书）。

引起最深刻的意见分歧的是对于热月政变和拿破仑活动的评价问题：这里应该不应该谈到革命或反革命的问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革命一直延续到1830，到1848，到1870年或者甚至到1914年世界大战。在所有这些观点中都有部分真理。

不同的因素或阶段，其中主要的是，

（1）与基础密切联系着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可以用精确科学或技术科学所能达到的准确度计量出来的。物质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与它相适应的社会集团存在的基础，这些集团之中的每个集团都在生产中执行一定的职能并占据一定的地位。这些关系是本来有的关系，这是不可改易的现实；任何一个人也不能改变企业的数目和其中的工作人员的数目，城市的数目和城市居民的数目等等。这些做为基础的关系使得我们能确定，在社会中是否存在着改造这个社会所必需的、充分的条件，也就是使得我们能确定在这些关系的基础上由于这些关系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而发生的这个或那个思想体系能够真正实现和实际实现的程度。

（2）下一阶段是政治力量的对比，也就是对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所达到的团结、自觉和组织性的程度的估计。在这些方面也可以分出各种不同的阶段而加以分析，这些阶段符合在这以前存在于历史上的集体政治觉悟发展的各种不同水平。集体政治觉悟的第一个和最基本的阶段是经济—团体阶段：商人认为他应该同其他的商人团结，工厂主认为他应该同其他的工厂主团结以及诸如此类的认识，但是商人还没有感觉到自己应该同工厂主团结。由此可见，同业集团已经认识到同业间的团结一致和建立这种团结的必要性，但是更为广大的社会集团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到了第二个阶段就确立了社会集团所有成员的为了共同利益而团结的认识，但仍限于在纯粹经济的方面。在这个阶段上就已经提出了关于国家的问题，但暂时仅仅是从与统治集团达到政治-法律平等的观点出发；这个社会集团所争取的是参加立法和行政管理的权利，甚至在这些方面实行改变和改良的权利，但是，当然不破坏现存制度的基础。随着第三个阶段而来的认识，是团体的利益本

身由于它们的发展在目前和将来要超出团体的范围，要超出纯粹经济团体的范围并且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其他的从属集团的利益。这一阶段主要具有政治性质并且标示着表现得很显明的由经济基础向复杂的上层建筑的范围的过渡。在这一阶段上，以前产生的一些意识形态变成了“党”，彼此冲突着，加入了斗争，这项斗争一直延长到这些意识形态之一（或最低限度这些意识形态的联合之一）开始成为主导的并努力成为政治的，普及于整个社会舞台。从而，除了确立经济的和政治的任务的统一以外，还建立精神的和道德的统一，而且不是在团体的范围内而是在“普遍的”范围内提出一切围绕着进行剧烈斗争的问题，因而造成主要社会集团对其他许多从属集团的领导权。当然，在这一阶段上，国家被看做一个属于一定社会集团的机构，其使命是创造有利于这个社会集团最大限度发展并最大限度传播它的影响的条件。但是这一集团的发展和它的影响的传播被看做是普遍发展的动力，各种“民族”潜力发展的动力，也就是占优势的集团的利益具体地同从属集团的一般利益结合起来。这时国家的生活被看做是一种过程，其结果经常组成统治集团利益与从属集团利益之间的不稳固的平衡的体系，同时这种平衡的体系会经常在法律范围内打破。在这种平衡的体系中，统治集团的利益占着优势，但仅仅到一定界限，也就是不能足以充分满足小的经济团体的利益的那种限度。

在历史的现实里，这些阶段可以说是在纵横地互相交织着，也就是根据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横的）以及根据领土（纵的）以各种不同方式结合着和分离着，同时每一个这样的联合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自己的组织上定型的表现。必须考虑到，同这些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关系交织着国际关系，结果就产生新的独特的和历史地具体的联合。产生于比较发展的国家里的意识形态在那些发展差一些的国家里传播着，把这些地方的联合吸引到活动里

来。这种民族力量与国际力量之间的对比更由于每个国家中都存在着许多具有特殊经济结构和在所有发展阶段上具有特殊关系的地区而复杂起来：万第那就是这种情况的例子，它是国际反动势力的同盟者并且在法国统一的领土内部代表了这些势力；里昂也是同样，在法国革命时期，这里的力量对比代表了矛盾的特殊的焦点等等。

（3）第三阶段——时时直接取得决定意义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历史的发展表现在经常摇摆于第一与第三阶段之间，其联系环节是第二阶段）。但是这一阶段也不是什么整个的、清一色的，直接具有公式形式的：甚至在它里面也可以分出两个因素来——军事的（狭义的）或军事一技术关系的因素和可以称为军事一政治的因素。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两个因素以最多样化的联合的姿态出现。存在于这个或那个国家与努力取得国家独立的民族之间的军事从属关系，是可以做为典范的典型例子。这些关系所具有的性质不是纯粹军事性质的，这是一些军事-政治关系。而且在事实上，假使从属国家的人民没有在社会方面被分离开，假使他们的大多数不是消极的；那么这种从属关系就无法说明；因此不能只借助一种军事力量就能取得独立地位——为了取得这种独立地位需要军事的和军事-政治的力量。的确，假使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为了开始争取独立的斗争，不得不等待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许可它在狭隘技术的意义上建立自己的军队，那么，这就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即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将会满足建立自己军队的要求，但这只是证明大部分斗争已经过去了，并且已在军事-政治方面取得胜利）。由此可知，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在初期仅仅以“军事-政治的”力量来对抗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的军事力量，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些政治行动来对抗，而这些政治行动可以制约军事性质的现象，这是指它们首先能够引起居于领导地位的民族内

部军事力量的深刻解体，其次能够迫使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广阔的领土上延展散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它们的战斗力而言。可以这样说，在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即黎沙治孟多时期)，由于缺少军事-政治领导，曾产生了致命的后果，特别是对于行动党来说是这样(这是因为它根本无能领导)，但是对于皮埃蒙特的温和派的党① (在1848年以前和在1848年以后)也是这样。当然，这个党缺少这种领导并不是因为无能，而是由于"政治经济的马尔萨斯主义"，换句话说，由于这个党对于可能实现土地改革的问题连听也不想听，而且也不想召开国家立宪会议。它只是力图不要人民方面的任何条件和限制，仅仅根据国内个别地区全民投票结果所通过的简单决议，而把皮蒙特的君主制度推广到全意大利。

同上面所考察的一些问题相联系的还有一个问题：经济危机是不是造成深刻的历史危机的直接原因。在前面的札记里已经含蓄地包含着对这一问题的答复。在那里也考察同一个问题，但只是从其他方面；同时经常必须从教学方法的理由出发和考虑，读者的特殊部分从各方面来考察同一个问题，每一方面就好象一个新的和独立的问题。

可以肯定地讲，经济危机本身不能直接造成主要的历史事件；它们只能创造比较有利的基础，以传布一定的思维方法、提出和解

---

① 温和派(或自由派)——19世纪40年代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资产阶级帝制派右翼的拥护者。温和派力图不使运动变成人民的革命，主张通过朝代战争和外交协定"从上面"解放意大利。大多数温和派力图在皮蒙特君主制度的庇护下统一意大利。——俄文版编者

行动党——1855年马志尼创立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组织。行动党的拥护者坚持在人民群众运动和建立共和国的基础上"从下面"统一意大利的纲领。意大利统一后，行动党解散了；后来，它的一部分拥护者组成了共和党。葛兰西以"行动党"一语标示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派。——俄文版编者

决那些包括国家生活发展整个下一过程的问题的方法。同时，任何一种涉及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问题的论断，都会成为片面评价的理由。马提亚在自己的关于法国革命的历史评论中，与传统的庸俗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先天地“发现”存在着与社会平衡体系的破坏同时发生的经济危机）相反，断定截至1789年国内经济情况十分良好，因此，不能说什么专制国家的崩溃是毁灭性的危机所引起的。应该指出，当时国家处于惨重的财政危机的魔掌下，因而产生了一个问题，两个特权社会等级之中哪一个等级应该牺牲和吃苦以便整顿国家和王国的财政。此外，尽管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繁荣了，城市和乡村的人民群众却陷入了窘困的地步，特别是在那些被普遍的贫穷弄得衰败不堪的城市和乡村里。无论如何，社会力量平衡的破坏并不是一心想消灭这种平衡的并且当真消灭了它的那一个社会集团贫穷化的直接结果、自动产生的后果。这种平衡是在一些冲突中消灭的；这些冲突发生在经济本身的领域之上；这些冲突是与阶级的“威望”（也就是由于争取自己未来的经济利益）相联系的，与争取独立、自主和权力的日益加甚的愿望有关联的。

做为产生新的历史现实的原因的经济衰朽或繁荣的特殊问题，仅仅构成力量在它们的各种不同阶段上的对比的问题的一个方面。新的历史现实既可以因为敌对集团的小气的利己主义威胁着经济的繁荣而产生，也可以因为经济已经衰朽不堪而且没有一种旧的社会的力量能够减弱这种衰朽过程并借助于法律手段以恢复正常状态而产生。于是，可以说，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笼罩着社会力量关系的全部总和的暂时性摇摆的具体表现。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着从社会关系向政治力量的关系、随后向顶点——起决定作用的军事力量的关系的过渡。

假使这个过程在自己的发展中没有经过上述阶段，而且假使在实质上这个过程的倡导者和体现者只不过是一些个别人，他们

的意志和能力，那么情况依然不变。同时可能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要么就是旧的社会从肉体上消灭敌对集团的杰出人物并对成为这个集团的后备军的群众采取恐怖手段而得以保全自己并保证自己有一段"喘息"的时期，要么就是斗争着的力量彼此消灭掉而出现一个死气沉沉的寂静局面，这种局面也许将用外国人的刺刀来维护着。

对于力量对比做任何具体分析的时候，所应该提出的最重要的意见，归结为一点，就是这种分析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成为目的本身（至少对那不写以往历史的人来说是这样），并且只有在它成为实践活动和目的明确的创举的根据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这样的分析能够查明阻力最少的地点，在这些地点运用目的明确的行动可以收到最大的效果；有助于实行具体策略的运用；表明怎样才能最妥善地组织政治宣传，什么样的语言是群众最理解的等等。在任何情况下，决定的因素总是经常起作用的、组织好的和预先准备好的力量，在认清情况有利于此的时候，可以把这种力量推向前进（其所以有利是因为有这种力量存在而且它具有战斗精神）；因此，主要的任务在于一贯地和耐心地形成并发展这种力量，使得它越来越巩固，越团结，越了解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作用。全部战史和在任何时代都表现出来的那种使军队准备随时作战的关心表明了这一点。大国之所以是大国就是因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准备好有效地去干预对他们有利的国际事件，而这些事件之所以对他们有利，也正因为这些国家有具体的可能性来有效地干预它们。

关于根本危机时期政党结构某些方面的意见

社会集团在它们的历史道路上的一定阶段要同自己传统政党

决裂。这就是说，传统的党——连同它们的特定的组织形式，连同那些构成并代表这些党以及领导这些党的一定人物，——不再被看作是阶级的或其一部分的实际表现者。在发生这种危机的时候，情况将会是很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会产生以强力来解决这种危机的可能，会产生神灵人物所代表的黑暗势力行动的可能。

怎样会产生下面这种情况呢，即在党的组织（就狭义而言的党的组织，议会选举区，期刊组织）的范围内“被代表者”同“代表者”之间的不和在所有国家机构内得到反映，从而相对地加强了官僚派（行政的和军事的）、财政上层分子、教会以及一般地所有那些相对地不受舆论影响的机构的权力呢？在每一个国家里，这个过程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尽管它的内容到处相同—统治阶级领导权危机的产生要么就是由于这个阶级在某一项巨大的政治事业（例如战争）中遭到失败，而为了实现这番事业他曾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意或者用自己的势力强迫他们接受；要么就是由于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突然打破政治消极状态而进行一定的活动并且坚持一些要求，这些要求虽然彼此缺少有机的联系但是总起来却成为革命。一般都惯于说“权威的危机”，而这也就是领导权的危机或整个国家的危机。

危机所造成的局面带有直接的危险，因为各种不同的居民阶层并不具有迅速根据事件的步调重新认清方向和重新组织的同样能力。掌握许多训练有素的干部的传统的统治阶级，能够撤换人员和改变纲领并且能够在处于他的权势下的阶级未及重新组织之前重新恢复它的失去的控制；他甚至可以有所牺牲，可以许下一些在渺茫的将来兑现的蛊惑性的诺言。这样一来，他保住了政权，在当时加强了它并利用它来摧毁敌手，驱散敌手的人数既不特别多、锻炼得也不很强的领导干部。

许多党的党员转移到能够很成功地代表和表现整个阶级需要

的唯一的党的旗帜下是一种有机的而且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哪怕这种现象的产生是非常迅速的，与普通平静时期相比几乎是闪电般的。这种转移表明整个社会集团结合起来处于统一的领导之下，而且也只有这种领导才有能力解决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从而消除致命的危险。如果危机的解决不带有这种有机的性质，而是由于一位深谋远虑的领袖的批准，那末这就证明存在着静止的平衡（这种平衡的因素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它的特点是进步力量的不成熟）；这一事实同样证明任何一个集团——保守的也好，进步的也好——都不具备足以赢得胜利的力量，而且甚至保守的集团还须要有一个主子①。

这类的现象是同有关政党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相联系的。这是指党有无能力反对停滞，反对导致僵化和陷入时代错误的倾向而言的。一些党的产生和在组织上的形成，是为了在对他们的阶级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历史时机去领导事件的进展，然而他们并非经常都善于适应新的任务和新的时代，并非经常能够按照某一个国家内部或国际舞台上一般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而按照他们阶级地位的变化）而发展的。在分析这些党的发展情况时，必须特别重视社会集团，党的群众，党的官僚派和党的参谋总部。党的官僚派是最危险的、毫无生气的保守的力量；假使它变成一个团结一致感到自己是独立存在于党的群众之外的集团，那么党本身最后将会落后于时代，将在严重危机中失掉自己的社会内容，就象一个空空的外壳。由于希特勒主义的泛滥，德国一些政党所发生的情况就是明证。法国一些政党就是进行这种研究的良好根据：所有它们都成了木乃伊，落后于时代了，它们好象成了法兰西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历史—政治文件，因为它们在重复这些文件上已经陈旧了

① 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的用语；它们的危机可能比德国党所遭受的危机更为惨重。

在研究这类现象的时候，通常都不注意正确地判定官僚派（行政的和军事的）的地位，除此以外，也不考虑这种分析不仅应该适用于正在任职的军事的和行政的官僚主义分子，而且也适用于在现存国家制度下通常成为官僚派后备力量的那些社会阶层。

政治运动可以带有军事性质，即使军队本身不公开地去参加这种运动；政府可以带有军事性质，即使军队本身在它里面没有自己的代表。在一定的情况下，不使军队"露面"，不使军队超出宪法范围，正所谓不干预兵士们的政治，以便维护军官与兵士之间在似乎是立于政治派别之上的军队有名无实的中立的基础上的团结，可能是有利的；然而，正是军队，也就是参谋总部和军官们来确定新的局面的性质，并在这个局面里起主要的作用。同时，如果肯定军队似乎根据宪法永远也不应该从事政治，这也是不对的，因为正是军队该当维护宪法（也就是国家的法律形式）和宪法所规定的制度。因此，所谓中立只不过是对反动势力的支持。但是在这类的情况下，问题正好是应该这样提出，以便使国内发生的分裂不致波及到军队，以便使具有决定意义的参谋总部的权力不致由于军事机器的解体而从它手里失掉。所有这些看法当然不是绝对的——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在各个不同国家，它们具有各个不同的意义。

首先必须考察下列这一问题：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里有没有广大的社会阶层，对于这个社会阶层来说，升官（行政的和军事的）是他们经济地位和在政治舞台上立脚（哪怕间接地、以"讹诈"手段切实参加政权的一切活动）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现代欧洲，可以把这一阶层同一方面根据工业发展程度另一方面根据土地改革实现程度而或多或少散布于各个不同国家的中农村小资产阶级看成一个东西。当然，升官（在政界和军界）并不是这一社会阶层的专利；然而，无论如何，它对于这一阶层却特别方便，这不仅由于他们所

执行的社会职能，而且也由于这种职能所引起的心理趋向或者是这种职能促成的这种心理趋向的发展。这两种因素使得整个这个阶层达到一定的团结并具有领导的能力，从而确定了这个阶层的政治意义和他常常在整个社会机体内所起的那个决定性作用。

这个阶层的代表具有直接指挥个别人的集团，即使是不大的集团的经验，并且是"政治"指挥而非"经济"指挥的经验，也就是他们的指挥本领不包括"管理事物"或管理具有有机联系的"人和事物"的素养（如在工业生产中那样），因为这个阶层不执行现代意义的经济职能。他们有收入，因为在法律上他们是部分国家土地的所有主。他们的职能是"从政治上"阻止农民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意图，因为农民地位的任何改善都会引起这个阶层的社会阵地的垮台。使农民变得粗野的长期的贫穷和辛苦的劳动是这一社会阶层存在的最必要的条件。这一点正说明他们之所以非常反对和极端仇视建立农民劳动者独立组织的微小的企图以及农民中间任何一种超出官方宗教范围的文化运动的道理。这一社会阶层的局限性和他们固有的软弱性的根源在于他们的涣散性和与这种涣散性有内在联系的"成分复杂性"；这也可以说明他们的其他一些特点：他们所遵循的思想体系是不稳定的和多种多样的，他们有时向之乞灵的那些思想体系是奇奇怪怪的。

为了达到目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意志，但是意志产生影响迟缓，通常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它的组织上和政治上集中化的过程。当各该社会阶层独自有的"意志"与上层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相吻合的时候，这一过程就会加速；但是不仅这一过程加速而已；这一社会阶层的"军事力量"也会突然出现，这个军事力量在组织上形成以后，有时会迫使上层阶级接受即使不涉及解决问题的实质，至少也涉及解决问题的"形式"的法律。如果考虑到从属的阶级，在这里起作用的仍是那些前面已经指出的、表现于城市与乡村之

间的关系上的规律：城市的力量自动成为乡村的力量，但是因为乡村中的冲突由于缺少经济活动的自由余地以及由于经常由上而下的沉重压迫迅速地具有尖锐的“个人”形式，所以这个社会阶层在乡村的“反击”必须是比较坚决的和比较经常的。他们理解并且看到他们的不幸的根源是城市，是城市的力量，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强迫城市的上层阶级解决问题，以便扑灭主要的篝火，哪怕城市上层阶级认为这样做没有直接的必要——不论是因为这样做代价过高，还是因为这样做归根结底是危险的（要知道这些阶级所注意的不仅是直接的“物质的”利益——他们考虑的是比较长期的发展阶段，因为在这时期中可以机动）。正是应该在这种（而不是绝对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社会阶层的领导职能，可是即使这一点也具有不小的意义①。

应该注意的是：假使以前这个社会阶层的“军事”性质通常是他们存在的一定条件的自发的反映的话，那么现在就是有意识地在培养它并努力把它变成这一社会阶层的有机的特点。在这种有意识的运动的进程中，一贯努力建立包括各种部队和兵种的退伍军人和过去的前线战士（特别是军官）在内的各种不同的军事团体作为经常存在的组织。这些团体同参谋总部相联系，他们的成员一有必要就能动员起来，结果就无须根据义务兵役制征兵入伍了；在这种场合下，应征的兵员就可以作为后备军，只有在紧急的时候才加以利用；这个后备军由于受到这些“私人力量”的影响也就会加强起来并且得到不致遭受政治解体的保证，因为这些“私人力

① 在具有保守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右派的思想活动中可以看到这一阶层的影响。在这方面盖·莫斯卡的《统治的理论和议会统治》(Gaetano Mosca, Teorica dei governi e governo parlamentare)（第二版出版于1925年，第一版出版于1883年）一书为例。从1883年开始，城市与乡村之间具有接触可能性这一点使莫斯卡感到惊异。由于自己的防守立场（与“反击”有关的立场），莫斯卡在1883年对于从属阶级政治技术的理解，比几十年后包括城市力量在内的从属力量的代表理解得清楚。

量”在教育着和巩固着军队，也就不能不影响军队的“道德”。可以说，在这种场合下，形成一种“哥萨克”型式的运动，但是部队已经不是象沙皇的哥萨克一样沿着国界而是沿着社会集团的“限界”进行纵深配备。

同时，在许多国家的生活中，军事因素的影响根本不能归结为仅仅一个职业军人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而表现为那个成为职业军人因素（特别是下级军官）形成的主要源泉的社会阶层的影响和作用。所有这些预先提出的看法对于正确地分析那个通常称为恺撒主义或波拿巴主义的一定的政治形式的具有代表性的一面是必要的。这样就可以把这种政治形式同另外一种职业军人因素本身的统治作用在它里面也许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坚决的政治形式区别开来。

西班牙和希腊是既有相似之点又有不同之点的两个典型的例子。必须注意西班牙的一些特点：领土广阔，农民人口密度小。在贵族大地主与农民之间没有人数众多的农村资产阶级；这说明了那个事实：作为独立力量的下级军官的意义很不大。（相反地，特种兵——炮兵和工兵——的军官在内部斗争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这些军官是由城市资产阶级来补充的；这个军官集团是与将军们对立的而且企图实行自己的政策）。因此军事政府在这里是“伟大的”将军们的政府。广大农民群众——正如公民群众和军队——的态度是消极的。假使军队遭到政治瓦解，那么它的发生不是“横的”，而是“纵的”——这是统治集团竞争的结果：军队分裂而归附于彼此斗争的首领。军队政府是两个立宪政府之间的中间环节；军事因素是维护现存制度的经常的后备力量，也是“法律”陷于危险境地时“公开”行动的政治力量。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希腊，但是不同的是：希腊的领土是由个别岛屿所构成的体系，而且全国精力最充沛和最积极的一部分居民

经常在海上，因而使得军界易于组织阴谋和叛乱。希腊的农民也和西班牙的农民一样消极，但是在全体居民中精力最充沛和最积极的人物是希腊水手，他们几乎经常都距离政治生活中心很远。因此，适应希腊的情况，必须以另外一种方法来分析居民的普遍消极态度，而问题的解决在两种场合下也不能一样（几年以前希腊枪决被推翻的政府人员可能须要用这些决心给予血的教训的精力充沛而活动的分子的剧烈冲动来说明）。特别须要强调指出下面事实：希腊和西班牙军事统治的经验并没有能够导致建立在结构上稳定的、成为定形的、包括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想体系，相反地，在那些所谓潜在的波拿巴主义的国家里却建立起来了。这两个国家的一般历史条件是相同的：在进行斗争的城市集团之间所树立起来的平衡阻碍着"正常民主制度"，议会制度的实现。但是乡村对这种平衡所起的影响却各有不同。在象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里，乡村的绝对的消极态度使得出身于贵族地主的将军们可以利用军队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来确立按其后果来说是很危险的平衡，也就是上层社会集团的统治。

在其他国家中，乡村不是消极的，然而在乡村展开的运动却不能在政治方面与城市运动相配合。军队必定是依然保守中立；因为有一种可能，即如果它不保守中立，就要遭到"横的"瓦解（当然，它的中立只保守到一定的时机）；因此，军事官僚派开始行动，他们以军事手段压制乡村运动（直接比较危险的），在这个斗争中达成一定的政治和思想的统一；从受到居住在城市而出身于乡村的大学生支持的城市中等阶层中得到同盟者（这里所谓中等是从意大利现实的观点出发）；迫使上层阶级接受自己的政治方法，而这些上层阶级被迫作出许多让步并且为了军事官僚派的利益实行一系列的立法措施。总而言之，他们能够在一定限度以内使国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并且排挤掉一部分旧的领导干部，占据他们的位置，

依然保持武装（同时其余的却已解除武装）并以内战相威胁，因为假使上层阶级过分顽强地力图抵抗，那么在他们的自己的武装部队与常备军之间就会发生内战。

这些说法不应看成是定而不可移的公式，而应该仅仅看做是进行历史和政治分析的实用指南。对现实做具体分析时，历史现象总是带有自己个别的特点，几乎象是“唯一无二的”特点。恺撒就是与这种具体情况的凑合联系着的，而这些情况又迥乎不同于产生拿破仑一世的那些情况，这正如普里摩·达·利维拉和吉甫柯维奇等等所活动的环境也各有不同一样。

分析在一定情况下形成的力量对比中的第三阶段（或第三因素）时，使用一下在军事科学中称为“战略局势”论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使用一下研究战场的战略准备程度的理论是不无益处的。而战略准备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指挥干部的质量和可以称为第一线力量（包括用于攻击的力量在内）的战斗力的强弱。高度的战略准备可以使那种“在外表上”（也就是在数量方面）比不上敌人的力量赢得胜利。可以这样说，实施战略准备的目的是使所谓“估计不到的”因素化为乌有，也就是把在一定时期来自平时处于消极和惰性状态的力量方面的突然反动的可能性消灭掉。在那些参与准备有利的战略局势的因素之中，正好须要指出在涉及——与国家军队职业机构一起——存在的有关军人等级及其组织问题的评论中所考察的那些因素①。

① 托马措·蒂托尼在《内政目击者的回忆》（T. Tittoni, Ricordi personali di politica interna）（载1929年4月1日—16日《新文选》）一文中对“军人等级”的评论是值得玩味的。他谈到他考虑过一件事，就是为了抵御某一地区的叛乱而聚集力量时，不得不置其他地区于不顾：在1914年7月“红色周”时期，为了镇压昂科纳地方的运动，只得放弃拉文纳地方不管；随后失掉武装力量的市长也被迫躲在市政府里面，置全市于不顾，使暴动者任意而为。“我多次反问过自己，如果在整个半岛上同时发生暴动，政府会有什么办法”。蒂托尼建议政府从过去的前线战士中征集“维持秩序的志愿队”，由退伍的军官统率。当时认为蒂托尼的方案值得考虑，但实际上没有采纳。

1932年5月19日陆军部长盖杰尔将军在参议院的讲话，其中有一段提供了其他因素的概念（载1932年5月20日《晚邮报》）："在我们军队里所确立的纪律在今天由于法西斯主义的意旨成了对于全国都有意义的指导准则。在其他国家的军队里过去存在有严厉的形式主义的纪律并且直到现在还在统治着。我们始终奉行的一项原则就是军队的使命是作战，因而应该作好战争的准备，因此平时的纪律也应该和战时的纪律一样，而且在和平时期应该打好执行这种纪律的精神基础。我们的纪律是以指战员与普通士兵团结一致的精神为基础的，这也就是我们所奉行的制度理当产生的结果。这个制度成功地经受住了长期的和最艰巨的战争，最后达到胜利。法西斯制度的功绩在于它把遵守纪律的堂皇的传统普及到所有的意大利人民身上。战略意图的完成和战术行动的成败系于一些个人能否恪守纪律。战争教会了我们许多知识，也使我们知道了在平时准备与战争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脱节现象。谁都明白，无论准备得怎样好，最初几次战役会向交战双方提出一些使得双方都感到意外的新问题。然而不应从此就做出结论，以为预先制定计划没有用处并且不能从过去的战争中吸取任何教训。根据以往战争的经验可以制定军事学说，这种军事学说应该通过必要的清醒的理智接受下来，做为确定统一观点并确立为大家所理解的并且使大家理解的划一的语言的一个手段。假使军事学说的统一有时会蜕变成为公式主义，那么立即就会引起迅速的反应，这种反应也就毫不延缓地造成战术上的改变，而军事技术上的进步也会引起战术上的改变。由此可知，这种规定不是死的而且也不象有时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具有传统的性质。传统只有到它成为一股力量的时候，才受到重视，条例之所以经常修改并不由于喜新厌旧，而是为了使它们符合现实"（在邱吉尔《回忆录》里关于日德兰半岛战役的一段叙述中可以找到"战略局势的准备"的例证。）

恺撒主义

以恺撒、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克伦威尔等人为例来加以考察。应该特别注意以伟大的“英雄”人物的出现为顶点的历史事件。

可以说，恺撒主义的局面，是彼此斗争的力量处于危急的势均力敌状态，也就是处于继续斗争只有斗争的双方同归于尽这个结局的这种势均力敌状态。在进步的力量甲与反动的力量乙进行斗争时，不仅会产生力量甲战胜力量乙或力量乙战胜力量甲的情况，而且也可以造成这种局势，即力量甲和力量乙都不能胜利而彼此消耗着，这时却从外面闯进来第三种力量丙，它使得甲和乙的残余力量归服自己。豪华的罗伦佐[①]死后在意大利正好产生了这种情况。

恺撒主义经常作为表明力量平衡最没有崩溃危险的历史政治局面的出路；这个出路具有付托给伟大人物去执行的“仲裁”的形式。但是恺撒主义的历史意义并不是经常都一样的：它既可以带有进步性，也可以带有反动性，恺撒主义每一种形式的真正意义归根结底只能借助具体的历史资料而不能根据社会学的公式来确定。当恺撒主义的干预协助进步力量取得胜利，哪怕是借助限制所取得的胜利的意义的一定的妥协和条件时，它是进步的；当恺撒主义的干预协助反动力量取得胜利，同样借助妥协和限制，但在这种场合下这些妥协和限制却具有另外的意义，另外的力量，另外的作用时，它就是反动的。恺撒和拿破仑一世是进步的恺撒主义的实例，而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则是反动的恺撒主义的实例。

---

① 豪华的罗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449—1492）——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译者

问题是要判明在“革命——复辟”的辩证过程中哪一个因素是主要的一革命的因素还是复辟的因素，因为尽人皆知，历史运动不能后退而且也不存在完全的 (in toto) 复辟。同时，恺撒主义这是论战一意识形态的公式，而不是历史说明的准则。情况可以导致建立没有恺撒、没有伟大的“英雄”和代表人物的恺撒主义。

议会制度也建立了实现这种妥协的决议的机构。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一类的妥协。同时，在麦克唐纳主持政府时，恺撒主义的程度增加了，因为这个政府得到议会保守党多数的支持。从 1922 年 10 月到“人民党”分裂时期，尔后又经过很多阶段，一直到 1925 年 1 月 3 日，最后到 1926 年 11 月 8 日，意大利发生过历史一政治运动，内容是以恺撒主义的一些阶段来代替另一些阶段，直到建立起它的最纯粹的和最稳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同样也是非经运动而不停为止。

任何一个联合政府都是恺撒主义的最初阶段，这个阶段可以发展（也可能不发展）到它的最显著的阶段；那些持有庸俗观点的人自然认为联合政府相反地是反对恺撒主义最“可靠的”堡垒。在现代世界中，由于存在着具有工会－经济的和党－政治的性质的广泛的联合，恺撒主义运动的机构与直到拿破仑三世以前所有的相比在多方面是不同的。在与拿破仑三世同时告终的时期中，正规军队（或步兵）在建立恺撒主义时是以决定性力量出现的，而恺撒主义是由于公开的国家政变、军事行动等等的结果而确立起来的。在现代由于存在着带有一些小的公民集团的能拥有的无数财政资金的工会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问题就复杂起来了。党和工会的职员可以被收买或者无须使用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而被恐怖手段所慑服，如像恺撒时代或雾月十八日政变时期所发生的那样。在这些场合下，就会产生曾经由于 1848 年雅各宾党人的公式，也就是所谓“不断”革命的公式而予以考察过的那种局面。现代政治的技

术从1848年以后就根本改变了，这是因为议会制度的流行和具有工会和党的联合形式的政治制度的流行，这是因为国家的和“私的”官僚派广大阶层的形成（“私的”是就政治而言，也就是党和工会的官僚派），而最后这是因为在警察组织方面发生一些改变——这是就广义的警察而言，也就是不能把警察仅仅看做是为了同犯罪行为作斗争而安排的国家职务，而应该看做是国家和私人为了保卫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统治而组织起来的一切力量的总和。就这种意义而言，该当把一系列政党、经济的和其他的组织看成是执行侦察和保卫职务的政治警察机关。

在上面大略提出了力量甲与力量乙可能以崩溃而结束的斗争的公式，也就是可能造成力量甲与力量乙在争取建立（或重建）产生（或能产生）恺撒主义的有机的平衡的斗争中都不能赢得胜利的公式这种公式正是一般的假定、社会学的公式（在政治艺术中是方便的）。这个假定可能愈来愈具体，可能在最大的程度上接近具体的历史现实；用进一步明确一些基本原理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一点。例如，关于力量甲和力量乙，仅仅说其中之一是完全进步的，而另一个是完全反动的，可以进一步明确的说的是哪种类型的进步的和反动的力量。这样就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接近现实。例如，关于恺撒和拿破仑一世可以这样说：虽然力量甲与力量乙彼此有所区别而且互相对抗，但是并没有到这两种力量由于暗中进行的过程而“绝对”不可能结合和互相同化的程度，在实际上也正是这样，至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但是这种程度是以实现历史-政治性质的任务，足以防止主要力量之间的有组织的斗争，足以克服崩溃的局面）。这就是可以使我们比较正确地认识历史现实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崩溃局面之能够产生，只是做为传统统治力量“一时的”政治上软弱的结果，不能做为这个统治力量在政治上已经不能克服的组织上无力的后果。这一点以拿破仑三世为例可以得到证

实。从1815年到1848年，法国政治(党的)方面的统治力量分裂成四个派别：正统王朝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和雅各宾-共和派。各党的内部斗争具有这样一种性质，使得与力量乙相敌对的进步力量"过早"地出头成为可能；但是已存在的社会制度还没有竭尽自己的发展可能，这一点被尔后历史的进程非常明显地表示出来。拿破仑三世以自己的一套方法表现了（适应这位根本不是什么伟大人物的才能）隐蔽的内在的可能。因此他的恺撒主义具有特殊色彩。恺撒所建立的以及拿破仑一世所建立的恺撒主义带有所谓数量-质量的性质，也就是在它里面表现了一个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完成了从一种国家型式向另一种国家型式的过渡，而这种过渡带有为数极多的和多种多样的改变，从而总起来即标明了完全的变革。至于拿破仑三世的恺撒主义，则带有狭隘数量的、并且是局限的性质，没有伴随从一种国家型式向另一种国家型式过渡，只不过是同一类型国家沿着一条绵延不断的路线"进化"而已。

在现代世界中，恺撒主义的现象一般地带有特殊性质，既有别于进步的恺撒主义（恺撒——拿破仑一世），也不同于拿破仑三世那种类型的恺撒主义，尽管我们这个时代的恺撒主义现象接近后者。在现今的时代里，在哪怕经过艰苦和流血的过程但归根到底却能够合而为一的力量之间建立不起来带有崩溃可能性的平衡；这种平衡现在只能在历史地被不可调和的矛盾分开的力量之间建立起来，同时它恰好由于建立恺撒主义制度的结果而会特别加强。而且即使在现今的时代里，也有或多或少比较广阔的一定的活动余地(以国家的性质和这个国家在世界结构中所占的地位而定)以发展恺撒主义，因为这个社会形式"经常"具有尔后继续发展和在组织上形成的潜在的可能性。这个社会形式可以把希望特别寄托在与它对立的进步力量的相对的软弱性上面。这种力量之所以是进步的，是由于它的本质本身和它存在的特点，而这个社会形式所

关心的是保持这种力量的软弱性。因此，人们也就这样说：当代的恺撒主义其性质毋宁是警察的而非军事的。

假使我们承认在恺撒主义——进步的也好，反动的也好，或是带有非固定的中间的性质的也好——时期，新的历史现象是整个地和完全地被“主要的”力量的平衡所引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犯方法论方面的错误（指社会学的机械论而言）；必须在这些力量之外看到那些把基本阶级的主要集团同那些被领导的或受到这种领导的影响的辅助力量联系起来的关系（各种不同性质的关系——社会-经济的和技术-经济的关系）。例如，假使不研究军事集团的作用和法国农民的作用，就不会理解12月2日（1851年）国家政变的本质。

从这一观点出发，由于德雷福斯案件而在法国展开的运动是重要的历史插曲。这一运动也应该根据这种看法来加以考察，但并不是因为它导致“恺撒主义”，而相反地，正因为它摧毁了想要建立恺撒主义的明显的反动形式的企图。虽然如此，营救德雷福斯的运动是一种具有突出的特点的运动，因为统治集团本身里面的人物参加了这一运动，他们阻止了这个集团本身的一部分最反动的人物建立恺撒主义，同时他们没有倚靠农民，倚靠乡村而倚靠依赖他们的奉行改良主义社会主义的城市分子（但也倚靠一部分比较先进的农民）。同样也可以指出其他的与德雷福斯运动相类似的现代历史－政治运动。当然，这些运动不是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反动的，至少它们消灭了统治阵营里面的反动的国家特点，而且使数量上比以前更为众多的新干部参加了国家生活和社会活动。这种运动甚至能具有相对“进步的”意义，因为它们证明了在旧社会内部隐藏着有旧的统治集团不会加以利用的富有生命力的力量，哪怕这些力量是“次要的”，而不是绝对进步的，因为它们不能“创造时代”。这些运动在历史方面之所以是有成效的，是由于对抗力

量的结构上的软弱性，而不是由于本身内部的力量；这样看来，这些运动是和斗争力量之间的平衡的那种程度相联系的，即其中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在自己的阵营里表现真正创造性的意志的那种程度相联系的。

政治斗争和战争

假使在战争进程中达到了战略的目的，击溃了敌军并占领了敌人的领土，那么战争就要以和平结束。不仅如此，为了结束战争，只须假想地达到战略目的就够了，也就是只要能造成一种敌军无疑再也无力作战，而胜利了的军队无疑"有力"占领敌人领土的局面就够了。

政治斗争却不可估计地更为复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它同以往的殖民战争或侵略战争相比，那时战胜了的军队对全部或部分征服的领土建立了（或准备建立）长期的占领。在这种场合下，战败了的军队解除了武装并且解散了，但是斗争却在政治的基础上并以军事"准备"的形式继续下去。

例如，印度反对英国人的政治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德国对法国的斗争，或匈牙利对小协约国的斗争亦然）采取了下列三种战争形式：运动战、阵地战和地下战。甘地所领导的消极抵抗运动是一种阵地战，它到一定时机转变为运动战或地下战。抵制是阵地战，罢工是运动战，秘密准备军队和突击人员则是地下战。最后一种战争是"敢死队"[1] 运动的形式，但是它在运用上非常小心。假使英国人确信正在酝酿着目的在于消灭他们的现在的能扼杀群众的战略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他们有可能沿着内部

[1] "敢死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意大利军队特种突击部队的义勇兵士。——俄文版编者

交通线机动，并且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有时"成为最危险的地点上）的强大的暴动，——一种迫使英国人把自己的力量分散到全国同时变成的整个战场上的暴动的话，那么在这种场合下，对英国人来说有利的是挑拨印度人的战斗力量过早出动，以便使这些力量暴露自己并使得总的运动失掉领导。与此相同，对法国有利的是德国右翼民族主义党派参加进行国家政变的冒险的企图，这样会迫使那些已经怀疑其秘密存在的军事组织过早出动，从而能够开始从法国人的观点来看是非常适时的武装干涉。

这就是为什么在基本上具有军事性质、但主要表现在政治形式（任何一种政治斗争经常有军事斗争做为自己的最初基础）上的这种混合形式的斗争中使用"敢死队"时，要求发展独创的战术，为了给这种战术找到理论根据，战争的经验只能成为一种刺激，但是不能做为典范。

应该特别考察一下关于巴尔干科密塔治兵团① 的问题。这些兵团的存在是和国家的特殊物理一地理条件，是和农村阶级的形成，以及当局的实在力量的性质相联系的。这也同样适用于爱尔兰支队，它们的组织形式和它们的斗争形式都是和爱尔兰社会结构的性质相联系的。应该把关于科密塔治兵团、爱尔兰支队和其他的游击战争的形式问题同"敢死队"运动的问题区别开来，尽管骤然看来，它们之间存在有相同之点。

上述形式的游击斗争是弱小的，却是顽强不屈的少数对组织得很好的多数进行的。同时，做为现代的"敢死队"运动其前提是巨大后备力量的存在，这些后备力量由于各种不同原因没有被利用起来，但具有强大的潜力，它们支持着这种运动并通过个别个人支援的办法加强这种运动。

① 科密塔治兵团——十八——十九世纪巴尔干斯拉夫民族反抗土耳其压迫者而进行的游击式解放斗争的参加者。——俄文版编者

不正确地理解1917—1918年"敢死队"同正规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使而且在实际上已经使政治领导者提出发展政治斗争的错误计划。第一，他们忘记了"敢死队"只有战术上的用途，而且它的先决条件是存在有尽管实力不大但并非绝无声气的军队，因为即使纪律和士兵松懈了，并在这种状态中延续到制定出新的战术部署，那么纪律和士气不管怎样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而这种程度恰好符合新的战术安排；否则结果只有溃逃，而别无出路。其次，他们没有考虑到，不应该把"敢死队"运动看成是军队的一般战斗力的证明，而相反地，它是这个军队消极和军心相对涣散的表现。

上面所讲的一切，隐蔽地包含着一般的准则，就是应该经常以清醒的头脑(cum grano salis)去比较军事艺术与政治，也就是这种比较只能做为对于思想和对于形成三段论法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便于用归谬法(ad absurdum)来证明。事实上，在政治的"民兵"的实践中，对于那些犯错误的或不绝对服从的人并不实行严厉的惩罚性的制裁；并没有野战法庭，更不用说政治力量的组织其性质甚至远远不能和军事力量的组织相比了。

政治斗争除了运动战和包围战(或阵地战)以外，还有其他的形式。真正的"敢死队"运动，也就是现代的"敢死队"运动是阵地战所固有的，这在1914—1918年期间是看得很清楚的。但是在以往时代的运动战和包围战中也在某种意义上有过"敢死队"：轻重骑兵，狙击兵等，而机动力量一般地都部分地执行了这种突击部队的角色；例如，在战斗警戒的组织艺术中就包含了现代"敢死队"运动的萌芽。这种运动的萌芽在更大的程度上不是包含在运动战中，而是包含在包围战中；因为它必须组织更广泛的警戒勤务，特别是它须要组织突然出击和出其不意的冲锋，要有专门选拔出来的人参加。

还须要记住在政治斗争中不该抄袭统治阶级的斗争方法，否则很容易坠入圈套。这一点往往从现代斗争的经验里得到证实。削弱了的国家机器和削弱了的军队一样；在这种场合下，就要出现"敢死队"，也就是独立产生的武装组织，它们抱有双重目的：利用非法行动做为改组国家的手段，同时又要使国家本身在合法范围内活动。假使认为可以用其他组织的类似行动来对付这些组织的非法行动，也就是可以借助"敢死队"的突击队伍来同另外一方的突击队伍做斗争，那就是愚蠢的；假使这样认为，那就是相信国家将永久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而这在事实上是决不会有的（何况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情况）。

各阶级的处境使得它们的可能性也根本不同：一个阶级的成员每天不得不劳动若干小时，那么这个阶级就不可能有常备的和专门的突击队伍，可是一个阶级拥有大量的财政资金而且它的成员又不受经常工作的束缚，就有这种可能性。这种具有职业性的突击组织不分昼夜随时都能出其不意地进行坚决的打击。这样看来，突击队伍的战术对某些阶级有作用，但对另外某些阶级就不会有同样的意义；某些阶级必须进行运动战、机动战（因为这对我们是方便的），这种运动战在政治斗争范围内是有用的，而且和使用"敢死队"战术配合使用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依照军事方式去进行，那就是做了愚蠢的事，因为在这种场合下应该把政治措施放在军队本身之上，而且也只有政治才可以造成机动和运动行动的可能。

从上面所讲的来看，在具有军事性质的"敢死队"运动中，应该区别作为与现代阵地战相联系的特种部队的职能的它的技术职能和它的军事-政治职能：参加世界大战的各国的军队中都有过"敢死队"这样的特种部队；在那些政治方面软弱而且也不能团结一致的国家里，"敢死队"运动执行了军事-政治职能；而政治方面软弱，

和不团结的表现是这些国家的军队战斗力低弱，参谋总部在其活动中变成了一种官僚主义的和僵化了的组织。

为了把军事艺术中关于进行运动战和阵地战的概念同政治艺术中所运用的同样概念加以比较，应该提一下1919年克·阿勒撒得里译成意大利文（从法文译出）的罗莎①所写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试图从理论上总结1905年的历史经验；但是这件事她做得有些匆忙，甚至还有些肤浅。在事实上，罗莎忽略了“志愿”和组织的因素，这些因素在那些事件的进程中传播得相当广而且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罗莎由于她本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经济主义”和自发性的成见所能估计的。尽管如此，这本小册子也和同一作者的其他的短论一样，是从理论上探讨如何把运动战运用到政治艺术上的最具代表性的文件之一。把直接的经济因素（危机等）看成野战炮兵，它在战争进程中把敌人的防御阵地打破一个缺口，足以使军队突入并达到最后的（战略的）胜利，或至少达到从制定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很重要的战果。

当然，在历史学中，把直接经济因素的作用看成是一种远比运动战中重炮兵复杂得多的因素，因为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这一因素将带来三重结果。首先它被看做是一个能在敌人防御阵地上打开一个缺口的因素，因为它已经造成敌人内部的混乱，使敌人对本身，对自己的力量，对自己的前途失掉了信心；其次它被看做是一个闪电般组织起自己的军队的因素，造成自己的干部或者至少使得已有的干部（以前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养成的）能立即各就各位把分散的部分集合在自己的周围的因素；第三，它被看做是一个在的追求的目的一致的基础上的一时的思想统一的因素。

---

① Rosa Luxemburg, Lo sciopero generale.—Il partito e i sindacati, Società Editrice«Avanti!», Milano, 1919〔罗莎·卢森堡：《总罢工。党和工会》〕——意文版编者

这样看来，这是一种坚决的经济决定论的形式，由于通常认为它的行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表现得非常迅速，而更为加深了；这样看来，这是最名符其实的历史神秘主义，是相信出现一种能创造奇迹的力量。

克拉斯诺夫将军在其长篇小说①里断言协约国不愿俄罗斯帝国战胜，是由于顾虑这种胜利似乎不会导致东方问题有利于沙皇俄国的彻底解决，并且似乎要迫使俄国参谋总部进行阵地战（这样做的确是荒谬的，因为由波罗的海到黑海是一条漫长的战线，地域辽阔，满布沼泽和森林），唯一可能的是运动战，——这种断言是纯粹的无稽之谈。实际上俄国军队曾企图进行运动战和进攻战，特别是在奥地利地区战线（以及东普鲁士），其战果虽辉煌，但却昙花一现。真理在于不能依照自己的愿望选择某一种作战形式，更不能依照自己的愿望立即取得对敌人的压制优势；大家知道，参谋总部由于不愿承认阵地战是作战双方力量一般对比"迫使进行的"而表现的顽强态度，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在事实上，阵地战并不只是堑壕战；它决定于作战军队后方地区整个那一套组织系统和工业系统。其中属于这方面的有大炮、机关枪、步枪的射速，军队在一定地点的集中，更不用说那种在被击溃或撤退后能迅速地补充物质上的损失的不断的供给。另外一个因素——这是广大群众（具有不同的战斗力），他们参加编制而且只能做为群众而行动。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在东战场上突破德国战线是一回事，而突破奥国战线又是一回事，甚至奥国战线得到德国精锐部队的加强并转入德军统率以后，进攻的战术依然遭到失败。在1920年波兰战争时期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当时表面上看来不可遏止的进攻却被魏冈将军在华沙城下法国军官所指挥的一线上阻止住了。但是

① Pietro Krasnov, Dall'aquila imperiale alla bandiera rossa, Firenze, solani, 1928〔彼得·克拉斯诺夫：《从帝国之鹰到红旗》〕。——意文版编者

现在由于阵地战而谈到的以及前面由于运动战而谈到的这些军事技术因素的存在当然并不表明应该把以前的型式看做是被科学推翻了的东西。这些因素的存在只不过证明在工业水平和公民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场合下应该把这个型式的意义看做是限于执行与其说是战略的职能不如说是战术的职能，而且应该以当初与运动战相比较考察包围战的那个角度来考察它。

在政治艺术中和政治学中也应该做同样的限制，至少对于比较发展的国家应该这样，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市民社会”变成了很复杂的结构，能够经受直接经济因素(危机，萧条等等)的灾祸性的“侵袭”：在这种场合下，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起的作用好象现代战争中的堑壕配系。在这种战争中，看上去一定能够消灭敌人全部防御配系的猛烈的炮击事实上只能破坏它的外部掩蔽工事，因而在冲击和进攻的时候，进攻者所面临的是依然具有威力的防线。在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在政治方面也会有同样的现象：尽管危机后果严重，进攻者既不能迅雷不及掩耳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把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更不能取得进攻的精神；而被攻击者也不会士气涣散甚至在废墟中也不停止抵御，而且对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前途也不失掉信心。当然，情况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有一点也是事实，那就是所发生的事件的不够迅速，进度不快，没有明显的进展，而在这种场合下政治独裁的战略家大概是希望这样的。

这类政治现象的最后表现是1917年事件。它们标示了政治艺术史和政治学史中决定性的转变。这样看来，问题在于应该十分深刻地研究市民社会中什么样的因素符合阵地战中的防御配系。我特意强调深刻研究的必要性，因为这些因素固然被研究过了，但都是从肤浅的和庸俗的出发点来研究的（正如一些服装史专家研究了妇女奇装异服的改变一样），要么就是从“理性论”的观点来研究的，也就是肯定某些现象一经得到“理性论”的解释就会消灭，好

象是民间的迷信一样(其实，即使它们得到科学的解释也根本不会消灭)。

应该考虑一下那个布朗斯坦的声名狼藉的不断运动的理论①是不是政治上的运动战理论的反映（关于这个问题必须回忆一下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的意见）而归根结底是不是下面这种国家的一般经济—文化—社会条件的反映：这个国家里面的管理国家生活的干部还处于萌芽而微弱的状态，不能起到"堑壕"或"堡垒"的作用。在这种场合下，大可以这样说：布朗斯坦表面看上去是个西欧主义者，而事实上却是个世界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只表面上是个民族人物，而他的西欧主义和他的欧洲主义同样是表面的。相反地，伊里奇是个深刻的民族人物，而他的欧洲主义也同样深刻。

布朗斯坦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有人对他说只有过了……十五年以后才弄清楚他的理论是正确的。其实他那套理论无论十五年前，无论十五年后都不是正确的；正如基查第尼所讲到的那些顽固的人物一样，他一般地并且笼统地做出了预见，也就是他在一般的实际预见中是正确的。照他这种方法同样可以预见一个四岁的女孩子将要做母亲，当她到了二十岁确实做了母亲的时候，就说："这一点我预见到了"，可是不再提起这个女孩子四岁的时候，打算强奸过她，希望她会做母亲。

我以为伊里奇了解到必须把1917年在东方胜利运用过的运动战改为阵地战，因为阵地战在西方是唯一可能的，（正如克拉斯诺夫指出的）这里军队可以在不大的地区集中无数的弹药，而且这里的社会干部本身还能够起到强大工事的作用。据我看，这也就是实现"统一战线"的公式，而这个公式正符合协约国在福煦统一指挥下的统一战线的观点。只是伊里奇没有时间把自己的公式再

① 指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意文版编者

深入一步；但是应该估计到的是他只能在理论上把它深入一步，而主要任务是具有全国性质的，也就是这个任务要求侦察领土并查明市民社会中那些可以起到类似堑壕和堡垒作用的因素等等。

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固的链条；当然这个或那个国家都是如此，只是程度大小不同。正是这个问题应用到每一个国家去时要求加以仔细的分析。

可以把布朗斯坦的理论拿来同一些法国工团主义者所提出的总罢工理论加以比较，也可以同罗莎在阿勒撒得里所译的那本小册子里陈述的理论加以比较。同时，她的理论和她的小册子带有法国工团主义者影响的痕迹，这一点从罗斯麦尔在"工人生活周刊"上所发表的探讨德国问题的几篇论文中可以看得出来（第一组论文出了小册子）；其中还有一部分也是同自发性理论有联系的。

消极革命的论点

"消极革命"的论点应该根据政治学的两个主要原则确定下来。这两个原则是：第一，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在它的生产力仍旧有可能继续进步发展之前是不会消灭的；第二，社会不会提出用以解决的必需条件还没有成熟的那些任务。自然，这两个原则首先应该清除掉任何机械论和宿命论的杂质而且在各方面得到批判的发展。这两个原则应该归结于考察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关于"形势"的问题或关于力量平衡体系的问题；第二，关于政治力量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予以最大的注意；第三，关于军事-政治力量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特殊意义。可以指出的是毕撒堪涅在其《革

命论纲》里所探讨的正是这第三个问题，他和玛志尼不同，他明白在意大利有一支很有锻炼的奥地利军队这一事实的全部重要性，因为这支军队随时能够侵入半岛的任何一个地区，它后面除了其他一切之外，还有整个哈布斯堡帝国的军事威力，也就是后援基地随时准备派出新编军队来支援它。

也须要记起另外一个历史现象——罗马帝国内部基督教的发展——以及与此有联系的现代印度的甘地主义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对于恶的不抵抗的理论。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处于最初发展阶段上的基督教的那种形式(在米兰勒令公布以前)。甘地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是"消极革命"理论的素朴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表现。也应该指出一些所谓"取消派分子"运动和他们所引起的那些反应——根据上述形势的时间和形式而定（特别是根据第三种类型的形势而定)。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应以古奥科① 的论文为出发点。但是毫无疑义，古奥科对 1799 年那不勒斯革命所抱的观点也只能做为出发点而已，因为从那时起这一论点已经丰富了并且完全改变了。

可不可以把古奥科运用到意大利第一次复兴初期的那种意义上的"消极革命"的论点同"阵地战"论点并列而与运动战对立呢？换句话说，在法国革命以后产生的这些论点以及蒲鲁东—乔别蒂两位一体的论点能不能用 1793 年的恐怖所造成的张皇失措来说明，而索勒尔主义能不能用 1871 年巴黎屠杀以后的张皇失措来说明呢？再换句话说，阵地战论点与消极革命论点之间是不是绝对等同？或者至少存在不存在整个一段历史时期(或者：可不可以假定这个时期的存在，在这个时期中两种论点都应该被承认是等同

① 古奥科，温岑卓(1770—1823)意大利资产阶级历史家、政论家和政治家。曾参加 1799 年那不勒斯革命。——俄文版编者

的，一直到阵地战变为运动战这个时机为止？

有一种"动的"观点，应该把它运用到"复辟"上；后者根据这个观点是"命运的转变"，这是指维科①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而言。问题在于：加富尔和玛志尼两个人在那个发生于他们彼此之间的斗争中是不是同样必要呢？在这个斗争中加富尔体现了消极革命、阵地战，而玛志尼却体现了人民的主动精神、运动战？必须经常考虑到加富尔是能够理解自己的使命的(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因为他了解玛志尼的使命所在，可是，据我看，玛志尼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也没有意识到加富尔的使命。相反地，假使玛志尼对使命有这样的了解，也就是是个实在的政治家，而不是宣教的使徒(换句话说，如果玛志尼不是玛志尼)的话，那么由于两派活动的结合而造成的力量平衡就会有所不同，就会对玛志尼派更为有利；换句话说，意大利国家就会建立在更为现代的而不是那样落后的基础上面了。由于在任何历史现象中几乎经常都会产生这种情况，所以应该考虑一下，能不能从这一事实中得出一种政治学和政治艺术的一般原则。

对于消极革命的论点可以应用说明那些在实际上能够导致原来力量对比的迅速变化并变为新的变化的根源的潜在变化的准则(从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的事实中能够证实应用这一准则的可能性)。例如，在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就可以看到：在1848年以后越来越多的行动党的拥护者转到加富尔派方面来，因而造成了温和派力量构成的迅速改变；一方面它造成了新戈威尔夫派②的

① 维科(1668—1744)——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天主教拥护者。他创造出形而上学社会发展循环说，认为人类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和暂时的进步以后，还要回复其最初情况。——译者

② 新戈威尔夫派——十九世纪前半叶产生于意大利的政治派别。它的著名的代表人物是乔别蒂。他主张以联邦的形式把意大利和各国统一起来，由教皇领导。——俄文版编者

消灭，另一方面它造成了玛志尼运动的衰落（加里波的等的动摇也和这一过程有关）。这样一来，这个过程就成了后来被人称为“变形”①的那个现象的开始阶段，而这一现象做为历史发展的形式其意义直到现在看来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阐述。

应该坚决地发挥上述的原理，它的意义在于正当加富尔意识到他所面临的使命的时候，因为他批判地接受了玛志尼的使命，而玛志尼却没有很好地了解或者根本没有了解加富尔所面临的使命；并且在实际上对于自己的使命也了解得不够明确；因此他才产生了动摇（例如在米兰“五日革命”②时期以后以及在其他场合）而且没有即时地企图掀起暴动，因而上了皮蒙特政策的圈套。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在《哲学的贫困》里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应该怎样理解辩证法；辩证矛盾的每一方都必须努力保全自己并把自己的一切政治的和精神的“潜力”用到斗争里面来——这一点无论蒲鲁东还是玛志尼都没有了解到。可以说，乔别蒂和消极革命（或“革命——复辟”③）的理论家也没有了解到这一点。但是在这个场合下问题有所不同：他们的理论上的“不了解”是“正题”所存在的必然性的实际表现，即必须完全发展自己，直到能够吞没一部分反题为止。使反题无法“超越”自己〔正题〕。从他们的观点出发，在辩证的矛盾中只有正题在实际上发展自己所有的斗争能力，直到把所谓反题的代表拉到自己这方面来为止；消极革命或革命——

① “变形”——意大利资产阶级那些“左派”分子的政策，他们害怕意大利统一后人民运动高涨，逐渐放弃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共和主义观点，不停地向右演化（“变形”），变成了反动派和君主专制的拥护者。——俄文版编者

② 米兰“五日革命”——1848年3月18日—22日米兰人为了反抗奥地利军队而掀起的英勇的暴动，为1848年伦巴迪革命奠定了基础。——俄文版编者

③ 应该翻阅一下政治哲学研究者笔下那些探讨1848年的政治著作中对这一问题说些什么，但是我认为收获不会很大。例如在考察意大利事件时，这种政治著作的代表人物只不过是追随鲍尔顿·金格等等的著作。

复辟恰好就在这里。

毫无疑义，应该从这个观点来考察政治斗争中所发生的转变问题，——从“运动战”向“阵地战”的转变问题。这种转变于1848年以后在欧洲发生了，它没有被玛志尼和玛志尼派分子所了解，但却被另外一个阵营某些人物所了解；在1871年以后，这样的转变也发生了等等。在那个时代，象玛志尼那样的人物难于了解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当时战争没有向他们呈现类似的型式；不仅如此，在这个时期军事科学所制定出来的学说是以运动战为背景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看一看毕撒堪涅——玛志尼派军事理论家——的著作里有没有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

对于毕撒堪涅应该予以特别仔细的注意，因为他是唯一企图赋予行动党以真实的、深刻的而非形式的内容的人，是唯一企图把行动党变成克服传统态度的反题的人。无庸赘言的是：为了完成这种历史任务必须有人民的坚决的武装暴动，而玛志尼是完全充满了这种思想的。但是这点正好表现他不是作为现实主义者而是以传教士—使徒的身份来对待这种暴动的组织问题的。

人民的干涉当时固然没有能够形成集中的和同时发起的暴动，但是也没有采取“散漫的”、“毛细管式的”间接压制的形式，尽管这种形式在当时是可能的而且可以成为暴动的必要前提的。人民的干涉之所以没有能够形成为集中的和同时发起的暴动、只是部分地由当时军事技术状况所决定，使这种干涉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对暴动进行长期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准备。这种准备会有机地鼓起人民的热情，从而使得全国集中力量和爆发暴动成为可能。

在1848年以后，只有温和派批判了革命失败以前所运用的方法，于是他们的阵营果然全部刷新了：清除了新戈威尔夫派，新的人物占据了最重要的领导位置。相反地，玛志尼派这方面就没有进

行任何自我批评。只是做了取消主义的自我批评，表现为许多信徒都抛弃了玛志尼而组成了皮蒙特党的左翼。唯一的"正统的"企图，也就是在玛志尼派本身范围内所采取的企图就是毕撒康涅的著作，然而这些著作根本也没有成为新的根本政策的纲领。尽管玛志尼自己承认毕撒康涅掌握了意大利民族革命的"军事概念"。

在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消极革命"和阵地战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可以从其他一些方面加以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可以称为革命力量的"聚集"问题。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干部问题可以拿来与发生于世界战争时期现役军官及预备役军官这方面同征募的新兵及志愿兵——"敢死队"——那方面的相互关系上的同样的问题相比。在第一次复兴时期与现役军官相符合的是传统的、主要的、经常活动以及诸如此类的政党，它们在行动时期(1848 年) 表现出自己完全或几乎完全无能而在 1848—1849 年被人民的、玛志尼派民主运动所淹没，——这个运动固然是混乱的、没有组织好的，所谓"临时凑成的"，但是这种运动虽然是由未经训练的或几乎未经训练的领袖们(总归不是象温和派的党那样预先建立好的组织领导，却无可争论地获得了比温和派更大的成就：罗马共和国和威尼斯表现了很大的抵抗力量。在 1848 年以后，通过加富尔和加里波的安排好了两种力量——正规的力量和"自发"的力量——之间的联系，因而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尽管以后仅仅为加富尔一个人据为己有。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聚集"革命力量的问题。应该指出的是使玛志尼派所采取的措施经常遭到粉碎的那个技术困难正是革命力量的"聚集"。从这个观点出发，引人注意的是研究拉摩里诺将军① 所采取的突入萨伏依的企图以及随后班第

① 拉摩里诺(Раморино, Феличо 1790—1849)——参加意大利民族运动，与玛志尼联合，指挥 1848—1849 年许多战役，因诺瓦拉之役战败而被处决。——译者

亚拉兄弟[①]、毕撒堪涅等的远征，把他们当时所处的条件同玛志尼1848年在米兰以及1849年在罗马所遭遇的但是没有能够加以利用的境况加以比较。这些人数不多的集团所采取的企图不可能不在萌芽时期就被压制下去。假使集中起来的可以任意行动（也就是没有遇到任何象居民广泛运动那样的抵抗）的反动势力没有能够破坏象拉摩里诺、毕撒堪涅和班第亚拉兄弟远征那样的企图，哪怕这种远征比实际上准备的好得多，那就可以算是奇迹了，到了第二个时期（1859—1860年），加里波的的“千人团”那种革命力量的“联合”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由于加里波的加入了皮蒙特的军队，随后是由于英国舰队在实际上掩护了在马尔萨拉的登陆，协助他们占领了巴勒摩，使波旁王朝的舰队无能为力。在米兰“五日革命”以后，在罗马共和时期玛志尼本来大概有可能建立基地进行有机的联合，但是他没有企图这样做；因此也就产生了他同加里波的在罗马的冲突，而他在米兰的行动同卡塔尼奥及米兰民主集团相比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无论如何，意大利第一次复兴运动的发展在实际上是由传统的有机的力量完成的，也就是由早已形成的具有训练有素的领导者等等的党派完成的，尽管这种发展也表现出了由偶然的未经训练的（以及诸如此类）首脑所领导的群众“蛊惑性”运动的特殊意义。所有这一类型的政治运动结局都是如此。例如1830年法国奥尔良派压倒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的人民力量；在实质上1789年法国革命结局也是一样：拿破仑归根结底体现了主要的资产阶级力量对小资产阶级雅各宾力量的胜利。在世界大战进程中，这一点表现在老的现役军官对预备役军官所占的优势中等等。无论如何，激进的人民力量由于不了解与他们敌对的党派的使命，也就妨

---

① 班第亚拉兄弟（Bandiela, Attilio 1811—1844；其弟 Emilio 1819—1844）——意大利爱国者，反对奥地利统治，后被出卖，被捕而处决。——译者

碍他们充分认识自己的使命，从而妨碍他们根据他们干预事件的效果，从而根据他们促使取得更重大的成就（所谓更重大的成就就是进步性更大而且更符合现代精神）的效果而形成的力量的最后平衡中起重大的作用。

在考察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产生的"消极革命"或"革命-复辟"的时候，必须经常考虑到的是：为了这一点必须正确地提出问题，这个问题某些历史编纂学派的代表称它为伴随历史事件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相互关系问题。十分明显，所谓主观条件有时可能在具有客观条件时不存在，因为问题只不过是教育方面的区别；因此关于主观力量大小的问题，关于它们的效果问题，从而关于彼此对立的主观力量的辩证的相互关系问题，都可以成为辩论的对象。

不应该使得这个问题从"理智主义"的角度上提出来；应该在历史-政治的界限内来考察它。在斗争界限的观念上，理智的"明确性"是必要的；这是大家公认的，但这个明确性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它将成为广泛传播的热情并且成为建立坚强意志的前提。近来在许多探讨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的著作里"发现了"在当时曾有过很有远见的历史人物（例如，可以指出彼耶洛·戈别第对于奥尔那托[①]的评价）。但是这些"发现"不攻自破，正因为它们是被发现的；它们证明有个别人正用心钻研——他们属于"事后聪明"一类的人物。这些发现确实有时候企图否认现实，有时候它们成为人民-民族意识的普遍的和积极的形式。在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谁掌握了确实有把握的"主观力量"——温和党还是行动党？当然是温和党，这正是因为他们原来就已了解行动党的使命。由于这种了解，他们的"主观主义"在质量上才是比较高的也是比较

① 奥尔那托，路易（1787—1842）——意大利文学家和哲学家。——俄文版编者

坚决的。

在"行动党是我们囊中之物"这句话里（哪怕这句话是维克多·埃曼努依尔第二那位军士吐露的也好）所包含的历史政治意义比玛志尼的一切议论里所有的历史政治意义都大。

论 官 僚 派

1. 在经济政治形式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常任"官员，他们专门适应官僚机关的工作（民事的和军事的），这个事实无论在政治这门科学里，还是在国家形式的历史里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问题在于是一种必要，还是如"纯粹的"自由派所设想的同自治(selfgovernment)相比是降低一格呢？无可争论的是每一个社会的和国家的形式都具有它自己的官员问题，有它自己的提出这个问题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它自己的挑选体系，有它自己应予以培养的官员类型。

描述所有这些因素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官员问题部分地同知识分子问题相一致。但是，如果说任何一个新的国家形式和社会形式都需要新的类型的官员是对的话，那么新的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决不能轻视传统和确立了的利益，也就是不能轻视在他们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并法定下来的官员的结构（特别在教会和军事方面）也同样是对的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以及立法权和行政权更为密切的联系（因此，选出的官员不需上面的监督，自会关心执行国家事务）能够成为一种推动力，从而产生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官员问题的新方针。

2. 同官僚派问题及"更好地"组织官僚派问题相联系的是关于所谓"有机的集中制"和"民主的集中制"（它们与抽象的民主制毫无共同之处，正如在法兰西革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得到发展的有

机的集中制是专制君主制及拿破仑一世所不晓得的一样）的辩论。应该考察和研究下列各个领域里有机的和民主的集中制的各种表现得到自己的组织形式，自己的结合，自己的用途的那些实在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关系：在国家生活里（中央集权制、联邦制、邦联制、各国联邦制或联邦制国家等）；在国际生活里（同盟、国际政治"星群"各种形式）；在政治和文化组织生活里（共济会，"工商业者俱乐部"，天主教会）；在工会、经济组织生活里（卡特尔、托拉斯）；在同一个国家里，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以及其他场合里。

关于过去（1914年以前）就德国人在高级文化方面和某些国际政治力量方面的优势而引起的论战问题：这种优势是实在的吗，它实际表现在哪方面呢？可以指出的是：（1）任何有机的和纪律的联系都没有导致过确立这种优势，因此这种优势不过是一种能起到抽象的文化影响的和具有很不可靠的威望的因素；（2）这种文化影响完全没有涉及到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相反地，依然是分散的、地方性的、没有共同方向的。因此谈不到什么新的集中制——有机的也好，民主的也好，其他类型的也好，或者混合形式的也好，感到它的影响的并受到它的作用的仅仅是人数不多的与人民群众没有联系的知识分子集团；正好这种没有联系说明了情况。然而事情的这种状况值得研究，因为须要说明导致形成有机的集中制理论的那种过程，这种理论是片面的和知识分子的对这种力量紊乱和分散的批评。

同时在有机的集中制理论之中必须区别两类理论，一类理论隐蔽了部分对整体的确实优越的明确的纲领（这一部分是由一个阶层组成，例如知识分子，或者包括"特权的"地域性集团），一类理论不过是一种宗派主义者和狂信者的片面的态度，它们虽然也可以隐蔽优越纲领（通常是个别人物的优越，象那毫无罪过的教皇个人，对他说来，天主教变成了一种对教皇的个人迷信），但是并不直

接象是有意识地为了政治目的而隐蔽这种纲领的。称这种现象为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将更为确切一些。只有民主的集中制才能具有“有机性”，这种集中制是所谓运动中的“集中制”，也就是这种集中制规定经常使组织符合实在的运动，就是把下面的推动和上面的命令结合起来，经常吸收来自人民中间的分子到管理机关的稳固的骨架中来，以保证不断和经常地积累经验。民主的集中制之所以是“有机的”，是因为它所注意的是运动，而这种运动是历史现实表现的有机形式，它不会僵化而机械地变为官僚派；同时也是因为它所注意的是相对经常的和稳定的东西，或者至少是在容易预测的方向中运动的东西等等。这个稳定的因素在国家中体现在领导集团的核心的有机发展中，正如在党的生活中比较狭隘的范围内所发生的这种情况一样。如果在国家中占优势的是官僚主义的集中制，那么这就表明领导集团达到饱和以后成了狭隘的小集团，他们努力的是永久保持自己的利己主义的特权，调整或者甚至防止敌对力量的产生，甚至在这些力量从其本质来看是和基本的统治利益同类的时候（例如，在保护关税政策制度下对经济自由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代表在社会关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集团的党里面，稳定的因素是必需的，这是为了保证不是特权集团的，而是进步因素的领导，这些因素同其他相近的和联盟的、但不是一类的而且是动摇的力量相比在结构上是进步的。

无论如何，应该强调指出官僚主义集中制有害表现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下层缺乏主动和责任心，也就是由于外围力量在政治上不成熟，即使它们同那在一定领土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团（皮蒙特在意大利统一最初十年间的角色）是一样的。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对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极端有害和危险。

民主的集中制提供富有弹性的公式，这个公式可以有多种式样的体现；它只是在它逐渐得到解释和适应需要的限度内才存在；

这个公式是批判地研究那个在表面上有区别但却是一样的东西，和那个在表面上一样但却是有区别的甚至是对立的东西，——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组织和密切联系那种相同的东西，但必须使得这种组织和联系表现为一种“归纳的”和实践的，实验的必要性，而不能表现为一种抽象的、演绎的、合理化活动的结果，也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或真正的傻瓜）所有的活动的结果。这种不断进行的在民族的和地方的现实中去寻求“国际性的”和“统一的”因素的工作，在事实上是一件具体的政治行动，是在历史前进中唯一有效的活动。这一工作要求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有机的统一。从这个观点来看，统一和联邦的公式失掉了自己大部分的意义，而同时却在官僚主义的概念里保存着自己的毒素，因为官僚主义的概念最后不会导致统一，而会导致表面上安静的、“一声不响的”死水的泥潭，所建立的不是联邦，而是“一口袋马铃薯”，也就是独立的、彼此没有联系的“统一”的单位的机械的结合。

关于“人的集体”和“社会的一致”的问题

这实质上是个国家的教育与建设的任务的问题。这项任务的目的始终是建立新的和更高的文明型式，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文明”和道德标准符合生产上的经济制度的不断发展的要求，从而也在体质方面养成人类社会的新的型式。但是怎样使每一个单独的个人能够汇成为人的集体并且怎样对单独个人进行教育影响，以便事先取得他们的同意和合作，把必然和强制变为“自由”？这里要考虑到一个“法律”的问题，法律的概念范围应该扩大，也要把那种今天以“在法律上不关心”的公式出现的并属于市民社会范围的活动包括进来。这个市民社会的活动是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

对的"义务"，但是在习惯、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道德等等方面产生集体影响并且能达到客观的结果。

关于还在1848年以前就已经出现的所谓"不断革命"的政治概念是作为从1789年到热月时期雅各宾党经验的科学总结的表现问题。这一公式属于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没有巨大的群众性的政党和经济方面的大规模的辛迪加，而社会在许多方面仍处于所谓动荡状态，乡村更为落后，在政治国务活动中几乎完全由少数城市或甚至一个城市（法国的巴黎）垄断了；国家机关相对地不够发展，市民社会更为独立，不受国家行动的影响；国家的军队和武装具有一定的制度；各个国家的经济更加独立于世界市场上经济关系之外。在1870年以后时期，由于欧洲殖民扩张，所有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国家的内部关系和国际关系的组织更为复杂和巩固了，1848年提出的"不断革命"的公式经过重新制定并在政治学里超越了"公民领导权"的公式。在政治艺术中也发生了象军事艺术中所发生的情况：运动战越来越多地成为阵地战了，而且可以这样说，如果国家在平时能精密地并深入地准备战争，就会赢得战争的胜利。现代民主制度的坚强的机构——做为国家各种组织和公民生活中团体组织的复合体——从政治艺术观点来看似乎是阵地战中一套"堑壕配系和前线永久工事配系"：它们只是运动的"局部"因素，而以前却是"全部"战争等等。

这是对现代国家而言，而不是对落后的国家或殖民地而言，因为在落后的国家里和殖民地里还保存着在其他地方已经被摧毁并且成了时代错误的那些形式的力量。在专门探讨政治学时，也必须研究意识形态的意义问题（象在玛拉戈迪同柯罗齐论战时所提出的那样），连同柯罗齐对索勒尔"神话"所提出的意见一起加以研究，因为这些意见可以用来反对"热情"的理论。

领导权(市民社会)和分权

分权和由于它的实现而发生的全部辩论以及由它产生的法理都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斗争的结果；在这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各阶级之间有某些受到下列事实制约的不稳定的平衡，即某类知识分子(直接担任国家职务的——特别是民事和军事的官僚)依然同旧的统治阶级保持密切的联系。这就表明在社会内部发生着柯罗齐称之为"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经常的冲突"的现象，在这种冲突的进程中，教会努力代表整个市民社会(虽然教会是这个社会的不很重要的成分，而国家则努力代表经常形成一定发展阶段、一定情况的一切企图。在这个意义上教会本身可以成为国家，而冲突可以发生在世俗的(或成为世俗的)市民社会与国家—教会之间(当教会已变成了由一定特权集团垄断的—这个集团依附教会以便倚靠教会所代表的那部分"市民社会"的帮助更好地确立自己的垄断—国家即政治社会的组成部分的时候)。

对政治的和经济的自由主义来说，分权的基本意义在于：所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它的优缺点在内，可以表现在分权的原则上，同时这里就出现成为自由主义弱点的来源的东西——官僚派，也就是起到联系力量的作用，并且在一定时机成为一种帮会的领导干部的特殊化。由此就产生了人民对一切职位实行遴选的要求，这种要求是自由主义最极端的表现，同时也是它的解体的表现(长期有效的立宪会议的原则等等，而在共和国里定期选举国家元首对人民这种基本要求给予了虚妄的满足)。

分权制度下国家的统一：议会在较大程度上同市民社会相联系，处于政府与议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司法权代表成文法的效力的不断性(对政府来说也是这样)。当然，这三权也都是政治领导

权的机构，但是是在不同的程度上：(1)议会，(2)司法机关，(3)政府。应该指出的是使得人民印象特别坏的是司法机关的不正确的行动；在这部分领导权的机构特别敏感，因为也可以表现出政策和行政的滥用。

法律的理论

法律的理论需要根本更新。不能完全装用任何一种从前制定出来的学说。(所谓实证学派的学说也不例外，特别是斐利[①]的学说)。假使国家致力于创造和确立一定型式的文化和一定型式的公民（从而创造和确立一定型式的公共生活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致力于根绝一定的习惯和风俗并传布另外的习惯和风俗，那么为了达到这项目的所必需的工具将是法律（除了学校和其他机构以及各种活动之外）。因此法律应该这样制定，以便它符合所要达到的目的，以便从它的积极的结果来看成为最大限度实用的和有效的。法律的理论应该摆脱任何超验的和绝对的杂质；它在实践上应该摆脱任何道德化的狂信。但是，据我看，似乎不能从国家不"惩罚"（如果这个用语是在它的一般人的那种意义上去理解的话），而只是反对社会的"危险性"出发。实际上，必须把国家看成是"教育者"因为它致力于建立新型的文明或新水平的文明。从下面这个事实出发，即把努力主要集中在经济力量上，改组和发展经济生产的体系，刷新经济结构，——从这一切出发，根本不能认为上层建筑现象应该自流，应该让它们自己不定期地时有时无地自发地发展。在这方面国家也应该成为一种"合理化"、加速、采用泰勒生产方法的工具，应该按照计划行动，坚持、鼓励，强制并"惩罚"，

① 斐利(Ferri, Enrico 1856—1929)——意大利刑法学者，实证论者，法西斯主义的信徒，曾主编《前进报》(Avanti)。——译者

因为如果创造了一种使得一定的生活方式成为“不可能”的条件，那么“罪行”或“罪过”就应该受到惩罚，包括感化措施在内，而不能只限于一般地估价这种行为的危险性而已。

法律是旨在传播文化的国家积极活动之消极的惩处的一面。在法律的理论里也应该规定对个别个人，集团等等“奖赏”的可能性。凡是值得赞扬和嘉许的活动都应该予以奖赏，也正如犯罪活动应该予以惩处一样(这种犯罪活动应该以独创的方法惩罚，利用“舆论”做为教化的措施)。

法国国家生活杂谈

共和制下的保皇党，君主制下的共和党也和民族的党一样，不能不是特种（sui generis)的政党，换句话说，它们如果想要获得相当迅速的成功，首先应该努力在党的同盟中占据中心地位，而不应该去精细地制定它们将来取得政权后所要实行的纲领。这类政党的目的应该是一般地建立某种统治体系，而不是去争取成立这样或那样的政府（在这些政党中占特殊地位的是那些表白自己信仰的党，例如德国中央党或其他基督教民主党或人民党)。

法国的保皇党倚靠力量仍然相当雄厚的旧的地主贵族残余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据保皇党分子的意见，什么东西能够使他们取得政权和恢复君主制度呢？他们希望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垮台并且希望任何一个其他的有组织的力量都没有能力成为预想的或是它们自己所准备的军事独裁的政治核心；通过任何其他途径它们的社会力量也不能取得政权。为了期待这一点，“法兰西行动”的领导中心展开了经常的活动：他们进行了有组织的、军事政治的活动（所谓军事的活动是指在军官中建立积极活动的

支部而言)，以便建立最坚固的一定社会基础，使得这个运动有所依靠。如果建立起来的这种基础是由与其他任何运动相比更为精选的分子构成的话(其中包括知识分子的代表，文化活动家，行政机关的人员和富人)，那么，在这种场合下可能建立大的甚至强有力的党；但是它只能指望自己，也就是它没有必须在紧要的转折关头投入斗争的后备力量。因此这种党在正常条件下方能算是大的，这时参加政治斗争的人数以几万计；但是在参加政治斗争的以几十万计甚至以百万计的紧急时期，它在人数方面就会是微不足道的了。

雅各宾主义(它的实质)的发展和在法国革命积极阶段实行的不断革命公式的发展，在议会制度下从宪法—司法上得到了“完成”，而议会制度在社会特别富于“私人创议”表现的时期内，在得到坚定不移的支持的黑格尔形式的政府中实现着城市阶级对全国居民的经常统治。但是这种支持通过私人创议去组织，因此具有道德的或伦理的性质，因为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志愿”支持的。

雅各宾党人在勒·沙佰利埃倡议制定的禁止罢工法令以及最高限度法令里所达到的那种“界限”在后来得到克服并且在复杂的过程中经常被推得越来越远；所谓过程复杂就是宣传活动与实践活动，也就是经济的和政治—司法的活动交换进行。经济基础由于工商业的不断发展经常扩大和加深，而下层阶级中最积极的和最精干的社会分子流入到统治阶级的组成里来。整个社会处于不断的兴建和死亡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里产生着越来越复杂的和越来越丰富的组织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基本上一直延续到帝国主义时代而在世界大战中完成。在这个过程里下面的现象互相交替着：暴动的企图和残酷的镇压；政治权利的扩大和政治权利的削减；实行集会的自由和这种自由的限制或根本取消；确立工会活动的自由；各种投票方法，照名单投票或投一个候选人的票；比例制

对多数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联合；两院制或一院制以及两院中各种不同的选举议员的方法（例如，有的议员终身任职并世袭；选期选举的上议院其议员的选举也按照这种制度而有别于下议院的选举等等）；各种不同的权力平衡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司法可以是独立的权力或者只是被各部监督和领导的机关；政府首脑和国家首脑有各种不同的全权；各种形式的地方机关的内部平衡（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地方官、各省议会、公社等等的权力大小不同）；由征兵编成的武装部队与职业武装部队之间的各种形式的平衡，而职业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警察，宪兵）以某些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内务部或总参谋部）为定；对习惯或成文法所赋予的地位大小不同，因此发展着在一定时机能够以法律名义废除的那种形式的习惯法（表面上似乎在某些国家里确立了民主制度，但是它们只是形式上确立起来了，既没有经过斗争，也没有经过宪法批准，并且因为它们得不到道德—法律的和军队的支持，所以它们也就很容易地——没有斗争或几乎没有斗争地——被取消，从而恢复旧的法律或者以反动的精神来解释现行法律）；在基本大法与现行规章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歧，后者可以废除前者或者对前者予以有限制的解释；比较广泛地运用法令，目的是为了代替正规立法，并且利用法令在一定场合下得以改变这种立法，"试探"议会的"耐性"直到能取得放弃掀起内战的真正的"赎金"为止。促进这种过程发展（指它的外面发展而言）的是哲学理论家、政治家、政党等等，而促进其内容发展的是群众运动和群众从下面所施的压力；这些行动是与双方出动及冲突相联系的，是与在某种现象采取危险方向以前实行"先发制人的"措施相联系的，是与这些先发制人的措施不够或者是不及时和效果不大而实行镇压相联系的。

在实行典范的议会制度的国度里，"正常"实现领导的特点是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

地压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象强力依靠大多数的同意，并且通过所谓舆论机关——报纸和社会团体表现出来。因此报纸和社会团体的数量在一定条件下人为地增加起来。

舞弊和欺骗处于同意与强力之间的中间地位，它们是一定情况下特有的现象，这时实行领导、已感困难，但使用强力又孕育着重大的危险。它们的流行表明对手或几个对手已经由于当局的收买而处于衰竭和麻痹状态，这种收买是隐蔽的，而在受到直接威胁时——也会是公开的，目的是使得对手的行列混乱和瓦解。

在战后时期领导机构发生了裂痕，因而实行领导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成为冒险的事情了。这种现象有各种名称和解释，同时人们从次要的和从派生的方面来考察它。名称里最庸俗的是："权威原则的危机'和'议会制度的解体"。当然，人们只是把这个现象当做发生在议会基础上的和涉及到政府的"戏剧的"表现的观点来考察的。同时也正好是用某些"原则"（议会制度，民主制度等等）的破产和权威原则的"危机"（另外有一些至少是肤浅的和迷信的意见也谈到这个原则破产的问题）来说明这些表现的。而实际上危机表现在由于组织政府而日益增加的困难的局势中和政府本身越来越不稳定的局势中；政府本身不稳定的直接原因是议会党派数目的增加和每个党派不断陷入的内部危机。（这样一来在任何一个议会党派之中也存在着和整个议会中一样的情况：组织政府的困难和领导的不稳定）。

营私舞弊和道德败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现象的表现。每一个党派都确信它掌握有万无一失的有效的手段以防止整个党的削弱，并采取一切方法以掌握党的领导或至少参加领导。议会也发生同样情况，每个党都认为为了挽救国家，只有它才应该组织政府，或至少要求最大限度地广泛参加这个政府，做为支持后者的条件，其结果是个人之间进行尔虞我诈和诡计多端的勾结，既然是这

样进行的，它们就不可能不带有可耻的性质，因为这些勾结往往不能执行而遭到背信弃义的破坏。

但是在实际上个人的舞弊其流行的程度可能比想象中的小，因为整个政治机体由于实行统治处于危机状态而完全陷入舞弊之中了。那些想要依照他们的志向来解决危机的人们装出一副样子，好象他们确信（甚至准备对这件事大声疾呼），关键在于舞弊和许多"原则"（永久性的和非永久性的）的"破产"。可以为这个事实找到理由：每个人在选择最符合他所提出的目的的意识形态武器时，都是最好的评判员，而煽动可以看做是最高明的手段。但是如果煽动家不善于做一个煽动家，他的实践活动好象当真以袈裟代替和尚，以帽子代替头脑，那可就成为喜剧了。这样，马基亚维利也就变成了斯坦代莱罗①。

法国的危机

法国的危机发展得非常缓慢。还是在世界大战以前，国内就有了许多政党。它们的形式之所以很多是因为法国从1789年起到德雷福案件止这一时期充满了革命的和政治的事件。其中每一桩事件都留下了遗迹、沉淀物、它们在党内凝固了起来。但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区别比起相似之点来小得多，所以在实质上议会里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两党制——自由民主党（带有各种不同的激进和保守党。甚至可以这样说，由法国的国家政治发展的特殊条件所造成的大量政党的存在，过去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可以在广大的范围内实行个人的遴选并且培养出多数有治理才能的人物，这正是法国的特点。

---

① 斯坦代莱罗——佛罗伦萨喜剧中的一个角色。——俄文版编者

任何体现在舆论中的思潮都通过这个非常活动的和富有弹性的机构得到直接的反映并固定下来。资产阶级的统治很强大并且拥有很大的后备力量。知识分子集中的程度很高（“法兰西研究院”、大学、巴黎的大型报纸和杂志），他们虽然在国内文化中心人数极多，但实质上都是很有纪律的。军事和行政官僚具有巩固的传统精神，他们达到的团结其效果也非常好。

成为国家机关（军事的和民政的）很大危险的内部弱点就是教权主义和君主主义的联盟。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即使他们也是天主教徒，并没有沾染上教权主义。德雷福案件是斗争的顶点，而斗争的目标是要麻痹教权主义及君主主义对国家机关的影响并保证世俗分子的绝对优势。

世界大战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法国一经参战，敌军几乎立时就侵入了它的领土，一点考虑的时间也没有。从平时军制转入战时军制并未引起特别严重的危机。旧的军事干部人数相当多而且能够应付裕的；下级军官和士官大概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在执行直接指挥部队的职责上也是最有锻炼的。

在这方面应该同其他国家比较一下。这里有“敢死队”的问题，志愿军的问题和干部危机问题；这个危机的引起是因为在其他国家里预备役军官占优势，而预备役军官所持的观点与正规常备军官的相反。在这些国家里“敢死队”是一种新型的志愿军，他们是精选出来的军事干部，从一开始就执行战术职能。同敌军接触只有通过“敢死队”，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好象是敌军与本国正规军之间的屏障（象是束身衣的硬绷带）。

法国的步兵大多数是农民出身，他们的体力非常充沛，神经坚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抵抗长期处于战壕里所造成的体力消耗（法国公民平均每年需要大约一百五十万卡路里热量，而意大利人则不到一百万卡路里热量）。在法国农业中雇农的意义不大，没有土

地的农民在农场上劳动，也就是过着主人的生活，因而他们感受不到哪怕是季节性失业所造成的饥饿。真正的雇农生涯是与乡村的生活不好有联系的，雇农是由那些在全国到处流浪寻找临时零散工作的不安定分子来补充的。法军在战壕里的伙食比其他国家办得好，而富有斗争和相互教益的民主的过去，造成了现代公民的类型，这种类型甚至在从属阶级里也传布得很广，这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公民——他们是来自民间的人，他们不但自己有一定的自尊心，而且上层统治阶级对他们也有一定的尊敬，也就是并不迫害他们，也不对他们吹毛求疵。因此在战争期间法国国内没有象泛滥在其他国家中的那种痛苦而辛酸的残酷。因此战后在法国展开的斗争并不残酷，而特别重要的是农民不动摇，这在其他国家却具有空前的规模。

对法国来说，具有特殊性质的议会制度危机说明国家处于患病状态，但是目前病情还不严重，暂时感觉不到的问题还没有表面化，国内的工业基地在扩大，城市集中化的加强就是其结果。大批农民奔向城市，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在乡村找不到工作或经常无地可耕；这是因为城市生活舒服些，享乐多一些等等（土地价格极为低廉，许多上好的土地都到了意大利人的手里）。在这以前议会危机勿宁是群众正常移动（不是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反映。同这种移动相联系的是难于在代表机关的系统里和政党的系统里找到平衡的新形式。同这种移动相联系的还有一种小病，这种小病只不过是可能产生深刻的政治危机的警告。至于病症外表的加重则是由于政治机体的特别敏感所引起的。在这以前问题主要是争取国家的职位和收入多的地位，这也就引起了中间阶层政党的危机，首先是代表中小城市和农民先进阶层的激进党的危机。准备进行当前战斗的政治势力努力寻求组织的最好形式，而不承认国家的那些势力却越来越显示自己的力量并且越来越粗暴地强迫自己的

人。

法国议会制度的危机在1925年达到了顶点，在评价“法兰西行动”这个组织的政治实质和思想实质时，应该从它对于这些起决定作用的事件所采取的态度出发。莫拉斯①宣称共和制破产，他的集团准备夺取政权。人们往往称赞莫拉斯是位大政治家和最伟大的现实政治家（real politiker）；其实他不过是个翻转过来的雅各宾党人。雅各宾党人具有特殊的语言，他们是一定思想体系的忠实信徒；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情况下，这种语言和这种思想体系具有超现实的性质，因为借助他们的力量才能够把达到革命的最终目的和便于使革命阶级不断地沿着夺取政权的道路前进所必需的政治精力发挥出来。以后，正如几乎经常发生的那样，雅各宾党人的语言和思想体系与它们得以传布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脱离了，归结成为一堆公式并且具有完全另外一种性质，成了一些幽灵，一些空洞的死气沉沉的辞句。可笑的是莫拉斯把这些公式以低劣的手法改头换面，用它们造了另外一些公式；他无可指责地以合乎逻辑的程式把这另外一些公式系统化了（从文字观点来看），但就是这些新的公式也只不过是最普通的和最平凡的启蒙思潮的反响。在实际上，莫拉斯恰好是“十九世纪的愚昧”的最典型的标本，是经过机械地改造过的共济会的所有一般的会旨的集中点。

莫拉斯之所以获得相当的成功是由于他的方法能够得到同情，因为他归结为进行判断的理性的方法，百科全书派的传统以及一般的法国共济会文化的传统也就来自这种判断的理性。

启蒙思潮产生了许多民间神话，这些神话不外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深刻的许多世纪以来的愿望对未来的投影；这种愿望是与基督教、是与健全理智的哲学相联系的；这些神话不管怎样是非常

① 莫拉斯，沙尔里（1868—1952）——法国反动的政治家，作家，君主主义者，反动组织“法兰西行动”的领导者之一。——俄文版编者

简单和天真的，但是它们的根源确实是来自感情，而且它们无论如何也没有受到试验性的历史检查。

莫拉斯也创造了关于法国君主政体的虚幻过去的"最天真的"神话，但是这个神话已经成了"历史"，而理智主义的对历史的歪曲是容易纠正的：要知道法国的整个一套教育体系都是为了以隐蔽的形式来纠正君主主义的神话；结果这个神话就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了"防御"的而非鼓动热情的神话了。莫拉斯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政治当先（politique d'abord），但是他却首先不遵守这个原则。他认为政治之前永远先要有"政治的抽象"，要先全盘接受"尽善尽美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可以使我们预见一切偶然事件（好象有些作家笔下的乌托邦），并且要求建立一定的历史观，它的对象必须是法国和欧洲的具体历史，也就是要求建立一种预定的和僵化的解释学。

列昂·多德① 写道，"法兰西行动"的巨大力量在于它的领导集团的不可摧毁的团结一致，在这个集团里无论政治方面或意识形态方面都经常是意见一致和团结无间的。"法兰西行动"的领导集团的团结一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但这是一种宗派的、一种共济会秘密集会问题的团结一致，而不是当政的大党的团结一致。它的政治语言变成了行话，造成了一种阴谋诡计的气氛，由于他们永远重复同样的公式，永远运用同样的臆造出来的一成不变的方案，日久天长他们的确就完全一样地去考虑问题了，因为他们一般地再也不去考虑问题了。莫拉斯在巴黎和多德在布鲁塞尔没有经过商量（他们早先在一切问题上就都彼此同意了）就用同样的事件讲出同样的话，因为他们两个人同样是说话的机器，这些机器已经开动了二十年，就是为了它们能够同时讲同样的话。"法兰西行

① 多德，列昂（1867—1942）——法国反动政治家、作家、君主主义者。他与沙·莫拉斯一起领导"法兰西行动"。——俄文版编者

动”的领导集团是用互相推选的方法组成的：开始是多嘴的莫拉斯，随后是沃日瓦，后来是多德，皮若等等。每次有谁脱离这个集团的时候，就引起一场真正是暴风般的争吵和无尽无休的无中生有的谴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莫拉斯的地位好象是一位毫无罪行的教皇，如果他的亲信中有人和他决裂，这当然是一场大祸。

“法兰西行动”的内部结构是很值得注意的，并且从这个观点出发，这个组织值得深入地加以研究。“法兰西行动”所以具有某些力量主要是由于它的支柱是一些优秀的（在智力方面）社会分子，这些分子在军事方面也可以极其容易地被组织起来，就同使那支只有官编成的军队进入战斗准备一样容易。当然，这些分子只是相对地可以在智力方面称为优秀，因为“法兰西行动”的信徒们居然能够那样轻易地象鹦鹉学舌一般重复着自己领袖的公式（即使并没有真正的军事上的必要）而且还能以“谄上”为快，是令人吃惊的。在共和制下君主专制的信仰可以作为奖章，而在议会民主制下一贯的反动信仰可以作为奖章。

“法兰西行动”由于自己的组成而拥有大量的资金（一些工业集团的津贴），除外，使得它能够进行多次运动，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这个组织无疑地富有生命力而且能积极活动。“法兰西行动”的许多公开的和秘密的信徒的社会地位使得报纸和领导中心能掌握多方面的情报和大量的秘密文件，因而也就能够对个别人物组织多次的攻击。在过去梵蒂冈正是头等重要的情报来源（通过国务所① 和法国高级僧侣），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只是范围有限了。许多反对个别人物的运动不能不具有秘密的或半公开的性质，公布一部分事实，使人相信他们已经洞悉全部事实，或者做一些微

① 国务所——梵蒂冈的外交部。——俄文版编者

妙的使有关人物可以领会的暗示。这些蓬勃的运动，对“法兰西运动”具有各种意义：可以鼓起它的信徒们的情绪，因为炫耀洞悉最秘密的情节就会造成一种印象，使人以为它具有很大的打入敌人阵营的能力，并且使人以为它是一个任何事物都逃不出它的掌握的强大的组织。在这些运动的进程中，他们把共和制描画成一种犯罪的联合；运动的发起人以造成对方身败名裂相威胁，麻痹了一些敌人的行动，而把另一些敌人变成了“法兰西行动”的帮凶。

由“法兰西行动”全部活动所产生的经验概念归结如下：共和议会制度必不可免地要瓦解，因为从历史的观点和理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奇形怪状的东西（mon strum）。它破坏了莫拉斯以无比坚定的信念确立下来的法国社会的“自然”规律。因此，十足的民族主义者就应该首先避免参加现代法国的政治生活，不承认它的合理的历史的“合法性”（不参加选举等等），并且联合在一起去反对它；其次是应该成立对抗政府，随时准备以突击的手段占据“传统皇宫”中的高位；这个对抗政府今天已经存在于处于萌芽状态的符合民族活动各个最重要方面的一些职务中。

但是，在实际上这些严格的规则已经不只一次地被破坏了：1919年他们就提出了几个候选人，而且象奇迹一样地多德被选举出来了；在其他的几次选举中，“法兰西行动”支持右派的候选人，他们承认了它的某些次要的原则。（显然这些行动是由于莫拉斯接受了他的那些在实际政治中比较有经验的党羽的劝告，而这也证明“法兰西行动”领导上的统一也是不无裂痕的）。为了摆脱孤立状态，曾决定出版大型通报性的报纸，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只有《世界评论》和《吹吹打打》以间接的方式在广大读者中间从事传布通报的工作）。

同梵蒂冈所进行的尖锐的争论和由此而来的僧侣的和天主教团体的改组把“法兰西行动”同广大群众所有的唯一的联系断绝

了；但是这种联系在以前也就非常不可靠的。很久以前就已经在法国实行的普选权，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形式上属于天主教会的广大群众在政治方面却依附中央的共和党，尽管后者采取反教权主义的立场并维护世俗的原则；由于热爱祖国的思想而形成的民族感非常强烈，而在某些场合无疑比对天主教的信仰更为强烈，固然对天主教的信仰具有其本身的特点。“信教是每个人的私事”这一公式已经成为教会同国家分离这一理论的人民成语而根深蒂固了。除此之外，所有总起来构成“天主教行动”这一组织的那些团体，都掌握在土地贵族手中（以——或曾经以——卡斯泰尔诺将军为首）；下级僧侣不执行僧侣—社会领导的职能，这和意大利（在它的北部）过去的情况不同。

法国的绝大多数农民象我国南方的农民一样，总喜欢说：“神甫只有在教堂才是神甫，离开教堂他也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在西西里是这样说：“Monaci e parrini, sienticci la missa e stoccacci li rini”）。“法兰西行动”希望在决定关头它能通过天主教上层领导来取得对法国天主教一切分支机构的统治。这个打算里面幻影多而现实少：当然，在深刻的道德政治危机时代，在正常发展时期已经减弱了的宗教感可能又坚强起来并具有一种吸引力；但是假使人们看到在国家前途的上空聚集了一片乌云，那么表现在热爱祖国的思想中的民族团结感也同样会具有吸引力，因为法国危机不能不具有国际危机的性质，而在这种场合下《马赛曲》要比忏悔的圣歌来得响亮得多。

不管怎样，莫拉斯对于利用这个可能的后备力量已经失掉了任何希望。梵蒂冈不愿意再抛开法国的国内生活不问，它认为现在期望君主制可能复辟的努力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梵蒂冈所采取的立场比莫拉斯的要现实些，对政治当先这一公式的意义也理解得更好一些。在法国农民还必须在欧里和与小贵族（hobereau）之

间有所选择时，他们是会选举欧里和的；因此梵蒂冈认为必须创造“天主教激进党员”类型，也就是“人民的”激进党员类型，必须毫无条件地承认共和国和民主政体并在这个基础上组织农民群众，使宗教不再脱离政治，使神甫不仅是个人私事情问题的精神领导者，而且也是个政治经济方面的社会领导者。

莫拉斯的失败是无可争论的（正如德国的胡根堡的失败一样）。莫拉斯主张的破产也同样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在逻辑上的过分的完整反而使得它成为虚假的了。同时，莫拉斯本人在他与梵蒂冈论战之初就觉察到这种失败了，这次论战正与1925年法国议会危机同时发生（未必是偶然的）。在内阁更迭频繁之际，“法兰西行动”发表了声明，说它准备夺取政权；事态已经发展到出现了一篇呼吁恺奥同“法兰西行动”合作的文章，而这位恺奥正是“法兰西行动”经常所讲的那位讨伐的对象。这是一桩很典型的插曲：莫拉斯一套生硬的合理化的政策，先天的不参加选举的政策，根据统治法国社会的自然的“宇宙”法则而实行的政策，——这一切到了决定时刻却注定瓦解了，注定破产了，不得不把这一切放弃了。

临到决定时刻由于危机而奔放出来一股精力的巨流根本没有注入到人工造成的容器里面来，而是沿着现实政治在过去所开辟的自然的孔道一泻而去；这一股巨流的方向是在那些经常积极活动的政党的影响下或者甚至那些在危机基础上象雨后春笋一样生长起来的政党的影响下改变的。

至于那种认为似乎1925年由于议会危机而共和制可能破产的愚蠢的预测就更不值得一提了（纯粹理性的反议会的愿望才能造成这种偏执狂的迷惑）。要是也发生破产的话，那么这是莫拉斯本人道德的破产，因为他也许一直就没有能够摆脱他已陷入的那种圣灵启示的状态，也是他的集团的破产，因为他们已经感到自己孤立而不得不向恺奥之流呼吁了。

莫拉斯的论点有许多地方与有名的经济主义及工团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特点相同，因为这两种理论在形式上就是一种崩溃论。产生于经济的和工会的基础上的概念这样转而运用到政治和议会方面来，是相当常见的现象。这样的机械崩溃的概念，不只成为议会的不参加主义的基础而且也是任何其他一种政治上不参加主义的基础。根据这种论点，可以象数学计算一样准确地预言敌人力量的崩溃，假使它的政府活动能够被坚决而毫不调和地抵制住的话（也就是把政治上的罢工和抵制与经济上的罢工结合在一起）。可以举1870年以后意大利教权主义者的行动做为典型的实例，他们的这些行动就是模仿和广泛推行意大利爱国人士（主要是在米兰）为了反抗奥国统治而采取的一些斗争方法。

在雅克·班威尔①的历史评论里往往重复一种论断，即全民投票和全民裁决在过去能够（曾经有能力）从而在将来也一定能够象它们为其他政治派系（特别是两位波拿巴）服务一样而为正统王朝派服务。这种论断非常天真，因为它是和天真的抽象贫乏的社会学观点相联系的，把全民投票和全民裁决看成是脱离地点和时间条件的抽象的公式。因此必须指出：首先全民投票或全民裁决的任何决定都是在统治阶级于政治方面已经达到高度团结，或在军事政治方面已经达到更高度的团结而联合力图建立“恺撒主义制度”的人的周围以后才通过的，或是在战争以后全国处于未能预见到的情势之下才通过的。其次，在法国历史上有过各种类型的“全民投票”，它们逐渐地造成了政治经济关系的历史改变。全民投票的危机是巴黎与各省之间，也就是城乡之间，也就是城市力量与农民力量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所引起的。在十八世纪革命时期，巴黎城市集团几乎把各省的领导完全集中到自己的手里，这样也就形

① 班威尔，雅克（1879—1936）——法国反动的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家，曾参加“法兰西行动”组织。——俄文版编者

成了关于全民投票的神话，这种全民投票经常该当赞同巴黎激进民主派的行动。因此在1848年巴黎要求全民投票，可是通过这次全民投票却选出了反动的教权派的议会，使拿破仑第三得以飞黄腾达。在1871年巴黎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反对全民投票所选出来的凡尔赛宫里的国民会议，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对于在"进步"与全民投票之间可能有冲突这一事实的隐蔽的"理解"。但是这一具有不可估价的意义的历史经验一下子就误失掉了，因为它的体现者立时就被消灭了。另一方面，在1871年以后，巴黎在很大程度上失掉了它对法国其余地区的政治一民主领导权。这是各种原因所造成的：首先，在整个法国传布着城市资本主义，到处发生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其次，巴黎彻底失掉了它的革命统一性，而且它的民主精神分散在各社会集团和对抗的党派之间了。普选权和民主制度的发展经过一定时间越来越同激进党在法国全国的确立以及反教权主义斗争的传布相吻合了。所谓革命的工团主义的发展便利了这一过程并促进了这一过程。的确，工团主义者所传布的拒绝参加选举和经济主义正是巴黎放弃自己的法国革命首领的角色的"无可争辩的"证明，而且是在1871年流血以后所传布开来的肤浅的机会主义的表现。这样，激进主义以居间地位划一了普通的小资产阶级，城市工人贵族和乡村的富裕农民。在战争以后，于1871年被火与剑阻止了的历史发展又前进了，但是这种发展是不够明确的、形式不定的、动摇的，而主要是缺少有思想的人物。

在1927年5月15日一期的《意大利观察报》里刊出了雅克·维阿拉杜的一篇短论，该文几周前在《法兰西社会新闻》发表过。维阿拉杜反驳雅克·马里坦在题为《对沙尔里·莫拉斯的意见和天主教徒的责任》〔Jacque Maritain, Une opinion sur Charles Maurras et le devoir des catholiques (Paris, Plon, 1926)〕

的一文所提出的论纲，根据这一论纲在莫拉斯的多神教哲学和道德这一方面同他的政治那一方面之间只存在着表面的联系，因此如果从哲学抽象而采取他的政治学说，那么就有可能抵御一切危险，正如在所有社会运动中一样，而且这个学说之中不包含有任何该当指责的东西。维阿拉杜认为政治学说起源于世界的多神教的论点（或至少同这个论点密切联系）是完全有道理的。

（关于这种多神教的问题，须要指出的是：应该从它里面判明和区别充满多神教譬喻和用辞的文学形式同下面这种学说的实质，这种学说是通过圣西门主义从孔德那里抄袭来的自然主义的实证论，这种学说的多神教的外衣只是一些教会暗语和教会用语）。国家是人的最终目的，国家只是利用自然力量（也就是与“超自然”力量对立的“人的”力量）实现社会制度。

确定莫拉斯憎恨什么比确定莫拉斯喜爱什么还容易些。莫拉斯所憎恨的是早期的基督教（包括在福音里面的、在最初几位基督教使徒的著作里面的关于创世的教义等等，总之是在发布米兰勒令以前那个时期存在的基督教，它的立脚点是深信基督的出现是宣告旧世界的终了，从而使得罗马政治制度溶化在道德的紊乱之中，腐蚀着整个国家制度和民政制度）；莫拉斯认为早期的基督教是犹太人的教义，他想要从这个意义上使得现代社会摆脱基督教的影响。他认为在过去天主教会是这种摆脱基督教影响的工具，而且它在将来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起到这种作用。他把基督教和天主教区别开来，并宣称后者是古罗马制度对犹太人的无政府状态的反应。崇拜天主教以及它的各种迷信和节日，它的繁文缛节，它的礼拜仪式，它的神圣的造型和程式，它的秘密的礼节和全能的教阶制度，把这些都看成好象就是一种救世的魔法，能够消灭基督教的混乱，能够解除真正基督教所中的犹太人的毒害。维阿拉杜认为“法兰西行动”的民族主义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近代宗教史里

的一段插话。

(如果这样看，那么任何一种政治运动，凡是不受梵蒂冈监督的都算是宗教史里的一段插话，也就是说全部历史都是宗教史。无论如何还应该指出的是莫拉斯对一切具有新教性质的和来自英国和德国的事物——浪漫主义，法兰西革命，资本主义等等——的憎根，是他憎恨原始基督教的一面。这种对天主教的观点的来源应该到奥古斯特·孔德的身上去找；同时它们是同恢复托马斯主义和恢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纯粹写作的形式相联系的)。

所谓"有机的集中制"所根据的原则是：政治集团成员的遴选是个别人物"推举"的结果，而且要有一个中心人物——"毫无缺点的真理体现者"，一个"受理性启发"的人物，他发现了历史进化的自然的定而不移的规律，即使时期悠久，甚至"看上去"具体的实在的事件已经证明这些规律是错误的时候，这些规律依然是定而不移的。把力学和数学的定律运用到社会现象上来(这样的运用也只能具有譬喻的意义)，成为唯一能发光的空转的精神发动机。有机的集中制同莫拉斯学说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

拾　零

国际主义和民族政策

谈一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②]的著作(采用问答形式的)。它里面探讨了政治艺术和政治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写于1927

---

②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著作系指1927年9月9日约·维·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而言(《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85—128页)。——俄文版编者

年 9 月)依我看，应该发挥包括在下面这种说法中的问题：根据实践哲学(在它的政治表现方面)，根据它的创始人的表述，而特别是根据现代伟大理论家加进去的明确说明，国际局势必须从它的民族方面来加以考察。的确，“民族的”这个概念是一种“独创的”，唯一的(在某种意义上)结合的结果；假使想要掌握和领导这种结合，那就应该从它的全部独创性和不可重复性来理解它和领会它。当然，发展的趋向是国际主义，但出发点却是“民族的”，而且也应该从这个出发点出发。但是前途是国际的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的。因此必须确切地研究民族力量的配合，因为国际阶级必须领导这些民族力量而且应该依照国际的前途和国际发展的要求来发展这些民族力量。领导阶级所以能成为领导阶级只是由于他们善于确切地解释这种他们本身就是其组成部分的这种配合，而且正因为这一点他们才能够赋予运动以一定的方向和一定的前途。据我看，列夫·达维多维奇与作为多数运动①的解释者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之间的主要分歧就在这里。指责民族主义不对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这些指责关系到问题实质的话。对于多数党在1902年到 1917 年这一时期的活动加以研究就会看出这个党的特点在于使国际主义肃清了一切不固定的和纯粹“思想意识”(在这个辞被曲解了的意义上)的因素，以便赋予它以实在的政治内容。领导权的概念，这是一种在它里面结合了各项民族性质的要求的概念，而且不言而喻的是存在着一定的倾向，对它完全避而不谈，或者只是稍稍地涉及到它一点。国际性质的阶级因为它所领导的是具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性质(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而且往往是具有更大的局限性质的——是本位主义的和具有地域观念的阶层(农民)，——所以这个阶级应该在一定的意义上“民族主义化”，而且

① 即布尔什维主义。——意文版编者

远不是狭义的，因为在建立起根据统一的世界计划而发展的经济之先，这个阶级势必经过许多阶段，在这些阶段上可能产生各种地方性的个别民族集团的配合。另一方面，永远也不要忘记：历史将依照必然的规律发展，直到主动权完全转移到那些努力根据和平的和协调的分工计划从事建设的力量手中为止。

非民族观（就是不以国家为单位来谈）的错误性从它们逻辑后果的荒诞看得出来；这些观点会造成在两个不同阶段上的消极和无能：（1）在第一个阶段上谁也不会考虑他应该第一个开始，因为每个人都会认为如果他首先开始行动他就会陷于孤立；由于等待大家一起活动，谁也不会活动，谁也组织不起来运动；（2）在第二个阶段上情况大概更坏，因为都等待着那种时代错误的、违反自然的"波拿巴主义"形成的发展（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阶段都以同样的形式重复着）。这种现代形式的旧机械论的理论上的弱点是用"不断革命"的一般理论来掩蔽的，而这个理论只是具有教条形式的最一般性的假设，这个理论由于没有为现实所实证会自然而然地破产。

国　家

罗马的匈牙利学院院长朱里奥·米什科尔齐教授在《马扎尔评论》① 写道，意大利的"议会从前是所谓立于国家之外，仍旧是可宝贵的同事，但是它已加入国家的组成之内，并且从自己的组成得到重要的改变等等"。

断定议会可以"加入"国家的组成之内，这在政治学和政治技术方面是一种发现，它可以同现代君主主义者-绞吏之中某一位克

① 这篇文章曾转载于1933年1月3—10日各期《外国报刊评论》上。

里斯多芬·哥伦布媲美。

同时这种论断也引起一定的兴味，因为它表明许多政治家毕竟在实践上是怎样设想国家的。事实上，必不可免地要产生一个问题：议会是否加入国家机构之内(甚至在那些它们似乎起到最大限度的实际作用的国家里)，假使不是的话，那么它们在实际上执行什么样的职能呢？假使答复是肯定的话，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它们怎样加入国家的组成之内并且又怎样执行自己专门的职能？即使议会并非有机地加入国家的组成之内，那么这是不是也就可以证明它们的存在没有一般国家的意义呢？而且对议会制度和与它密切联系的多党制的那些指责，其根据又是什么呢？(自然，这个根据是客观的，也就是与下面这个事实联系着的：议会存在的本身阻碍并延缓政府的技术活动)。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代议制度在政治方面能够“使”常任的官僚派“不安”，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代议制和多党制原来是一种遴选优秀的工作人员来补充并调整常任的官僚派借以防止他们僵化的机构，——可是这种代议制是否已变成了一种障碍，变成了性质完全相反的机构，如果是的话，——那么由于哪些原因呢？

同时，即使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话，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即使假定(而这正好是必须假定的)，议会制度丧失了它的效能，而且更有甚者，已经带来了害处，那么也根本不能因此而认为必须恢复和表扬官僚制度。应该考虑一下，议会制度和代议制是否一般地等同，而有没有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解决议会制度的问题和官僚制度的问题。

必须考虑一下这些年来所发生的关于国家活动限度问题的辩论：这种辩论比起政治学说来更为重要，可以使我们在自由主义者同非自由主义者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卡尔洛·阿尔别尔托·毕志

尼的一本小册子：《确定国家活动界限的基础》① 可以做为出发点。毕志尼以为只有存在着力图超出"社会结构的宪法标准"去治理国家的场合，才会产生暴政，根据他这种意见就可以做出非常不同于毕志尼自己所能做出的广泛的结论，因为所谓"宪法标准"不能理解为宪法条文；大概毕志尼本人也不这样理解（假使根据1929年10月号《意大利评论》所载阿尔弗列多·波吉的评论来判断的话）。

由于国家是自行调整的社会，所以他是自主的。它不能有法律的界限：公法的主观准则不能成为它的界限，国家不能讲它自己限制自己。制定出来的法不能成为国家的界限，因为它随时都可以被国家借口新的社会需要等等而废止。波吉承认这是正确的，并且认为这种结论已经隐蔽地包含在以法律限制国家的学说之中。根据这种学说，只要存着法律准则的时候，国家就在这些准则的范围内行动；假使国家决定变更这些准则，就用另外一些标准来代替它们，就是国家只能通过法律的途径行动（但是因为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有法律性质的效力，所以这是可以继续到无限）。应该考虑一下，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毕志尼的论点是伪装了的并且是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形式。

从这两种关于国家观的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据我看，维达尔·齐札里尼—斯佛尔柴的小册子② 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古代罗马人使用了 jus（法律）这个词来标明做为意志力量的法律并且把法律程序看做是一些力量的体系，这些力量不能用客观的和合理的标准控制在它们相互的范围之内；他们所使用的一切用语——

① Carlo Alberto Biggini, Il fondamento dei limiti all'attività dello Stato; Città di Castello, Casa Ed. «Il Solco», p.150.

② Widar Cesarini-Sforza, «Jus» et «directum».Note sull'origine storica dell' idea di diritto; Bologna, Stab.Tipogr. Riuniti,1930.

aequitas(公正),justitia(司法),recta 或 naturalis ratio (正确的或自然的思维方式)——都应该在这个主要意义的范围之内来考察。基督教适应它使意志服从准则,把力量变成责任的趋向,构成了监管(directum) 大于法律 (jus) 的观念。法律就是权力的理论被归诸上帝一人,他的意志已经成了受到平等原则鼓励的行为的准则。在这种场合下 aequitas(公正)无异于 justitia(司法),而这两种准则都暗示着rectitudo(正确性),这种正确性是主观的品质,它努力符合正确的和公正的事物。齐札里尼－斯佛尔柴小册子里面的这些基本原理是我从卓戈勒·索拉里的评论里 (1930 年 8 月号《列奥那尔多》)摘下来的,后者往往驳斥前者的论点。

在新的"法学趋向"之中,特别是以沃尔皮柴里和斯皮里托为首的"新画室"派所代表的新的"法学趋向"之中,应该指出国家—阶级观点与被调整了的社会观点的混淆,因为它是首先值得批判的原理。在斯皮里托于 1930 年 9 月在波尔萨诺举行的科学发展协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经济自由》(载于 1930 年 9 月—10 月号《新画室》)里这种混淆的范围特别大。

只要存在着阶级国家,被调整了的社会就只能做为一种譬喻而存在,也就是只能在那种意义上,即在阶级国家同样是被调整了的社会的意义上而存在。空想主义者由于他们批判了他们当代的社会,所以很清楚地了解阶级国家不能是被调整了的社会,而证实这一点的是当他们空想地描画出各种类型的社会时,他们把经济平等做为所计划改革的必需的基础。这样看来,空想主义者在这方面不是空想主义者了,而是最真正的政治学者和真正的批评家了。其中一些人的著作之所以具有空想性质是由于他们认为可以借助随意制定的法律,以任意的行动等等实行经济平等。但是其他一些政治家(甚至是右派的政治家,即批评民主派的政论家,因

为民主派采取瑞士的或丹麦的制度作为理性制度的典范，而这种理性制度是应该在所有国家内建立的）所持的观点依然是正确的；这种观点认为没有经济平等就不能有十足的和完全的政治平等。十七世纪的一些作家往往持有这种观点，例如，刘陀维科·祖柯罗的《Il Belluzzi》一书中就持有这种观点，我以为马基亚维利也持有这种观点。莫拉斯认为在瑞士这种民主形式之所以可能恰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按其经济地位来说处于一定的中等水平上等等。

阶级国家观点与被调整了的社会观点的混淆是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因为他们欢迎任何样式的调整，由于它能防止尖锐的冲突和崩溃。这样看来，这种观点具有典型的反动性和退步性。

谈到伦理的和文化的国家，那么据我看在这方面最合乎理性的和最具体的是归结为下列几点：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因为它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把广大居民群众提高到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或型式）。在这个意义说来，在国家中起特别重要作用的是执行积极的教育职能的学校。但是在现实中为了达到这项目的还进行许多具有所谓局部性质的他种活动和创举，它们总在一起构成统治阶级政治的或文化的领导机关。

黑格尔的观点是属于那个时期的，在这时期内人们可能以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宽无边际，从而可能承认资产阶级具有伦理性和普遍性并且认为全人类都要成为资产阶级的。但是实际上只有那个致力于消灭国家和自己的社会集团才能够建立伦理的国家，这个国家所努力的是结束那些曾经被统治的人的内部分裂并建起统一的——在技术和道德方面——社会机构。

关于黑格尔的把党和社会团体看做是国家的"私下的"阴谋的结果的学说。从历史来看，这个学说是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政治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它的目的是使立宪制度更为具体。这个学说要求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建立政府，但是这种同意并不是在选举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一般的和不确定的同意，而是在有组织的同意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国家的前提是同意而且要求同意，但是它也借助政治的和工会的团体用这种同意的精神来"教育"自己的公民；但是这些团体却是使领导阶级可以任意私自实行创议的私人组织。这样看来，黑格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纯粹的立宪制度并且研究出了多党制议会国家的理论。他的团体观还不能不具有模糊的和原始的性质，不能不处于政治观及经济观之间的中介地位，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经验还很少，只提供了一种完美的组织样式，即"团体"组织(也就是采用到经济里面的政治)。

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提出了两种基本的团体型式。第一是俱乐部，没有严格的组织。它们具有"人民集会"的性质。它们的集中是由个别的政治家来实现的，其中每个政治家都有自己的报纸并且利用报纸吸引某些不明事理的人的注意和鼓起他们的兴趣，而这些人随后就在俱乐部会议上支持报纸上的主张。无疑问的是在俱乐部会员之中一定有彼此十分了解的人凑成的小集团，他们在暗地里聚会，为俱乐部会议准备气氛，以便在必要的时机根据斗争的具体利益而支持某一个派别。

后来在1848年以前那个时期在意大利传布得十分广泛的秘密结社活动，在法国热月政变① 以后曾注定在雅各宾党第二条路线拥护者中间发展起来。在拿破仑当政时期，由于警察的不懈的监督，这些秘密结社活动具有很大困难。但是从1815年到1830

① 1794年7月27日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政变。——译者

年这段时期，也就是在复辟时期（这次复辟根本上具有相当自由的性质而且没有陷入特殊的顾虑之中），组织这种活动才比较容易了。在这个时期，即从1815年到1830年，在人民政治阵营里注定产生了分化，这种分化在1830年“光荣的日子”里范围已经很大了，当时出现了十五年来形成的一些组织。在1830年以后，一直到1848年，这种分化过程深刻了并产生了象布朗基和菲力普·布奥那罗蒂那样的十分成熟类型的活动家。

很难设想黑格尔详细了解这些历史经验。相反，在马克思著作中这些经验却具有了很大生命力①。

资产阶级在法律理论中从而在确定国家职能中所完成的变革，主要是努力造成一致（因而在确立国家和法律的伦理性质中也是这样）。从前的统治阶级从其实质来看是保守的，这是就这个意义来说的：他们没有努力铺设道路，使其他阶级能够沿着它根本地转到他们自己这边来，也就是没有努力从“身体上”和思想意识上来扩充自己的阶级范围，因而坚持着一种闭关自守的帮会的主张。资产阶级做为一种处于不断运动中的有机体而确立起来，他们能够吸收整个社会而把它提高到自己的文化和经济水平。因此国家的作用有所改变：国家成了“教育者”等等。

什么迫使资产阶级停滞不前并且回到把国家看做是一种赤裸裸的力量的主张上来等等。这是一个问题。资产阶级已经“饱和”：他们不再扩大，而相反地，正在解体，他们不仅不再同化新的分子，而相反地，他们的一部分正陷入解体过程（或者至少解体的

① 关于这些事件可以参阅以下这些第一手资料：波尔·路易的著作和莫里斯·布洛克的《政治辞典》（Maurice Block, Dizionario politico）。欧乐的书对于研究法兰西革命是特别需要的。也应当看一看阿德勒对于《宣言》的意见。路齐奥的《共济会和意大利第一次复兴》（Luzio, La massoneria e il Risorgimento），是一本研究意大利的书，偏见很大。

范围较同化的范围无比地大)。会确立起一个能够同化整个社会并且在实际上的确能表现出这一过程的阶级，——这个阶级能够极度地改进国家观和法律观，使它达到完美的程度，他们认识到取消国家和法律的必要性，因为国家和法律由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且即将被市民社会所吸收而成了无用的东西。

一般承认的关于国家的观点具有片面性，并且会造成严重错误，这一事实可以不久以前出版的达尼埃尔·哈列维的《自由的衰落》〔Daniele Halévy, Décadence de la liberté〕一书为例，就会看得很清楚，对于这本书的评论，我在《新文选》上看到了。哈列维认为“国家”是代议机关，他并且发现从1870年起直到今天这一时期，法国历史中的最重要事件不是由根据普选产生的政治机关活动决定的，而是个别机构(资本家团体，参谋总部等等)，或是国内不知名的伟大人物的活动决定的。但这难道不是表明承认下面这个事实，即所谓“国家”除了理解为政府机关之外，还必须理解为“个别的”“领导”机关或公民社会吗？必须指出怎样由这种对于逃避干涉的和甘心当事件的尾巴的“国家”的批评中产生独裁性质的、要求加强行政权的右倾思潮等等。但是须要翻阅一下哈列维的书，以便判明他是否已走上这条道路；对他来说，在原则上这根本不是困难的，假使考虑到他以前的那些言论的话(他对于索勒尔，对于莫拉斯等人的同情)。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在其小册子《国家政变的技术》的前言里似乎坚持“一切在国家之内，没有在国家之外的东西，没有反对国家的东西”这个公式，与“凡是有自由的地方就没有国家”这一原理是等同的。这个原理中的“自由”一语并不是在普通的“政治自由，即出版自由等等”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而是做为“必然性”概念的对

立物来使用的，并且与恩格斯的关于从必然性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的原理相联系的。但是马拉巴特对于这个原理的意义甚至没有些微观念。

在关于国家职能（狭义地做为政治-法律组织来理解）的论战（附带讲一下，这是肤浅的论战）中“国家—守夜者”（Veilleur de nuit）的说法与“国家—卡宾枪手”的意大利说法相等，它所表示的国家职能只限于维持公共秩序和保证守法。同时却没有提到在这种制度的形式下（而且这种制度只是以纸上的假设型式存在过）历史发展的领导属于私人的力量，属于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也是“国家”，并且不仅如此，市民社会恰好构成国家。

“国家—守夜者”的说法大概应该比“国家—卡宾枪手”或“国家—警察”的说法更具有讽刺的意味，前一说法看上去象是属于拉萨尔的。这种国家的对立物应该是“伦理的国家”或“国家—干涉者”（“实现干涉的国家”）。但是必须区别这两种说法。

伦理的国家的观点有哲学的和智力的渊源（它是知识分子所固有的；例子是黑格尔的观点），而且的确可以把它拿来同“国家—守夜者”观点并列，因为它勿宁属于世俗国家的独立活动（教育的和道德的），而与世界主义和做为中世纪残余的宗教—教会组织活动的特点的那种干涉相对立。至于国家—干涉者的论点，则具有经济的渊源，并且一方面同保护关税政策的思潮或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相联系，另一方面同一种企图迫使封建主和地主出身的某些国家干部担负起“保护”劳动者阶级不受资本主义过分行为残害（俾斯麦和狄兹勒里① 的政策）的责任相联系。

这些各有不同的倾向可以各式各样地结合到一起，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自然，自由主义者（“经济主义”的拥护者）赞成“国

① 英国伯爵（1804—81 年），反动政客，作家，英保守党魁。1868 和 1874—80 年任英首相，实行对外扩张政策。——译者

家—守夜者”并且愿意把历史发动权赋予市民社会和各种正在蓬勃发展的力量，如果存在有关心“老实地”进行“赌博”并遵守它的规矩的“国家—看守者”的话。谈到知识分子，那么自由主义者也好，甚至国家—干涉者的拥护者也好，对待各种不同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可能在经济方面是自由主义者，而同时在文化方面又是干涉主义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天主教徒关心的是国家—干涉者的存在，因为它的行动专门对他们有利。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或者在他们占少数的那些地方，天主教徒就赞成“漠不关心的”国家，因为它不至于支持他们的敌人。

必须考虑下列这个问题：把国家看成是宪兵或守夜者（把“国家—宪兵”，“国家—守夜者”等等术语问题撂在一边）的观点，是不是那种把国家看做唯一能克服最后的经济—团体阶段的观点呢？

我们往往把国家和政府等同起来，而这种等同恰好是经济—团体形式的新的表现，也就是混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新的表现，因为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有一种关于国家的学说认为国家注定要结束自己而熔化在被调整了的社会之中，——在这种学说里上述问题占着中心的地位。可以设想，国家强制的一面将由于确立起来了被调整了的社会（即伦理社会或市民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因素而逐渐结束自己。

“伦理国家”或“市民社会”的说法似乎应该表明大学问家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具有这种没有国家之国家的“观念”，因为他们立脚于纯粹的科学（就是纯粹的乌托邦，因为乌托邦的基础是假定所有的人都的确彼此平等，从而理智和道德也是程度相等，即能够自由

地、自动地接受法律，而不是由于强制的结果，也就是不是由于其他阶级做为一种与意识格格不入的东西强加在头上的结果）。

必须考虑到是拉萨尔把"守夜者"的说法运用到自由国家上面来的。他是教条主义地而不是辩证地观察国家。（应该详细地研究拉萨尔的学说，要从这方面研究，也要从它一般地对待国家的态度来研究，要从它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观点来研究。）在把国家做为被调整了的社会的学说中，须要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国家"将类似"政府"，而与"市民社会"等同；在后一阶段中国家将以"守夜者"的身份出现，也就是将成为强制的组织，它保卫被调整了的社会的因素的发展，因而这些因素将不断增多，结果这个组织的权威的和混乱的干涉将逐渐减少。但是这不能做为理由去考虑新的"自由主义"，哪怕是做为根本自由的纪元的开始。

假使任何一种型式的国家都确实不能不通过经济—团体的原始主义的阶段，那么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认为建立新型国家的新的社会集团的政治领导权的内容，应该主要具有经济性质呢？要知道在这种场合下问题是改造经济结构和改造人同经济世界即生产之间的具体关系。这时上层建筑的因素不能不是在发展上还很薄弱的；这些因素的活动归结为预见和斗争，同时"计划的"原则所起的作用显然是还很不够的；文化计划主要将具有消极的性质，只不过是批判过去的，忘掉并破坏旧的，而积极建设的计划只是最"概括地"制定出来，随时都可以（而且必须）修改，以便使计划符合重新建立起来的经济结构。

在中世纪公社时代恰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相反地，仍然属于教会特权的文化，正好具有反经济的性质（这是指产生了的资本主义经济而言），这种文化的目标不是建立新兴阶级的领导权，而相反地是阻止这个阶级取得领导权。因此，人道主义和文艺复兴带

有反动性质，因为它们意味着新兴阶级的失败和对于这个阶级所带来的那种经济制度的否认等等。

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关于国家的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有机关系的问题。对内政策决定对外政策，还是相反呢？在这种场合下也必须区别那些国际立场相对独立的大国同其余的国家；此外，也应该考虑各种统治形式（例如拿破仑第三时期的那种型式的统治，他显然实行双重政策：在国内实行反动的政策，在国际上实行自由主义的政策）。

战前和战后国家状态的问题。不容置疑在列强某种联盟中，各该国家在战临和平时期所处的那些条件是有意义的。因此可以产生这种情况：在战争期间掌握领导权的到最后会失掉它，因为它在战争中削弱了，它只有看着那个比较"走运的"或者比较擅于"服从的"变成领导者。在"几次世界大战"中正是这样的，当时地理的环境迫使这个国家把所有自己的资源都投到战争的熔炉里；他为了联盟国家而赢得胜利，但是胜利到来时他已经衰弱不堪了。因此，在"大国"的定义中应该包括许多因素，特别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也就是"经济的和财政的潜力"和居民。

个人和群众

拉丁谚语："元老是高贵的人士，而元老院却是只野兽（«Senatores boni viri, senatus mala bestia»）——已成陈辞滥调。这句谚语的意义何在，它说明什么？它的意义在于一群人被具体利益所控制或者为热情的支配，这种热情是由不加批判地口口相传的一时的印象所引起的，——这一群人结合在一起来通过一项符合最低级的动物本能的集体的坏决议。这种观察是公正的和实在

的，因为它是指偶然聚在一起的人群而言(正如"大雨时在棚下避雨"的一群人)，这些人彼此不负责任，对集团不负责任，对具体经济活动也不负责任，而这种活动的瓦解会引起个别人的灭亡。因此可以这样讲，在这群人里面个人主义不但不能克服，而且由于完全没有惩罚和完全不负责任反而变本加厉了。

但是有一件事实也是众所周知的，由一些固执的和没有纪律的人形成的"组织得很好的"群众却能一致地通过胜于中等的个人所能采取的集体决议，数量转为质量。不这样，军队的存在就是不可能的，不这样，在一定情况下一些很有纪律的集团所能做出的空前的牺牲就是不可能的，这时他们身上所有的社会责任感由于直接感到共同危险而特别强烈起来并且感到未来比现在更为重要。可以举广场上的群众大会为例，这种群众大会与室内的群众会议不同，也与工会等等会议不同。参谋总部的军官会议根本不同于全排战士会议等等。

在现代世界上一致主义的倾向更为流行，而且比较过去具有更为深刻的性质，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的标准化遍及全国或甚至遍及整个大陆。

人的集体的经济基础是大工厂，泰勒生产方法，合理化等等。但是在过去存在过人的集体没有？用米开尔斯的话来说，它在神意的主使下存在过。这就是说，集体意志是在直接感化的影响下，在"英雄"、代表人物所给予的冲动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但是这种集体意志是受外部因素制约的，因此时而产生时而破灭。相反地，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集体的形成从其实质来看是由下而上，其基础是集体性因素在生产世界中所占据的地位。到了今天，在这种形成的过程中代表人物也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这个作用比起过去要小得多，即使没有这种代表人物，也不会引起集体团结的削弱和它的破产。

据说“西方学者认为群众的心理不外是原始人群古昔本能的表现，因此要把它看成是重返早已经过的文化阶段”。这种应该属于所谓“群众心理学”的，也就是应该属于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人们的心理学的论断，是伪科学的，并且是与实证论社会学相联系的。

关于社会“一致主义”一节，应该指出的是这一问题不是新问题，而某些知识分子的大惊小怪是很可笑的。一致主义一直存在着。而今天的问题是“两种一致主义”之间的斗争问题，也就是关于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和关于市民社会危机的问题。曾在社会的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领导过社会的旧的领导者觉得他们的立脚点要跨台，理解到他们的“说教”也只是“说教”而已，——成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东西，成了没有内容的光秃秃的形式，成了毫无生气的幽灵；由此也就产生了他们的绝望，他们那些保守的和反动的倾向。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特殊形式的文明，文化和道德在解体，于是他们就喊叫一切文明，一切文化，一切道德都要毁灭，并要求国家采取镇压措施。这些领导者组成处于实在的历史过程之外的反抗集团。这样一来，他们就增加了危机的持续性，因为一定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没落不能不发生危机。另一方面，代表即将出现的新制度的人们，由于对旧的事物的“合乎理性的”憎恨，就传布一些空想和臆造的计划。

这种现实所孕育着的新的制度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是生产世界，是劳动。对于即将建立的道德和思想体系的规定以及即将传布的原则进行任何分析时，应该以最大限度的功利主义这项标准做为基础；集体的和个人的生活应该组织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机构的基础上。在新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力量并且向前发展新的经济结构将解决不能不有的矛盾，并且自下面建立一种新的“一致主义”，从而为自我律，也就是为个人自由开阔新的可能性。

历史主义的"矛盾"和它们在文学上的表现(讥笑、讽刺)

我们来考虑一下阿德里安诺·铁尔格的反对历史主义的著作。从波那温吐尔·戴基的论文里(《造物主布尔齐奥》载于1929年10月20日《意大利文学》)看出了菲力普·布尔齐奥的一些出发点。根据这些出发点来看,布尔齐奥(如果抽出语言的艺术性里抽象和带有文学奇谈倾向的结构的话)对于产生在唯心论的和完全的历史主义的基础上的"心理上的"矛盾研究得相当深刻。

必须审慎地思索下列的论题:"要超乎热情和感情之上,哪怕你已经感受到了它们",——从这个论题大概能够做出许多结论来。在事实上,由于历史主义而产生的整整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铁尔格未能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在于断定"在同一个时间可以又是批评者又是行动的人,同时这一方面不但不削弱另一方面,而且甚至加强另一方面"。铁尔格很肤浅地而且机械地分开一个人的两面,因为没有而且向来也没有一个人完全从事批评和一个人整个陷入热情。相反地,应该试着判明在各种不同历史时期这两面怎样在单独个人身上和在社会阶层中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构成知识分子社会职能问题的一个方面),使得某一面显然占优势(是指批评的时代,行动的时代等等)。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柯罗齐哪怕在自己那些力图描画出"政治—热情"观的轮廓的著作里深刻地分析过这个问题:正如柯罗齐所说,假使政治领袖个人实现着具体的政治行动,那么也就应该注意到这个领袖所具有的特点当然不是热情,而是冷静地、准确地、客观地估计参加斗争的力量和这些力量的对比关系(假使所谈的政治是表现于决定性的形式中——战争形式中或任何其他武装斗

争形式中的话，那么这一点就具有更大的意义）。领袖鼓起热情并指导这种热情，但是他自己却“不坠入”热情，或者控制热情，以便能够更有效果地发挥它们的作用，或者在必要的时机抑制它们，使它们就范等等。领袖与其直接“感觉”它们，勿宁应该把它们做为现实的客观因素，做为一种力量而加以认识；他应该认清并理解这种热情，即使对它们抱着很大的同情（这时热情具有更高的形式，对这个形式必须根据布尔齐奥提出的论题加以分析）。

根据戴基的论文来判断，布尔齐奥常常指明“讥笑”是立场的特点（或者特点之一），这种立场的集中表现为以下的公式：“要超乎热情和感情之上，那怕你已经感受到了它们”。显然，“讥笑”的态度不可能是一个政治领袖或军事领袖对彼他的拥护者和他所领导的群众的热情和感情的态度。在甚至对建设文化世界也不负直接责任的单独的知识分子的态度里，“讥笑”是可以说得通的，“讥笑”也同样可以表现一位艺术家脱离了他的作品内容所充满的那些感情（他能“理解”这些感情，但是不“接受”它们或者以另外方式“接受”，以在智力上更为微妙的形式接受）。在历史活动方面“讥笑”的因素只具有文学的、臆造的性质并表现为一种显然与或多或少的肤浅的怀疑主义相联系的疏远的形式，而这种怀疑主义是由失望、疲倦和想做“超人”产生的。

相反地，在历史一政治活动方面，“讽刺”则是一种合适的文体上的要素，是一种异化一理解态度上的特点，而它的特殊形式则是“热情的讽刺”。在实践哲学创始人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热情的讽刺在伦理学和美学方面最鲜明的表现。它也采取其他的形式。在人民信仰或人民幻想（信仰正义、平等、友爱，也就是信仰由于从法国革命继承下来的民主倾向而传布开来的思想因素）面前，这种讽刺是热情而“积极的”，是具有建设性的，是具有进步性的；十分明显，它的目的不是嘲笑潜藏在这些信仰和这些幻想里面的

最隐密的情感，而是嘲笑它们那种与一定"腐朽的"世界有联系的外形，嘲笑从尸体发出来的臭气，嘲笑从那些建立"不朽原则"的专家们所涂抹的一层人文主义红粉下面发出来的臭气。同时也还存在有"右派的"讽刺。这种讽刺只在很少的场合下是热情的，但是它经常带有"消极的"，怀疑的和破坏的性质，这不仅是对偶然的形式如此，而且对这些情感和这些信仰的"人的"内容也是如此（关于应该对"人的"这个定义赋予什么样的意义这一问题在许多书里都探讨过，而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的是"神圣家族"）。人们企图借助第一种讽刺给予包含在这些人民信仰里面的那些愿望中有生命的东西以一种新的形式，从而企图更新并且更为确实地确定这些愿望，而不是破坏这些愿望。右派的讽刺，相反地，正是为了消灭这些愿望中有生命的东西（不是在人民群众中间，因为这样一来也就要消灭流传在人民中间的基督教，而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因此对"形式"的攻击只是一种"教训的方式"。

正如经常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讽刺的最初的独创的表现具有模拟的和鹦鹉学舌的性质。文体变成"文体学"，变成一种机械、密码、行话，这些都完全能够成为进行有趣的观察的理由。例如，"文明"这个辞经常都冠以形容词"所谓的"来使用，这就使人们有权设想：说话的人相信抽象的典范的"文明"的存在，或者最低限度他们就象当真相信这一点似地去行动，也就是他们思想的方向在改变——他们从批评的和历史主义的立场转到空想性质的思维的立场。讽刺在其最初的形式中应该看做是一种能揭露过渡时期矛盾的表现的方式。人们企图借助讽刺来同旧论点的人道主义的次要表现保持联系，同时强调同这些统治的和主导的论点决裂，期待新的论点将由于自己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取得的巩固性而占据统治的地位并且最后将具有"人民信仰"的力量。这些新的论点已经被那些擅长讽刺的人很确实地掌握了。但是这些新的论点必须表现

和宣布在“政治”上，否则它们就会成为“空想”，因为它们从表面上会被人看成是单独个人的或者秘密会议的“专断”。另一方面，“历史主义”根据它自己的本质，不能把自己看成是一种要求以肯定无疑的或说教的形式来表现的东西，而应该创造新的文体甚至新的语言，做为智力斗争的手段。因此“讽刺”（也和从狭隘的文学方面教育小集团的“讥笑”一样）看上去象是一系列理论的和实践的要求的文学成分，而这些要求从表面上来观察可能象是矛盾的；讽刺的重要特征是“热情”，它将成为个人文体力量的标准（与鹦鹉学舌和机械主义相对立的诚恳性和坚信的深度的标准）。

从这个观点出发，必须考虑一下柯罗齐于1917年给他那部《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写的序言里最后的一些说法。在这篇序言里所谈的是“魔法师阿尔钦那”的问题，以及一些对罗里阿教授文体的意见。因此也应该看一看德文版弗兰兹·梅林[①]的关于“寓言”的概论等。

拜物教

怎样可以说明拜物教？集体是由单独的个人组成的，这些单独的个人所以能组成这个集体正是由于他们处于少数为首者的统治之下并积极地接受了这个少数人的一定的领导。如果每个组成这个集体的个人把集体看成是一种对于自己格格不入的东西，那么显然这个集体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了并变成了普通的虚构，变成了偶像。必须思考一下，这种很流行的思维方法是不是从天主教的超验论和旧的权威制度（regimi paternalistici）承袭下来的，因为它遍及许多有机体，例如国家、民族、政党等等。自然，这种情

① 弗兰兹·梅林：《卡尔·马克思是位思想家和革命家》，维也纳，1928年版。——意文版编者

况的产生是由于教会，因为至少在意大利梵蒂冈许多世纪以来为了根绝内部民主和教徒干涉宗教活动的一切遗迹所进行的工作是完全成功了并且成了教徒的第二天性，即使这项工作恰好由于这一点而创造了意大利人民所固有的那种天主教的特殊形式。

下面这个事实是使人吃惊的（但同时也是典型的），即不象政党或工会那样具有“公开”性质的一些“志愿的”组织在重复拜物教。它们喜欢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看成是二元的并且采取个人对集体表面批评的态度（如果这种态度不是非批评的热心和赞美的话）。在任何场合下这是一种拜物教的态度。个人即使他自己什么也不做，却希望集体有所行动，但是没有想到正由于这种观点流行得很广，所以集体就必不可免地陷于无所作为。此外，必须承认，由于决定论的和机械论的历史观点（也就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消极态度相联系的健全理性论点）流行非常广泛，任何个人因为看到虽然他无所事事，却经常有什么事物在发生，所以就会产生一种想法，以为不依赖单独的个人而存在着一种幽灵的东西，存在着集体的抽象，存在着一种独立的神，他尽管不是用具体的头脑思考，但总是在思考，他尽管不是利用人的腿脚移动，但总是在移动。

看上去好象某些思潮，例如把个人与国家等同起来的现代唯心主义的思潮（乌哥，斯皮里托）必然会改造单独个人的意识，但在事实上却看不到这一点，因为这种等同带有纯粹口头的和宣言的性质。这一点应该适用于任何形式的所谓“有机的集中制”，它的立脚点是预想（这种预想只有在非常的时机，只有在人民的热情极度高涨的时机才是准确的）下面的事实对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起决定作用：领导者维护被领导者的利益，因此“应该”获得他们的同意，也就是单独的个人与整体应该等同，同时整体（不问它是什么样的集体）应该由领导者代表。必须考虑一下，这样的论点对于天主教会是否不仅有用，而且必需和必要呢；的确，任何

形式的来自下面的干涉都会造成教会行列中的混乱（以新教教会为例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对于其他的集体来说，关键的问题不是被领导者消极的和间接的同意，而是单独个人的积极的和直接的同意，从而是单独个人参加它们的活动，哪怕这样会在表面上造成瓦解和混乱。集体认识以及生气勃勃的集体组织只有在群众通过单独个人的不同意而达到统一之后才能建立起来，因此就不能说"沉默"意味着没有群众。

正在进行调音的乐队，由于每件乐器各自调音，所以造成一种声调极不悦耳的印象；但是这种调音却正是使整个乐队能象音调一致的"乐器"一样演奏的先决条件。

第三部分　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

I. 第一次复兴时期①

1. 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

第一次复兴时期和它以前的历史

第一次复兴时期问题必须从两个方向研究。其中一个方向是研究第一次复兴时代，另一个方向是研究第一次复兴时代以前的意大利半岛的历史，因为这一段历史创造了文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第一次复兴时代得到了反响（肯定的和否定的），并且继续在意大利民族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哪怕是做为宣传的思想意识要素），因为这个民族是在第一次复兴时代形成的。

从第二个方向来研究，就应该以那一套探讨欧洲历史中和世界历史中在意大利半岛上得到反响的那些时代的著作为对象。例

① 第一次复兴时期——(Risor gimento)是意大利人民为统一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时期(1821—1870年)。这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结果于1870年统一了意大利。这是第一次复兴时期。第二次复兴时期则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1943—1945年的民族解放斗争。

如：

1.关于“意大利”这个词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意义的论著，可以卡尔洛·齐波拉教授的有名的纲要为起点（这部纲要必须补充和进一步明确）。

2.关于以从共和国转入帝国为标志的那一段古罗马历史时期的论著，——因为这一时期创造了未来意大利民族某些思想倾向的一般轮廓。看上去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实际上正是恺撒和奥古斯都（屋大维）以激进的方式改变了罗马和半岛在古代世界内部的力量平衡中的地位，使意大利失掉了“领土的”领导权并且把领导权转给了“帝国的”，也就是超民族的阶级。如果说恺撒承继了和完成了革拉古兄弟，马里和卡梯林那的民主运动是对的话，那么恺撒赢得了胜利也是对的了，因为革拉古兄弟，马里和卡梯林那所要在半岛上、在罗马解决的问题临到恺撒面前就是整个帝国范围内的问题了，而在帝国之中半岛只不过是一部分，罗马只是个“官僚的”首都，而且也仅仅是到一定时期为止。

这一关键性的历史阶段对半岛的和罗马的历史来说，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它是罗马和半岛“失掉国家地位”过程的开端，并且是半岛变为“世界性的领土”过程的开端。利用符合他们时代的方式和手段统一了半岛并建立了民族发展基地的古罗马的贵族，这时被帝国的力量和那些他们自己所招致的问题压制下去。恺撒挥剑斩掉历史的政治的症结，开始了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东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至归根结蒂压倒了西方，而这就造成了帝国两部分之间的分裂。

3.关于中世纪的或者关于公社时代的论著，在这些公社里隐蔽地产生了新的城市社会集团。但这一过程在意大利并没有达到象在法国，在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所达到的那种比较高的成熟程度。

4. 关于重商主义时代和专制君主时代的论著。这个时代的出现正好在意大利具有有限的民族的意义，因为半岛正处于外国势力之下，可是同时在欧洲的大的民族国家里新的城市社会集团抱着统一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地加入到国家机构里面来，他们一面加强了这个机构本身，一面也加强了中央集权制，从而建立了社会力量的新的平衡。这样一来，这里就形成了迅速向前发展的条件①。

中世纪资产阶级，其发展停留在经济-团体阶段

应该明确国家的独立和自主具体表现在哪里，而在十世纪以后这一时期它们的内容又该是什么。时至今日一些处于大国领导下的联盟的作法，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行动的自由成了问题，而特别是确定自己行动路线的自由成了问题。在十世纪以后，由于帝国和教皇的国际职能并且由于帝国掌握了独占军队的特权，这一现象应该表现得最为明显。

做为现代国家的经济-团体阶段的中世纪公社

雕特烈第二

在一篇标题为《斯威福国家的灭亡和现代历史编纂学》的论文

① 这些论著的对象应该是固定的某类读者，目的是打破那些通过流行于人民的一定范围内的思想消极地接受的烦琐而表面华丽的论点。这些论著的目的是鼓起对所探讨的问题的科学兴趣，因此这些问题将做为重要而迫切的问题被提出来，时至今日更将做为完全现实的动力被提出来。

里(载于1930年3月16日《新文选》)，拉法艾罗·摩尔根提出了一些关于腓特烈第二的最新的传记资料。米恺兰杰罗·斯吉普写了一本小册子《腓特烈第二时期的西西里和意大利》(那不勒斯。那不勒斯祖国历史协会，1929年)，其中有几节专门论述中世纪的公社和意大利知识分子的世界性职能，从这几节里所表现出来的对意大利历史的"了解"来看，这本小册子是值得注意的。当然，如果斯吉普当真对于反抗腓特烈的公社和教皇"有些气愤"的话，那么这是反历史的。但是这证明教皇反对意大利的统一而且公社没有超出中世纪的范围。

当摩尔根写出在腓特烈与教皇斗争时期公社"都焦急地和忧愁地向往着未来等等"的时候，他又陷入了另一个错误。"这是准备给予世界以新文明的意大利，这种新文明的基础是世俗的和民族的，而以前的文明则是世界性的和教会的"。摩尔根很难于以其它的方法来证实这种论断的正确性，也只能引证象《君主论》那样的著作。但是为了肯定一点，即著作不只是文化的因素而且也体现着民族，——为了肯定这一点是需要很多雄辩之才的。

腓特烈第二还同中世纪有联系没有？这是无疑义的。但是同样无疑义的是他同它断绝了；他反对教会，他容许异教存在，他采用三种文明——犹太的、拉丁的、阿拉伯的——并企图把它们结合起来，这都使他超出了中世纪范围。他是自己时代的人，但他确实能建立世俗的和民族的国家，而且与其把他看成是德国人，勿宁把他看成是意大利人等等。这里是整个地来考察问题的。甚至摩尔根的这篇论文也是可以利用的。

但丁和马基亚维利

清除后人在但丁政治学说上面先后所加的一切杂质而判明这

个学说的真正的历史意义是必要的。但丁的思想和学说是不是那样具有说服力和起作用，以至由于但丁做为意大利文化的因素所具有的那种意义而能激励和鼓起民族的政治思想呢，——这一点还须要弄清楚；但应该驳斥一种思想，即认为这样的理论具有有机意义上的直接的渊源的价值。以往某些问题解决的性质可以帮助我们现在找到解决同样问题的途径，这是由于在科学研究方面养成了一种文化的批判的能力。但是任何时候也不能说现在解决问题的性质渊源于以往问题解决的性质。它的解决的性质渊源于现时的情况，也只能渊源于此。这个标准不是绝对的，也就是不应该做到荒诞无稽的地步。在最后这个场合下就会造成经验主义：极端的现实主义也就是极端的经验主义。

应该善于分辨出重大的历史时期，这些时期总地提出了某些问题并从这些问题一开始产生就指定了它们解决的因素。这样，我以为但丁结束了中世纪（中世纪的一定阶段），而马基亚维利的出现正标明新世界的一个阶段已经能够十分明确地和深刻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并且制定出相应的解决它们的方法。认为马基亚维利渊源于但丁或者同他相联系——那就会犯严重的历史错误。例如，现在根据但丁的公式“十字架和鹰”来说明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见弗·科波拉的论著）就是最纯粹的幻想。在马基亚维利的君主与但丁的皇帝之间没有渊源的联系，在当代国家与中世纪帝国之间更没有这种联系。企图在意大利文化阶级于各种不同时代所有的精神生活的表现之间建立渊源的联系正好就是一种民族的“花言巧语”：真正的历史用历史的幻影来代替了（同时这根本不是说这一事实毫无意义——它只不过是没有科学的意义而已。它是一种政治因素；不仅如此，它是一些争取文化和政治领导权的小集团的政治和思想组织的次要和从属的因素）。

我以为应该把但丁的政治学说看做是他的传记的一个普通的

组成部分(这一点无论如何对于马基亚维利是谈不到的,也是不能适用的),但并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因为在任何一篇传记里,被描述的个人智力活动总是主要的,因此不仅这个人的行动重要,他的思想和幻想也同样重要。而我的用意是但丁的这种学说在历史-文化方面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和益处,而只是作为但丁的党遭到失败和但丁被赶出佛罗伦萨以后但丁本身发展中的一个要素,才具有意义。当时但丁自己的政治--公民的信仰、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热情、自己的世界观正处于激变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他的完全的孤立。不容置疑,他的新的政治方向只能有条件地称为"皇帝派"("吉别林派");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新的皇帝派",它超过了旧的皇帝派以及旧的教皇派(戈威尔夫派)。在事实上,问题不是政治学说,而是带有过去印记的政治空想,问题首先是企图把所有仅仅构成诗的素材的一切东西变成学说;这些素材正处于形成和创造热情的形成过程中,而这种创造艺情则是由于诗的幻想而产生的;这种幻想在《神曲》里得到自己的完成;在诗的"结构"上——企图的继续(这次以诗的形式)变感情为学说,而在"诗体"本身上——则采用冷讽热嘲和戏剧表演的形式。

但丁超出公社内哄——破坏与消灭互相交替——之上,幻想一种优于公社的,也优于依靠"贱民"的教会的,更优于依靠皇帝派的旧帝国的社会。他幻想一种能制定超然于各党派的法令的统治形式。这是一个在阶级战争中遭到失败并且幻想在仲裁政权庇护下消灭这个战争的人。但这是一个遭到失败而保存了战败者一切耻辱,一切热情和感情的人。同时这也是一位通晓过去的理论和历史的"学者"。他的概念中的过去是一幅古罗马帝国的梗概和它的中世纪的反映——"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他想要超出现在,但是他的视线是向着过去的。马基亚维利也同样回顾过去,但

比起但丁来，却完全不同，以及诸如此类。

佛罗伦萨公社的财政

安东尼奥·帕内拉在1930年7月号《飞马》上发表了一篇对巴尔巴多罗的一部书[①]的评论，里面谈到朱塞佩·卡内斯特里尼企图（没有完成而且也不成功）根据佛罗伦萨共和国和美第奇家族的官方文件写出一套专门论述佛罗伦萨科学和艺术的丛书（1862年出版了第一套也是唯一的一卷丛书）。吉威金写了关于热那亚公社财政的书，关于威尼斯的财政则由贝斯塔、柴西、路察托等人来写的。

巴尔巴多罗现在从事于佛罗伦萨财政的研究；从年代来看，他已经叙述到雅典大公当政以后设立"蒙泰"[②]的时期，而他研究的对象是直接税和国家的公债，也就是公社的经济结构的主要支柱（巴尔巴多罗也许应该补充研究间接税）。

税收的第一种形式——"佛卡蒂科"[③]——还带有封建捐税制度的痕迹，并且是已经确立了的公社自主性的可以感觉到的标记，因为公社已经把属于帝国的权力拿到自己的手中。

较为发展的形式——"爱斯蒂摩"[④]，这种形式的基础是一般地估计公民的纳税能力。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直接征税制度同统治阶级的利益相矛盾，因为统治阶级是财富的主要占有者，他们力

---

① 指贝尔那尔金诺·巴尔巴多罗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财政》〔Bernardino Barbadoro, Le finanze della Repubblica fiorentina, Olschki, Firenze, 1929〕。——意文版编者

② "蒙泰"——佛罗伦萨共和国中央财政机关，国家公债管理局。——俄文版编者

③ "佛卡蒂科"——（il focatico），家庭税或户口税。——译者

④ "爱斯蒂摩"——（estimo），土地税。——译者

图通过粮食税把捐税的负担转嫁到广大居民阶层的身上，于是产生了国家公债的第一种形式，即由有产阶层提供贷款或预借款以应国库的需要，而保证以捐税偿还。政治斗争受到“爱斯蒂摩”与粮食税之间的消长的制约。当公社陷于外国统治（卡拉布里亚大公和雅典大公）时，就实行“爱斯蒂摩”，而相反地，在一定时机内城市中却又能取消“爱斯蒂摩”（例如：1315年）。超出社会阶级利益之上的（这是帕内拉的看法，但实际上只是社会阶级的一定的平衡，因而人民得以限制富有阶级的万能）贵族统治能够实行公平分配赋税的原则，甚至能够改进直接征税制度直到1427年——即直到美第奇家族当政的初期和建立税籍册的寡头制度末期为止。

巴尔巴多罗这部著作之所以需要，正是为了证实公社资产阶级没有能够超越经济一团体阶段，也就是没有能够建立得到“被治理者信任”的并且有能力发展的国家。国家的发展只是在执政官的形式中才能实现，而非公社一共和国的形式中实现。

为了研究国家公债的政治意义，这本书也是值得注意的。当时的国家公债由于进行侵略战争，也就是由于力图保证资产阶级有广大的市场和运输的自由①而日益增多。国家公债所造成的后果也是值得注意的：有产阶级本来认为公债是把大部分赋税负担转嫁给广大公民阶层的一种手段，但由于公社没有偿还能力而倒了霉。这种没有偿还能力的现象正好同经济危机碰到一起从而使国内的贫穷加剧，助长了混乱。这种情况在雅典大公被赶走和“小人物”执政而设立了“蒙泰”以后引起了公债偿还无限的延期和利息的降低。

---

① 应该参照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关于公债的作用和意义所说的话。（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963年版第1卷第832、835页。——译者）

佛罗伦萨公社的灭亡

到了十五世纪，意大利商人的事业心猛然低落下来，他们宁愿把赚到的资金购置土地以便从农业中得到可靠的收入，而不愿再拿这些资金去冒险远航和在外国投资。

但是什么东西决定了这种创始精神的丧失的呢？促成这种情况的有许多因素：在城市—公社里激烈的阶级冲突；由于王室债务人没有偿还能力而造成的银行破产（巴尔第和白鲁齐的破产）；没有强大的能够保获自己侨民的国家；换句话说，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公社的结构本身，这种国家不可能发展成为领土广大的国家。从那时起，在意大利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落后观点，认为发财致富的唯一保证就是地产。必须精细地研究这一个时期，因为在这一个时期内商人变成了土地所有者，并且必须研究清楚究竟做生意和经营银行发生了什么危险。

1925—1930年佛罗伦萨的包围是佛罗伦萨历史上经济—团体阶段与现代（相对的）国家之间的斗争的最后一幕。历史家对于这次包围的意义进行论战① 是因为不善于估价这两个阶段，而这又是因为对于中世纪公社采取了表面看问题的态度。马拉马尔多可以算做是历史进步的代表，而菲鲁齐则是历史退步的代表，——这一切在道德方面可能令人感到不如意，但是在历史上这一点可以而且必须肯定。

由于公社资产阶级没有能够超越团体阶段，因而不能说他们

① 参阅安东尼奥·帕内拉与阿尔多·瓦洛里之间的论战，结果是瓦洛里在《狮像》上作了科学的投降，并在《法西斯主义者评论》里作了无味的报复（见1929年9月22日及10月13日《狮像》和1930年1月15日《法西斯主义者评论》）。——意文版编者

建立了国家（因为成为国家的勿宁是教会和帝国），也就是不能说公社超出了封建国家的范围，——由于这种情况在着手写这方面的东西之前，必须读一下卓阿基诺·伏尔培的《中世纪》一书。下面我引一段李加多·巴恺利的论文（1928年7月1日发表于《文坛》〔"Fiera Lettereria"〕）《许多生命》："无须追溯史前，也不要超出这本书的范围，我们可以指出的是伏尔培在《中世纪》里所论述的是公社的人民如何产生并且如何在'天赋他们一种特权'的环境中生活；这种环境是以前世界性教会和神圣帝国的那种思想所造成的；这种神圣帝国的思想是意大利做为人类文明的同义语和等价等强加给（？！）欧洲的，并且也是被欧洲这样接受和支持的，后来却成为意大利最（！）自然的历史发展成为现代民族的障碍（?!）"。应该查一查看，伏尔培对这种……奇怪的断语是否同意了。

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人道主义和文艺复兴

下列的说法表明什么：文艺复兴发现了"人"，使人成为宇宙的中心等等？难道在文艺复兴以前人不是宇宙的中心等等？可能应该这样讲，文艺复兴创造了与从前的文化或文明相对立的或发展了它们的新文化或文明。但是必须"指出范围"或"进一步明确"这种文化的内容是什么等等。在文艺复兴以前"人"什么也不是，可能后来却成了一切，这种说法对不对？要么就是人在其中力图成为一切的文化形成过程有了发展？也许应该这样说，在文艺复兴以前先验论是中世纪文化的基础，但是难道那些代表这种文化者"什么也不是"，或者难道这种文化对他们来说不是成为"一切"

的手段吗?[①] 如果文艺复兴是伟大的文化革命的话，那么这不是因为所有原来“什么也不是”的人相信他们成了“一切”，而是因为这种思想方式得到了传播，成了普遍的酵母等等。并不是人“被发现了”，而是产生了文化的新形式，也就是为了在统治阶级中造成新型人物所必需的那种力量的新形式。

久住意大利的瓦尔塞认为，要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一下当代意大利人的心理是有益的。据我看，这个意见特别是对宗教来说，是十分中肯的。这个意见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当前意大利的宗教精神是什么，可以不可以把它拿来至少同其他天主教国家的，特别是法国的宗教精神相比，更不要说同新教徒的宗教精神相比了。

无可争论的是意大利人的宗教精神是很表面的，同样无可争论的是这种宗教精神具有狭隘的政治性质，国际范围的领导权的性质。乔別蒂的《关于意大利人的道德的和公民的优先地位》一书是同这种宗教精神的形式相联系的。这部书也促进了以前处于分散状态的那种东西的巩固和系统化。

不应该忘记：从十六世纪开始以及在以后的时期中，意大利参加了世界历史——首先是做为教皇的教廷所在地，同时也是因为意大利的天主教不止被看做是国家的和民族的精神的别称，而且毫无疑问地也被看做是世界的领导职能，也就是帝国主义的精神。

认为反教权主义是一种反对特权等级的斗争形式，这也是公正的；而且不能否认意大利宗教阶层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所起的作用，比起其他国家来重要的多，因为在其他国家里民族的形成限制了教会的作用。世俗知识分子敌视教皇的教廷，和由于反对教权主义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冷讽热嘲”等等也都是由教会知识分子占

① 无论如何，应该把那些从十四世纪开始就成为传统的反对僧侣的冷讽热嘲同那种对于宗教的生活论的多少属于正统的观点区别开来。

优势所造成的世俗知识分子与教会知识分子之间斗争的形式。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怀疑主义和异教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纯粹表面的性质，并且可以同一定的宗教精神结合起来的话，那么在瓦尔塞看来认为比较危险的人民的①不体面的表现（谢肉祭日的乘车狂欢尽情歌唱等）也可以这样来解释。

瓦尔塞写道，无论在我们今天，无论在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都能够“分别地和同时地发展人对于现实的感受能力的两方面——合理的和神秘的，——这样一来，已经达到绝对怀疑主义的合理主义又以一条看不见的为北方居民所查觉不到的线索同最原始的神秘主义，同最盲目的宿命论，拜物教和愚昧的迷信联在一起了。”这些见解大概是瓦尔塞对布尔克哈尔德和戴·桑克蒂斯的关于文艺复兴的论点最重要的修正。杨纳认为瓦尔塞不能够在人道主义与文艺复兴之间划一条界线，并且如果没有人道主义就可能没有文艺复兴的话，那么文艺复兴从它的意义和后果来看却是超乎人道主义的。但是即使这样来区别的话，也应该比较更微妙更深刻才行：可能比较正确的意见是：文艺复兴是一个很重要的运动，这个运动从十世纪以后开始，同时狭义的人道主义和文艺复兴却是这个以意大利为主要中心的运动的两个完成了的要素，而整个历史过程具有不是狭隘意大利的性质，而是具有全欧洲的性质。

意大利是做为这个全欧洲的历史运动的文字表现的人道主义和文艺复兴的主要中心。但是十世纪以后的进步运动，虽然它由于公社而起了很大的作用，却恰好在意大利衰落了，恰好同人道主义和文艺复兴一起衰落了，因为人道主义和文艺复兴在这个国家里具有退步的性质，可是同时在欧洲其余部分总的运动却在民族

① 见多米尼科·古艾里《关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民运动》(D.Guerri, La corrente popolaze nel Rinascimento, Berte, burle e baie nella Firenze del Brunellesco e del Burchiello, Sansoni, Firenze, 1931)一书。——意文版编者

国家中完成了，随后在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葡萄牙的世界扩张中完成了。在意大利与这些地区的民族国家相符合的是亚历山大六世建立的做为君主专制国家的教廷组织，是把其余意大利地区分开的组织。在意大利马基亚维利理解到，没有建立起民族国家，则文艺复兴不成其为文艺复兴，但是他个人从理论上概括的不是意大利事件，而是意大利境外所发生的事件。

根据杨纳的说法①，我们对于文艺复兴的概念主要决定于两部巨著：雅科夫·布尔克哈尔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戴·桑克蒂斯的《意大利文学史》。

在意大利国内对布尔克哈尔德这本书的解释各有不同。它出版于1866年，在欧洲引起广泛的反响，对于尼采的超人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这样一来，产生了（特别在北欧国家中）论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佣兵队长的大量著作；在这些著作里面庄严地声明个人不顾道德上的限制对美好的生活和英雄的生活的权利，对行动的自由的权利。这样一来，文艺复兴体现在希吉斯梦多·马拉铁斯塔②，柴札列·鲍札③，里夫十世④，阿列金诺⑤的身上，也体现在理论家马基亚维利的身上，更体现在独树一帜的米开兰基罗的身上。在意大利对文艺复兴做这种解释的以邓南遮为代表。

---

① 见阿尔明尼·杨纳1933年8月1日发表于《新文选》上的对恩斯特·瓦尔塞一书的评论。(Ernst Walser, Gesammelte Studien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r Renaissance, Benno Schwabe, Basel, 1932)

② 马拉铁斯塔·希吉斯梦多（1417—1468）——里米尼的统治者之一，有名的佣兵队长。在他身上结合了佣兵队长所有的典型性格——粗暴、残酷、政治上没有原则，又爱好诗歌，保护许多出色的人道主义作家和艺术家。——俄文版编者

③ 柴札列·鲍札(Cesare Borgia, 1476—1507)西班牙血统的意大利主教，教皇使节。马基亚维利在《君主论》中对他的性格有生动的描写。——译者

④ 利奥十世(Leo X, 1475—1521)1513—1521年为罗马教皇。肆无忌惮地贩卖免罪符，造成德国宗教改革的借口。他爱好文艺，奖励文艺活动。——译者

⑤ 阿列金诺·彼埃特罗（Aretino, Pietro, 1492—1556）——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讽刺作家。——译者

布尔克哈尔德的这部著作（于1877年由瓦尔布萨译出）在意大利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影响；意大利文的译本特别强调了布尔克哈尔德认为文艺复兴所具有的那些敌视教廷的倾向，而这些倾向正与第一次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倾向和文化倾向相吻合。布尔克哈尔德所阐明的文艺复兴的另一个要素——个人主义和新的气质的建立，——在意大利也被看作是反对体现在教皇制度中的中世纪世界。对于精神充沛的生活和纯洁的美的赞扬在意大利表现得程度较小。佣兵队长、冒险家、放荡者所引起的注意较小。

这些意见也许应该考虑；这正是那种该当归诸意大利的关于文艺复兴和新的生活的解释（好象它确实来源于意大利），但他却不是别的，而是对于专门探讨意大利的德国书的解释。

戴·桑克蒂斯强调文艺复兴时代政治和道德败坏的阴郁的色采。尽管可以承认文艺复兴所具有的一切优点，但是它却破坏了意大利，并使他成了外国人的奴隶。

总之，布尔克哈尔德把文艺复兴看做是欧洲文明新的进步的时代的起点，是产生新人的摇篮。在戴·桑克蒂斯看来，从意大利历史的观点出发并且专就意大利而言，文艺复兴是退步的起点等等。但是布尔克哈尔德与戴·桑克蒂斯在分析文艺复兴时代的细节中是意见一致的，而且都同意把新气质的形成，在对待宗教、权威、祖国、家庭方面同一切中世纪的联系决裂，做为文艺复兴的要素。

根据杨纳的说法，最近十年或十五年内在学者中间主要是天主教学者中间逐渐形成一种相反的潮流，他们尽力否认文艺复兴的这些特征（布尔克哈尔德和戴·桑克蒂斯所强调指出的事实）的实在性，并且企图把另外一些与前者在很大程度上相反的特征提到首要地位上面来。这些是意大利的奥尔札蒂，札布金，托梵尼恩和德语国家的巴斯托尔（《教皇史》前几卷）和瓦尔塞。瓦尔塞有专

门研究普而奇的信仰的著作。(Lebens-und Glaubensprobleme aus dem Zeitalter der Renaissance, in «Die Neueren Sprachen», 10. Beiheft)

他们继续着沃尔皮和其他一些人的研究工作，进而分析了普而奇异端的性质和尔后使普而奇势必舍弃这种异端的情况。在这次探讨中，他"最令人信服地"判明了这个异端的根源(阿威罗伊主义①和神秘的耶稣会流派)并且表明普而奇的问题不止是同正统的宗教感情决裂的问题，而且是关于他的新的信仰(由魔法和降神术结合而成的)的问题，而这种信仰尔后变成了广泛的包罗一切信仰的东西，并且对这些信仰完全宽容。

应该考察一下降神术和魔法是不是那个时代的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所应采取的合法的形式，也就是是对天主教先验论的反动，不是粗糙和原始的内在论的最初形式。

在杨纳所评论的那一卷里，也许特别能引起人的兴趣的是下列三章，因为它们说明了对文艺复兴的新的解释："第一次意大利文艺复兴论点中的基督教和希腊罗马文化"，"文艺复兴时期思想潮流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的问题和艺术的问题"。

瓦尔塞认为布尔克哈尔德肯定文艺复兴似乎具有异教的、批判的、非宗教的性质并且是与教廷敌对的说法是不对的。第一代的人道主义者象佩脱拉克，薄伽丘，萨留塔蒂在教会面前并没有同中世纪学者的原则决裂。十五世纪的人道主义者波阜、瓦拉、白卡德里其批判性和自主性更为强烈，但是在启示录面前他们尚且表示沉默并且接受了它。

---

① 指阿拉伯哲学家阿威罗伊(Averrois, Abul Walid mohammed,即伊本·路西德 Ibn Roschd,1126—1198年)的学说。阿威罗伊把宗教与哲学结合了起来。阿威罗伊的哲学学说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也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译者

在这种论断上瓦尔塞是同托梵尼恩一致的。托梵尼恩在其《什么是人道主义?》〔G. Toffanin, Che cosa fu l'Umanesimo? Il Risorgimento dell'anticità classica nella coscienza degli Italiani fra i tempi di Dante e la Riforma, Firenze, Sansoni (Biblioteca storica del Rinascimento)〕一书中证明,人道主义由于崇拜拉丁语风和罗马风,所以比起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用民间语言写作的学术著作来,其正统性要大得多。(假使在文艺复兴进程中人道主义同在十世纪以后开始形成的民族生活的脱节是很显著的话,并且假使把人道主义看做对文化的"世界主义"阶级来说是一种进步过程而从意大利历史观点出发又看作是一种退步的话,那么这种论断是可以采取的)。

可以把文艺复兴看做是一种历史过程的文化方面的表现。历史过程在意大利形成具有欧洲意义的新的知识分子阶级;这一阶级分成两个集团,一个集团与教皇相联系并且具有反动性,在意大利执行世界主义的职能;另一个集团在国外由政治亡命者和受教会迫害者组成,他们在他们所立足的各个国家里执行进步的世界主义职能,或者做为军队里的、政治方面的、工程方面的以及其他部门的技术人员而参与建立一些现代国家的工作。

可能在意大利人道主义确实是在研究罗马风而不是在研究整个古典世界(雅典和罗马)的基础上产生的;既然如此,那就必须有所区别。人道主义具有"政治的道德的"性质,而非艺术的性质,它是在寻求那个应该与法兰西、西班牙和英吉利国家的产生同时而并行产生的"意大利国家"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最鲜明的代表人物是马基亚维利。

正象托梵尼恩所断言,人道主义是"西塞禄式的",也就是说它在帝国以前那一个时期,帝国的国际都市的以前那一个时期寻求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西塞禄可以做为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

他首先反抗卡栋林那，随后又反抗恺撒，也就是反抗新的反意大利力量的出现，反抗世界主义阶级的出现）。

在十世纪以后开始的并且在艺术方面于托斯坎纳盛极一时的自生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被人道主义和文艺复兴在文化方面的表现窒息了，被做为知识分子的语言以与民间语言相对立的拉丁语的恢复等等窒息了。无可争论的是，这种自生的文艺复兴（特别是从十三世纪开始）只能同希腊文学的盛行相比，而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政治清淡主义”却是可以同罗马风相比的一种文艺复兴。

雅典和罗马在正教的和天主教的教会中继续下来。在这里也应该肯定，罗马在法国所得到的发展比在意大利更大，而雅典和拜占廷在得到的发展更大于沙皇俄国（西方和东方的文明），并且这样一直延续到法国革命，甚至可能一直延续到1914年世界大战。

在罗斯坦尼的概论里有许多局部性质的中肯的见解，但总的论点却是错误的。同时罗斯坦尼把书本的文化同具有自生来源的文化混为一谈。

认为罗马人意义的降低是由浪漫主义而来，特别是由德国的浪漫主义（在艺术方面）而来，这也可能是对的。同样可能的是这一点具有直接的实践的理由等等。但是无论如何罗斯坦尼应该深入考虑一下在这种片面性里有没有真理，哪怕是片面的。这是讲文化的真理，而非美学的真理，因为美学的“自主”是个别艺术家的“自主”，而不是文化集团的“自主”；但是即使是“文化的自主”，那么它当然也应该存在，证明这一点的恰好是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分离的事实，是天主教会与拜占廷正教之间文化分离等等的事实。既然如此，那么所需要的不是表面说明理由，而是不止深入地研究文学，而且深入地研究一般的文化。

朱塞佩·托梵尼恩的《什么是人道主义？》一书是很重要的（在

但丁和宗教改革之间的时期中希腊罗马古典著作在意大利人意识中的重现)。托梵尼恩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指出了人道主义的中世纪的反动性质:"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之间的时期里在意大利被称为人道主义的那种精神和文化的特殊状态,只不过是一种报复,并且至少也在两个世纪的过程中成为一种屏障,以防止那种与一般公认的学说分歧的不安的浪漫主义方向;这种一般公认的学说更早一些就以萌芽状态存在于公社时代和宗教改革时代,尔后并占了上风。它是各种矛盾的思想因素的自生的调和,而且在实质上是对规定的界限反哲学的承认;但是同样的反哲学观点,只要一旦经过深思熟虑而被承认下来,它本身也就是哲学"①。

我以为人道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只能在意大利知识分子历史和他们在欧洲的作用的比较广阔的范围内来解决,舍此别无他法。

托梵尼恩笔下的著作还有《人道主义末日》一书以及瓦拉尔第文集里面论述十六世纪的著作。

维托里奥·罗西于1929年11月16日发表在《新文选》上面的《文艺复兴》一文,尽管简短,但是很有内容而值得注意。

根据罗西的说法,——而且是很正确的,——盛行研究古典文学是次要的现象,是理当被称做《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的深刻内容的表记、征候。"产生一切其他枝节的中心的和基础的现象是新的精神世界的诞生和成熟,这个世界借助于十世纪以后在人类活动所有各方面解放出来的积极的和紧密团结的创造力量在当时被提到不止是意大利的而且也是欧洲历史的舞台上来了"。

在十世纪以后开始了对"在全部生活上烙上自己印记的"封建

① 见维托里奥·罗西的论文《文艺复兴》(Vittorio Rossi, Il Rinascimento)(1929年11月16日《新文选》),这篇论文部分地同意托梵尼恩的论点,但不过是为了更成功地反驳他。

制度的反动(借助于土地贵族和僧侣阶级)。在尔后两个或三个世纪的过程中，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起了深刻的变化：农业在巩固，工业和商业活跃起来，扩大了并且调整了，产生了资产阶级，新的领导阶级(这一因素必须更加以明确，而罗西却没有做这一点)，这一阶级政治热情很高(在什么地方？是在全欧洲还是仅仅在意大利和弗兰德里亚？)并且团结成为强大的财政集团；形成具有日益增长的独立精神的国家——公社。

这一因素也需要加以明确：必须确定把“国家”这一概念应用于国家——公社上是什么意思；国家在这里具有有限制的“团体”的意义，因此在那个随在封建混乱状态(所谓在十一世纪以前存在过的没有第三等级的封建主义时期之后)时期之后的封建主义中间时期的范围以外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代替它的是一直存在到法国革命的十五世纪的君主专制政体。

从公社有机地过渡到已经不是封建主义的制度发生在尼德兰，而且也仅仅发生在尼德兰。意大利的公社没有能够超出团体阶段的范围；封建的混乱状态在适合于新的情势的形势中获得胜利，而然后就建立了外国的统治①。

改革教会的运动是什么，新的力图恢复使徒生活的教团的产生又是什么？这些运动是新的正在发展中的世界的积极的表征，还是消极的表征呢？当然，这些运动看上去象是对新的经济制度的反动，即使改革教会的要求是进步的；但是，不可争论的是它们指出了人民对于文化问题具有很大兴趣以及一些大的宗教活动家，也就是当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对于人民具有很大兴趣。但即使是这些运动，最低限度在意大利，也被教会所窒息或者制服，而在欧洲其他国家它们却做为动荡的酵素被保留下来，以便在宗教

① 谈到罗西所指出的十世纪以后欧洲社会的整个发展，那就必须注意安里·皮连所写的关于城市起源的那部书。

改革中找到出路①。

"在法国的哲学和神学流派中掀起了很热烈的争论，证明信教情绪的恢复和理智要求的增加"。这些争论是不是表现征服欧洲世界野心的阿威罗伊学说所引起的，即是不是阿拉伯文化影响所引起的？"爆发了争取授职授土权的斗争；这种斗争是觉醒了的帝国精神感（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表明国家努力把公民的全部积极性如同罗马帝国一样吸收到自己身上来的觉醒了的国家感？）和对于迫切的精神、政治、经济利益的认识所引起的，它震撼了世俗的和宗教的统治者的整个世界和许多无名的僧侣、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产生了异端（它们遭到了火与剑的镇压）。

"骑士阶层肯定并尊重个人具有美德时，就支持对人类文化的爱并树立某些高尚的道德"。但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可以把骑士阶层同十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联系起来呢？罗西不区别矛盾的运动，因为没有考虑封建主义和封建主义一般范围内的地方自治的各种形式。同时不能不把骑士阶层做为十六世纪的真正文艺复兴的一个因素来谈，尽管《狂暴的罗兰》〔刘陀维科·阿利渥斯妥〕已经是对他的一种哀泣，在这篇长诗里面同情心和讽刺以及嘲笑的描绘交织在一起，而"宫臣"〔帕里达萨尔·第·卡斯蒂里昂涅〕则反映出了他那发展得相当严重的庸俗的、烦琐的和迂腐的形式。

十字军东征，信仰基督教的国王对西班牙摩尔人的战争，法兰西卡佩王朝对英吉利的战争，意大利公社对士瓦本皇帝的战争，在这些战争期间似乎民族统一感成熟了并且尖锐化了，——这种说法是夸大了。而且值得奇怪的是象罗西这样知识渊博的人居然有这样的论断："在那种使得这些人能以自力更生并创造新的生活环

① 谈到十世纪以后的文化倾向，不应该忘记阿拉伯人通过西班牙所做出的贡献（见艾齐奥·列维在《猶像》和《列奥那尔多》上所发表的论文），以及西班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起所做出的贡献。

境的条件中，他们感到自己历史蕴藏的深刻的酵母的发作，并且在那自由地并充分的表现出人类精神的古罗马的世界中，找到志趣相同的灵魂”。

我以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些模糊的和毫无意义的论断，因为第一，古罗马世界同十世纪以后的时期（中世纪拉丁语时期）的联系向来也没有断过；第二，“志趣相同的灵魂”这种说法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譬喻，而且无论如何是属于十五——十六世纪的，而不是属于这第一个时期的；第三，文艺复兴除了表面的文学色采之外，没有任何古罗马的东西，因为缺少的正是古罗马文明的专有特点——国家的从而也是领土的统一。

在十二世纪的法兰西学校中盛极一时的拉丁文化，其特点是修辞学和文法学著作、韵文作品和庄严而优美的散文的蓬勃发展，在意大利与之相当的是作家、威尼斯诗人和博学者在时间上较晚一些而内容较平凡一些的作品，——这种文化属于中世纪拉丁语阶段并且是纯粹封建主义产物，具有十一世纪以前的那种原始的精神。关于因为必须赋予新的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以合法的外形而恢复的法学研究就是这样讲的；这种研究也确实曾经乞灵于罗马法，但是很快就恰好因为“纯粹的”罗马法不能调整新的复杂的关系而退化成为最无味的诡辩术；在实际上，曾借助当时的解释者和后来的解释者的诡辩建立了一些地方的法律标准，这些标准使得最有力的人（要么是贵族，要么就是资产阶级）成为正当的，并且这些标准是现存的统一的“法律”。罗马法的原则被遗忘了或者不予运用而等待解释者去解释，而这种解释又要经过解释，归根到底罗马法一无所存，只余下明白而简单的所有权的原则了。

经院哲学“又在古代哲学的形式中被理解和系统化起来”（请注意这是回复到欧洲文明世界，但不是由于历史蕴藏很深的酵母的“发酵”，而是由于把它带到那里去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这是

被基督教猜想到的真理。

罗西有充分的根据断言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期间的所有这一切现象不是人为努力模仿的成果，而是创造能力的自生表现，这种创造力由深处向外奔放并使得这些人有能力感觉和恢复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但是这种推想是错误的，因为在实际上这些人原来都是有能力感觉并且过着现今的紧张生活的。然而同时却也不停地在形成着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感觉并且恢复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而且越来越脱离人民的生活，因为市民等级（意大利）走向衰落和退化一直到十八世纪。同样值得奇怪的是罗西没有觉察到他所陷入的矛盾而断言："但如果通过文艺复兴本身就可以理解（我对这一点并不怀疑）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人类活动的多种多样表现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把文学拉丁语的盛行，而应该把用民间语言写作的文学的产生看做是文艺复兴的特征。这种精力的最显著的表现之一——中世纪的统一分裂成为各种不同的民族集团——就表现在这上面"。

罗西对于文艺复兴的看法具有现实性和历史主义的精神，但是他还不能完全放弃旧的修辞学的和文学的传统——这就是他产生矛盾和拘泥的原因；民间语言的产生表明同古代的决裂，因而需要说明为什么这个现象伴随着文学拉丁语的恢复。罗西正确地指出："人民由于不关心智力的目的而爱好一种语言并憎恶另一种语言，这并不是单独个人的或集体的任性怪想，而是一种采取它自己唯一具有形式的特殊内部生活的自然表现"，即任何语言都是完整的世界观，不仅是随便做为任何内容之形式的外衣。既然这样，那么这是否表明两种世界观——以民间语言来表示的资产阶级－人民的世界观同以拉丁语来表示的并乞灵于古罗马文化的贵族－封建的世界观——之间发生了斗争，而且文艺复兴的特点恰好就是这种斗争，而不是安静地创造庄严的文化呢？罗西不能理解，乞灵

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它本身不能创造文化，因此文艺复兴时代势必变成反宗教改革，也就是势必成为被公社所唤起的资产阶级的失败和罗马风的胜利——但是在教皇统治意识的形式中和企图回复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式中。也就是悲剧以后的一幕滑稽戏。

在十一世纪末和十二世纪初法国产生了以OC语言和以oïl语言[①]写作的文学，当时全国正处于动乱之际，这是由于上面所指出的一些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重大事件造成的。"而且如果说在意大利促进文学发展的民间语言其出现迟了一个多世纪的话，那么这种出现在我们这里正是一种伟大的运动，因为它在中世纪普遍主义的废墟上确立起了新的民族文明，这种文明由于我们城市许多世纪以来历史的多种多样，成为十分形形色色的，到处土生的和自生的，这种文明只缺乏君主政体和强有力的大人先生们所具有的约束力；因此那种新的精神世界之统一的形成就缓慢得多和困难得多。而这种精神世界的最出色的一面就是使用民间语言的新文学"。

另外一些矛盾是：在实际上十世纪以后的革新运动在意大利比在法国来得更为活跃，而高举这个运动的旗帜的阶级在经济方面发展得也比在法国早，程度也深。同时他能以摧毁自己敌人的统治，而这在法国却没有发生。法国的历史发展有别于意大利，——这是罗西的陈词滥调，他不能确定发展过程中的实际区别而把这些区别归结为不同程度的自生性和土生性，要想对它们加以检查是很困难的而且甚至是不可能的。同时法国的运动也不是统一的，因为北方同南方存在着显然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文学

① OC语言，是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法国南部通行的拉丁语系方言，法国卢瓦尔河以南的语言，也是浪漫的抒情诗人所用的语言。oïl语言是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法国北部的语言，法国卢瓦尔河以北的语言，也是叙事诗派诗人所用的语言。——译者

方面是北方有大量的叙事诗文学，而南方则没有叙事诗。

关于意大利和法国的历史发生差别可以在斯特拉斯堡宣誓(842年)① 中找到证明，也就是可以在人民积极参与历史(人民军队)成为查理大帝继承者执行条约的保证人的那个事实中找到证明；人民军队以保证人的身分出现，以"用民间语言宣誓"，也就是把自己的语言写到民族历史里面去，当做头等重要的政治职能，做为集体意志而出现，做为民族民主的因素而出现。加罗林那王朝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乞灵于人民的这种"煽动性"的姿态，对于了解法国历史的发展和了解做为民族因素的君主政体在这个历史中所执行的那项职能是很重要的。

在意大利最初以民间语言书写的文件要么就是私人证明寺院土地所有权的誓言，要么就是具有反人民性质的碑铭(《Traite, traite, fili de putte》)。这已经说不上什么自生性和土生性了！在君主政体——罗马国家统一的实际继续——的庇护下法国资产阶级得到了比起意大利资产阶级达到的充分经济独立所能提供的更大的发展可能性，然而意大利资产阶级却不能脱离团体的贫乏的基础而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全国性的文明②。

罗西指出，以民间语言写作的文学的发展伴随着"我们人民那种内部活动本身的现代的富有意义的形式——所谓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前人道主义的公社形式"的发展，并且随着以民间语言写作的文学之后和这种所谓前人道主义之后而来的是"十四世纪末和

---

① 斯特拉斯堡宣誓——是查理大帝的后裔日耳曼路易斯(后为东法兰克国王)和秃子查理(西法兰克国王)兄弟俩公元842年2月14日在斯特拉斯堡当着军队所发的誓言：遵守共同利益，反对堂兄意大利王路德尔。斯特拉斯堡宣誓是查理大帝所建帝国分裂的开始。——译者

② 应该考察一下意大利的公社怎样夺取了伯爵对城市附近领土的封建权利并在把这些领土合并以后怎样又变成了封建因素，具有由团体委员会代替伯爵权力实现的权力。

十五世纪初的文献学的人道主义"。他从这一点做出结论："这三个事实如果被现代的人和后代的人完全从表面上（！）来加以考察时，那么就会以为它们是彼此矛盾的，然而它们在文化方面却标示着意大利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几个进步的阶段而且整个与下面那些阶段相似，这些阶段在政治方面就是公社和与公社相适应的以民间语言写作的文学以及前人道主义和西尼奥里①统治的一定的形式，而与这种西尼奥里相关的现象在文学上也就是文献学的人道主义。"

这样一来，一切好象都在"意大利精神"这种一般的漂亮的外衣之下各得其所了。世界上两个最高的权势之间的史诗般的斗争随着中世纪最后一位大教皇波尼法齐八世和亨利七世而结束了。教会政治影响的衰落，"教皇在阿维尼昂的幽居"②和分裂。做为普遍的政治权威的帝国死亡了（路易·巴伐利亚和查理四世枉费心机）。"生命蕴藏在年轻的和进取心很强的公社的市民等级身上，他们在发展着。巩固着自己的政权，反对国外的敌人，也反对平民（贫民），他们在历史中走着自己的道路，要想造成或者已经造成民族的西尼奥里"。什么样的"民族的西尼奥里"？意大利西尼奥里的来源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他们在意大利的产生是由于市民等级不能保持团体制度，也就是不能仅仅用暴力来管理"贫苦的人民"。在法国则正好相反，专制制度是在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的斗争中产生的，在这个斗争中资产阶级同城市贫民及农民（当然，是在一定的限度内）联合在一起。这样是不是可以谈到意大利的

① 西尼奥里（意大利文 Signorie）——是中世纪意大利城邦国家（如威尼斯和佛罗伦斯）的统治机关。——译者

② 指1309年教皇克利门特五世离开罗马把教廷迁往法国南部的阿维尼昂。自他以后共有七个教皇都在此"幽居"，他们在这里争吵和混乱之中度过了七十年。——译者

"民族的西尼奥里"呢？这时候"民族"又表明什么呢？

罗西接着说："在这些伟大的事件面前，看上去象是体现在帝国、教会和罗马法的普遍的永恒性之中的而且还是但丁所具有的思想，中世纪生活中的普遍的连续性的思想，古罗马生活的普遍的思想，都让位于近百年来用以完成伟大革命的和从它而开始了历史新纪元的那种思想。它产生了对于从此以后把新的文明同旧的文明划分开的那条鸿沟的认识；因此罗马的居民不再被看做是一种日常生活内部所固有的力量；但是意大利人却开始把古希腊罗马文化看成由于力、新鲜和美而使人神往的自己的过去；他们必须通过思想——通过思考和研究——为了教育人而来恢复这些力、新鲜和美；他们开始把这种过去看做就象久别之后重返父亲怀抱的儿女，而非缅怀或哀悼青春的老年人"。这也是真正的"历史长篇小说"，因为到哪里可以找到"用以完成伟大革命的那种思想"等等呢？罗西把来自书本的笑话用到历史事实上面去了，又是人道主义者对中世纪拉丁语的憎恶，又是大人先生对中世纪"野蛮"的卑视；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说得对，他在短论《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里断言，仅仅从法国革命起才开始使人感到同过去、同全部过去的决裂，而且这种感觉在企图以共和历的形式实行新历上极度表现出来。假使罗西所肯定的确有其事，那么就不会这样轻易地由文艺复兴转变为反宗教改革。罗西不能摆脱对文艺复兴的华而不实的看法，因此他也就不能估价下面这一个事实：曾经存在着两种潮流——进步的和退步的——而且归根到底后者胜利了，这是在整个现象于十六世纪达到最盛时以后（并不做为民族的和政治的事实，而即使不完全是也主要是做为文化的事实），这是在脱离了人民和民族的贵族间的运动发生以后，而在人民中间对那些漂亮的寄生行为所产生的反应成熟了，这些寄生行为是新教的宗教改革，是萨服那洛拉的那个"烧毁空虚作品"的运动，是普遍的

抢劫行为，例如卡拉布里亚国王马尔科尼的抢劫行为，以及其他类似的运动；查明和分析这些运动，至少做为间接的标记，是很有意思的，马基亚维利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对文艺复兴的反动，就是宣布政治和民族方面同人民重新接近的必要，而这一点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专制政府做过了，其表征就是瓦连廷诺大公在罗曼尼亚的人望，因为他压制小地主和佣兵队长等等。

根据罗西的说法，"对于介乎古代和近代间百年中表现的思想划分的认识"已经潜藏在但丁创作的精神本身里面了，但是却真正地表现在和体现在柯拉·得·利恩齐[1]的政治计划中，利恩齐"继承了但丁的思想，努力在帝国中维护一切罗马的，从而也是一切意大利的东西（为什么"从而"？柯拉·得·利恩齐所考虑的根本只是从物质上来理解的罗马的人民），并且努力利用罗马精神的神圣的纽带，把所有意大利人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在文学方面这种认识体现在佩特拉克身上，他向'我们的卡密拉，我们的布鲁特，我们的罗米留斯'柯拉致敬，并且耐心地进行研究以便复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同时他做为一位诗人充满了古希腊罗马的精神并且使它复生"。这是历史长篇小说的继续。柯拉·得·利恩齐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一点结果也没有；而且怎能通过徒然的努力和虔诚的愿望来创造历史呢？佩特拉克把卡米拉、布鲁特、罗米留斯胡乱地凑在一起，这是不是不折不扣的卖弄辞藻呢？

罗西没有能够判明中世纪拉丁语同人道主义或罗西名之为文献学拉丁语的脱节；他不能理解这实际上是两种语言的问题，因为它们表示两种在一定意义上相反的世界观——甚至即使它们仅仅传播在知识分子中间；此外，他还不愿意理解前人道主义（佩脱拉

---

[1] 柯拉·得·利恩齐(Cola di Rienzo)——真名为尼可乐·迦勃里尼(Nicculo Gabrini，1313—1354)，意大利爱国者，曾倡导复兴古罗马的市民政治，推翻贵族政府，被市民拥为护民官(1347)，后因个人专横、滥用权势等而失败。——译者

克）还是不同于人道主义的，因为“量转变为质”。

可以说，佩脱拉克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人物：当他以民间语言创作的时候，他是市民等级的诗人，但是做为使用拉丁语的作家，作为“演说家”，作为政治家他是反市民等级的反动派（西尼奥里，教皇）的精神的代表。这同样说明十六世纪“佩脱拉克主义”的现象和它的虚伪性：这种现象带有纯粹书本的性质，因为产生“新的快乐风格”诗体和佩脱拉克本人诗体的感情已经不再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正如重新被延围处于凋敝中的自己的商店和自己的手工工场的公社的市民等级不再占统治地位一样。在政治方面占统治地位的是贵族——大部分是各类暴发户，——他们聚集在君主的宫廷中并处于雇佣军队的护卫之下；他们创造了十六世纪的文化并且支持各个党派，但是在政治方面他们是有局限性的，因而到最后也就陷入了外国人的统治。

罗西也不能看清最初的以民间语言写作的诗体从西西里移到波朗尼亚和托斯坎那的阶级根源。他把“皮耶洛·达拉·文尼的和佩脱拉克极端憎恶的大音乐家那不勒斯的白拉尔多的帝国的和教会的前人道主义（他所理解的）”——这种前人道主义“仍旧根源于古希腊罗马生活的普遍的连续性的感觉”（也就是依然是中世纪的拉丁语，正如维罗纳的和帕杜亚的语言学家和诗人以及波朗尼亚文法学家和修辞学家的公社的“前人道主义”一样），——同西西里的诗派并列，而且断言这两种现象都是没有成果的，因为它们同那个“日趋没落的政治和精神世界”相联系。西西里的诗派不是没有成果的，因为它那种“新的民主主义文化精神的空洞的技巧”使得波朗尼亚和托斯坎那为之赞不绝口。但是在解释中这样把概念结合起来是不是公正呢？

西西里的商业市民等级是在君主专制政府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并且由于腓特烈二世而被拖进了“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

国"问题里面来；腓特烈二世是西西里和南方的专制的君主，但他也是中世纪的皇帝。西西里的市民等级也和法国的市民等级一样，在文化方面发展得比托斯坎那的资产阶级更为迅速；腓特烈二世本人和他的几个儿子都能以民间语言写诗，而且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参加了从十一世纪开始的人类活动的新阶段；但是也不完全由于这个观点；在实际上托斯坎那的市民等级和波朗尼亚的市民等级在思想意识方面比起中世纪的皇帝腓特烈二世来是更为落后的。这就是历史中的象是荒谬的现象。但是不须要象罗西那样伪造历史，由于爱好一般的原理而玩弄一些定义。腓特烈二世固然失败了，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不同于利恩齐的那种企图的完全另外一种企图，而且也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波朗尼亚和托斯坎那以完全不同于罗西的另外一种历史的理解接受了"空洞的西西里的技术主义"；他们理解到问题在于"他们的事业"，可是，同时又没有理解到英佐① 也在他们这一边，尽管他也举起了世界帝国的旗帜，而且最后使他死于狱中。

罗西认为与帝国的和教会的"前人道主义"不同，在那"粗糙的而且有时还有些奇怪的公社西尼奥里庇护下盛行起来的前人道主义的拉丁语里面，相反地却隐藏着（1）对中世纪普遍主义的反动和对于民族风格的形式的模糊的努力（这是指何而言？这是指民间语言是拉丁语的改装而言吗？）；因此，古希腊罗马世界的新的研究者应该认为它们是罗马帝国主义的预兆，而这个罗马帝国主义是被利恩齐做为民族统一的中心而向之努力的，也是被这些研究者看做意大利对世界的文化统治的形式并且郑重地宣布过的。势

---

① 英佐（1220—1272）——霍恩斯陶芬王朝腓特烈二世皇帝之子。被腓特烈二世封为撒丁国王。热中于扩张德意志皇帝在意大利的权势。曾对米兰，波朗尼亚及其他意大利城市作战。1249年在一次战役中为波朗尼亚军队所俘并囚于狱中，即在这里度过他的余生。——俄文版编者

将于十六世纪在欧洲所有文明国家中完成的人道主义的民族化(!)恰好将由于一种文化——我们的文化的普遍统治而产生，而我们的文化是来自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但同时以民间的从而以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形式确立和传布”。这种关于文艺复兴的看法完全是花言巧语；断言人道主义者预言意大利文化统治世界只不过是“雄辩术”——做为民族形式的雄辩术——的开始。在这种断言中包括有一种“意大利知识分子的世界性职能”的解释，而这种职能不论是什么样的都可以，但只不是民族性质的“文化统治”；相反地，它是缺少文化的民族性的证明。

人道主义者一辞仅仅在十五世纪后半期才出现，而在意大利语言中到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才出现；人道主义一辞则出现得更晚一些。在十四世纪末叶，最初的一些人道主义者把自己的著作称为 studia humanitatis，也就是“目的在于一般地使人类精神趋于完善的著作，从而也是唯一的确实对人有价值的著作。对他们来说，文化不只是一种知识，而且也是生活……也是反映在活生生的文学活动的统一中的学说、道德和美”。罗西的对于文艺复兴历史的看法具有机械的一元的性质，因而造成一些矛盾，而罗西陷入这些矛盾不能自拔，就求助于幻想，以说明为什么正当民间语言在文学的所有各方面欢庆自己的胜利的时候，人道主义的拉丁语却日趋衰落，“而意大利人道主义最后获得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也就成了它的唯一的语言，而拉丁语却进入了自己的坟墓”。但它决不是完全进入了坟墓，因为在教会的文件中和科学上它一直到十八世纪还占着统治的地位，从而表明确实有一种社会潮流经常维系着对拉丁语的不停的使用；现代资产阶级才把拉丁语从世俗方面赶掉了，它使得各种保守派对拉丁语哀泣。

“人道主义不是拉丁语风，这是真正人性的肯定，而意大利人道主义者的人性，按其历史性质来说是意大利的。这样看来，人道

主义只能以民间语言表现出来，人道主义者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用这种语言讲话的，而且即使以古典为主题时，这种民间语言也大胆的冲破了他们的拉丁语的障碍。他们能够从生活抽象而坠入幻想，而且当他们确信名符其实的文学只能以拉丁语存在的时候，他们也就能够废弃了新的语言。但是历史现实却是另外一回事，而他们本身和他们的幻想性就是这种他们在其中度过他们的生活的历史现实的产物，——这是在伟大的罗马演说家以后几乎过了一千五百年所产生的人们的生活"。这一切都表明什么呢？拉丁语——幻想与民间语言——历史现实之间的这种区别从何而来呢？而且为什么拉丁语不是历史的现实呢？罗西不能说明知识分子使用两种语言的道理，也就是不肯承认对人道主义者来说民间语言是一种方言，也就是不具有民族的性质，而且因此人道主义者就是中世纪普遍主义的继续者——当然是在另外不同的形式中，——而不是民族分子；他们是"世界主义的邦会"，对这个邦会来说意大利大概就等于是现代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一个地区，——既不更大些，也不更好一些，他们既具有非政治倾向，又具有非民族倾向。

"人道主义者的崇尚古典其所追求的已经不是宗教—道德目的，而是全面培育人的精神的目的；其中的要旨首先是恢复做为生活和历史的创造者的人的精神"云云云云。绝对正确，这是人道主义最引入胜的一面。但这是不是同我以前所说的关于人道主义本身具有民族的从而是退步的精神——对意大利来说——的意见相矛盾呢？我以为不矛盾。不错，人道主义的这个最富有独创性的和具有很大前途的特点在意大利没有得到发展。人道主义具有复兴的性质，但是和任何复兴一样，它掌握了并且发展了——比被它在政治方面绞杀了的革命阶级所发展得更好——被战败了的没有能够超出团体界限并创造完整社会的一切上层建筑的那个阶级的

意识形态原则。不过这项研究工作"毫无进展"，成了与人民和民族没有接触的知识分子帮会的财产。当意大利的以人道主义为其必要前提的反动的运动发展成了反宗教改革的时候，它也就把新的意识形态绞杀了，而人道主义者（只有少数例外）在火场之前宣誓放弃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①。

文艺复兴的思想内容在意大利国外——在德国和在法国以政治的和哲学的形式得到了发展，但是新的国家和新的哲学却以另外一些形式但仍然是在那些最基本的方面传进了意大利，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不具有民族的性质，而是世界主义的——正如在中世纪时期一样。

罗西的论文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值得注意的原理，但它们具有局部的性质②。

民间文学和诗歌的根源

应该读一读爱齐奥·列维的《乌古庄尼·达·洛地与诗歌的起源》一书以及他的较晚一些的专门论述伦巴第旧日诗人的著作（出版于1921年），同时也要翻阅一下这些诗人的带有注释和小传的诗集。列维肯定，这是一种"伴随着社会思想的运动"，并且表明其"与昏沉停滞的中世纪相对立的新的意大利的意识开始确立"的"文学现象"③。

---

① 见发表在《新意大利》上面的戴·鲁吉洛《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De Ruggiero, Rinascimento, riforma e controriforma, Bari, 1930, 2 Voll.）一书中关于《爱拉斯谟》一章。

② 除了外国作家（布尔克哈尔德、佛格特、西蒙斯等人）笔下关于文艺复兴的古典著作外，需要研究罗西的《十五世纪》（瓦拉第丛书），托梵尼恩的《什么是人道主义？》以及这里引用的戴·鲁吉洛的著作。

③ 见斯·巴塔里亚著《我国十三世纪文学论纲》。（S. Battaglia, Gli studi sul nostro Duecento letterario, «Leonardo», del febbraio 1927）

列维的原理是值得注意的并且需要深入一步，当然这原理是属于文化史的，而非属于艺术史的。

巴塔里亚写道："列维错误地把保存自己民间性质和主题思想的很普通的押韵的作品视为文学现象"。可能正如在这种场合下往往发生的情况一样，列维确实夸大了这些作家的艺术意义。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而且把"民间"性同"文学"性相对立又表明什么呢？

难道新生文化采取了原始"民间"形式，而其体现者是"普通的人"不是很自然的事吗？而且这对于那个文化和文学只是少数关门主义集团垄断的时代来说不是特别自然的事吗！不仅如此，难道在乌古庄尼·达·洛地等人的时代，哪怕是在有教养人士中间有过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吗？

列维提出的问题是有意思的，他的研究结果肯定文艺复兴的最初因素不是来自宫廷，也不是来自经院哲学，而是来自民间；他们是反对中世纪制度——教会和帝国的普遍的文化和宗教反抗运动（巴塔里运动）① 的表现。即使伦巴第诗人的吟诗的技巧水平不高，但决不因此而减低他们在文化史中的意义。

根据巴塔里亚的说法，列维的另一个成见是"新的意大利的文明"的来源必须到十三世纪去寻找，而且一定在十三世纪找到。

这类的研究是纯粹表面上的，而且追求着现代的实际的利益。新的文明不是"民族的"，而是阶级的，并且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文化"方面，它所采取的不是统一的、而是"公社的"和地方的形式。因此它做为"方言的"而产生，并且一定有十四世纪托斯坎纳

---

① 巴塔里运动（意大利文 pataria——由米兰的旧货商和贫民的房子得名，意为"破烂"）——是公元 1056 年发生的一个民间运动，在米兰最为盛行，它采取宗教的形式：要求僧侣独身不娶和反对买卖圣职。实质上是贫民、手工艺在反对与高级僧侣勾结的大封建所有主的运动。运动获得了胜利，促进了独立的城市国家的形成。——译者

的极度的繁荣，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语言的统一。文化的统一不是预先已有的因素。完全相反！已有的是“欧洲的文化一天主教的共同性”，而新的文明则反对以意大利为其基地的普遍主义，反对发展地方方言和把市民等级都市集团的实际利益提到首位。

这样看来，我们所要研究的是现存文化世界的破坏和崩溃的时期，因为新的力量不仅不努力加入到这个世界里面来，而且还出来反对，尽管是无意识地。这些力量就是新的文化的萌芽①。

他们把历史上两个时机混淆在一起了：（1）同中世纪文明的决裂，其最重要的表现是民间语言的出现；（2）制定“volgare illustre”（统一的意大利文学语言）——这一事实引起了各类知识分子，更确切些说，职业文学家一定程度的集中。这两个时机确实彼此联系着，但是它们不能完全合而为一。

最初使用民间语言不是经常的，而是一时用一时不用，都是在宗教原因的影响下使用的（不会拉丁语的农民进行作战宣誓，在法庭上确定所有权时作证等）。以本族语言发表文学作品，不问它们的价值如何，已经是一种新的事实，确实是很重要的事实。在地方方言中只有一种方言，恰好是托斯坎纳的方言成为主导的方言，也是一件重要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的意义必须加以限制，因为这一事件并没有造成佛罗伦萨的社会—政治领导权的建立，所以它只限于是一种纯粹文学事实。书面的民间语言做为初次取得一定意义的现象而出现在伦巴第是很值得重视的事实。至于语言同巴塔里运动有联系也是很重要的事实。

新生的市民等级确实采用了自己的方言，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创建全民族的语言。假使这种语言产生的话，那么也仅仅是流行

① 对于中世纪异端的研究是必要的（托科、沃尔培等人的著作）巴塔里亚的《我国十三世纪文学论纲》，载1927年1月—2月—3月《列奥那尔多》，对于提供书刊资料是有用的。

于文学家之中，而他们都被反动阶级和国王宫廷吸收去了；这样一来，他们已经不是“市民等级的”，而是宫廷的文学家了。而且这种吸收也不是没有反抗的。人道主义表明“拉丁语”还很强大。但这是文化的妥协，而不是革命。

文艺复兴中的人民思潮[①]

朱里奥·奥古斯特·列维的方法——这是提出牵强附会的问题的方法。在他发表于1932年1月号《新意大利》上的对于路易吉·敦内莱和路易吉·鲍尔德的《圣菲力普·涅理和他那个时代的社会（1515—1595）一书[②]的评论中说：“流行着一种庸俗的意见，认为人道主义似乎仅仅产生和成长在学者的书房里。但是胡埃里却提到街头也很热烈地参加了这一件事。我自己这方面在《美学和趣味简史》(G.A. Levi, “Breve storia dell'estetica e del gusto”1925年第2版，第17—18页）一书中也同样强调了这一运动的人民性。还有一种意见流行得更广，认为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本是主教们和大公们的事，似乎是用法律的严格性和法庭而强加在人们头上的。人们对这个伟大的但却阴暗的（大多数都以为是这样）运动是尊敬的，但并不喜爱它。可是假使这种宗教革新仅仅是通过强制手段来实现了的话，那么怎样又能够恰好在那个时期，在天主教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意大利产生伟大的宗教音乐呢？在惩罚的威胁下可以压制人们的意志，但不能强迫人们创造艺术作品。谁要想知道在这个运动里有多少新鲜的事物，多少活生生

① 应该翻阅一下多魁尼科·胡埃里的《第一次复兴时期的人民思潮》，这部著作深受赞扬，并得到很高的评价。

② (Luigi Tonnelle e Luigi Bordet, San Filippo Neri e la società del suo tempo(1515—1595))蒂托·卡季尼译，卓万尼·帕皮尼作序，红衣主教费拉里出版。

的东西，多少纯洁的东西，多少庄严的灵感，多少人民的热爱，那么就让他去读一读这位圣者的历史等等”。

作者做得很好，他把圣伊格纳齐同圣菲力普做了如下的比较：“一个是想要争取全世界的基督教徒，而另一个的理想却没有超出能够展开他个人活动的小团体，并且他不甘心情愿地同意在那不勒斯设立他的团体的分支机构”。还有：“耶稣会徒的活动，其效果比较广阔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比较久；菲力普的活动产生于内心的灵感，这与他本人的个性大有关系：由于灵感而做的事，既不能继续也不能由别人重复做；不通过新的灵感去做，是不可能的，而新的灵感总是与前不同的”。这样看来，菲力普原来没有参加反宗教改革，但是与它背道而驰达到很大的成功，即使他没有能够出面来反对它。

十 六 世 纪

应该读一读佛尔屠那托·李齐的《十六世纪精神和人民的抒情诗》〔Fortunato Rizzi, L'anima del Cinquecento e la lirica volgare〕，根据我所读过的对它的评论，我以为它做为自己时代的文化的文件来看，比从它的内容本身的观点来看更为重要①。

必须重读一下1929年8月1日载于《新文选》上的专门评论李齐这本书的阿尔弗莱多·伽列蒂的论文《十六世纪的人民抒情诗和文艺复兴的精神》(Alfredo Galletti, La lirica volgare del

① 关于李齐，我在另外一个本子上有所论述，由于他对于一位法国民族主义者的论浪漫主义的一本书的评论，我把他看成一位“不幸的意大利人”，因为那篇评论表明他对一般的思想和文化问题完全没有判断能力〔见安东尼奥·葛兰西：A. Gramsci, Gli intellettuali e l'organizzazione della cultura, 第53—54页。——意文版编者〕。

Cinquecento e l'anima del Rinascimento)①。

在对十六世纪意大利诗作的批评中有一种意见占主导地位，认为这些诗作五分之四是矫柔造作的、是俗套、缺少深刻诚挚的感情。李齐以深邃的常识指出："现在一般的意见都认为在抒情诗里特别热诚地和生动地表现出了人的感情、人民的感情、历史时代的感情。是否可能十六世纪恰好正是那个'不幸产生没有自己的精神面貌的世纪呢'，或者这个世纪(在它自己的精神面貌下)高兴(?!)把虚假的形象恰好写进抒情诗里面去呢？莫非在智力方面最生动的，在精神方面最无畏的，以及正如他的许多敌手(！！)关于它所说的许多世纪中最无耻的世纪，居然能够伪善地在佩特拉克十四行诗和短曲的不自然的谐音之下隐蔽自己的真正的灵魂？或者把后代神秘化，用诗来宣扬充满忧愁的、后来被小说、喜剧、讽刺诗文以及那个时代许多其他文学作品所公开推翻了的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对他来说莫非是一种娱乐吗？"这里问题完全被曲解了，而它的提出也充满了内部冲突和矛盾。

在事实上，为什么十六世纪不能是充满矛盾的呢？相反地，莫非他不恰好就是那个造成意大利生活最大矛盾的组结，而且这些矛盾的不能解决也就确定了直到十八世纪末的整个民族历史的性质的世纪吗？莫非在阿尔培蒂的人与帕尔达萨尔·卡斯第里昂涅的人之间，在体面的人与"宫廷的人"之间没有矛盾吗？莫非在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和多神教与他们为了保卫天主教而反对宗教改革所进行的热烈的斗争之间没有矛盾吗？在一般地接触妇

① 也必须扩充一下我自己对伽列蒂的认识。在战争以后(为了这次战争他曾热心地同萨尔威米尼及毕索拉蒂进行了斗争，这是由于他们的改良主义的本质)，伽列蒂走上特殊的反德意志的方向，他在第一次特别是第二次战争时期已经坠入了懵恨文化的状态，坠入了那些有"破碎了的理想"的人所固有的知识分子悲鸣状态；他的著作充满怨望，含蓄的嘲笑，批判的暗示，这些批判表现出可笑的绝望情绪因而并没产生什么效果。

女（卡斯第里昂涅笔下的夫人那样的妇女）与对待个别妇女，即对待民间妇女之间莫非没有矛盾吗？莫非骑士的礼仪曾适用于民间妇女吗？一般地讲，现在妇女成了物神，她的形象是牵强附会的，几乎全部抒情的爱情诗，至少模仿佩特拉克的五分之四的诗也同样成了这种牵强附会的。这并不表明十六世纪没有自己的抒情的、艺术的表现，有过这种表现，但不是在真正的抒情诗里面。

李齐在他那本书的第二部分里提出了十六世纪的矛盾的问题，但是他不理解从这些矛盾的冲突中可以产生真正的抒情诗。但是这种抒情诗并没有产生，而他只不过是确认这种历史事实而已，反宗教改革不能是而且也不是这种危机的克服；它只是专横地并机械地使它消沉罢了。从此以后再没有基督教徒了，但是也没有勇气去做非基督教徒，在死亡面前战栗，而且也恐惧衰老。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随即陷入悲观失望；另一方面存在有脱离人民的现象。

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人

列昂·巴蒂斯塔·阿尔培蒂，帕尔达萨尔·第·卡斯蒂里昂涅和马基亚维利，据我看，对于从"人的"方面以及从道德上的和国内的矛盾来研究文艺复兴时代的生活，是最有意义的三位作家。

阿尔培蒂代表资产者（也须要参阅潘多尔芬尼的著作），卡斯蒂里昂涅代表宫廷贵族（也参阅德拉·卡萨的著作），马基亚维利代表并企图有机地把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君主的政治倾向结合起来，因为他们都努力建立国家或者努力扩充他们的领土和加强他们的军事实力。

据维托里奥·吉安①讲，当代作家佛朗柴斯科·桑索维诺谈到查理五世读书很少时补充说："他只喜欢读三本书，他命令把三

本书译成他的本国文，其中第一本书是关于国内生活制度的书——帕尔达萨尔·第·卡斯蒂里昂涅伯爵所写的《宫臣》，第二本书是关于国家事务的书——马基亚维利写的《君主论》和《议论》，第三本书是关于军事制度的书——波里比的《通史》和他的其他著作。吉安写道："过去没有注意的是《宫臣》这一部极重要的历史文件证实了并且明显地说明中世纪骑士等级的进化，而这种骑士等级正如一般人所讲，在意大利没有十分扎下了根。然而在实际上从自己的出身来看有别于阿尔卑斯山那一面的骑士等级的意大利的骑士等级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条件下成为一种新的骑士等级，他具有在战神的旗帜下，以及在阿坡罗，维娜丝和所有缪斯的旗帜下进行战斗的民兵的性质。但是据我的看法，这是进化，而根本不是戴·桑克蒂斯所认为的退化或衰落"。

然而吉安只是以"宫臣"做根据，而"宫臣"是一种把贵族团结在"君主"周围的企图并强调它与装模做样的资产阶级道德有别。这只是表面上的骑士等级，这一点可以从写在《唐吉诃德》之前并且为它做了准备的《狂暴的奥兰多》② 看得出来③。

宗教改革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的政治斗争》〔A. Oriani, La lotta politica in Italia〕(米兰版，第128页)一书中阿·奥里安尼写道："意大利各色

① 见1929年8月16日及9月1日《新文选》所载《帕尔达萨尔·第·卡斯蒂里昂涅伯爵(1478—1529)》一文。

② 《狂暴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是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Ariosto, Lodorico 1474—1533)的作品，是一部歌颂武侠的叙事诗，出版于1516及1532年。——译者

③ 无论如何，应该把吉安的诗文再看一遍，他是《宫臣》的文献学方面的出色的专家，必须弄到这本书的他的版本(第三版，出版者。——桑察尼)。

各样的天才人物遍布在科学方面，从伽利略的宏伟的睿智起到加尔旦诺的惊人而奇妙的推测为止，尽管有宗教改革，却具有一番新的色采，而立时映入眼帘的则有拉丁语诗人玛尔科·安东尼奥·伏拉米尼奥，历史学家亚柯波·那尔第，大公爱尔柯列二世之妻列那塔·戴斯泰，远远超过路德和加尔文的伟大的天才莱里奥·索奇尼更高地歌颂了意大利的天才，建立了唯一神教派。还在人世的有：别尔那尔多·奥基诺和神学家别特罗·马尔齐列·威尔米里，其中之一转入牛津大学，另一个加入了坎特伯里牧师会。弗兰齐斯科·布尔拉马奇企图重复斯捷番诺·波尔加里的非常事业，做为英勇的殉教者而牺牲了。别特罗·加尔奈塞奇和安东尼奥·帕列阿里奥都壮烈牺牲。但是这个运动没有普及到人民，所以与其说是一种宗教的赎罪和升遐过程，勿宁说是一种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的危机(当然与伟大的德国革命有联系)。的确，表述了这个运动的实质的乔尔丹诺·布鲁诺和托马佐·康帕内拉，尽管他们生活在和死亡在寺院的范围之内，但从他们的论断来看，却是远远超出不仅是宗教改革的而且也是基督教本身的范围的哲学家。因此，人民对于他们的悲惨的遭遇很无动于中，看上去他们对这种遭遇几乎毫不注意。”

这一切到底都表明什么？也许宗教改革毕竟不是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的危机，不是世界感和世界观的危机？

因此，必须这样说，意大利与其他国家不同，甚至宗教也不是人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的环节，而且恰好因为这一点知识分子中间的哲学思想危机没有涉及到人民，这是由于这种危机的根源与人民没有联系并且在宗教界也没有过“民族-人民的联盟”。在意大利没有过“民族教会”，只有宗教的世界主义，因为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以不关心民族的领导者的身分直接与整个基督教世界联系。从此就产生了科学与生活之间，宗教与人民生活之间，哲学与

宗教之间的脱节；乔尔丹诺·布鲁诺以及其他人的悲剧是欧洲思想界，而非意大利思想界的悲剧。

尼古拉·库赞诺

1929年6月16日在《新文选》上发表了勒·冯·贝尔塔兰非的一篇论文《德国红衣主教(尼古拉·库赞诺)》这篇论文不论就本身来说引起人们的好奇，而且也由于《新文选》编者对这篇文章所加的一段按语而引起人们的好奇。贝尔塔兰非很简短扼要的叙述了德国新教对尼古拉·库赞诺的意见，没有附批判性的书籍提要。《新文选》抱怨贝尔塔兰非没有谈到“最近十年来意大利专门论述尼古拉·库赞诺的许多重要著作”，并且把这些著作都列举出来，直到罗塔的著作为止。

唯一提到这篇论文优点的是下面这一段话：“贝尔塔兰非把尼古拉·库赞诺看成现代自由科学思想的前驱，而罗塔则正相反，认为布勒萨诺内主教如果按照其世界观的精神，而不是按照其形式来看，依然完全处于中世纪思想的范围之内。真理向来也不会完全站在一方面”。这说明什么？

毫无疑义，尼古拉·库赞诺是中世纪思想的改革者，同时也是现代思想的最初的代表者之一；下面的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教会忘记了他，而他的学说却为世俗的哲学家所接受，他们承认尼古拉·库赞诺是现代古典哲学的先驱之一。

尼古拉·库赞诺的实践活动对于理解新教的宗教改革史是很重要的。在宗教会议(君士坦茨？)上他为了宗教会议权反对教皇。后来同教皇和解了。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他是教会改革的拥护者。他曾企图使罗马同胡司派人妥协，企图把东方同西方联合起来，而且当他发现可兰经与福音书具有共同原理以后，甚至想要准

备使土耳其人信奉基督教。在《Docta Ignorantia e coincidentia oppositorum》里面尼古拉·库赞诺远在乔尔丹诺·布鲁诺和当代天文学家之前首先提出宇宙无穷性的思想。

可以说，路德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尼古拉·库赞诺的改革活动没有成功，换句话说，是因为教会没有能够从里面改革①。

英俊的罗伦佐

爱德孟多·罗奥的专门论述英俊的罗伦佐的面貌和意义的著作是值得注意的。也有人谈到罗·帕尔马洛奇的这方面的著作；不过据我看，帕尔马洛奇未必有能力阐明罗伦佐的意义②。

罗奥断言，从历史政治观点来看，英俊的罗伦佐是一个庸才，是一个没有创造能力的人。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个外交家，他只不过继续实行美第奇家族科吉莫的纲领。在外交政策方面（意大利的，涉及整个半岛的）罗伦佐具有一种建立意大利联盟的天才思想，但是未能实现……

罗伦佐的活动对于重温意大利历史中那个关键性的阶段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力量从蓬勃发展时期转向迅速的衰落。

可以把罗伦佐本人看做是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的"范例"——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由于他们不能把自己个人的直接的利益去服从更广大的目的，所以也就不能团结成为一个独立而自主的阶级。说到这里就必须考察一下罗伦佐本人和美第奇家族其他人物，也

① 参阅路易吉·克列达洛协会会员于7月17日在一个学院召开的会议上所提出的米开列·罗扎柯的笔记《尼古拉·库赞诺的辩证法》（第38页）。该学院的名称为《新文选》所遗漏。（可能是林齐学院？）

② 帕尔马洛奇在奥耶蒂出版社里出版了一部专集：罗伦佐的《最美的篇章》。在绪论里他曾企图重现罗伦佐的形象。

就是他的前辈和他的后辈同教会的相互关系。

那位断言萨服那洛拉是"中世纪的人"的人没有充分地考虑到他同教会当局的斗争，这种斗争实质上旨在使佛罗伦萨摆脱教会的封建制度而独立。人们在谈到萨服那洛拉时，正如通常所做的那样，总是把以过去的神话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同他的实在活动混在一起，其实是必须把这种活动同这些神话分开的……

反宗教改革

纪多·加尔伏于1928年4月16日在《新文选》上发表了埃曼努依尔·菲立贝尔托给自己的宰相和军法官皮耶林诺·贝里所下的一道《谕旨》。下谕的日期是1559年12月1日，是关乎"国务会议"的事。这道《谕旨》开头是这样说的："因为对上帝的畏惧是知识的第一个来源，所以对治理国家来说，最大的不幸和沉痛的苦难莫过于参加治理国家的人不畏上帝而把那应该感激神的意旨和神的灵感的事归功于自己的聪明睿智。从这种一切罪过的根源的大逆不道的异端产生世界上的一切恶行和罪行，而人们也就敢于冒犯神明的和人间的法律"。

教会的反动

马基亚维利的著作在意大利最后一次全部印行是在1554年，而薄伽丘的《十日谈》在意大利最后一次全部印行则是在1557年。在1560年以后出版商本里托甚至连佩脱拉克的作品也不再发行了。

从这时起就开始出现诗人、短篇小说家、长篇小说家的一些被篡改了的作品；教会的书报检查机关也来摧残艺术家了。

巴斯托尔在《教皇史》〔Pastor, Storia dei Papi〕里写道："也许在其他天主教国家里完全禁止捍卫哥白尼新太阳系的著作可能消灭了对天文学的兴趣；但是法国的限制教皇权力主义者却以法国教会自由为依据，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执行禁书勅令和宗教裁判所的教令。而且也不见得可以把禁止哥白尼学说的教令看做是意大利没有出现新的伽利略，或者牛顿，或者布莱德利的原因"。但是正如布鲁艾尔斯所指出的，禁书勅令的威胁引起了学者中间的惊慌失措，而伽利略本人在第一次受审被判死刑以后，二十六年来就没有可能自由地深入钻研哥白尼的学说并把它传授给自己的信徒。从巴斯托尔本人这部书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意大利文化方面的反动势力特别猖狂。

大一些的意大利出版社趋于衰落；在威尼斯他们挣扎的时间比其他地方都久。但是到最后意大利作家的著作和布鲁诺，康帕内拉，瓦尼尼，伽利略等人用意大利文写的著作全都只能在德国、法国和荷兰印行。

随着以审判伽利略为其顶点的教会反动的到来，在意大利甚至对知识分子来说文艺复兴的时代也告终了。

文艺复兴、第一次复兴时期、解放等等

(Rinascimento, Risorgimento, Riscossa)

应该注意意大利历史政治辞汇里面的同解释民族历史和意大利文化的传统方法有密切联系的许多概念。这些概念很难、有时甚至不可能译成外文。例如，有一组术语"Rinascimento"，"Rinascita"（法语化了的"Rinascenza"），它们都已成为欧洲文化中和世界文化中的常用语，这是因为尽管它们所标示的现象在意大利最为光辉灿烂，然而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这一个国家。

在十九世纪产生了比较狭义的民族和政治意义上的术语“risorgimento”,随着也就产生了其他一些用语:“riscossa nazionale”〔“民族起义”〕和“riscatto nazionale”〔“民族解放”〕。所有这些概念都表示恢复过去已经存在过的情况的思想，要么就是表示一些围绕着积极斗争着的中央核心的分散的民族力量进攻行动(“riscossa”)的“恢复”，要么就是表示从奴隶地位中解放出来，回复到原来的独立地位中去——“解放”(“riscatto”)。

这些概念难于译得确切，因为它们是同民族文字传统密切相联系的，而这种传统确立了从古罗马起到建立统一的现代国家止在意大利半岛上展开的历史过程的内部连续性。根据这种传统把意大利民族看成是在古罗马时代所“产生的”(“nata”) 或所“发生的”(“sorta”)，同时认为希腊罗马文化已被“复兴”(“rinata”)，民族已被恢复(“risorta”)等等。“riscossa”（起义)一辞出于法文军语，后来把它同生物有机体的概念联系起来，这个有机体先是入于昏睡状态，尔后又苏醒过来了；同时也不能否认在这个辞里面还有最初军事意义的东西。

可以把其他一些同类的概念同这一组纯粹意大利的词联系起来。例如，来源于法语并且主要确定法国现象的用语——“复辟”(“Restaurazione”)。

有一双词——“formare”和“riformare”（创造和改革)，因为根据历史上确定下来的辞义，“被创造的”(“formata”)东西可以不断地“改革”(“riformare”)，否则在“创造”——“改革”的相互关系中就暗示一种剧变或昏睡状态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相反地包含在“复兴”(“rinascimento”)和“复辟”(“restaurazione”) 的概念中。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天主教徒肯定罗马教会已经在内部改革了几次，而同时“改革”(“Riforma”) 一词在新教的字义中却含有复兴和恢复被罗马教所窒息了的原始基督教的意思。因此在世

俗文化的语言中常常讲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可是天主教徒（特别是耶稣会徒）却不愿承认特利恩特宗教会议只不过是对路德教和整个一套新教潮流的反动，并且肯定问题只是必须予以实现的独立的积极的“天主教改革”而已。研究所有这些用语的历史是具有不小的文化意义的。

2. 第一次复兴时代

阿道尔夫·奥摩第欧的《第一次复兴时代》① 一书，在我看来，整个是不成功的。这部书是学校教科书的改编，还保留有课本的许多特点。书里很简单地描述了一些事实（事件），而缺少必要的历史联贯性，正象一般地逐条解释目录一样。这部书的文体也是粗劣的，往往令人生气；在议论方面是具有倾向性的，因此有时使人觉得好象奥摩第欧在和一些历史上的领导人物算私帐（例如，和法国的雅各宾党人）。谈到意大利半岛，那么奥摩第欧的打算大概是要把第一次复兴时期说成基本上是意大利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根源必须在意大利内部来找，而不能完全或者主要在那些由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入侵所造成的欧洲变革中去找。但是作者这种打算只表现在他的叙述是从 1740 年开始，而不是从 1789 年，或者从1796年，或者从1815年开始而已。

在某一个时期意大利有过开明的君主政体，这并不是什么土生的现象，也正如与这一事实相联系的社会思想运动（詹农和帝王教权主义者②）不是意大利“独有的”一样。我以为开明的君主政体可以看做是来自重商主义时代的最重要的政治现象，而重商主

① Adolfo Omodeo, L'età del Risorgimento (ed. Principato, Messina)。阿道尔夫·奥摩第欧《第一次复兴时代》，普林西派托编，墨西拿出版。

义时代正标明新时代的到来，正标明现代民族文明的出现。但是难道意大利的重商主义时代是民族现象吗？如果重商主义在这里得到了有机的发展，那么它会造成地方国家的更为深刻的而且可能是彻底的分开。

意大利各个不同地区在经济上没有组织起来以及在经济上没有固定下来，同时其中每一个地区都不是认真关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贸易体系，这就使得第一次复兴时代国家的统一成为可能，或者最低限度便利了这种统一。

此外，我以为奥摩第欧的这部著作既然是把教科书改编成以《第一次复兴时代》为名的一般教育性质的书，那么看上去应该把它的结构完全加以改变，把一般欧洲部分缩小，把意大利部分扩大。从一般地欧洲观点出发应该谈的是法国革命时代，而不是意大利的第一次复兴时代，应该谈的是被理解为一般的世界观和国家文明和文化的新形式的自由主义的时代，而不只是自由主义的“民族的”方面。当然，可以谈第一次复兴时代，但是这时候就须要限制前景，要把意大利放在中心，而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欧洲上面，从欧洲史和世界史里面只须要阐述那些影响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力量的相互关系一般结构有所改变的关键性的强有力的全意大利国家，曾经压制趋向这方面的任何创举，尽量在刚刚产生的时候窒息这些创举；同时还要说明那些从外部世界渗入到意大利的潮流，它们影响了地方的同一来源的自主的力量，鼓舞了它们并使它们更为稳定。

---

② 詹农，皮耶特洛（1676—1748）——卓越的意大利启蒙学者，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在他的著作里包含着对于教会滥用教权的尖锐的批评。他主张教会不得干涉社会世俗生活并且必须把教会的活动完全限制在精神范围之内。他的著作被译成许多欧洲国家的文字。他受到教会的残酷的迫害，被关进监狱并瘐死狱中。——俄文版编者

帝王教权主义者——这是一些拥护帝王在教会问题上有最高权力的人，他们反对教会干涉世俗生活。——俄文版编者

由此可知，第一次复兴时代仅仅存在于意大利半岛的历史中，而在欧洲历史中是没有过的。在欧洲与第一次复兴时代相当的是法国革命时代和自由主义时代（柯罗齐对它所做的解释是不完全的，因为在他所描画的情景中缺少一个前提——法国革命和尔后的几次战争；他没有把从生的历史事件看成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个历史过程的最重要的和必要的因素应该是法国革命和与它相联系的几次战争，而把它们看成为独立的、不依赖的现象，这些现象存在的原因就包含在它们本身之中）。

奥摩第欧是从结束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的亚亨和约开始叙述的，这一事实表明了什么或者能够表明什么呢？奥摩第欧并没有为自己方法上的标准“论证”和“辩护”，他没有表明这一标准表现出下面这一事实：某一段欧洲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意大利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必须包括在意大利民族生活的发展里面。但是这一因素可以而且必须“说明”。民族类型如果脱离国际的（或社会的）联系来考察它，那么它也和一般的个人一样是一个单纯的抽象。民族类型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中是“区别”的表现，但同时它却也与国际关系相联系。

这样看来，我们有过一个外国人在意大利统治的时期；某些时间保留了外国人的直接统治，而后来这种统治具有了领导的性质（更确切一些是直接服从和领导相混合）。

十六世纪半岛上外国统治的建立立即引起了反应：产生了马基亚维利的民族-民主的方向，它同时也表现出对于先前在一定的形式中（在英俊的罗伦佐时期以佛罗伦萨为主导的意大利各个国家之间保持内部平衡的形式中）存在过的已丧失的独立的悲哀，同时它也表现出刚刚产生的争取在历史上更高的形式中——西班牙类型和法兰西类型的君主专制的形式中——恢复独立的努力。

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的“奥地利—法兰西”的平衡，对意大利来

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个列强的彼此削弱和第三个列强——普鲁士的崛起。但是第一次复兴时代的运动的根源，也就是外部和内部条件形成过程，——这些条件可以为意大利造成统一民族的可能性并且可以促成内部民族力量的发展和成长，——这些根源不能在标明某一个日期的某一具体事件中去找，而要在那个导致形成整个欧洲体系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进程中去找。同时这一个过程并不是孤立地脱离半岛上展开的内部事件和存在于那里的力量而产生的。

欧洲体系中的主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因素一直是教皇的权势。在十八世纪中做为欧洲势力的教皇地位的削弱实在是他的一番灾难。由于反宗教改革的结果，教廷从实际上改变了自己权力的结构：他把人民群众推开，他成了多次接连不断的战争的发动者，他同统治阶级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了。这样一来，他失掉了影响——无论是直接地或是间接地——政府的能力，不能再利用坠入狂信的人民群众做为压制政府的工具。值得提起的是正当贝尔拉尔米诺① 制定了自己的教会间接统治的理论的时候，教会本身却脱离了人民群众，以自己的具体活动破坏了自己统治的任何一种形式，哪怕是间接的形式的存在的条件。

一些开明的君主政体实行帝王教权主义政策是教会失掉自己做为具有欧洲从而具有意大利意义的势力的威望的表征。此外，这种政策正是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开端，如果下面这种看法是对的话(而实际上确是这样)：第一次复兴时期之所以成为可能，仅仅是由于教皇权势这种欧洲的和意大利的力量，也就是一种能够在自己领导下改组半岛国家的可能力量削弱了。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还只是一些准备的因素。历史现实还没有提供出令人信服的证

① 贝尔拉尔米诺，罗贝尔托(1542—1621) ——红衣主教，意大利反宗教改革的主要思想家之一。——俄文版编者

明，说在十八世纪意大利就已经形成了那些具体为了在半岛上建立统一的和独立的政治机体而活动的力量。

第一次复兴时期从何时开始？

被称为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历史运动其开始应该属于什么时候？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各不相同的而且是彼此矛盾的，但基本上这些答案分为两类：（1）是一些人的意见，这些人想证明意大利的民族运动渊源于本国并且直接了当地断言法国革命伪造了意大利的传统，并且把这个传统从正确的道路上引开了；（2）是另外一些人的意见，这些人断言意大利民族运动是与法国革命及革命战争密切相关的。

这一历史问题被一些形形色色的感情用事和政治上的干预以及先入为主的论断弄得模糊了。具有"健全的常识"的人们现在已经难于理解这个统一的意大利——从1870年开始成为这样的，——怎么会向来没有存在过而且以前不能够存在；"健全的常识"迫使人们相信今天所存在的始终存在着，意大利向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但是外国的势力把它窒息了等等。许多受到认为自己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世界等等的继承者的愿望孕育的思想潮流，促成了这种信念的加强；同时这些思潮做出了很显著的功绩，因为它们成了组织政治的、文化的和其他工作的基础。

我以为必须分析这一历史运动的全部进程，从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考察它，一直到那个具有积极和消极意义的、具有民族和国际性质的民族统一的基本因素联合到一起并成为足以能够达到目的的力量的时候。据我看，这只是在1848年以后才发生。相当古老的因素之一是至少从十三世纪开始也就是从发展了统一的意大利文学语言（但丁的"volgare illustre"）开始存在于意大利知识分子中

间的"文化统一"的意识。但是这一因素并没有直接影响历史事件的进程，尽管它受到爱国的雄辩术的最多的运用；同时它也不是具体的和可以起作用的民族感的表现，而且也与它不相吻合。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对于意大利半岛从外国形势影响下解放出来的这种必要性的认识。这一因素远远不如前一个因素流行得广，但是，不言而喻，它在政治方面更为重要，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它更有成效，这是指实际结果而言的。然而不应该夸大这一因素的意义，特别是它流行的范围和它的力量。这两个因素只是很少数人、知识分子上层的财产，而且向来也不是对于民族统一必要性的广泛流行的和坚定的认识的表现。

建立民族统一的条件之一——国际力量平衡的存在，因为它可以做为意大利统一的先决条件。这一条件在1748年以后实现了，也就是在法国领导权衰落以后和西班牙及奥地利领导权完全消灭以后实现了，然而到1815年以后它又消失了。不过从1748到1815年这一时期对于准备统一，或者更确切一些说，对于发展那些能够导致统一的因素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国际因素中必须考虑到教廷的态度，因为它在意大利本国范围内的力量取决于它的国际威力，而且必须考虑到帝王教权主义和约瑟夫二世的政策，也就是最初一些导致国家加强的自由主义的和世俗的步骤，因为它们是准备统一的重要的因素。国际情势在法国革命和几次拿破仑战争以后从消极的和不利的因素转化成为积极的因素。这些事件使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下层也来关怀政治的和民族的利益，使他们接受一定的军事经验并且养成一定数量的由意大利人担任的军官。"统一的和不能分开的共和国"这一口号相当流行，而且不管怎么说，行动党渊源于法国革命以及这个革命在意大利所得到的那种共鸣。这一口号变成了"统一的和不能分开的国家"的口号，变成了统一的和不能分开的或者中央集权的君主国以及诸如此类

的口号。

民族统一的过程以完全确定的道路向前发展，而这一过程的动力是皮蒙特国家和萨伏依王朝。因此必须从一般民族的观点考察皮蒙特的历史发展。从1492年起以及在以后的时期(也就是受外国人统治压迫的时期)中，皮蒙特很关心意大利各个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内部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可以成为独立的(也就是外国列强不干涉意大利内政)前提。当然，皮蒙特一直努力争取在意大利占居首位，至少在半岛的北部和中部，但是它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威尼斯过于强大等等。

在1848年以后，也就是在"右派"和皮蒙特政治"中派"失败以及以加富尔为首的自由派取得政权以后，皮蒙特王国成了为争取统一而斗争的实在的动力。所谓"右派"是索拉罗·第拉·马尔加里塔①，也就是"皮蒙特民族主义者-独占主义者"或者地方自治主义者(根据爱国的雄辩术，"地方自治主义"这一说法其来源是同真正而隐蔽地统一意大利的主张相联系的)。所谓"中派"是齐别蒂和新教皇派，但是不能把自由主义者-加富尔分子称为意大利的雅各宾党人。他们确实立于索拉罗所领导的"右派"之上，但是在质上同后者并无轩轾，因为他们把统一看成是皮蒙特王国和萨伏依王朝版图的扩大，而不是"从下而上"的民族运动，只当做王国的征服。实质上最富于民族性的因素是行动党。

有意思和必要的是把关于原来意义上的第一次复兴时期的起源问题和关于造成意大利在领土上及政治上统一运动问题的所有说法都搜集起来，同时要考虑到有许多人也用"第一次复兴时期"这个用语来标示十世纪以后开始的意大利地方力量的觉醒，也就是那个导致成立公社和文艺复兴的运动。

---

① 索拉罗·第拉·马尔加里塔，克列孟特(1792—1869)——伯爵，皮蒙特王国反动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俄文版编者

所有这些有关第一次复兴时期起源的问题所以能够成立是由于下面这个事实：意大利的经济很薄弱而且资本主义还刚刚产生，还没有强有力的和分布得很广的在经济上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占据它的地位的是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等等。当时的任务与其说在于把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从陈旧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如说在于创造一些一般的条件，以便使这些经济力量在这些条件下能够按照其他国家的样式产生和发展。当代的历史提供一个实例，能帮助我们理解意大利的过去。在我们今天存在着一种一般欧洲的文化认识，并且有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和政治家出来坚决主张建立欧洲联盟的必要性；甚至可以这样说，历史的进程在导向这种联盟，而且许多物质力量只能在这种联盟中得到发展。假使再过若干年这种联盟当真成立了，那么"民族主义"一词势将具有和现在"地方自治主义"一样的考古学的意义。

另外一种现代的却是说明过去的现象，这就是甘地所鼓吹的"不抵抗和不合作"。这种思想帮助我们理解基督教的根源和它在罗马帝国发展的原因。托尔斯泰主义在帝俄有着同样的根源，但是它没有象甘地主义那样成了"人民的信仰"；甘地通过托尔斯泰也走向了原始基督教的思想，而且由于他在全印度恢复了特殊形式的原始基督教，甚至天主教世界和新教世界也已经不能理解它了。甘地主义和英帝国之间的关系好象基督教和希腊主义一方面同罗马帝国另一方面之间的关系。被解除武装的和在技术上（军事方面）落后的古代文明国家接受了在技术上发展的（罗马人的统治艺术和军事技术达到高度发展）国家的统治，尽管后者的人口是很少的。原始基督教同甘地主义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下列这种情况：人数不多的、被认为是文明程度较低的、但是在物质上不可战胜的一方统治着人数众多的、被认为是文明的另一方。广大群众

意识到本身的物质力量比起人数不多的压迫者来是薄弱的，就会导致推崇纯粹的精神财富等等，就会导致消极，采取不抵抗、不合作的态度，这些当然也是一种防卫，但是这种防卫是薄弱的，是难乎为济的，和用草褥子防卫枪弹一样。

中世纪的人民的宗教运动，圣芳济会和其他运动也都具有那种广大群众在人数不多的但是受过战争锻炼的并且联合一致的压迫者面前表现得政治上软弱无能的情况："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在福音书所传布的原始的和平主义里面找到自己的避难所，用赤裸裸地"摆出"自己的"人性"的方法逃避现实——而这种人性违反了人们在上帝－天父面前是平等的友爱的等等的教义而被蔑视了的和被凌辱了的。

在中世纪异端史里，圣芳济占有特殊的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占有的地位：他不同于其他宗教改革者（华尔多等人以及同样的那些圣芳济信徒），他不愿意斗争，甚至连想也不愿意想任何的斗争。在古老的圣芳济原文里面有一段逸话描画出了他的态度："一位圣多米尼克斯教团的神学家问他应该如何来理解以西结（Иезикииль）下面的话：'假使你不对不信神的人指出他的罪行，那么你要为他的灵魂对我负责'"。圣芳济对这个问题这样回答："上帝的仆人在生活中和办事中都应该做好事，使得他的善行之光和良言之香膏成为对一切不信神的人的咒诅；我想，这样一来，他的生命之光和荣誉之香就会对不信神的人指出他们的罪行了……"（见1931年1月号《新意大利》上发表的安东尼奥·威斯卡迪的论文：《圣芳济和福音书的贫苦条例》）。

第一次复兴时期的起源

在专门探讨为了实现第一次复兴时期而进行的民族运动的起

源的著作中，不只是意大利的，而且也有外国的作家，特别是法国的作家(或者受法国文化影响的作家)，几乎始终有不加掩饰的政治倾向性。有一种法国的关于第一次复兴时期起源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意大利能够有这样的命运理当感谢法国，特别是两位拿破仑。这个学说还有其论战-否定的一面：拥护君主政体的民族主义者(班威尔)非难两位拿破仑(以及法国革命所产生的一般的民主倾向)，认为他们不应该以自己的“鼓励的-民族的”政策削弱法国在欧洲的相应的地位，也就是认为他们不应该反对法国民族的传统和利益，而这些传统和利益的体现者正是经常与意大利敌对的君主政体和“右派”(教权派)政党。依照他们的意见，法国的利益在于使自己的邻国始终处于当初德国和意大利于十八世纪所处的那种小国混合物的地位。

因此，在意大利就有了下列一些“先入为主的、有倾向性的”观点：(1)民主的亲法兰西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第一次复兴是法国革命所引起的，其起源直接来自法国革命，这就决定了第二种相反的论点的产生；(2)法国革命由于侵入到半岛上来就打断了“真正的民族”运动。这第二种论点有两方面：(一)耶稣教徒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合理的和值得尊敬的唯一的“民族”因素是桑菲特运动[①]信徒)和(二)温和派的观点，这种观点毋宁应该列入改革者的原则，列入开明的君主政体的原则。有些人还对这一点加以补充：(三)改革运动被法国事件引起的慌乱所打断，因此法国军队侵入意大利不仅没有阻碍了地方运动，而且甚至使得这种运动的恢复和完成成为可能。

这些观点的许多要点已经在那些以《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

① 桑菲特运动(来自拉丁语——Santa fede——神圣的信仰)——十九世纪初在意大利组织的极端反动的政治运动。天主教会的建立的桑菲特运动信徒的恐怖组织暗杀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俄文版编者

历史诠释》为标题的文献中有所论述。这种文献对政治思想史来说可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他们在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却微不足道。

卑阿基诺·沃尔培的文章《现代意大利历史简论》[①]是很值得注意的，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大家都知道，为了理解第一次复兴，只是深入研究1815年以前的历史，甚至1796年以前当拿破仑侵入半岛并在那里造成骚乱时的历史是不够的。第一次复兴时期作为意大利生命的恢复，作为新的市民等级的形成过程，作为正在增长的不仅对地方自治和各省任务而且也是对一般民族任务的认识，作为对某些理想要求的反响，——整个这一过程的起源应该早在法国革命以前去寻找；它本身也是即将到来的革命——不仅法国革命，而且也是一定意义上的世界革命——的象征或象征之一。同时大家也都知道，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历史，不仅仅根据意大利的文件来研究，也不是作为纯粹意大利的现象来研究。人们是在整个欧洲生活的范围内来研究这一时代的，其中包括文明潮流的，经济改造，新的国际条件——引起意大利人产生新思想、进行新的活动、产生新的政治制度的一切东西"。

在沃尔培的这一段话里面已经扼要地指出了奥摩第欧在他那本书里所应该努力的目标以及他论述得毫无联系和肤浅的地方。假使根据标题和编年的范围来判断的话，那么就会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奥摩第欧由于机会主义的"竞争"的原因——不够明确的、而且无论如何是没有重大意义的原因——以他这本书只是想对历史倾向性而不是对历史表示"论战性的"贡献。

在十八世纪，半岛的地位在欧洲关系的范围内发生一些变化，这不仅是指列强对意大利进行决定性的压迫而言，因为它们不能

① 载1932年1月9日《晚邮报》。

允许出现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而且也是指教皇强大的政治的（在意大利）和文化的（在欧洲）地位改变而言。（欧洲列强更缺少理由允许成立一个以教皇为最高首脑的统一的意大利国家，也就是允许教会依靠领土广大的国家和相应的军队能够加强自己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和自己的外交，而这两方面本来就已经大大地压服了和限制了天主教国家的国家政权。）

同时使古罗马、中世纪公社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以及意大利教皇宫廷的世界作用为之增光的文学-修词学的传统其意义和作用也改变了。

这种不固定的和不明显的文化气氛在意大利一直保持到十八世纪。这对教廷特别有利，因为为它树立世界威力创造了思想基础并且为遴选和训练教会的和世俗-教会的工作人员做出了标准。这些工作人员是教廷所必需的，用以进行实际的行政工作，用以集中和加强整个教会机构的影响，用以进行一切政治的、哲学的、法律的、政论的和文化的活动，这些活动使那个以实现教会间接统治为目标的机构发动起来并在宗教改革前的一段时期里为实现教会的直接权力或者实现直接权力的那些职能服务（这些职能在每一个天主教国家中都存在的内部力量的那种对比关系下是可以具体实现的服务）。

到了十八世纪，这一传统潮流开始分开。一种潮流越来越有意识地（根据一定的和明确表达的纲领）同教廷结合在一起，把教廷看做是意大利该当在全世界上完成的那种精神使命——具有精神和非军事领导的性质的道德政治使命——的体现。这一潮流最充分地表现在乔别蒂的《论意大利人的道德和文明的优越》一书中和新教皇派中（预先以一系列的多少值得怀疑的流派，例如初期的桑非特运动和拉门尼运动① 等形式形成起来）；尔后这一潮流所形成的那种有机的形式是梵蒂冈本身直接领导的“天主教行动”运

动。在这个运动中意大利做为一个民族其作用被缩小到最低限度（仅限于梵蒂冈的某些领导人参加，他们虽然是意大利人，却不能象以前一样把自己出身于意大利这一点提到首位）。

同时也在发展着另外一种潮流，"世俗的"而且是反对教廷的潮流，它极力主张意大利应摆脱教廷而居首位并完成世界使命。这第二种潮流不能依靠罗马教会这个依然很强大的机构；因此它没有统一的中心，不象第一种潮流那样团结一致，清一色和有纪律。它是沿着几个分枝路线发展的，而且可以肯定最后汇集为玛志尼运动。

从历史方面来看，有一件事实很重要，那就是在十八世纪这个传统的潮流开始分裂（更确切一些说是具体化）并依照自己内部的辩证法发展。这就表明这种文学-修词学传统成为产生这样一种思想基础的政治酵母和动机，正在活动中的政治力量以这种思想基础为根据就能够领导起广大人民群众来，尽管队伍零乱，因为这种政治力量要达到一定的目的必需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对梵蒂冈本身和半岛上其他聚集在教廷周围的反动势力造成威胁。

第一次复兴时期的最重要的政治上的成就和在解决早已迫不及待的一些问题（它们从前曾经阻碍具体提出关于成立统一意大利国家的可能性问题）方面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于自由主义潮流拥护者能够推动天主教-自由主义力量并且使得庇护九世本人转到自由主义立场上来，尽管为时不久（这已经足能瓦解天主教的思想和政治机构并破坏它对本身的信心②）。

《波拿巴——意大利共和国的总统》〔Albert Pingaud, Bo-

---

① 拉门尼运动——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发生于意大利的天主教的流派。这一运动的思想家和鼓舞者是修道院院长菲里西第·罗贝尔·第·拉门尼（1782—1854），他传布宗教问题中的极端反动的观点，他主张教会在社会生活中起领导作用。后来拉门尼转到了自由主义的立场。——俄文版编者

napart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italienne〕一书的作者阿尔伯·朋高得正在准备出版新著《第一个意大利王国》〔"Le premier Royaume d'Italie"〕(它几乎已经分别一部分一部分地在各种刊物上全部发表了),他抱有那些"认为1814年是起点而伦巴地则是以1870年攻下罗马而完成的政治运动的发源地"的人的观点。

巴尔多·皮龙尼在1932年8月16日《新文选》上对朋高得著作的个别部分加以评论:"我们的被看做是政治觉醒的第一次复兴时期开始于对祖国的热爱已经不再是一种恍忽的感情的冲动或者文学上的主题,而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志愿和热情的时候,这种志愿和热情通过长期而顽强的、不惜任何惨重牺牲的活动得到实现。这种变化发生在十八世纪最后十年,并且不只在伦巴地,而且也在那不勒斯、皮蒙特和几乎意大利的所有地区。从1789年到1796年这一时期被放逐的和处死的'爱国人士'的抱负不仅是恢复共和国,而且也是为意大利争取独立和统一。在尔后的一些年代里,正是对独立的热爱鼓舞着并指导着意大利的整个政治阶级的活动,——不只是那些同法国人合作的人的活动,而且也是那些在明显地看到拿破仑不肯给予他曾经郑重许诺过的自由时企图组织暴动的人的活动"。无论如何,皮龙尼并不认为意大利的运动开始于1789年以前;换句话说,他肯定关于第一次复兴时期与法国革命相联系的论点——被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所推翻的论点。但是如果注意到一个特有的并且有决定意义的现象,也就是政治分子集团的出现,那么皮龙尼的论断将是对的,因为这个集团尔后就当真

---

② 假使把这些反映意大利文化传统改变的因素看成是研究第一次复兴起源的必要的因素,而把这种传统的破坏看成是积极的事实,看成是具有民族性质的积极的自由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例如"詹森教旨"这些潮流将会具有一定的(不小的)意义,因为他们做为学者普通好奇的对象将呈现另一种面貌。换句话说,问题将在于研究意大利政治史方面的"催化剂",也就是加速剂的因素,它们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是在建造新的历史机体上却起了必需的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

发展成了一些在第一次复兴时期起到主要作用的政党。

在十八世纪中，无论在意大利国内或在意大利国外都产生了一些客观的、国际的和民族的条件，它们逐渐稳定下来，并且赋予建立民族统一的任务以一种历史具体性，也就是不只使得这项统一的建立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可是，当然只有在1789年以后，一些准备斗争和甘愿牺牲的公民才开始意识到这项任务。这样看来，法国革命是那些欧洲事件之一，这些事件最大程度地促成了已经开始的“隐蔽的”运动的加深，巩固了对运动本身有利的条件（主观的和客观的），并且起着把分散在整个半岛上的力量在自己周围团结起来和集中起来的那种因素的作用。否则，这些力量的“集中”和相互了解将会大大地推迟。

由于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卓阿基诺·沃尔培的发表于1932年7月号《法西斯主义者的教育》上的论文《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致代表大会》。沃尔培总结了1932年5月到6月于罗马举行的国立第一次复兴时期历史研究协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初期把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历史主要看成是“意大利爱国主义史”。随后又开始对它深入地加以研究，“看成是十九世纪一般的意大利生活，于是这个历史几乎成为一般地对这种生活的描述，而这种生活整个就是理想和实际事务，文化和政治，私人的和公共的利益之改变、配合和统一的过程”。从十九世纪追溯到十八世纪，随即发现了以前潜在的联系等等。十八世纪是“通过第一次复兴时期的棱镜来考察的，甚至做为第一次复兴时期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十八世纪的已经成为民族的资产阶级，在于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它渗入到经济的、宗教的生活里面，尔后也渗入到政治生活里面，它对生产者来说不仅是‘原则’，而且也是刻不容缓的需要。问题是发生于十八世纪的对‘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的最初的具体的企望（桀诺威吉）”。这种企望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当时已经认识

到分立的意大利国家其经济不够发达，经济力量有限，不能抵御领土广阔势力强大的国家的经济入侵。

在同一个世纪里也确立了一种新的国际局势：正在事件叠出之际，欧洲的一种政治力量活动起来，他们所关心的是使各意大利国家能够更加独立，能够彼此联系得更密切些，彼此之间的平衡较为不静止。总而言之，确立了新的意大利的和欧洲的"'现实'，因此许多文学家所固有的民族主义也取得了意义并起了作用，因为它代替了前一个时代的世界主义而又重新露面了。"

沃尔培没有专门详细论述教会的国内和国际的地位，而在十八世纪里教会同样经过了根本的改变——取消了耶稣会教团。这一事件是加强世俗国家以对付教会干涉的顶点等等。可以这样说，梵蒂冈在同其他国家订立条约以后又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现在梵蒂冈对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历史编纂学来说成了相当敌对的（也许是最敌对的）力量之一。这些力量阻碍科学思想的发展，并努力传播和推行"马尔萨斯主义"的方法。早先除了这个一直表现得嚣张的力量之外，君主专制政府和对分离主义的恐惧也使得历史研究的范围缩小了。因此，许多有关历史的著作都没有发表（例如，曼诺男爵的撒丁史，专门论述战争时期波列阿的插曲的著作等等）。共和国的政论家专门从事"诽谤"史，尽力贬损每一部科学地再现第一次复兴时代事件的历史著作。这就造成研究和写作范围的缩小，造成辩护性历史编纂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利用档案文献成为不可能等等。总而言之，这就使第一次复兴时期历史编纂学比起法国革命历史编纂学来显得十分贫乏。

现在君主专制政府的利益和分离主义的利益已经被放到末位，但是梵蒂冈和教权主义者的势力却加强了。毫无疑义，对于柯罗齐的《欧洲史》的攻讦大部分来源于这方面。佛兰西斯科·萨拉塔的《罗马问题外交史》〔Francesco Salata, Par la storia diplo-

matica della Questione Romana〕一书之停止印行也可以用同样的原因来说明。1929年出版的这部书的第一卷，也就成了唯一的一卷了。

在上面引证的沃尔培的论文中是这样论述皮耶特洛·希尔瓦的论文《十八世纪欧洲外交中的意大利问题》〔"Pietro Silva, Il problema italiano nella diplomazia europea del XVIII secolo"〕的实质的。这篇文章是提交国立第一次复兴时期历史研究协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十八世纪对意大利来说是处于列强势力之下。但是在列强之间也有矛盾，因此外国人的直接统治减弱的程度越来越大，而发展起来两个强大的国家机体——在北方和南方。自从法国与西班牙于1752年在阿兰辉斯订约以及紧紧随之而来的奥法接近以后，两个意大利王国在四十年间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在这四十年的时期里，这里曾经多次试图打破奥法包围，并与普鲁士、英吉利和俄罗斯接近，同时那些由于法国革命和奥法体系的破坏而进行斗争以便依照民族统一的精神来解决意大利问题的内部力量也得到了发展。于是最近在许多研究两个西西里王国、托斯坎纳、帕马、皮亚辰察和伦巴地的著作里都考察了关于改革和改革原则的问题。"

卡尔洛·摩兰迪在自己的论《根据最新历史编纂学资料探讨十八世纪的改革》(Carlo Morandi, Le riforme settesentesche nei risultati della resente storiografia) 里考察了（从全欧洲改革运动的角度）在意大利所实现的改革的作用，以及改革和第一次复兴时期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法国革命与第一次复兴时期的联系，沃尔培是这样写的："无可争论的是，这次革命由于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自己的热情，由于自己的军队和拿破仑的活动，给意大利生活的激流带来了新的因素。同样无可争论的是第一次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是个生动的有机体，它吸收了从外部渗透进来的各种可能

的事物(包括某些思想，它们最初产生在意大利而后来在国外经过改造)，同时对它所吸收的一切有所反应，有的摒弃，有的补充，并且无论如何它总能超越它所接受的一切。这个时代的意大利具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思想方式。它面临着特殊的问题，它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所有这一切也就构成了第一次复兴时期的真正的和深刻的基础，构成了它的真正的特点。第一次复兴时期与以前的时代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其实质就在这里，而这一点也就造成了第一次复兴时期反过来影响其他国家的条件。同时这种影响并不是奇迹是的，而是通过邻国人民之间用以传布影响的普通的历史途径。”

在沃尔培的这种看法里面并不全是正确的：怎样可以提到真正意大利的“传统、思想方式、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呢？至少这具体说明什么呢？当时存在有许多矛盾的传统、思想、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它们往往仅仅具有个人的和任意的性质，而且向来也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为统一的整体。企望统一的力量是极端软弱的、分散的，彼此没有联系的，而且没有能力建立这种联系。不只是在十八世纪如此，而且一直到1848年也是如此。相反地，这些为统一而活动的力量(或者，更确切一些说，具有趋于统一倾向的力量)，遭到强大而联合一致的力量(这特别指教会而言)的对抗。后者还把大量有能力的和精干的人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来。这些人本来可以成为新的民族干部以治理国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却把他们加以训练而引上了世界主义-教权主义的道路。

国际事件首先是法国革命削弱了这些反动力量，并使它们消耗殆尽，从而使本身还不够强大的民族力量有可能对反动派进行反击。这就是法国革命的最重要的功绩之一。这项功绩很难用言语来评价和确定，但却可以根据法国革命对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发展所给予的那种决定性影响来衡量它。

在另外一些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中，值得注意的是吉亚科摩·伦布洛索的一篇论文：《十八世纪末叶反对法国人的人民运动》(Giacomo Lumbroso, La reazione popolare contro i Francesi alla fine de 1700)。伦布洛索断言："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出动并不是因为贵族教唆了他们，而且甚至不是由于热爱安静的生活（要知道事实上他们曾拿起了武器啊！），而是因为他们受到没有意识到的和模糊的对祖国的热爱的激励，尽管是部分地，或对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制度、自己的独立（！？）的依恋的激励。由此也就产生了从1799年就已经开始常常重复的'反动派'对意大利人的民族感的呼吁"。伦布洛索没有能够很好地阐明这一问题，它的提法是矛盾的。完全没有提到神甫们的"教唆"，而这种教唆比起贵族们的教唆来，其效果要大得多（贵族们已并不象从帕尔丹诺普共和国①以来所被看成的那样敌视新思想）。还有括弧里面沃尔培的那种暗示——不能讲拿起武器的人热爱安静生活——又表示什么呢？要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口头说法的矛盾。"安静的生活"从政治意义上来看与反动性和保守性等同，而根本不排斥武装保卫自己的社会地位。此外，不把人民群众态度问题同统治阶级态度问题联系起来，就不能提人民群众态度问题，因为人民的反抗"异族"的起义可以被直接的和偶然的原因所引起，这是由于谁也没有给人民群众指出不同于地方活动和有限制活动的其他斗争道路。人民群众自动起来的发动（就一般地它们发生来说），只能作为上层阶级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至于何种程度的指标；意大利的自由资产阶级向来是不把人民群众放在眼里的。因此，沃尔培应该确定自己对于那种专门论述第一次复兴时期的片面性的和矛盾

---

① 帕尔丹诺普共和国——原来的那不勒斯共和国，1799年被法国人侵入变成保护国。所以被称为帕尔丹诺普共和国，是因为那不勒斯的城市最早时被称为帕尔丹诺普。自1799年1月23日成立，这个共和国一共才存在五个月。——译者

重要的文献的态度，而伦布洛索已经做出了这种文献最典型的specimen①：在伦布洛索的理解中谁是"爱国者"或"民族事业捍卫者"呢？是被英国人绞死的卡拉佐洛海军上将还是起来反抗法国人的农民？是多米尼科·齐里洛还是乌拉·吉亚沃罗？而且为什么亲英政策和英国金钱比起法国的政治思想来更富有民族性呢？

对第一次复兴时期历史的解释

对第一次复兴时期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存在许多自相矛盾的解释这件事无论对整个意大利历史政治文献来说，或者对第一次复兴时期的研究工作所处的状况来说都是一种特点。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某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能够成为这类文献出现的基础。这类文献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容不够明确和理由不够充分的特点，是不是那些显然产生这类文献的"隐蔽的"力量之低能的结果，是不是这类文献里面所讲的那些客观的"民族的"因素之贫乏的结果，最后，是不是所研究的现象本身不固定和不定形的结果（事实上往往可以听到有人把第一次复兴时期当"奇迹"来谈）。

不能以文件缺乏（档案资料搜索的困难）为理由来为这类文献的出现做辩解，因为在这种场合下历史事件的全部进程本身就可以做为文件。相反地，十分明显，恰好在第一次复兴时期一些事件的发展中整个"骨干"的有机的软弱性才是在文献中造成这种随心所欲的，有时甚至异想天开的和肆无忌惮的"主观主义"泛滥的原因。一般地可以这样说，所有这些解释整个来看都具有直接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却没有历史的意义。它们的民族意义同

① 样本、样子（英文）。——译者

样也很有限——一方面由于它们带有过分的偏见，以及没有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抽象性过大，而且往往是牵强附会和铺张渲染。

可以指出的是这类文献盛行于社会政治危机最严重的时期。这时统治者与被统治的群众之间的脱离现象特别严重，而且看来好象在预示着民族生活中将发生毁灭性的事件。在某些最敏感的知识分子集团中间散布着惊慌失措的情绪并多次地企图改组现有的政治力量，在衰竭的和不巩固的党的机构中掀起新的思潮，不再悲观失望，唉声叹气。

正确地把所考察的文献加以分类是一项必需的和重要的工作；现在为了临时有所依据，可以提出一些方向：

1. 一些狭义地解释第一次复兴时期的著作，例如阿尔夫列多·奥里安尼在其《意大利的政治斗争》(Alfredo Oriani, Lotta politica in Italia)一书中以及其他一些涉及政治和文化问题的论战性著作中的解释。他以许多这类论战性著作来攻击马里奥·米西罗里的作品。属于这一类的有彼耶洛·戈别第和基多·多尔索的论点。

2. 许多具有较为重要和较为严肃的解释，它们自命具有历史编纂学上的准确性，例如柯罗齐，索尔密，萨尔瓦托列里的解释。

3.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著作中（在《野蛮的意大利》(Curzio Malaparte, Italia Barbara)一书中）以及论述反对新教改革斗争等问题的书中对第一次复兴时期的解释，卡尔洛·库尔卓（《第一次复兴时期的遗产》〔Carlo Curcio, L'eredità del Risorgimento, Firenza, La Nuova Italia,1931,p.114〕）等。

应该把蒙泰弗列丁尼的著作（参阅《新意大利文学》上柯罗齐对这些著作的评论）和阿尔多·菲拉里的一些著作（书，小册子和发表在《历史新观察》上的论文）做为"珍品"而提出来，这些著作既

是富于技巧的概论同时也是长篇小说。属于这一类的有汶森佐·卡尔达列里的小册子《关于意大利的谈话》(Vincenzo Cardarelli, Parliamo dell'Italia(ed. Vallecchi,1931))。

还有一类重要的解释第一次复兴时期的著作，以盖坦诺·莫斯卡的《统治的理论和议会的统治》(Gaetano Mosca, Teorica dei governi e governo parlamentare(Milano, Soc. An. Istituto Editoriale Scientifico, p.301))这样的书为代表。该书于1883年初次问世，于1925年重版。属于这一类的有：帕斯库阿列·屠里耶洛的《政府与臣民》(Pasquale Turiello, Governo e governati)；列昂·卡尔皮的《活的意大利》(Leone Carpi,L'Italia vivente)；路易吉·齐尼尔的《统治的标准和方法》(Luigi Zinil, Dei criteri e dei modi di governo)；乔治亚·阿尔科列奥的《议会政府中的内阁》(Giorgio Arcoleo, Il Gabinetto nei governi parlamentari)；马尔科·敏海蒂的《政党及它们的参与司法和行政》(Marco Minghetti, I partiti politici e la ingerenza loro nella giustizia e nell'amministrazione)以及一些外国人的著作，例如，拉威列的《意大利来信》，冯·洛海的《新意大利》以及布拉塞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意大利》。此外还有发表在《新文选》和《每周观察》(索尼诺出版)上面的帕斯库阿列·维拉里，朋吉，帕尔马等人的论文，其中包括索尼诺的发表在《新文选》上面的有名的论文——《我们回到法令上去！》

所有这些著作的出现是"右派"垮台和所谓"左派"取得政权的结果，是实行加入立宪制度中的"实际的"新措施以及赋予这种制度以一种议会制度的形式的结果。这些著作大部分都充满了怨言，互相的非难，悲观的论调，关于民族灾难的预言。柯罗齐在其《1870年到1915年意大利史》的前几章里指出了这种情绪。

与这些著作相对立的是行动党仿效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以书、

小册子和刊物上的论文的形式问世，其中也包括共和党现代政论家的著作（典型的范例是修道院院长路易吉·阿涅里的遗书，该书在不久以前出版，有阿尔坎杰洛·吉斯列里所写的绪论和注解）。

很容易看出盛行这种冒充历史的和冒充批评的著作各个不同时期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些保守分子的著作，他们由于“右派”和他的“党羽”的垮台而激怒起来，也就是由于某些大地主集团和贵族集团在国家生活中的影响的衰落而激怒起来，尽管还谈不到由其他阶级来替换这个阶级。这些著作相当挖苦，十分刻薄，没有建设性的成分，更不遵循任何历史传统，因为过去的一切反动的传统，其中任何一个也不可能为了它的恢复而被提出来，假使哪怕有一些羞耻心和自尊心的话——要知道在过去只存在旧的地方政体、教皇和奥地利的势力。

对议会制度所提出的，认为它不是“民族的”，而是抄袭外国的样式的“责难”只是一种空洞的和徒劳无益的指责，隐藏在它背后的只是甚至对人民群众最起码的干预国家生活的惊慌失措。以“传统的”一意大利统治为借口将必不可免地成为空洞的抽象，因为这个传统没有很大的历史前途。过去向来没有过意大利领土国家的统一，而教皇领导权（保存于整个中世纪时期直到外国统治时期）的前途早就同新教皇派一起被破坏了①。

这里所考察的反动著作，比起具有很大人民—民族意义的奥里安尼—米西罗里的这类著作来，出现得更早。而后者又出现在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戈别第和多尔索的这类著作之前。但是甚至这两种新的趋向也还保存着抽象的和纯粹文学的性质。在所有这些著作里所提出的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意大利没有发生

① 归根到底将在古罗马时代中找到这种可能具有很大历史前途的“传统的”一意大利统治。它的可能性将与（根据政党的性质）共和国的或恺撒的罗马相联系。但是这一事实将具有新的意义，并成为在人民群众观点上烙上痕迹的新潮流的特点。

过象新教改革那样的宗教改革。然而这个问题提得很机械而且肤浅，成了马萨里克[①]在他有关俄国史的著作里所发挥的那些思想之一的重复。

所有这些著作整个看来具有“文件性的”意义，用以研究这些著作出现的那个时代。“右派”的著作很明显地描述“左派”执政时期那种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败坏情况，而从行动党仿效者的著作里也看不出“右派”执政时期的情况好一些。这样看来，政权由“右派”转到“左派”，并未引起任何重要改变。根据这种情况来看，国家之所以衰落，并不是议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议会制度仅仅把以前隐蔽起来的事情或者为出版秘密的诽谤性刊物创造基础——弄得人所共知罢了），而是统治阶级根本软弱无能以及国家极度贫穷和落后的结果。

政治局势看上去是荒唐的：右翼是教权主义者，是根本否认一切现代文明的和抵制合法国家的“希拉波”党。这一翼不仅阻碍广大的保守党的建立，而且也支持国内所产生的那种关于新的统一国家的不巩固和不可靠的印象。占据中心地位的是从温和派到共和派的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在进行争取恢复统一的斗争时期中，他们彼此之间的仇视是记忆犹新的，而这一集团由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也遭到分裂。

左翼是穷苦的、落后的、愚昧无知的群众。他们的行动具有时有时无、断断续续和歇斯底里的性质，而且许多无政府主义的破坏的倾向是他们身上所固有的。这些倾向是不稳定的，缺少具体的政治方向，它们没有任何前途。没有“经济党派”，有的只是由各阶级里失掉阶级性的代表人物所组成的思想集团；他们好象是预报

① T. G. Masaryk, Russland und Europa. Studien über die geistigen Strömungen in Russland, 2 Bd., Jena, 1913.（马萨里克，《俄罗斯与欧洲。俄罗斯精神生活的研究》[意文版（两卷）洛·加托译，罗马 1925 年——意文版编者]。）

那个实际上永远也升不起来的太阳将升的雄鸡。

在战前的年代里，莫斯科——屠里耶洛集团的书又流行起来（在《呼声》上经常载有对屠里耶洛的介绍和评论）。莫斯卡在年青时写成的书在1925年重印，书中有作者的附注，说明该书所表述的是1883年的思想，到了1925年，作者并不完全同意在1883年从事著述的二十四岁的作者的看法。重印莫斯卡的书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后时期自由主义者政治上轻率和不负责任的许多表现之一。同时，莫斯卡的这部"创作"是一部没有写好的、肤浅的书。它是一位一心想要"崭露头角"，摆出一副过激分子的姿态、并以反动的精神使用大言不惭的而往往是无味的词句的青年匆匆忙忙写成的。莫斯卡的政治观点很模糊，很不稳定，他的哲学修养等于零（在他那整个写作生涯中他始终这样），他的政治活动的原则也同样是模糊的和抽象的，而且勿宁具有法律的性质。他那个"政治阶级"论点极端无力，考虑得不够周密，理论上毫无根据，可是在莫斯卡的一切论述政治学说的著作中，其中心问题就是为这个论点辩护。不过，莫斯卡的书作为文件资料还是可以有用处的。这位作者努力表现得毫无偏见，谈到一切问题都不是转弯抹角的，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观察到当时意大利生活的许多方面，否则，这些方面可能在那个时代文件中得不到反映。他所描述的文职的和军事的官僚派、警察等等有时是矫揉造作的，然而实质上却是正确的（例如，军队中的下士，公安机关全权代表等等）。特别宝贵的是他关于西西里的论述，因为由于他的亲身经历，他对西西里最了解。到1925年前，莫斯卡的观点和他对未来的看法都有所改变。他的第一部书的材料已经陈旧了，但是他格于写作的虚荣心，又把它印行了，他的打算是加上几条附注表示放弃自己的一些旧的观点①。

所有对意大利历史的解释以及导源于这些解释的许多思想体系和历史长篇小说在大多数场合下都"要求"证明从古罗马起到今

天止在国家的全部历史中都是民族统一的，至少是在实际上（往往甚至包括古罗马时代以前的时期，例如在乔别蒂的《希腊皮拉斯基族人》里以及其他一些出版时间较晚的著作里）。

这一"要求"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是怎样巩固下来的而且为什么一直存在到现在呢？它是有力的表征还是软弱的表征呢？它是否反映新的、自信力很强的、为自己寻求并建立过去贵族所具有的爵位称号的社会集团的存在呢？或者，相反地，这一要求是模糊的"信仰的意愿"的反映，是那个应该"治疗"国家结构软弱性并防止威胁着它的灭亡的思想狂信的因素（和刺激这种狂信的手段）吗？最后这一观点大概是正确的。这一观点与下面这个事实密切联系着，即知识分子，也就是小资产阶级比起那些经济上落后而政治上无力的阶级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的确，民族统一被看作是不巩固的，因为"野蛮的"、还不大为人所知的、由于自己的本性就是不安分的力量在不断地反对它的基础。知识分子和拥有地产的市民中的某些集团的铁一般的独裁所以能保持自己的团结一致，只是由于这种独裁可以在自己的行列中利用这个关于历史宿命的神话激起黩武的因素，因为这种神话比起空谈国家软弱和国家政治上无能及军事上无力来较为有力。而且恰好在这个基础上人民－民族群众同国家之间的有机的

---

① 在廖第元帅的《青年信札》〔Lyautey, Lettres de jeunesse. Paris, Grasset, 1931〕一书中，可以找到一些有意义的资料，借以了解意大利的恰好是1883年的政治情势和教权主义者的态度。根据此书的说法，当时有许多最热烈拥护梵蒂冈的意大利人不相信年轻的王国的前途。他们预言它将要解体，结果必定出现以佛罗伦萨为首都的上意大利，以那不勒斯为首都的南意大利，在中央则为罗马连同海口。廖第转述公爵沙波尔对当时意大利军队的评论，法国对当时的意大利军队不够注意："在估价意大利军队上请你们不要误解。我对这件事所讲的话，使我有理由把它看成是一支雄厚的兵力，很值得注意。意军军官虽然在外表上有些舞台上的打扮，而且军帽上有羽饰，但是训练有素的，而且很勤奋。然而，这是我的住在帕马的一个侄子的意见，他平常对这些军队并不喜爱"。

联系被抽象地解释的"民族"的"志愿兵"的遴选所代替。谁也没有想到马基亚维利在宣布必须以民族民兵来代替临时的不可靠的雇佣兵以后所提出的问题，在志愿兵的遴选为群众性的"人民－民族"民兵所代替以前，不能解决，因为这种遴选是问题的过渡的、矛盾的解决，其危险程度与雇佣兵制相同。

以意大利国家的成立为探讨对象的那些思想论点里所存在的对历史事件的描绘，可以称为"拜物教化了的历史"。的确，它的主要角色是抽象的和神话般的"人物"。在奥里安尼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就有这种神话图式中的最通俗的图式。这样的图式又产生了一系列的奇谈怪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联邦"，"统一"，"革命"，"意大利"等等的神话形象。在奥里安尼的著作中很明显的表现出这种借助神话人物来解释历史的方法的原因之一。

批评的规则规定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本身是一部文件，现在的说明和证实过去的，——这个规则被机械化了，成了纯粹表面上的东西，归结为一种直线性的和"一线性"的决定论的规律（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也是因为以国家的地理界线来限制历史的眼界，并且从统一的历史过程中、从国际关系的体系中把每一个事件抽出来，其实这个事件与整个历史过程和国际关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查明具体的和一定的事件——十九世纪意大利现代国家的形成——的历史根源，这一问题归结为这个国家被看成是一般地在以前的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以统一的形式，或民族的形式，或意大利的形式而存在过，正象母鸡在鸡蛋中就以胚胎状态存在着一样。

为了估价这一论据，应该看一看包括在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选集》〔Antonio Labriola, Scritti vari, pp. 487—490, pp. 317—442〕里面的以及他的最初一部《随笔》〔Saggi, pp. 50—52〕里面的评论。同时柯罗齐的第一版《历史编纂学史》第 227—228 页，

以及一般地包括在这部著作里面的关于“意大利通史”的“感情上的和实际的”来源和证明它的建立“逻辑上不可能性”的研究，也都值得注意。与上述看法有关的其他看法是属于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它的涉及基督教的一般的历史。拉布里奥拉认为这种历史是没有根据而不能成立的，正如一切以非实在之“本质”为对象的历史构造一样（见《随笔》，第113页）。

以拉布里奥拉的精神来对待具体现实的态度，也可以在萨尔威米尼的历史（和政治）著作中看得到。他不肯承认“教皇派”是人民和教廷的党，也不肯承认“教皇派”是贵族和国王的党，他认为它们只是一种“地方的党”，他们是为了与教廷和帝国利益不相符合的纯粹地方的利益而斗争的。

在萨尔威米尼的《法国革命》一书的序言中，这种观点升华为一种理论，其中具有从此产生的一切反历史的夸大性①。他只把“无数的各式各样的革命事件”归结到“革命”的概念上去，而不去“把每一个事件同一定的个人或者同成为这种事件的历史创议者的个人的集团联系起来”。但是如果历史只归结为这类的研究方法，那么历史就过于贫乏了，而且，更有甚者，就成了简直不可理解的了。②

---

① 《法国革命》一书从其他方面也是易于受到批评的，例如书中断言革命完成于瓦尔美一役，就是没有根据的。

② 萨尔威米尼所指望的是这种小心谨慎的批评，所以他怎样具体解决由于他过于片面地提出方法论上的问题而产生的矛盾，是值得玩味的。假使不能从其他著作中了解到这书里面所讲到的一些事件，而我们又仅仅有这一本书的话，那么难道我们能够理解这书里所描述的现象吗？这样看来，问题在于是哪一类的历史，是“完整的”历史，还是“论战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论战的－补充的历史，这时作者只是打算（或者虽然没有抱着这种目的，但却必不可免地达到这一点）在那张已由别人绘出模样的画稿上添上几笔而已。在任何批评中都应该经常具备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在事实上，我们往往遇到一些著作，它们“本身”距离理想很远，但在研究某些问题时却很有用，因为可以把它们当做其他著作和研究工作的“组成和补充”的素材。

在1932年7月20日《批评》杂志中第280页上阿道尔夫·奥摩第欧写道：他（皮耶洛·马尔科尼）向爱国者提出一个论点，这一论点当时是萨尔威米尼提出来的。它的实质不外是：人们把第一次复兴时期看成是不大重要的流血不够多的历史现象，看成是在大多数人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少数人手下办的事，而认为统一与其说是意大利人的战果毋宁说是命运的恩赐。这一论点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估价道德的伟大本身而产生的，没有从经验上计算所流的血，没有考虑各种不同的利益（玛志尼和加富尔的艰巨的事业看样子象是很轻易，而这种事业曾注定成为一切杂志和报纸讨论的对象，从而受到无知者的非难），——就是这一论点成了马尔科尼以《呼声》风格进行道德说教的论证的根据①。

但是奥摩第欧本人在其《第一次复兴时代的时期》一书中所做的说明和所提出的观点，无一不具有肤浅的和装饰门面的性质。所谓第一次复兴时期的确是意大利对于十九世纪伟大欧洲运动的贡献，这一事实根本不等于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是意大利，正如不等于甚至"积极少数中的多数"没有抵抗地和表面热情地参加这一运动。象加富尔和玛志尼这些个别人物，如果从历史远景来考察他们的话，那么他们的伟大看上去就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正如屹立于沙漠中的孤零零的棕榈。

奥摩第欧对于把第一次复兴时期看作"微小的"历史现象的批评意见，是恶意的而且也是意义不大的。他不能理解这种论点是一种唯一的多少比较认真的企图，提出人民群众来做为民族力量，也就是造成一种具有意大利根源和意大利要求的民主运动的论点①。同时，可以指出下列这一点来：如果不考虑和探溯现在的利

---

① 奥摩第欧所写的是在战争中牺牲的皮耶洛·马尔科尼和他的《我听到了命令》(Piero Marconi, Io udii il comandamento, Firenze, s.d.)。

益就不能写过去的历史的话，那么在这种场合下那种要求重现的第一次复兴时期历史只不过是具体事件的叙述的批评公式是不是不够和过于狭隘呢？（假使这个公式不仅仅是号召历史著作完全地并确实地符合历史文件的话）。

把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历史归结为仅仅一些单纯的事实的叙述，归结为以第一次复兴时期为其最后完成的规律性的历史过程的那些阶段的描绘，那就是被限制在仅仅所谓"客观性"的、纯粹外表的和机械的新形式之中。在这种场合下，问题往往是下面这些人的"政治"要求，他们满足于现在并且公正地看到发生于过去的过程与发生于当前的过程的相同之点，看到对现在的批评和将来的纲领。

柯罗齐—奥摩第欧之流的集团甜言蜜语地（奥摩第欧特别惯于甜言蜜语）盛赞自由主义时期。奥摩第欧本人的《军事生活片断》〔«Momenti della vita di guerra»〕一书的目的是表明在"声名狼藉"的乔里丹诺统治时期事实上隐藏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无上的"财宝。然而，这些论断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它们是立脚于纯粹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上面的。而且如果说写过去的历史就是创造现在的历史的话，那么一部在今天能帮助正在发展着的力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自己并且因此而成为更积极的和更能起作用的力量的书，就会是伟大的历史书了。

一切对第一次复兴时期的解释，其主要缺点都在于他们具有纯粹的思想体系的性质，也就是没有为自己提出使现代的政治力量积极化的任务。这是一些文学家，外行们写出来的东西，是杂技表演，他们不是炫耀智慧，而是炫耀天才；其中一部分是以没有前

---

① 萨尔瓦托列里在《文化》上曾发表评论，谈到柯罗齐的《欧洲史》和奥摩第欧的《第一次复兴时代》，他认为后一书里有民主的倾向，而《欧洲史》里则有更接近自由－保守的倾向。

途的小知识分子集团为对象，一部分是为了给陷于尴尬地位的反动力量作辩解，硬把他们根本没有过的打算和目的放到他们的头上——甘心做走狗的知识分子（登峰造极的典型是马里奥·米西罗里）和卖身投靠的文人的小殷勤。

这种对意大利民族和国家形成过程的纯粹思想意识的解释也应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加以研究：在或多或少"英明的"人物的影响下，这些论点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这一事实证明旧的政党的原始性，证明一切建设性的活动（包括国家活动）的狭隘的经验主义，证明意大利生活中没有任何能够含有经常和不断发展的可能性的"中心的"运动。

党的纲领没有以最大的科学的认真态度制定出来的历史前景，这种前景从全部以前的历史出发提出那些应该在将来达到并且应该做为要求有意识斗争的必然性而在人民面前提出来的目的。没有这样的远景也就决定了大量的思想性很强的长篇小说的盛行，而这些长篇小说在实质上就是那些在理论上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它们的开展尔后在实际上没有用处的政治运动的前提（宣言）。

这种态度非常便于那些往往被称为"隐蔽的"或"不负责的"力量和那些"独立的"报纸为其喉舌的力量的"活动"。这些力量所关心的是时时同这个或那个社会舆论运动建立联系，它们支持这些运动，直至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止，以后就让这些运动衰落和灭亡。出现一些"雇佣支队"，认真的思想上的被雇佣者的支队，而且正因为他们甘心为财阀或其他类似集团服务，所以他们往往装成反财阀或其他类似集团的战士。这些"支队"的典型的组织者是皮波·那尔第，他是奥里安尼的追随者，马里奥·米西罗里的及其发表在刊物上的即兴之作的鼓舞者。

把马里奥·米西罗里的著作编成一份完全的书目提要是有益

处的[①]。米西罗里所提出的基本论点是：首先，第一次复兴时期是国王的征服而不是人民运动。其次，第一次复兴时期没有解决国家与教会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后一种看法是与前一种有联系的。因为“不认识宗教自由的人民也就不能认识政治的自由。独立和自由的理想成了不顾人民群众的让步态度和毫无作为而打算统一的英雄的少数人的财产和纲领”。

归根结底，整个第一次复兴时期和全部现代民族历史似乎完全可以用意大利没有发生新教的宗教改革这一事实来说明。米西罗里把马萨里克用以考察俄国历史的那些解释学上的原则和标准运用到意大利上面来（尽管米西罗里曾表示同意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对马萨里克这位历史家所提出的批评）。米西罗里也和马萨里克一样（虽然他同索勒尔有联系），不理解具有人民意义的精神的和道德的（也就是“宗教的”）“改革”在现代世界中曾发生过两次：起初是传布法国革命的原则，第二次是传布许多从实践哲学中借用来的、往往是同启蒙哲学相混的而后来又是同科学的进化论相混的论点。这一“改革”具有粗糙的形式而且它的思想是通过大量的小册子传布开的。这一事实并不足以否认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不应该这样想：处于加尔文教影响下的人民群众所掌握了的思想比包含在这些小册子里面的更为复杂和更为微妙。另一方面，产生一个关于这种改革的领导者的问题，关于他们的不彻底性，关于他们性格不坚强，没有魄力的问题。

---

① 这里先指出他的几部著作：《社会主义君主专制政体》〔La Monarchia socialista（1931）〕，《自由的论战》，《意见》，《国家变革》〔Polemica liberale, Opinioni, Un colpo di Stato（1925）〕，《失败的战役》，《今天的意大利》〔Una bataglia perduta, Italia d'oggi（1932）〕，《穷人的共和国》（论摩里涅尔）〔La repubblica degli accattoni〕《爱情与饥饿》、《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②……》〔Amore e fame, Date a Cesare……（1929）〕，《战争中的教皇》〔Il Papa in guerra（1917）〕等等。

② 语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0章第15—22行。——译者

米西罗里没有试图仔细地分析一下，为什么领导第一次复兴时期运动的少数人没有“走向人民”，既没有能够“从思想上”通过采取民主纲领的途径做到这一点，而这种纲领毕竟由于从法文翻译过来而传到了人民身上，也没有能够“从经济上”，通过土地改革的方法做到这一点。可是要知道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当时农民在意大利居民中占压倒多数，而土地改革恰好是他们的迫切要求，同时德国的新教改革恰好与农民战争同时发生，而在法国伴随这一改革的是贵族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①。

“统一是不能由教廷来实现的，这是由于它具有普遍主义的本质，而且它根本仇视一切现代的自由。但是把这样的普遍主义的思想拿来与天主教思想相对立也没有能够胜过教廷，这样的普遍主义的思想会在同样的程度上符合个人的意识，符合被改革和革命所更新了的整个世界的意识”。所有这些都是抽象的和大部分没有意义的说法。法国革命以什么样的普遍主义思想与天主教相对立呢？为什么在法国运动就是人民的而在意大利却不是呢？被称为“英雄的”著名的意大利的少数（作者们笔下的“英雄的”这一用语具有纯粹“美学的”和修词的意义，既可以用在顿·塔卓里②的头上，也可以用在米兰贵族的头上，而米兰贵族对奥国皇帝的卑恭屈膝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即甚至写出了一部把第一次复兴时期当做“没有英雄的”革命来看的书，这部书同样具有这种纯文字的和书本的性质），——领导统一运动的少数在实际上较关心的是经济问题，而不是理想的公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反对统

① 不要忘记，另一方面，奥国曾利用土地改革投机，唆使农民反对占有广大土地的爱国人士，而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则利用互教学校以及以人民群众为对象的互助机关和小抵押贷款努力争取仅仅手工业者和城市工人少数集团的同情；在都灵“工人协会总会”的创始人之中有加富尔。

② 顿·塔卓里，恩里科——神甫，曾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为奥国当局所杀）。——俄文版编者

一的敌人，不如说是阻止人民参加运动从而把这一运动变为社会的（指实行土地改革而言）运动。

米西罗里写道，在意大利恢复统一以后出现于意大利历史中的新的因素，也就是社会主义，成了表现反中央集权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反动的最强有力的形式（这是地道的胡扯，这与米西罗里本人的另外一些论断不合，因为他断言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把以前没有过的或者毫无作为的人民的力量发动起来了）。米西罗里本人这样写道，“社会主义不仅没有掀起政治热情来（?!），反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促成了它们的扑灭。这是一个贫民的和饥饿的平民的党：经济问题很快成了主导的，政治原则让位（?!）于经济利益。”产生了“把人民群众导向经济成就方面，并强迫他们规避一切法律问题上的阻碍”。这样看来，社会主义犯了与那著名的少数所犯的相反的错误：后者只是讲了一些抽象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可是社会主义则为了单纯的经济而蔑视了政治。不错，在另外一个地方米西罗里恰好为了这一点而称赞改良主义者的领导等等。这类渊源于奥里安尼和共和国的方法被米西罗里轻率地并且不负责任地接受下来了①。

难道一种造成民族统一和意大利国家的建成的政治运动，一定要流为民族主义或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吗？可以断言，这样的转化是时代错误的，也是反历史主义的（也就是人为的，不能广泛流行的），而且在实质上与具有世界主义性质的一切意大利的传统——起初是古罗马的，后来是天主教的——传统，相矛盾的。

可以对下面这个事实做出解释：政治运动应该反对世界主义

① 事实上，正如一般人通常讲的，米西罗里只不过是一位漂亮的作家。造成一种十分固定的印象，那就是他毫不在乎自己的思想、意大利及其他一切。他最感兴趣的只是以片刻间的玩弄一些抽象的概念，他每每喜欢屈膝于新的理想之前（米西罗里——“不倒翁”）。

的传统并且为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开辟道路。但是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对这些传统具有有机的一人民的性质。另一方面，在同一个第一次复兴时期，玛志尼和本别蒂曾致力于把民族运动同世界主义的传统联系起来，制造复兴了的意大利在新的欧洲的和世界的世界主义者身上所负的使命的神话。但这是一种纯粹字面上的、修词学上的神话，它是以过去为依据的，而不是以现今的那些已经形成了的或者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条件为依据的（这类神话向来是在全部意大利历史中，包括它的现代——从葛汶丁诺·塞拉到恩里科·科拉迪尼和邓南遮——起作用的酵素）。

假使说某一种事件在过去发生了，那么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认为这种事件也必定在现在或将来重复发生。军事扩张的条件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存在。我以为这种条件甚至连一点萌芽也没有。现代的扩张具有财政资本主义的性质。在现代意大利的"人"——这要么就是"做为资本家的人"，要么就是"做为劳动者的人"。意大利的扩张只能是"做为劳动者的人"的扩张，而表现他的利益的知识分子不是充满修词才华和从书本上怀念过去的传统的知识分子。传统的意大利的世界主义应该成为现代型式的世界主义，也就是应该成为能保证意大利劳动者发展（不问他在世界上什么地方）的最好条件的世界主义。

"世界公民"必须出现——而且已经并不是因为他是civis romanus或天主教徒，而是因为他是文明的创造者。因此可以断言，辩证地继续意大利传统的是劳动者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传统的公民和传统的知识分子。意大利人民是一种"从民族观点"最关心世界主义现代形式的人民。关心这一点的不只是工人，而且也有农民，特别是南方的农民。共同参与世界整体的经济改造是意大利人民和意大利历史的传统。意大利人民需要这种合作不是为了统治世界并把别人的劳动果实攫为己有，——意大利人民需

要这种合作是为了恰好做为意大利人民而存在和发展，并且可以证明这种传统的根源还有信徵。法国型式的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历史中是一个时代错误的赘瘤，它是那些象但丁笔下的罪人一样头向后扭过去的人所特有的。意大利人民的“使命”是复兴古罗马的和中世纪的世界主义，但在他的最现代化的和发展的形式中。

我们姑且可以认为意大利人民是正如帕斯柯里想要把它称做的那种“无产阶级民族”——其所以是无产阶级的，因为他们充当过外国资本家的后备军，是因为他们同斯拉夫民族一起向全世界献出了灵巧的劳动的手。正因为这样，所以意大利人民应该被列入争取改造整个社会（而不只是意大利）的现代战线，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参加过这种社会的建立……

做为民族的“传记”的历史

这种编历史的方法是从产生民族感的时候出现的。它是一种政治工具，用来在广大群众中配合和加强恰好是那些其总和构成民族感的因素。

这种方法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人们努力想达到的那个东西是向来存在过的，但是由于外部力量的干涉或者由于内部力量还处于“睡眠状态”而没有能够公开地确立起来和表现出来。其次，它为民间彩色版画历史开辟了道路。在事实上，意大利是一种抽象的，同时又是具体的，甚至非常具体的东西，是民间油刷石印画中一位漂亮的高贵夫人，这些民间油刷石印画对个别人民阶层的心理起着（总是以不合理的方式）比一般所想象的更为巨大的影响——积极的和消极的。意大利是位母亲，她的“子女”是所有的意大利人。借助一种看上去是生硬的并且不合理的但无疑义是起作用的转变，母亲的传记变为与败坏了的、脱离真理道路的子女相

对立的"善良的子女"的集体传记。

不言而喻，这类编写和普及历史的方法是由实践的宣传动机所引起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还继续奉行这样的传统呢？

在我们今天这样来阐述意大利历史是加倍地反历史的。首先，这是因为这样阐述与现实相矛盾。其次，这是因为这样阐述轻视了第一次复兴时期活动家的范围和特性，从而防碍正确地估价他们的努力，而他们这种努力不只是反对外部敌人，并且特别是反对国家内部那些反抗统一的保守力量。

为了理解那种决定把历史解释为民族传记的"教育的"动机，在这个场合下也应该把实现了第一次复兴时期的那一时期意大利的局势同法国的局势做一个对比。拿破仑宣称自己是法国人的而不是法国的皇帝，路易·菲力普同样宣称自己是法国人的国王。这样的称呼具有深刻的民族的一人民的性质。它是来自民族制度时代的一幅鲜明的写照，并且证明把决定意义赋予了人，而不是领土。因此，在法国甚至最热忱的爱国人士也可以嘲笑"玛丽安娜"，而在意大利人中间有人讥笑意大利的特有风格的形象就意味着必定属于反爱国主义者的阵营，就象1870年前后的桑非特运动者和耶稣会徒一样。

关于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各种不同的"论点"的来源之一是为意大利思想方法所独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宗派主义。这种宗派主义表现在真正的被迫害妄想症之中，表现在坚信人们向来对意大利人没有好评并且低估他们，表现在确信意大利人是国际阴谋的牺牲品，意大利人应有特殊的历史权利，没有被承认的权利、被蹂躏的权利等等。

这种观念不但为渊源于玛志尼的民主派所固有，而且也为有新教皇派和本别蒂派的保守派所固有。这些观念是同模模糊糊接受下来的和有神秘感的民族"使命"思想相联系的。而且这在所有

场合下就流为憎恶法国病，因为认为是法国把意大利的继承古罗马的权利夺去了——而意大利之所以具有这项权利是由于自己的公民的长子继承权。

在第一次复兴时期，反对奥国的斗争把这种感情冲淡了。但是现在到了奥地利帝国消灭以后，这种感情又复活了，而且由于巴尔干问题加剧了，因为把这个问题的发生看成是法国敌对行为的结果。

在形成统一的意大利国家时，是不是把以前各个独立小国制定出来的一切政治－文化职能都“继承下来”了呢，还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都完全被丧失了呢？换句话说，新的国家在自己的国际地位中是不是继承了以前独立存在的意大利国家的立场呢，还是除了新取得的利益之外，也受到一些损失呢？而且这些损失在1861年—1914年时期的统一了的国家生活中是不是能感觉到呢？我以为这个问题不是徒然无益的。

很明显，举例来说，当萨伏依属于皮埃蒙特的时候，皮埃蒙特对法国的态度是一个样子，而失掉了萨伏依和尼西的意大利对待法国的态度则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在瑞士的关系上和日内瓦的态度上也可以这样说。那不勒斯王国的情况又何尝不是这样。统一的意大利不能象那不勒斯王国那样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有同样的势力并处于同俄国及英国的同样的关系上。可以允许军事潜力微弱而版图比较小的波旁王朝国家的事，就不能允许意大利国家。

但是，我觉得近些年来过于夸大了那不勒斯在东方的影响，这种夸大是有各种不同的动机的（力图为现代政策寻求历史先例，以及为了恢复那不勒斯波旁王朝的声望）。

关于教皇国家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也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意大利的威尼斯是不是承继了奥国占领下的威尼斯所具有的那种作用呢？还是这种作用完全转到的里亚斯特去了？在什么样的程

度上英国政府对待意大利统一的态度不仅决定于奥国在欧洲的作用(作为与法国和俄国的对抗)，而且也决定于那不勒斯和俄国在地中海上的相互关系呢？而且俄国对意大利的殖民政策（对阿比西尼亚)的反对，在什么程度上是为新的意大利国家的建立和这个国家对英国的依附关系引起的呢？

意大利民族和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的政治领导问题

所有关于第一次复兴时期各种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它们与存在于国家领域历史上不同部分(或地区)的同它们相类似的或者依附它们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问题，都归结为这一基本问题。

温和派是一个比较清一色的社会集团，因此他们的领导所经受的动摇就比较有限(无论如何，他们是沿着有机的进步发展的路线走的)。同时所谓行动党在任何一个固定的历史阶级中也没有支柱，因而它的领导机构所经受的动摇，归根到底在符合温和派的利益的情况下解决了。这就表明历史上行动党是由温和派领导的；被认为是维克多·埃曼努依尔二世所讲的关于行动党“是他的囊中之物”(或类似的话)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确切的，这不仅是由于国王与加里波的有私人关系，而且也因为在事实上加富尔和国王“间接地”领导了行动党。

应该列为这项研究工作的基础的方法论上的标准如下：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

只有那个力图“消灭”与它敌对的集团或者使这些敌对集团服

从自己，不惜使用武力并且同时以联盟的或亲近的集团的领导者的身分出现的社会集团，才是它的敌对的集团的统治者。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分出现(这就是夺取政权本身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尔后这个集团取得政权，即使很坚固地掌握着它，成了统治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领导的"集团。

甚至在1870年和1876年以后，温和派也继续领导着行动党，而所谓"变形"并不是别的，不过是这种精神的道德的和政治的领导权的议会表现。甚至可以这样说，整个意大利的国家生活从1848年起以及尔后的时期其特点就是变形，也就是在温和派于1848年以后及新教皇派和联邦派的空想破产以后所规定的范围内建立人数越来越多的领导阶级——这种建立伴随着逐渐地、但不断地吸收(这种吸收是以各种效果不同的方法实现的)不仅是联盟集团中的，甚至是本来看上去不可调和地相敌对的集团中的积极分子。从这方面来看，政治领导变成一种统治，因为从敌对集团中吸收杰出人物(e'lite)就会使得这些集团失掉首脑从而造成这些集团往往是延续很长时期的破坏。温和派的政策十分清楚地表明，领导权的政策也可以而且应该在取得政权以前这一时期实行，并且不应该仅仅指望政权为了实现有效的领导所提供的物质力量。正因为这些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所以使得第一次复兴时期能够在它被实现的那些形式中和限界内完成——没有"恐怖"，做为"没有革命的革命"或做为"消极的革命"(如果使用古奥科的说法，但意义与他本人所赋予这种说法的稍有不同)。

温和派在何种形式中并以何种手段能以确立他们的精神的、道德的和政治的领导权的机关(机构)呢？是在那些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形式中和利用那些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手段，也就是通过"个人的"、"分子的"、"私人的"创议，而不是根据还没有开始

实际工作和组织工作以前就依照计划制定出来的党的纲领。同时，这本是“很自然的”，如果考虑到温和派表现其利益的那些社会集团的结构和作用的话，而温和派是这些集团的领导阶层，他们从根本来讲是知识分子。

这个问题提到行动党面前就有所不同了，因而它应该利用另外一种组织系统。温和派是“凝聚起来的”一团知识分子。这一点已经是他们同那些其利益是由他们来表现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之有机性本身所造成的（在这些关系的整个一条线上表现着被代表者和代表者的利益的一致性：温和派是上层阶级真正的有机的先锋队，因为他们本身在经济上属于这些阶级；他们是知识分子，是政治组织者，同时主持着大经济，他们是大地主或大地产的管理者，是商业和工业的企业家等等）。由于这种紧密的联系或有限的集中，温和派对意大利知识分子一切阶层起了“自生的”强有力的吸引作用。而意大利知识分子根据教育和管理的需要（哪怕在基础阶段上满足了这些需要也好），“散开”、“分布”在整个半岛上。这里表现出进行历史政治研究工作所必需的那种标准的方法论上的实质来：不存在知识分子的独立阶级——每一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或者在努力造成这种阶层。但是属于在现有条件下历史地（和实在地）进步的阶级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吸引力，归根结底能使其他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从属自己，从而利用心理上的联系（虚荣心等），往往是帮会的关系（技术上的、法律的、团体的等等）达到所有知识分子的团结。

这种现象在“自生的”形成中发生在下列这些历史时期：这个社会集团确实是进步的，确实能促使整个社会前进，不止满足自己的最重要的要求，而且也由于这个社会集团的生产经济活动经常包括所有新的部门而不断扩大自己的干部。

一旦统治的社会集团完成自己的职能，则思想上的联盟就有

瓦解的倾向，于是“自生性”就会被“强制”所代替，这种强制越来越露骨而直截了当，直到采取真正的警察手段和实行真正的国家政变。

行动党由于自己的本质不能具有这种吸引力，相反地，它本身受到温和派方面的吸引而处于温和派影响之下。首先，促成这一点的是畏惧气氛（害怕在意大利重演为 1848—1849 年法国事件所加剧的恐怖的 93 年）。这种气氛决定了行动党的犹豫不定，决定了它不能把某些人民要求列入自己纲领（如，土地改革的要求）。其次，是下面这个事实，即它的某些重要代表人物（加里波的）尽管不经常地（也就是表现了摇摆不定），却处于对温和派领导者的个人依附地位。

为了使行动党变成一支独立的力量，并且归根到底至少能够赋予争取第一次复兴时期运动以一种比较明显的人民的和民主的性质（在那些成为运动本身基础的先决条件下，大概它不能达到比这一点更大的成就），那么它应该用反映人民群众首先是农民的最重要的要求的完整的政府纲领来对付温和派的“经验的”活动（这种活动之所以被称为经验的，只不过是口头上这样讲，因为这种活动非常符合目的），至于温和派所实行的“自生的”吸引活动则应该用有计划地“组织好的”反抗和反击来对付。

“自由主义一天主教”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做为温和派自生的吸引活动的典型例子。这一运动把教廷搅扰得十分不安。这个运动得以部分地麻痹了教廷的行动，使得它精神涣散，在最初一个时期把它远远地推向左面（庇护九世在其文告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倾向），而在第二个时期使它走上比它本身所能采取的更为右倾的立场，因而归根到底使它在半岛上和欧洲陷于孤立。教廷而后表现出它接受教训至于何种程度，在最近时期内使人们看到它非常善于随机应变。始而出现的现代主义，继而出现的人民主

义① 都是与第一次复兴时期自由主义的天主教运动相类似的运动。这两种运动的产生大半一方面由于上层阶级世俗知识分子的现代历史主义所具有的自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于实践哲学的实际运动所具有的自生的吸引力。

教廷消灭了现代主义这个力图改革教会和天主教的倾向，而促进了人民主义的发展，也就是现代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今天庇护十一世一手把人民主义当做自己世界政策的一个枢纽。

相反地，行动党所缺乏的正是具体的政府纲领。在实质上，这个党向来也不是别的，而是为温和派服务的宣传和鼓动机构。行动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和冲突，玛志尼在行动最坚决勇敢的人物（加里波的、菲里奇·奥尔希尼等人）中间所引起的对自己个人和自己活动的极度不满，都是由于没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所致。党内的争论具有很大程度的抽象性，正如玛志尼的说教是抽象的一样。但是从这些争论中可以吸取有益的历史教训（为了理解毕撒堪涅笔下的一切著作，这些教训也是重要的，而毕撒堪涅却犯了难以纠正的军事上的和政治上的错误，他之反对加里波的的军事独裁和罗马共和国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行动党浸透着意大利文学中的修辞传统：它把文化的统一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土的和政治的统一混在一起了。文化的统一确实在半岛存在过，但只限于很少数的居民阶层并且受到梵蒂冈世界主义的熏染，而广大人民群众与这种文化传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并且毫没有重视它，因为它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传统的存在。

可以把雅各宾党人拿来同行动党对比一下。雅各宾党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以保证城市（巴黎）与乡村的联系，并在这方面取得

---

① 人民主义——所谓"人民党"（"popolare"）的思想基础。这个党是在1919年年初由天主教上层分子成立的群众性的政党。梵蒂冈力图通过"人民党"使工人和农民群众受自己的影响，使他们脱离争取自身解放和摆脱资本主义桎梏的斗争。——俄文版编者

了成就。他们做为一个固定的党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在一定时机出来反对了巴黎工人的要求，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活动被拿破仑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下来了，而到了我们今天，尽管是很可怜地，但也被激进社会党人欧里和达拉第继续下来了。

在法国的政治书籍中向来都生动地使人感觉到和表现出城市（巴黎）与乡村联系的必要性——只要回忆一下欧仁·苏的那一套长篇小说就够了。这些长篇小说在意大利也是很流行的（佛加查罗在《衰亡的小世界》里讲到弗朗科·麦罗尼怎样秘密地从瑞士得到几部《巴黎的秘密》，这些书本来都是被刽子手们在一些欧洲城市，例如维也纳投到火里烧掉的）。在这些长篇小说里特别主张必须注意农民并把他们同巴黎联系起来。欧仁·苏是一位很受欢迎的小说家，他是以雅各宾政治传统的精神来写作的，他在许多问题上（拿破仑的轶事，反教权主义，反耶稣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重新教育的理论等等）是赫里欧和与达拉第的"精神导师"。

当然，行动党由于玛志尼的思想体系而向来都在隐蔽的形式中具有反法兰西的倾向（见 1929 年《批评》上的论文，第 223 页等，奥摩第欧的短论《法国的优先地位和意大利的首创精神》），但是行动党在半岛历史中找到一种它能够向之乞灵以便继续它的传统。

在这方面公社历史可以提供丰富的经验：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在农民身上找到反对帝国和反对地方封建主义的同盟者（固然，问题由于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为了取得廉价的劳动力的斗争而复杂化了。资产阶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这种劳动力只能由农村群众供给；贵族所关心的是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农民向城市逃亡的现象越来越多，贵族在城市里不能抓到他们。无论如何，即使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即使在公社文明的发展时期，也表现出城市这个领导因素的作用来，也表现出城市这个加深农村内部冲突的并成为削弱封建主义的军事政治工具的因素的作用来）。

意大利统治集团在政治艺术方面的头等的导师——马基亚维利——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当然在那为他的时代所规定的界限里，与他的时代所规定的任务联系起来。在马基亚维利的军事－政治著作里相当明显地贯穿着一种思想，即必须有机地使人民群众服从领导阶层，以便建立能代替雇佣队伍的国民兵。

想必也应该把卡尔洛·毕撒堪涅列入以马基亚维利为其创始人的那一派里面去。毕撒堪涅主要从军事观点来考察实现人民要求的问题（当这些要求通过宣传而被提出来以后）。在这里把他的论点的某些矛盾之处加以分析是适宜的，那不勒斯的贵族毕撒堪涅总算掌握了一些根据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军事经验而制定出来的军事一政治理论。这些军事政治理论在约瑟夫·波拿巴和约西姆·缪拉统治时期，特别是由于曾在拿破仑军队中作战的那不勒斯军官的亲身体验而闻名于那不勒斯[1]。

毕撒堪涅理解到不实行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建立义务兵役制的国家的军队；但是他对加里波的战略的敌视态度以及他个人对加里波的的不信任依然是无法辩解的——毕撒堪涅看不起他，正如旧政体的参谋部看不起拿破仑一样。

鉴于第一次复兴时期的这些问题，特别必须研究朱塞佩·菲拉里[2]这个人，但是不仅要根据他的所谓主要的著作，而且要根据他那些偶然写成的小册子和信札，因为前者是杂乱无章的和漫无次序的混合的作品。但是，菲拉里在更大的程度上处于意大利具体现实之外，因为他已经非常法国化了。他的论断看上去往往使人

---

① 马·米西罗里在其发表于《新文选》（1929 年 3 月 1 日）上面的纪念卡多那的论文里坚持己见，认为这项经验和那不勒斯的军事传统在 1870 年以后改组意大利军队上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有赖于皮阿涅尔）。

② 菲拉里，朱塞佩（1811—1876）——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主张以联邦形式统一意大利各国家。——俄文版编者

感到比现实中所存在的更为尖锐，因为他把能够反映比起意大利来大为先进的国家情势的法国方式运用到意大利来了。可以这样说，对意大利来讲，菲拉里处于“后辈”的地位，而他的智慧在一定意义上是“未来的智慧”。相反地，一个政治家应该考虑现代的情况而有效地活动。菲拉里没有看到在意大利与法国现实之间缺少一个中间的环节，而重要的正是要把这一环节联紧，以便然后转到次一环节。菲拉里不会从法文“译成”意文，因此他那“尖锐”本身反而变成了混乱的因素，产生了新的宗派和细小的流派，但却没有在实在的运动中留下痕迹。

如果更为深入地把问题加以考察，就会看得出，在许多方面，在许多行动党拥护者与温和派之间的区别毋宁是“气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根本上并没有政治性质。

“雅各宾党人”这一术语归根结底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原来的、在历史上明确的意义，是法国革命某一政党的名称，这个党具有一定的纲领，其目的是在某些社会力量的基础上在国家的全部生活中实现（用一定的方法）变革。党的和政府的活动的方法其特点是具有非常的毅力，并且坚决而勇敢。这些特点都是由于狂信这个纲领和这种方法优良有益而产生的。

在政治语言中，雅各宾主义的这两方面分裂了，于是开始把有毅力的、坚决的和狂信的政治家称为雅各宾党人，他们狂信自己的思想具有创造奇迹的力量，不问他们是什么样的思想。在这个定义中占主要地位的勿宁是由于憎恨对手和敌人产生的破坏因素，而不是由于支持人民群众的要求产生的创造因素。占主要地位的勿宁是宗派主义的、结党营私的狭隘性的、派别活动的、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的因素，而不是民族的政治因素。假使我们读到克里斯比是位雅各宾党人，那么也就恰好应该在这种被歪曲了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论断。从自己的纲领来看，克里斯比是位百分之百

的温和派。他所"充满"的最高尚的雅各宾的热情，就是企望国家在政治上和领土上统一。不仅在狭义的第一次复兴时期，而且在以后的时期，即克里斯比加入政府时期，这一原则一直就是他的方针。他是一个具有非常热情的人，他憎恨温和派这些人。在他看来，这是一些收场时候的人，是"六日英雄"①，他们会同旧的政体媾和，如果这些政体成为立宪政体的话。在他看来，这是一些与抓住大公的衣襟不放他逃走的托斯坎那温和派相类似的人。他不大相信不是统一的拥护者所实现的统一。因此他同君主专制政府联系起来，因为后者——他懂得这一点——将为王朝设想而坚决地出来主张统一，并将以甚至皮埃蒙特政治家也不具备的毅力和热情支持由皮埃蒙特领导的原则。加富尔曾事先提出警告，反对在南方实行戒严，但是克里斯比却相反地立即在西西里宣布戒严并对"法西斯"运动的参加者开设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控诉他们的领导者同英国暗地勾结，想达到分离西西里（毕撒库依诺的假条约）的目的。正当基本的政治路线是利用反对法国的关税战争和关税保护主义来加强北方的工业的那个时期，他同西西里的大地主密切地联系起来（因为他们由于畏惧农民的要求而最热心地主张统一）。他单单为了加强工业而宁肯使南方和各岛陷入可怕的商业危机，因为工业完全能够使国家获得真正的独立，并且能够扩充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成员。这是制造工厂主的政策。

从 1861 年起到 1876 年止，"右派"的政府行动怯懦，为了经济的发展仅仅造成了一些主要的表面的条件（整顿国家机关、道路、电报、铁路线等），并整顿了由于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各次战争而困难起来的财政。

---

① "六日英雄"——这是那些不肯参加 1848 年米兰起义（参见原文第 203 页注米兰"五日革命"）的，但却妄图尔后坐享人民胜利果实并夺取政权的资产阶级活动家的贱称。——俄文版编者

"右派"曾寻求方法来安抚由于"右派"实行片面的财政政策而在人民中间所引起的愤懑。但是它只能成为一个安全阀，它利用"左派"的拥护者和左派的言辞继续了"右派"的政策。

相反地，克里斯比确实推动了新的意大利社会的发展。他是新的资产阶级的忠实可靠的人物。虽然如此，但是他在活动中的特征却是言行之间的矛盾，镇压手段与镇压对象之间的矛盾，行动工具与施工打击的方法之间的矛盾。他使用生了锈的旧炮，就好象它是现代火炮一样。甚至克里斯比的殖民政策也是和他的对统一的热情相联系的，而且为了实行这项政策他很善于利用南方在政治方面的缺乏经验。南方农民渴望土地，而克里斯比不愿意(也不能)在意大利本土把土地给予农民，因为他不想实现"经济的雅各宾主义"，所以就创造了关于可以开发的殖民土地的神话。克里斯比的帝国主义是热情的、雄辩家的、没有任何财政—经济基础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欧洲是资金充斥的，而且到了利润率开始表现出下降趋势的时机，因此它感觉到必须扩充获取利润的投资范围，——于是到了1890年以后就建立起了广大的殖民帝国。但是还没有成熟的意大利不仅没有资本以供输出，而且必须乞灵于外国资本以满足自己本身的刻不容缓的需要。因此，意大利帝国主义的实在的冲动是不够的，这种冲动被极端的激奋所代替，这种激奋普及到盲目追求土地财产的农村居民。这就是说对内政策迫切问题的解决无尽期地推迟了。这样一来，克里斯比的政策就受到资本家(北方的)本身的敌视，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要把大量资金花在意大利本土，而不是非洲。但是克里斯比在南方是受欢迎的，因为他创造了关于"易得的土地"的神话。

克里斯比很重视西西里知识分子的广大集团(特别是因为这个集团对所有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建立了在未来行将蓬勃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最初的基层组织)。他造成了一种对

统一的狂信。由于这种狂信也就出现了怀疑一切可能与分离主义相类似的现象的稳定的气氛。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住西西里的大地主在1920年汇集于巴勒摩，向“罗马政府”提出真正的最后通牒，以分离相威胁，也没有阻止住其中某些大地主继续保留西班牙国籍，从而强迫玛德里政府通过外交途径(1919年比翁公爵事件)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因为这些利益受到了曾在前线作战的农民运动的威胁。

从1919年起到1926年止，南方各种社会集团的地位使得我们能够说明并且表明克里斯比如此热情地奉行的那种统一方针的某些缺点并且看出乔里蒂对这个方针所做的一些修改。这些修改为数不多，因为乔里蒂在实质上是奉行克里斯比的路线的。乔里蒂用热心和官僚式的奋勉代替了克里斯比性格中所固有的雅各宾主义精神。他保留了殖民政策中的“土地神话”，并且以更大的力量用军事“防御”的理论和预先得出的关于必须在将来创造扩张的自由的论断来支持这种政策。

1920年西西里大地主提出最后通牒这件事不是孤立的。要是没有从1919年起直到斯卡尔佛里奥弟兄们被解除掉为止在《晨报》上所展开的宣传活动中对这件事有一种确实可靠的解释，否则会对它做出另外一种解释来；因为伦巴迪上层阶级也曾有一个先例，他们有一个时间也曾为了恢复旧的米兰公国(这是对政府实行的短期恫吓政策)而以“独立行动”进行威胁。如果认为这些宣传活动完全是悬空的，也就是与舆论方向和人们的心情没有一定联系，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人们的心情由于狂暴的中央集权主义所造成的恐怖气氛没有表露出来，在隐藏着，暗地里活动着。《晨报》两次提出以下的论题：南方同意在条约的基础上，在查理-阿尔柏特法规的基础上成为意大利国家的组成部分，但事实上(这是从一般意义而来的)它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且有权利脱离统一

的国家，假使条约关系遭到某种形式的破坏的话，也就是假使1848年的宪法有所变更的话。一种解释是说这个论题被提出来是反对在1919—1920年改变宪法，而在1924—1925年它又被利用来反对改变宪法，但已经又是另外一种解释了。必须记住《晨报》在南方所起的那种作用（当时它是最流行的报纸）。《晨报》一向具有克里斯比的那种扩张主义的性质，口吻都是南方意识形态的，这种意识形态来自企求土地和向往外国，而这种企求和向往也就推动了某些模糊的国民殖民主义的思想。谈到《晨报》，则除此以外还应该提及的是（1）由于伦巴迪的一部分纺织业主非法的企图消灭南方某些棉织品生产部门而对北方进行了疯狂的攻击（事态当时已发展到他们打算把机器冒充为废铁，输入到伦巴迪逃避工业区的法律），——这种企图也就是被这家报纸发觉的。这家报纸竟然发展到了颂扬波旁王朝和他们的经济政策（这事发生在1923年）的地步。（2）1925年刊登了玛丽娅一苏菲娅的回忆录，回忆录里充满"离愁"和"怀乡之情"，这篇回忆录引起了轩然大波。毫无疑义，为了估价《晨报》的这种立场，必须考虑一些方法论上的因素：斯卡尔佛里奥弟兄们的冒险主义和出卖行为，他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肤浅①。

① 应该提到的是玛丽娅-苏菲娅经常想要干涉意大利的内政，如果不是希望恢复那不勒斯王国，那就是出于报仇的心理，为了这件事她甚至花了钱，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1914—1915年在《统一》上发表了一篇反对恩里科·马拉铁斯塔的短论。短论里断言奥国参谋总部可以通过吉特·波旁资助和奖励1914年6月事件，这是由于在马拉铁斯塔与玛丽娅-苏菲娅之间存在着"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看上去从来也没有断绝过。柯罗齐在其《旧意大利的人物和事件》（Uomini e cose della vecchia Italia）一书中回溯到这种关系，这是由于组织一位无政府主义者逃亡的企图，后者曾在意大利政府对法国政府提出外交声明要求制止玛丽娅-苏菲娅活动之后进行过某杀。此外，应该提起B·夫人所讲的关于玛丽娅-苏菲娅的笑话。这位B·夫人在1919年为了给这位过去的王后画像，常常去看她。最后应该提起的是马拉铁斯塔一直没有答复这些责难，这本是他份内的事。有人肯定说，他确实给一家报纸写了回信。这家报纸是斯吉基在法国以《伐木者》为名秘密发行的。但就是这种说法也是非常可疑的。

但是必须坚持一点，那就是《晨报》是南方最流行的一家报纸，而斯卡尔佛里奥弟兄是天生的记者，也就是说他们具有敏锐的和“出奇的”直觉，具有能感觉最深邃的和热情的人民思潮的本领，这种本领使得黄色报刊的流行成为可能。

可以使我们判明克里斯比顺利实行的统一政策之真正意义的另一个因素，是在北方所形成的对南方的一套意见。南方的“贫穷”在北方人民群众看来是在历史上“不能理解”的，他们没有理解统一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是在北方对南方城乡之间的地域关系统治的基础上实现的，也就是说北方实质上是条“章鱼”，它是借南方的花费而富足起来的，并且它的工业—经济的发展是与南方经济和农业的衰竭有直接联系的。相反地，一个上意大利的老百姓则以为，如果南方在摆脱掉波旁政体在现代发展的道路上所造成的那些障碍以后依然不能发展的话，那么这就表明贫穷的原因不具有外来的性质，也不是由客观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条件而来，而是所谓生来的，是南方居民本身内部所固有的，——不仅如此，而且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南方的土地自然肥沃。解释南方贫穷的原因只有一个了——居民生来的无能、野蛮、生物学上来看低能。这些已经很流行的意见（那不勒斯的穷光蛋是古老的传说）被实证论社会学家固定下来并且提高为一种理论。（尼齐福罗、谢治、斐利、奥兰诺等人），从而一刹那间由一种偏见就变成了“科学的真理”。

在南方与北方之间就这样展开了关于种族，关于南方与北方谁优越谁低劣的论战（参阅科拉雅尼根据这个观点为南方辩护的著作和《人民观察》丛书）。同时在北方保存着一种看法，认为南方是意大利的一只“铅球”，如果没有这只“铅球”的累赘，上意大利的现代工业文明将会获得很大的成就等等。

本世纪之初南方也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强裂的反动。1911年

在鲁金诺将军主持下于撒丁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曾计算过在国家统一实现以后五十年间大陆榨取了撒丁数亿资财。

由萨尔威米尼发起的运动，其顶点是创办了《统一》杂志，但是这项运动的进行还是通过《呼声》的（参阅专门探讨“南方问题”的唯一的一期《呼声》，后来又印了单行本）。在撒丁岛上开始了一个争取自治的运动，是温伯特·考乌领导的。他自己也有一个日报——《乡村》。在本世纪之初也成立了一个以贝·柯罗齐和朱斯秦诺·佛尔吐那托为首的有名的“知识分子的”、“泛意大利的”联盟。这个联盟致力于把“南方问题”做为民族问题来解决，因为这一问题一旦得到解决就能够革新政治生活和议会生活。在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倾向的而且一般地努力于革新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并消灭它们在各方面——艺术上，文学上，政治上青年们所发行的任何一种刊物中，都表现出不仅是柯罗齐和佛尔吐那托的影响，而且表现出他们与例如《呼声》和《统一》，波伦亚的《祖国》，米兰的《自由行动》以及乔万尼·鲍列里领导下的青年自由主义者的运动的合作。这个联盟的影响为确立阿尔别尔蒂尼的《晚邮报》的政治路线开辟了道路，而在战后由于新的局势的产生这个影响也表现在《出版》上（通过科斯莫，萨尔瓦托列里以及安布洛吉尼），并且由于柯罗齐参加了乔里蒂最后的政府也表现在乔里蒂主义中①。

运动达到自己的最高峰，在这高峰上也开始了它的瓦解。这种瓦解的开始应该与戈别蒂所采取的那种特殊的立场以及他的文化方面的倡议等同起来。乔万尼·安萨尔多（以及他的助手如“卡尔坎泰”，也就是弗兰齐斯科·齐科蒂）同基多·多尔索的论战是

---

① 这个运动毫无疑义是很复杂的而且是包括多方面的。今天甚至朱·普列卓里尼也抱有偏见地对它加以解释，可是他本是它的典型的代表。但是现有一部可靠的文件，就是普列卓里尼本人的第一版《意大利文化》（1923年），其中恰好有他一切疏漏之处。

一种文献，它甚至由于现在可以明显地在角斗士的姿势中和以狂暴的中央集权制相威吓中看到的那种滑稽的表现而最明显地反映了这种坚决的向新的立场的转变①。

从这些观察中，从对于统一后那个时期意大利历史某些因素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标准，用以评价温和派和行动党的极端相反的立场，用以研究这两党的以及那些不肯接受后一政党政治和思想领导的各种不同流派的政治"智慧"的区别。不言而喻，如果行动党要想有效地与温和派抗衡，那就必须同农村群众，特别是南方的农村群众联系，必须不仅在外表"形式"上，在气质上，而主要是在自己的社会经济的实质上成为"雅各宾主义的"。利用正统派一教权派知识分子的不同阶层、以反动的联盟的形式实现的农村各种不同阶级的联系，仅仅在下列场合才能被打破——以便转为新的民族-自由的联合——，也就是假使在下列两个方向中做出努力才能被打破：对于农民的基本群众，承认他们的基本要求，并把这些要求变成政府纲领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层和下层知识分子，团结他们并捍卫那些同他们最为休戚相关的要求（而新政府机构——可以利用愿意为它效劳的人——组成的远景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吸引他们的因素，假使这种远景被具体地提出来，也就是以农民的意图为根据的话）。在这两种努力之间存在有一种辩证的相互依赖关系：许多国家的经验，首先是法国在大革命时期的经验表明，假使农民由于"天然的"冲动而发动起来的话，那么知识分子就会开始动摇，同样地，假使知识分子集团开始在具体的亲农民政策的

① 安萨尔多在1925—1926年认为可以迫使人们相信波旁王朝能回到那不勒斯来。这对于那些不了解所有以前所发生的与这问题有关的事件的以及进行论战时所使用的隐蔽的方法——暗示和对于"局外人"来说是莫名其妙的说法——的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的。虽然如此，大家都知道，甚至某些读过奥里安尼著作的人民分子，也曾经担心波旁王朝可能在那不勒斯复辟，担心随后统一的国家可能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瓦解。

新的基础上行动的话，那么归根结底这个集团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众集团。但是，可以这样说，由于农村居民的涣散和孤立，从而因为难于把他们联合在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之中，所以运动的发起者必须是知识分子集团（然而，一般说来，在两种行动之间存在有一种辩证的依赖关系，这一点必须记住）。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一点几乎不可能建立狭义的农民党。一般地讲，农民党只是做为舆论中一种稳定的派别而存在着，尽管已经具有了这种党的官僚机构的外形。虽然如此，哪怕存在一种组织的骨架也会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可以固定的团结一些人，同时这样一来可以实现对知识分子集团的监督，并且可以防止邦会的利益不知不觉地迫使他们转到另外一种立场上去。

在研究朱塞佩·菲拉里这个人的时候，应该考虑这些标准。他是行动党中没有被承认的土地问题"专家"。也必须精细地研究菲拉里对待雇农（即无地农民和短工）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他的思想意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的著作仍在被某些派别阅读和研究（摩南尼重印了他的著作并附有路易吉·法布里的序言）。应该提起雇农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甚至到今天也难于解决。一般地说，必须记住下列几点：直到今天大多数雇农不过是无地农民（而且因此他们之中更大部分的人在第一次复兴时期是处于这种地位的），而不是在资本集中和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村工业工人。在第一次复兴时期，义务农民类型流行的程度比短工类型要大得多。因此，雇农的心理除了少数的例外也就是小佃农和小所有者的心理①。

① 应该提一下参议员塔那里和巴西尼于1917年末和1918年初在《卡尔林诺复辙》和《坚毅》上对于实行当时提出的"把土地给农民"这个公式所展开的论战。塔那里赞成，而巴西尼反对。巴西尼根据自己做为一个大农业企业主、农业所有主的切身经验提出反对。在他的农业中分工已经很细，分地已不可能——由于小农消失和现代工人的出现。

这个问题不止在南方严重，因为这里农业劳动的手工业性质已经相当明显，而在巴达盆地亦复如是，不过这里比较含蓄而已。甚至还在不久以前巴达盆地雇农问题的尖锐化一部分也是经济以外的原因所引起的：（1）人口过剩，没有象南方那样在海外移民中找到出路，因此就只能人为地保持实行社会工作的政策；（2）所有主的政策，他们不愿意劳动居民结合成为统一的雇农或对分制佃农阶级，所以在自己的农场有时以对分制将土地佃出，有时又实行雇工的办法，两种方法交替使用，利用这一点以保证更好地遴选特许的对分制佃农，他们将成为地主的同盟者。巴达盆地区域的大地主每次开会时都讨论何种方法有利：雇农有利还是对分制佃租有利。显然，选择是根据社会政治方面的动机作出来的。在第一次复兴时期，巴达盆地雇农问题表现在令人感受威胁的现象——赤贫现象的形式中。从经济学家吐里奥·马尔泰罗于1871—1872年所写成的《国际的历史》〔Tullio Martello,Storia dell'Internazionale〕一书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这部著作值得注意，因而它反映了前一个时期的政治热情和社会恐慌。

后来菲拉里的立场因为他标榜"联邦主义"而软弱了。这种联邦主义，特别是在法国住过的菲拉里所标榜的联邦主义，在更大的程度上做为法国民族的和国家的利益的反映而突出来了。应该回忆一下蒲鲁东和他一些反对意大利统一的小册子。他攻击这种统一是从公开承认的法国国家利益和民主政治的利益的观点出发的。法国的主要政治派别确实是极端仇视意大利统一的。甚至在今天君主主义者（班威尔之流）依然回溯过去而"责难"两位拿破仑不该创造"民族的"神话，并促进它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实现，从而相对地减小了法国的威力；可是法国周围"应该"有象瑞士一样的小国，方保"安全"。

所以，温和派就正好根据"独立和统一"的口号，不去考虑这

个一般的公式的具体政治内容，而在1848年以后在自己的领导下组成了民族联盟，并且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中和程度上影响了行动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物——玛志尼和加里波的。葛威拉齐在给一位西西里大学生的信里，讲过这样几句话："每个人随便抱什么样的目的都可以——专制也好，共和也好，另外的其他的制度也好——我们不要费力地去分辨谁是谁非。在这个基础上让天坍下来也好——我们自会找到自己的道路"①。这几句话足可以证明温和派怎样努力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本质转移到它的表面上去而获得了成功。然而，玛志尼的全部活动实际上是经常而不断地宣扬统一。

既然谈到雅各宾主义和行动党的问题，应该把下列情况提到首位：他们的确把自己的一个领导政党的地位，把雅各宾党人以不倦的斗争赢得来的地位，"强加到"法国资产阶级身上，把他们推上比起那些在初期比较坚决的资产阶级集团想要独立采取的立场来大为前进的立场，甚至比起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而可能采取的立场来大为前进的立场。由此也就产生了把拿破仑一世的作用往相反的方向推动的现象。

这一雅各宾主义所具有的（更早一些是克伦威尔和"圆头党员"②所具有的），从而也是整个大革命所具有的特点——显然地加速事件的发展，并且在非常强干的和坚决的集团无礼地鞭策资产阶级前进时造成不可挽回的既成事实的局面的特点，这一特点可以这样地加以概括：第三等级是所有等级中最不清一色的。这个等级里面包括有在比例上不均衡的很大的一个有智力的杰出人

① 系指葛威拉齐与公证人弗兰齐斯科·保罗·萨尔多芳坦·第·里埃拉的通信而言，发表于欧仁尼奥·第·卡尔格的《西西里历史档案》中。1929年11月24日《狮像》曾简短地加以介绍。

② 1642年英国内战时期清教徒议员之称呼，由其头发都剪短而来。——译者

物阶层和一个在经济方面最前进的但在政治上却温和的集团。事件的发展汇集成为最值得注意的过程之一。第三等级的代表在开始时只是提出那些当时实际加入这一社会集团的人物所关切的问题，提出他们的直接的团体的利益（团体的——系就传统的意义而言。直接的、利己主义的——系就狭义的而言，做为一定范畴的利益）。革命的先驱者事实上是温和派的改革家，他们叫喊得很凶，但是实际上要求得很少。渐渐地拔擢出新的杰出人物来。他们的利益不只限于"团体"性质的改革。他们倾向于把资产阶级看成是领导所有人民力量的集团，而且这种选择是两种因素促成的：旧的社会势力的反抗和干涉的威胁。旧的势力一点都不想让步，而假使它在哪方面让步的话，那么它这样做只是为了赢得时间以准备反攻。如果没有雅各宾党人的坚毅的行动，第三等级就会坠入了这些连续设下的"圈套"。雅各宾党人反对革命过程中任何中间的停顿并且不但把那不肯死亡的旧社会的分子送上断头台，而且甚至把昨天曾经是革命者而今天成了反动派的人也送上了断头台。因此雅各宾是唯一在实际上进行革命的政党，他们所代表的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直接需要和意图，而且也代表了做为统一的历史过程的整个革命运动，因为他们也代表了未来的利益，并且不只是法国资产阶级某些代表的需要，而且也是所有应该为当时存在的主要集团所同化的民族集团的需要。

应该反对那种有偏见的并且实质上是反历史的倾向而坚持下面这一点：雅各宾党人是马基亚维利类型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抽象的政治家。他们坚信"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口号的绝对正确性，而特别重要的是被雅各宾党人鼓动起来的并被吸引到斗争里面来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坚信这一口号的正确性。

雅各宾党人的语言，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的行动方法都卓越地反映了时代的主要要求，即使到了"今天"，在另外一种情况下，

并且经过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对它们的“文化上的加工”可能看上去令人觉得“抽象的”和“激烈的”。自然，它们是适应法国的文化传统而反映了这些要求的。证明这一点的是《神圣家族》中所做的对雅各宾党人语言的分析以及黑格尔的假定。黑格尔把雅各宾党人的政治-法律语言同德国古典哲学的论点看成是相似的而且彼此可以互译的概念。而今天，相反地，则承认德国古典哲学具有最大限度的具体性，并且为现代历史主义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最重要的要求是要求击溃敌人的力量，或者至少削弱敌人的力量而不让反革命有机可乘。第二个最重要的要求是扩大资产阶级本身的队伍，并使他们领导一切民族力量，对一切民族力量共有的利益和要求一视同仁，以便把这些力量发动起来，使它们加入到斗争里面来，并达到两个结果：第一，以最广大的阵线来对抗敌人的打击，也就是造成有利于革命的军事-政治的相互关系。第二，不使敌人占有任何可以征集万第军队的中立地带。如果不是雅各宾党人的土地政策，万第已经到了巴黎的大门。其实，万第的抵抗是同布列塔尼居民中间的民族问题尖锐化相联系的。布列塔尼居民对于“统一的和不可分的共和国”这一口号和军事-官僚集中政策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放弃这个口号和这项政策对雅各宾党人来说就是自杀。吉伦特党人曾试图强调联邦主义，以便摧毁雅各宾的巴黎，但是被调来巴黎的各省的队伍却转到了革命者这方面来了。除了某些民族（和语言的）的区别很大的外围地区以外，土地问题压倒了地方自治的意图：农村的法国把巴黎领导起来了，农村的法国理解到为了坚决地破坏旧的制度必须同第三等级的最前进的分子结成联盟，而不是同温和的吉伦特党人结成联盟。如果说雅各宾党人采用了“暴力”是对的话，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始终是与实际历史发展相符合也是对的了，因为他们不仅组织了资产阶级政府，也就是不仅仅使资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而且更有甚

者，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使资产阶级成为民族的领导的阶级，成为领导者，给了新的国家一种经久的稳定的基础，造成了现代的团结一致的法兰西民族。

标志着雅各宾党人做为带有过分固定的和僵化了的组织的政党之结束的各项事件和罗伯斯庇尔之死都表明雅各宾党人无论如何始终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他们不肯承认工人有组织的权利，他们继续实行了勒·沙伯利埃的禁止罢工法，结果势必又公布了工资物价限制法。这样一来，他们破坏了巴黎的城市联盟；他们的曾经聚集在公社里面的进攻力量都绝望地涣散了，因而特米多尔①胜利了。

革命是在最广泛的阶级的基础上发生的。联盟的政策和不断革命的政策归根结底导致了一些当时不能解决的新问题的提出，解放了那种只有军事独裁才能使之就范的最初形成的力量。

行动党没有任何与这种雅各宾方向相类似的东西，没有与这种勇往直前一心成为领导的党的努力相类似的东西。当然，必须考虑到其中的区别：在意大利所进行的斗争其目标是反对现存的国际制度并反对旧的条约以及反对外国——在意大利代表和维护这些制度和条约的，占领半岛的一部分而监督着半岛的一部分的奥国。在法国也有过这个问题，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有过这个问题，因为在一定时机内部斗争变成了在边界上展开的民族斗争。但这是在全部领土已被革命力量所占有而雅各宾党人已经能够利用外部威胁来在国内实行更为坚决的行动以后。雅各宾党人很清楚地理解到，为了战胜外部敌人，他们必须消灭外部敌人在国内的同盟者，因而毫不动摇地进行了九月屠杀。

在意大利这种隐蔽的和明显的联系也存于奥国与至少是一部

① 特米多尔(Thermidor)——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1793年颁布的新历法中月份的名称(热月，即7月)。雅各宾党人在该月被大资产阶级推翻。——译者

分知识分子、贵族及地主之间，但是它没有被行动党揭发出来，或者至少没有被以应有的毅力和实际上最有效的方式揭发出来。这一联系没有很为政策上的积极的政治因素。这种联系“很微妙地”流为一个爱国气节大或小的问题，随后并引起了一场令人厌烦的和毫无成果的论战，这场论战甚至继续到1898年以后①。

由于在这以前不久伦巴迪贵族对奥国所采取的立场，特别是在1853年2月米兰暴动试图以后，和总督马克西米里安执政时期所采取的立场也受到了保护，所以应该回忆一下：其历史著作向来具有倾向性，并特别反对民主派的阿列撒得洛·路齐奥，居然发展到了为奥国的忠实奴仆萨尔沃蒂的活动作辩护，——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雅各宾的精神！

阿尔弗列多·潘吉尼把一种可笑的音符加入到这个主题里面来了。这位阿尔弗列多·潘吉尼在《加富尔的生活》里对一位贵族当弗兰茨-约瑟访问米兰时期在窗外挂了张“虎皮”这个主题大演

---

① 参阅列鲁姆·斯克里普托鲁姆发表于复刊后的《社会评论》上的论文和罗姆阿尔多·邦法迪尼的《半世纪以来的爱国运动，历史短论》〔Romualdo Bonfadini, Mezzo secolo di patriottismo—Saggi storici, Milano, Treves, 1866〕一书。因此应该提一下与菲第里科·康法洛尼耶里案件的法庭审讯记录有关的问题。邦法迪尼在上述一书中的一条附注里断言他在米兰的国家档案中看到《法庭审讯记录》汇集，并指出它们共有约八十卷。其他的人则始终否认意大利有《法庭审讯记录》汇集，而这些记录之所以没有公布原因就在这里。奉命在维也纳的档案中查找有关意大利的文件的参议员萨拉特的论文中—该文发表于1925（？）年，——讲到《法庭审讯记录》已经找到，即将公布。应该提一下当时《天主教文明》曾向自由主义者挑衅，要他们公布《纪录》。它甚至肯定地说，一旦《审讯纪录》公开就会使国家的统一破裂。在康法洛尼耶里的问题中最值得注意是康法洛尼耶里与其他被奥国大赦的爱国者不同，他本来是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却不再积极地活动，在被释放以后就采取了非常克制的态度。对于康法洛尼耶里的问题应该重新批判地加以考察，应该同时研究他本人和他的战友们所采取的态度，并且深入地研究个别人物的回忆录，确定出它们写作的时间。在他所造成的论战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亚历山大·安得里安的回忆，这位法国人对康法洛尼耶里表示非常尊敬和赞美，同时却对乔卓·帕拉威奇诺的软弱大肆攻讦。

其整套的变奏曲，这套变奏曲不只是矫揉造作而已，而且虚伪狡诈令人作呕。

对于米西罗里·葛佩蒂、多尔索以及其他一些人所坚持的视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为“王国的征服”的论调，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出发而加以考察。

要是意大利没有形成雅各宾党，其原因应该在经济上去找，也就是应该在意大利资产阶级比较软弱上和1815年以后欧洲所造成的历史条件中去找。

工资物价限制法是雅各宾党人强制地解放人民群众的精力以便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这项政策的极限。在1848年，这一法令看样子已经象一个可怕的“幽灵”，并且被奥国、旧的政府，以及加富尔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更不用说教皇了。大概资产阶级再不能（不能是由于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原因）把领导权普及到广大的人民阶层了，但是相反地他们在法国却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影响农民当然始终都是可能的。

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英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是有区别的。在法国这一过程从自己的发展和在政治上很活动的和积极的分子的多少来看是很丰富的。在德国这一过程其发展的形式某些方面象意大利，而其他一些方面又象英国。1848年德国的运动由于资产阶级不够团结（雅各宾型式的口号——“不断革命”——是由民主派极右翼提出来的），以及国家革新问题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而失败了。1864，1866和1870年的几次战争以妥协的形式同时解决了民族的和阶级的问题：资产阶级在工业-经济方面取得了统治的地位，但是旧的封建阶级在国家中依然是政治方面的统治等级，并且在军队里、在行政机关里保有广泛的小团体的特权，以及广泛的土地特权。但是如果这些旧的阶级在德国保有很重要的意义，并享受着这些特权，那么他们最低限度执行着

民族的职能，变成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门阀出身和它们的传统而具有一定的特性。

在资产阶级革命比法国展开得较早的英国所发生的过程，与德国的新旧结合的过程相类似，尽管英国的“雅各宾党人”即克伦威尔的“圆头党人”尽了最大的努力。旧日的贵族依然是享有一定特权的统治等级。他们也成为英国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同时英国的贵族不是闭关自守的集团，他们经常用来自知识界和资产阶级的分子更新自己）①。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对于德国大地主和恺撒主义之不断的当政，——虽然有资本主义的强大的发展，——所做的解释模糊了正确的说明，由工业发展所产生的阶级关系，因为资产阶级领导已经达到极限和进步的阶级失掉了自己的阵地，就促使资产阶级不去同旧的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保留它的一部分门面，以便在这个门面之后隐蔽自己实在的统治。

同样一种历史发展过程在不同国家中所产生的这些不同的表现，不仅应该同欧洲各民族生活内部关系的形形色色的联合联系起来，而且也应该同各种不同的国际关系联系起来（国际关系通常在这类研究工作中具有从属性质）。雅各宾党人的精神，那种强悍的和激昂的精神当然是同法国很长时期在欧洲所实现的领导相联系的，而且除此以外也是同象巴黎这样的中心城市的存在，以及法国由于君主专制政体的活动而达到的集中化相联系的。相反地，拿破仑所掀起的几次战争，因为它们造成了最英勇的和最富有事业心的一些人的大量死亡，所以不仅削弱了法国的军事政治实力，

---

① 为此应该看一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序言中的几点意见，这些意见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和他们的社会历史作用问题时必须予以考虑。[参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英文版序言（1892年），意文版，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1947年。——意文版编者]

而且也削弱了其他国家的军事政治实力，虽然在精神方面这些战争对于革新欧洲是很有成效的。

国际关系对于确定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发展路线无疑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可是它们的这种意义却被温和派和加富尔为了达到党的目的而夸大了。因此，下面这一事实是意味深长的：在远征军从库阿尔托起航以前，和由于这次远征可能引起的国际纠纷而横渡海峡以前，害怕加里波的的创议象害怕烈火一样的加富尔后来本人在“千人团”于欧洲舆论中所引起的热情的影响下，开始把对奥国的新战争看成是完全可以在最近时期实现的战争。加富尔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为他的外交官的职业所歪曲，因而促使他能看出“过分的”困难，采取“机密的”夸大手法，从而产生了惊人的，简直是魔术师一般的机巧和奸诈。不管怎样说，加富尔做为党人其活动是极出色的；至于他的党尔后是否代表了最深刻的和最确实的民族利益，哪怕只是指最广泛地理解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基本要求的共同性而言，——这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①

在考察 1848 年以前和以后的民族运动带有其烙印的政治的和军事的领导的时候，必须预先提出一些涉及方法和术语的看法。所谓军事领导不应该仅仅理解为狭义的、技术意义上的军事领导，

---

① 顺便提一下，应该研究在1848—1849 年形成的“雅各宾主义的”口号［不断革命］的复杂的命运。这一口号被帕尔乌斯——勃朗斯坦［海尔方达——托洛茨基］集团重新以系统化了的、修改过的、理智化了的形式提出来，到了 1905 年它却成了无生气的和无效的东西，尔后又变成了一种须要拿到书房里去研究的抽象。摒弃了这种文字表现中的这一口号的那个方向［列宁的］，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去利用它，而是在事实上以符合时间和地点并完全为一定的（须要改变的）社会在所有时期显露出来的要求所决定的形式——以城市集团为领导的两个社会集团［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形式，把它运用到具体的现代的活生生的历史中去。在第一种场合中有“雅各宾主义的”气质，但没有相适应的政治内容，在第二种场合下无论气质和内容都是“雅各宾主义的”，而这种内容是与新的历史关系相符合的，而不是与文字的和理智主义的招牌相符合的。

也就是叙述皮埃蒙特军队的，或加里波的军队的，或者各地暴动(米兰"五日革命"，保卫威尼斯，保卫罗马共和国，1848年巴勒摩暴动等等)时期临时征集的各种民兵的战略和战术。相反地，应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并且与真正政治领导最密切地联系起来去理解它。从军事观点来看，最重要的问题是从半岛上赶走外国——奥国的问题。当时奥国拥有欧洲最大的军队之一。此外，它还在半岛上甚至在皮埃蒙特有自己的人数绝对不少的而且绝非软弱的拥护者。因此，军事问题归结为判明以什么样的方法把那些不仅能从半岛上驱逐奥国军队并且不许它采取反攻重返半岛的暴动的力量动员起来，因为不言而喻的是强制驱逐会使帝国内部联系受到威胁，从而使它里面的一切力量重新振作起来并把它们团结到一起以达到报复的目的。

对这个问题曾经以抽象的形式提出过几项决定，但它们都是矛盾的和没有成效的。"意大利自己能应付"这一口号，是1848年皮埃蒙特的口号，但是它表明了毁灭性的失败。皮埃蒙特右翼党派所实行的不确定的、畏缩的、模棱两可的同时也是轻率的政策，是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些党派体现出了无味的狡猾，由于他们，其他意大利国家的——那不勒斯的、罗马的军队都不顾而去，因为这些党派很快就表现出他们所努力的是皮埃蒙特的扩张，而非意大利的联合，他们不协助，反而阻碍志愿军运动，他们一般地只想使没有能够指挥这样困难的战争的皮埃蒙特的将军们成为胜利者。不实行人民的政策是个致命的问题。被奥国征集去的伦巴迪的和威尼斯的农民是扑灭维也纳的从而也是意大利革命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在农民看来，伦巴迪-威尼斯的运动，正如维也纳的运动一样，是老爷们和大学生们的事。意大利各民族党派，本应该以自己的政策造成奥地利帝国的瓦解或促成这种瓦解。但是由于它们的惰性，却使得意大利的团队成了奥地利反动派可靠的支柱之一。

在皮埃蒙特与奥国之间的斗争中，其战略目的不可能是消灭奥国军队和占领敌人领土——这样的目的将是不可能达到的和空想的。其战略目的可以是破坏奥地利帝国的内部联系并协助自由派建立巩固的政权，以便改变帝国的政治结构，把它变成联邦制的，或者至少在那里造成内部不断斗争的局面，这种斗争会给予意大利民族力量以喘息的机会，并使他们能够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集中力量。①

在战争于"意大利自己能应付"这一格言之下开始以后，在遭到使全部事业都被糟踏了的失败以后，曾经企图得到法国的支援——这正是法国反动派在奥国人又重新加强了的印象下掌握政权的时候，而这些反动派是反对建立统一而强大的意大利国家的甚至反对扩充皮埃蒙特的边界的，这正是法国甚至不肯把一位有经验的将军给皮埃蒙特，而皮埃蒙特只好向波兰人侯爵诺夫斯基求援的时候。

军事领导是比起指挥军队来和制定军队应该执行的战略计划来更为广泛的问题。此外，它还包括有为了举行暴动而对人民力量所展开的政治动员。这些人民力量会活动在敌人的后方，以此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后方勤务的活动，使敌人不能建立用以编成新的团队的辅助力量和预备队并且使正规军队也感受到自己的这种热情和精神。

在1849年以后也没有实行人民的政策。他们甚至很荒谬地企图污蔑1849年的事件，想借此恐吓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人。在第一次复兴第二个时期，"右派"的民族政策由于寻求波拿巴法国的

① 在世界大战期间，索尼诺不顾卡多那的反抗，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索尼诺不愿意哈布斯堡帝国垮台，因而拒绝采用任何民族政策。甚至在卡波列托一役意军被击溃以后，民族政策也是被迫地、马尔萨斯主义式地实行的，因此没有获得本来可以获得的最迅速的效果。

帮助而使自己缩手缩脚起来，与法国的联盟也均衡了奥国的力量。1848年"右派"的政策把全国的统一推迟了几十年。

对军事政治领导没有信心，经常摇摆于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之间，这就对皮埃蒙特军队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可以肯定说，做为被动员起来的群众的军队的绝对人数越大，或者说它的相对量(即被征集的人与全体居民的对比)越大，政治领导比之军事—技术领导的意义就越大。在1848年战役开始时，皮埃蒙特军队的战斗力是非常高的。右派以为这种战斗力是纯粹军事精神和抽象的王朝精神的表现，于是就阴谋限制人民的自由，并消灭对民主的未来的希望。军队的"士气"衰落下来了。关于诺瓦拉的"宿命性"的论战整个都与此有关。在诺瓦拉，军队不愿作战，因此它被击溃了。右派责难民主派不该把政治带到军队里面来，从而瓦解了军队——这种责难是荒谬的，要知道正好是立宪主义使军队"国有化"了，使它成了一般政治的因素，从而在军事方面加强了它。这种责难尤其令人感到荒谬的是，军队不是通过"瓦解分子"知道政治领导的改变的，而是通过许多小的改变知道的，其中每一种改变看上去可能是不大的和微不足道的，但是汇集在一起就会造成新的窒息的气氛。因此对瓦解负责的是那些改变了政治领导而没有预见到由此产生的军事后果的人，也就是以坏的政策代替了以前的政策的人，而以前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了目的。军队也是达到一定目的的"工具"，但是军队不是由自动枪组成的，而是由有思想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可以在他们的身体与机械相结合的限度内加以利用。如果可以而且甚至必须在这种场合下谈到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适合的话，那么也必须注意一个特点：这种适合应该以该工具本身的特性为条件。假使用木头钉钉子，也拿出用铁锤钉钉子所用的那股力气的话，那么钉子钉不进墙里去，反而要钉进木头里去。正确的政治领导甚至对职业的雇佣军队来说也是必需的（甚至在

雇佣军队里，除了军事-技术领导之外，也有起码的政治领导)。这种政治领导对于由新募集的兵士组成的国家军队就更必需了。在阵地战中，问题就更为复杂和困难了。阵地战要由广大群众进行，他们只凭高度的士气就要经受得起很大的神经上的、心理上的和体力上的紧张。只有能够洞察群众最深刻的愿望和感情的、非常完善的政治领导，才能防止他们的瓦解和士气衰落。

军事领导永远应该从属于政治领导，也就是战略计划必须是一般政治的军事表现。当然，会遇到这种情况，即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政治家无能为力了，可是在军队里却有领导者能把政治能力同军事能力结合到一起，其实例就是恺撒和拿破仑。但是以拿破仑为例看看：自信预计可以掌握纯粹军事性质的工具所引起的政策的改变，怎样会导致政策的完全失败。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政治和军事领导集于一身的场合下。政治因素的本质就是应该比军事因素占优势。恺撒的《战记》就是说明政治与军事艺术巧妙结合的典范，兵士们认为恺撒不仅是伟大的军事领袖，而首先是自己的政治领袖，民主派的领袖。

应该提一下，追随着克劳塞维茨的俾斯麦是赞成政治因素比军事因素占优势的思想的，可是据路易证明，威廉二世却对一家报纸很气愤，这家报纸在表达俾斯麦的这种意见时写道："这样看来，德国人很出色地几乎在所有会战中都赢得了胜利，却在战争中失败了"。

有一种要过高估价各人民阶级对第一次复兴时期的贡献的意图，同时特别夸大志愿军运动的意义。

艾托列·罗塔于1828—1929年所写的并发表于《新历史观察》上面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文是最认真的和深思熟虑的。关于应该赋予志愿军以何种意义这一问题，除了罗塔在另外一篇短论里所发表的意见以外，应该着重指出的是：从罗塔本人这些论文里

可以看得出皮埃蒙特当局当时对志愿军是不满意的，并且牵制了他们的行动——也就是可以看得出恰恰证明政治-军事领导不好的那种表现。皮埃蒙特政府可以在本国的居民中强制募集士兵。奥国也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并在自己的为数无疑是更多的居民中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过一些时候在胜利结束前对皮埃蒙特来说将永远是致命的。假使提出了“意大利自己能应付”这一原则，就必须要么立即支持同其他所有意大利国家结成联盟，要么就把领土的和政治的统一建立在深刻的人民的基础上，以便把群众吸收进来参与反对其他政府的斗争，以便他们编成志愿队而同皮埃蒙特并肩作战。

而问题恰好就在这里：皮埃蒙特右派努力不要助手而单独行动，他们认为只用皮埃蒙特正规兵力就能够战胜奥国（不理解这种自信从何而来），或者他们打算得到免费的帮助（这里同样不可理解的是，认真的政治家怎么会容许这样荒谬的主张）。在实际上，不去满足本国国民的利益就甚至不能要求他们表现出热情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等素质来，也就更不能根据一般的抽象的纲领和在盲目地信任遥远的政府的基础上来要求其他国家的公民做到这一点了。产生1848—1849年的悲剧的道理就在这里。但是，为此而鄙视意大利人民，那当然是不公正的——造成溃败的责任要么就应该由温和派来负，要么就应该由行动党来负，也就是归根结底应该归罪于各领导阶级行动的不成熟和毫无成效。对第一次复兴时期军事－政治领导的缺陷所提出的意见完全可以用十分陈腐的和令人厌烦的论证加以驳斥——“这些人不是煽动家，没有进行煽动”。另外一种很流行的陈腐的看法，专门反驳对民族运动领袖们的领导能力的否定估价，它们只是反复重弹老调，说民族运动要是能够实现，这一件事上的功绩完全属于有教养的阶级。这个功绩是什么，很难理解。有教养的阶级之功绩在于领导人民群众，并发展他们

的进步因素(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历史职能)。假使有教养的阶级没有能力完成自己这一职能,那么所应该谈的就不是功绩了,而是过错,而是这个阶级的内部不成熟性和软弱性了。也应该这样来考察煽动行为的概念和论点。假如在其最初的意义上来理解煽动行为的话,那么,很明显,这些人就不能够有效地领导人民,就不能够鼓起人民的热情并使他们情绪高涨。他们最低限度达到了他们所企求的那个目的没有?他们说过打算在意大利建立现代国家,可是却造成了一种畸形的东西。他们努力形成一个富有毅力的广泛的领导阶级——可是失败了。他们计划把人民包括到国家范围里面来——这一点也没有做到。从1870年到1900年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狭隘性;广泛流行的各人民阶级的自发的骚动;懒惰的和抱有怀疑情绪的领导阶层的缩手缩脚和畏首畏尾——都是这种缺陷所造成的后果。新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是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因为这种地位没有实际的独立性,原因是它在内部受到教廷和广大群众恶意的消极态度的威胁。以后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右派果然成了很大的煽动家:他们把人民-民族当成了工具,当成了他们侮辱的对象,正好在这里表现出最厉害的和最可鄙的煽动行为,而且恰好在这一术语于右翼党派同左翼党派论战时从右翼党派口中所取得的那种意义上,虽然前者经常利用最坏的煽动行为并且往往诉诸流氓(象拿破仑第三在法国那样)。

第一次复兴时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在国家结构中的地位

在意大利不存在统一的公式化形式的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之间的关系。特别因此,必须明确在现代文明中“城市的”概念和“乡村的”概念表明什么,而且由于以多少集中的观点来研究的居民的

一般结构中保存了陈旧的和落后的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结合。有时候那种看上去是奇谈怪论的现象却是对的，即乡村类型比起所谓城市类型来更进步。

"工业的"城市向来是比乡村更为进步，因为后者有机地依赖着前者。但是在意大利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是"工业的"，而且标准的工业城市更少。"一百座"意大利工业城市和集中在非乡村中心的几乎超过法国城市居民两倍的居民，能够证明意大利工业化水平比法国高一倍吗？意大利城市集中发展化并不是仅仅由于资本主义和大工业发展而产生的特有现象。长时期以来一直是意大利最大城市的并且依然是最大城市之一的那不勒斯，并不是什么工业中心。甚至现代意大利最大的城市罗马也不是工业中心。虽然如此，甚至在这些中世纪类型的城市里还有现代城市类型的居民的广大集团—可是他们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被另外一部分占据大多数的并且不是现代类型的居民所压倒，受到这另外一部分居民的压迫和欺凌。这就是"沉默的都市"的奇谈怪论。

在这种类型的城市中，在所有社会集团之间存在有一种以反对乡村为目标的城市的思想体系的一致。甚至存在于城市里的集团中的那些执行最现代的公民职能的集团也不能置身于这种一致之外。这就是憎恨和蔑视"乡下佬"，这就是反对乡村所要求的隐蔽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些要求一朝实现，那么这种类型的城市就不能存在了。同时也存在着"一般的"，但在顽强上和热烈上程度绝不少减的乡村对城市的敌视—对整个城市，对城市居民的所有集团的敌视。这种在实际上是很复杂的而且它的表现形式从外表上来看是很矛盾的一般的关系，对于在第一次复兴时期展开斗争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因为当时它还具有今天已经没有了的更为绝对的和实际的性质。

这种毫无疑义的矛盾的最初的轰动一时的表现，应该以1799年的帕尔丹诺共和国为例来加以研究。当时城市被组成红衣主教鲁佛集团的乡村所击毁，因为这个共和国一方面无论在最初的贵族阶段，或在次一阶段，即资产阶级阶段都是完全看不起乡村的，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个可能的雅各宾变革的前途—结果在那不勒斯花用地租收入的土地所有者可能失掉自己的所有地，这样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失掉收入和生活费的来源—从而使那不勒斯平民不仅产生漠不关心的情绪，甚至敌对的情绪。不仅如此，在第一次复兴时期已经以萌芽的形式表现出象大城市与大乡村之间的关系一样的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历史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已经不是省与工业首都之间的正常的有机的关系，而表现为两个文明和文化传统极不相同的广阔的领域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民族冲突的各个不同方面和各个不同因素尖锐化了。对于第一次复兴时期来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一事实，即在政治危机时期，行动的主动权总是操之于南方：1799年——那不勒斯，1820—1821年——巴勒摩，1847年——墨西拿和西西里，1847—1848年——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另外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中部意大利这个北方与南方之间的中间阶段的任何运动所固有的那些特点。人民发动（相对地人民的）的时期由1815年延续到1849年，并在托斯坎纳和教皇领地（罗曼尼亚和路尼吉安永远应该属于中部）达到了顶点。这些特点也表现在尔后的时期中：1914年6月事件在中部某些地区（罗曼尼亚和马尔卡）达到了顶点。1893年开始于西西里并波及南方和路尼吉安的危机于1898年在米兰达到了最高点。1919年在南方和西西里发生过夺取土地的事件，1920年在北方发生过占领工厂的事件。这种相对的并发性和同时性一方面证明在1815年以后已经出现了相对一样的政治-经济结构，另一方面表明在危机时期甚至国内最软弱的和辽远的部分也能首先行动。

具有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之性质的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关系，可以根据各种不同的文化观和思想立场加以研究。前面已经提到过，在本世纪之初站在文化运动前列的是贝·柯罗齐和朱·佛尔吐那托。这种文化运动用某种方法同北方文化运动相对立（唯心主义对实证论，古典主义或古典派对未来派）。应该着重指出一个事实，即西西里在文化方面也有别于南方：如果说克里斯比是北方工业界人物的话，那么皮兰德罗大体上很接近未来派，秦梯尔和"现实主义"哲学也很接近未来派运动（广义地理解为传统古典主义的对立面，为现代浪漫主义的形式）。知识分子阶层的构成和出身也各不相同：在南方主要的还是"草帽"[1]那种人，他们把农民群众同地主以及国家机关联系起来。在北方占优势的是工厂"技师"那种人，他们是工人群众同企业主之间的连接的环节。工会组织和由完全新的知识分子阶层所领导的政党，起着工人群众同国家之间的连接的环节的作用（现代的国家的工会——能很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有系统地推广这一类型的社会关系，以前的工会是不能这样做的——在一定意义上和一定时间内是道德和政治划一的工具）。

这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根据曾经在法西斯取得政权以前力图确立的基本政治纲领加以研究。乔里蒂的和民主自由派的纲领抱有在北方建立"城市"联盟（工业家和工人）的目的，以便使它成为保护关系制度的基础，从而加强北方的经济和领导权。南方被推上半殖民地销售市场的地位，它成了积累和税收的来源，这里的纪律用两种方法来维持：对任何群众运动实行警察的残酷的镇压的方法，有时屠杀农民。[2]再就是警察-政治相结合的方法：对"知识分子"（"草帽"）等级中的个人施以小恩小惠，以准许

[1] "草帽"（那不勒斯方言）是南方对受理零星案件的律师所给予的轻视的绰号。——译者

随意抢劫地方机关的形式，并以在运用上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宽大的教会立法的形式在行政机关中给他们职位，使得僧侣阶级有可能拥有大量的财产等方法，也就是把南方最活动的分子"以个人方式"囊括到国家领导人员里面去，赋予他们以"法庭的"，"官僚主义的"和其他的特权。

这样一来，本来能够把南方人民在当地的不满的表现组织起来的社会阶层，相反地，变成了北方政策的工具，成为秘密警察的附属品。由于没有领导，这种不满没有采取正常的政治形式，因而它的混乱的、漫无秩序的表现被看成是"法警行动范围"以内的事了。

在实际上象柯罗齐和佛尔吐那托这样的人物由于对统一持拜物主义的论点，都参与了这种形式的贪赃枉法的行为，哪怕是消极地和间接地参加的。

不应该忘记政治一道德因素，恐吓运动就是这样的因素。这个运动是反对对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对立原因的任何的、甚至是最客观的说明的。应该提一下根据 1890—1900 年商业危机以后佩塞尔在撒丁的质问所得出的结论和前面已经讲过的克里斯比对西西里"法西斯"提出的认为他们不该出卖给英国人的责难。特别在西西里知识分子中间有过这种对统一极端不满的形式（农民严重压制地主土地和克里斯比在这地区很受欢迎的结果）。甚至在最近这种不满还表现在那托里由于柯罗齐毫无恶意地暗示西西里努力脱离那不勒斯王国而对柯罗齐进行的攻讦中（参阅柯罗齐在《批评》杂志上的答复）。

---

② 在"旁观者"(Spectator'a)（米西罗里）纪念乔里蒂的悼文中（1928 年 8 月 1 日发表于《新文选》），对于乔里蒂一向坚决反对在南方传布社会主义和开展工会感到惊讶，可是这是十分自然和可以理解的，因为工人的保护政策（改良主义，合作社，社会工作）只有在它具有局部的性质时才属可能，也就是任何特权是以牺牲者和被抢掠者的存在为前提的。

乔里蒂的纲领被两个因素“破坏了”：(1)社会党里的不可调和的分子转移到墨索里尼的领导之下，并开始向南方人献殷勤(自由贸易，摩尔菲特选举等等)，这样就造成了北方城市联盟的破坏；(2)实施普遍选举法，它空前地扩大了南方的议会基础，并使个人难于受贿(过多的人为所欲为地受贿，结果就出现了马齐耶里)①。

乔里蒂更换了同伴；城市联盟被“简蒂洛尼”协定②所代替(或者讲得更合适一些，把后者同城市联盟对立起来，以防止完全失败)，也就是被北方的工业与“有机的和正常的”乡村的居民的联盟所代替(天主教徒的选举力量也在社会党选举力量所在的那些区域——他们都集中在北方和中部)。这个协定的效力也普及到南方，至少是在“纠正”选民人数增加所引起的后果所必需的那种程度上。

另外一个纲领或者一般的政治方向可以称为《晚邮报》纲领或者路易吉·阿尔别尔蒂尼纲领，并且可以把它同北方的部分工业家(以纺织业主、棉织业主、丝织业主、出口商以及自由贸易拥护者为首)与南方的农村集团之间的联盟等同起来：《晚邮报》于1913年摩尔菲特选举中支持萨尔威米尼反对乔里蒂(乌戈·奥耶蒂所进行的运动)。它开始支持萨兰德拉内阁，而随后又支持尼蒂内阁——这是两届最初由南方国务人员组成的政府。③

---

① 马齐耶里(Mazzieri)——在竞选期间用以威胁政府党派的反对者(往往用暴力)而武装雇佣兵。——俄文版编者

② 简蒂洛尼协定是代表天主教会的简蒂洛尼伯爵与首相乔里蒂商谈缔结的协定(1913年)，是意大利国家与天主教会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乔里蒂为了酬答天主教议员的支持，同意不提教会与学校分离，尊重教会。——译者

③ 对于西西里人必须特别加以考察，从60年代起到以后的时期，他们向来在内阁中占很大一部分位置；他们不同于南方的是有几次担任内阁首揆，而第一位领袖就是萨兰德拉。这种“西西里横霸势力”应该用这个岛的政党所实行的讹诈政策来说明。它们向来秘密支持有利于英国的“分离主义”精神。克里斯比的责难是那种担心的轻率的表现形式，而国家领导人中最负责的和最敏感的集团也确实都是这样担心的。

1913年选举权的扩大已经产生了那种在1919—1921年有了最高限度发展的现象的最初征候，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在1919—1921年有了最高限度发展是由于农民群众在战争期间取得了政治－组织经验，由于南方农民集团部分分裂，由于部分知识分子（战争期间的军官）所领导的农民同大地主的分裂。这样就产生了撒丁派，西西里的改良党（所谓保诺米议会集团是由保诺米本人和另外二十二个西西里代表组成的），和由《新西西里》所代表的极端分离主义的一翼。在南方产生了"更新"集团，它由前线归来的将士组成，他们力图按照撒丁党型式组成地方的行动党。[①] 在这次运动中，农民群众的独立意义根据大地主的组织力量、威望和思想影响而由撒丁向南方，向西西里转移，这些大地主在西西里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和团结起来了，反之，在撒丁所具有的意义就比较小。知识分子相应的阶层的相对独立性也同样改变了——自然同地主相比是正相反。[②]

为了很好地分析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作用，必须记起和考察他们对那些他们在各方面接触的主要阶级的心理关系。他们对于生产阶级是否采取"父亲般的"地位？或者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有机地表现这些阶级的利益？他们对于领导阶级是否采取"辅助"态度或者他们认为自己就是领导者，是领导阶级的组成部分？在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发展进程中，所谓行动党采取了"父亲般的"态度，因为它只在不大的程度上达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同国家的接触。所谓"变形"不是别的，而是下面这一事实在议会中的表现：温和派完

---

① 参阅由《罗马人民》组成的托拉克的杂志《意志》。

② 所谓"知识分子"不应该只理解为通常适用这一名称的那些阶层，而应该理解为一般地整个那个执行广义的组织职能——在生产方面，或在文化方面，或在政治－行政方面——的社会阶层。他们符合于军队中的上官和下级军官部分地，甚至出身于下级军官的高级军官。

全吞没了行动党，人民群众失掉首领，而且也没有被吸收到新的国家范围里面来。

在研究意大利历史基本动力和纲领条款时（必须根据它们来研究和估价第一次复兴时期的行动党的方向），应该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做为出发点。可以大概地勾画出这样一种图画：(1)意大利北方城市力量，(2)南方农村力量，(3)北部中部地区农村力量，(4)西西里农村力量，(5)撒丁农村力量。

除了把“火车头”的作用做为第一种力量，应该再进一步考察一下组成一列在历史中运转最快的列车所必需的各种“最有用处的”组合。同时第一种力量的活动是从它本身内部问题、组织问题，为了团结一致所必需的关节问题，军事政治领导问题（皮埃蒙特的领导权，米兰与都灵之间的关系等等）的解决开始的。已经确定的是，如果这种力量达到一定程度的统一和战斗能力，那么它就已经对其他力量“机械地”实现了“间接的”领导。在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各种不同时期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下列这种情况：当这种力量走上不可调和的立场，走上反抗外国统治的立场的时候，它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引起南方进步力量猛烈的高涨——由此也就产生了1820—1821年，1831年，1848年各次运动的相对的并发性，但不是完全的同时性。在1859—1860年，这个历史-政治的“机构”以最高的效率发生作用，因为北方开始斗争，中部安详地或几乎安详地加入到它一起来，而在南方波旁国家由于加里波的分子的比较衰弱的推动而垮了台。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在温和派（加富尔）把北方和中部组织起来以后，行动党（加里波的）猛加干涉的结果。这并不是能产生相对同时性的军事-政治领导（温和派或行动党），而是很幸运地结合起来的两个派别的合作（机械的）。

因此第一种力量本应该提出一个把本国其他地区的，特别是南方的城市力量组织到自己周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

而且由于那些产生暴风骤雨般热情的矛盾和因素而复杂化了（这些矛盾之可笑的解决方式是所谓1876年议会革命①）。可是正因为这样，它的解决才成为民族发展中痛苦的时机之一。城市力量在社会关系上是清一色的，因此他们应该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历史上这问题则是另一种提法：北方的城市力量无疑地居于自己的民族地区的首位，而南方的城市力量——至少在同等程度上——则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北方的城市力量应该力求南方城市力量做到使它们的领导作用归结为保证北方在城市与乡村一般关系的范围内对南方的领导，因为南方城市力量的领导作用不是别的，而是从属于北方更广泛的领导作用的因素。最剧烈的矛盾产生于下列的情况：不能把南方的城市力量看成是一种独立的、不依赖于北方城市力量的东西。这样提问题——会意味着预先承认不可挽救的“民族的”分歧的存在，这种分歧十分严重，甚至联邦制度也解决不了它。这就等于肯定存在着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仅仅可能实现军事－外交同盟以反对共同敌人——奥国（一句话，团结一致的唯一因素只能是两个民族有了“共同的”敌人）。

但是在实际上仅仅存在有民族问题的几个“方面”，而不是“所有的”方面，更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很严重的一方面是南方城市力量在与乡村力量的相互关系中的软弱的立场。这种不利的相互关系有时表现在城市真正从属乡村之中。北方与南方城市力量之间的密切联系赋与了后者以代表前者的威望的力量，也就应该帮助后者成为独立的力量，并且不仅是在理论上和抽象地，而且“具体地”认识它们的领导作用，协助它们找到解决南方的广泛问题的方

① 1876年议会革命——在1876年，于议会投票以后，意大利政权从代表大资产阶级集团的主要是地主贵族和自由派贵族的“右派”资产阶级政治集团转到“左派”集团——转到自由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手里。——俄文版编者

法。很自然的是在南方出现了反对统一的强有力的集团；无论如何，北方城市力量该当执行最艰巨的任务，因为他们不仅必须说服南方自己的"弟兄"，而且首先必须使自己相信这种政治体系的复杂性。因此，在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中心，而南方和各岛上的意志坚决的和受人爱戴的人物必须同这个中心合作。在北方与南方之间建立统一的问题是同在全国所有城市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团结和一致的问题密切联系着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这个问题的组成部分。①

北中部地区的乡村力量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本是北部城市力量所应该提出来以取消干涉和外力影响新国家发展的可能性而达成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正常关系的。在这些乡村力量之中应该区别两种派别——世俗派和教权主义亲奥派。教权派的势力除了托斯坎纳和教皇国家的一部分以外，在伦巴迪-威尼斯有最大的影响。世俗派的势力在皮埃蒙特有最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折光的形式中也或多或少地普及到意大利其余地区）。它的影响曾经普及到教皇使节区，特别是罗曼尼亚以及其他地区，直到南方和各岛。北方城市力量只要正确地解决这些直接的关系，也就能够推动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一切相类似的问题。

在整个这一套复杂的问题上，行动党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实际上行动党只限于把那种简单是政治基础的问题作为根本原则的纲领性问题，这些问题根据政治基础在合法的范围内可以集中并解决，——就是立法会议的问题。

不能说温和派遭到失败，因为他们致力于有机的扩张皮埃蒙特，并且他们需要的是皮埃蒙特军队的兵士，而不是暴动的兵士或者过分庞大的加里波的的队伍。

---

① 以上所引的论断属于所有三个南方地区——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

为什么行动党没有全面地提出土地问题呢？温和派没有提出它来，本是自然的事，他们提出民族问题，要求在做为国家和做为军队的皮埃蒙特周围建立所有右派势力（包括大地主阶级）的集团。

奥国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威胁——这一威胁在加里西亚违反波兰贵族的意志而为了乌克兰农民实现了——不仅在意大利的有关人物中间引起了一场慌乱，确定了贵族的一切动摇的行径（1853年2月米兰事件和米兰名门大族正好在贝尔非奥列①绞杀爱国者的前夕向弗兰茨-约瑟致敬）而且也麻痹了行动党本身，因为行动党在这个问题上也抱着与温和派同样的观点，认为贵族和地主是"民族的"，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则不是"民族的"。

只有到了1853年2月以后，玛志尼才做了一些在实质上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指示（参阅这一时期的《通信》），但是他没有能力坚决地、激进地修改自己的抽象的纲领。应该研究1860年加里波的分子在西西里实行的克里斯比所口授的政治路线：农民反对地主贵族的暴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并建成了反农民的国民近卫军。其中典型的是尼诺·比克西奥在喀塔尼亚地区的讨伐队，因为这里的暴动声势浩大。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甚至在朱塞佩·柴撒列·阿巴②的《杂记》里也包含着一些因素，可以说明土地问题是一个能够发动广大群众的动力。只要回忆一下阿巴同那个在加里波的分子在马萨拉登陆后很快就来欢迎他们的修道士的一段谈话

---

① 1853年2月米兰事件——指玛志尼分子企图把意大利北部人民群众鼓动起来的事件，这一企图进行得无比英勇，但未能成功。贝尔菲奥列绞杀案——1853年3月在贝尔非奥列（曼都亚附近）小镇绞杀了一批意大利爱国者，他们参加了反对奥国占领军的暴动的准备工作。——俄文版编者

② 阿巴，朱塞佩·柴撒列（1830—1910）——作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活动家，曾参加加里波的率领的远征西西里的"千人团"义勇军（1860年）。其后二十年阿巴发表了《远征参加者的杂记》。——俄文版编者

就够了。在乔万尼·威尔加① 的一些小说里包含着对这些农民暴动的艺术描写，这些暴动都被国民近卫军以恐怖手段和大批枪杀的方法镇压下去。"千人团"远征队的这一面向来也没有人来研究过和分析过。

由于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因而教权主义问题和教皇对统一的仇视态度问题也就成为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了。从这一观点出发，温和派显得比行动党更为坚决。固然他们没有把教会的财产分散给农民，可是他们却利用它建成了具有新的政治地位的大中地主的新的等级，而且毫不动摇地采取了让渡土地所有权的办法，尽管只限于主教会的地产。此外，行动党对农民所采取的政策，由于玛志尼派意图实行宗教改革而失掉了作用，因为广大农民群众不仅对这种改革不感兴趣，而且相反，他们对于反对新异端者的煽动变得敏感了。在行动党面前是法国革命的实例，而法国革命表明雅各宾党人——他们根据土地问题得以摧毁了一切右派政党，直到吉伦特党人，而且不仅预先阻止了反对巴黎的农村联合，而且增加了自己在各省的拥护者的人数——由于罗伯斯庇尔企图实行宗教改革而受到了损失，但是这种宗教改革在实在的历史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和直接的具体性。②

① 乔万尼·威尔加(1840—1922)—意大利作家，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最大代表。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呈现出西西里农民破产以及被资本主义国家统治势力奴役的鲜明的图画。——俄文版编者

② 应该仔细地研究罗马共和国的实际的土地政策和玛志尼交给菲里齐·奥尔西尼在罗曼尼亚和马尔卡进行的讨伐任务的真正性质。在这个时期之内，直到1870年(甚至更晚一些)几乎向来都把农民为了夺取土地掀起的热火朝天而极其残酷的自发运动视为匪徒强掠行为。

温和派和知识分子

问题是为什么温和派应该在知识分子中间具有优越性。乔别蒂和玛志尼。乔别蒂向知识分子提出一种哲学，看上去是独创的同时也是民族的，它所追求的目的是把意大利至少提高到最先进国家的水平，并赋予意大利思想界以一种新的价值。而玛志尼则相反地常常仅仅提出了一些模糊的原理和一些哲学的梗概，这些东西在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不勒斯的知识分子看来，一定认为是废话（修道院院长加里安尼曾教导追求这种思维和议论的方法）。

关于学校问题：温和派活动的目的是实行互教的教育原则（康法罗尼耶里，卡朋尼等人）。费兰特·阿波尔蒂运动和与赤贫问题有关的争取组织收容所的运动。在温和派中间仅仅确立了与"耶稣会"学校相对立的具体的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既不能不在世俗人士中间获得成效，因为这个运动在世俗人士这里通过学校就形成了自己的个性，而且也不能不在具有自由主义情绪的反对耶苏会的僧侣中间获得成效（极端仇视费兰特·阿波尔蒂等等；扶养和教育弃婴是僧侣的独有权利，而这些创议就把这种独有权利破坏了）。在教育方面所进行的具有自由主义性质或具有自由主义特点的活动，对于确立温和派在知识分子中间的领导机构具有重大意义。教育方面的活动在其所有阶段上对于各类知识分子都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甚至经济方面的重要性。甚至在那个时期比起现在来其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当时社会干部的人数极少，而且为小资产阶级的创议所开辟的道路也有限（在我们今天杂志事业、党的运动、工业、异常扩大了的国家机关等等都空前地扩大了利用他们的机会）。

知识分子中间的领导中心其领导权是沿着两条主要路线确立的：（1）通过存在的总的观念，通过能赋予自己信徒以智力的“品德”的哲学（乔别蒂）。这种品德会给他们提供基本的不同于一般的原则，以及反对由于强制而占统治地位的旧的意识形态的基础；（2）通过学校的课程大纲，通过独创的教育和教养原则。这种原则会使那部分最清一色的和人数最多的知识分子——教师（教师——从普通的教员到大学教授）感到兴趣并且能够据以进行积极活动（根据他们的职业）。

在第一次复兴时期初期不止一次召集过的学者代表大会具有双重意义：（1）它们把高级知识分子联合在一起，团结他们并扩大他们的影响；（2）在最短的时期内把低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并且使他们最坚决地确定了立场，这些知识分子由于具有行业关系的精神，所以通常都倾向于追随大学代表人物和大的学者。

研究内容广泛的评论和专门的评论可以了解温和派领导权的另一面。象温和派这种政党满足了知识分子的一切基本要求，而这些要求是政府（执政党）能够以提供国家职位的方法来满足的。在1848—1849年以后，皮埃蒙特王国很出色地完成了意大利执政党的这项职能，因为皮埃蒙特王国收容了被驱逐的知识分子，并且提供了未来统一国家的范例。

皮埃蒙特的角色

皮埃蒙特在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扮演了“领导阶级”的角色。的确，不能断言在半岛的整个领域中存在过清一色的领导阶级的原始集团，这些集团对完全统一的不可遏止的努力会确定新的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些原始集团毫无疑义是存在过，但是他们对统一的努力是很有问题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每一个

在自己的范围内都不是"领导者"。领导者以"被领导者"为前提，而这些集团所领导的是谁呢？这些原始集团不想"领导"任何人，也就是不想把自己的利益和意图同其他集团的利益和意图协调起来。他们所想的不是"领导"而是"统治"；他们还想使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使他们的人占统治地位。他们所致力的是要使一种不受任何和解和任何条件束缚的新的力量成为国家的仲裁者：这种新的力量就是皮埃蒙特，从此也就产生了君主专制政府的作用。因此皮埃蒙特也就起到了在许多方面可以同党的作用相比的作用——社会集团领导人物的作用（而且的确人们也向来谈到"皮埃蒙特党"）。当然，这个定义必须理解为在谈一个具有军队、外交等等的国家。

这一事实对"消极的"革命理论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表明某一个社会集团不是其他集团的领导者，而国家，哪怕是力量有限的国家，却以那个本身就应该成为领导者的集团的"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并且能够把军队和政治-外交力量交给后者支配。

可以引证一点的是开始用国际政治-历史的语言称谓"皮埃蒙特的作用"。在战争以前，塞尔维亚尽力装出巴尔干的"皮埃蒙特"的姿态（而且法国在1789年以后以及尔后许多年来，直到路易·拿破仑政变，就这一点而言是欧洲的皮埃蒙特）。如果塞尔维亚没有能够达到象皮埃蒙特所能达到的成就的话，那么这是由于在战后年代农民有了政治觉醒，而这在1848年以后是没有过的。假使把发生在南斯拉夫王国的事件仔细地加以研究的话，那么就会看清楚，"亲塞尔维亚的"力量或者对塞尔维亚领导抱好感的力量是仇视土地改革的。我们无论在克罗地亚，或是在其他非塞尔维亚地区都可以找到反塞尔维亚的农村知识分子集团和对塞尔维亚表示友好的保守力量。在这种场合下，同样不存在地方的"领导"集团，而只有由塞尔维亚力量领导的集团，可是做为破坏力量的社会作

用，却没有重大意义。应该向那表面上观察了塞尔维亚事件的人问一下：如果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发生于那不勒斯省和西西里的所谓强盗抢掠行为出现于1919年以后，那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毫无疑义，这是同样一种现象，但是1919年以后农民群众的社会意义和政治经验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1848年以后他们的社会意义和政治经验。

深入地研究“皮埃蒙特”类型的职能在消极的革命中所具有的那种意义，也就是国家在领导争取复兴的斗争中代替个别地区的社会集团的那一事实是很重要的。这就是那些场合之一，在这些场合下这些集团实现着“统治”的而非“领导”的职能——没有领导权的专政。在这种场合下，发生社会集团的一部分领导整个这个集团，而不是这个集团本身对于用来照“雅各宾”的方式加强和加深运动等等的其他力量的领导。

应该进行研究，以便寻求拿破仑失败以后那个时期与1914—1918年战争以后那个时期之间的类似处。只是从两个观点来看，相似处是可能的：瓜分领土和可以明显看到的以及比较表面的类似处——企图在国际关系中建立永久性法律组织（神圣同盟和国际联盟）。

但是，看上去似乎须要研究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那个称为“消极革命”的问题，那个不能立刻注目的问题，因为没有同1789—1815年法国的外表的类似性。可是即使如此，大家都明白，1914—1918年战争是历史的转折，这是指在1914年以前逐渐积累起来的整个一系列的问题形成了真正的“一堆”而言，而这就引起了以前这一时期中的过程的一般结构的改变；回忆一下工会运动所取得的那种重大的意义就够了；在这一重要的现象中概括了各种不同的问题和具有各种不同意义的各式各样的发展过程（议会制度、工业组织、民主政治、自由主义等等），但是在客观上这种现象反映了一个

事实，即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它的意义已经不能忽视了。

做为主要历史阶段的1848—1849年事件

我以为1848—1849年事件由于它们的“自发性”，在研究意大利民族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时，可以看做是典型的事件。在这些年代里，我们看到几个主要的联合：反动派——温和派，地方自治主义者；新教皇派（天主教民主派）；行动党—左派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派。这三种力量彼此进行斗争，而且所有这三种力量都在两年之内相继遭到失败。随着失败之后，在每一个集团内部划分界限过程和分裂过程之后，力量向右进展了。

新教皇派遭到最惨重的失败，他们不再做为天主教民主派而存在，并且在改组以后以城市和乡村资产阶级的社会分子身份出现，同反动派一起组成新的自由-保守右派的力量。可以把新教皇派同“人民党”相比拟，这是建立天主教民主派的新的企图；后者也以同样的原因遭到了失败。行动党的失败也正好与1919—1920年“破坏运动”的失败相似。

应该把皮埃蒙特从新制度开始起到孟加里耶里宣言止，从索拉罗·第拉·马尔加里塔起到马西莫·达捷里奥止的政府的更迭次序和政党配合（立宪派和专制派）顺序加以回忆并进行仔细的研究。应该研究乔别蒂和拉塔齐的作用和他们影响那个从专制政体以来就从未改变的或几乎没有改变的国家机器的效果。应该确定所谓加富尔——拉塔齐婚姻的意义①。这是不是民主政治瓦解的

---

① 加富尔——拉塔齐婚姻——是在1852年达成的自由温和派首领加富尔与皮埃蒙特议会中资产阶级“左派中心”首领乌尔班诺·拉塔齐之间的一个共同行动的协定。这个协定保证了加富尔内阁在议会中的多数，使他能实行一些自由主义的改革。——俄文版编者

第一步呢？而且在这时期以前可不可以称拉塔齐为民主自由派？

菲拉里—卡塔涅奥的联邦制度是一个政治历史纲领，它反映了存在于皮埃蒙特与伦巴迪之间的矛盾。伦巴迪不愿意把它作为省归并到皮埃蒙特去，因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它比皮埃蒙特为发达。在"五日革命"时期，它以自己的人力和财力完成了自己的民主革命。可能它比皮埃蒙特更富有意大利气味，这是指它代表意大利比皮埃蒙特更好而言。如果卡塔涅奥力图把联邦制度说成是全部意大利历史所根本固有的东西，那么这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的因素，其目的是加强现实的政治纲领。为什么要非难联邦制度，说他拖延了统一运动和民族运动了呢？也必须坚持一个方法论上的标准，就是：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历史是一回事，而爱国力量，尤其是为了统一的国家而出场的这些爱国力量的一部分人的圣者传记则是另一回事。

第一次复兴时期是一个复杂的和矛盾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整个说来是由它的一切相对立的因素，由它的主要活动力量的和它的反对者的积极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构成的；它是这一斗争所造成的那些相互改变的结果，而其中也包括了那种消极的和隐蔽的力量（广大农村群众就是这种力量），更不用说国际关系所起的那种重要作用了。

关税联盟的思想是柴撒列·巴尔保提出来的，并且于1847年11月3日在都灵由皮埃蒙特、托斯坎纳和教皇国家的代表组成。随着这一联盟的成立应该成立政治同盟，可是后来被巴尔保本人推翻了，因而关税联盟本身也流产了。意大利的小国都关心成立政治联盟。皮埃蒙特的反动派（其中有巴尔保）认为皮埃蒙特的领土扩张已经得到保证，因而不愿树立可以阻止它实现这种扩张的约束，从而使皮埃蒙特受到损失（巴尔保在《意大利的希望》〔Cesare Balbo, Speranze d'Italia〕里断言成立同盟是不可能的，因为意大

利的一部分处于外国人(!?)之手)，就拒绝了成立同盟，声明在战争前或战争后(!?)再订立同盟。在1848年前半年里同盟被拒绝了。

乔别蒂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甚至在战争期间订立的政治同盟和关税同盟也是实现"意大利自己能应付"这一口号的必要前提。这种对于同盟的不正确的政策以及其他有关志愿军和立宪会议的同样不正确的指示，表明1848年运动是由于在尔后时期中成了温和派的右派的低劣的狡诈的阴谋而遭到了失败。他们对于民族运动既不能提出政治的，也不能提出军事的方向。

1849年2月希尔维奥·斯帕温特在皮萨访问了马西莫·达捷里奥。他在1856年流放中所写的一篇政治性论文里回忆到同后者的谈话，他说："皮埃蒙特王国一位最知名的人士前一个月曾对我说过：我们不能获胜，但是我们将重新作战。我们的失败将是那个今天把我们重新推进战争的党派的失败，而在失败与内战之间我们选择前者。失败使我们得到内部和平，使皮埃蒙特得到自由和独立，而这是内战所不能给我们的。这位明智的(!)人的预见实现了。诺瓦拉战役对独立事业来说是失败了，可是对皮埃蒙特的自由来说是胜利了。并且据我看，查理-阿尔贝特牺牲了自己的王冠与其说是为了独立，勿宁说是为了自由"①。于此产生一个问题，是不是"预见"的确实现了，还是这次失败是马西莫·达捷里奥这样的"智者"所准备的。

在那篇于1934年5月14日发表于《晚邮报》上面的论文里(《菲里普·卡朗蒂所致的美国的敬意》)，安东尼奥·蒙蒂从卡朗蒂的《回忆录》(它们没有印行，保存于米兰的第一次复兴时期博物

① 参阅希尔维奥·斯帕温特，《1848年到1861年》——贝·柯罗齐所发表的信札、札记、文件(Silvio Spaventa, Dal 1848 al 1861, lettere, scritti, documenti, publicati da B. Croce, 2ª ed., Laterza, p. 58, nota)。

馆中）里引证了下面两段故事：卡朗蒂于1848年在科莫战胜奥军以后，成立了一队志愿兵，并来到了都灵，以便领取武器。巴尔保大臣给了他一个蒙蒂称之为“令人吃惊的”下列的答复：“现在武装起来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强大的正规军队将战胜敌人。莫非你想要利用武器使科莫的居民与米兰人之间的不和重新爆发起来，以损害意大利事业的胜利结局么？”（回忆一下在1848年战争不久以前皮埃蒙特曾放弃一部分武器，以便把它们运到瑞士送给来自Sonderbund'a［宗得崩德①］的举行暴动的反动的天主教徒，也不是没有益处的）。

关于“准备”在诺瓦拉失败一节，卡朗蒂这样说，正当在科莫加紧准备武装斗争，并正在组织志愿军的时候，却接到了侯脅诺夫斯基将军（蒙蒂写成查尔诺夫斯基将军）在诺瓦拉战役之后签订了停战协定的消息。卡朗蒂见到了将军，这位将军对他说："Nous avons conclu un armistice honorable. —Comment, honorable?—Oui, très honorable, avec un armée, gui ne se bat pas"②。这段谈话也被加希里埃尔·卡莫齐证实了。

但是重要的不是波兰将军的话，他不过是暴风雨所掀起的一根小草，重要的是那个宁要失败而不肯要全意大利暴动的皮埃蒙特政府所赋予军事政策的方向。

第一次复兴时期和东方问题

在一系列的评论里（有倾向性地赞扬温和派）对第一次复兴时

---

① 宗得崩德(Sonderbund)是1845年瑞士七个天主教邦结成的反动联盟。——译者

② “我们签订了光荣的停战协定。——怎样是光荣的？——是的，很光荣，因为有未曾作过战的军队”(法文)。——译者

期的文字著作赋予特殊的意义；在这些文字著作里把东方问题看成意大利的问题之一；在这些文献里拟制出一些推使奥国向东发展以及它的巴尔干化的计划，以便补偿它为了意大利民族复兴事业而和平地让出来的伦巴迪-威尼斯等等。

据我看，这些计划不足证明象一般所断言的所谓具有很大政治能力；也许它们勿宁应该被解释为他们在民族事业的困难面前表现出来的政治消极和畏缩无能，用计划来掩饰的畏缩无能。并且它们越是庞大，就越是抽象，越是模糊，因为这些计划的实现并不决定于意大利的力量。事实上，奥国的"巴尔干化"将意味着要在欧洲造成一种政治-外交的局势（孕育着战争的），由于这种局势，奥国势必只有"巴尔干化"；而这也意味着必须在欧洲掌握政治的和外交的领导权，这是十足的废话！

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奥国保持着伦巴迪-威尼斯，也就是保持在意大利的领导作用和地中海中部的统治地位，就再不能在巴尔干，从而在地中海东部造成更大的影响呢——这甚至符合了英国的利益，因为后者一向把奥国做为基础以建立抵制法国和俄国的平衡体系。包含在巴尔保计划里面的这种对于独立的政治创议的空洞的理解和对于自己力量的不相信，必然会使英国对这些建议默不作声。只有一个能代替奥国在地中海中部扮演反对法国角色的强大的意大利国家，才能够引起英国对意大利的同情，而在许多其他意大利地区归并到中部意大利之后，以及"千人团"远征波旁以后，也当真做到了这一点。在这些实在的事件发生以前，只有充满决心，富有勇气而且相信自己行动的（由于它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巩固的联系）大党也许能够达到同样的结果。但是当时恰好没有这样的党，而且巴尔保和他的朋友甚至不愿意形成这样的党。奥国丧失它在半岛上的领导权以后和在波旁继续保持在那不勒斯（依照新教皇派的计划）条件下的巴尔干化，对于英国在地中海的政策

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那不勒斯王国会变成俄国的领地。俄国会有可能在地中海中心进行独立的军事活动。① 不应该忘记，东方问题虽然它的战略关键在巴尔干和土尔其帝国，但在实质上却是俄英之间斗争的政治-外交形式。这是关于地中海、近东和中亚、印度、不列颠帝国的问题。

巴尔保的《意大利的希望》一书于1844年问世，他在这本书里为自己的论点辩护，这一论点本身的效果只不过是他提出了东方问题，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从而使加富尔的与克里米亚战争有联系的政策易于(可能)实现而已。它在1859年也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当时皮埃蒙特和法国打算挑动奥国在巴尔干的敌人起来反对奥国，想以此来削弱它的军事力量，因为这种举动是有限制的，并不能使他们多少有较长时期的轻松，而且不管怎样这一举动只不过是把法国-皮埃蒙特的军事行动组织起来的插曲而已。1866年的情况也可以这样说，当时意大利政府和俾斯麦也打算进行这样的破坏举动，目的是要对奥作战。意图在战争期间削弱敌人，在国内和整个军事-政治界线上发动起它自己的敌人来反对它，一这种意图并不是对于东方所制定的政治计划的因素，而是军事统帅的通常的行动方法。

不过在1860年以后和起着显著作用的意大利国家建成以后，奥国向东方的努力已经具有了另一种国际意义，并且在英法两国国内也有了欢迎这种努力的人物。②

---

① 应该考察和深入地研究那不勒斯波旁王朝与沙皇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在从1799到1860年的这段历史中占有特殊的一页，根据1915年问世的尼蒂的《外国资本在意大利》(Francesco Nitti, Capitale straniero in Italia, Laterza, 1915)一书可以知道当时俄国国家债券在意大利南部的总值，达一亿五千万里拉——这决不是1860年以前在那不勒斯与俄国之间为了对付英国而建立起来的那个集团关系所留下来的微不足道的残余。

当意大利人民的行动具有特别的群众性质和团结性质时其民族发展中的个别时机

必须研究从1800年起和在尔后时期中民族生活发展过程里面的所有时机，因为这时意大利人民起来以解决一般的任务（至少是潜在地一般的），所以在这些时机中能够形成按其性质来说（从深度和范围来看）是集体的和联合的行动或运动。这些时机在历史过程的各种不同阶段上可能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和各种的人民-民族意义。重要的任务在于研究集体行动和联合行动的可能性（从而研究这种可能性的实现程度）；研究群众行动的地域广泛程度（这一任务如果不是在一省的范围内，可以在大的区域范围内求得解决）和群众行动的紧张程度（也就是参加的群众多或少，运动在居民的各种不同阶层中得到的反应大或小——肯定的或断然否定的）。

这些时机可能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这些时机是：战争、革命、公民投票，具有特殊意义的普选。

1848—1849、1859、1860、1866、1870年各次战争，非洲战争（厄立特里亚、利比亚），世界战争。1820—1821、1831、1848—1849、1860年各次革命〔和革命发动〕。1898、1904、1914、1919—1920、1924—1925年各次西西里的“法西斯”运动。1859—1860、1866、1870年有关成立王国的公民投票。选举权幅度不同的普选。典型的选举：1876年使“左派”取得政权的选举。1880年以后随着选举

---

② 在不久以前出版的一本书里考察了波旁王朝向东方扩张的计划（一直是个计划），目的是想从这种计划里找出一些论据以恢复那不勒斯政府的命名。这种计划向来被俄国看成是合乎愿望的，而被英国看成是一种障碍，因为英国在马尔他岛问题上不愿对那不勒斯让步。

权扩大而举行的选举。1898年以后的选举。1913年的选举是第一次由于农民广泛参加而具有人民性的选举。1919年的选举是所有选举中最重要的选举，因为它是按省投票并具有按比例进行的性质，因此迫使各党派集聚起来，所以具有同样的(基本上)纲领的同样的党在整个领土上第一次登上舞台。

1919年的选举比起1913年的选举(当时一个选举委员会只选举一名代表，因而限制了当选的机会，并且由于故意地把选举委员会划分开来，也就假造了群众的政治立场)来要广泛得多，而且重要的程度也大得多。在整个领土上所有最活动的那部分意大利人民在同一天都考虑同样一些问题，并企图通过自己对历史-政治的认识来解决它们。1919年选举的意义决定于整个那些集中在选举里面象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面似的、正面和反面的"统一的"因素：首要的统一的因素是战争，因为它帮助广大群众认识一个政府机关的结构甚至对于单独个人的命运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此外，还提出了反映人民-民族统一的一系列一般的和个别的具体问题。

可以断言1919年的选举对人民来说具有立宪会议选举的性质，①哪怕这次选举对当时的"任何一个"党都不具有这种性质，1919年的历史悲剧也正在这种人民与党派之间的矛盾和脱离上面。这个历史悲剧只有一些最明智的和最富有预见性的领导集团(他们理当最担心自己的未来)直接理解了。应该指出，恰好是那个其传统是坚持在意大利召开立宪会议的党——共和党表现出自己最缺乏历史敏感性和政治才能并且让"右派"领导集团把纲领和方针强加在自己的头上(也就是抽象的和溯及既往的主张参战的纲

① 1913年选举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凡是参加过各地方中心选举的人都会记得这一点，因为在这些地方选民人数特别增多了，而且参加投票的人的百分数也很高。当时曾流行一种神秘的信念，以为投票以后一切都要改变，以为真正的民族复兴就要实现——至少在撒丁岛上。

领）。

人民以自己的观点去看未来（甚至在参战的问题上），而1919年选举的特点也就在这里，因为人民以隐蔽的形式赋予这次选举以立宪会议选举的性质。各个党派仅仅对过去有具体的看法，而对于未来，他们“抽象地”、“一般地”（其形式是：“你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党”）来看，而不是根据建设性的历史-政治观。

在1913年选举与1919年选举之间的其他区别中必须指出天主教徒带着自己的选民群众、自己的党、自己的纲领积极参加选举。在1913年，天主教徒也参加了选举，但却是在隐蔽的形式中，通过伪造了传统的政治力量的团结和影响的作用的简蒂洛尼协定。谈到1919年的选举，那么应该提一下乔里蒂所发表的为立宪会议辩护的演说（以追溯既往的观点），也应该提一下路易吉·安布洛吉尼在其于《出版》上发表的论文里所谈到的乔里蒂分子对天主教徒的立场。实际上，乔里蒂分子在选举中是胜利者，这是就这个意义来说的，即他们赋予了这次选举以立宪会议选举的性质，尽管后者根本并没有举行，并且他们能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未来引向过去。

关于罗赛里所写的论毕撒堪涅的一本书

当过去本身被利用来发现错误和缺点（某些政党或派别的）时，对于过去的解释就不是“历史”，而是乞灵于过去的现代政治。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书里常常重复一些“假使”也不惹人厌烦的道理。应该指出，对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的解释是同下列一系列事实相联系的：（1）必须说明，为什么实现了所谓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奇迹”；认为拥护统一和独立的积极力量不是很大的，而且第一次复兴时期也不能被解释为仅仅这些力量的行动；但是，另一方面

又不肯公开承认这一点，其理由与民族政策有关，因而创造了历史长篇小说；（2）有一种不愿牵扯梵蒂冈的倾向；（3）努力不对南方地区的“强盗抢掠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4）在较后一个时期——想要说明国家在同非洲作战时期的软弱性（特别是由此而引了奥里安尼从而也是奥里安尼分子的观点），想要说明卡波列托一役和战后期间自发的“破坏运动”，以及它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

这种“解释者的”倾向的软弱性在于，它就这样一直是一个纯粹智力的因素，没有成为民族政治运动的前提。这一点只是由于彼耶洛·戈别第才开始弄清楚（在戈别第的传记里也必须提到这一点）。因此戈别第同奥里安尼学说以及米西罗里决裂了（应该把多尔索同戈别第并列，而且——好象映影戏里面的影子一样——也把乔万尼·安萨尔多同戈别第并列，因为他比米西罗里更聪明）。①

罗赛里在论毕撒堪涅一书中提得不正确的问题是：领导阶级怎样才能够领导人民群众，也就是成为“领导者”。罗赛里没有研究法国的“雅各宾主义”是什么，以及正好是对雅各宾主义的恐惧怎样麻痹了民族的积极性。此外，他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在毕撒堪涅的心目中从而也是在玛志尼的心目中，有一种把南方看成是“意大利火药库”的神话般的概念。而这一点在理解毕撒堪涅个人和判明他那些与巴枯宁的思想相符合的思想的来源等等方面是个基础。例如，不能认为毕撒堪涅是创造的“先驱”，象索勒尔形容

① 安萨尔多是“基查第尼②类型人物”，后来成为文学家和美学家。他阅读过戴·桑克蒂斯的关于基查第尼类型人物的篇章。对安萨尔多完全可以这样说：“某一天这位基查第尼类型人物读了戴·桑克蒂斯的关于自己本人的篇章，开始在乔万尼·安萨尔多这个名字下面隐藏起来，后来又在黑色小星下面隐藏起来；但是他的特点却没有能够隐藏起来”。

② 基查第尼（Guicciardini, Francesco 1483—1540）——佛·罗棱萨历史家和政治家，十六世纪主要历史著作《意大利史》（Storia d' Jtalia）的作者。——译者

他那样的。他只不过是来源于俄国的"虚无主义"和建设性的"破坏一切"（甚至允许犯罪）的理论的代表。从玛志尼到毕撒堪涅的"人民主动精神"都带有极端"民粹主义"倾向的色彩（也许应该深入地研究一下金兹堡在1932年的《文化》杂志上所指出的赫尔岑活动的方向。[①] 甚至小说《父与子》里面的巴札洛夫[③]也许能在同有夫之妇一起出奔以后写给家人的信上签名：[②] 这里有整个一套产生于自然的道德，象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对它所描述的那样。

看上去，几乎不可能恢复"毕撒堪涅的书本上的文化"和确定他的思想的"根源"。可以取得成效的唯一的方法，是恢复1848年以后在法国和英国的一定的政治亡命者集团的确切的精神环境，恢复通过辩论和谈话而实现的那种思想交流的"谈话的文化"。

应该考察一下阿·奥摩第欧对奈洛·罗赛里论卡尔洛·毕撒堪涅一书的评论（发表于1933年7月20日《批评》杂志上），——这是一篇在许多方面都值得注意的评论。奥摩第欧以很高的洞察力不只揭露了该书的严重的缺点，而且也揭露了毕撒堪涅对第一次复兴时期问题在提法上的根本的毛病。但是这种洞察力来源于他采取了"保守者和退步者"的观点。

奥摩第欧断言毕撒堪涅是"列入意大利历史的1848年法国事件的片断"，看来是不正确的，正如罗赛里硬把毕撒堪涅同现代工团主义者（索勒尔和其他好斗的工团主义者）联在一起同样不正确。应该把毕撒堪涅同俄国革命者，同民粹派联在一起。在这方

---

① 参阅1932年10—12月《文化》杂志所载金兹堡的论文《加里波的与赫尔岑》。——意文版编者

② 此信全部在1932年《新文选》刊出。

③ 指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巴札洛夫是小说中的主人翁，是个"虚无主义者"。——译者

面值得注意的是金兹堡所提出的赫尔岑对意大利亡命者的影响。不应该低估巴枯宁在更后一些的时期中在南方和罗曼尼亚所取得的成就。这一事实对于理解毕撒堪涅及时作为其表达者出现的那种思想是有重要意义的，而奇怪的是罗赛里正好没有发觉这种联系。

不应该认为毕撒堪涅与平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具有社会主义或工团主义的性质。勿宁应该把它们看成是雅各宾主义类型的关系，哪怕是最极端的。奥摩第欧很容易批评第一次复兴时期问题在平民—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提法，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在"雅各宾—土地改革"基础上提出，那么批评就不会是这样容易的了，正如不容易否认领导阶级的小气的、可怜的、反民族的利己主义一样。在这样的场合下，这些阶级是由地主贵族和不参加选举的农村资产阶级代表的，而不是由工业类型的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思想家"代表的，因为他们的利益不是"命定地"同地主的利益相联系的（尽管也应该把它们同农民的利益联系起来），也就是他们的利益不完全是民族的。

奥摩第欧认为在第一次复兴时期有制定得明确的纲领是一个弱点，因为并没有锻炼出实现这些纲领的"技术"，这种看法也不是"白璧无瑕的"。

毕撒堪涅并没有制定得明确的纲领，他只具有"一般的倾向"，比玛志尼的一般的倾向为明确的倾向（而且在实际上比玛志尼的富有民族性）。我们把这一事实放在一边，但应该指出：否认制定明确纲领必要性的理论，具有表现得很明显的保守性和反动性。

毫无疑义，制定得明确的纲领应该合乎实际，以便可以运用；同样毫无疑义的是制定得明确的纲领假使没有确定实现它们的实际道路，那就等于空谈。但是同样毫无疑义的是，象玛志尼这样没有"制定得明确的纲领"的政治家，只是"为别人"卖力气，并且是暴

动的酵母，而这种暴动一定要被最反动的分子所垄断，同时后者利用“技术”归根结底会占所有其余分子的上风。

结果对毕撒堪涅甚至也应该说：他在第一次复兴时期没有代表“现实的”倾向，因为他的行动是孤立的，他没有党，没有准备为未来国家服务的干部等等。

但是问题不只在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历史里面，而主要是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因为它是以最直接的现代利益的观点来加以考察的，并且从这个观点出发，奥摩第欧的这篇评论正如他的其他著作一样，是具有保守和退步的精神的倾向性的。

不过，这篇评论之所以值得注意在于它里面包含着一种取自对第一次复兴时期历史反复思考而产生的现代“意识形态”的论据。这种意识形态对于理解最近几十年来的意大利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乔别蒂指出过的这种值得注意的论证（例如，在《更新》上），总起来是一个关于在第一次复兴时期意大利民族革命技术能力的问题，是一个关于配置在全国各个不同地区的暴动力量的革命中心（象法国的巴黎）问题等等。奥摩第欧批评罗赛里没有研究过南方的组织，这种组织在1857年显然已经不是那样毫无作为的了，要是它在1860年就能够麻痹波旁的力量的话。然而他自己的批评也并不特别深刻。到了1860年，局势完全改变了，只要有一种消极态度就足以从精神上瓦解波旁王朝，可是在1857年无论消极态度，无论开列在纸上的部队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问题不在于以1860年的组织情况同1857年的组织情况相比，而在于比较各种不同的局势，特别是“国际的”局势。相反地，1860年的组织由于反动势力的到来甚至比1857年更坏，这是可能的。

从奥摩第欧的评论中引用下面这一段话是适宜的：“罗赛里由于有许多丰富的纲领而兴高采烈。但是以假定方式说明未来局势

的纲领往往是一种累赘和无用的包袱。最重要的是方针，而不是详细地列举行动。我们看到了所有那些以备战后时期实用的纲领。在人们研究它们的时候，还不知道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和这种生活极端困难中的人们怎样能够熬过考验！

由此可知——在不确定性（为了这一点玛志尼受到责难）的后面隐藏着对具体现实的曲解。另一方面，不少社会主义要求的条款只是假设（而且是没有明确的技术过程以实现这些条款的假设），因而它们过去和现在都引起了不只是陷于苦难中的阶级的反应，或者与其说是那些临于苦难中的阶级的反应，不如说是那些虽然摆脱了阶级利益(1)，却感到无论新的道德制度或新的法律制度都还没有成熟的人的嫌弃。这种情况与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派别想要取法的法国革命时期的那种情况完全相反，其所以相反是因为在1789年新的道德—法律制度曾存在于大家的意识中因而是易于实现的①。

奥摩第欧的看法是很肤浅的和轻率的。他的说法应该同柯罗齐在1911年发表的《党是明智也是偏见》一文相比。

毫无疑义，毕撒堪涅的纲领也和玛志尼的纲领同样不确定，它也只是提出了一般的意向，而做为意向也不比玛志尼的意向清楚很多。无论怎样"具体地"制定纲领，无论怎样确定这种纲领的实现的技术过程，其先决条件是党，是很清一色的和很团结的党。可是玛志尼也好，毕撒堪涅也好，都没有这样的党。

缺少带有清楚的一般的倾向的具体纲领是反复无常的"雇佣行为"的形式，它的代表归根结底会转到最有力量的和报酬最高的那一方面去。战后时期的实例不仅没有证实奥摩第欧的正确性，而且适得其反：（1）因为在实际上这些年来根本没有什么具体纲

① 1932年7月20日《批评》，第283—284页。

领，而有的只不过是一般的倾向，或多或少模糊的和不明显的。（2）因为恰好在这个时期没有清一色的和团结一致的党，而有的只是按其组成来说很不固定的"游牧式的"集团。这些集团正好是纲领的不确定性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反面。同1789年法国革命相比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当时巴黎曾提拔用了一些干部，而这些干部是1848年以后意大利任何一个城市，不问它有什么样的纲领，所不能提拔的。

问题应该在这个形式上提出："运动战——包围战"。换句话说，为了赶走奥国人和他们的意大利的喽罗，首先，必须有强大的团结一致的意大利政党；其次，这样的党必须有具体的和制定得很详尽的纲领；第三，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支持这种纲领（这样的群众当时只能是农村群众），而且他们必须被准备好在全国"同时"暴动。只有这一运动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展开的同时性才能造成奥国军队和它的喽罗的失败。从这一观点出发，与其把毕撒堪涅与玛志尼对立起来不如把毕撒堪涅与乔别蒂对立起来才有意义，因为后者对意大利革命有自己的战略观点，并且不是狭义的军事上的战略（这是玛志尼认为毕撒堪涅具有的），而是军事政治上的战略。但是乔别蒂也同样没有党——不只是现代意义上的，并且甚至是当时这个辞所具有的意义上的，也就是法国革命所产生的那个意义上的，——做为"启蒙者"运动的。

不过在政治方面玛志尼的纲领对自己的时代来说是过于"确定"了，并且就共和制和中央集权制而言是过于具体了，这也就是不同于乔别蒂的纲领之处，因为后者更接近雅各宾主义类型的纲领（这种纲领在当时是意大利所必需的）。实质上，甚至奥摩第欧（他的反历史主义也就在这里）自己不知不觉地也以那种"统一的意大利"的观点出来活动，好象这种"统一的意大利"在形成起来的意大利之前，即以1870年所形成起来的那种形式存在于今天的意

大利之前就存在过①。

至于那些“摆脱了阶级利益”的人的立场，他们在战后时期所抱的态度也和在第一次复兴时期一样。他们没有能够表现出坚决的意志而同胜利者勾结在一起了，可是他们正以自己的不坚决帮了胜利者的忙，因为问题是谁以狭隘的和利己主义的意义代表了他们的阶级。

发表于1933年《历史新观察》上（第156页及以下各页）的对奈洛·罗赛里论毕撒堪涅一书的评论，也适用于许多这类象罗赛里这本书一样的对第一次复兴时期的“解释”。评论的作者（也和罗赛里一样）同样不理解，如果说第一次复兴时期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么正是典型的“雅各宾主义”酵母，而毕撒堪涅是极度值得注意的人物，因为他是看到缺少这种酵母的少数人之一，尽管他自己也不是当时意大利最需要的“雅各宾党人”。还可以指出的是在1859年以前威胁意大利的幽灵，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幽灵，而是法国革命和恐怖的幽灵；被吓得惊慌失措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土地所有主”，而且在梅特涅的宣传中，所谓共产主义干脆就是指土地问题和土地改革而言。

路齐奥与温和派的有倾向性的和假造的历史编纂学

应该着重指出，阿列撒得洛·路齐奥所持有的编写第一次复兴时期历史的方法往往得到《天主教文明》的耶稣会徒的称赞。在路齐奥与耶稣会徒之间可能有一种协议——不是永久性的，但是

① 尽管奥摩第欧自己敌视经济法律倾向，可是也支持萨尔威米尼在他那本论玛志尼的小册子里所贯彻的那种观点，那就是：玛志尼一般地鼓吹统一是玛志尼主义的稳定的核心，是他对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实在的贡献。

在一系列场合下，并且比一般所设想的要频繁的多①。路齐奥不得不为查理－阿尔贝特政策辩护(《玛志尼——烧炭党》一书第498页)，他不惜严厉谴责乔别蒂在1831年条件诉讼中的立场，而与耶稣会徒完全意见一致。应该着重指出，发表在1928年《天主教文明》上面的关于乔别蒂诉讼案的论文，根据梵蒂冈的文件表明，教皇对乔别蒂死刑的判处和执行事先就以耶稣会形式表示了自己的placet②，可是例如在1821年对一个皮埃蒙特神甫由于梵蒂冈的干涉却取消了死刑改为服劳役。

对于路齐奥的一些论述第一次复兴时期诉讼案的历史著作，应该提一些涉及他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政治——揭发性的意见。

常常令人觉得路齐奥（当问题涉及被逮捕的民主党派的党员的时候）好象总是谴责被告没有被判刑和处死。甚至从法律的或法庭的观点出发，路齐奥提出问题也是歪曲和有倾向性的，因为他是抱着“审判官”的看法，而不是被告的看法；由此也就产生了他的想要为象萨尔沃蒂那样的反动的审判官“恢复名誉”的企图（毫无意义的和愚蠢的）。即使萨尔沃蒂做为一个人，做为一个奥地利的官吏本应无可指摘地进行审判的话，那也不能改变下面这个事实，即他所组织的诉讼案是与新的法律意识相矛盾的，而这种意识的体现者是爱国者—革命者，因而这些诉讼案是使他们感到惊奇的。

被告的处境是最困难的和极端难堪的；最无害的招认也会招致极悲惨的后果，并且不仅是对一个被告，而且是对许多人，这一点以帕拉威奇诺为例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于表现为一种战争形式的国家“审判”来说，真理和客观的正义性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不仅是击败敌人，而且必须在击败敌人的时候，使人看上去好象敌人

---

① 参阅1928年8月4日《天主教文明》第216—217页《1833年对修道院院长乔别蒂的政治诉讼和判决》一文。

② placet——乐意（拉丁语）。——译者

理当被消灭，并且他自己也承认该当如此。

根据对路齐奥的《历史－诉讼的》著作研究，完全可以提出一系列的有关历史方法的意见——在心理方面最有意思，而在科学上也很重要的意见①。

第一次复兴时期以路齐奥的精神编写第一次复兴时期历史的方法特别是在上一世纪下半期表明了自己的虚伪性（而特别显著的是在1876年以后，也就是在“左派”取得政权以后）。它是温和派天主教徒（或者力图与天主教徒和解，并寻求基础，以成立一个右派大党，使这个党能利用教权派在农村群众中建立广大基地的温和派）与根据类似理由力图摧毁教权派的民主派之间的政治斗争的特征。对路易吉·卡斯台拉左所采取的疯狂的攻击是典型的插曲。这是由于他据推测在曼土亚审讯中采取了一种立场，造成堂·塔卓里，卡尔洛·波马，提托·斯别里，孟塔那里和弗拉蒂尼等人在贝尔菲奥拉的被处死。这次攻击具有完全故意的性质，因为对卡斯台拉左所提出的责难并没有向其他的人提出来，可是这些人在大家都知道的几次审讯中的行为比起硬加在（而且不能令人信服的）卡斯台拉左头上的行为要来得恶劣。因此象卡尔杜奇这种人一直是同卡斯台拉左团结在一起的。但是卡斯台拉左是共和派，是共济会员（可能是共济会组织的首脑?），而且甚至对公社表现出了自己的同情。是不是卡斯台拉左当真比乔卓·帕拉维秦诺在康法洛尼耶里诉讼案中表现得坏呢?（注意路齐奥因为安得里安仇视帕拉维秦诺而对安得里安的攻讦）。不错，曼土亚的审讯最后是死刑的执行，可是康法洛尼耶里和他的同志们却免于此。但是把那个事实，即这并不应该改变对于个别人物行动的判断那个事实搁在一旁不谈，是不是就可以说在贝尔非奥拉处死一些人是

① 应该参阅一下1934年9月3日《晚邮报》所载马里安诺·达麦里奥《继承与法律》一文。

由所假定的卡斯台拉左的行为引起的，而不是相反地对于 1853 年 2 月 3 日米兰暴动的闪电式的回答呢？并且米兰贵族的怯懦态度是不是促成了弗兰茨－约瑟残酷的决心加强呢？因为他们正好是在执行死刑的前夕匍匐在皇帝的膝前献媚的。

应该弄清楚路齐奥对这一系列复杂的互相联贯的事件的态度。温和派想要减轻米兰贵族责任的那种企图，具有真正肮脏的形成①。

温和派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用自己不倦的、非常审慎的和组织得很漂亮的(有时候会使人觉得这项活动有一个领导中心，一个温和派的特殊的共济会组织，而他们的行动也具有高度的一贯性)宣传追求过什么目的而部分地仍在（但是在这方面近些年来改变了许多）追求什么目的呢？这个目的就是“昭示”半岛的统一是同王朝联盟的温和派的最伟大的功绩，并且以历史的观点把对政权的断垄合法化。必须指出一点，最大的文化代表人物都属于温和派，同时“左派”在智力方面(除少数例外)水平并不特别高，尤其是

① 参阅勒·邦法迪尼《半世纪来的爱国主义》(R·Bonfadini, Mezzo secolo di patriottismo)。弄清楚路齐奥对康法洛尼耶里《审讯记录》问题、对康法洛尼耶里被释放后的行为问题的态度。关于卡斯台拉左的问题，参阅路齐奥的《贝尔非奥拉的殉难者》(A. Luzio, I Martiri di Belfiore)(第四版于 1924 年出版)；《奥国在米兰和曼土亚组织的政治审讯》(I processi politici di Milano e di Mantova restituiti dall'Austria, Milano, Cogliati, 1919)（在这个小册子里所讲的大概是康法洛尼耶里审讯结果的记录问题，据参议院议员萨拉特表示，他曾在维也纳的档案里“发现”这些纪录)。《共济会组织和意大利的第一次复兴时期》二卷。(La Massoneria e il Risorgimento Italiano, 2 voll., Bocca)(大概这部书在很短的期间内出了四版，很令人惊奇)。同时参阅：普·勒·兰巴尔底《曼土亚审讯的明暗面》(P. L. Rambaldi, Luci ed ombre nei processi di Mantova)，载于《意大利历史档案》第 18 卷，第257—331页以及朱塞佩·法蒂尼《格罗塞托的选举和共济会》(Giuseppe Fatini, Le elezioni di Grosseto e la Massoneria)，载于 1928 年 12 月 16 日《新文选》(里面讲到 1883 年 9 月间曾选举卡斯台拉左为代表，还讲到展开的运动，卡尔杜奇支持卡斯台拉左并在报刊上出面反对“温和派伪善的残酷行为”)。

在普通的历史研究和政论方面。温和派利用论战，利用“显示”他们的俯首听命精神能够在意识形态方面拆散民主派，把他们的许多代表人物拉到自己这方面来，而且更主要的是通过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口号和纲领对青年一代的教育产生影响。此外，应该指出的是：（1）温和派在自己的宣传中不是一丝不苟的，可是行动党的代表却都充满爱国者、民族志士（等等）的“宽宏大度”，并且尊敬所有在第一次复兴时期确实经得起考验的那些人，哪怕有时候这些人也表现出软弱性来；（2）公开的档案的制度对温和派有利，准许他们（以个人资格）查阅不利于他们的政敌的文件，歪曲或隐瞒可能对他们自己不利的那些文件。

仅仅在不久以前才有可能公布比如托斯堪纳的温和派的通信全集。他们于 1859 年还在扯住大公的衣襟，不让他跑开。温和派顽强地拒绝承认在第一次复兴时期除了王朝和温和派之外还存在有另外一种积极活动的、集体的力量。他们对于行动党只承认那些由于被捕而故意予以赞扬的个别人物的功绩。他们对于其他的人则尽力侮辱，无论如何也力图表明没有集体的联系。

实质上行动党对于这种宣传（这种宣传通过学校成了训练的正式指导）没有能够采用任何有效的手段以相对抗，只有埋怨和发泄牢骚，这些东西具有天真的宗派主义和偏颇的性质，不能说服有教养的青年，对普通人民漠不关心，因而不能影响青年一代。这样一来，行动党遭到了瓦解，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没有能够给自己建立人民的基础。他们的宣传不应该倚靠过去，不应该倚靠以过去为内容的论战，广大群众向来不大关心这种论战，这种论战仅仅在一定限界内有用—用以建立和加强领导干部—，而应该依靠现在和未来，依靠制定出来用以与官方纲领相对立的（或把官方纲领加入进来做为组成部分）建设性纲领。以过去为内容的论战对行动党来说特别困难和危险，因为后者已成为战败者，而胜利者仅

仅因为他是胜利者而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来也没有人想到写一部行动党的历史，尽管它在事件的发展中具有无可争论的意义：回忆一下民主派1848—1849年在托斯坎纳、威尼斯，在罗马的行动以及“千人团”的远征就足够了。

在一定时期所有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了，而共济会成了这种联合的轴心。这是在共济会的历史中确切地确定下来的时期；共济会成了在民间社会中能够抵制教权派的僭望、和抑制教权派的危险的、国家最有影响的力量之一。这个时期随着工人群众力量的发展而告结束了。共济会成了温和派的目标。虽然温和派打算这样至少把一部分天主教力量，特别是青年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但是在实际上温和派却加强了梵蒂冈所控制的天主教力量。这样一来，正象尔后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现代国家和世俗民族意识(归根结底是爱国心)的形成受到了反击。

II. 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

前　　言

在考察以这个有些一般的和有条件的标题《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联合起来的一系列问题时，必须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即由于必要而提出并解决这些问题的企图是在现代社会的矛盾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就决定了它们的复杂化，对它们的荒谬的态度，以及往往造成大的灾难的经济和道德危机等等。

一般地可以这样说，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产生于有可能组织计划经济的内在的必要性，而且这里所考察的各种问题，应该作为正好表明由旧的经济的个人主义向计划经济过渡的一个链条中的环节。这些问题产生于发展过程所碰到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抵抗。这种抵抗产生于那些包括在 societas rerum（万物的社会）和 societas hominum（人的社会）本质本身里面的困难。这个或那个社会力量出来做一种进步企图的首创者，是要造成决定性的后果的；必须根据新的目的加以“改造”并使之“合理化”的从属力量由于必然性而开始抵抗。但是统治力量本身或者至少他们的同盟者的某些部分也要抵抗。在美国成为发展符合福特主义化工业的新型工作者的必要条件的禁酒法，由于从属的依然落后的力量的抵抗，而当然不是由于工业家或工人等等的抵抗而取消了。

下面就是一些在实质上最重要或者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尽管

骤然看来它们不象头等重要的：（1）以直接建基在工业生产上的财政资本的积累和分配的新机构来代替现在的财阀阶层；（2）性的问题；（3）美国主义能不能构成一个历史"时代"，也就是它能不能决定上一世纪所具有的"消极革命"（这在另外一个地方加以考察）类型的逐步发展，或者相反地，它只不过是那些尔后造成"爆发"，也就是法国类型的变革的因素的逐步积累；（4）欧洲人口成分"合理化"的问题；（5）发展的出发点是不是一定在工业和生产世界的内部，或者发展由于建立可靠的和巩固的形式上的法律上层建筑，而可以从外面得到推动，这种上层建筑可以容许从外面领导生产机构发展的一切必要过程；（6）福特主义化和合理化的工业所支付的所谓"高工资"问题；（7）福特主义是工业为了克服利润率下降的合乎规律的倾向而一贯采取的企图链条中一个最后的环节；（8）精神分析学（它在战后时期流行很广）是国家和社会机关对单独个人所实行的增长了的精神强制的表现，也是这种强制所造成的病态的危机的表现；（9）"扶轮社"和共济会。

欧洲人口成分合理化

在欧洲采用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某些方面的各种企图应该归功于旧的财阀阶层，因为他们想要调和那在逻辑上不可调和的东西，把欧洲旧的和时代错误的社会人口结构，同由最完善的美国生产型——亨利·福特的工业所代表的生产的最新形式和劳动的最新方法调和在一起。因此，福特主义的采用就碰上了很顽强的"精神上的"和"道德上的"反抗，而且由于使用极端的强制而采用了特别残酷和狡诈的形式。简而言之，欧洲所希望的是正如俗语所说的"酒桶里装得满满的，老婆喝得醉醺醺的"。——希望在竞争能力方面具有福特主义的一切优越性，同时保存着自己的寄生虫军队，

这些寄生虫吞食着依靠增加生产费负担的很大数额的剩余价值，并破坏着欧洲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因此必须很注意地研究欧洲对美国主义的反应：从分析这种反应就可以取得为了理解旧世界许多国家当前局势和战后时期政治事件所必需的不少因素。

在形式上最完善的美国主义要求一个先决条件，而探讨这些问题的美国人并没有对这个条件予以注意，因为这个条件在美国是自然存在着的，这个条件可以称为"合理的人口成分"，它在于缺少在生产范围内丝毫也不起一点重要作用的人数众多的阶级，也就是绝对寄生的阶级。欧洲的"传统"，欧洲的"文明"相反，其特点正好是存在着这些由过去的历史的"财富"和"复杂性"所产生的阶级，而过去的历史由于国家机关和知识分子，教会和土地财产、掠夺的贸易和军队（先是职业的，后来是建立在义务兵役制上的但是军官仍属职业的）的过分饱和和僵化的现象遗留下来许多消极的渣滓。并且可以这样说，国家的历史愈古老，这些渣滓就愈多，就愈成为沉重的负担。这些渣滓是以无所事事和无用的群众、以"祖产"为生的历史恤金领取者所构成的。要统计这些在经济上消极的（对社会而言）分子非常困难，因为找不到能够为了直接研究的目的而把他们加以确定的那一"栏"。可以间接地，例如可以从民族生活的一定的存在形式中得到能使我们明了真象的说明。很多城市型的但是没有工业（没有工厂）的大的和中等的（以及小的）人的集合体是这些表征之一，但仍然不是最可以作为标志的。

所谓"那不勒斯之谜"。应该回忆一下歌德对那不勒斯的意见和朱斯蒂诺·佛尔吐那托从这种看法中所得出来的"令人慰藉的道德的结论"①。歌德是对的，他打破了关于那不勒斯人是天生的

① 佛尔吐那托关于歌德和歌德对那不勒斯人评论的小册子〔歌德《那不勒斯通信》，朱斯蒂诺·佛尔吐那托译，那不勒斯1917年出版——意文版编者〕为"李京蒂出版社文库"重版，收入多米尼科·彼特里尼主编的《评论札记》中。关于佛尔吐那托这本小册子，应该读一下路易吉·艾脑迪发表于1918年《社会改革》上的评论。

"流氓"的传说。相反地，他强调他们很积极而且富有发明精神。问题在于要看清楚这种发明有什么实在的效果：它是没有生产效能的，而且不是为了满足生产阶级的需要和要求的。那不勒斯是南方大部分地主（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依靠自己的地租在这里过活的城市。围绕着这万家在经济方面或多或少有势力的地主，连同他们的由奴仆和走狗组成的庄园，组织起具有手工业者，串街的手艺人，罕闻的另星分散的直接供应商品以及为徜徉在街心的游手好闲者服务的小商贩的大部分城市的生意。另外大部分城市组织在运输行业和批发商业的周围。"生产性的"工业，即创造和积累新的财富的工业比较少，尽管官方的统计把那不勒斯列为米兰、都灵和热那亚以后的意大利第四个工业城市。

那不勒斯的这种经济——社会结构（而现今由于各省团体经济委员会的活动已经可以得到关于这种结构的相当确实的资料）说明这个充满矛盾的和棘手的政治问题的那不勒斯城市历史中的许多问题。我们所观察到的存在于那不勒斯的情况也在很大的范围上出现于巴勒摩和罗马以及所有多数的城市（关于"百市"的名言），不只在南部意大利和各岛，而且也在中部甚至北部意大利（波朗尼亚、帕尔马、菲拉拉等城市的大部分）。对这类城市的大部分居民可以重复一句民间的谚语："一人耕田，七人坐吃"。

直到现在对于下面这一事实还没有以应有的态度加以研究，即中小地产不在农民手里，而在小城市和郊区的资产者手里。这种土地以原始的对分制出租（即以实物或服役付租方法），或长期出租，以农产品或货币付租。这样，就存在有大批的（对总收入而言）中小资产阶级，"领退休金者"和"以利息为生者"的资产阶级，他们以所谓"积累制造者"的奇异的形象出现在相当于《憨第德》①

① 系法国启蒙运动家伏尔泰的著作，中译为《老实人》。——译者

的某些经济著作中，也就是在经济上消极的居民的整个阶层。

这些人不仅从一定数额的农民的原始劳动中取得维持自己的生存的资料，而且居然还要储蓄。这是资本积累的最吓人听闻的和最不健康的方法之一，因为它是建立在对那些濒于半饥饿状态的农民进行犯罪的、高利贷的剥削之上的，而且它的代价令人难以置信地高，因为积累不大的一笔资本就要消耗罕闻的劳动，这种消耗是维持所有这一大批绝对的寄生虫的往往是相当高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这是一种历史现象，由于这种现象在意大利半岛上就形成了类似的不正常的情况，它决定了历史的停滞。这种情况是在中世纪公社垮台以后和城市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首创精神衰落以后分几次形成的，——这种现象曾被历史学家尼科洛·罗多里科称为"走回土地"，并且干脆做为有益的民族进步的标志接受下来。响亮的辞句多么善于模糊处于危机中的意识）。

国家管理机关向来是绝对寄生生活的另一个来源。列那托·斯帕温特计算过，意大利人口的十分之一（四百万人）是依靠国家预算生活的。而且到现在还有相当年青的人（四十多岁），身体很健康，精力和体力都很充沛，担任过国家职务二十五年，就不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领取一定的巨额退休金，而苟且偷生。可是工人只能六十五岁以后享受补助金，而农民的劳动却根本没有限度（所以一个小康的意大利人一旦听说美国大富豪直到他有知觉地活到最后一天始终活动着就感到奇怪）。如果某一家的教士成了神甫，那么，对所有的亲属来说，做"粗工"就是"可耻的事"了；可以干的事顶多也就是经商。

意大利的人口构成仅仅因为长期侨居海外和妇女很少从事生产新财富的劳动就已经成为"不健全的了"；"潜在地"积极的居民与消极的居民之间的对比是欧洲最不利的对比之一①。假使考虑到以下几点情况，那么这种对比就越发地不利了：（1）减少平均个

人劳动潜力的地方病(疟疾等等)；（2）许多下层农民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从发表于1926年《社会改革》上的马里奥·卡米斯教授的研究资料里可以看到[2]，对他们来说民族平均指标应该划分为阶级平均指标，如果民族平均指标勉强能达到科学所规定的必需标准，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就是不少的居民阶层经常挨饿。在参议院讨论1929/30年国家预算时，墨索里尼断言有些地区在整整几个季度内人们只是以草为食[3]；（3）存在于某些农业区的而未经官方调查的普遍失业；（4）绝对寄生的居民群众，他们为数很大而且要求另外一些为数众多间接寄生的人为自己服务；还有"半寄生的"居民，其所以是半寄生，因为他们促成(通过不正常的和不健康的途径)经济活动从属形式象商业和一般的中介的增多。

这种局面不仅存在于意大利，它也存在于旧欧洲各国，程度大小不同，而以更坏的形式存在于印度和中国，这也就说明了这些国家历史的停滞和它们的军事—政治的衰弱。(在考察这一问题时，不直接涉及到社会—经济组织的形式。只涉及到居民中各种不同集团之间在现存社会制度中比例的合理性，每一种制度有它自己的人口构成中一定比例的规律，自己的"最好的"平衡和不平衡性的因素，这种不平衡性得不到相应的立法的调整，它本身就可以成为毁灭性的，因为它会使国家经济生活的来源涸竭，更不要说所有另外一些瓦解的因素了。)

美国没有伟大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传统，可是正因为这样，它就不受这项大帽子的压制，这也就是这个国家积累大量资本的主

---

① 参阅摩泰拉教授的一些有关的研究著作，特别是在1922年《经济展望》上发表的。

② 参阅《关于意大利人民饮食条件》一文，载于1926年6月《社会改革》，第52—81页。——意文版编者

③ 参阅《议会记录》和参议员乌戈·安康那的发言。

要原因之一(当然，比之所谓自然财富更为重要)，尽管它的生活水平比起欧洲的人民阶级的生活水平来要高。没有这些被过去各个历史阶段所遗留下来的寄生的渣滓，就使得它能够创立工业，而且特别有利于在健全的基础上发展商业，并且能够使运输业和商业的经济作用，越来越大地转变到视生产而定的确实必需的范围。不仅如此，还发生以生产本身来包容这些种类活动的企图。只要回忆一下福特的多次试验和在他的企业中由于直接管理成品的运输和销售而造成的节省就够了。这种节省能影响成本，也就是可以提高工资和降低售价。由于有了这些已经被历史过程合理化了的先决条件，于是就能比较容易地使生产和劳动合理化，巧妙地把力量的运用(取消以地域原则为基础的工人的工团主义)同说服的方法(高工资，各种社会慈善事业，巧妙的政治和思想宣传)配合起来，从而使国家的全部生活从属于生产的利益。领导权产生于工厂，并且为了自己的实现仅仅须要最小数量的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职业中间人。

使罗米耶大吃一惊的"群众"现象不是别的，而是这种类型的"合理化了的"社会的形式，在这种社会中"基础"更为直接地统治着上层建筑，而这些上层建筑是"合理化了的"(简单化了和在数量上减少了)。

在美国合理化决定了造就符合新型劳动和生产过程的新型人物的必要性；这项造就工作目前仅仅处于自己的开始阶段，因而(看上去)是素朴的阶段。这还只是对利用高工资建立起来的新的工业结构的身心适应阶段。目前还没有发现(在1929年危机以前)任何"上层建筑的"现象，有的也只是偶然地，换句话说，还没有提出基本问题——领导权问题。斗争是用由旧的欧洲武库取出来的而且依然不中用的武器进行的。因此，这种武器同"事物"发展相比还是"时代错误的"。在美国展开的斗争([安德烈·]菲力普描

写了这种斗争①）目前还是一种争取手工业所有制反对“工业自由”的斗争，换句话说，它象十八世纪发生于欧洲的斗争，尽管条件有所不同。美国工会勿宁是熟练的手工业所有制的同业工会的表现，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因此工业家要求取缔这些工会的活动是有其“进步的”一面的。由于缺少欧洲的甚至在经济方面也以法国革命为标志的历史阶段，使得美国人民群众依然处于未成熟的、没有造就好的状态；此外还应该加上它的民族不是清一色的，各种不同种族的文化混在一起，还有黑人问题。

在意大利仅仅响起了福特进行曲的头几个拍子（对大城市的赞美，大米兰重建计划等等；断言资本主义刚刚处于自己道路的开端，必须准备广阔的天地使其发展等等；关于这些问题必须阅读一下刊于《社会改革》中的斯基亚维的一些论文）；随后就开始转向“农村化”和反动地贬低城市的作用，开始赞美手工业和宗法制的田园生活，号召起来斗争以反对工业自由，争取“手工业所有制”。但是，甚至即使发展进行得缓慢，带有可以理解的小心谨慎态度和前顾后盼的精神，也不能说保守的部分，即代表旧的欧洲文化及其一切寄生的附加物的那部分没有自己的对抗者（根据这一观点，《新研究》，《法西斯主义者评论》和皮萨大学所组织的团体高等院校学术中心所代表的倾向是值得注意的）。

第·曼的书②也是这些震撼旧欧洲整个结构的问题之别具一格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毫无气派，而且也不与在世界舞台上竞争的任何一种巨大的历史力量相联系。

---

① 是指安德烈·菲力普的《关于美国的问题》（Andre Philip, Le probleine aux Stats unis, Paris, Alcan,1927）一书。——译者

② De Man, Au delà du Marxisme.——意文版编者

工业的财政自给自足

在卡尔洛·潘尼的一篇十分有意义的论文《关于建立团体主义纯粹理论的企图》(刊载于 1929 年 9 月—10 月《社会改革》) 里分析了马西摩·佛威尔的一卷本著作《经济与团体主义》〔Massimo Fovel, Economia e corporativismo; Ferrara, SATE, 1929〕。同时提到了佛威尔的另外一部著作——《工会国家里的地租与工资》① (罗马,1928)。但是作者没有注意,因而也没有以必要的明确性着重指出佛威尔在自己的著作里把"团体主义"理解为意大利在劳动和生产方法上采用最先进的美国制度的前提。

值得弄清楚的是:佛威尔是单凭"自己的才智"来写作呢,还是他背后有(而且是具体地,不是"一般地")一定的经济势力在支持他和推动他呢。佛威尔向来也不是"纯粹的学者",象其他的也是知识分子的"纯粹的"代表通常所表现的那样表现一定的倾向。从他本身所具有的许多特点来看,他属于齐科蒂、那尔第、巴齐、普列齐奥吉等那些人物之列,但是由于他自己无可争论的可宝贵的智力,他比他们要复杂些。佛威尔一直努力想做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可是由于缺少几种主要品质而一无所成:这里所需要的是指向一个目标的意志的力量,而不是米西罗里那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朝三暮四变化无常;除此以外,他过分经常而且明显地追求细小的肮脏的利益。在战前他一开始以"青年激进派"的姿态出现(他为传统的民主运动加入较具体的和较现代的内容,想使它富有年青的朝气),同共和党人勾勾搭搭,特别是同联邦主义者和地方自治主义者(参阅奥里威耶洛·朱卡里尼《政治评论》)。在战争期间他

① Reudita e salasio nello stato sindacale.——译者

是中立派——乔里丹诺派。1919年他在波朗尼亚加入了社会党，但是他从来没有在《前进!》上写东西。在停战以前，他曾几次到都灵。都灵的工业家把一家名声不好的旧报《都灵日报》弄到手，加以改组，变成自己直接的传声筒。佛威尔很想做这家新机关报的编辑，当然也就同工业界拉上了关系。"青年自由派"托马佐·波列里被选为责任编辑，跟着不久《民族思想》的依塔罗·米农尼也加入到编辑部里来(可是《都灵日报》甚至在《乡村》的名称下也没有能够维持下去而被它的老板关闭了，尽管为了它的发展曾经很大方地拨过经费)。

佛威尔在1919年所写的一封信是很"有趣"的，他写道，"责任感"追使他为《新秩序》周刊撰稿。后来有一个答复，里面指出他可能撰稿的限度，在这以后"责任声"突然沉寂了。佛威尔加入到帕西里依、孟台里、加尔登基一伙人里面去了。这一伙人把的里雅斯特的《劳动者》当成了进行赚钱的勾当的中心，而且一定同都灵的工业界有联系，帕西里依借口"在商业上"便于进行工作企图把新《新秩序》移到的里雅斯特(看一下当时为了直接商谈而来到都灵的帕西里依所兜揽的一百里拉订阅费公布的日期)①以及当时提出的"贵族"能不能为《劳动者》撰稿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1921年在《劳动者》编辑部里发现了属于佛威尔和加尔登基的一些文件。根据这些文件知道这两位朋友在工团主义者尼古拉·魏基领导罢工期间正在交易所里搞纺织业股票投机，并根据自己股票投机的利益来指导报纸。到了利沃诺以后，佛威尔有一个时期销声匿迹了。到了1925年，他又自称是南尼和加尔登基主持的《前进!》的记者，跟着为了使美国财政资本操纵意大利的工业，他就发起了一个宣传运动，而与"意大利皮埃蒙特协会"这一垄断组织的工程师

① 帕西里依(当时是《劳动者》管理人)的订阅事载于1920年3月27日《新秩序》第42期上。——意文版编者

庞蒂有关的《人民报》立即利用了这一宣传运动(想必预先有了协议)。在1925—1926年,佛威尔常常在《共和党人呼声》上发表论文。目前(1929年)他支持团体主义做为意大利形式的美国化的前提,他在菲拉拉的《波河流域晚报》,在《新研究》,在《新问题》,《劳动问题》撰稿,并且好象他也在菲拉拉大学教书。

在潘尼复述的佛威尔的论点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把团体看做自治的工业-生产联合的看法,这个团体的使命是以现代的方法并且着重以资本主义的方法解决今后继续发展意大利经济机构的问题,以抵制从剩余价值和"积累生产者"征收过多的贡税的半封建分子和寄生分子的利益。积累必须是生产联合本身的内部(收益较多的)职能,积累必须是依靠以降低成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发展,这样不仅能得到较多的剩余价值,而且也能付给较高的工资,其结果是内部市场容量增加,工人可以有储蓄,保证较高的利润。这样一来,资本的积累就会以加快的速度在企业本身内部进行,而不须通过"积累生产者",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的吞食者。在工业-生产联合中,技术因素(管理处和工人)应该比在最"贫乏的"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因素占优势:换句话说,一切直接参加生产的、唯一能够结合成为工会的,从而能够组成生产团体(由此就产生了斯皮里托所做的关于所有主团体的极端的结论)的分子的联合,应该代替工业界巨头与小资产阶级"积累者"之间的联盟。潘尼驳斥佛威尔,说他所研究出来的论点不是新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新的经济政治学,这种驳斥是形式的,也可能在某方面具有一些意义,但没有涉及到主要的论据。其余一些具体的反驳不是别的,只是证实意大利生活中比起这种经济机构中的"组织上的"改革来某些落后方面而已。佛威尔的最大的缺点在于忘却了由于存款所有者对工业家的不信任,意大利国家一向所执行的经济职能,在于忘却了团体的方针并非产生于对工业技术条件改革的要求,更非

产生于对新的经济政策的要求，而勿宁是产生于经济行政管理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由于1929年的危机而更为重要了，并且直到现在依然有效。

实际上意大利的生产集体无论个别的单位也好，无论工会也好，从来也没有积极地或是消极地反对那些旨在减低成本、劳动合理化、在整个企业范围内采用最完善的自动机构和建立最完善的技术组织的新设施。完全相反。这种现象发生在美国，因而决定取消了一半的自由工会并用企业中(彼此)孤立的工人组织系统代替了它们。相反地，在意大利任何一种甚至最微小的和怯弱的把工厂变成工会组织中心的企图（回忆一下关于企业中代理人的问题）也会碰上刺刀而受到严格的取缔。对意大利历史进行仔细的分析，直到1922年，甚至到1926年，能使我们看到隐藏在现象的虚饰表面之后的工人运动的深刻的动力。通过这种分析可以得出客观的结论，即恰好工人才是工业的新的和最现代的要求的体现者并按自己的方式热烈地确定这些要求。甚至可以这样说，工业家之中也有人理解了这种运动，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图事先取得支持(应该这样来说明安尼耶里努力要把《新秩序》和学校拉进他的康采恩"菲阿特"(Fiat)里，以便建立工人和技术员学校来保证工业改革和按照"合理化"的方法工作。基督教青年会①曾试图举办"抽象的美国主义"训练班，但是尽管花费了大量金钱，这些训练班都垮台了)。

除了这些看法以外，还有另外一系列的问题，存在有团体运

---

① 基督教青年会(YMCA)是资产阶级的国际群众性组织。它的基本会员群众是英国、加拿大和其他与不列颠友好的国家以及美国的代表人物。这个会创办于十九世纪中叶，目的是吸引劳动青年不去参加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使他们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它的教育、文化、运动和旅行活动周密地掩盖了它的政治目的。——俄文版编者

动，而在某些方面所实行的法律措施已经创造了正式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技术一经济改革可以在广大范围内实现，因为工人既不能反抗它，也不能争取自己做它的旗手。团体组织可以成为这种改革的形式，但这时却产生一个问题：这将是维科的那些"狡猾的预言勾当"之一，即人们没有给自己提出这种任务而且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却服从历史命令吗？当前对这一点不得不怀疑。直到现在，"经济警察"的消极因素仍驾凌积极因素——要求能使国家的经济一社会结构具有现代水平，哪怕在旧的工业范围内的新的经济政策。可能的法律形式——这是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这只是直接条件中的最重要的。美国化要求一定的环境，一定的社会结构（或建立这种结构的决心）和一定型式的国家。这种型式的国家——是自由的，但不是指关税自由或实际的政治自由而言，而是指更为深刻意义的自由的首创精神和经济的个人主义而言。这种自由的首创精神和经济的个人主义由于历史发展本身和借助自己的力量，作为"市民社会"，能达成一种工业集中和垄断制度。在意大利取消了半封建类型的靠利息为生者——这是工业改革的主要条件之一（其中一部分也就是改革本身），而决不是结果。实现这次取消的工具是国家的财政经济政策：清偿国债，登记有价证券，增加预算收入项目中的直接税对间接税的比例。但是不相信这已经是或者在最近的将来即将是财政政策的方向。不仅如此，国家在造成新的靠利息为生者，也就是保存和鼓励寄生性的积累储存的旧形式并努力造成闭关自守的社会集团。在事实上，直到现在实行行会方针是为了扶持中等阶级不稳定的阵地，而不是为了消灭这些中等阶级。它一面保护着旧的基础所产生的已经确定的利益，同时越来越变为一种保存原来状态中的事物的机构，而没有变成进步的动力。为什么？因为行会方针也取决于失业情况：他对就业者保证某些最低生活费（在自由竞争场

合下，这种最低生活费也会猛烈下降，引起严重的社会改革)，同时为中等阶级的失业者创造新型的就业(组织的而非生产的)。而且无论如何，也有打破困难处境的出路：做为非常棘手的局面的结果而产生的行会方针(其基本因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着平衡，以避免惊人的崩溃)，可以用极端缓慢的、几乎是感觉不到的步伐向前推进而实现，这些步伐不经过突然的震动就会改变社会结构：要知道一个婴儿不论襁褓裹得多么紧，也毕竟是要发育和成长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值得弄清楚，佛威尔是为自己说话，还是以那种无论如何也要寻求自己本身道路的经济势力的代表身份出现。无论如何，这一过程将是十分漫长的，而且要碰到许多困难，以致在这个期间会形成能够对它进行顽强抵抗的甚至能够完全停止它的新的利益。

性问题的几方面

对性问题的纠缠不清以及这种纠缠不清的危险。

一切“空头计划家”把性问题提到首位，并“率真地”解决它。

应该指出，在《乌托邦》里性问题占有很多地位，往往压倒其他问题。(柯罗齐很不恰当地指出：康帕内拉在《太阳城》里的决定不能用卡拉布里亚农民性的需要来解释。)性的本能是受到发展中的社会方面的最大压力的本能。对这种本能的“节制”是极端“违反自然的”事，因为它造成许多矛盾并做了不少的曲解。由此也就有了向“自然”的号召，这种呼声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比在这方面喊得这样频繁。

“精神分析”的著作——这是批判节制性的本能的又一种方法，有时是以“启蒙运动”的形式，在性的基础上制造关于“原始生活”(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的新神话。

城乡之间在这方面存在着分裂，但这种分裂，无助于支持乡村的闲情逸致的观念，乡村发生最多离奇的性犯罪，流行着鸡奸和兽奸。在议会1911年对南方的调查材料中载有：在亚不路息和波西利加大（这里宗教的狂信很厉害，宗法性也是根深蒂固的，城市思想的影响很微弱，以致根据塞尔皮耶里的资料，在1919—1920年这里连一次农民骚动也没有）百分之三十的家庭里发生过近亲相奸，而且看上去直到最近几年来那里的情况也没有改变。

性行为是一种再生育的机能，也是一种娱乐。妇女的“审美的”理想介乎“生育者”与“玩物”的观念之间。性生活成为娱乐不仅在城市；民间谚语说：“男人——猎色者，女人——诱惑者”，“没有比去和妻子睡觉更美的事”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表明在乡村里，在同一个阶级的分子之间的性关系中也流行着娱乐这种观念。

再生育的经济职能。这种职能不仅是使整个社会感到兴趣的共有的事，因为为了执行这种职能，需要在不同的世代之间有一定的对比关系，以生产物质财富和维持居民中的消极部分（是经过正常途径成为消极的：到了一定的年龄，残废等等），而且也是“分子的”事，是家庭这种最小的经济联合的内部的事。关于“老年的倚靠”的说法指出了本能地意识到整个社会舞台上老年人与年青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的经济上的必要性。目睹乡村中没有子女的老头儿和老太婆受到冷遇的那副情景，迫使为夫妇者盼望后嗣（谚语“一位母亲抚养起一百个子女，而一百个子女却养不活一位母亲”，说明问题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把没有子女的老头儿和老太婆看成为“败类”。保健卫生工作有了成绩，增加了人的平均寿命，这就越发尖锐地提出了作为经济问题的重要的而且完全独立自在的一面的性的问题，从而引起许多“上层建筑”性质的复杂的问题。在法国平均寿命增加了，出生率低落了，又必须开动很多和很复杂的生产机器，在今天就已经提出与民族问题密切有关的

一些问题：老一辈的人与同一民族文化的年青一辈的人发生越来越不正常的关系，而劳动群众周围却都是外国侨民分子，后者改变了他们的基础；也像在美国一样，已经开始出现一定的分工（要求熟练技术的工作，此外要求执行领导和组织职能的工作由本国居民来做，而不需要熟练技术的工作则由外侨去干）。

在一系列的国家里，在出生率低的工业城市与生殖力大的乡村之间也建立着同样的关系，但造成严重的违反经济的后果。从事工业的工作要求有预先一般的准备，要求一种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适应一定劳动、饮食和居住条件以及一定风俗习惯等等的过程。这些必须培养，不是天赋的，不是"天生"的，可是个人获得的城市的习性则代代相传，或者在幼年和青年时期就养成了。这样一来，城市中低下的出生率要求经常和认真花费人力物力去教育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新的群众，这样就造成城市社会-政治成份的经常改变，每次都在新的基础上提出领导权问题。

与性的问题有关的最重要的公民道德问题就是新女性的养成问题：在妇女不仅没有在男权面前获得真正独立，而且对自己和自己在性的关系中的地位没有确立新的观点以前，性的问题依然保存着自己的一切不健康的性质，因而每次在立法上采取新措施时，必须抱着谨慎小心的态度。在性的关系方面任何摆脱片面的强制性就会造成"浪漫主义的"荒淫无度，由于合法的和有组织的卖淫的取消就更会变本加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一切对于性的问题的节制，使得一切建立符合新的生产方法和劳动方法的性的道德的企图复杂起来和困难起来。另一方面，沿着这种节制和建立新道德的方向前进是必要的。应该注意的是工业家（尤其是福特）很关心自己工作人员的性的关系，并一般地关心他们家庭生活的安排情况。不能被这种关心所披着的"清教主义"外衣（正如实行禁酒法的场合）引入迷途：真理在于生产和劳动合理化所要求的

新型人物，在性的本能没有得到相应的调节以前，没有像其余的一切问题得到合理化以前，是不能发展的。

“兽性”和工业主义

工业主义的历史表明，它向来是(而现在则更为明确)经常反对人身里面的“兽的”本性，是用经常新规定的越来越复杂的和越来越严厉的标准以及经过调整的确实而严密的习惯来控制本能(自然的，也就是兽性的和原始的)的连续的、往往是痛苦的和流血的过程。这些标准和习惯使得越来越复杂的集体生活形式的出现成为可能，而这些形式是工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斗争是从外面强加上来的，而在这种斗争中所获得的结果，尽管具有很大的直接的实际价值，直到现在大部分具有纯粹的机械的性质—它们成了“第二本性”。但是难道在同旧事物进行斗争时期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一定时间内不是机械压迫的结果吗？要知道即使到现在也必须予以克服的还有太多的“兽性的”本能，在事实上比起以前的、更为原始的本能来是很大的进步。有谁能够算清人们为了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的、农业生活而付出的“代价”呢？这种代价表现在人的生活中和由于这种对本能的压制所造成的痛苦中。对于农奴制度和手工生产的早期形式也可以这样说。直到现在，每次生活方式的改换，都是通过残酷的强制，通过树立一个社会集团对社会一切生产力量的统治而实现的。遴选或“造就”适合于新型文明的、也就是适合于新的生产和劳动形式的人，势必带有空前的残酷性，势必把一些能力弱的和不驯服的人投到社会的“沉渊”，或完全消灭。每次在新型文明得势的时候，或者在它发展的过程中，都要有一个痛苦的转变的时期。但是，陷入这种危机的是哪些人呢？不是劳动群众，而是中等阶级和同样感受到暴力压迫

的统治阶级本身的一部分；这种暴力压迫必然是遍及整个社会舞台的。道德败坏的时期是很多的：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过这样的时期。

在整个社会都感受到暴力压迫（在奴隶制度消灭和基督教出现以后特别感受到了这一点）的时期中，清教的思想意识发展了，它们赋予暴力的运用以说服和协议的外表形式。但是到了效果已经达到的时候，哪怕不是充分地，这种压迫就停止下来（在历史上这种转变自然以最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这种压迫向来都采取了独特的形式，往往体现于单独的个人中：它有时在宗教运动的外衣下发动，它有时在某些等级和帮派中间建立了自己的机关，有时采用克伦威尔之名，有时采用路易十五之名等等），于是道德败坏时期来到了（当然，路易十五死后的法国危机，不能同比如罗斯福上台后的美国危机相比，而禁酒法及与其同时发生的强盗抢掠之风以及其他现象在以前各个时代中都找不到相似的前例），但是它只是表面地、间接地损害劳动群众，使他们的妻女败坏。事实上，这些群众要么已经有了新生活方式下和新劳动制度下所必需的技能和习惯，要么就是在满足自己生存起码的要求时继续感觉到暴力的压迫（要知道禁酒法并不是由于工人的愿望而取消的，而走私和抢掠所带来的贪污受贿等行为则盛行于上层阶级当中）。

在战后时期，显露出了就其范围和深度来看是空前的道德堕落，但是它的作用是为了反对那种并非旨在造成符合劳动新形式的习惯，而是由于一种其临时性和暂时性已很明显的必要性一前线生活、战壕生活的必要性硬予实行的强制形式。尤其是这种必要性表现在压制广大青年群众甚至是正常的性的本能上，而那样多的男子的消失以及两性人数的经常悬殊，使得在恢复正常生活时期中所爆发的危机变得特别残酷了。与性的生活有关的规章制度受到强烈的震动，于是在性的问题上启蒙运动的空想的新形式

开始发展起来。危机（到现在还有）之所以变得更为残酷，因为这个危机损害了所有阶层的居民，并且与当时取得了地位的新的劳动方法（泰罗制和一般的合理化）的要求发生了冲突。这些新的方法要求性的本能（神精系统）服从严酷的纪律，换句话说，要求巩固广义的“家庭”（而不是那种或这种家庭组织），要求加强性的关系的节制和固定。

应该坚决认定一点，即在性的关系方面最腐朽的和最“退步的”思想因素是在与生产劳动没有密切联系的阶级中间所盛行的并对劳动者阶级产生有害影响的主张感情自由的启蒙学派的理论、对行为放纵的鼓吹。这一因素的危险性在那个劳动群众不再感受上层阶级的强力压迫的国家里要严重得多，因为劳动群众在这里必须通过互相劝说的方法或通过个人提出意见和个人接受意见的方法养成与新的劳动方法和新的生产方法有联系的新的心理生理的本领和习惯。可能形成“双层底”的情况，即可能在承认新的要求的“口头上的”意识形态与阻碍纯粹在身体上养成新的本领的实在的“兽性的”实践之间发生内部冲突。在这种场合下所造成的情况，可以称为普遍的社会伪善的情况。为什么是普遍的？在其他情况下人民阶层被迫奉行“美德”。宣传美德的却不遵守美德，尽管在口头上大事宣扬，因而这是一个等级的伪善，而不是普遍的伪善。当然，这种情况不能继续很久，而会导致道德败坏状态；但这是在“美德”已经在群众中变成经常的或几乎是经常的习惯的时候，也就是在这种习惯下败坏“美德”的事越来越少的时候。在没有上层阶级的强力压迫的场合下，一般地确立起“美德”来。这种美德无论在说服教育下，或是在强制下都没有遵守，因此也就不能养成新的劳动方法所必需的心理生理的习惯。危机可以成为前途极为可怕的“不断的”危机，因为只有强制才能停止它，而且是新型的强制，因为这种强制既然可以由一个阶级的杰出人物对自

己的阶级实行，它就不能是别的，而是自我强制，也就是自我约束（强迫别人把自己绑在椅子上的阿尔菲耶里[①]）。无论如何，唯一可以同这种杰出人物的职能相对立的一这就是在性的关系范围内的启蒙学派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与这种理论进行斗争也就恰好意味着造就解决历史任务所必需的杰出人物，或者至少把他们发展到能使他们的职能普及到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的那种程度。

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

据我看，关于列昂·达维多维[②]的倾向同这些问题有密切联系这一点没有十分清楚地阐明。从这一观点看来，他的倾向的基本内容是"过份"坚决地（从而是非合理化地）希望在国家生活中把工业和工业方法摆得高于一切，以外部的和强制的手段加速生产中纪律和秩序的建立，使道德符合劳动的需要。假如考虑到与这种倾向有关的一切问题的一般提法，就会看得很清楚，这种倾向必不可免地要流为波拿巴主义的一定形式。由此而产生了对它进行坚决斗争的不可动摇的必要性。他的顾虑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所做出来的决定是极端错误的。危险的根源就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之中，而这种危险早先在1921年就已经感觉到。在劳动和生产组织中实行直接的或间接的强制原则是对的，但是他所采取的形式却是错误的：军事的样式成了命定的偏见，而劳动大军遭到破产。列昂·达维多维对美国主义的兴趣；他的关于"日常生活"[③]

---

① 阿尔菲耶里·维多里奥（1749—1803）——意大利大诗人和作家，意大利古典悲剧的创造者。在他的《阿尔菲耶里·维多里奥生平自述》里，他写道，为了使自己能养成勤奋和热爱工作的习惯，他命令别人把他绑在椅子上。——俄文版编者

② 列夫·达维多维奇·布朗施坦，即托洛茨基。——意文版编者

③ 原本上俄语用拉丁文拼写为"byt"。——译者

和文学的论文和研究著作；生活的这些领域彼此之间的联系比看上去要大，因为新的劳动方法与一定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和世界观是分不开的；不在另一方面获得显著效果，就不能在这一方面达到成功。美国的劳动合理化与禁酒法毫无疑意是彼此互相联系着的，工业家对工人的精神生活的监督，某些企业中为了检查工人的"道德"而成立的检查处都是新的劳动方法的要求所造成的。凡是讥笑这些创举(即使垮了台的)的人，凡是认为这些创举只是"清教的"伪善的表现的人，就会为自己杜塞了理解美国的现象的重要性、意义和*客观作用*的任何可能性，而这种现象也是直到目前为止所完成的旨在以空前的速度并通过历史上罕见的对最终目的的认识来创造新型的工作者和人的集体努力之中的最大的一种努力。凡是记住泰罗关于"受过训练的猩猩"的说法的人，对于这种"对最终目的的认识"至少会觉得滑稽可笑。泰罗的确极端恬不知耻地表达了美国社会的目的：在劳动者中间发展机器的和自动的技能至于最大程度，打破要求一定程度地发挥劳动者智力、幻想和主动精神的熟练和专业劳动的旧的心理生理关系，把一切生产作业都归结到它们的体力和机器的一面。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任何独创的新东西，这里所讲的只不过是自有工业主义以来就已经开始了的漫长过程的一个最新阶段，——这一阶段所不同于以前各个阶段的是具有很大的紧张性，而且表现的形式更为粗野。这一阶段也将随着不同于以前类型的而且无疑比它们*更高*的新的心理生理关系的造成而被打破。一种强制的淘汰将是不可免的：旧的劳动阶级的某一部分将无情地被排挤出劳动范围，或许将被根本从生活中勾消。

正好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去研究福特类型的美国工业家的"清教徒的"措施。当然，他们并不关心"人道"，并不关心直接遭到破坏的劳动者的精神需要。这种"人道"和这些"精神需要"只能在

劳动和生产世界实现，在生产的“创造”中实现。它们曾经在手工艺者，“造物主”身上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扬，因为这时候工作者的个性完全反映在他所制造的东西上面，因为当时劳动与艺术之间的联系还很坚固。可是最新的工业主义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人道主义”。“清教徒的”措施仅仅追求着一个目的—在劳动活动范围以外保持一种心理生理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允许剧烈地消耗为新的生产方法所压榨的劳动者的身体。这种平衡当然是纯粹外表的和机械的，但是这种平衡也可能为内部的，假如它不是从外面强加上来的，而是劳动者本人、新的社会形式利用适当的独特的手段提议建立的话。美国的工业家所关心的是保持工作者经常的体力效能，保持他的肌肉的和神经的作用；他的利益是有一个稳定的集体，经常的和在劳动中协调一致的工人集体，因为企业中的人的集体（集体工作者）一也是一种机器，不能为了更新另件而过于频繁地拆卸它，因为这难免对它造成重大损失。

所谓高工资就是这种必要性所决定的一种因素：它是选拔适應于劳动和生产制度的集体的工具，也是保持这个集体的稳定性的工具。但是实行高工资是有其利必有其弊的事：需要工作者“合理地”花费更多的钱来维持和更新自己，并且尽可能地加强自己肌肉和神经的工作能力，而不是为了破坏和损毁它。于是反对酗酒这种破坏劳动力的最危险的原因就成了国家的职责。可能其他各种“清教徒的”斗争也要成为国家的职责，假如工业家私人的提倡已觉不足，或者在劳动群众中已产生过份深刻的和广泛的道德危机，而这种危机由于长期的和规模较大的失业是会发生的。

性的问题也是同酗酒问题相联系的：过滥地和不正规地消耗性的机能是继酗酒之后为神经能力的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大家都知道，“激烈的”劳动能引起酗酒和性的荒淫无度。福特所采取的利用特别视察人员去干预自己工人的私生活以及监督他们怎样使

用自己的工资和怎样安排生活的企图，是那些目前仍属“私人的”和隐蔽的倾向的表征，而这些倾向到了一定时机会成为与传统清教主义相配合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做为“真正的”美国主义开路先锋的道德的恢复而出现。但是必须从美国的实例中做出最重要的结论（因为所讲的正是这些表现），一这就是在劳动者道德习惯与上层居民的道德习惯之间所形成的并且在往后将更清楚地显现出来。

禁酒法已经表明了这种决裂的例子。是谁喝用了私运到美国来的酒精饮料呢？酒精饮料成了昂贵的奢侈品，而广大劳动群众一甚至有最高工资收入的一没有能力享受这些饮料。凡是按照严格规定的劳动日去劳动以领取工资的人，既没有工夫去寻找酒精饮料，更没有工夫去玩耍作乐和规避法律。这种看法也适用于性方面的寻欢作乐。“追逐女人”须要很多的时间。产生于乡村农民身上的东西在新型的工人身上就会以另外一种形式重复着。农民的性的结合的相对稳定性是与农村劳动制度密切相联系着的。农民在漫长的一天劳动以后，晚间回到家里，他所要的是诗人贺拉西所吟咏的“Veneren Facilem parabilemque”①，他不喜欢同朝三暮四的女人去甜言蜜语，他爱自己的妻子，可靠的、始终如一的妻子。她在丈夫要占有她的时候不会装腔作势，不会演成诱惑或强奸的喜剧。这样一来，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以为性的机能成为机械化的了，然而在事实上是产生了一种性的结合的新形式——没有小资产者和游手好闲放荡不羁的名士派代表人物的浪漫主义虚情假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显然，新的工业主义须要一夫一妻制，要求劳动的人不要胡乱地和兴之所至地去寻求一时的性的满足以损费自己的精力。夜里“纵饮”的工人，白天到工作岗

① 可爱的、亲密的和可接近的（拉丁语）。贺拉西（Quinto Horatius Flaccus 纪元前65—8）系罗马抒情诗人和讽刺作家。——译者

位上不会是好工人；感情兴奋同那种与最完善的自动化机构有联系的时间准确测定的生产运动相抵触。这一套施加于群众的直接和间接的压力和强制无疑要产生自己的结果，因而也就产生性的结合的新形式，这种结合的特点和要点显然必定是一夫一妻制和相对的稳定性。

了解一下美国官方所宣传的有关违反性道德的统计资料，并按社会集团加以分析，是很有意思的，整个来看，会令人觉得在上层阶级中离婚的人数特别多。劳动群众与领导阶级越来越多的分子之间这种道德上的分歧，是美国最值得注意的和可以产生严重后果的现象之一。在不久以前，美国人民是劳动的人民，"热爱劳动的天赋"是不仅一个工人阶级所固有的特点，而且也是领导阶级的专有特点。百万富翁在疾病或衰老迫使他去休息以前一直继续实际操劳，而且在他一天的生活中工作要占去许多小时，——这就是典型的美国现象之一，这就是一个普通欧洲人心目中的最反常的美国作风。上面已经提过，美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这种差别是由于美国缺少"传统"使然的，因为传统同样也就是一切离开历史舞台的社会形式的消极残余。相反地，美国的拓荒者的"传统"犹新，也就是强有力人物的"传统"犹新，这些人物的"热爱劳动的天赋"达到最大的紧张程度和强而有力一这些人物不是通过仆从和奴隶大军，而是直接地同自然力量精力充沛地接触的，为的是征服和胜利地利用这些自然力量。因而这些消极的残余也就在欧洲反抗美国主义（"他们代表一定的生活方式等等"），因为他们本能地感觉到新的劳动和生产形式会无情地把他们一扫而光。但是，假如旧的还未埋葬的欧洲的破烂东西将这样被坚决地消灭掉是对的话，那么在美国本土将要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上面提到的道德的分歧表明：社会中积累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的消极成份。显然在这种现象中妇女起着主要的作用。工业家即使成了亿万富翁，

他依然继续工作，但是他的妻女却都逐渐变成"奢侈的哺乳动物"。在世界范围内挑选美女模特并公之于世的美女比赛，电影比赛(回忆一下1926年曾有意大利少女三万人将穿浴衣照的像片寄往福克斯影片公司)，以及剧团等等引起了卖淫的思想方式，而上层阶级的"买卖女白奴"的行为在合法地进行。游手好闲的女子往往远渡重洋前往欧洲，逃避本国现行的禁酒法，并进行"短期结婚"(只要回忆一下美国的船长被取消了在船上的证婚权，因为许多夫妇在欧洲上船后结婚，又在美国下船前离婚)。实际的卖淫到处泛滥，表面上勉强掩盖着薄薄的一层法律手续的外衣。

由于上层阶级所固有的这些现象，为了使劳动群众适应新的工业的需要而对他们施加的强制越来越难于实行了；无论如何，这些现象决定了心理上的分裂，并加速了社会集团形成和充实的过程，使得它们变为帮会则更为明显，正如在欧洲已经发生的情况一样。

泰罗制和劳动者的机械化

对于似乎为泰罗制所制约的分歧—手工劳动与劳动的"人的内容"之间的分歧，可以根据过去的例子，恰好是可以根据被认为是最"须要智力的"职业的例子，也就是同为了印刷或其他形式的传播和传达而复制原文有关的职业的例子，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抄写工(在发明印刷以前)，手工排字工人，打字排字机工人，速记员和打字员。假如思索一下，就会明白，在这些职业中适应和机械化过程要比其他职业困难。为什么？因为在这些职业中很难达到最大限度的专业的熟练程度，因为这种熟练程度要求工人"忘掉"的复制的原文的知识内容或者不去思索它，而把自己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每个字母的书写形式上(假如他是抄写工的话)，或者集

中在把整个句子分为"抽象的"单词，再把单词分为所要排的铅字字母，很迅速地在铅字盘里找到所需要的那块铅。或者把某段讲话的上下文分开，但已经不分为单词，而分为词组，再机械地把它们联结成为速记符号，或者在打字中达到最大速度，等等。工人对原文知识内容的兴趣是由他的造成的舛误来测量的，对原文知识内容的兴趣也就是他的职业上的缺点：衡量他的熟练程度的标准就是对内容恰好在理智上不关心，就是他的"机械化"。中世纪的抄写工由于关心所抄写的原文，往往改变了它的写法，它的字法和句法，漏掉了他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低而不能理解的整个句子；由于对原文的兴趣而引起的思路迫使他把自己的解释和告读者的话加到原文里面去了。假如他的语言或方言与原文的语言不同，他就会加入一些错误的语言意味。他不能算是好的抄写工，因为在实际上他"改写"了原文。中世纪书写艺术所固有的过程缓慢性可以说明许多这样的缺点；有过多的时间可以思索，从而"机械化"就要比较困难。印刷工人则必须动作非常迅速，他的手和眼必须经常运动，这样就易于使他机械化了。这一类的劳动者为了把印刷符号同原文的有时是很引人入胜的（在这种场合下工作确实进行得较差）知识内容分开而专门注意后者所必须做的努力——假如仔细地思考一下，这种努力也就是这种职业所能要求的最大的努力。无论如何，这种努力一直在做而且也没有在精神上使人感到极大痛苦。一旦适应过程完成，在事实上工人的脑子原来不仅没有木乃伊化和枯竭，反而达到完全自由的状态。完全机械化了的只是身体的姿势。归结为以很紧张的速度重复着的简单的姿势的职业记忆力、行业记忆力，其"基础"是神经节和肌肉节，而脑子则被解脱出来进行其他思维活动。正如一个人走路并不须要考虑按照走路所必须的一定次序去同时转动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样，工业中基本职业运动也不须要思考而进行着（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而且今后

也将要发生)；一个人可以自动地走路，同时又可以任意思考。美国工业家很清楚地理解这种以新的工业方法的本质为根源的辩证关系。他们理解“受过训练的猩猩”——这不过是一句话，而过人则“对不起”，依然是人，他们甚至理解到在劳动时间他思考得更多，或最低限度有更多的可能去思考，假如他已经克服了适应的危机而没有被这危机所摧毁。不过工人不仅思考，他觉得劳动不能给予他直接的满足，于是他理解到别人想要把他引进受过训练的猩猩的状态中去，而这就会迫使他坠入不大能使他保持他的驯服性的思考。工业家很忧虑这一点，这可以从福特的书和〔安德烈〕菲力普的著作中所提到的一系列的预防办法和“教育”措施看得出来。

高 工 资

可以十分自然地设想，所谓高工资是劳动报酬中的一种临时现象。适应新的劳动和生产方法不能仅仅通过社会强制来进行，在欧洲，特别在日本很流行的“成见”也恰好就在这里。在这些地方这种成见无疑会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立即造成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这种“成见”是完全与战后发生的普遍失业相联系的。假如局势“正常”，则为了达到预期效果所必须的强制机关，其费用要比高工资贵。因此必须考虑设法使强制同说服和自愿同意配合起来。这一点在各该社会所固有的形式中可以借助于给予较多报酬的方法达到。这种报酬能保持足以维持和补充为新型劳动所消耗的体力的一定的生活水平。但是一旦新的劳动方法和生产方法传播开来并成为普遍的时候，一旦新型工人到处都形成起来，而物质生产机关更为完善了的时候，则过份的 turnover① 将自动地被广

① 这里是指用其他较为完善的生产方法来代替现有的生产方法而言。——译者

泛的失业限制住，而高工资也就随之消灭。在事实上，美国实行高工资的工业享有采用新方法的专利权。垄断的工资与垄断的利润相适应。但是这种专利权在开始时必然受到限制，以后随着美国内部和国外（同日本的商品价格低廉现象相比）的新方法的普及而被消灭，而利润一经拉平，高工资亦将消灭。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高工资必然与工人贵族相联系，而不是付给所有美国劳动者的。

福特的整个高工资思想体系是由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的现代工业的客观需要所产生的现象，这不是最初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必要去研究这种思想体系的意义和这种思想体系本身所能起的作用）。同时，“高工资”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福特的工资仅仅比美国工资的平均水平高呢，还是它作为福特工厂劳动者由于福特劳动方法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劳动力的价格而高呢？看来，这种研究谁也未曾系统地做过，可是要知道只有这种研究才能提供最后的答案。这项研究是困难的，可是这种困难的原因本身就是间接的答案。答案之所以困难，因为福特的生产集体很不稳定，因此也就不可能确定福特工人的平均的“合理的”死亡率，以便把它拿来同其他工业企业中的平均死亡率相比。但是这种不稳定性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工人宁肯接受“较低的”工资，而不愿接受福特所给的工资呢？这不是表明所谓“高工资”反不如其他企业中最低工资能恢复所消耗的劳动力呢？生产集体的流动性证明凡是涉及福特工业的工人中间，竞赛（工资的差别）的正常条件只在一定限度内产生自己的作用。平均工资的各种不同水平的作用是没有效果的，失业后备军的压力也是没有效果的。这说明在福特工业中应该寻找一种新的因素，这种因素将成为“高工资”和其他上述现象（流动性等等）的实在根源。这种因素只有在下列情况中才能找到：福特工业要求自己的工人有其余工业尚未要求的分工和

熟练程度；福特工业要求一种新型的熟练程度，一种消耗劳动力的形式，一种在同样的平均时间内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辛苦劳累，都更为使人疲惫的劳动力的消耗量，这些在现存社会所提供的条件下不能以工资完全补偿，不能以工资恢复。我们提出这些道理以后，就碰到一个问题：福特类型的工业，福特的劳动和生产组织是不是“合理的”呢？换句话说，它们可以不可以和须要不须要成为普遍的呢，或者这都是一些有害的现象，应该通过工会和立法对它们进行斗争呢？换句话说，是否可能利用社会和国家的物质和道德压力，强迫做为群众的工人耐心地忍受整个心理生理变态的过程，以便使普通类型的福特工人成为普通类型的现代工人，或者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造成人类身体上的退化和恶化，随之而来的是一切劳动力的消灭。可能有这样的答复：福特方法是“合理的”，也就是它应该成为普遍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社会条件必定发生变化，个人的道德和习惯必定发生变化，这不能只用一种“强制性”来达到，而只能以强制的缓和（自我约束）和说服来达到，包括高工资的形式在内，也就是包括更高的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在内，或者也许可以更确切一些说，包括实现符合要求特别消耗肌肉和神经能力的劳动和生产的新方法的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在内。

在某些“非福特主义化的”工业部门里或在个别企业中过去和现在都显露出一些与被福特主义在这种范围内所决定的现象相似的现象，尽管在程度上有限，但依然相当显著。建立有组织的在劳动中协调一致的工厂的集体，或者具有专业知识的工作队，从来不是很简单的事；工厂的集体或工作队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就要给自己的成员——或者其中一部分——一种便宜，即不仅能领取垄断的工资，而且在生产临时停顿的场合下也不会被辞退；允许费了很大工夫才建立起来的有组织的整体的分子散伙，是不经济的，因为要想

把他们重新结合到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要借助新的、临时找来的分子以恢复集体就要耗费不少的人力和物力。这一点正好就是由后备军和失业所决定的竞争规律产生效力的限度。而且这种限度向来是与享有特权的贵族的形成相毗邻的。由于向来没有而且现在也没有一种使一定工业部门的所有企业的劳动和生产制度和方法均等的完备的法规，所以每一家企业在一定的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是“独特的”，它会为自己建立能掌握这个单独企业所独具的熟练程度的集体：它有一些秘密的劳动和生产方法，它施展各种各样的“手法”和巧计。这些东西本身看上去是完全微不足道的，但是它们一旦被无休止地反复使用起来，也会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码头劳动的组织是个特殊的研究对象，特别是那些装货量与卸货量彼此悬殊以及有淡季与旺季区分的码头。在这些地方，必须随时有可供支配（即离劳动地点不远）以完成最少的淡季工作或其他工作的集体，因此就形成了一类领取高工资并享受其他特权待遇的、与“季节工人”群众完全不同的专用骨干人员。在农业中长期佃农与雇农之间的关系上以及由于生产本身特殊性而（例如，在服装部门中）产生“淡季”或者由于批发商业组织得不好（即不能配合生产部门的周期，而只根据自己的周期进货）而产生“淡季”的许多部门中，也会有这种现象产生。

股票、债券、国家有价证券

假如当前的经济萧条再继续若干时期，而这看上去是很可能的，那么会在中小储蓄的方针上造成什么样的根本改变呢？可以看出的是：市场上股票跌价造成了不可估计的财富的转移，以及所有各国，特别是美国广大居民群众的积蓄“同时”被征用的现象；在一系列的国家内又恢复了战后最初几年通货膨胀所引起的那种痛

苦的过程；这种过程也把那些在前一个时期没有发生过通货膨胀的国家卷进去了。意大利政府在这几年来所巩固下来的制度（继续已经有的传统，尽管范围比较小）是最合理的和根本的（至少对一些国家来说是如此）。但是它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在普通股票与优先股票之间，在股票与债券之间，在自由市场股票和债券与公债券或有价证券之间存在着差别。大批储户都力图完全摆脱各种空前贬值的股票；他们宁愿要债券而不要股票，宁愿要国家有价证券，而不要任何其他形式的储蓄。可以这样说，大批储户想要同私人资本主义体系断绝一切直接关系，但却相信国家；他们想要参加经济活动，但是通过国家，因为国家可以保证给他们以一些有节制的，但可靠的利息。因此，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头等职能都赋予了国家，而国家好象变成一种企业（国家控股公司 holding company），把储蓄集中起来，以便供给工业、私人企业使用，做长期投资和一般期限的投资（在意大利成立各种"动产信用"银行，工业建设银行等等，改组"商业银行"，加强并成立新形式的储蓄部等等）。但是在国家一旦由于刻不容缓的经济需要而担负起这项职能的时候，国家可以不关心组织生产和商品交换吗？能象从前一样放任不管，随它去竞争和受私人摆布吗？假使当真如此的话，那么目前对私人工业和贸易所表现的不信任也会扩及到国家。如果形成这样一种情况，迫使国家贬低自己有价证券的价格（通过通货膨胀或其他形式），象私人股票贬值一样，这就将意味着整个社会－经济组织的崩溃。因此，国家根据必要就不得不进行干涉，以便检查通过它所进行的投资在使用上是否妥善。这样至少可以明白关于团体制度的理论辩论的一面。但是只有一种检查是不够的。在事实上，问题并不是保持生产机构当前所具有的局面，问题在于改组它，以便配合居民的增加和集体需要的增加而发展它。由私人主办的最大的危险性恰好就在这种必不可免的发展上，因而国家的

干涉必须更多一些，尽管这种干涉也决没有摆脱危险。

我所指出的这些事实是最主要的和最根本的，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它们造成国家的干涉或者在理论上证实这种干涉的正确性，加强关税制度，加强自给自足倾向，奖励、倾销，挽救处于破产威胁下的或者摇摇欲坠的大企业，也就是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亏本和工业赤字国有化”等等。

假使国家为自己提出了建立一种能使储蓄的积累以寄生阶级的“职能”变成生产机构本身的职能的这种经济领导的任务，则这些假定的发展方向就会是进步的；它们很可能成为包括一切的合理化的广泛计划的一部分。为了这样，必须实现土地改革（取消做为非劳动阶级利息的地租，并把这种地租放到生产机构里面去做为集体储蓄，可以用来改造和继续扩充生产）和工业改革，以便使一切收入都能供应工业的技术上的机能的需要，而不要做为今后由纯粹的所有权产生的诉讼的根据。

从这一系列的要求（不过，这些要求并非始终都是被承认的）可以产生对所谓团体倾向的历史的辩解；这些倾向主要表现在对那被理解为一种绝对的东西，理解为一种对资本主义传统形式的不信任和敌视的表现的一般国家的赞扬上。因此，在理论上“小人物”和知识分子应该构成国家的社会政治基础；但是在实际上，它依然以财阀做为基础，而且不能与大的财政资本断绝关系；国家本身毕竟成为最大的财阀机构，成为小资本家大量储蓄的持有者。（引用巴拉圭耶稣会国家做为许多现代倾向的范例是有好处的。）在政治上同时以财阀和小人物为基础的国家能够存在，这一事实并不是那样矛盾的，而且像法国这样典型的国家也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财政资本在法国的统治如果没有它在小的以利息为生者和农民中间的民主人士做为政治基础，就恰好是不可理解的。法国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毕竟具有还相当健全的社会成份，因为在

那里中小地产有广泛的基础。至于其他国家，则储蓄所有者是脱离劳动和生产世界的。这些国家的积累“从社会来看”其代价是过高的，因为它是以工业特别是农业工人的过份低下的生活水平为代价而造成的。假使新的信用机构把这种局面巩固下来，在实际上就会恶化：寄生性的积累由于有了国家的保证，甚至连正常市场上的普通风险也蒙受不到，一方面会导致寄生性的地产的加强，另一方面也会使工业债券（其红利有保证有限制）更为残酷地压榨劳动。

美国的文明与欧洲的文明

路易吉·皮兰德罗在同柯拉多·阿尔瓦洛的一次谈话（1929年4月14日《意大利文学》）中断言：“美国主义把我们束缚住了。我想在大洋彼岸已经燃起了新的文明的灯塔。”“流通于全世界的钱——都是美国的钱(?!)，随着这些钱(!)而来的是生活方式和文化〔这对于漂浮在社会表面的泡沫来说是对的，可是根据皮兰德罗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意见，由这样的世界主义的泡沫也就构成了“整个世界”〕。美国有没有自己的文化？〔本应该这样问：它有没有统一的和集中的文化，也就是美国是不是法国、德国和英国类型的国家？〕它有书籍和习俗。习俗——这就是它的新的文学，就是那种透过了最狭窄的和防护得很严密的门户的文学。在柏林你感觉不到旧的与新的欧洲之间的分裂，因为城市结构本身不做抵制。〔今天皮兰德罗已经不会再讲同样的话了，就是说他的意见应该理解为是对夜咖啡店的柏林而发的。〕在巴黎由于存在有历史的和艺术的传统，由于有本土文明的证据，所以美国主义看上去是惹人注目的，好像一个卖弄风情的老妇脸上的胭脂。”

但是问题完全不在于美国有没有新的文明，新的文化，哪怕还

处于"灯塔"阶段，以及它们是否在欧洲泛滥或者已经在欧洲泛滥。假使问题是这样提出的话，那么答复就会是很简单的：不，没有。不仅如此，美国只不过是反刍旧的欧洲文化。问题在于：美国能不能（或者它已经在做）以自己经济生产（也就是间接地）的无情的压力迫使欧洲在它那过份陈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反正是要发生的，不过速度较为缓慢而已，可是这时这种改革则已经直接地做为美国"万能"的反作用而出现了。换句话说，是否发生了欧洲文明物质基础改造过程，并且这种过程在今后长期发展中（而且这种过程甚至不是很长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比过去的时期发生得快）就要造成现有文明形式的改革和新文明的强制的诞生呢？

当前在美国商标下流行的"新文化"，"新生活方式"的因素，——这只是最初步的试探性的企图，这些企图根本不是新的和还没有完全形成起来的结构所产生的"制度"决定的，而是那些开始感觉自己在社会上已被新的、正在形成中的结构的活动（暂时是破坏的和瓦解的）所代替的因素表面的和纯粹模仿性的倡议决定的。当前被认为"美国主义"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那些将被新的可能的制度摧毁和已经成为社会恐慌、瓦解、绝望浪潮的牺牲品的旧的阶层的先发制人的批评。这是那些没有能力自我改造并努力利用改革的缺点做为支柱的人们的没有意识到的反应的表现。决不能期待在新的制度下"必遭灭亡的"社会集团的改造，而只能期待那些忍受痛苦并完成所担负的职责而从事创建这种新制度物质基础的人的改造；他们"应该"找到"独特的"，而非美国型式的生活方式，以便把目前是"必然性"的东西变成"自由"。

有一种准则，即对新生产方法的确立所产生的精神和道德的反应，在同样的程度上一如对美国主义的表面上的赞扬，都是来自那些瓦解中的阶层的残余，而非来自其命运与新方法今后发展相

联系的那些集团，一这个准则极端重要；它说明了为什么某些对现代政治负责和把自己的成就建筑在组织整个中等阶层上的分子不愿占有明确的立场，而宁愿保持“理论上的”中立，以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传统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比较一下想要把乡村“都市化”的乌哥·斯皮里托和其他总是吹排箫的经济学家怎样各自不同地解释“乡村化”）。

关于我们所谈到的美国主义（如果不仅把它理解为饭店的习俗，而且也把它理解为“扶轮社”的意识形态的话）并不是什么新型的文明这一点，从主要集团的性质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毫无改变就可以看得出来：所涉及的是在美国气候下不过取得了一层新的皮肤的欧洲文明的有机的延长和强化。皮兰德罗关于美国主义在巴黎（可是在克勒索① 怎么样呢？）遭到抵制和在柏林似乎受到直接款待的意见证明：无论如何，美国主义与“欧洲主义”的区别不在本质上，而只在程度上。柏林中等阶级已经因战争和通货膨胀而破产，而整个柏林工业则具有不同于巴黎工业的完全另一种性质；法国中等阶级既没有遭受到德国通货膨胀型式的整个一系列的短期危机，而在遭受1929年严重危机时，也不像德国所遭受的那样急速。因此，美国主义在巴黎看上去像是一片胭脂，像是表面的外来的时髦，这样的说法是对的。

① 克勒索是法国中部城市，法国军火和机器业最大的中心之一。——译者

第四部分　文化生活问题

I. 知识界和文化活动的组织

知识界的形成

知识界是自主的和独立的社会集团，还是一切社会集团具有知识界自己本身的、特别的范畴？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因为形成不同知识界范畴的真正历史过程，至今采取了不同的形式。

这些形式中的两种形式是显著的：

（1）所有社会集团，既产生于历来经济生产基础之上，也就同时有机地给自己造成一个或几个知识界阶层，这种阶层使知识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在社会政治领域具有其自身作用的同一性和意识，企业主-资本家和自己一道创造出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学专家学者，新文化、新法律等等的组织者，指出下面的事实是必要的：企业家也是社会高级产品，这种产品的特点是众所周知的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就是从事知识活动的能力）；他不仅应当在其活动和创举的直接范围中，而且应当在至少是接近经济生产的其他范围中具有某种技能（他应当是众人的组织者，是他的事业

的参加人、他的商品的买主等等"信任"的组织者)。

如果不是一切企业主，那末，至少是优秀的企业主，应当拥有一般社会、社会所有复杂服务机构直到国家机关组织者的能力（由于有必要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以扩大本阶级)，或者至少应当拥有选择《掌柜的》（专职人员）能力，把在一般企业界限外的相互关系方面的这种组织活动委托给他们。可以指出，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以创造并在自己逐步发展中形成的"有机的"知识界代表人物大部分是新阶级使之出现的新社会型基本活动各方面领域中的"专家"。①

封建老爷们也具有某种技术的能力（特别是在军事活动方面），正是从贵族在军事技术方面丧失垄断权的时候起，才使封建制度的危机开始。但是封建世界知识界的形成，也正如更早的希腊罗马世界一样，是一个应当独立研究的问题；这种形成和产生所走的道路，应该具体地予以研究。例如，应当指出，农民虽然在生产界也起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产生本身的"有机的"知识界，并且没有使任何一个"传统的"知识界阶层和自己"同化"，而其他社会集团却把许多知识分子—农民出身者纳入自己的队伍，因此，大部分传统的知识界是农民出身的。

（2）但是所有"重要的"社会集团，从作为其发展产物的以前的经济基础走向历史舞台时，至少在以前的历史中，能够找到早已诞生的知识界范畴，这是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证明，甚至社会的和政

① 莫斯克的《政治科学入门》〔Gaetano Mosca, Elementi di scienza politica〕（1923年增补新版）应在本标题下予以研究。莫斯克所谓"政治阶级"不外是居统治地位社会集团的知识界；莫斯克"政治阶级"的概念，应与帕烈托èlite（杰出人物）的概念近似，这种概念是说明知识界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对国家社会生活的作用的另外一个尝试。莫斯克的《政治科学入门》一书，是社会学的和实证论者性质的大杂烩，它具有大量的偏见，而这些偏见，是由政治的见解所直接决定的，因此就使这本书在文献方面说来，还是较少惹人讨厌的，并且是比较生动的。

治的形式最复杂而激烈的变化也不能违反的。

这类知识界最典型的就是教士，他们在漫长的时期中（在也具有这种垄断权部分特征的整个历史时代），篡夺了某些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的地位，宗教的意识形态，即当时的哲学与科学，包括学校、教养、道德、司法、慈善事业、社会救济等等在内。教徒的范畴，可以看做知识界的范畴，他是与土地贵族有机地联系起来的；它在法律上与贵族相等。它与贵族同样参加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也享有与所有制联系的国家特权。①

但是，教士② 在上层建筑范围内的垄断权，并不是不经过斗争而坚持的，也绝对不是无组织地保留的；其他范畴的产生（在各种不同的应当调查研究的形式上）也被以上情况所说明，而促进其他范畴发展的，是君主中央集权的加强，这种加强是专制制度所完成的。披着带有其自身特权的托加③ 的贵族的形成，行政人员等阶层的形成，就是这样逐渐来的；学者、理论家和哲学家——非教会服务人员等等也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在这些各种不同范畴的传统的知识界中，活跃着“行会的精神”，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连续不断的历史继承性，和自己“特殊的

---

① 当研究这个知识界的一种范畴时，也许是次于“教士”的最重要的范畴，因为这类知识界在早期社会中具有的威信和所起的社会作用，这就是广义的医生范畴，即是那些所有抗拒死亡和疾病而“斗争”或装模做样而“斗争”的人，这就需要利用阿尔杜尔·卡斯提利奥尼的《医学史》。想起来宗教与医学有联系，在某些地方至今还有联系；由于某些组织机能，医院操于教士之手，凡有医生的地方，也有神职人员（神灵咒语、各种慈善事业等等）。许多教会大牧师，甚至也是大“大内科医师”（或者办这样的事）——流传着直到死而复生奇迹的事。长期以来人们相信，就是国王也用手摸治病等等。

② 因此，在新拉丁语来源的或经受（通过教会拉丁文）这些语言强烈影响的许多语言中，“知识分子”或“专家”的公认概念，是产生于“chierico”（宗教界人）和它对应的“laico”（俗人），后者的意义是不学无术的人，不是专家。

③ 托加是古罗马的男长衣，以一块布从左肩搭过缠在身上。这里以披着带有特权的托加来象征贵族。——译者

本质”，所以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仿佛自动的，并且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这种“孤立的立场”免不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走得很远的后果：所有唯心主义哲学和这种知识界社会综合体所站的立场，很轻易地结合起来，并且被判定为社会乌托邦的表现，知识分子适应乌托邦，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自动的，具有自己的特点等等。

但是，应当指出，如果教皇和教会高级人员认为自己对耶稣和使徒比对元老安尼耶里和别延尼有更多的联系，那么，例如这对秦梯尔和克罗齐就没有关系了；克罗齐特别感觉到自己和亚里士多德及柏拉图有巩固的联系。但是他并不隐瞒他也和元老安尼耶里及别延尼有联系，而且也正是在后者之中找到克罗齐哲学最显著的特点。

“知识分子”概念“最大限度”界线是怎样呢？

可不可以找到一种统一的范畴，用以鉴定知识分子活动的所有不同的和单独的形式，同时用以决定这种活动和其他社会集团活动之间的本质的差别呢？

在我看来，最通行的方法论的错误，就是企图在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而不是相反，在各种关系体系的总和上找寻这种区别的标准，因为知识分子（以及从而他们所代表的集体）处于各种社会关系的一般的总体之中。实际上，例如，工人、无产阶级的显著特点，并不在于他从事手工劳动，而在于他是一定条件下，一定社会关系下，从事这种劳动（我们暂不考虑这种想法，即纯粹的体力劳动并不存在，甚至泰勒关于“驯化猩猩”的说法也是一种譬喻，指明某种方向上的极限；在任何体力工作，甚至最粗笨和最机械的工作中，也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技术熟练程度，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智力活动）。上面已经指出，企业家由于他执行的职能本身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具有智力性的熟练程度，可是企业家的社会面貌，不

是由智力性熟练程度所决定，而是一般的社会关系所决定，也正是社会关系说明了企业家在生产中的地位。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肯定说，一切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①。

实际上，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仅只在于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直接的社会作用方面，即是考虑特殊职业活动所在重心的方向——智力工作还是使用神经－肌肉力量。这就意味着如果可以说知识界，那末就不能说非知识界，因为非知识界并不存在。但是知识-脑力工作和使用神经-肌肉力量的关系本身，并不是常常一样的，因而有特殊智力活动的各种不同的阶段。所有智力干预可以排除的那种人类活动是没有的，homo faber 不能和 homo sapiens 分开②。最后，除自己的职业界限外，每个人都在发展某种智力活动，是“哲学家”、艺术家、具有一定兴趣的人，各有一定的世界观，从而对拥护或变更世界观，即是唤起新的思想方式，起着一定的作用。

因此，建立新的知识界阶层的问题，归结起来，是要使某种程度上每人所具有智力活动予以批判地改造，变更智力活动和神经-肌肉活动的比例关系，在新的水平上规定它们之间的平衡，而且要使神经－肌肉活动本身，成为新的和有目的的世界观的基础。因为神经－肌肉的活动是不断更新体力活动社会界的一般实践活动的要素。传统的和庸俗化的知识分子典型，可以看成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因此，自认为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的新闻记者，也把自己看成“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和工业劳动(那怕是最原始的和非熟练的工业劳动)关系密切的技术教育，应当形成知

① 例如，谈及谁给自己煎鸡蛋或谁缝补短上衣，并不是说谁就是炊事员或谁就是裁缝。

② 体力劳动的人不能和脑力劳动的人分开。——译者

识分子新型的基础。

《新秩序》周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工作的，它力图发展新知识论的某些形式，并规定新的概念，而这一点并不是它成功的最后原因，因为这样的提法符合隐蔽的愿望，而且与实际生活形式的发展协同一致。成为新的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并不是更加依赖于娓娓动听——外表上活跃一时的激奋与热情的媒介物，而是依赖于“不停地坚信事业”的——不仅是夸夸其谈的，而且是提高到抽象－数学精神的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实践生活积极的溶合；必须从劳动活动形式上的实践，推进到科学活动的实践以及历史的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没有这种世界观，就仅仅是一个“专家”，而不是一个“领导人”（专家＋政治家）。

由此可见，为实现知识界实际作用历史地形成人们专门化范畴，这是联系一切社会集团，特别是联系其中最重要社会集团形成的，并且要适应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发展，而加以最广泛和复杂的改造。在建立自己统治地位上发展着的每一集团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意识形态”上战胜传统知识界而斗争，——这个集团同时形成自己有机的知识界越有力，则同化与战胜的完成更加迅速，也更加有效。

从中世纪世界中崛起的社会上学校与教育－启蒙活动（广义上说）得到的大规模发展，表明当代世界知识界和被他们完成的职能，具有怎样的意义；正如以前人们企图加深和扩大任何个人的“知识性”一样，现在人们力图增大专业的数量，并使之更加完善。各级教育机关，直至负有推进所谓“高级文化”使命机关每一科学与技术部门中的教育，就是这样的结果。

学校是培养各级知识界的手段。各个不同国家知识界所完成的职能的复杂性，客观上可以用专门学校的数量及各级专门学校的人数来衡量：学校“分布区域”越广泛，学校“垂直阶梯”越多，则

一定国家的文化界、文明越复杂。工业生产范围中有个一定的比较尺度：用以衡量国家工业化的，是机器制造业的技术装备、制造机器与机器制造工业等等适用工具时采用的工具与最精密仪器的生产技术水平。拥有最优良设备为实验室制造仪器，并且为检验这些工具出产机器的国家，可以称之为工业技术方面最先进的国家、最文明的国家等等。由此可见，就是在培养知识分子和为此目的而成立专门学校，也可以比较。这里能够作为类似尺度的，是教育机构和学校的高度文化。尽可能更广泛地普及小学教育，和千方百计力图鼓励增加中学数量，不能不适应最严格的文化技术专门化。自然，为培养最高级的和不同知识专业工作者而建立更可能广泛基础的这种必要性——即是给予高度文化与高度技术以民主的结构——还不免具有困难；例如，发生广泛危机、知识界中等阶层失业的可能性，正如现代社会中，这种情况也实际上发生。

应当指出，在具体实际上知识界许多阶层，并不是在抽象民主基础上形成的，而是适应最具体的传统历史过程形成的。根据传统"产生"知识分子的那些阶层形成了，而这些阶层正是在"储存"中平平常常地专门化的那些阶层，也正是中小土地资产阶级以及中小城市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各种类型学校（古典的和职业的）在"经济"领域范围内不同的分布和这些阶层各种范畴不同的意向，决定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提供出各部门专家"产生"的形式。例如，意大利乡村资产阶级基本上"产生"国家官吏和自由职业者，而城市资产阶级优先"产生"工业技术人员；因此，北部意大利产生"技术人员"，而南部意大利产生官吏和自由职业者。

知识界与生产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决不是基本社会集团所具有的直接的相互关系；它们在各种程度上是全社会"中介"的结构，是上层建筑的综合，知识分子也就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家"。可以衡量各种知识界阶层"有机性"的程度，衡量它们和基本社会集团

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而从下到上纪录职能和上层建筑的顺序（从结构的基础到上面）。可以指出两个巨大的上层建筑"平面图"：一个平面图可以称之为"公民社会"，即俗称"部分"的有机体的总和；一个是"政治或国家社会"平面图，适应于这个平面图的，是全社会统治集团的"领导"职能和"直接统治"职能，或表现在国家活动和"合法"政府活动上指挥的职能。这些职能，正是有组织的和相互联系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就是：（1）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自由"同意基本统治集团所提供的社会生活方向——统治集团的威信（因而也就是给与统治集团的信任）"历史地"产生的同意，统治集团的地位及其在生产界的职能所规定的同意；（2）执行国家机关的强制作用，"合法地"加强对那些都不积极或消极"表示同意"的集团纪律；这些机关在预见当"自由"同意一旦消失时，指挥与管理有可能发生危机点，而为全社会建立的。

这样提出问题的结果，就是很大地扩充了知识分子的概念，但是，只有这个方法才能首先具体达到接近真理。这样的提出问题的方法大声疾呼反对等级的成见。当然，社会领导与国家统治同样的组织职能，给予一定社会职能，从而给予专业整个次第以地位，并且其中某些专业已经没有任何指示性或组织的使命；在社会和国家领导机构中，存在着一系列的职务，其使命是为了完成体力的和纯粹执行性的职能（这些职务的使命，是为了维持秩序，而不是为了提出想法或意见，是代理人的职务，而不是官吏或职员的职务等等）。但是做出这样的区别显然是必要的，也正如做出某些其他的区别是必要的。实际上，从智力活动内在的内容观点看来，也应该把这种活动按阶段划分，这些阶段——如果推到极限——提供真正的质量上的差别；应该摆在最高级阶段的，是各种不同科学、哲学、艺术等等的创造者；应该摆在最低级阶段的，是已经存在

的、传统的、前此积累的知识财富的"管理者"和推广者。①

现代世界知识界的范畴，在这样的理解它的时候，就极大地扩充了。现代社会的民主－官僚主义制度，产生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的存在，并不总是证明社会生产的需要，纵然对重要统治集团政治上需要是必然的话。罗里阿表述的非生产"工作者"概念从此开始(对谁和对何种生产是非生产的?)，如果考虑到这大批人滥用自己地位，以便从国民收入中提取巨款而占有的话，这种概念可能部分是对的。这种知识界大规模地形成，无论在他们个人熟练程度上，无论在他们心理方面，都使个体标准化，并且也在所有其他标准化总量上，确定了同样的现象：引起保卫工会组织必要性的竞争、失业、学校的生产过剩(школьное перепроизводство)、移民等等。

城市型与乡村型知识界地位的差别

城市型的知识界是与工业一齐成长的，因而与工业的命运相联系。工业的作用可以与下级军官在军队中的作用相比拟：在制订生产计划上工业没有什么独立的创造。它是工人群众与企业主间的联系环节，力求及时完成工业参谋总部所规定的生产计划，控制工作的基本部分。城市知识界的中等阶层是很标准化的，而高等阶层则日益与工业的参谋总部相融合。

乡村型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传统性"的，即是与农民的社会

① 军事组织也提供了这样的复杂阶梯的样式：低级官员、高级官员、参谋总部，不应当忘掉部队的下级指挥人员，他们实际上的重要性，要比想象的大的多。指出下面一点是很有意思的：所有这些部分，都觉得自己是融合一体的，不仅如此，下层表现了更明显的小集体精神，并且从其中汲取"自尊心"，而"自尊心"常常成为他们说俏皮话和经常取笑的目标。

环境相联系，与还没有形成、没有利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城市(特别是不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相联系：知识分子的这种典型，规定着农民群众与国家及地方(律师、公证人等)行政机关的联系，正是由于自己的这种职能，就起着巨大的社会政治作用，因为职业的中介作用很难和政治的中介作用分开。此外，乡村知识分子(教士、律师、教员、公证人、医生等等)处于中等生活水平，更高的或极端不同于中农的水平，因此在这种知识分子看来是他梦寐以想的社会典范，所以力图摆脱自己的处境，而改善自己的地位。农民总是想着至少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成为教士)，即是成为"先生"，这样升到更高的社会阶梯，与他的家属一齐提高，因为他可以确定与其他"先生"的关系，这就改进了自己家属的生活。由此可见，农民对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二重性的，看来是矛盾的：他钦佩知识分子和一般国家官员的社会地位，但有时却显出蔑视后者的样子：在他的钦佩之中，下意识地渗透着忌妒的因素和怀有敌意的因素。

如果不注意、不具体而深刻地研究农民实际从属于乡村知识界：农民群众一切有机的发展直到某种限度，都与知识界的运动相联系，并且依赖于它们，就丝毫也不能理解农民的集体生活，存在于其中的发展的萌芽和酵母。城市知识界是另外一种情况：工厂或制造场的工程师和技师不对工人群众发展任何政治活动，或者至少这已经是经历过的阶段；有时也恰好发生相反的情况——这些群众至少通过自己本身有机的知识界对技术专家实现政治影响。

问题的中心点还是确定任何基本社会集团有机知识界范畴和传统知识界范畴之间的差别——产生一系列问题和新的历史研究可能的差别。

最有兴味的问题是——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研究的话—现代政党、其实际发生、其发展、其形式的问题。从知识界问题的观点看

来，政党是什么？这里必须做某些区分：（1）对某些社会集团，政党不外是前者所固有的选择自己有机知识界范畴的手段（知识界考虑到该社会集团形成的积极活动与发展的一般特点与条件，只有这样才形成并且可能形成），是直接在政治与哲学领域内，但只不在生产领域内选择；①（2）对一切社会集团，政党是公民社会内执行与国家在政治社会内以更广泛更综合程度执行的同样的职能；政党关怀着一定的——也正是统治的——集团有机知识界与传统知识界之间联系的加强。政党之完成这个职能，依赖于自己的基本职能，这个职能归结起来是培养自己的干部、一定社会集团（作为“经济”集团发生和发展的）分子，直到把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知识分子、领导者、各种形式活动的组织者和整体社会——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有组织发展所具有的职能的执行者。甚至可以这样说，政党在自己的范围中执行自己的职能，比国家在更广泛的领域中执行自己职能，更加完全、更加有组织，成为一定社会集团政党党员的知识分子和这个集团有机的知识界溶合起来，和它更巩固地联系起来，而知识分子在国家生活中却是软弱无力地参加，有时简直是微不足道地参加。但是许多知识分子，恰好相反，认为他们什么人也是国家。这个意见因为赞成的人们是极其众多的，就另一次引起显著的后果，而对实际上是国家的基本经济集团，召致不愉快的麻烦。

“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作知识分子”。这个断言可以提供笑话和讽刺的借口；而且如果仔细想一想，简直什么也不能更加正确了。应当要做各种程度的划分：党能够具有比较多数的成员，具备

① 在生产生活中形成阶层，可以说这些阶层相当于军队中的“分队的下级军官”，就是城市中的熟练化了的和专业化了的工人，而且——以更复杂的形式——乡村中的对分制佃农和垦殖者，因为对分制佃农和垦殖者，一般地宁可说是手工业者典型，而手工业者实质上是在中世纪的经济中熟练化了的工人，

比较高尚的品格，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这一点；重要的是党应当实行领导和组织作用，即是教育的、精神力量的作用。商业家成为政党的党员，不是为了大大有利于做生意，工业家成为政党的党员，不是为了用最小的开支而生产更多的东西，农民成为政党的党员，不是为了掌握新的耕作土地的方法，纵然政党在某种关系上也能够满足商业家、工业家和农民的这些要求①。工会在某种限度内适应这些目的，在工会中，商业家、工业家、农民的经济—团体活动，找到了最合适的范围。属于某一社会经济集团的人们，在政党中克服他们历史发展中的这些因素，成为无论就其性质上是国家的以及无论国际的一般活动的传导者。无论在国家历史的特别基础上，无论在不同民族范围内各种最显著社会集团、特别是经济活动主要为生产活动的那些集团发展的基础上，由于对知识界有机的和传统的范畴发展道路具体历史的分析，政党的这一职能的性质应该成为更明白的了。

传统知识界的形成是最有兴趣的历史的问题。当然，传统知识界和古典世界的奴隶制相联系，也和罗马帝国社会组织内部的希腊的和东方出身的被解放的奴隶的地位相联系。

注释　从共和国时代并且到帝国以前（从贵族—团体统治到民主—官僚主义统治）罗马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条件的变化，和恺撒是联系的，他对医生和自由艺术教师给以公民权，为了使他们更愿定居罗马，并召徕其他人。Omnesque medicinam Romae professos et liberalium artium doctores, quo libentius et ipsi urbem incolerent et coeteri appeterent civitate donavit②（斯维托尼：《恺撒传》42 页）。因此，恺撒给自己提出了任务：（1）使知

① 一般的意见反对这一点，他们断言"政客化"的商人、工业家、农民甚至因加入政党而受损失，并不是有利，并且他们是自己范围内的最坏的代表人物，但是，就这一点说，也许已经是一个有争议的方面了。

识界附着罗马，他们已在那里定居，通过这种办法建立一个永久的范畴，因为没有这个范畴的稳定，便不可能建立文化的组织；有地位的知识界的动摇，必须结束等等；（2）把全罗马帝国优秀知识分子吸引到罗马，实行大规模集中化。在罗马的"帝国"知识界范畴，就这样开始了，他们在天主教教士中找寻自己的继承人，并且在意大利知识界全部历史中留下了如此的痕迹，它的显著特点，直到十八世纪，就是"世界主义"。

罗马帝国颇为众多的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之间这种不仅社会的、而且国家的、种族的裂痕，在帝国崩溃后，作为日耳曼军人与罗马化出身知识分子，即解放了的奴隶那种范畴的继承人之间的裂痕而重新诞生了。和这些现象交织在一起的，是天主教与教会组织的发生与发展，教会组织在许多世纪中使大部分智力活动服从于自己的利益，并且将来实行对文化领导的垄断，对那些想着反对或逃避这种垄断的人，就结合上惩罚性的制裁。意大利的知识界依时间而定或多或少地执行了世界主义的职能。

我指出的那些差别，在许多国家，至在最重要的国家知识界发展中，立即引起注意；但是应当事先知道，这些意见必须受到检验，并加以深刻化。

对于意大利，中心事实正是它的知识界执行了国际主义的，或者世界主义的职能；这种职能就是从罗马帝国崩溃起到 1870 年半岛所在的支离破碎、不相往来情况的原因和结果。

法国提供了全民族力量，特别是知识界范畴和协发展的完美的典型。当 1789 年新社会集团出现于历史政治舞台时，它已做好完全准备，以便执行全部社会职能，因此，它能为民族的总体统治

---

② 他赐与罗马一切从事医务活动者及自由艺术教师以罗马的公民权，以便用这种办法使他们乐于久住罗马，并且也吸引同类的新人来这里（拉丁文）。——译者

而斗争，不去和旧阶级作实质的妥协，恰好相反，使旧阶级服从自己的利益。新型知识界最初基层组织是随新经济最初基层组织诞生的；甚至教会组织本身也经受它们的影响(教皇权力限制主义，教会与国家之间最顽强的厮杀)。知识界组织的这种强大，说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法国文化作为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辐射器的作用，在其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性质下有组织进行的扩张，因而和意大利文化扩张截然不同的作用——意大利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是经过它的代表人物移居于其他国家的途径的——这种扩张没有对本民族的基础给以反作用以便加强它，恰好相反，是力图使建立巩固的民族基础成为不可能。

英国知识界的发展和法国大不相同。在现代工业化主义基础上诞生的新社会集团，有可惊的经济一集团的发展，但在智力—政治领域却是摸索着前进的。有机知识界的范畴是很广大的，他们产生在真正同样的工业基础上，也就是经济集团本身，但在更高级的范围内几乎保存了旧土地阶级的垄断地位，后者虽丧失了经济上首要地位，却长期保存着政治一智力的优越性，并且和掌权的新集团相溶化，作为"传统的知识界"并且作为领导的阶层。古老的地主贵族仿佛借助于"缝合"而与工业家联结起来，在其他国家中这种缝合恰好是传统知识界和新的统治阶级结合起来。

英国的这种现象在德国也看到，这种现象在德国因其他历史的和传统的因素复杂化了。德国也正如意大利，是一个普遍主义的、超民族的研究所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也是同样意识形态的地方。德国对中世纪世界城市给以一定数目的活动家，使自己内部力量缺少；德国纠缠于厮杀，转移了民族统一问题，并且支持了中世纪时代领土割据。工业的发展是在严格的半封建外壳之下进行的，这种外壳一直存在到1918年11月，并且容克贵族保持了自己政治一智力优势，比英国同样集团的

优势要显然更加强大。他们是德国工业家的传统的知识界，但是具有特权，并且坚决相信，他们是独立的社会集团，因为他们坚持掌握比英国更多"生产成效"的土地。普鲁士容克贵族类似军事-祭司等级，几乎拥有政治社会中组织领导职能的无限垄断地位，但同时他们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不专门依靠居统治地位的经济集团的慷慨无私。此外，和英国土地所有者不同，容克贵族是巨大常备军军官成员所由以构成的一些人，这就给与他们稳定的组织干部，使之保持集体精神和政治垄断。①

在俄国则出发点完全不同，政治和经济-贸易组织，是诺尔曼人（瓦兰人）建立的，宗教组织是拜占庭希腊人建立的；后来德国人和法国人又把欧洲经验带给俄国，并且给予俄国历史的"肉冻"以最初真正的骨头。国家的力量是惯性的、被动的并且易于接受的，但是可以说，正是因此，它们完全同化了外国的影响以及外国人本身，把外国人俄罗斯化。在晚近历史时期发生了反作用：由最积极的、精力充沛的、有事业心的和有教养的人组成的杰出人物（élite）出国，掌握西方更先进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经验，同时并没有丧失本国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即是没有和自己的人民断绝精神联系和历史联系；由此可见完成了自己的智力培养后，他们返回国内，强制人民奋起觉醒，迅速前进，为自己扫除障碍。在这种杰出人物（élite）与被输入的德国人（例如，彼得大帝）之间的差别，在于后者实质上具有人民-民族性质；俄国人民的惰性被动不可能套住后者，因为后者本身就是对这一历史惰性的精力充沛的俄罗斯的反应。

在另外的基础上，并且在完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条件下，这种

① 在玛克斯·韦伯《德国新体制中的议会与政府》一书中可以找到许多因素，表明贵族政治垄断不仅阻碍足够数量的有经验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形成，而且是议会不断发生危机和自由与民主党派分裂的基础；在帝国时期得以形成自己很重要的议会的和领导的力量之天主教中心和社会民主党，其意义由此而来。

俄罗斯的变态可以与美国(合众国)的诞生相比拟：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也是智力上的杰出人物，特别是在精神方面。自然需要谈谈最早的移民，谈谈拓荒者，英国宗教与政治战争的参加者，战败者、但在他们的祖国并不是被贬低者和受压制者。他们随自己一齐带到美洲的，除精神和意志力量外，还有某种程度的文明，某种阶段的欧洲历史进化，进化被这类活动家移植于美洲处女地之后，继续发展包含于其自然界的种种力量，可是发展的速度要比古老的欧洲更加无比地迅速，欧洲存在着一系列限制(为一定的居民集团所创立的政治、经济、智力、道德限制——不愿消灭的过去制度的种种残余)，这种限制阻碍着迅速的与平衡的进步，阻碍着创造精神，把它随时间和空间而溶化了。

应当指出美国在某种意义上缺乏传统知识界，因而一般说来，不同的知识界范畴异常平衡。在工业的基础上，发生了一切现代上层建筑的紧密的体系。平衡的必要性的决定，并不是把有机知识界和传统知识界混合起来的需要(传统知识界并不是作为结晶化的、仇恨新事物范畴存在的)，乃是要求把不同民族出身移民带来的不同类型文化，一齐熔合于民族单一文化的坩埚之中。在古文明各国中铭记不忘的传统知识界重要阶层的缺乏，部分地说明，只有两个大政党存在，它们事实上很容易归为一个政党(这里与法国比较是合适的，并且不仅与战后法国比较，那时政党数量的增加，成为普遍现象)，——与此相反，宗教派别无限地增多①。

在美国还看到了一个应当研究的有趣的现象——可惊的大量黑人知识分子的形成，他们掌握美国的文化和技术。应当想到这些黑人知识分子能够对非洲落后群众给以间接影响，也应当想到直接影响，如果存在以下设想中之一的话：(1)美国扩张主义利用

① 我以为它们确定为200多个。应当和法国比较，和残酷的战争比较，这些战争是为了拥护法国人民宗教与道德统一而进行的。

美国黑人作为其代理人来夺取非洲市场并且推广（在非洲）自己类型的文化（在这个范畴内已经做过些事，但是我不知道程度如何）；（2）美国人民争取统一的战争尖锐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引起黑人的大批移居国外，使最为独立自主和精力充沛的知识分子返回非洲，因而他们更少愿意服从比现代道德规定还更加有损尊严的可能的立法。在这些条件下发生了两个基本的问题：（1）语言问题，英语能否成为非洲的先进语言，统一现存方言的分散状态？(2)这种知识分子能不能具有同化的和组织的能力，达到这样程度，以便使至今被蔑视的民族的原始情感成为"民族的"的情感，把非洲大陆的重要性提高到创作推动统一的神话，到对全体黑人是共同的祖国的作用？在我看来，美洲黑人将来必须具有否定比肯定为多的种族的和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将在白人旨在实行孤立与排挤黑人斗争中诞生；但直到十八世纪初叶对待犹太人不正是这样吗？已经美国化的利比里亚使用正式英语，可以成为美洲黑人的锡安①，具有变为非洲皮埃蒙特的倾向。

至于南美和中美，在我看来，这些国家中的知识界问题需要研究，考虑以下的基本条件：这里也不存在广大传统知识界范畴，但这里的情况并不象美国那样。实际上，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文明，是这些国家发展的基础，其特征是反宗教改革和寄生性的军国主义。这些已经成熟的，迄今作为教士和军阀存在于国内的社会阶层，是欧洲祖国传统范围内僵化的传统知识界范畴。工业基础很窄狭，没有发展了复杂的上层建筑；知识界基本群众是乡村型的知识界，因为在国内经济上起统治作用的是大地产和广大的教会领地，所以，这些知识分子与教士和大地主相联系。民族成份甚至在白人中也不一致，而相当多的印第安群众更要复

---

① 锡安(Сион)——耶路撒冷附近锡安山为犹太人古都。——译者

杂，他们在这里某些国家中构成居民的大多数。一般说来，可以说，在这些美洲各地区还存在着天主教与政府斗争时期和德雷福斯案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世俗的和资产阶级分子还不能达到使教权主义与军国主义者利益与势力服从现代国家的世俗政策的阶段。这样一来，由于反对伪善就有了共济会的巨大影响和象"实证主义教会"那样的文化组织的典型。

后来时期（1930年11月）的事件——从墨西哥政教斗争的卡里斯到阿根廷、巴西、秘鲁、智利、玻里维亚的人民-军事起义，都表明了这种意见的正确。

知识界范畴的形成和他们与国家势力的相互关系的其他种种典型，可以在印度、中国及日本找到。日本知识界是按英国或德国典型形成的，即是在封建官僚外壳内发展的工业文明基础上发生的，并具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特有的那种文字，表示着知识界完全与人民分开。印度与中国的知识界和人民之间的巨大距离，甚至表现在宗教方面。各种信仰与同一宗教在社会各阶层——特别在僧侣、知识界与人民中——接受与信服的不同的问题，一般应当彻底地研究，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差别到处可见，虽然在东亚各国可以遇到最为极端的情况。

在新教徒各国，这些差别相形之下不大（教派的繁多与知识界和人民要求充分一致有联系，这说明在高级组织范围内，人民的真正认识是很不清楚的）。

这些差别在天主教各国是很显著的，但是这里它们也不是到处一致的：天主教德国和法国不那么大，意大利、特别是南部与群岛有点大，伊比利安半岛和拉丁美洲各国是特别大。在正统的各国中，这种现象以更大的规模表现出来，那里必须谈到同一宗教的三个等级：高级教士和修道士，世俗教士和人民——而在东亚竟达

到荒谬的程度，那里人民的宗教和书本的宗教毫无共同之处，可是两种宗教都是同一个名称。

学校与文化活动的组织

作为普遍现象可以指出来的，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各种实践活动成为如此复杂，并且科学与生活如此交织在一起，因而所有实践活动都促使为领导者和专家设立学校，从而也形成更高级熟练程度的知识分子——专家集团，他们在这些学校中任教。由此可见，除开可以称为"人文"的，即传统的、更古老的学校，其目的是对每一个人发展普通的暂时还没有区别的文化，发展基本思维能力并善于独立指导生活——除开这种学校外，还要为了某些个别生产部门或者为了已经专门化的和以某一专业为特色的职业建立一系列的各级不同的特种学校。另外还可以说，今日正在爆发的学校危机，正是以下的事实所决定，这个分化与孤立的过程是乱七八糟地进行的，并没有根据明显与精确的原则，也缺乏深刻研究过的和有意识地规定的计划；教学大纲与学校组织的危机，即是形成现代知识界干部政策总的方向的危机，只是更广泛与一般的有组织危机的一个方面与后果。

学校根本分为古典的和职业的，是合理的图式，职业学校适用于劳动群众，古典学校适用于统治阶级，也适用于知识界。正如城市一样，乡村也同，工业基础的发展，引起造成新型城市知识分子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此可见，除开古典学校外，也出现了技术学校（职业学校，但不是为了培养工人的职业学校），这种情况就使人怀疑一般文化具体倾向性的、以希腊-罗马为基础的这种一般文化人文主义倾向性的本身原则。若是这种倾向性被怀疑，那么它已经可以说是失掉了生命力，因为它的教育能力基本上依靠着一

定的文明形式公认的和传统地无可争辩的威信。

在我们的时代，一方面出现了一种倾向：废除各种类型不追求（直接形式）实际目标和纯“教育”的倾向，或者只保存一种为少数优秀男女设立的，他们并不想培养自己从事某种职业的学校的倾向；另一方面出现了以下的倾向：日益广泛推广专业化职业学校，预先决定学生命运和他们未来活动。应当在成立普通文化统一初级学校的基础上，在保证发展手工劳动（在技术、工业领域）能力与发展脑力劳动能力正确结合的人文的、普及教育的学校的基础上，来实现危机的合理解决。由这种类型的统一学校，通过积累职业路线的经验的道路，然后转移到专门化学校之一，或者转移到生产工作上。

在这一方面应当考虑发展着的倾向，由于这种倾向，每一实践活动促使设立适应于它的专门化的学校，在同样的程度上，一切智力活动都促使成立文化团体，负责执行出学校后研究所的职能，组织上专门化条件的职能，这些条件提供可能把某一科学领域的一切成就置于教程中。

也可以观察到通过决议的机构，逐渐表现出划分自己活动为两种“有机的”形式的倾向：作出决定（它们的基本职能）和技术一文化工作；因此，正在要求解决的问题，开始用经验来研究，而且从科学的观点来分析。这种活动已经产生了拥有新编制的一整套官僚机构，因为除开由为做出决定机构准备技术材料内行人员组成的专设部门外，还成立了第二个官吏机构（或多或少程度上的“志愿人员”，而非追求自私目的），这些官吏有时是从企业、银行、财政机关选拔出来的。而这种机构是基干官吏借以最后把民主和议会各项规章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机器之一；现在这种机器正在有机地扩充，把从事私人实践活动的大专家们纳入自己的范围，从而也把这机构和官僚们控制起来。用关于领导巨大复杂现代国家团

体基本实际活动具体问题上专门化的人员，补充实际执行政策的专家干部，因为问题是产生这倾向的必要的有机的发展，所以从外部来反对这些倾向的一切企图，除开劝善式的说教和巧于辞令的呻吟外，引不起任何其他的效果。

发生的问题是通过发展适应新要求的道路培养技术内行执行政策人员制度的变更，并且问题是培养新型官吏-专家，他们集体地制定和通过决议。只是被培养来执行法律-形式任务的“政治领导者”的传统典型，成为危害国家生活的无政府状态；领导者应当具备最低限度的一般技术文化，让他即使不能独立“写出”正确的决定，至少也善于分析经验提供的决定，然后从“总结”的观点从其中选择适用于政治技术的正确的决定。

力图获得必要实践知识以便在真正的基础上行动的集体通过决议的典型，在另外的地方叙述，那里谈到同时也执行文化团体职能的某些杂志编辑部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接触发展着集体的批评，从而有助于为个别编辑的工作准备资料，编辑的业务活动是适应有计划并且合理准备分工而组织的。通过讨论与集体批评的方法（推荐、忠告、方法指示、建设性的与旨在相互教育的批评），每个人因而作为自己领域内专家进行工作，从而对集体管辖的范围作出贡献，真正能提高个别编辑的平均水平，达到最高的技术与技能，因此保证杂志更加精确而有机的改进工作，创造条件以便形成坚强的知识分子集团，知识分子被培养来正常地和系统地出“书”（不仅是偶然出书和发表部分问题的文章，而且也完成代表有机整体的著作）。

毫无疑义，在发展这类集体活动的条件下，每项工作都有助于发展应用自己劳动的新能力与可能性，因为它造成更加适合于工作的种种条件：卡片、图书目录卡片、关于专门问题基本著作特辑等。要求严厉反对有害的习惯，反对不求甚解、临时抱佛脚、“演说

家”式的和豪言壮语的决定的倾向。工作应该主要以书面形式实行，批评意见也应该以书面陈述，并且要采取简短形式，通过及时分配材料的方法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等等；写简报和批评意见是教导性的原则，其前提条件是必须反对废话连篇和光说大话或者因高谈阔论而产生的谬论这类习惯。在自动形成学校正规学习贯彻的纪律下，旨在使脑力劳动泰勒化，上面所述那样脑力工作的方法对完成工作是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回忆“散特·兹特长老”(«старцев Санта Дзиты») 原则是有用的，戴·桑克蒂斯在其关于那不勒斯巴集利奥·普奥提(Базилио Пуоти) 学校回忆录中谈到散特·兹特长老，即是仿佛能力与技能的“分化”和在最有经验和有教养的人们领导下对工人集团的教育是有用的，最有经验和最有教养人们促进对较落后和缺乏教养者的培养。

在研究统一学校 (унитарная школа) 实践组织的问题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是适应学生年龄与智力道德发展以及估计到这一学校对其提出学习目的各个不同阶段的学校学习。统一学校、或人文学校(这里“人文主义”一词，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而不仅在普通意义上理解)，或普及文化学校，应当使青年受社会活动培养，引导他们到一定成熟阶段，发展他们的能力，在智力和实践方面造就他们，培养他们善于独立选定方向，并且表现出独创精神。规定义务学校学习的时间，取决于一般经济条件，因为这些条件能够对青少年提出要求，立即对生产有所贡献。统一学校要求国家负担学生生活费用，这种费用现由家庭负担，而这样就引起人民教育部收支平衡的根本变化，引起它从所未闻的增大和复杂；教育与造就新的一代的全部事业，由私人的变成国家的，因为只有在这种形式上，教育才能普及整个一代，而不划分为集团或等级。但是这类学校活动的改革，要求在组织学校事业上异常扩大实际任务的范围，指的是保证学校建筑物、科学资料、教学干部等等。

特别显著的是应当扩充教学干部，因为教员与学生间的关系越密切，学校工作的效果则越大，但这里又提出另外的种种问题，问题的解决不可能轻易而迅速。学校建筑物问题也不简单，因为这种学校典型，应当是拥有宿舍、教室、专门图书馆、进行课堂讨论的房屋等等的学校——学院。因此，起初时新型学校应该并且能仅仅为青年狭窄集团服务，这些青年根据竞赛选拔，或者由相应的学校经过审查派遣而来。统一学校肄业期间应当与中小学现行肄业期间相适应，中小学不仅从教学内容与方法观点，而且也在布置学校学习各阶段意义上加以改组。小学学习期间应当不长于三、四年，除开教"基本"课程——读、写、算、地理、历史——外，还应当学习今天还忽视的课程，如"法律与义务"，即是提供作为新世界观基本因素的关于国家与社会的概念，新的世界观和社会各种传统范围所具有的观念正在进行斗争，后一观念可以称为民间观念。要求自行解决的教学问题，在于使教条式的标准减轻，并使之富有成效，而这一点正是在学习的初年应当做到的。其余课程应当在不超过六年内学习，估计要到十五、六年可以经过统一学校的全部阶段。

对于这一点可以提出异议的，是这样的课程，由于学习速度之快，太使人疲倦了，要想真正收到预期的效果，就要求助于这样学习，可是现代古典学校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可以说，新组织的整个综合，应当包含一切普遍的因素，相反（在各个场合，对部分学生说），由于这些因素，使课程以过慢的速度进行。这些因素究竟如何呢？

在某些家庭中，特别是知识界的家庭中，儿童在家中受到培养，延长并补充学校生活；据说，他们"一听"就明白许多知识和习惯，使学校教学一词意义便利了：他们已经懂得了标准语言、并且加深了这些知识，即是拥有表达和认识的手段，在技术上比 6 到12 岁年龄全体学生半数所拥有手段更加完善。例如，城市学生，仅仅

因为他们生活在城市，到4岁时已经具有大量的知识和技能，对他们说来，就使学校学习更加容易，更加富有成效，并且使他们更迅速地掌握学校的教学大纲。在统一学校的内部组织中，应当创设那怕是这些条件中的一些基本条件，至于和统一学校相应的那种环境，就已经更不用说了；应当分设幼儿园和其他设施网，在儿童到达学龄之前已习于遵守某种集体纪律，儿童获得学前的知识和习性。

事实上统一学校应当作为寄宿专校组织起来，在那里学生的集体生活，不受假仁假义的和机械的纪律的现代形式所排挤；学生应该是集体地、在教师和优秀学生帮助下，也在所谓课余时间内进行。

基本问题牵涉到当前学校学习时期，它在今日为个人所表现，并且完全与以前各班的学习是一样典型；它的差别（如果从抽象假定出发的话）也许只是在于学生的巨大的知识和道德的成熟程度，考虑到学生年龄较长，并且已拥有以前积累的经验。

实际上，个人与整体之间，即是完全意义的学校和生活之间有裂痕，违反了连续性，而不是合理的数量（年龄）到质量（知识与道德的成熟性）的过渡。从讲课，可以说，从记忆起重大作用的纯粹教条式的讲课，过渡到创造性的阶段，自主和独立工作的阶段；从具有强制的和自上而下监督的学习纪律的学校过渡到职业教育或职业工作的阶段，理性的自我纪律和道德的独立自主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这在发育成熟危机之后立即发生，那时本能的和原始的情绪对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性格或良知的抑制原则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在意大利，大学中没有推行"课堂讨论"方法，转变是特别尖锐并且机械的。因而在普及学校中后一阶段应该看作并组织为决定阶段，在该阶段力图造就"人文主义"应有的基本品质，养成理性的自我纪律和道德的独立自主，这无论在科学的（大学课程）领域，也

无论在直接实践－生产活动的(工业、官僚机关、商业组织等等)领域都是必要的。研究和掌握科学上与生活上的创造性方法，应当在这学校的最后阶段开始，这不超过大学所专有，也不让在实际生活中自流。这个学校的学习阶段已经应为促进个人责任与独立自主因素的发展，即是成为创造性的学校。甚至从“道尔顿制”的方法出发，这里也必需区别创造性的学校和主动的学校。每一个统一学校就是主动的学校，虽然也必需规定在这方面自由放纵的范围，并且要求充分绝对实行自己成年人方面的责任，即是国家在“应当形成”(国教化)新的一代方面的责任。目前还处在主动学校的理想主义阶段，在这里所看到的是对机械的和伪善的教育方法斗争表现的病态地过分发展，这是力图否定与辩论所决定的；必须进入“古典的”、合理的阶段，寻求拟订应该达到的目的中那些方法和形式。

创造性学校是主动学校的完成。在学习的第一阶段企图实行纪律，然后消灭差异，达到一种“国教主义”，它可以称之为“动力”的。在创造性阶段，根据已达到的“集体化”社会形态，力图发展那种已经获得独立自主和负责精神的个性，但是，现在已经通过养成坚定的和不动摇的道德与社会责任的意识这种道路来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创造性学校并不是“发明者和发现者”的学校，它是研究与认识技能发展的一个阶段，它教授给它们以方法，而并不实行早已规定的、带有强制目的用任何代价提供独创性与新发明的“计划”。这种学校表明，学习的进行，主要地是因为学生自愿与自动地努力，而教师只是执行自己友好领导者的职能，正如这是大学中进行的或者应该进行的一样。自动的，不要提醒、也不要从旁帮助的寻找真理，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甚至这个真理是陈旧的)；独立寻求的过程证明掌握了方法；无论如何，它标志着进入理性成熟的阶段，这时可以发现种种新的真理了。因此，在这个阶段，学校的

基本活动是在课堂讨论、图书馆、实验室发展的；正是在这个阶段，积累了选择职业的有机的前提。

统一学校标志着不仅学校中、也是一切社会生活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新的相互关系的开始。因此，统一的原则应该影响所有一切文化组织，改造它们，并给它们以新的内容。

根本变更大学与研究院任务的问题

现在这两种形式的制度是相互独立的，并且研究院是存在于高级文化与生活间、知识界与人民间（在反研究院的、反传统的狂飚〔Sturm und Drang〕初期未来主义者具有某些成就的原因在此）的分裂的象征（常常完全公正地受到嘲笑）。

在日常生活与文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新的相互关系的条件下，研究院应当成为统一学校毕业后面临职业工作的那些分子的文化组织（就知识系统化、智力发展与形成而言），应当对他们形成规定与大学成员联系的手段。从事职业劳动的社会成员，不应陷入智力的消极状态；他们应该自行拥有（在集体创造精神、而非个人创造方面，并且在执行为社会必要与有益所承认的有机的社会职能方面）研究与科学活动一切领域中的专门化研究所，他们能在那里工作，能找到他们乐于参加的任何形式文化活动必要的参考书。

研究院的组织应该从根本上改革，并且活跃起来。

它应该根据管辖范围和专门化原则，在地域方面集中起来；现有大研究所归并入国家中心，然后接着是又把地方城乡团体联合起来的地域性和省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的划分将按科学文化职能进行，这些职能的执行将完全交给中心，而只有部分交给地方团体。应当把现有各种形态的文化组织统一起来；文化研究院、研究

所、哲学团体等等，统一起来传统的研究院工作，这种工作主要地表现在过去积累的知识系统化，力图规定一条折衷的民族思想路线作为对智力工作的领导，所用的方法是发展与集体生活、与生产界、与人们劳动相联系的活动。对工业项目的报告、对劳动组织活活、对工厂实验室等等，将实行监督。为了从人民群众中选择和提拔各个天才的代表人物，将建立机构，今天把这些人物的能力牺牲了，由于错误和无效的尝试使这些人物等于零。每一地方团体必须具有人文主义与政治科学的部门，并且组织其他特别部门来讨论工农业、劳动组织与合理化——工厂制造厂、土地、行政管理等问题的技术的各个方面。定期召集各种不同水平的大会可以发现最有能力的人。

具有研究院和现今存在的其他文化组织全部名单，以及它们主要研究的和发表在它们"著作"中的问题的项目。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些"著作"是文化的基地，虽然它们也执行着领导阶级心理的职能。

在这些组织和大学之间，应当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也正如在各种典型(如陆海军等等)专门化学校方面一样。目的在于使民族文化达到集中化和推动的发展，在这方面要超过天主教会①。

论教育原则的研究

秦梯尔改革② 预先决定了一方面中小学，他方面高等学校之

---

① 适应着统一学校普遍原则的文化工作组织的这个图式，应当在所有一切自己的分支机构中得到慎重的发展，并且在建立那怕是最起码的和原始的文化中心时充当领导，这种中心应当看作所有这个笨重结构的萌芽和开始的因素。具有临时性和经验性的一切创举，也同样应当看作醉心于一般系统的强大创举，同时看作有助于制作一般图式的活生生的因素。应当细心研究扶轮社(Rotary Club)的组织和发展。

间的裂痕。这种改革之前，类似裂痕仅仅以特别尖锐的形式，存在于职业学校与中等学校及高等学校之间；小学由于它具有的某些特性好象很荣幸。

在小学中奠定儿童教养与教育的基础的，有以下两种因素：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初步知识和公民关于权利义务的首要概念。科学知识应当服务于引导儿童入真实的社会，使他们认识国家生活与公民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总体。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知识进入儿童由民俗精神渗透环境中所接受的世界与自然魔力概念的斗争，这也正如权利与义务概念进入对个人主义的和由地方利益窄狭性所产生的野蛮行为倾向的斗争，野蛮行为也是民俗方面之一。学校教育儿童时要对民俗及其在认识世界方面的一切传统遗产作斗争，力图传播更加现代的世界观，掌握世界观的首要与基本要素是获得自然界规律存在的知识，把自然界作为客观的和需要适应它的没有征服的东西，为了征服它以及征服人的活动产物的公民与国家的法律，就由人规定，并且能够由人变革以达自己集体发展的目标；公民法与国家法用历史上更加适合于管理自然界规律的方法管理人，即是减轻自己的劳动，劳动是人所特有的积极参加自然界生活的形式，旨在逐渐深刻与广泛改造自然界并且为公共利益所利用。因此，可以说，奠定小学基础的教养原则，包含着劳动的观念，如果没有正确的和实在的自然界规律的知识，没有规定的合乎规律的程序，即有机地规定人们在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应当根据内心信念，而不仅因为从外部强加给人的程序，劳动是不能带着它特有的一切发展能力和生产能力实现的，按照已经被承

---

② 秦梯尔改革——1923年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教育部长秦梯尔）进行的教育范围的反动改革。按照这个改革，国内准予设立私人学校，小学校中强制实行教授天主教教义问答，学好拉丁语的学校教学计划扩充了，正式规定《哲学史》等等课程。——译者

认的和已经了解的作为必然性的自由，而非简单地按照强制办法。劳动观念和行动本身（作为理论一实践活动），是小学机体上所具有的教育原则，因为社会与国家制度（权利与义务），是劳动规定的并与事物的自然秩序相似的制度。以劳动为基础的，以人的理论一实践为基础的事物的社会与自然秩序之间的平衡，产生着关于摆脱每种魔法与巫法的世界的概念的起初因素，并且提供推动力来继续发展历史的、辩证法的世界观，来了解运动与形成，来评价过去对现在要用怎样的努力和牺牲的代价，来了解现在对将来要用怎样的努力和牺牲，来了解现代是过去的总结，是所有过去各代的总结，这种总结要反映在将来。这是小学的基石；学校是否提供了自己的一切成果，教师干部是否认识了自己的任务及其哲学内容——这是另外一个与全国公民认识阶段批评有关的问题，全国教学干部只是它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极不重要的，当然也不是先进的一部分。

教育同时也不是教养，这种断言绝不是正确的；唯心主义教学法的严重错误，正在于太过于支持这种区别，在适应这些教学法原则改组的学校里，其结果已显见。为要使教育也不包括在教养之内，需要学生体现真正的被动精神，成为抽象知识"机械的电池"，这当然是荒诞的；但是，连所谓纯粹教养本身的捍卫者，正是反对机械式教育的，也把这一点"抽象地"否定了。在儿童意识中"肯定的东西"成为"真理的东西"。但是，当然儿童的意识不是某种"个人的东西"（尤其是个人化的东西），在儿童意识中反映出他所属的公民社会中那一部分的意识，即纠缠在家庭、邻居、乡村等等社会相互关系的意识。在绝大多数儿童个人意识中所反映的，是社会与文化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不同于学校教学计划、和教学计划对立的东西；先进文化中"肯定的东西"成为顽固与陈腐文化范围中"真理的东西"，在学校与生活中缺乏一致性，因此在教育与

教养中也没有一致性。从而可以说，学校中教育与教养的一致性，只有在教员的生动的工作中，能够体现出来，因为教员认识他所代表的社会与文化典型和他的学生所代表的社会与文化典型之间的种种矛盾；教员也了解自己的任务，是归结为促进并引导儿童部队于一定的范围，适应高级典型的理想，并且对低级典型斗争。如果教学人员素养缺乏，如果教育一教养的统一性因为根据取消了教养主要作用的书面计划而力图解决教育问题以致瓦解时，那末，教员的工作将苦于有更多的缺点，学校将是修辞性的、不重要的，因为其中肯定的东西将缺乏自己的具体性，而真实成为口头上的、纯粹修辞的了。以文学与哲学课程为例，可以更好地看见中学的退化。以前学生们总还有些由具体知识组成的"行李"或"嫁妆"(依靠趣味)；现在当教员应该不得不成为哲学家和唯美主义者时，学生却轻视具体知识，用那公式以及言论去"填满头脑"，它们的涵义学生大多数场合下莫名其妙，并且立即把它们忘掉。反对旧学校的斗争是正确的，但改革也不是那末简单，因为问题不在于教学规划，而在于人，并且不在于直接当教员的人，而在于一切社会整体，这些人就是整体的表现。事实上，谦逊的教员能够使他的学生成为更加知识渊博的人，但他不能使学生成为更有文化的人；教员将仔细地和认真地用官僚主义的办法实现学校的机械职能，而学生如果有积极的智能，将独立地，并且借助自己的社会环境，拥有为他所积累的"行李"。实行新的教学计划，等于普遍降低教员干部的文化水平，将来就绝不会存在可以拥有的"行李"了。在新的教学纲要中应当规定完全废除考试；现在放弃考试，也许是一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的赌博"。日期永远是日期，什么教授也总是考学生，而"定义"永远是定义；那末，判断、美学或哲学的分析在那里呢？

关于是或不是旧式学校问题的新提法中，不应当找寻(甚至应

当拒绝它）根据旧的卡札提法组织的意大利旧式中学的教养效能；这种效能应当在以下事实中寻求：学校的组织和教学纲要，是智力与道德生活、文化气氛由于古老传统散布于全意大利社会的传统计划中的表现。这样的气氛与这样的生活方式之进入垂死阶段，学校与生活之脱节的情况，预先决定了学校的危机。不估计这些条件来批评学校中的教学纲要和纪律的组织，意味着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

由此可见，我们返回来谈学生真正积极参加学校工作问题，而只有当学校与生活相联系时，这一点才会存在。至于新的教学纲要，则学生积极性及其乐于参加教师活动在纲要上固定并陷于理论形式越多，它们对成为体现被动性的学生的用途越大。

在旧学校中拉丁和希腊语纯粹语法的研究和拉丁与希腊文学及政治史的研究一道，是教养的入门，因为在雅典和罗马体现的人文理想，普及于全社会，构成生活与民族文化的基本因素。甚至纯粹对语言作语法研究的机械性也曾使文化前途活跃起来。掌握个别概念不是为了达到具体的实践一职业的目的（仿佛并没有这样直接的利害关系），因为学习的目的是从内部发展个性，形成性格，其途径是掌握并融化现代欧洲文明的全部文化遗产。人们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不是为了说那些话，不是为了做侍役、翻译员、买卖人。学习这些语言是为了具体研究这两个作为现代文明必要前提的民族的文明，即是为了本身自觉地认识自己。人们从文法上机械地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但是责备这种学习的机械的态度和没有效果时，那在这方面就太不公正和偏颇了。需要付出许多劳动来培养儿童某些勤勉奋发、循规蹈矩、精神集中（尤其是体力的）的习性和心理集中注意特定课程——这种习性没有机械重复的练习是得不到的，而练习则有助于养成纪律性和有条不紊的学习。难道四十岁的学者如果从幼时起由于机械的强迫没有掌握应有的

心理习性，能够连续十六小时坐在桌子边吗？如果愿意培养伟大的学者，那末就需要早从这个时期开始，并且在整个在校时期，从这个意义上影响学生，以便涌现出每一个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几千、几百或甚至几十个优秀学者（如果只要在这个范围内借助相应的科学手段，而不重蹈不切实际的耶稣教徒的方法可以多多改进的话）。

人们掌握拉丁语（或者更好地说研究拉丁语），分析它一切最起码的细节，作为死板的东西来分析——这都是对的，可儿童也能做只是对死板的东西的分析；但是不要忘记，当这种学习以这样形式进行时，部分已引起儿童兴趣的以后也继续引起儿童兴趣的神话表现出罗马人的生活，这样在死板的东西中也常常存在着伟大的活生生的东西。因此，纵然死板的语言作为某种消极的东西，作为解剖家桌子上的死尸，可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停息地活跃在例证中和故事中。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研究意大利语吗？不，不可能的，任何一种活的语言不能象拉丁语那样研究，这是而且一望而知是一种荒谬的事。按照这种方法开始学习拉丁语，任何一个儿童也不懂它，但是活的语言却可以懂的，并且只要一个儿童懂得了它，以便破除一切魔法就够了；所有的人都立即会进伯尔利茨学校①的。由于一种幻想，拉丁语（正如希腊语）对教员也是一种神话。拉丁语的学习不是为了掌握语言；由于可以研究的其发生与发展的文化－经院哲学传统，人们早已把研究拉丁语，作为理想的学校教学纲要的要素，即是把整套教学法的和心理要求结合于自身，并且满足于这个意义的要素；教授拉丁文是为了使儿童养成习性，按规定的方法研究、分析历史现象，这种现象可以看做经常复活的尸体，以便使他们习于判断、概括地抽象（纵然他们也能立即从抽象转到

① 外语实习学校。——译者

现实生活），在每一事实或某一因素中看到共同的和局部的东西、观念和个体。但是在教养意义上看到拉丁语与人们所说的语言经常的比较是怎样呢？语言和概念的区别与类同，一切形式逻辑和它的一切对立物的矛盾，以及不同的分析和语言学总体的一切历史运动，后者随时受到变化，并且能够发展，而不仅是处于静止状态中。在文科中学和高等法政学校八年上学时，充分学习作为历史上实在的东西的语言，起初就在某一抽象方面，在照像法的基础上熟习其语法的形式；从厄尼开始（甚至从"十二铜表法"片断开始）到菲德鲁斯①，到基督教的拉丁文；整个历史过程受到分析，从它的发生时起，直到暂时死亡，表面死亡，因为人所共知，人们不断用拉丁语与之比较的意大利语，是现代的拉丁语。人们学习某一特定时期的语法，抽象法，某一特定时期的语汇，但同时学习（为了比较）每一特定作家的语法和语汇以及每一名词在每一特定（修辞上）时期的意义；由此可以发现，菲德鲁斯的语法和语汇并不是西塞禄、或普罗托斯，或拉克唐提乌斯以及忒尔杜连斯，在不同作家各时代同一语音的结合，没有相同的意义。人们经常比较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但是每一个词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的概念、形象——在两种被比较的语言中的每一种——有细微的差别。人们研究用某种语言所写的书的合乎语言规范的历史、政治史、操这种语言的人们的活动。由所有这一切有机的总体中形成了对青少年的教养，这是因为以下的事实，他实际上通过了（就让仅仅根据文献说）所有各阶段上的整个这条道路等等。他潜心历史，具有以历

---

① 厄尼，克文特（纪元前239—169），罗马诗人，温和的罗马贵族思想家，罗马贵族力图在罗马灌输古希腊文学与哲学传统。"十二铜表法"——最古老的（约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罗马法文献，记载于十二块铜版（"铜表"）上的法律准则汇编。

"十二铜表法"内容提供了古罗马社会关系多方面认识。菲德鲁斯（公元前一世纪）——第一个罗马寓言家。改编了伊索寓言，针对罗马现实用讽刺形式补充了它。——译者

史主义为基础认识世界与生活的能力——成为几乎自发表现的他的第二天性的能力，因为所有这些知识不是墨守成规地由纯粹教养“动机”中注入他的头脑的。这样的学习纵然也没有明显表现的意图受到了培养，在教师极少参加“教养”下受到了培养。不要“思考”，不要经常地照镜子，就获得了逻辑、美学、心理性的经验，特别是在“综合法”、世界历史实在发展方面获得了特别巨大的经验。这并不意味着（和荒诞地这样想）拉丁语和希腊语本身具有内在奇迹式的教养性质；这就是整个的文化传统，它也（而且特别）在校外存在，仅在某种环境下提供类似的效果。

由此可见，显然，随着传统认识文化的变迁，学校进入危机时期，正如拉丁语与希腊语的学习也进入危机时期一样。

作为起教育作用学校的支柱，拉丁语和希腊语应予代替，并且它们将被代替，但将不易使新课程或一系列新课程，附属于这样的教学程序：保证由童龄开始到选择职业开始在培养与形成个性中有相等的成效。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学习或大部分学习应该是（或者学生看来）无私的，即是不追求直接实际的或过份实际的具体目的；学习应该是教育性的，甚至是“启发的”，即是充实具体知识的。在现代学校中，由于文化传统和生活与人的概念的深刻危机，出现了逐渐变形的过程，负有适应直接实际利益使命的职业型学校，凌驾于不是直接追求实用目的的纯粹教育性学校之上。但是这件事最大的似是而非的方面，是这种新型学校仿佛是民主的，并因此而出色，但这种学校的用途，不仅为了使社会差别永恒化，而且为了把它们固定化于凝固不变的形式上。传统学校是寡头政治的，因为它作为领导集团新的一代之用，而新的一代又应该成为领导集团；但它在教学法方面不是寡头政治的。给予一定类型学校以社会特征的，不是具有领导能力，不是形成高级人物的倾向。给予社会特征的由于以下事实：每一社会集团有其自己类型的学校，旨在

把一定传统的职能，即领导的或生产的职能在这些阶层中永恒化。由此可见，为要打破这种阴谋，需要的不是职业学校类型的数量，不使它们的阶段复杂化，而是设立统一类型的准备学校（中小学校），它引导青年走向选择职业的边缘，同时形成他的个性，能够思想、研究、领导或控制那种当领导的人。

因此，职业学校由于它的类型多样，所追求的目的是使传统的差别永恒化，但因它要适应这些差别，力图引起内部分化，正因此形成了一种它具有民主传统的印象。例如，社会上存在着粗工与熟练工，农民与几何家或小农艺师等等。但是，民主倾向在内部并不能只说是粗工成为熟练工人；它是说每个“公民”能够成为“执政者”，并且社会把他们，就算甚至是“抽象的”，置于一般条件下，在这条件下他可以达到下面一点：政治民主力图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关系和协化（指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上的统治），保证每个被统治者有可能逐渐发展其能力与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需要的一般技术修养。但是作为人民的学校而发展的这样类型的学校，甚至也不再想更加保持幻想了；它日益更加组织得要使在社会－政治环境中缩小技术有修养的领导阶层的基础，更加限制“个人创造精神”，其意义在于发展这种能力和实现技术－政治上的修养这样地进行：实际上宁可重返在“法律上”形成阶梯的划分，而不愿克服集团的划分。这种倾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增加职业学校的数量，从开始就日益力图使学习狭隘的专门化。

至于中小学中教条主义和批判的历史主义，则应当指出：在教育领域本身教条主义中，在赋与具体知识方面，即在某些教条主义实际不可分割，而只能在学校课程整个体系之内才能融化（在小学与文科中学不能教授历史语法）的地方，新的教育学愿意打开一个缺口；但这种教育学后来不得不和纯粹教条主义之渗透宗教意义领域相妥协，其结果也是和作为梦话与狂行交替的全部哲学史的

解释相妥协。至于研究哲学，则新的教育学课程（至少对于那些在校外、家庭或周围环境得不到智力帮助，并且他们的认识只应根据班上得到的知识来形成的那些学生——他们的绝大多数）使教授课程贫乏，虽然从合理的观点看来，这种教学纲要仿佛是乌托邦式地美好，而实际上是降低教授时的水平。由哲学史教程引言和某些哲学家著作阅读所充实的传统叙述哲学，仿佛实际上是优秀的。叙述的和固定的哲学，应当象语法和数学一样，是教条主义的抽象，但是教授这种哲学必须就教育学的和教学法的方面考虑。"一等于一"这是抽象，因此任何人都没有想到一个苍蝇等于一头大象。同样是形式逻辑的规则——这类的抽象也仿佛是正常思维的语法，但是毕竟需要研究这些对象，因为它们不是某种天生的东西，而是应当在劳动的基础上，并且借助思考掌握的。新的教程规定，形式逻辑是当人在思维的时候，已经拥有的某种东西。但是并没有说明，怎样得到这种逻辑；这样实际上仿佛人们假定这是天生的本质。那怕学习由于必要是提纲式的和抽象的，形式逻辑也正如语法一样，融合于"活生生的"方法；这是因为学生不是留声机的底板，不是被动的机械的电池，那怕是弥撒式的考试虚仪，也会引起他有时看来是这样的。在这些教养图式和儿童聪明之间的相互关联，永远是积极的和创造性的，正如工人及其劳动工具之间的互助是积极的和创造性的一样；口径也是抽象的总和，并且如果没有定径器简直就产生不了反映社会关系和建立于其上的思想。

儿童们苦恼于 barbara, baralipton①，当然疲惫不堪，需要寻求一种方法，以便他只付出一些必要的劳动，而不是更多的劳动；为了学会迫使自己对付体力活动方面的困苦和限制，即是受到身心方面的考验，他必须常常是疲倦的，这一点也是对的。必须使许

① Barbara, baralipton（拉丁文）——逻辑上三段论法第一格的两种方式。——译者

多人相信，学习也是一种技能，并且是一种最令人疲劳的技能，伴随着它的是专门练习——不仅是脑力的，也是肌肉—神经的；这是一种适于掌握技能劳动并取得成果的过程，它引起苦燥无味甚至痛苦。广大群众参加中等学校的活动，引起了一种倾向，削弱学习纪律、和缓"减轻苦难"的要求。事实上许多人以为这些困难是人为的，因为他们习惯于认为只有手工劳动才是劳动并引起疲劳。但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当然，出身于具有固定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儿童，易于克服身心适应的过程；他第一次进入班里，就已具有某些比其同学优越之点，由于他在家中所掌握的习性，他已经有了一定方向；他易于集中注意力，因为他习于集中体力等等。城市工人的孩子也正相同，他们进入工厂，要比已经习于农村生活的农民儿童或青年农民受的痛苦较少。营养情况也有重要性等等。因此，许多来自民间的人以为，在学习的困难中，隐藏着"技巧"损害他们（当他们并不以为糊涂出于天性的时候）；他们看到什么样的老爷（对特别在乡村的许多人看来，老爷就是知识分子）巧妙地，并且仿佛轻易地完成着他们孩子们以热泪和鲜血才能做到的工作，并且想到这里有什么"技巧"。在新形势下这些问题能够成为特别尖锐的问题，并且人们应当反对那种把不能成为轻易的事，不只是本身的事简单化的倾向。为了要造就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包括传统上没有发展了相应技能的社会集团出身的绝大多数专家，应当将克服从所未闻的种种困难。

II. 文学批评问题

艺术与争取新文明的斗争

从作品的艺术性观点评价艺术作品，显然指出，特别在实践哲学中，那些拥有一些陈腐而千篇一律公式的鹦鹉学舌者自负的天真朴实，认为自己具有打开任何门户的钥匙（这些钥匙自称为“百宝钥匙”）。

两个作家能够表现同一社会-历史因素，但其中一个是能够做艺术家，而另一个不过是个画匠。记述只限于两个作家对社会关系所指出或表示的东西，即是比较顺利地总结一定历史-社会因素的特点，并且从而解决问题，这就留下艺术问题完全不可接触。所有这些能够是有益的，并且是必要的，此外，真正是这样的，但是只有在另外的区域——在政治批评、风尚批评的区域，在为破坏与克服某类意见与信仰、对待生活与世界的某种立场的斗争中，但是，这不是批评，并且不是艺术的历史，而且能够认为这样只是由于科学思想概念、倒退或停滞的完全混合，这也恰好是使为文化而斗争所追求的目的，不可能达到。

一定的历史-社会因素永远不是统一的，恰好相反，它是充满矛盾的。它具有“面貌”，由于活生生的活动的一定的基本形式，其中占有优于其他形式的地位，是历史的“顶点”，所以它是发展的“因素”。但这就以隶属、分歧、斗争为前提，显示出活动的优越形式，即这种历史的“顶点”的人，应该是某一因素的描写者；但是，怎

样估价那些显示其他活动形式，其他的活动因素呢？难道这后者不也是“被描写的”因素吗？表现其“反动”的、不合时代的因素的人，不也是“要素”的描写者吗？或者需要认为描写者的，只是那些将表现相互对立的一切抵抗力量和处于斗争状态中的，即是描写一切历史-社会整体矛盾状态的成分的那些人？

当然，可以想到，对文明的文学的批评，为建立新文化的斗争，是艺术的批评，其意义为新文化产生新艺术，但这将是一种诡辩。无论如何，为了根据类似的前提可以更好地使自己了解戴·桑克蒂斯—柯罗齐的相互关系和内容与形式讨论的本质，是可疑的。戴·桑克蒂斯的批评是富有战斗精神的，而不是“冷淡无情”美学的批评，这是文化格斗和对立的世界观冲突的批评。内容的分析、作品“结构”的批评，即是获得艺术体现的一切多种形式情感逻辑的和历史上真正连贯性的批评，和这个文化斗争是相联系的：戴·桑克蒂斯的那种深刻的人道精神和那种人道主义，看来也正在这里，它们就是在今天也使这个批评家成为如此讨人喜爱的。令人愉快地感觉到其中党人的热情的火焰，党人具有坚定的道德与政治信念，他并不隐瞒，也不愿隐瞒这些信念的。柯罗齐拆散了批评家这些不同的观点，而戴·桑克蒂斯的这些观点，是以有机的统一和混然一体突出的。戴·桑克蒂斯方面真正文化的志向，柯罗齐方面也是同样存在，但这种志向还是在它们推广与胜利时期存在的；斗争继续着，但在这次已经是为了改善文化，而不是为了争取文化的存在权：热情与浪漫主义的火焰，以崇高的精神开朗和充满宽容的善心并发出来了。但这个立场在柯罗齐方面不是经常的；它为时期所代替，在这个时期，精神开朗与宽容被撕裂了，并且表面显示出痛苦和很难被压抑的愤怒。这个时期是防御的，而不是进攻的，充满了热情的，因此，不能把它和戴·桑克蒂斯立场表现的时期相比拟。

总之，实践哲学具有的文学批评的典范，是戴·桑克蒂斯提出来的，而不是柯罗齐或任何其他人（卡尔杜奇更说不上）。这个批评应当和甚至具有讽刺形式的一切偏颇的热情融合一致为争取新文化而斗争，即是为争取新的人道主义、批评风尚、意见和带着美学的或纯粹艺术的批评的世界观而斗争。

近来"呼声"（Воче）立场所表现的时期，适应了、但是最低度地适应了戴·桑克蒂斯立场所表现的时期。戴·桑克蒂斯为在意大利创造反对传统旧事物、空谈阔论和伪善（葛威拉齐与修道士勃烈拿阿尼）的崭新的高度民族文化而斗争；"呼声"仅仅为普及同样文化于中等阶层、反对土头土脑等等而斗争。"呼声"是战斗的柯罗齐派的观点，因为它想要把戴·桑克蒂斯的根据必要性是"贵族"的东西，和柯罗齐的作为"贵族"的保持住的东西加以民主化。戴·桑克蒂斯想要把文化本部组织起来，而"呼声"力图普及同样的文明形式于下级军官，因此具有一定的意义；它的著作涉及最本质的东西，在以下的意义上引起艺术流派的出现，它帮助许多人发现自己本身，唤醒对内心精神生活的巨大需要，而在其真实的说法，纵然业经产生的"呼声"运动也没有造就任何一个巨大的艺术家。

腊法厄耳洛·腊马在1934年2月4日《意大利文学》写道："有个什么人本来说过，第二流的，而不是伟大作家的研究，有时对于文化史是更有益的；而这一点部分是正确的，因为不再属于某一特定时期（当人的自有品质载入史册时，而这点是发生过的）的个性归根到底在伟大作家方面如果战胜的话，那末在其他，在二流作家方面（仅仅这是善于观察的和自我批评的聪明）可以以巨大的明确性辨别个人文化辩证的因素，因为在伟大作家方面发生这种情况时，它们则不能融为一体"。

这里指出的问题，通过在1930年4月6日《意大利文学》上登载的阿耳弗烈多·加尔朱洛《由文化到文学》一文竟至荒诞的道路

得到证实。正如其他同样一系列文章一样，该文表现出加尔朱洛（许多没"成熟"的青年人之一）知识的最充分的枯竭)。他因和这个"意大利文学"匪帮相勾结完全堕落了，在上述一文中他把乔·巴·安卓列特提给恩里科·法里基和厄利奥·维特托里尼所编《新作家文集》序言中发表的以下判断当做真理："因而这些作家是新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找到新形式、新题材，——完全是相反的！他们之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对艺术有新的理解，不同于他们先行者的作家的理解。或者，他们直接转向事物的本质，成为新的，因为他们相信艺术，而那些人相信和艺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许多其他东西。

传统形式与旧内容的结合，因此在这样新事物条件之下可以允许，它只是不能允许偏离艺术的基本思想。思想应当包括于其中，在这里重复是不适当的。但是，是的，让我将记住，新作家们完成在充分沉默(！)中通过的革命(！)时，并不因此而较少记忆(！)，在他们先行者满足于道德家、宣传家、有唯美观点者、心理学者、享乐主义者等等的地位的地方，他们一心一意首先要当艺术家"。

判断不够明确的和有体系的，如果可以从其中引出具体的东西，那末这完全只是"矫揉造作主义"① 的倾向，并且只此而已。

这种对艺术家作用的理解，是谈话时"谛听语言"口号的新的变体，是造成"毫无价值的思想"新方法的宣传。而"毫无价值的思想"的创立者，不外是一切诗人形象的创立者，以这个由朱捷朴帕·翁加烈特提（并且，他用不正确的在颇大程度上法兰西化语言写作）为首的"匪帮"自负。

"呼声"运动不能造成名副其实的(ut sic)②艺术家，而这是显然的；运动也直接推动独具一格的艺术性的形成前进，它为新文化

① Сечентизм——十七世纪意大利作家特有的装腔作势的文体。——译者

② 拉丁文。——译者

而斗争，为新的生活方式而斗争，因为艺术也存在于生活本身。安卓列特提所说的“沉默的革命”完完全全是由谈话（咖啡馆内）和标准报及外省杂志上平凡的文章组成的。“艺术献身者”的离奇形象，甚至在宗教仪式变化的情况下，也已不是这样巨大的新事物了。

仿佛是显然的，为了十分准确，应当说为“新文化”而斗争，并不是说为“新艺术”而斗争（就直接的意义说）。为了十分准确，也许不能说，进行斗争是为争取艺术的新内容，因为艺术不能抽象地、脱离形式而想象。为新艺术而斗争，即是为造就新型个别艺术家而斗争，而这一点是荒诞无稽的，因为艺术家并不能人为地造就。应当谈为新文化而斗争，即是为不能不内在地与新的活跃的洞察力相联系的新的精神生活而斗争，——除非它成为感性认识和观察现实世界的新方式，因而内在具有新的“可能的艺术家”和“可能的艺术作品”的文明的斗争。

人为地造就个别艺术家之不可能，因而并不意味着为之而斗争的新的文化利益范围，在唤起人道的爱好心和热情时，一定不唤起“新的艺术家”；换言之，不能说某某和某某成为艺术家，但可以断言，运动要产生新艺术家。新的社会集团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心，以领袖、领导者形式登上历史舞台时，不能不从自己个体内部出现，而这种个体前此还没有找到足够的力量，以便在确定的方向表现自己。

由此可见，不能说根据几年前流行的时髦话出现了新的“富于诗意”的气氛。“富于诗意”的气氛只是一种借喻，表示所有艺术家总体，已经形成和表现，或至少已经奠定自己形成和开展足够稳定过程的开端。

与此相联系，应当转而注意柯罗齐著《十七世纪意大利文学新论》（1931）① 一书第 12 章，其中他谈到天主教徒的诗学研究院，并认定它们近于俄国设立的“诗学学校”（柯罗齐大约是从同一 Fu-

llop-Miller'a〔富洛普-米勒尔〕得知的)。

但他为什么不认定它们接近于十五至十六世纪巧妙的写生与雕刻呢？同样是"天主教徒研究院"。而且为什么在写生与雕刻方面所做的事，不能在诗学方面做呢？柯罗齐不考虑"愿有"自己本来诗学的社会因素，"没有学校"的因素，即是不具有"技术"和语言本身的这样因素；实际上，问题是成年人的"学校"，这种学校培养兴趣，并且形成广义的"批评"意识。"描摩"拉斐尔画的写生家通过"天主教徒研究院"么？对写生家说来，这就是专心致志于拉斐尔艺术的最好办法，写生家是力图使拉斐尔的艺术再现等等。

为什么工人不能练习作诗呢？难道这不是使他们的听觉更易于接受音乐(诗的)等等么？

"培养的艺术"

"艺术培养着，因为它是艺术，但不是'培养的艺术'，在最后的场合，它是某种东西，而某种东西不能培养。当然我们大家仿佛一致都想具有类似第一次复兴时期的艺术，而不是类似例如邓南遮时期的艺术；但在实际上，如果好好地想一想，这种愿望——不是愿望一种艺术宁可比另一种好，一种道德现实比另一种好。这就象以下情况：当一个人愿意在镜子里看到美丽的面孔，而不是丑陋的面孔时，他愿意具有的并不是异于他面前的另外一面镜子，而是另外一付面孔"。②

"当诗的作品或诗集已经形成时，这诗集不能以研究、模仿的

① B. Croce, Nuovi saggi su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del Seicento, capitolo XII: Poesia latina nel Seicento, pp. 135—136 (1931)。——意文版编者

② 柯罗齐：《文化与精神生活》，《信仰与纲领》章 (B. Croce, Cultura e vita morale, capitolo: Fede e programmi (del 1911); pp. 169—170)。

方法和借助该作品题目的变换来继续：这个方法仅仅引导到所谓诗的学校，模仿的 servum pecus①。诗不产生诗：'单性生殖'这里没有地位；'雄性'因素的干预是必要的——这是实在的、热情的、实践的、道德的。最有影响的诗的批评家，在这种场合下，推荐的不是诉诸文学处方，而正如他们所说，是'改造人'。"在人将改造好以后，他的精神更新，感觉将体验到新的生活，就会产生新的诗篇②。

这种观察可以由历史唯物主义运用。文学不产生文学等等，即是意识形态不造成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不产生上层建筑，例外的是由于惯性和被动而继承，它们的产生不是通过"单性生殖"的方法，而是由于"雄性"因素的干预、革命活动历史的干预的结果，它造就"新人"，即是新的社会关系。

由此也可得出结论，"旧人"也因变革成为"新人"，在原来的关系成为被推翻的关系之后，就进入于新的关系。这也是因为下面的事实，当积极地被造就的"新人"把自己表现在诗篇中以后，可以看到否定地被革新的旧人"最后杰作"的出现；而这最后杰作往往具有惊人的光辉；其中新旧结合起来，情感达到无与伦比的灼热等等。(难道"神的喜剧"不是这样的程度上的中世纪最后杰作，来预前想到新时代和新历史吗？)

文学批评的标准

艺术就是艺术，而不是"预谋的"和先写好的宣传的这种想法，本身能否成为形成一定文化倾向的障碍，这种倾向是自己时代的

① 牲畜(拉丁语，骂人话)。——译者

② 柯罗齐：引自《多余的哲学》章(B. Croce, op. cit., capitolo: Trappa filosofia(del 1922); pp.241—242)。

反映并且有助于加强一定的政治倾向呢？没有这样想法。也许恰好相反，这种想法给与问题的更激进的提法，做了更积极与坚决的批评。我们假定在艺术作品中应当研究的只是艺术质量，可无论如何并不排除研究集中什么感情，对待生活是什么态度贯穿着艺术本身的作品。现代美学倾向允许这一点，这可以在戴·桑克蒂斯和柯罗齐本人方面看出来。例外的只是为了使艺术作品由于其道德与政治内容，而不是由于形式被认为是艺术的，抽象的内容在形式上并非如此，它是溶合起来并且混同起来了。还要研究的是艺术作品是否由于作者因外部实践的即是虚伪的和不诚实的考虑偏离了〔他所选择的道路〕。我们看来，争论的决定性问题如下：某某人"愿意"把一定内容矫揉造作地贯穿自己的作品，而不去创造艺术作品。这一艺术作品的站不住脚（因为某某人在他真正感觉到和体验到的其他作品中显示自己是艺术家）表明：某某人的这类内容，是什么也没有谈的、和从所未闻的题材，某某人的热情是虚伪的，是从外部付与的，实际上在这一具体场合，某某人并不是艺术家，而是力图逢迎主人的仆从。由此可见，有两种事实：一种是属于纯粹艺术的美学方式，另一种是属于文化政策的即是单单属于政治的美学方式。与否定艺术作品价值相联系的事实，其本身可以为政治批评所利用来证明作为艺术家的某某并不属于某一特定的政界，因为在其中正如在个性上艺术家占优势地位，所以在其内心双重个性生活上，这种特定的世界并没有出现，并不存在。因此，某某人是政治丑角，他愿人们把他当另外的人看待，而不把他实际上是谁看待等等。所以政治批评家不把某某人当艺术家揭穿，而是作为"政治上机会主义者"揭穿。

如果政治活动家施加压力，旨在使自己时代的艺术表现一定的文化界——这将是政治的行为，而不是艺术批评的表现，因为为之而进行斗争的文化，是活生生的和必要的事业，文化发展的愿望

成为不可遏止的，并且要寻找自己的艺术家。如果不顾压力，不看到这种愿望，而愿望也不起作用，那末这就是说，问题在于虚假的伪造的文化，问题在于平平凡凡的人纸上的热心，他们抱怨居于更高地位的人和他们不协调。提出问题本身的方法，可以作为文化与道德稳定的标志；而实际上，所谓"书法式"不外是保护微不足道的小艺术家，这些艺术家机会主义地维护某些规则，但他们感到给与它们的艺术表现，即是使它们体现在自己直接活动中软弱无力，并且梦想成为其本身内容的纯粹的形式等等。精神范畴不同的正式原则和它们要求的一致，纵然在其抽象形式上，却允许人们理解真正的现实，并且对那些或者不愿公开露面，或者随便成为偶然居于重要地位的平凡人物的恣意妄为和虚伪生活给以批评。

1933年《法西斯教育》(Эдукационе фашиста) 3月号上应该看到阿尔哥的文章，他在文中和波利·尼赞（见他写的《外国思想》一文）就智力与道德完全复兴的结果可以产生新文学的概念争论。有人以为尼赞从想象完全恢复文化前提，并且限制自己研究领域的定义开始，正确地提出了问题。阿尔哥唯一有根据的反驳归结如下：不能放过新文学的民族的、本地的阶段以及尼赞概念的"世界主义的"危险。从这个观点看来，应当重新审查尼赞针对法国知识界集团——从«NRF»①(《法兰西新评论》)、民粹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等等直到《世界报》(Monde)集团——的许多批评文章，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批评文章没有在政治方面提供公正的打击，而正是因为要使新文学在比较杂乱的联合和各种联系中，没有自己的"民族的"表现是不可能的。调查和客观地研究一切倾向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必须记住以下的标准：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文

---

①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意文版编者

学家比政治活动家不可避免地将具有较少精确和确定的前景，他应当是较小的“宗派主义者”，假如可以这样表达的话，但是在“矛盾的”意义方面。对政治人物说来，每一“固定”形象，首先是反动的，政治家把一切运动看成是它的形成。恰好相反，艺术家应当具有“固定的”形象，这是它们最后形式所赋与的。政治家想象人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而正在同时，人应该是为要达到一定目的的那种人；人的工作恰好也在于引导人于运动之中，使他们超出今日的界限，并且使他们用集体方法成为有能力达到已定目标的人，即是与目标“相适应”的人。艺术家对个别的、未形成的事物等等的某种因素，有必要指出“本来是什么”——现实主义地指出来。因此，政治家从政治的观点看，永远也不满艺术家，而且也不能成为艺术家；政治家永远要寻找那种当尾巴的人，永远不适合于时代的人，永远落后于现实运动的人。如果历史是自觉心的解放和发展的不断过程，那末，显然，任何历史阶段，而在某一场合——文化史阶段将迅速地被超越而不再引起人们的兴趣。我认为在评价尼赞对各种集团的判断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但是从一定的客观的观点来看，象伏尔泰那样的人在今天也还是对某些阶层居民的“现实”的人，恰好一样也能成为现实的，并且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些文学集团和它们所代表的联合；在这种场合下，“客观的”一词意味着智力与道德的革新，在一切社会阶层中不是同时发生的，即使在今天——记住这一点也是有益的——许多人仍是托勒密的拥护者，而非哥伯尼的拥护者。

存在着许多“一致主义”形式，许多为“一致主义”新形式和是什么（已完成的变换）与在实现什么之上工作（并且存在着许多在这方面工作的人们）之间不同的联合而斗争的表现。站到进步发展“一个唯一”路线观点上，一切新事物溶合于其上并且成为其他成就的前提，将有严重的错误；存在着的不仅是许多路线（道路），

而且在“最进步的”道路上也发生倒退。此外，尼赞不能提出供广大读者阅读的所谓“大众文学”问题，即是发表在“附刊”上的（惊险、侦探、“黄色”等等）文学在人民大众中享有的成就问题——电影、杂志有助于此种成就。而所有这样的问题，代表着新文学问题的大部分，因为它是智力与道德革新的表现；要知道只有从“附刊”文学的读者中才能选拔造就新文学文化基础必要的和足够的公众。在我看来，问题在于下面：怎样建立文学家的队伍？从艺术水平的观点看，正如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欧仁·苏或苏利耶，或者正如切斯脱顿在侦探小说领域中对柯南道尔和威尔斯等等，这种文学家对“附刊”文学采取同样的态度吗？在这些条件下应该放弃许多成见，但特别需要想到不仅不能确立垄断，而且相反，在保护出版利益方面存在着庞大的组织。

更流行的是以下一种成见：新文学应当和知识来源的一定艺术学校等量齐观，正如这和未来主义一样。新文学不能不具有历史的、政治的、人民的前提；这种文学应该努力深入研究已经存在的东西——，用争论或者其他方法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要使新文学扎根于人民文化富饶基础，人民文化，正如文学那样，有它的趣味、倾向等等，有它的道德与智力境界，甚至就让它是落后并且相对的。

III. 人民文学

内容与形式

在艺术批评上这两个名词的接近，具有许多意义。内容与形式是同样的等等的假设，还并不是说内容与形式之间不能作出区别。可以说，拥护“内容”的人，实际上为一定的文化、为反对其他文化与其他世界观的一定的世界观而斗争；也可以说，如果历史地看待问题，那末，至今所谓“内容拥护者”，例如，比较他们的高蹈派诗人的反对者“更加民主”，他们愿意有的文学，不仅专为“知识界”等等之用。

可以不可以说内容优先于形式呢？可以就如下的意思说，艺术作品是一个过程，并且内容的变化，也是形式的变化；但谈内容比谈形式“容易的多”，因为内容在逻辑上能够被“总结”起来。当人们说内容对形式有优先权时，简单地愿意说作品加工过程中所从事的一连串的努力，作为内容的变更呈现出来，只此而已。不满意于原先的内容，也是形式，但当“满意的形式”已经达到时，往往以为内容也改变了。众所周知，关于形式等等饶舌的人，把形式和内容对立起来，说得完全是一大堆混乱的空话，而且常常不遵守语法（例如，翁加烈特提），他们所理解的技术、形式等等，是够得上一堆空头行语的空洞东西。

这也是意大利民族史问题之一，并且在各个场合，它具有不同的形式。在为公众所写的文章与其他文章，例如在文学作品与信件之间存在着修辞学上的差别。常常看来仿佛与两种不同的作家有关——这种差别是如此之大。在信件中（有一些例外，比如邓南遮

甚至站在镜子面前表演喜剧，只是为了自己而已），在回忆录中以及一般在供窄狭范围之用的和自用的一切文章中，占重要地位的是温和、简单、直率，而在其它文章中占重要地位的，往往是夸大其词、动人听闻、朗诵格调、花言巧语。

这种"病症"如此普及，以致传染到人民，因为这病态"写作"，现在意味着搔首弄姿，造成兴高采烈气氛，和"宁愿"废话连篇，往往言不由衷；因此，人民不是文学家，至于文学，人民知道的只是十九世纪的歌词，结果，人民中来的人们"传奇剧化"了。那正是当时"内容"与"形式"除"美学"意义外，也有历史意义。"历史的"形式意味着一定的语言，而"内容"则指一定的思想方式，不仅是历史地连贯的、而且是坚定的、富于表达力的，但没有打咀巴的；热情的，但没有要使热情成为通红地炽热，如象"奥塞罗"（Отелло）① 或传奇剧中那样，总之，没有戏剧的假面具。我认为这只在我国有地位，诚然，这是大规模的现象，因为个别现象到处都有。但是需要注意，因为我国是一个追随巴乐歌式② 程式接着而来"阿尔卡吉"③ 程式的国度，却永远保持着戏剧性和程式的国度。有必要说，这些年份情况大大改进了；邓南遮是意大利人民病症的最后冲击，并且他的报纸追求着自己的目的，在散文"合理化"方面取得成就很多。但是散文使报纸贫乏和狭窄，以致也是有害的。可惜，除开"未来主义者—反学院派"之外，在人民中还存在着变相的"矫揉造作派"。从另一方面，这里提出历史问题，以便说明过去，而不纯粹是现代的斗争，以便消除现代的祸害，纵然祸害在其以前的形式中并未完全消灭，并出现于某些特种表现上面（在隆重的演说中，特别是在墓地爱国主义碑铭等等上）。可以说这里谈到各种趣味，但这是错误

---

① "奥塞罗"系莎士比亚剧作。——译者

② 巴乐歌式系欧洲16—18世纪建筑程式。——译者

③ "阿尔卡吉"系希腊古代一以牧羊为主之州，用作世外桃源之意。——译者

的。兴趣是“个人的”或者不大的集团固有的，而这里谈的是广大群众，因此不能不谈作为历史现象的文化、两种文化的存在；“坚定”的兴趣含有个人性质，不过，传奇剧适应民族兴趣，即是民族文化。

也不能说，这样的问题没有必要来研究——相反，写作生动的和富于表现力的，同时又是有分寸的和有节制的散文，必须成为文化目的之一，文化目的需要自觉地提到自己面前。由此可见，在这种场合，形式与表现混为一谈也好，拥护“形式”也好，不外是实践手段加于内容上面的工作，其目的是破坏传统的空谈，这种空谈毁坏每种文化形式，甚至——唉！——连“反空谈”的形式也破坏！

对于是否存在意大利浪漫主义的问题，可以提出不同的回答，这取决于怎样理解“浪漫主义”。当然，“浪漫主义”一词，存在着许多定义。这些定义之中的一个对我们重要，而重要的恰好不是问题的“文学”方面。“浪漫主义”一词在其他意义中，具有知识界与人民、民族之间特别相互关系或者联系的意义；浪漫主义是文学上“民主”（广义地）的部分反映（广义的说，甚至天主教可以成为“民主”的财富，而自由主义却不能成为“民主”的财富）。

在这个意义上——引起我们兴趣的问题适用于意大利——浪漫主义存在的问题和其他种种问题相联系：意大利戏剧是否存在的问题、语言问题，为什么文学不是人民的文学等等问题。因而在无限辽阔的关于浪漫主义文学中，有必要特别注意这种情况，对它既然显示理论的兴趣，同样显示实际的兴趣，——正如显示历史事实一样，同样显示社会的趋势，这种趋势能够给现代运动、期待自行解决的现代问题以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预报、伴随、肯定并发展由法国革命得名的一切欧洲的运动。这是它的感伤主义的文学方面（而比文学方面更加感伤主义的是在下面的意义上，文学方面只是感伤主义倾向部分的表现，这种倾向贯穿了整个生活，或者至少是绝大部分生活，可是这种生活仅有极小一部分，表

现在文学上面)。

文学著作可见就是文化的历史，而不是文学史，或者说得好些，不是文学的历史，因为它是更广泛的历史——文化的历史的一部分和一方面。这样看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不存在于意大利，在最好的场合下，它的表现是很不重要的，是无足轻重的，并且无论如何含有纯粹文学的性质[①]。

有必要研究这些讨论在意大利怎样采取了理智和抽象的性质，乔别蒂的“彼拉斯吉人”，“罗马前居民”等等，和现代生活着的人民相联系的东西是丝毫也没有的，恰好相反，梯叶里感兴趣的是现代人民和人民有亲密关系的政治的历史编纂学。

上面已经指出，“民主”一词不应理解为只是“世俗的”或“半世俗的”意义，象人们愿意使用它那样的含义，并且不应理解为“天主教的”，甚至反动的(如果愿意的话)意义；重要的正是以下的事实：人们寻觅与人民、与民族的联系，所谓联系就是指必要的一致，不是被动顺从引来的奴性一致，而是积极的一致，充满生活的一致，而不论这种生活内容如何，意大利缺乏这种生动活泼的一致；至少在足够使之成为历史事实的阶段上是缺乏的。由此而知“意大利浪漫主义存在吗？”这一问题的涵义是明明白白了。

关于“民族—人民的”概念

1930年8月1日那一期《法西斯批评》的一则简讯中诉苦说，两家大的日报——罗马的和那不勒斯的——作为附刊开始登载了以下的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仲马(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和《朱塞佩·巴尔扎摩》以及玻利·方田的《一个母亲的苦难》。《法西

① 因此，必须想起梯叶里的理论，以及这种理论在曼卓尼方面的反映。梯叶里的理论恰好是浪漫主义这些表现最重要方面之一，关于这些表现是我们打算要谈的。

斯批评》写道："毫无疑义，十九世纪在法国，是报纸附刊连载小说[①]的黄金时代，但是，好似一种口味、兴趣转载百年以前之久长篇小说的这些报纸，关于自己读者应当有着怎样的贫乏印象，文学的体验从那时起完全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现代意大利长篇小说存在着呢？（尽管有对立的意见）。为什么需要思索意大利人民情愿倾注笔墨的泪水于祖国创作的不幸命运之上呢？"

《批评》把不同程序的问题混为一谈：在人民中所谓艺术文学不大普及的问题和意大利没有"人民的"文学，因而"被迫"从国外供应杂志的问题。（当然，理论上说，没有什么东西阻碍艺术的人民的文学存在；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小说家在人民中曾有的声望，而现在也还有这种声望；但是，在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艺术文学的人民性，并不存在什么地方创作的"人民"文学，因为"作家"和"人民"的世界观没有同一性。换句话说，作家不以人民的感情为自己本身的感情而生活，并且不起"民族的一教育的"作用，即是在人民的感情受到作家的体验并成为作家自己的感情以后，他们并没提出，也不要提出发展人民感情的问题）。《批评》不提这些问题，并且不善于从以下事实中得出"现实主义的"结论：如果百年以前之久的长篇小说人们喜欢的话，那末这就是说人民的口味和意识形态，仍然和他们在百年前是一样的。报纸是政治-财政的机关报，因此假如优美创作不使收入增加时，报纸就不以传播优美创作于本地区为目的。报纸的附刊形式是传播小说于人民各阶级之中的手段（回想起日内瓦《劳动报》（Лаворо）的例子，该报为乔万尼·安萨尔多领导，他以附刊形式转载了一切法兰西文学，同时力图使日报的其他部分都具有这种最讲究的文化的腔调）；而要知道这就是政治的和财政的成就。因此，报纸寻找"有把握"讨好

① Роман-приложение (romanzo d'appendice) 葛兰西用以表示发表在报纸上的连载小说。——译者

人民、保证"连续不断"的经常主顾的这样小说或者这类小说。人民中的个人都购买一份报纸（假使只买一份报）；选择报纸常常不是个人的事，而是由家属的兴趣决定的，这里妇女占有最大比重，她们拥护"很有兴趣的小说"(这决不是说男人不看小说，这只是说妇女对小说和各种往事叙述特别地感兴趣)。由此得出一个以下的经常事实：纯粹政治性和理论性的刊物什么时候也得不到大量推广(紧张的政治斗争时期除外)；上述刊物争取到的青年、男人和女人是对家庭不大负责关心，对自己政见的命运具有坚定兴趣以及少数思想方面巩固联系的家庭。一般地说，报纸读者并不赞成他们购买的报纸的方向，或者只受到报纸方面不大的影响。因此，需要从记者技术的观点来研究"时代"(Секоло)和"劳动"(Лаворо)的情况，在发表三个附刊连载小说之前，这两报出版的目的是保持巨额和稳定印数(人们往往不明白："附刊连载小说"之对于许多读者，正如头等"文学"之对于有学问的人一样；了解《新闻报》发表的"长篇小说"，是瑞士内部宫廷和城市偏僻地区"上层社会的职责"；每期都是"座谈"的题材，"最卓越的人物"在"座谈"中以心理的洞察、逻辑的能力等而出人头地)。可以断言，连载小说读者对自己作者的兴趣和赞美，其诚心诚意与活跃人物的兴味，要比所谓有学问的人在沙龙中为邓南遮的小说或皮兰德罗作品更大更多些。

但是最有兴趣的问题可以认为如下：为什么1930年的意大利报纸，如果它们愿意推广的话(或者愿意保持它的印数)，应当在附刊上登载百年之久以前的小说(或者同类的现代小说)？并且为什么在意大利不存在这类"民族"文学，纵然它是能有收入的？

需要指出的一个事实是，在许多语言中"民族的"与"人民的"是同义词，或者差不多是同义词(例如，在德语中 volkisch 还暗指种族之意，或者俄语以及一般斯拉夫语中)；法语"民族的"一词，具有"人民的"一词意义，但是在政治上已经更是加工了，因为和"主

权"的概念联系起来；但这里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现在有或者过去有同样的意义。

而在意大利，"民族的"一词，有很狭隘的意识形态意义，但无论如何，和"人民的"一词不相符合，因为意大利知识界远离人民，即是远离"民族"（нация），而且恰好相反，他们是和等级传统联系，这种传统从来没有被下层的强大的政治的人民运动或民族运动所打倒；传统是"书本的"和抽象的，而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自己觉得就其程度上说和安尼巴利·卡罗或与伊波利托·平德蒙特① 的联系要比亚普利亚或西西里农民为多。意大利流行"民族的"一词，与这个知识的和书本的传统有关，由此而来的一种愚蠢的，并且终归是危险的轻率——把那些不赞成考古的染有樟脑油味道概念的国家利益的人，称为"反民族的"人。

需要看看 1930 年 7 月《意大利文学》(Италия леттерариа) 乌姆别尔托·弗腊克克亚的文章和 1930 年 8 月《天马》(Пèгасо) 乌戈·奥耶蒂《乌姆别尔托·弗腊克克亚论批评的信》。弗腊克克亚的诉苦，很象《法西斯的诉苦》。"民族的"、所谓"艺术的"文学在意大利并不普及。这怪谁呢？不看这种书的公众么？不善提供和告诉文学"价值"于其公众的批评么？附刊上不登载"现代意大利小说"，而登载老的《基督山伯爵》的报纸么？但为什么在意大利公众不读它，而同时公众在其它国家却读它？并且后来也大概是意大利不读它么？提出以下的问题不是更好些么？为什么意大利公众读外国文学，人民的文学和非人民的文学，而相反，却不读意大利文学？难道那个弗腊克克亚不发表最后通牒给印刷（因而也应该相应地售卖）外国作品的出版人，用政府措施来威胁他们么？而且难道政府的干涉不是上议员米克列·比扬基、内政部代理秘书部

① 伊波利托·平德蒙特（1753—1828）意大利诗人，接近感伤主义文学派。早期作品歌颂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译者

分地插手的事么？

意大利人民优先读外国作家的书那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呢？它是意味着人民感觉到外国知识界的智力和道义领导权，他们觉得自己与外国作家的联系比和“本地”作家联系的程度大些，即是国内在精神与道德关系上不存在民族统一整体——等级制的和谈不到平等的。知识分子没有人民的出身，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也是出身于人民，却并不自觉与人民相联系（如果把动听的空谈放在一旁的话），不知道人民，不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渴望、人民藏在心里的情感；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关系是割断的悬空的等级关系，而不是人民本身组成的部分，体现其有机地固有的职能。

这个问题应该归之于整个民族的一人民的文化，而不能只限于叙述性的文学；同样需要谈到戏剧、一般科学著作（自然科学、历史等等）。为什么意大利没有出现象弗拉姆马里昂那样的作家？为什么没有诞生象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学、大众化科学呢？他们既然阅读和寻求翻译书籍，就是享受巨大的成效。这就是说，一切“有学问的阶级”及其智力活动脱离了人民一民族，并且不是因为人民-民族对这些活动的各阶段，从最低级（报纸附刊连载小说）到最高级（因他寻求外国书籍而肯定这事实）不表示有兴趣，而是因为在人民-民族面前，地方上的智力因素是外国书籍要比外国人本身为多。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它是从意大利国家建立时提出来的，它以前的存在是一个文件，显然指明半岛政治上民族统一形成的缓慢性；在鲁哲罗·朋吉的书中，也谈到了意大利文学的非人民性。并且民族语言问题只是民族与国家精神与道德统一问题的一部分，这种统一是在语言统一中找到的。但语言统一仅是外部现象之一，并且决不是民族统一唯一必要表现！无论如何，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费·马尔提尼的论戏剧的文章中也谈到了这一点。文中断言，在戏剧上坚持的东西，也在一切文学中继续发展了。

无论是叙述和其他风格上，意大利从来没有，现也没有民族的-人民的文学。而在诗作方面没有布兰热式的诗人，和一般法兰西式歌曲作者（Chansonnier）。具有巨大成就，个人孚众望的作家也是存在的：例如，葛威拉齐的成就，他的著作一再印行并推广；卡罗利纳·印韦尔尼威奥读过，也许现在还读它，虽然它的水平比彭桑和芒帖彭挛低得多；马斯特罗尼等人也读过。①

由于缺少"现代"文学，某些少数人阶层就以各种口味满足于自己的智力和艺术要求，这些要求仍然是存在的，虽然它们是以起码的和不定的形式存在的；举例证明这一点，如中世纪的骑士小说的推广——《法兰西王子》，《外号小家伙的格韦里诺》等等，特别是在南意大利和山区；在托斯卡纳区的《五月》之歌（其中题材取自书籍、小说，特别是民间传说，例如，关于皮亚·德·托洛密的传说；关于《五月》之歌及其内容，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文件）。

世俗知识分子纠缠于教养者的自己的历史任务，教养者正在形成人民-民族的精神与道德自觉，他们不能满足人民的知识要求，正因为他们不代表世俗文化，不善于形成现代《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能够推广一直到最粗鲁而不文明的阶层，从民族的观点看来，这正是必要的，他们和陈腐的、可怜的、抽象的、过份个人主义和等级的世界仍然联系着。法兰西人民文学在意大利最为流行，相反地却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以及在可以使人高兴或使人不高兴的方法上）代表着这种现代人道主义，这就是它在现代形式上的世俗的原则；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葛威拉齐、马斯特罗尼和许多其他地方上孚有众望的作家。但是如果世俗知识分子陷于失败，那落在天主教徒身上的也不是巨大成就，而且不值得迷惑于某些

① 卓·帕皮尼于约1916年战时在《古钱报》（Resto del Carlino）写了一篇论印韦尔尼威奥的文章；看看收入帕皮尼文集里没有，他写了一些有趣味的东西，描写孚众望的文学的这一谦逊的母鸡，指出它的声望是怎样在少数人群中诞生的。

天主教书籍已有的大规模扩散——扩散应当是广泛而有力的教会组织负责，而不是自己内心品质负责；书籍在无数礼仪时节赏赐，强迫命令或带着绝望心情读它。

奇怪的是在惊险文学方面，天主教徒收到了最可怜的效果，而他们却具有极其丰富的材料，传教士的旅行和自我牺牲的、往往是冒险生活提供了这些材料。而且简直甚至在地理惊险小说极其流行的时期，天主教文学在这个题材上也是区区不足道的，无论如何不能与这种风格的世俗的法、英、德文学相比拟；红衣主教马斯萨伊阿赴阿比西尼亚的惊险事迹，看来是最显著的书，而所有其余这类书——类似乌哥·米奥尼（当时的神父）的书低于所有的要求。谈及科学—普及文学方面，天主教很少成就，虽然他们之中也有大天文学家，例如，神父谢克基（天主教徒），而天文学是最引起人民兴趣的科学。这种天主教文学散布对天主教的赞扬，好似带有麝香的老鼠，而由于自己的微不足道也是不高明的。天主教一知识分子的破产和他们文学的无大成就，是宗教与人民之间内部脱节存在的显著标帜；人民处于极端漠不关心的状态，而缺乏活跃的精神生活——宗教仍处于偏见状态，但是由于世俗知识界的软弱无力，它没有为新的世俗的人道主义道德所代替（宗教没有象同样是耶稣教的其他国家如美国那样），既没有被代替，也没有被内部变形和国家化；人民的意大利整个还处于反宗教改革直接形成的条件之下；此外，宗教和多神教民间创作交织在一起，并且仍然停留在这个阶段上）。

报纸附刊连载小说为来自民间的人的幻想所代替（同时也发展），这是睁开眼睛睡觉。应当看一看弗洛伊德和心理分析方面论述睁开眼睛睡觉说了些什么。在这方面可以说，人民中的梦想依附于“不完整的综合”（社会的），后者决定着关于复仇、惩罚召祸罪犯等等思想长期的梦想。在《基督山伯爵》出场的，都是为抱有这

种梦想，从而提供减轻病痛麻醉剂所必需的一切成份。

流行小说的各种典型

流行小说各种典型的著名的多种多样是存在的，而且有必要指出，纵然所有典型同时享有某种传播和成就，但其中一种终久占有优势。从这种优势中可以得出关于基本口味的变化的结论，因为从各种典型成就的暂时性中，可以提出证明，在人民中存在着各种文化阶层，在某一阶层中占有优势的各种“感情的凝结”，各种“众望所归英雄人物的典型”。把这些典型作一目录，并且规定它们历史上相对地或大或小的成就，对本段叙述是重要的：1)由维克多·雨果、苏·欧仁的小说(《悲惨世界》、《巴黎的秘密》)所代表的典型；其中清晰地表明与48年意识形态相联系的思想政治的、民主的倾向；2)感伤主义的典型，不是狭义的政治典型，而是表现可以为确定为“感情民主”的典型(里舍布尔、迭库尔谢利等等)；3)以纯粹阴谋形式所表现，但具有保守－反动意识形态内容的典型(芒帖彭)；4)大仲马和彭桑·杜·特里尔的历史小说，除历史性外，还有思想－政治性，但不很显著；不过彭桑·杜·特里尔是保守－反动分子，并且赞扬贵族及其忠实奴隶有与大仲马历史描写截然不同的性质，当然，大仲马也没有表现民主－政治倾向，宁可说是抱有一般“消极”民主情绪，并且往往接近于“感伤主义典型”；5)双重形式的侦探小说(列科克，罗堪博尔，舍尔洛克·霍尔姆斯，阿尔先·柳彭等)；6)黑色小说(幻想作品，秘密监狱等：安娜·拉德克丽芙等)；7)科学－惊险、地理小说，它也许是独出心裁的小说，或者干脆说是有趣情节小说(儒勒·凡尔纳，布斯谢纳尔)。

这些小说典型中的每一个都具有各种不同的民族观点(美国的惊险小说是初期殖民主义者的长篇史诗等等)。可以观察一下，在每一国家的一般作品中，怎样从内心感觉到民族感情，这种感情

不是演说式地表现，而是轻轻渗透叙事小说中。儒勒·凡尔纳和其他法国人有很鲜明的反英情感，这与殖民地的散失和海上失败的痛苦有关：在惊险地理小说方面，法国人接触的不是德国人，而是英国人。但是英国人的情感，既存在于历史小说中，甚至也存在于感伤主义的小说中（例如，乔治·桑；对百年战争、贞德被惨杀和对拿破仑逝世的反响）。

这些小说典型中的任何一个典型，在意大利也没有出现甚至丝毫卓越的作家（不是在文学方面，而且从"商业"价值、阐明情节结构、锻炼成熟而具有某种理性的独出心裁的观点看）。甚至获有国际成就（也包括著作人与出版家财政收获在内）的侦探小说，在意大利也找不到作家；许多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作为其题材的，仍然是意大利以及与它有关的城市、地区、典章和人物的历史波折。这样看来，威尼斯的历史及其政治、司法和警察组织对各国著名小说家已经提供了，并且继续提供题材，独对意大利除外。意大利关于盗贼生活的大众文学有一定成就，但其作品低于每一批评。

最近与最新的大众化书籍典型——长篇小说化的传记，无论如何，是不自觉的企图满足某些人民阶层文化要求的企图，这些要求在文化方面是最朴实的，仲马型的历史满足不了它们。但这种文学在意大利也没有多的代表人物（马茨措克克耳利、切扎烈·扎尔迪尼等等）；意大利作家不能与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相比拟，不仅是在人数上、著作丰富上和引人入胜文学才能上，而特别显著的是他们在意大利境外选择自己题材（马茨措克克耳利、扎尔迪尼在法国，厄乌卡尔迪奥·莫米利亚诺在英国）适应着在历史小说中，特别是在法兰西小说中所形成的意大利人民的口味。意大利文学家没有写马萨尼洛、米克列·迪·兰多、科拉·得·利恩齐的罗马化传记，不认为自己必须用无聊的演说式的"加强法"来充满传记，因为不相信……不思想……等等。诚然，长篇小说化传记的成就

迫使许多出版家开始出版传记丛书。但问题在于对待罗马化传记的态度，正如对待《由莫涅茨家专制》到《基督山伯爵》一样的书籍；问题在于往往经过语文上校订的通常传记提纲，至多可以找到几千读者，但不成为普及读物。

需要指出，上述流行小说的某些典型，在戏剧、而现时在电影中也有它类似之处。达里奥·尼克科米迪在戏剧上有其巨大成就，要归功于他善于把和人民意识形态显然关联的地点与动机戏剧化；在《布头》(Scampolo)、《羽帽》(Aigrette)、《飞行》(Volata)等等就是这种情况。在卓阿基诺·佛尔察诺方面也有此类某些情况，但就彭桑·杜·特里尔模式说，则有保守倾向。具有真正意大利性质的扎科美特提的《公民之死》是在意大利人民间具有巨大成就的戏剧作品；但他并没有重要的模仿者(而如果有的话，也往往不在文学方面)。联系到戏剧方面可以指出，一系列有巨大文学才能的剧作家也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很受市民欢迎，因为在这个剧中，作者的感情和道德倾向在人民心理上找到深刻的反响。如果不去描写联系性格、联系代表了"进步的"缓和①、显示社会最进步的(在精神与道德关系上)部分的戏剧并表现隐藏在现存性格中历史的发展的戏剧解答，那末，所谓"思想性的戏剧"还应当做什么呢？但是这些激情和这种剧本应当作为论题、作为宣传者发言表演，而不是展开，即是作者应当生活在具有其一切矛盾要求的实在世界中，而不应当表现仅仅从书本中拿来的情感。

儒勒·凡尔纳与科学－地理小说

凡尔纳的书中无论什么时候也没有丝毫的完全不可能；凡尔

① 缓和系戏剧创作理论用语，按照亚里士多德学说，所谓激情的消除或缓和，减轻古代悲剧中各种事件对观众引起的同情与恐惧的感情。——译者

纳的主人公拥有的"可能性"，高出于时间上真实存在的东西，但是并过分讴歌他们，而且主要地不"出乎"科学已有成就的发展路线；想象并不是完全"任意的"，因此，具有唤起读者想象的能力，这种幻想已为科学进步注定发展、人类闯入自然界力量至今独占统治地区的思想所取得。

威尔斯和波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正是大部分由"恣意妄想"统治者，甚至当出发点可以是逻辑性的，并且牵涉到具体科学现实性的时候：凡尔纳方面是人的理智和物质力量的联合，威尔斯和波方面以人的理智为主；因此，凡尔纳是更孚众望和更使人易于理解的。但是，同时在凡尔纳罗马化结构上这种平衡成为时间上受限制的，致使它的流行减少（更不要谈他的书艺术意义不大）；科学超过凡尔纳的幻想，他的书不是较多"心理上的刺激物"。

关于警察侦探冒险，例如，柯南－道尔也可以谈谈某些类似情况。它们在当时哄动，而到今天也由于各种原因几乎触动不了任何人了。一部分因为警察格斗方面今天人们知道得更多了，而柯南－道尔至少对大多数和平居民只是揭开了它。特别是因为在舍尔洛克·霍耳莫斯中有智力与科学过度理性的平衡。今天恐怕最引人入胜的是英雄个人的特点，"心理"技术本身，因此，波和哲斯脱顿是更加引起兴趣的等等。

1928年2月19日《狮像》(Marzocco)报上阿多利夫·法哲（《儒勒·凡尔纳的印象》）写道：凡尔纳许多小说的反英性质必须归之于法英竞争的那个时期，其最高点是法绍达冲突。这就是错误的不合时代的论断：反英主义是（也许现在仍然是）法国人民心理的基本要素；反德情绪相形之下是较新的，而且比之反英情绪较少根深蒂固，反英情绪在法国革命之前还不存在，它是在1870年以后发生的，即是在战败和认识那一悲惨事件之后发生的：法国不再是西欧最强的军事和政治国家了，因为德国没有盟国单独一国

战胜了法国。反英情绪上升到使现代法国形成为统一与现代的国家，上升到百年战争和贞德史诗反映于人民想象中；它们在近代为争夺大陆霸权（和地球霸权）斗争所加强，在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时期，达到最大的力量；法绍达冲突就其全部意义说，不能与法国人民所有文学证明的这种有威力的传统相比拟。

论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产生于专写"轰动一时诉讼案"文学的末位之上。可是，《基督山伯爵》类型的小说也和这种文学有关；谈到利用法律、特别是如果政治热情掺杂上法律的地方，难道这里也不谈罗马化的和具有人民思想体系情调的"轰动一时的诉讼案"么？难道《永久的犹太人》中的罗登不是对任何罪行或谋杀也不停止的"卑污的阴谋"组织者典型，并且相反，难道鲁多利夫王子和他对立，不是使其它阴谋和罪行溃败的"人民之友"吗？从这种小说典型过渡到纯粹冒险小说，标志着没有任何民主与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分的纯粹阴谋模式化过程：已经没有人民——善良、直率和浑厚——与暴政黑暗势力（伪善者、秘密警察，其活动与保障国家安全或个别统治者估名钓誉等等）的斗争，而所有的只是职业的或在某一特定地区专门化罪行与以规定的法律为基础活动的私人或国家合法秩序的力量之间的斗争。

关于著名的法国成套出版的"轰动一时诉讼案"的小说，在其它国家也有其相似之处。这套小说，往往是它们的一部分——关于轰动全欧的诉讼案，例如费尤阿利捷案件、里昂信使暗杀案等等——被翻译成意文。"审判"活动过去永远引起而且继续引起人们的兴趣；社会公众对待审判机关（常使自己威信扫地，因而给予私人侦探或非专家侦探以广泛活动场所）和对待犯罪者的态度常常

发生变化，或者无论如何，具有不同的色调。大罪犯常被置于审判机关之上，简直作为"真正"正义的代表者；浪漫主义、席勒的《强盗》、霍夫曼的短篇小说、安娜·拉德克丽芙、巴尔扎克的沃特林的影响是很大的。

《悲惨世界》中的日阿韦尔典型在人民心理方面是饶有兴趣的；日阿韦尔从"真正"正义的观点看来是不对的，但是雨果赋与他以讨人喜欢的特点，把他描绘成忠于"抽象"职责"性质的人"等等；根据甚至警察也可能是"受尊敬"的人这一传统，由日阿韦尔开其端。

彭桑·杜·特里尔的罗卡姆博利，加博里奥用给舍尔洛克·霍耳姆斯开路的自己的列科克先生，继续警察的恢复名誉。说英国人在其"审判"小说中"拥护法律"，而法国人吹嘘罪犯是不对的。这里发生了"文化"的过渡，过渡是某些知识界范围内也传播这样文学的情况所引起的。要记住苏，其小说在中等阶级民主主义者中享有很大声誉，发明了对职业罪行斗争的整个体系。

在这些侦探文学中常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机械的"，富有情节的；另一种是"艺术的"：哲斯脱顿今天是"艺术"观点最驰名的代表人物，正如波之一时为代表人物一样；而巴尔扎克在描写自己的沃特林时，研究罪犯的个性，但是在技术方面，他不是侦探小说的里手。

现在我们看看安里·日阿哥的书《维多克》(Henri Jagot. Vidocq, ed. Berger-Levrault, Paris, 1930)。《维多克》给创作以下典型奠定基础：如巴尔扎克的沃特林、亚历山大·仲马的脚色(他的特点部分地也可以在雨果的然-瓦利然，特别是在罗卡姆博耳中找到)。维多克以制造伪币者由于自己的疏忽被处徒刑8年，20次逃跑等等。1812年充当拿破仑的警察职务，指挥为他特设的暗探队15年；他以自己轰动一时的被捕而出名。维多克为路易·菲力普

解除职务，建立了自己的私人侦探所，但这给他带来不大顺利，因为他只能在国家警察系统中活动。他于1857年逝世。留下了备忘录，不是他一个人所写；其中有许多过甚其词和许多虚张声势之处。

我们看一下1930年8月《飞马》(Пегас)发表的阿利多·索腊尼一文《科南－道尔和侦探小说的成就》。引起兴趣的是文中分析了这类文学，并且把直至今日给与它的各种鉴定引申。索腊尼谈到哲斯脱顿和关于勃腊翁神父短篇小说集时，对两种文化因素熟视无睹，但它们是重要的：

1)他不强调讽刺画的气氛，这种气氛特别表现在《勃腊翁神父无罪》一书中，而正是这些讽刺画的特点也构成艺术性的因素，这种因素提高了哲斯脱顿侦探小说的价值，当时它的表达并没有完全达到完美的程度；

2)索腊尼不记得以下事实：关于勃腊翁神父的小说，是"赞扬"天主教与罗马宗教界——通过利用忏悔和忏悔者自己的作用、人神间精神领袖和仲介人的道路，以认识人的心灵一切曲的精神来被培养的人——作为"科学性"与科南－道尔新教徒实证论心理的对照。索腊尼在其文章中谈到各种具有极大文学意义，特别是从盎格鲁撒克人方面技术上改进侦探小说的各种尝试。舍尔洛克·霍耳姆斯及其对学者与心理学家两个出色的鉴定，在这里是影射的人；人们常常企图使那个、或另外一个、或二者一起的鉴定完善。哲斯脱顿在其神父勃腊翁中正是坚持心理方面，坚持归纳法与演绎法的表演，但是仿佛追随这种倾向，创造了侦探诗人加勃里厄耳·赛姆的典型，作得太过火了。

索腊尼描绘侦探小说在社会各阶层中从所未闻成就的图景，竭力解释这种成就的心理原因，把它仿佛看成抗议现代生活机械与单调的表现，看成摆脱日常平凡无味的方法。但是这样的解释适用于一切文学形式，无论是人民的文学，也无论是艺术的文学，

从骑士的诗篇（难道堂·吉诃德也不企图，甚至在直接的意义上说，逃避西班牙农村日常生活的平凡与单调吗？）到各种报纸附刊连载小说。那么，所有文学与诗歌不是作为反对日常单调无味的麻醉剂工具吗？无论如何，索腊尼的文章提出了必要的资料以供进一步更有机地研究人民文学的这种典型。

发生一个问题，侦探文学传播的原因在那里？这是更多的普遍问题方面之一：何以说明非艺术文学的受欢迎呢？毫无疑义，这种情况的原因，具有实际的和文化的（政治的与道德的）性质；并且以这样的普遍形式提出的这种答复是最正确的，即是一切接近于真实。但是难道由于或是实际的或是道德的和政治的原因，并且只是或多或少因为适应艺术的口味，适应美的认识和享乐的志趣，艺术文学就得不到推广吗？实际上，人们读书出于实际动机（并且需要试图说明为什么某些动机具有比其他动机更加普遍的性质），而再次读书即为了美学的享乐。当第一次阅读时，几乎任何时候也没有发生美学情感。这在戏剧上以更大的程度看出来，那里美学的情感，只是组成观众表现的兴趣的最低限度的"百分比"，因为这里起作用的是其他种种因素，其中许多因素甚至不属于智力方面的动因，而只是生理的动因，例如，sex appeal①等等。在其他场合，戏剧上发生的美学情感并非受文学作品本身的影响，而是由于戏剧演员和导演的解释。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为要使剧本本文受到解释，它不应当是"艰难的"和心理方面精细的，而是恰好相反，应当是"简单而易懂的"，其意义即是剧本描写的情感应当是深刻"人性的"并且接近于每个人本身的体验（复仇、荣誉、母爱等等），由此可见，就是在这种场合，分析也复杂化了。在诸如《公民之死》、《两孤儿》、《马尔亭神父的篮子》等等演出中较之庞大而复杂的心理剧，对创立传统的大大演员给

① 英文性欲之意。——译者

与更多的掌声；在第一种场合，演员得到无保留地掌声的补偿，在第二种场合，这种掌声具有更慎重的性质，并且只是给与演员——观众的喜爱者，与上演的戏剧无关等等。如索腊尼所提出的对流行小说成就大致同样的解释，我们在菲力普·布尔齐奥论亚历山大·仲马《三剑客》一文（发表于1930年10月22日《新闻报》并且转载于11月9日《意大利文学》杂志（摘录）中也找到。布尔齐奥认为小说《三剑客》也正如《堂·吉诃德》和《狂怒的罗兰》都是冒险主义精神极其成功的体现，“接近人的本质的某种东西，看来这种东西虽然很费力气，却是逐渐从现代生活中排挤出去。存在成为合理的（而也许更正确地说是迫不得已的合理化的，因为如果存在对统治范围是合理的，那末对受统治的人则是不合理的，同时也联系到经济一实践活动，因此，这种迫不得已，纵然甚至是间接地，也扩张到‘知识界’）和有组织的越多，社会纪律、个人任务日益成为确定的和日益容易成为预料的（但是象危机和历史浩劫所指示的，不是对领导者说）越严厉，则对冒险家所留的地位越少，正如在私人领地围墙挤占中，给处女林所留的地方越少了。泰勒制是好事，人是易于适应的动物，但是也许把他变成机器却有某种界限。如果人们问我西方耽忧的深刻原因，我毫不动摇地答复说：信心的低落和冒险主义精神的消失。谁战胜了——泰勒制呢，还是‘剑客’呢？这已经是另外的谈话了，并且三十年前仿佛准备好的答复，现在应该收敛起来了。如果现在的文明不趋于灭亡的话，那末，我们在这两种现象混合的兴趣下将要在场了”。

问题在于布尔齐奥不注意以下的事实：人类大部分活动永久泰勒制化了，并且纳入铁的纪律范围，这种活动力图借助幻想与梦想逾越现存组织紧紧挤占的范围界限。但是难道宗教——最大的冒险，人类总有一天集体建立的最大的“乌托邦”——不是摆脱“尘世”的手段吗？巴尔扎克谈到抽采是贫穷的鸦片（其他人后来重复

说这句话)不也是这个意思吗？但是最明显的是除唐·吉诃德外，还有散绰·潘萨，他不愿冒险，而愿做一个相信生活的人，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大多数人正是苦于人类固执“未来不可知”论，苦于自己平凡生活的毫无希望，即是苦于过分大的可能去“冒险”。

在现代世界这个问题较之过去具有另外的色彩，因为具有从所未闻规模的存在的迫不得已的合理化，日益在巨大程度上触及中等阶级和知识界；但是，甚至在这个场合，问题也并不在于冒险主义精神的“低落”，而在于日常生活的太多冒险性，即是在于生存的非常不可靠，结合着一个人不能和这种不可靠斗争的信念；因此梦想自己本身自由创造精神应该达到的“美好”的和有兴趣的冒险，反对“讨厌的”和丑恶的冒险，因为后者是强加于他人，而非依据自愿提出的条件所引起的。索腊尼和布尔齐奥所引述的论证，也能同样顺利地用来说明运动的“急性人”，因为他们说明的太多，因而就是什么也没有了。这种现象是陈旧的，至少作为宗教也是多方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它也有积极的方面，即是愿意“扩大自己的视野”，认识那种人们认为高于本身生活的生活方式；提高自己个性的愿望，追求理想的模式；愿意在某种条件下可能做到的更好地认识世界和人们，认识趋炎附势等等。

报纸附刊连载小说的文化影响

1931年《文化》杂志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期我们来看一看。乌拉迪米尔·波兹涅尔在他发表于这期的文章中公正地维护了以下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从继承性观点说，是从苏及其他人小说典型的报纸附刊连载小说开端的。当我们分析人民文学这种风格的发展时，必须注意这种继承性，因为它指出精神生活的某些方面(精神动机与兴趣、灵敏性、意识形态等等)能够有双层的

表现：纯粹机械的，具有轰动一时情节的（苏和其他人等）和抒情的（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部分维·雨果）。现代人常常不注意某些文学现象的危害性，如特别是对苏发生的这种情况：社会各阶层都读他的书，他甚至"轰动"了文化人，而后来退步到"只是人民来读的作家"（从"初次阅读"的书留下来的仅仅是或者几乎仅仅是"文化的"认识或题材的认识，而"人民"，"初次阅读"书籍的读者，无批判地对待已读过的东西，并且他的激动往往产生于他同情一般的意识形态，在这些书中，一般意识形态常常是人为地和任意地表现出来的。

根据这种原因，应当转而作以下的研究，如：(1)马里奥·朴腊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肉欲、死亡与魔鬼》(Mario Praz, La carne, la morte e il diavolo nella letteratura romantica p p.X-505, Milano-Roma, ed. La Cultura)（参阅1931年3月《辽奥纳多》〔Леонардо〕卢伊哲·佛斯科洛·别涅迭特托的书评；这篇书评指出，朴腊兹没有把文化各阶段之间做出精确的划分！而由此别涅迭特托也有反对意见，其实他本人显然没有判明历史—文学问题上的历史的联系）；（2）谢尔委·厄季延：《从〈新厄洛伊兹〉出现时代到革命前夜法国浪漫主义派》(Servais Étienne, Le genre romanesque en France depuis l'apparition de la«Nouvelle Héloïse» jusqu'aux approches de la Révolution; ed. Armand Colin)阿尔曼·科连版；（3）阿利斯·基耳连：《从乌耳波耳到安娜·拉德克丽芙恐怖小说或"黑色小说"及其对1840年前法国文学的影响》(Alice Killen, Le roman terrifiant ou «roman noir» de Walpole à Anne Radcliffe, et son influence sur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jusqu'en 1840; ed. Champion)尚皮尼版；以及烈治纳利德·夫·哈尔特连德（同一出版家），《瓦利帖尔·斯科特和"疯狂"小说》(Reginald W. Hartland,

Walter Scott et le roman«frénétique»)。波兹涅尔的论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冒险的小说"，他所作的这种论断也许受日阿克·里维耶尔论述《冒险小说》（可能发表在《新法兰西评论》〔NRF〕上）一文的影响，里维耶尔把它描写为"包括戏剧与心理活动一起的广大的画面"，正如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和乔治·厄耳利奥特对此所理解的一样。

现在我们为了比较起见，转过来看看安德烈阿·穆夫列发表在1931年2月1日《法兰西信使报》(Мекюр де Франс) 的《小说一小品文风格》。据穆夫列的话说，报纸附刊连载小说诞生于需要幻想的基础上，人们尝试过的，也许无数小小人物还正在尝试的幻想的基础上，仿佛他们愿意破坏生活的贫乏的单调性，他们认为自己命定于这种生活。一般的意见可以涉及每一篇小说，而不仅涉及报纸附刊连载小说；需要分析报纸附刊连载小说把什么特别幻想给与人民，和这种幻想怎样依从于历史-政治时期而变化；在这里有趋炎附势的一份，但民主的夙愿也植根于此，这种夙愿也反映在经典的报纸附刊连载小说中。应当把拉德克丽芙小说典型的"阴暗"小说，富有情节、冒险、侦探、黄色、犯罪生活等等小说也以这种观点审查。在报纸附刊连载小说中也遇到冒充绅士的小人，描写贵族或一般上层阶级生活，但是这点讨妇女、特别是少女的欢心，其实她们每个人都想美丽帮助她钻进上层社会。

据穆列夫的意见，报纸附刊连载小说的"经典著作"是存在的，但这应当在一定的意义上去理解；显然，人们所了解的经典的报纸附刊连载小说，是指从雨果起到苏和仲马带有各种色调的"民主主义小说"而言。应当读一下穆夫列的文章，但在这里必须注意，他把报纸附刊连载小说就体裁等等上看作"文学风格"，看作"人民美学"的表现，这是不对的。人民有兴趣的是内容，但是毋宁说，要使

引起他们兴趣的内容，是被大艺术家所叙述的。应当回忆我写过人民爱莎士比亚、爱希腊经典作家，而在现代则爱伟大的俄罗斯小说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在音乐方面则爱凡尔第。

老罗尼在其于1930年10月4日发表在《新文学》上的《文学的重商主义》一文中断言，维克多·雨果在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影响下和受这一作品成功的影响下，写了《悲惨世界》，苏的作品的成功如此之大，以致在出书后40年出版家拉克鲁阿对这种成功还一直吃惊。罗尼写道："无论报纸的编辑也好，报纸上文学附刊的作者也好，都在力图使附刊写得适合读者口味，而不是适合它们的作者的口味"。但这也是片面的评述。实际上，罗尼只是对一般"商业"文学（从而也是对诲淫文学）提了许多意见，并且特别是关于文学的商业方面。"商业因素"和读者一定的"口味"相符合，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例如，1848年前后所写的报纸附刊连载小说，曾具有一定的政治-社会倾向性，而即使在今天，它们对感到生活仍然象1848年的人一样的读者，也享有声誉①。

"超人"的人民来源

当我们每次接触到不论什么样的尼采的崇拜者时，很有益处的是提出问题并力图解答，是否有他关于反对普通道德的"超人"的概念，纯粹尼采的来源，即是它们是不是应当归于"高级文化"范围的或者应当寻求其根源于更加有限的——例如，与报纸文学附

① 谈到雨果的时候，应该回想起他和路易·腓力普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因而也就回忆起他在1848年所采取的立宪君主制立场。指出以下的事是有趣味的：与《悲惨世界》同时，他也写了《关于目击者》札记，于逝世后出版，这两部作品永远不是互相协调的。这些方面必须注意，因为雨果通常是由全面的本质来估价的等等（因此《世界评论》（Рьвю дe лe Монд）上发表的文章，不知是1928年、还是1929年，最正确地说是1929年）。（参阅安德勒·德·勃烈汤发表在1929年2月15日《世界评论》上的文章《维克多·雨果—院士》。——意文版编者）

刊有联系的范围内思想工作的成果。(但是难道法国报纸附刊连载小说对尼采本身没有什么绝对影响吗？这里回忆一下是适当的：今日降落到瑞士报纸低栏这类文学十分流行于知识界中，至少在1870年以前，正如今日所谓"黄色"小说一样)。无论如何，看来可以断言，臭名远扬的尼采"超人性"，決不是由扎腊土斯特腊，而是由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开端，并且采取了理论形式。大仲马在他的《基督山伯爵》中最充分代表的典型，在同一作者其他小说中不止一次重复，例如，从《三剑客》中阿特莫斯，在朱塞佩·巴尔扎摩中，也许甚至其他人物中可以看到这种典型。由此可见，当你读到某某是巴尔扎克的崇拜者时，应当提起注意，要知道巴尔扎克著作中也有许多来自报纸附刊连载小说中的东西。沃特廉本身也是超人，并且在于他在《高老头》小说中对腊斯亭亚克所说的，也有许多尼采的日常意义中的东西；同样需要既谈及腊斯亭亚克，也谈及留巴姆朴尔①。

尼采不是这样简单地达到他的成就的：尼采全集由出版人莫楠尼出版，莫楠尼本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根源和他的常久顾主也本来是为人熟知的。

沃特廉和"沃特廉的朋友"在帕奥洛·瓦列尔的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他的《人群》(回忆一下都灵人——《人群》中的"沃特廉的朋友")。大仲马小说中吸取来的剑客的意识形态在人民中有广泛的反响。

不难了解、以大仲马和巴尔扎克小说影响来为自己的内心思想辩护，不知如何地羞愧；因此为他们引证尼采辩护，并且赞扬巴尔扎克为语言艺术家，而不是报纸附刊连载小说主角典型小说人物之创造者。但是，当然从文化的观点看来，实际的联系是存在

① 文钦措·莫烈耳洛从这样的精神继续发展中成为"腊斯亭亚克"，并出面保护科尔腊多·勃兰多。

的。"超人"的典型——这就是基督山伯爵，他是由具有低级浪漫主义，还更突出地表现在阿托斯和朱塞佩·巴尔扎摩的"宿命论"特殊荣耀解放出来的。基督山伯爵搬到政治舞台上，当然形象特别生动（基督山伯爵对"私人敌人"的斗争等等）。可以指出，即使在这一方面，某些国家还是仿佛不开通的、较之其他国家是落后的；虽然对欧洲大多数国家说来，舍尔洛克·霍耳姆斯甚至已经成为非常落后的东西，可是还有些国家简直过着基督山伯爵和费尼莫尔·库彼尔（"红皮肤的"、"铁的花边"等等）的日子。

我们转到马里奥·朴腊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肉欲、死亡与魔鬼》一书。除研究朴腊兹外，还需要作其他的研究：关于人民文学中的"超人"和关于他对现实生活及习惯的影响（这些浪漫主义形象对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界的特别影响；这是他们的"鸦片"，较之他们个人生活的缺陷和狭隘，这些他们的"人造天堂"；某些谚语的受人欢迎，就是由此而来，例如"做一天狮子，比做一百年绵羊要好"，正是对那些真正的、绝望的绵羊，这谚语有特别巨大的声誉。多少这样的绵羊说："阿呀，那怕是只在一天之内我有权"等等；做一个"铁石心肠的法官"，这是那些亲身受基督山伯爵影响的人的梦想。

阿道尔夫·奥摩第欧指出，宗教文学是一种文化上"不应收归国有的财产"，谁也仿佛不愿研究它，似乎它在民族与人民生活中没有任何意义和任何作用。把"不应收归国有的财产"的碑铭和宗教界满足于它的特殊文学不受批判的分析的情感放在一边，我们必须指出，在谁也不研究、谁也不想以批评态度对待的民族与人民文化生活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领域，正是报纸附刊连载小说在本来意义和广义上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由此应当归于维克多·雨果，甚至于巴尔扎克）。

在《基督山伯爵》里，有两章以报纸附刊连载小说精神公开谈

论“超人”：一章是当基督山伯爵与维利佛尔姆检察官会晤时，标题为“意识形态”，另一章叙述基督山伯爵第一次赴巴黎在莫尔谢尔夫子爵家早餐情况。需要注意的是即在大仲马的其他小说中，有没有类似“意识形态”的萌芽。在《三剑客》中阿托斯的形象，有低级浪漫主义典型的苦命人的较多的特点；在这一小说中，剑客们本身的冒险（在逃避法律）活动，可以说大半激起老百姓的个人主义情绪。在《朱塞佩·巴尔扎摩》中个人的力量与黑暗的魔力、与欧洲共济会的支持相联系，因此，对来自民间的读者，这样的例子较少有感染力。巴尔扎克的形象得到了更具体的艺术体现，但是他们精神上接近人民浪漫主义。当然，不应把腊斯亭克、沃特廉和大仲马的人物混为一谈，并且正是因此，他们易于“承认”不仅对如帕奥洛·瓦列耳及其《人群》中的同事这样的人们的影响，而且也对如莫烈耳洛中等知识分子、但他自认为（或许多其他人认为）属于“高级文化”知识分子的影响。司汤达及其柔利延·索烈利的形象和他的小说角色中的典型，很接近于巴尔扎克。

至于尼采的“超人”，则除法国浪漫主义（特别是拿破仑文化）的影响外，露出来种族主义倾向，戈宾诺和后来的张伯伦以及泛日耳曼主义中（特列契凯、实力论等等）最强烈地表现出来。但是，也许在大仲马小说中存在的来自人民的“超人”应当认为不外是对封建制产生的种族主义情绪“民主”反应的表现，并且应当和欧仁·苏小说中吹捧“法国语风”联系起来。

谈到对这种法国人民小说倾向的反应时，必须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分裂派教徒—这就是基督山伯爵，他是受到泛斯拉夫主义者-基督教徒“尖锐批评”的。熟悉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化》专刊号后，可以看到法国报纸附刊连载小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怎样的影响。

在“超人”的人民性格中，有许多戏剧的、宁可说“歌剧女主角”

较之“超人”更具有摆样子的因素；有许多“主观”和“客观”的形式主义，有做“班上第一名”的幼稚傲气，但是首先要被承认和宣布为这样的。关于下层的浪漫主义和现代生活（《基督山伯爵》精神中的气氛）某些方面之中的联系问题，应当读一读1932年12月15日《世界评论》上路易·日伊的文章。这种“超人”典型在戏剧上（特别是在法国的戏剧上，在1948年小品文学许多连载的倾向上）；看看鲁哲罗·鲁哲里的“古典”剧目，例如《朴里奥耳侯爵》、《奸计》等等，以及安里·伯恩斯坦的许多著作就够了。

巴尔扎克[①]

应当看一看发表在1931年8月8日《新文学》上波利·布尔热的《巴尔扎克的政治与社会思想》一文。布尔热在文章起首就提出意见说，现在巴尔扎克思想被赋与日益重大的意义：“传统主义的（即是强迫的）在我们看来日益成长的学派把他的名字与波那尔、列·朴勒、甚至和泰纳本人的名字并列”。

但是在过去不是这样。森一标夫在发表于《周报》中的纪念巴尔扎克逝世后的文章中，甚至没有提到他的政治与社会思想。称赞他是浪漫主义者的泰斗，没有承认他的作品有任何理论意义。甚至天主教的批评家卡罗在第二帝国初期，认为巴尔扎克的思想是徒劳无益的。福楼拜写道，巴尔扎克的政治与社会思想不值一谈：“他是个天主教徒、王朝复辟主义者、私有主，性格异常大方，但是二流人物”。左拉论及他时写道：“较之这种个人拥护专制政权再

① 应当注意实践哲学的奠基人怎样赞扬巴尔扎克，并且关于恩格斯未发表的信件，信中从批评的观点论证这种赞扬（参阅1888年4月弗·恩格斯给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发表于《论文学与艺术集》，巴黎，《社会主义国际》版，[俄译本此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6页——俄译本编者]——意文版编者），（此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40页）。

没有什么更加古怪的事了，这个人的天才实质上是在民主传统中发展的，并写下了自己革命的作品”。

布尔热的文章是一目了然的。他要指明，巴尔扎克为实证主义的，但反动的小说奠定始基，谈到为反动派服务的科学（莫拉斯典型），其实是离开康德的实证主义的真正命运。

巴尔扎克和科学

我们就拿《人间喜剧》的《总序》来说，巴尔扎克写道，自然科学家获得永久的荣誉，他证明了“生物是在其旨在发展的环境中，获得自己外部形式，或者更正确地说，获得自己显著特征的基础。动物的种类是由这些差别决定的。我深入了解这种分类法之后，就明白社会正象自然界一样。要知道社会由适应着他活动的环境的人中，创造了一如动物界生存的那么多的形形色色的类别。正与动物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因而存在着类别，并且将来永远存在着。士兵、工人、官吏、懒汉（!!）、学者、国务活动家、商人、海员、诗人、穷人（!!）、神父之间的差异，正如狼、狮、驴、乌鸦、鲨鱼、海豹、绵羊相互的差别一样的重要。

巴尔扎克描写了所有这一切，甚至郑重地对待，设想着用这种比喻可以建立整个社会体系，这是不足为奇，甚至绝不抹煞作为艺术家的巴尔扎克的伟大。

值得注意的是，今日的布尔热，也正如他所说，“传统主义学派”，创立了自己的社会-政治体系，把这些贫弱的、没有任何创造活动加强的“科学”幻想作为基础。从这些前提出发，巴尔扎克对自己提出了“最大限度改善这些社会类别”和达到它们之间的和谐，但是因为“类别”产生于环境，必须“保持”并且组织这种环境以便维持和改进这种类别。看来福楼拜没有错误，他断言对巴尔扎

克社会思想题目是不值得辩论。布尔热的文章指出，法国传统主义学派是何等的处境不佳。

但是如果巴尔扎克的整个体系作为“实践纲领”即是从布尔热观察这种体系的观点看没有任何意义，那末，它对于恢复巴尔扎克诗的境界、他的体现在艺术形式中的世界观、他的其效果并不削弱“现实主义”提供兴趣的因素还是包含着的，尽管他的意识形态根源具有反动的、复辟的、君主专制的等等性质。巴尔扎克引起实践哲学奠基人的那种称赞是显然的；要知道巴尔扎克清楚地了解，人是在其形成与生活中的社会条件一切综合的表现，并且为了“变革”人，就应当变革这些条件的全部综合。他从政治和社会观点看来是反动分子这一点，只是从他作品的非艺术部分、插话、前言等等看出来。所有这些条件与环境的综合，应当作“自然主义地”了解，也都是对的；并且在事实上，巴尔扎克是著名的法兰西文学流派的先行者等等。

统计性质的意见

最流行的驰名杂志，例如，《小说月报》、《星期日邮报》、《画报论坛》、《插图晨报》发表了多少意大利作者的小说？《星期日邮报》在其全部存在时期（大约36年）在发表的几乎百篇文章中，可以说连一篇意大利作者的小说也没有说。《画报论坛》共发表过几篇（最近发表瓦列里奥·品亚帖耳利公爵一批侦探小说）；但是应当指出，《画报论坛》——是一个较之《星期日邮报》极少流行的杂志——从编辑工作观点看组织得不那么好，在选择小说典型时也不那么严谨。

有趣的是看一看已发表的惊险小说的作者是什么国籍以及这些小说属于什么典型。《小说月报》和《星期日邮报》发表许多英国

小说（毕竟占优势的，应当是法国小说），特别是侦探典型的小说（它们出版了《舍尔洛克·霍耳莫斯》和《阿尔先·柳彭》，但也有德国的、匈牙利的（男爵夫人奥尔施极负盛名，并且她由法国革命时期的小说，即在《小说月报》上也多次再印，《小说月报》也应享有巨大声望），甚至还有奥地利的（格维多·布特比的小说出过几版）；当然侦探小说或类似侦探小说，仍然占重要地位，后者具有渗透了保守落后思想与专门着笔于奇异情节的典型。有趣的是要知道，正是谁在《晚邮报》上有全权选择这些小说，并且给了他什么指示，因为在《晚邮报》上，一切都组织得十分合理。《插图晨报》虽然也在那不勒斯出版，但是登载了《星期日邮报》上发表过的同样典型的小说，固然受财政原因所支配，有时也受满足文学口味的愿望所支配（在我看来，正因此登载了康拉德、史蒂文森、伦敦的作品）；就都灵《人民每日画报》而论也应当说是同样的。《星期日邮报》编辑部相对地、甚至也可以说在绝对意义上，是最多扩散流行小说的中心；它每年至少出版小说 15 部，而且印数极大。后来有桑左涅奥出版社，仿佛也是定期出版些什么。

如果比较一下桑左涅奥出版社活动的各个时期，那末，这种比较就会提供在老百姓口味中发生变化的一种多少正确的图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因为桑左涅奥出版社没有指出出版年头，并且常常不载明再版几次；在批审目录时终究可以得出某些结果。50年前出版的（当《世纪》报正在时兴时）图书目录和今天的目录作一比较，已经提供了一定的兴趣，所有哭泣—伤感性质的小说都被忘掉了，至今还应保留的那种典型的一些《杰作》（例如，里舍布尔的《磨坊的黑头莺》）（Капинера дель мулино）；但是，这还不是意味着在外省公众某些阶层中不读这些书，那里还有“无成见的人们”充分欣赏波利·迭·科克，而且对《悲惨世界》的哲学热烈讨论。由此可见，有兴趣的是追求出版连载小说，直到成为投机对



象，价值几十里拉，并且由奖金中获利。

阿多阿尔多·彼里诺和不久前涅尔比尼出版了流行小说中的一些，它们都有反教权主义的倾向性，而且继续了葛威拉齐的传统。关于很好地出版流行小说的萨拉尼，就无须提了。需要编一个流行小说出版者的目录。

人民文学中的“主人公”

老百姓对自己文学态度最显著方面之一如下：引起人民兴趣的，不是什么名字，不是什么作者个人，而只是最主要的活动人物。人民文学作品的主人公进入人民智力生活的范围后，和自己的“文学根源”脱节，并且具有历史人物的意义。他们的一切生活，从出生到死亡都使人发生兴趣，正是这一点说明连载的成功，甚至主人公是伪造的，当形象的第一塑造者在其书中使主人公死亡，而“续者”又使他复活来大大满足读者，读者重新热情地迷恋他并恢复了形象，根据其加工材料的基础给他以新特点，所谓伪造的情况，就是在这种场合下发生的。为要了解幻想世界在人民生活中具有独特神话具体性，并不需要了解字面意义上的“历史主人公”，虽然也发生这样情况：人民中的读者已不能在过去历史真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划条界限，并且争论有关小说主人公的事，似乎问题在于真正活跃着的、但不知是在怎样改造的形式中的人们。有这样的情况，例如，当主人公由于有类似特点把不同的小说混淆不清的时候：民间说书人把许多角色的类似一点结合为一个角色的形象，并且断言：为要被认为是“有教养的人”，正需要这样办。